汉唐考古学讲稿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系列教材

冉万里 编



三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建黎
韩宏伟
书装设计　陈　飞



定价 50.00 元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系列教材

汉唐考古学讲稿

冉万里 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考古学讲稿 / 冉万里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736-439-9

Ⅰ. 汉… Ⅱ. 冉… Ⅲ. ①考古-研究-中国-汉代 ②考古-研究-中国-唐代 Ⅳ.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134422号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系列教材

汉唐考古学讲稿

冉万里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5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439-9
定　　价　50.00元

前 言

这本《汉唐考古学讲稿》，实为中国考古学通论以秦为界的下半部分，是为了配合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通论》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所涉及的内容起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明亡，即公元前221年～1644年，将近2000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跨度大，几乎涵盖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研究对象纷繁复杂，头绪较多。其学科性质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特别是其中的秦汉和隋唐部分，属于典型的历史考古学。

众所周知，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的界限在于文字的发明。但由于文字的发明有早有晚，所以各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和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各有不同。历史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两者都以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由于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证文献记载，而史前考古学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供依据，所以两者的研究任务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任务，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

由于史前考古学主要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时也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历史考古学主要研究铜器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两者所研究的遗迹与遗物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根本方法是一致的。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史前考古学要充分与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历史考古学则必须与历史学相结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建筑学等分支。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而历史考古学则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尽管历史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有一定的不同，但在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等方面的方法则是一致的，都离不开类型学和地层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习历史考古学时，不能将其理解为历史学的附属，它仍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考古学研究的总目标是要究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历史考古学

也不能例外，这一点则与历史学是相同的。总而言之，二者虽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过和方法有别，但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学习，始终要把握住这些基本理论方法，不可有所偏离。尽管如此，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还存在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足。在“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目前汉唐宋元考古学中，两汉和唐代考古工作开展较多，宋辽金元明考古学比较薄弱。从总体上看，汉唐宋元考古发掘和研究缺乏统筹规划和宏观控制，薄弱环节和缺环较多；在发掘中有重墓葬轻遗址，重大墓轻小墓，或碰到什么挖什么的倾向，随意性大，学术目的性不够明确；在研究方面，对汉唐宋元考古学课题构成、学科生长点、前沿课题、主攻方向缺乏共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广度和力度不够；学科基本建设薄弱，至今尚未建立主要遗迹与遗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和其他时期考古学一样，资料整理、编写和出版滞后，经费短缺，人才断层，科技手段落后或缺门。针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汉唐宋元考古学应当加强都城和城址考古、手工业遗址及其产品、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制度、中外比较和中外交流考古学以及边疆考古学的研究。特别是墓葬研究方面，应当加强墓葬分区、分期和类型研究，从而建立墓葬形制和主要遗物组合以及形制的发展演变序列[①]。这些看法为汉唐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学习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教材是在编写者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最初的编写目的仅仅是作为教辅材料使用而已，通过使用，学生们认为便于阅读，可以通过它基本了解目前汉唐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订，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于主要供学生使用，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采用目前考古学界通行的观点，并辅之以其他观点的介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编写中分别参考了王仲殊先生、宿白先生、段鹏琦先生、徐苹芳先生等前辈学者所创立的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的基本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新资料，并根据新发现修正了一些现在看来已经明显滞后的观点。具体各部分的内容，也参考了许多前辈学者的思路、方法、观点和内容，如夏鼐先生关于玉器的论述，俞伟超、信立祥先生关于画像石和壁画墓的论述，宿白、马世长、丁明夷、萧默先生关于佛教遗迹的论述，安家瑶先生关于玻璃器的论述，冯先铭、李德金先生对瓷器的论述，王世襄先生对漆器的论述，徐苹芳先生对于简牍的论述，韩伟、齐东方先生关于金银器的论述等，不一而足。编写者只是将这些观点和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编排，就像一个采摘花朵的孩子，将采摘的花朵编织成花篮呈现给大家。同时，在此向前辈学者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对行文过程中引用的重要资料、观点，以参考文献的

①本刊记者：《“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纪要》，《考古》1997年第10期。

方式列在各章节的末尾部分，一般以节为单位按出版或发表的年代顺序列举。为了便于学生阅读，对有些重要名词以页下注释的方式进行解释，对引用的一些发掘资料等也以页下注释的形式列出，以便于学生查阅。

由于汉唐时期的考古学，内容繁杂，头绪多，而且新发现层出不穷，在编写过程中，不仅深感责任重大，还有力不从心之感。但为了教学需要和学生们便于学习，勉为其难，努力完成了此事。毕竟，一个人能力和水平是有限的，讲稿中的错误或疏漏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位前辈和同仁的批评指正，特别欢迎学生们提出批评意见，这样可以使编写者在以后的教学中或教材的日后修订时，得到改正和提高。

目 录

第一章　秦汉考古 ………………………………………… 1
　第一节　绪论 ………………………………………………… 1
　　一、断代与分期 ……………………………………………… 1
　　二、文化分区 ………………………………………………… 3
　第二节　重要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 4
　　一、都城遗址 ………………………………………………… 4
　　　（一）咸阳城 ……………………………………………… 5
　　　（二）长安城 ……………………………………………… 8
　　　（三）洛阳城 ……………………………………………… 13
　　二、县邑遗址 ………………………………………………… 15
　　　（一）内地县邑 …………………………………………… 15
　　　（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 20
　　三、聚落遗址 ………………………………………………… 21
　　四、长城、鄣塞与烽燧遗址 ………………………………… 23
　　五、其他 ……………………………………………………… 26
　第三节　秦代帝陵与墓葬 ……………………………………… 29
　　一、帝陵 ……………………………………………………… 29
　　二、秦代墓葬 ………………………………………………… 37
　第四节　汉代帝陵与墓葬 ……………………………………… 39
　　一、帝陵与诸侯王、列侯墓 ………………………………… 39
　　　（一）西汉帝陵 …………………………………………… 39
　　　（二）东汉帝陵 …………………………………………… 43

（三）诸侯王和列侯墓 …… 44
二、墓葬 …… 45
（一）分类 …… 45
（二）地面设施 …… 50
（三）葬具与葬俗 …… 51
（四）随葬品 …… 54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器物 …… 61
一、秦汉时期的陶瓷器 …… 61
（一）建筑用陶 …… 61
（二）秦汉陶瓷器 …… 64
二、汉代铁器 …… 69
三、汉代铜器 …… 71
四、秦汉时期的漆器 …… 76
（一）秦代漆器 …… 76
（二）汉代漆器 …… 77
五、简牍、帛书 …… 80
（一）简牍的基本概念 …… 81
（二）简牍与帛书的发现与研究 …… 82
六、汉代碑刻 …… 92
七、货币与度量衡 …… 93
（一）秦代的货币与度量衡 …… 93
（二）汉代的货币与度量衡 …… 94
八、汉代玉器 …… 98
九、汉代玻璃器 …… 102
十、秦汉金银器 …… 102
十一、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 …… 103
第六节　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103
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汉代遗存 …… 103
二、新疆地区的汉代遗存 …… 106
三、西南地区的汉代遗存 …… 112
四、南越国的墓葬与遗址 …… 115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考古 …… 118
第一节　中原地区 …… 118
一、重要遗址 …… 118
（一）城址 …… 118
（二）矿冶遗址 …… 125
二、帝陵 …… 126
（一）西晋陵 …… 127
（二）北魏陵 …… 127
（三）西魏永陵 …… 131
（四）北周武帝孝陵 …… 131
三、墓葬 …… 132
第二节　南方地区 …… 144
一、城址 …… 144
二、东晋、南朝陵墓 …… 146
（一）东晋、南朝陵墓的基本特征 …… 146
（二）陵墓举例 …… 146
三、墓葬 …… 148
（一）长江中下游墓葬 …… 148
（二）闽广墓葬 …… 153
（三）川黔滇墓葬 …… 154
第三节　东北地区 …… 156
一、魏晋十六国墓葬 …… 157
二、高句丽遗迹 …… 157
（一）城址 …… 158
（二）墓葬 …… 160
第四节　北方地区 …… 164
一、拓跋鲜卑遗迹 …… 164
二、慕容鲜卑遗迹 …… 166
三、北魏城址 …… 167
（一）都城 …… 167
（二）其他城址 …… 169

四、大夏和吐谷浑城址……………………………………………… 170
（一）大夏城址 ……………………………………………………… 170
（二）吐谷浑城址 …………………………………………………… 171
五、平城墓葬…………………………………………………………… 172
六、河西魏晋十六国、北朝墓葬……………………………………… 174
第五节 新疆地区………………………………………………………… 175
一、吐鲁番一带的遗迹………………………………………………… 175
（一）城址 …………………………………………………………… 176
（二）墓葬 …………………………………………………………… 177
二、若羌和民丰附近的鄯善遗迹……………………………………… 180
（一）若羌附近的遗址 ……………………………………………… 180
（二）民丰尼雅附近的遗址与墓葬 ………………………………… 183
三、库车附近的龟兹城址……………………………………………… 185
第六节 瓷器与瓷窑遗址………………………………………………… 187
一、南方地区的瓷器与瓷窑遗址……………………………………… 188
二、北方地区的瓷器与瓷窑遗址……………………………………… 190
第七节 简牍……………………………………………………………… 192
第八节 货币与度量衡…………………………………………………… 193
一、货币………………………………………………………………… 193
（一）三国时期货币 ………………………………………………… 193
（二）两晋时期货币 ………………………………………………… 194
（三）南朝时期货币 ………………………………………………… 194
（四）北朝时期货币 ………………………………………………… 195
二、度量衡……………………………………………………………… 196
第九节 佛教遗存………………………………………………………… 197
一、石窟寺及其分区…………………………………………………… 197
二、中原地区的佛教遗存……………………………………………… 200
（一）佛教遗存概况 ………………………………………………… 200
（二）重要石窟寺 …………………………………………………… 201
三、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 206
（一）石窟寺 ………………………………………………………… 206

（二）佛教寺院遗址 …… 211
三、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 …… 211
四、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存 …… 213
（一）吐鲁番地区 …… 213
（二）龟兹地区 …… 213
第十节　铜镜 …… 215
第十一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 …… 215
一、外来移民墓葬的发现 …… 215
二、外来遗物的发现 …… 220
第三章　隋唐五代考古 …… 225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城址 …… 225
一、城址的发现 …… 225
二、城址的分类 …… 226
三、都城遗址 …… 231
（一）隋大兴唐长安城 …… 231
（二）隋唐洛阳城 …… 236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陵墓 …… 244
一、帝陵 …… 244
（一）隋代帝陵 …… 244
（二）唐代帝陵 …… 244
（三）五代王陵 …… 246
二、墓葬 …… 247
（一）分类 …… 247
（二）地面设施 …… 247
（三）葬具与葬俗 …… 249
（四）随葬品 …… 253
（五）壁画 …… 260
（六）分区与分期 …… 261
第三节　渤海、南诏与吐蕃遗迹 …… 272
一、渤海遗迹 …… 272
二、南诏遗迹 …… 273

三、吐蕃遗迹……………………………………………………………… 274
第四节　瓷器与瓷窑遗址…………………………………………………… 275
一、概况……………………………………………………………………… 275
二、瓷窑遗址………………………………………………………………… 277
（一）北方地区的瓷窑遗址 ………………………………………………… 277
（二）南方地区的瓷窑遗址 ………………………………………………… 281
第五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遗物……………………………………………… 285
一、唐三彩…………………………………………………………………… 285
二、唐代金银器皿…………………………………………………………… 286
三、隋唐铜镜………………………………………………………………… 287
四、唐代的丝织与印染……………………………………………………… 290
五、货币与度量衡…………………………………………………………… 291
（一）货币 …………………………………………………………………… 291
（二）度量衡 ………………………………………………………………… 293
第六节　宗教遗迹与遗物…………………………………………………… 294
一、石窟寺…………………………………………………………………… 294
二、隋唐时期的寺院布局…………………………………………………… 299
三、其他佛教遗迹与遗物…………………………………………………… 301
第七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 303
一、外来货币的发现与研究………………………………………………… 303
二、外来玻璃器的发现……………………………………………………… 304
三、波斯釉陶器的发现……………………………………………………… 305
四、外来金银器的发现……………………………………………………… 306
五、外来铜器的发现………………………………………………………… 307
六、外来宗教的遗迹与遗物………………………………………………… 307
（一）景教遗物 ……………………………………………………………… 307
（二）摩尼教遗迹 …………………………………………………………… 308
（三）袄教遗物 ……………………………………………………………… 310

第四章　宋元明考古 ………………………………………………………… 312
第一节　宋元明考古概况…………………………………………………… 312
一、分期……………………………………………………………………… 312

二、研究内容与特点 …………………………………………………………… 312
第二节 城址及其他 …………………………………………………………… 313
一、宋元明时期城市考古的特点 …………………………………………… 313
二、都城规划的发展和变化 ………………………………………………… 314
三、中原和南方地区的地方城市类型和布局 ……………………………… 315
四、宋元明时期的城址及其他 ……………………………………………… 316
（一）宋代城址 ……………………………………………………………… 316
（二）辽代城址 ……………………………………………………………… 322
（三）金代城址及其他 ……………………………………………………… 324
（四）西夏城址 ……………………………………………………………… 330
（五）元代城址 ……………………………………………………………… 331
（六）明代城址及其他 ……………………………………………………… 334
（七）古格王国遗址 ………………………………………………………… 340
第三节 帝陵 …………………………………………………………………… 344
一、北宋帝陵 ………………………………………………………………… 344
二、南宋帝陵 ………………………………………………………………… 347
三、辽代帝陵 ………………………………………………………………… 348
四、金代帝陵 ………………………………………………………………… 350
五、西夏王陵 ………………………………………………………………… 352
六、元代帝陵 ………………………………………………………………… 354
七、明代帝陵 ………………………………………………………………… 354
第四节 宋墓的分区与分期 …………………………………………………… 360
一、中原北方地区 …………………………………………………………… 360
二、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 …………………………… 362
三、湖广地区 ………………………………………………………………… 362
四、闽赣地区 ………………………………………………………………… 363
五、川渝贵地区 ……………………………………………………………… 364
第五节 辽墓的分类与分期 …………………………………………………… 366
一、辽墓的分类 ……………………………………………………………… 366
二、辽墓的分区与分期 ……………………………………………………… 366
第六节 金元明时期墓葬 ……………………………………………………… 372

一、金代墓葬…… 372
二、西夏墓葬…… 373
三、蒙古时期与元代墓葬…… 374
四、明代墓葬…… 378
第七节　手工业遗址与遗物…… 378
一、宋代冶铁遗址…… 378
二、宋代煤矿遗址…… 379
三、元代铸造遗址…… 379
四、瓷窑遗址与瓷器…… 379
（一）定窑 …… 381
（二）汝窑 …… 381
（三）磁州窑 …… 383
（四）耀州窑 …… 384
（五）钧窑 …… 385
（六）景德镇窑 …… 386
（七）龙泉窑 …… 387
（八）建窑 …… 388
（九）吉州窑 …… 388
（十）德化窑 …… 389
（十一）西村窑 …… 390
（十二）辽代官窑 …… 390
（十三）西夏瓷窑 …… 391
第八节　重要遗物…… 394
一、铜镜…… 394
二、金银器…… 395
三、货币…… 398
四、漆器…… 400
五、纺织品…… 402
六、玻璃器…… 404
七、三彩器…… 406
第九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 407

一、泉州宋元港与海船遗迹 …………………………………… 407
二、泉州宗教石刻 …………………………………………… 408
三、扬州拉丁文墓碑 ………………………………………… 409
四、海南岛穆斯林墓群 ……………………………………… 409
五、伊斯兰玻璃器 …………………………………………… 410
六、外来货币 ………………………………………………… 412

附录 ……………………………………………………………… 413

一、参考文献 ………………………………………………… 413
二、插图出处 ………………………………………………… 416

后记 ……………………………………………………………… 418

第一章 秦汉考古

第一节 绪论

秦汉时代包括秦、西汉、新莽、东汉 4 个朝代，开始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 220 年东汉灭亡，前后共约 440 余年。从生产力水平而言，公元前 3 世纪后期到公元 3 世纪初期是中国铁器时代的发展期。从上层建筑而言，当时的中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密切，与外国的交往频繁。相对于以前而言，关于秦汉时代的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遗物丰富，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属于典型的历史考古学。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特点表现为：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为基础，以各种遗迹与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课题广泛，研究内容充实。

一、断代与分期

秦和两汉，盛行在器物上作铭纪年。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使得各种纪年器物不断增多。汉墓的墓砖有时也有纪年文字，而各种铜钱则都有明确的铸造年代可查。这些都使得秦汉考古的断代有可靠的依据。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各种史书对秦、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参照。按照政治历史发展的阶段，结合遗迹、遗物的特点，秦汉考古可以从时代上划分为六期[①]。

1. 秦和西汉前期

从秦始皇统一到西汉的景帝，共约 80 年。和战国时期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明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

①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2. 西汉中期

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 70 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3. 西汉后期

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 70 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有“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4. 新莽时期

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光武帝建武 16 年（40）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 35 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墓室顶部隆起呈穹隆状；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纹镜（博局镜）[1]”。

5. 东汉前期

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 70 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墓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偶像；开始用买地券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博局镜”和“连弧纹镜”。

6. 东汉后期

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 90 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当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以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铅釉陶器和陶质明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环钱”；铜镜除“博局镜”和“连弧纹镜”之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

①周铮：《“规矩镜”应改为“博局镜”》，《考古》1987 年第 12 期。

二、文化分区

秦汉时代的中国版图达到了空前规模，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历代的疆域。随着全国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逐渐趋于统一。因此，秦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是，由于存在气候、地理、产业、民俗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地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特征。从考古资料的特征出发，可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区①。

1. 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

包括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从秦、西汉到东汉前期，许多新兴的事物，如空心砖墓的盛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的兴起，彩色壁画的出现，陶质明器的流行，铅釉陶器的发明等都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2. 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南部和江苏省南部。与中原地区相比，木椁墓延续较久，砖室墓出现较迟，画像石墓罕见，未见空心砖墓；印纹硬陶始终流行，青瓷器出现较早；铜矿丰富，铜镜制造业发达。

3.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包括四川省中部的成都平原和东南部的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代起就受关中和中原文化影响甚多；西汉和东汉前期，铜器和漆器制造业发达，其产品远销各地；东汉中后期崖墓流行，砖室墓中使用画像砖。

4. 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

主要指内蒙古自治区，也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这一带是主要的国防前线，长城、鄣塞和烽燧是最具特色的遗迹。长城内侧早置郡县，治所附近的木椁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长城外侧属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陶器和铜器等，则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长城沿线既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在北方地区的交汇地带，也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地带。

5. 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

这里是秦汉辽东郡辖地，为中原文化影响所及，而周围的匈奴、东胡等族则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东汉后期，公孙氏在此割据，郡治襄平附近的许多砖室墓和石室墓施有彩色壁画，对此后的高句丽墓制颇有影响。

---

①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6. 岭南的珠江流域

包括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汉前期墓葬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之后，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然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铜器多施细线镂刻花纹，亦与黄河流域有别；海外交通发达，琥珀、玻璃质的珠玑等外贸品甚多。

7. 川黔滇高原地区

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为西南夷各族所聚居，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有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格，尤以铜鼓、铜贮贝器、铜钺等青铜器为突出。西汉中期设郡县之后，中原文化影响渐深；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砖室墓，与内地相似；铜矿丰富，东汉时所制造的铜器远销各地。

8. 甘青地区

主要指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也包括青海省东北部。这里是西汉中期所置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河西四郡及王莽所治西海郡的所在地。郡县治所及其附近，文化面貌大体与中原地区相同；由于气候干燥，纺织品及漆器、木器得以保存，其中包括许多木制简牍。

9. 新疆地区

由于地区广大，民族复杂，各处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开通西域以后，中原地区的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铜钱大量传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的开展，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影响，在新疆发现的大量中亚、西亚遗物就是明证。总体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这一个特征。

第二节　重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以分为都城、郡国、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在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并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具体而又真实的情形。

一、都城遗址

秦汉时期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一时期的都城在设计思想、平面布局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特点，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

一个新阶段。首先，秦汉时期的都城是在大一统局面下修建而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次，与春秋列国时期大小城制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将宫殿、市、生活区纳于一个城郭之内，使得城的规划布局趋于整齐有序，有利于更进一步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意识；第三，城的设计和布局更加接近《周礼·考工记》所追求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理想都城模式，特别是西汉长安城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第四，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修建还充分考虑了礼制的因素，将宗庙、明堂、辟雍、灵台、社稷等礼制性建筑设置在南郊，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并对此后历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五，秦汉时期的都城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园林设施，不仅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的思想，也是重要的游猎、风景设施；第六，从秦咸阳城到东汉洛阳城，宫殿的布局从分散的形式向布局整齐的单一宫城制发展，直到东汉末年曹操被封为魏王时营建的王都邺城的出现，结束了这一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逐步加强的一个发展历程；第七，秦汉时期都城的宫殿建筑技术采用减地留墙法，规模巨大，大多数属于高台式建筑，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雄浑和内在的张力，也是新兴的封建阶级蓬勃向上精神的具体反映。

（一）咸阳城

秦孝公十三年（前 359），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朝仍以之为都城。咸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 15 公里的咸阳塬上。秦都咸阳最初选择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后来逐步向渭河南岸扩展，至秦统一六国之时，已经是"渭水贯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的东方大都会了。对咸阳城遗址的勘察开始于 1959 年，1974 年以后开始发掘。由于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从咸阳城所在地的地势来看，北高南低，全城由北原向渭河缓坡逐渐而下，城的最北部呈阶梯状陡起的形势。宫殿区就建在城的北面，现在还有许多大型殿址保存良好。咸阳城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属于高台式宫殿建筑，每个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①]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个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的还有彩色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影响。将宫殿区设计在城北部的最高处，对后世都城宫殿区的布局也有一定影响。

1. 宫殿遗址

一号建筑遗址于 1974 年 3 月~1975 年 11 月发掘。该遗址平面呈凹字形，东西

---

①复道：即天桥，又叫阁道。由于这种跨空通道一般下面还有道路，形成上下道路相互重叠，所以称上面的道路——天桥为复道。

长 130、南北宽 40 米。遗址中部有一条后期形成的牛羊沟穿过，至今在沟的东西断面上仍然可看到殿基的夯土层和预埋的陶排水管道。在凹字形遗址的西端有一个残高 6 米的大型夯土台，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 60、南北宽 45 米。在沟东相对应的位置上，原来也应有同样的一个夯土台，只是已经被夷毁。经发掘，残存的夯土台基是一座南北朝向并有上下两层布局的高台式宫殿建筑。这座高台建筑与牛羊沟对面被夷毁的那座高台建筑之间有长廊相连，构成一组东西对称、形似双阙[①]的建筑整体。

二号建筑遗址也是一座夯土高台，位于一号建筑遗址的西北，两者相距 93 米。基址东西长 127、南北宽 32.8~45.5 米。基址顶部有三室，其中 4 号房子位于台面西半部正中，为主体建筑，平面为方形，东西长 19.8、南北宽 19.5 米。台下建筑位于夯土台东半部北侧的底层，并向下延伸至台基夯土之中，是这座建筑的地下室。高台基址底部依台基筑回廊一周。回廊和庭院地表还发现竖直的陶管道 18 处，可能是插放旗杆的设施。二号建筑的基址东西两端仍向外延伸，东南又与第一、第三号建筑有走廊相连。

三号建筑遗址位于一号建筑遗址西南，相距百米，东北角与一号建筑西南角有走廊相连。三号基址南北长，东西窄，中间高，两边低，呈鱼脊状。由于基址南部后期被破坏及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出基址北部的走廊等遗迹。走廊南北长 32.4、东西宽 5 米，计 9 间，东西为坎墙，墙残高 0.2~1.08 米。墙体采用减地留墙法在夯土台基中挖制，东西两壁装饰大幅彩色壁画，内容为车马出行、仪仗及植物、几何纹等。廊北一室为正殿，东西长 13.4、南北宽 6.5 米，面阔[②]五间，进深[③]两间。

阿房宫位于渭水之南的秦上林苑中，遗址在今西安市三桥镇西北的新军寨、后围寨、南王寺村—和平村北缘一线，纵长 5 公里。东以沣河为界，西迄长安县（今长安区）小苏村—纪阳村，横宽 3 公里，占地约 15 平方公里。在这一区域之内，至今仍保留在地面的夯土台基还有 20 余处，其中以阿房宫前殿遗址最大。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为秦惠文王所初创，秦始皇时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秦始皇原准备将都城由渭河北迁往渭河南，建设以阿房宫为中心的大都会。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动工修建，动工三年后秦始皇死去。秦二世时又开始修建，但不到一年，陈胜、吴广起义军攻入关中，工程被迫停工。后被项羽一把火焚毁干净，现仅存留高大夯土台基。前殿是阿房宫的主体建筑。《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①阙：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高大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楼台）。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就目前所见的阙来看，有三出阙（大阙旁筑两个小阙）、子母阙（大阙旁筑一小阙）等。从建筑材料来看，有夯土筑成的阙、石筑或石雕而成的阙以及夯筑包砖等。特别是有的用石雕而成的阙，作为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

②面阔：一间房子的宽度，叫面阔。整个建筑物若干间加起来的宽度叫通面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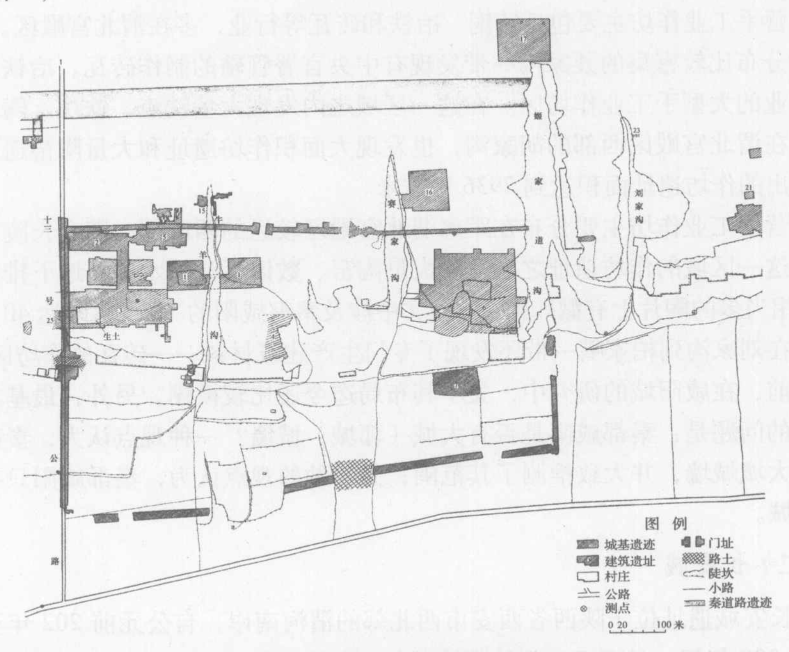
③进深：一间房子的深度叫进深。若干间合起来的深度，叫通进深。

记载："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其主体工程当已完成。已经建成的部分，东西五百步约合 750 米，南北五十丈约合 116.5 米。现存前殿遗址，西起古城村，东至巨家庄，地面上有一座巨大的夯土台基，东西宽约 1300、南北进深 500、台基高 7 米，约合 65 万平方米。这个夯土台基要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前殿大得多，可能是现在的数据将前殿的基座、殿四周的回廊、台阶及其附属建筑包括在内。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东北、西南约数百米处，地面上都可见到多座夯土台基，并发现建筑用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陶水管、石柱础以及带有戳印文字的陶片。

除上述宫殿建筑外，咸阳城郊县还建有大量的离宫别馆。经过调查可以确定位置的有：望夷宫（今陕西省泾阳县东南界）、步寿宫（今陕西省渭南市靳尚存村）、林光宫（今陕西省淳化县北 25 公里处的梁武帝村一带）、谷口宫（今陕西省泾阳县口镇）、蕲年宫、橐泉宫（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字壕村一带）、梁山宫（今陕西省乾县西关 1 公里处）等。此外，咸阳附近还有上林苑、宜春苑、甘泉苑等皇家园林。其中的上林苑在汉武帝时经过大规模扩建，成为汉代皇家最主要的苑囿区。

2. 宫城遗址

1973 年底至 1974 年，对宫城遗址进行过调查和钻探。宫城墙基暴露于断崖上，距离现在地表深度 0.8~3.5 米，夯土筑成。平面接近长方形，经钻探周长 2747 米。（图一）



图一　秦咸阳城宫城遗址平面图

A. 城墙

东墙仅残存南半部 256 米，复原长度 426 米，距离地表 0.8~1.1 米，墙基宽 6~11 米。南墙全长 902 米，西段距离地表 1.2~1.4 米，墙基宽 11~14 米；东段距地表约 1 米，墙基宽 10~14 米。西墙全长 576 米，距地表深度 0.6~3 米，其中北段墙基距离地表较深，约 2~3 米，墙基宽 11.3~14.8 米，与北墙相接处宽达 17.1 米，其余地段的墙基宽在 8.9~11 米。北墙现存长度 843 米，距离地表 1.5 米，宽度各处不同，在 3.4~9 米之间。

B. 城门

在南墙和西墙发现了城门基址。西门基本位于墙中部，距离地表约 1 米，门道长 38.5、宽 17~18 米。南门略偏东部，距离地表约 0.45 米，门道宽 7.2 米。

C. 城壕

城墙内外发现了城壕遗迹。已公布的资料主要为西墙和北墙的城壕。西墙北段的墙体内外均有发现，内侧城壕深 2~2.6 米，西北角部分较深，为 2.4~3 米，外侧部分地段城壕深 4 米多，宽 1.8~2.4 米。北墙内外两侧城壕一般深 2.4~3 米，个别地段深 4.2 米。其中北墙西段至西墙转角处约 250 米的内外城壕深一般为 2~2.6、宽 2.7 米。

3. 手工业作坊遗址

秦都咸阳已经发现冶铜、铸铁、砖瓦、陶器和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多处，主要分布在渭北区域，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系统。

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包括铸铜、冶铁和砖瓦等行业，多在渭北宫殿区。例如，在宫殿分布比较密集的聂家沟一带发现有中央官署管辖的制作砖瓦、冶铁、铸铜三个行业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在这一区域之内发现大量铁渣、铁块、陶范、陶窑等。在渭北宫殿区西部的胡家沟，也发现大面积作坊遗址和大量陶窑遗址，已经钻探出的作坊遗址面积达到 7936 平方米。

民营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距离渭北宫殿区较远的西南部，即今长陵车站附近。在这一区域的作坊遗址之内发现大量陶窑、数以百计的水井、地下排水管道等。在相当多的陶片上有戳印陶文，陶文中涉及秦都咸阳的“里”名多达 40 多个。此外，在刘家沟到柏家嘴一带还发现了专门生产建筑材料——砖瓦的作坊区。

目前，在咸阳城的研究中，关于其布局迄今还比较模糊。另外，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秦都咸阳是否有大城（郭城）城墙？一种观点认为，秦都咸阳应当有大城城墙，并大致推测了其范围；另一种的观点认为，秦都咸阳只有宫城没有大城。

（二）长安城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的渭河南岸，自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16 年的 200 年间，是西汉王朝的都城所在。秦代末年，项羽攻入咸阳城时，放火

焚烧宫室，咸阳城的渭北主体建筑变为废墟。汉王朝建立之时，再利用咸阳城作为首都已经不可能了，而位于渭河南岸的秦兴乐宫幸免遇难，于是便将秦兴乐宫改为长乐宫。汉高祖八年（前199），由萧何主持修建的未央宫已初具规模，东阙、北阙、前殿和武库也已建成。汉惠帝时，先后三次征发长安郊县数十万人筑城墙，奠定了长安城的基本轮廓。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加强，国家财力充实，于是对长安城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在未央宫、长乐宫以北修建了桂宫、北宫、明光宫，并扩建上林苑。同时，开凿关中漕渠，修建“京师仓”，不仅可将关东粮食运抵长安，也可解决城市供水与排水问题。长安城的名称是由于其所在地为长安乡，因而得名。

对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较早涉足者是日本人足立喜六，他于1906~1910年应清政府招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其间，他曾经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迹，其中包括对汉长安城的勘查及对未央宫前殿、城壕等遗迹的测量。1955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汉长安城西北部进行了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考证了一些遗迹的位置。自1956年以来，通过多年的发掘与研究，目前已基本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位于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遗迹，已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1. 形制

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大体上为不规则的方形，西北部不甚规则，南面城墙多有曲折（图二）。总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这主要是因为城墙的修建晚于长乐宫和未央宫的修建，所以在修建城墙时必须迁就两宫，从而形成曲折。西北部的不规则是因为河道关系而形成的。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首次提到长安城的形制与天象有关，但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以汉志及班固、张衡的赋中皆无此说为由，否定汉长安城“斗城”之说。王仲殊等也认为斗城之说不可信。但近年又有人重提此事，李小波论证汉长安城形制与星象图吻合，并认为这是西汉“法天象地”文化思想在都城建制中的反映[①]。也有人根据西安发现的西汉南北超长建筑基线，认为长安城的设计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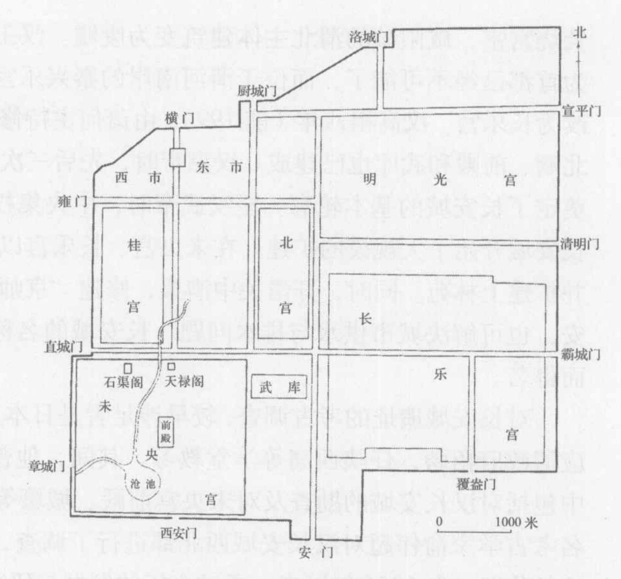
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根据现在的遗存，推测其高度在12米以上，基部

①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②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

宽度为12~16米。东城墙长约6000、西城墙长约4900、南城墙长约7600、北城墙长约7200米，合计25700米，约折合汉代62里强，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当。墙外有壕沟，经发掘知其宽约8、深约3米。

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各有3个门道，每个城门门道各宽6米，门道之间以夯土墙相隔，其上有木构的城门楼。门道宽度恰好等于当时4个车轨的宽度。这就是文献上所记载的“三门洞开，方轨十二”。根据史书记载，东面城门自北而南分别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西面城门自北而南分别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南面自东而西分别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北面自西而东分别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其中的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于1957年经过发掘。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因为入门不远便是长乐宫和未央宫而未形成大街之外，其余每个城门都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全城共有8条大街，宽度在45米左右。最长的是安门大街，长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长850米。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有两条排水沟，将大街分成平行的三部分，中间的称“驰道”，专供皇帝行走。



图二 西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2. 宫殿

汉长安城的宫殿遗址中，现已探明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的范围，并对其中的部分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西南部，平面呈方形。勘探查明其东西墙各长2150、南北墙各长2250米，周长8800米，与《西京杂记》所载“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的长度基本吻合。宫墙已全部埋没在地面以下，经对南宫墙的试掘，其门道宽8米。此外，在北宫墙西南角发掘了一处曲尺形的角楼建筑遗址，并发现带有“卫”字的瓦当，可知未央宫警卫归“卫尉”管辖。宫内已经探明道路多条，四座宫门皆有道路通至宫城的主体建筑——前殿。前殿南侧和北侧各有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北侧干道与东西宫门相连接，路宽8~12米。前殿东侧还有一条连接南北宫门的南北向干道。

未央宫内最为重要的建筑当属前殿。前殿为朝宫正殿，位于未央宫中部偏东。

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00、东西宽 200 米，北高南低，南端高出现今地面 0.6 米，向北逐渐升高，北段高出现今地面约 15 米。经钻探，前殿台基利用龙首山丘陵的地势并加工夯筑，然后再于其上构筑殿堂建筑。

长乐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部，是在秦代兴乐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全宫的平面形状不规整，总面积约 6 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的六分之一。长乐宫最初由高祖刘邦居住，后为太后常住，因其在未央宫东面，所以又叫东宫。文献记载长乐宫内有鸿台、临华殿、温室殿、长秋殿、永寿殿、永宁殿等。考古勘探出在长乐宫中部有一东西横贯的干道，干道之南有大型建筑基址三组，最东部由阶、庭、朝、寝组成，为长乐宫重要建筑之一。

桂宫在未央宫北，西邻长安城西城墙。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800、东西宽约 880 米。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日联合考古队发掘的桂宫二号建筑遗址位于桂宫南部。为一处东西长 84、南北宽 56 米，有着南北两重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其布局特点与椒房殿遗址相似。发掘者认为，二号建筑及其桂宫可能是后妃的宫室居所。二号建筑的年代上限不超过西汉中期，与文献记载的桂宫建于汉武帝时期是一致的。

3. 武库

武库位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1975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武库四周建有围墙，东墙和西墙均长 320 米，南墙和北墙均长 800 米，东墙和西墙各开一门。武库中部又有一道隔墙，将武库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有 4 个仓库，西院有 3 个仓库。其中西院中最大的一个仓库长约 230、宽 46 米，包含 4 个库房。在各库房中原来靠墙紧密排列着木质的兵器架，木架已朽，但础石尚存。出土的兵器以铁制的剑、刀、矛、戟、镞、弩机和铠甲为主，铜兵器较少。

4. 市

据《三辅黄图》卷二引《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即长安城中有东市六、西市三，均位于城北部。汉惠帝六年（前 189）起长安西市，此时东市似乎已经存在。东西两市的位置在长安城横门大街的两旁，其范围已经探明。市内除货物交易之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例如，在西市及其周围发现有大量陶窑分布，其中考古发掘的西市之内的 21 座陶窑专门用来烧造裸体陶俑，与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完全相同，当为少府所属东园匠的官营窑址。西市西侧的 6 座陶窑则分布散乱，烧造砖瓦、日用器皿以及陶俑，可能是民营性质的陶窑。东市可能主要从事商业活动，而西市则可能主要为手工业区。

5. 礼制性建筑

礼制性建筑位于长安城南郊，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掌朝政及篡汉建立新朝后先

后建立的，包括明堂、辟雍[1]、宗庙、社稷等礼制性建筑。这些礼制性建筑已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过调查发掘，但有关各建筑的定名及其性质尚有较大争论。

礼制性建筑群最东部的一处可能为“辟雍”的建筑遗址，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及配房建筑、圜水沟组成。中心建筑位于一方形土台上，土台南北长205、东西长206、高1.6米，土台中部又有一直径62、高约0.3米的圆形夯土台基，为中心建筑的基座。方形土台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边相等，每边长225米，距离中心建筑各96米，其正中各开一门，围墙四隅有曲尺形配房。围墙外面有近圆形的圜水沟，东西长368、南北长349米，沟与四门相距43~56.5米。作为该建筑群主体的中心建筑，部分虽被后代河道所破坏，但其基本形制仍可复原。经过复原研究，大体是一座上圆下方、四向多室的大型礼制性建筑。关于该建筑的定名与性质，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请修建的明堂辟雍遗址。但明堂辟雍遗址究竟是分开的两类建筑还是一体建筑，尚有争论。

在辟雍遗址的西北部另有一处规模更大的建筑群，由十二座单体建筑组成，外边有平面呈方形的围墙，围墙每边长1400米。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为方形。中心建筑在整个遗址的正中，有中央主室，四面各有一室，其形制与辟雍的中心建筑相近。关于这组建筑的形制，多数学者认为当属王莽为其祖先所修建的“九庙”遗址。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九庙不是九座而是十二座呢？王恩田认为，按照《水经注》的记载，“王莽九庙”不在此处，该遗址应是王莽为汉室修建的宗庙建筑，即“明堂”。而所谓的明堂辟雍遗址当为辟雍遗址[2]。

文献上记载的官社（土神）、官稷（谷神）遗址也已发现。官社遗址位于王莽九庙遗址的围墙之外的西南面，现存夯土台基高4.3米，东西残长240、南北宽70米。主体建筑已经被毁，仅存四周廊庑建筑。发掘证明，遗址始建于秦或汉初，西汉中期重新扩建，西汉末年废弃。官稷遗址在官社的西南边，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每边长约600米，内围墙每边长273米。内外围墙正中各有一门。未发现中心建筑，估计是未及修建而王莽政权已经迅速覆灭。

通过对长安城南郊建筑群的发掘，使人们对西汉建筑技术水平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它们的基本特点是：每座建筑物的主体建筑都修建在高台之上，每组建筑或每座建筑又都是前后左右相互对称的组合体；建筑的程序是先挖坑，再在坑内打夯作台基，然后按照平面的布局挖出间次，留出墙壁，最后挖柱窝；门旁都立柱，柱子之下置柱础，转角处一律采用两柱并列的办法；墙壁、地面不砌砖，而是涂抹草拌泥，表面粉刷红色或白色的颜料；有些建筑物的边缘，密布下

①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根据蔡邕《明堂月令论》，所谓辟雍，乃“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之意。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也称外学）之外，均仅为祭祀之所。

②王恩田：《“王莽九庙”再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水道，下水道用陶管相衔接，管道尽头有渗井或汇通于总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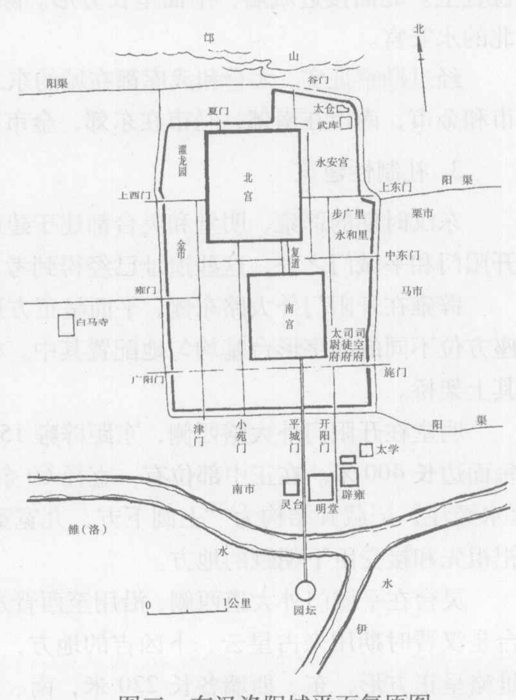
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内有一百六十闾里。从整个汉长安城的布局来看，宫殿占据了全城的三分之二。居民区当集中于东北隅，但尚未进行钻探。杨宽甚至曾经怀疑现今所知的长安城只是一座宫城，而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可能还有郭城的存在。他还认为，文献记载的“九陌”应在今城郊外。刘庆柱则持与杨宽相反的看法，指出根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今长安城墙以外不大可能再有外郭城的存在。赵化成则认为，暂且不论汉长安城是否只是宫城这一概念，汉长安城可能与秦咸阳相似，应以“大长安”的观念视之，即外城的许多遗迹也属于广义的长安城的一部分。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洛阳城

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约 15 公里。西周初在此筑城，称为成周。因在雒水之北，战国时称雒阳，两汉因之，曹魏以后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建都洛阳。献帝初平元年（190）迁长安时，雒阳宫庙、民居被焚毁。自 1957 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了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图三）。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这些中国古代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来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是当时的天文、气象等的专门研究机构，已经过了发掘；太学的遗迹也进行了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

1. 形制

洛阳城平面略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约合汉代九里，东西约合汉代的六里，故又有“九六城”之说。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厚约 14~25 米。东、西、北三面城墙遗迹尚存，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而冲毁，但仍可恢复其原貌。东城墙长 4200、西城墙长约 3700、南城墙长约 2460、北城墙长约 2700 米，总长约合汉代的三十一里。



图三　东汉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全城共有 12 个城门，东面有三门，自北而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望京门（又称为旄门）；西面三门，自北而南依次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南面四门，自西而东依次为津门、小苑门、平城门、

开阳门；北面二门，自东而西依次为谷门、夏门。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24段，这可能便是文献所说的“洛阳二十四街”。根据钻探，大街的宽度约20~40米。每条大街都分成三股，唯公卿、尚书等大臣行中道，一般行人皆行左右。

2. 宫殿及其他

城中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两宫相距较近，有“复道”相连。南宫和北宫由于未经发掘，具体情形不明，仅大致知道其范围。南北两宫在西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当时以南宫较为重要。根据文献记载，南北宫之间相距一里，根据实测，应当是七里。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帝五年（前202），“帝置酒洛阳南宫。”《汉书·王莽传》记载：“地黄三年，司徒王寻将十万屯洛阳，镇南宫。”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之时，居住在南宫的却非殿；该殿可能是西汉旧殿。此后，南宫的规模不断扩大，于建武十四年（38）在南宫建成规模最大的前殿。南宫的遗迹虽未发掘，但在“中东门大街”之南、“旄门—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有一片长方形的区域，南北长1300、东西宽1000米，大致是南宫的位置。

北宫开始修建于汉明帝永平三年（60），至永平八年完成。其中的德阳殿最为雄伟，“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从勘探的结果来看，北宫在南宫以北略偏西的位置上。北面接近城墙，平面呈长方形。除了南宫和北宫之外，还有位于北宫东北的永安宫。

经过勘察证实，太仓和武库都在城的东北隅。根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在南郊，马市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北宫的西南。

3. 礼制性建筑

东汉时期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建于建武中元元年（65）。其位置在洛阳城的开阳门和平城门之外，这些遗址已经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

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东侧，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70米。在围墙之内，有4座方位不同的品字形台基均匀地配置其中。根据文献记载，辟雍四面门外有水沟，其上架桥。

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西侧，东距辟雍150米，平面呈正方形，四面筑有围墙，每面边长400米。在正中部位有一直径60余米的台基，可能是主体建筑的基础。《水经注》记载其结构为“上圆下方，九宽重隅十二堂”。明堂是天子太庙，是祭祀祖先和接受臣下朝觐的地方。

灵台在平城门外大道西侧，沿用至西晋永兴三年，前后使用达250年之久。灵台是汉晋时期用来占星云、卜凶吉的地方，也是研究天文、气象的专门机构。遗址略呈正方形，东、西墙各长220米，南、北墙各长200米，中心建筑为一座方

形夯土台，基础部分约 50 米见方，残高 8 米多。房屋修建在高台的四周，台基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四周环绕回廊，回廊外用卵石铺成散水，散水外有砖砌的水沟。北面正中有坡道可通上层平台，上层每面各有房屋 5 间，东屋涂青，西屋涂白，南屋涂红，北屋涂黑，显然是按照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的四方而设计的。特别是南面的 5 间房子，都有深入到土台内的暗室，与《晋书·天文志》记载的“张平子（张衡）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记载相吻合。

4. 太学

太学遗址位于南城墙开阳门外，辟雍的东北，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西北约 35 米处，平面略呈南北向长方形[①]。太学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历时 4 年之久，用工 11.2 万人，“凡所造构二百五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学生最多时达 3 万余人，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著名的大儒马融、郑玄、班彪、桓谭等都在这里讲过学。汉灵帝熹平年间，蔡邕书写《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诗经》等经书，镌刻成 46 通石碑，立于太学门前，这就是“熹平石经”，不幸毁于董卓之乱。在 1962 年和 1974 年发掘出土了《尚书》残石，1980 年 4 月出土 600 多块残石[②]。

二、县邑遗址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目前，关于县邑类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秦代的此类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做得较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部分集中在汉代；汉代的县邑发现数量多，调查者少，发掘者更少。根据所在地域的不同，可以分为内地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县邑。

（一）内地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　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期数量众多的城址，它们的城墙壁都用夯土筑成。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汉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北京市房山的城址为广阳县城，天津市武清的城址为泉州县城，河北省易县的城址为故安县县城，江苏省扬州的城址为广陵县城，湖北省江陵的城址为郢县城，湖南省宁远的城址为冷道县城等。经过调查和发掘的城址较少，主要有临淄故城、曲阜故城、东平陵古城、洛阳汉河南县城、磁县讲武城、武安午汲故城、崇安城村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 年第 4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 年第 4 期。

故城以及南阳宛城郡城、西海郡城等。

1. 县邑的修建

从目前勘查的大多数汉代城址来看，其修建情况可以分为三种[①]：（1）在前代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例如，河北的黄骅汉城、武安午汲古城、湖南宁远的汉泠道县城。（2）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发展起来的城市。战国时期的城址因为战争焚毁过甚者之外，大多在汉代得到利用或改造。如经过勘探的汉临淄城，似乎完全沿用了东周齐国临淄城。临淄城内曾经发现大量汉代封泥、冶铁、铸币作坊遗址以及汉代建筑群。邯郸的大北城，也存在类似情况。汉代的中小城邑沿用战国旧城的例子就更多。有一些城市则是在原战国城址上缩小规模，更筑新城，汉河南县城便是一例。有的城市则是在东周城的一隅，或利用原来城墙的一部分，筑起较小的汉城。例如，山西夏县的汉河东郡安邑县城、山东曲阜汉鲁县县城、河北易县燕下都东城南部东贯城粗附近的汉故安县城等，都属于此类情况。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战国时期的都城，在汉代被降格为郡县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失去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3）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中或附近另置秦、汉郡县新城。例如，湖北楚纪南城东南 2 公里的郢城，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汉代城址中，或者城址附近，常常发现冶铁作坊遗址、郡国铸钱遗址和墓地，它们是研究城址兴衰的可靠资料。在一些陶器、漆器和画像砖上刻印有“亭”“市”文字或市井图像，也是研究汉代城市的重要资料。

2. 县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1）河南县城

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时 20 世纪 50 年代寻找周王城时发现的，是西汉中期在荒废的东周王城的废墟上重新修建的一座规模较小的新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只有西面城墙随涧河的曲折流向而斜向内凹，从而使西北城角形成抹角。城墙夯筑而成，基宽 6 米以上，周长 5400 余米，保存高度在 0.4~2.4 米。墙基下叠压有战国墓葬，墙基同时又被东汉晚期墓葬打破，而且夯层中没有比汉代更晚的包含物，从而为城的修建年代提供了证据。城内西汉时期窖穴中出土有“河南太守章”、“史守印信”、“洛阳丞印”等封泥，陶器上也有“河亭”、“河市”的戳记，从而证明该城址是《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河南郡辖下的河南县城。

1955 年，在汉河南县城内的中部和东部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中部发现的遗迹属于西汉时期，东部发现的遗迹则以东汉时期为主。西汉时期的房基多为半地穴式，夯土筑造，圆囷也是半地下式的土坑。水井为圆形竖穴，周壁不用砖砌。东汉时期的房址有的已经建造在地面上，但多数还是半地下式。建于地面的房屋四壁用版筑，有的附加砖柱。半地下式的房址，有的四壁已用砖砌。不论半

①黄展岳：《汉代的城邑与边塞遗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地穴式还地面上修建的房屋，屋顶一律铺瓦。房屋的居室一般为一间或两间，而且比较分散。粮仓有半地下式的方仓和圆困两种，周壁砌筑有砖。

1986年，在城内东南部发现汉代水管沟，清理出东西长62.8、南北宽17.5米、相互交叉的十字形水管沟，沟内敷设直径0.22~0.23米的陶水管，每节长约0.65米，十字沟中心为一圆井，井径0.8、深1.80米，内置陶井圈，井壁厚0.03、高0.31米。

1991年，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发现一条汉代道路，清出路面60余米，呈东西向，宽5.6~6米，可分上、下两层，路面上有车辙4条，每条宽0.1~0.2米，深0.05~0.1米。辙壁光滑，可分南北二组。每组两辙间距1.17米，据此可推测出当时的车轨宽度。1987年在城内西北部发现一条同样的道路，分上下5层，说明使用了5个时期，层面由下而上逐渐加宽，反映了路面使用年代的长久性和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2）东平陵县城

东平陵县城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阎家村北，是山东地区一处十分重要的城址，《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籍均有记载。西汉时置县，文帝十六年建济南国，封齐悼惠王子辟光于此，始为王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政府曾于全国手工业发达的地方设置工官十处，东平陵城即为其中之一，这里不仅设有工官，还设有铁官，足以证明其为汉代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1975年调查时采集的大批铁器即是非常重要的证据①。

经调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1900米，城内总面积约360万平方米。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墙，为夯筑而成，夯层厚0.12~0.22米。以西城墙保存最好，地面以上残存高度约5、宽24米，墙基宽约40米。其余各面残存城墙高矮宽窄不一。城内地势南高北低，有南北向和西南至东北向两条古代壕沟穿过城址并打破城墙。相传东平陵城四周共有城门12个，钻探资料表明，在西城墙南段被古代壕沟打破的缺口处有宽7.6、厚1米的路土，边缘整齐；北城墙中部缺口处，也发现有宽8、厚1.3米的路土，应分别为城的西南门及北门之所在。其余两边城墙缺口处，由于长期以来人为取土破坏及自然风雨侵蚀，现存地面已降至当时生土面以下，因此，不能确定这一位置原来是否有城门。城内暴露遗迹、遗物较为丰富。城内西南部分，在南北向古代壕沟的西侧，俗称“铁十里铺”，从沟的断崖观察，在距地表0.85米以下，有厚0.2~0.4米的一层紫色土层，在南北约200、东西约210米的范围内，地面以上可见到零星的铁屑和炉渣，并在此采集到较多的铁器及铁范等遗物，应当是当时的冶铁遗址。城内东北部，俗称“殿基地”的地方钻探到较大面积的夯土遗迹，此地曾出土过较多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及构件，应为当时的建筑基址，或即为宫殿、衙署区所在。城内西北部南北向古代壕沟的西侧为制

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故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陶遗址，其准确范围不详。

关于此城的年代，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总结各家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其一，认为东平陵城遗址即汉晋时期的东平陵县城故址；其二，今平陵城系后魏时的平陵城，而在其西南的城子崖遗址是汉晋时期东平陵县城；其三，今平陵城遗址既是汉晋时的东平陵县城，也是春秋时齐之平陵邑。从调查情况来看，采集遗物的种类繁多，较为丰富，各类遗物的年代大多属两汉时期，少量为战国晚期之物。在城址内出土的一批鉴、盘、灯、熨斗等铜器，有的铜器之上有明确纪年，亦均属汉代[①]。此可证明，东平陵城遗址的年代应属战国至汉代，为汉之东平陵故县城当无疑义。

（3）午汲古城

1956年，对河北省武安县午汲古城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城址平面近方形，长、宽各在800米左右，现存的夯土墙是东汉时期筑造或重建的，尚高出地面3~6、宽8~13米。东、西、北三面城门的遗迹清晰可见。连接东、西城门的大路宽6米，长近1000米，直通城外，城内还有4条南北向的道路。

大约自春秋以来这里就是聚落级别的居民区，文化层堆积非常厚，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说明这座城是在前代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城内西半部发现有居住基址、水井、窖穴、灰坑、石子路面和许多陶窑。陶窑分属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在战国末年至西汉早期窑址出土的陶器上，有"邯亭"或标明手工业者姓名的戳记。此外，还发现了分布密集的东周墓葬群和东汉时期的砖室墓群，两汉时期的大批铁农具和手工工具。

（4）城村古城

福建省崇安县的城村古城，不见于文献记载，发现于1958年，并于1959年进行了发掘。1980年9月~1984年1月，对城址又进行了系统勘探和重点发掘[②]，进一步搞清楚了城的布局情况，出土了陶、铁、铜器6000余件，其中的陶器既有中原式，也有闽越式。

城址坐落于3座相连的低矮山岗上，西高东低，东、北两面面临大河，地势开阔。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60、东西宽约550米，总面积约48万平方米。城墙系夯土筑成，因山势起伏，墙宽4~8、墙基宽15~21、残高4~8米，周长2896米。城墙的西、南、北面沿山丘脊梁外侧延伸环绕，地势陡峭。东城墙于平地起筑，联结3座山丘及两山垅沟谷，曲折绵延，有4处拐角。城外取土后修整为护城壕，壕宽6~10、深5米左右。城墙分两次修筑，第二次修筑的城墙在第一次之上加宽约50厘米。城墙仅见主墙，未见附坡。内外壁近于垂直，用火烧烤出一层厚约5厘米的红烧土墙皮，这种做法也常见于其他建筑台基边沿，是当时一种独

①宁荫堂、牛祺安：《山东章丘市东平陵故城出土汉代铜器》，《文物》1997年第4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特的修造加固措施。城墙的西南角是全城的制高点，有台基呈圆形的夯土台，台中央有直径 1.1、深 3.5 米的深坑，坑内有大量红烧土、木炭和灰烬，推测是烽燧遗迹。西北角也发现夯土台基，可能是瞭望台遗存。

探出城门两座，西城门设于西墙南段，东城门处于东墙南端。两城门之间横贯一条河卵石铺设的主干道，路面宽约 10 米。城内各建筑基址之间由 4 条河卵石铺设道路相连接。还发现两组利用自然沟谷并施陶制管道的排水系统和 3 处进、排水口遗迹。

城内外分布着 30 余处汉代的居住建筑、冶炼、制陶作坊遗址以及墓葬等。这种因地制宜的总体布局，体现出南方山地城市规划的特点。

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城内中部的高胡坪上。高胡北坪建筑基址面积达 1 万平方米，探明有 5 座大型的宫殿建筑物，依中轴线对称分布。高胡南坪的宫殿建筑基址面积达 2 万平方米，有两组建筑群。基址位于城址中部宫殿建筑区的南部，是宫殿区中的主体建筑群体。台基利用原高岗整平夯实而成，仍沿袭战国以来的高台建筑形式。建筑包括大门、庭院、殿堂、西侧殿、厢房、廊屋、天井及门卫房，回廊和散水环绕于各单体建筑周围，整体呈现以庭院、殿堂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单体建筑下部采用“干栏”式结构，即在各柱位之间分置小础石，竖立矮柱网，再横架填木，铺设地板，建成干燥防潮的居住面。干栏式建筑为南方所常见，但用于大型的宫殿建筑，在国内考古发现中尚是首例。在城西部、北部也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建筑群基址。此外，在高胡坪宫殿区周围还发现 8 处汉代的居住遗址和下寺岗制铁作坊区。围绕城址发现汉代聚落遗址 10 余处。

以前，人们认为该城址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汉武帝时期和武帝以后至王莽时期，可能是“无诸之后越繇或东海王余善的宫殿建筑”。也有学者认为是汉武帝平定闽越后建立的军事城堡。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该城址的上限在西汉早期，下限在东汉初年。可能是西汉闽越国都城“东冶”，或者是汉武帝灭闽越后不久设立的“冶县”治所。

（5）南阳宛城遗址

宛城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楚国重镇，以产铁著名，秦以后历为南阳郡治所，西汉末年跃居全国五大城市之首，商业繁荣盛况正如《盐铁论》所说：“宛、周、齐、鲁，富冠海内，商遍天下。”宛城故址位于河南南阳东北隅，平面近正方形，每面长 1000 米。城址南靠白河，城墙夯筑而成，现存高度 2~3、底宽约 10 米，夯土层厚约 8 厘米，城内外有厚达 2.5 米的文化层，遍布汉代砖瓦和日用陶器残片，并发现汉代水井。1963 年在东城墙下发现汉半两钱范及炼渣，1964 年在城北部曾发现“契刀五百”和“大泉五十”钱范。城内发现高台建筑遗址两处，一处位于城东北，南北长 46、东西宽 44、高 9 米；另一处位于其西 1600 米，东西长 80、南北宽 70、高 9 米，堆积中有板瓦、方砖和陶片。著名的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位于城内东北

角，东西长 600、南北宽 200 米。1959 年曾在此发掘汉代炼铁炉 1 座、铁块约 350 公斤、坩埚 3 件和大量陶范。出土的铁器有刀、镰、凿、马衔、矛和环鼻等。

（6）西海郡城遗址

西海郡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城西约半华里的青海湖东北侧，俗称“三角城”。西汉平帝时始建，王莽败后郡废，东汉时曾复郡。是湟水流域发现的汉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西北角稍微曲折，南北长约 645、东西宽约 615 米。现存城墙残高 6~12、基宽 8 米。四面发现门址。城内地面有几处略微隆起，隐约可辨为方形院落。城内原有一个花岗岩方形石座，每面宽 1 米，其上雕刻一虎，座的前面刻有“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9 字铭文。1987 年，城内又发现带铭文石刻一块，其长宽尺寸、所用石料、铭文字体均与此前发现者相同，其铭文三行分别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调查中还曾经发现钱范残块、以及“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还发现云纹瓦当、“长乐未央”瓦当，有的瓦当之上带有长铭文，如“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同时还采集到唐代莲花纹瓦当和宋代圣宋通宝、崇宁通宝等钱币，证明此城的使用下限晚至唐宋时期①。

（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到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的边城遗址近 100 处。城的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小，城内有官署、民居、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鄣、烽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边城属于临时军事性质，时用时废，形同城鄣，或者处于双方争夺地带，时失时得。这种边城构造一般比较简单，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也比较少。这类城郭一般用夯土筑成，根据其平面形制可以分为四类②：

1. 城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仅有四面城墙，一般每边长 420~600 米。城的中部或一隅往往另筑内城，官署设在内城中。内蒙古磴口市布隆淖古城、兰城子城址、喀喇沁城址、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属于此类形式。

以沙巴营子城址为例。1973~1974 年，对沙巴营子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查发掘。其城址平面呈方形，南城墙被牤牛河冲毁殆尽，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每边长 450 米左右，残高 4 米左右。城墙版筑而成，细密坚实。东墙偏南处有一豁口，宽 3.5 米，地面有厚 40 厘米的路土，应当是城门遗址。西墙和北墙未见城门，南墙已被冲毁，是否有门，情况不明。城内中部有一处高台建筑遗址，出土了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陶量，从遗址所处位置和规模来看，似为官署所在。在其西部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地层堆积和遗物证明，该城是燕国时所修建，

①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年。

②黄展岳：《秦汉长城遗迹的调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秦和西汉时期继续使用，东汉时期废弃。

2. 平面呈回字形，城墙有内外两重，均呈方形。外城墙每边长1000米左右，内城大体设置在外城的中央，每边长200~250米左右。官署一般设在内城。内外城之间是屯戍建筑和民居。呼和浩特塔布秃村、内蒙古磴口市陶升井、包头市的三顶帐房、麻池乡、东胜的城梁村等城址属于此类形式。

以塔布秃城址为例，外城南北长900、东西宽800米。南墙正中有一门址，内城在外城正中偏北，每边长230米。汉代的砖瓦陶片集中在内城和外城南部，南郊则为汉墓区。

3. 城中设子城，子城偏于城内一隅，城墙的规模略小于回字形城。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城址等均属于这种形式。以二十家子城址为例。

1959年，对二十家子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得知其外城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60~475米。城墙夯土筑成，北墙西段已毁，东、西、南三墙和北墙东段保存尚好。子城在城内西南隅，每边长300~320米，保存完好，也是夯土筑成。在子城内发掘了官署遗址、炼铁场、陶窑和民居。出土的主要遗物有"安陶丞印"和"定襄丞印"封泥、铁铠甲，汉代砖瓦和陶器、铁器的数量甚多。西城墙下有汉墓区。发掘迹象表明，此城修建于西汉，至唐辽金仍在沿用。

4. 形状不规整。杭锦后旗太阳庙城址即为其代表，城墙夯筑而成，东西最长处不过250米，南北最宽处200米。墙宽9~13米，西城墙有两处曲折，城门设置在南墙中部，呈瓮城（附于大城门外的小城，又称月城，为增强防御力量而设）形。城内出土的砖瓦、陶片和铜钱，均为汉代遗物。

在北方边境地区的城址之中，以回字形和设子城两种形式为多数。这种边城形式的出现，与晁错《言守边备塞疏》中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的边城形制相符，应当是文帝及其以后流行的边城形制。

三、聚落遗址

聚落是指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但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河南省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址等数处。

1. 三道壕遗址

位于辽阳市北郊，遗址范围大约有100万平方米（面积将近1平方公里）。1955年，发掘了1万平方米，揭露出居住遗址6处，水井11眼，砖窑7座，铺石道路两段。该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后期①。

从揭露的居住遗址来看，一般长度在20~38、宽13~22米，内部设炉灶，屋顶

①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铺瓦。屋外有窖穴和水井。晚期的居住遗址附近还有畜栏和土沟厕所，并发现了粪肥痕迹。在每个居住遗址中都出土有一批铁农具、手工工具以及若干铜、铁兵器。道路用河卵石铺砌。附近有烧砖的窑场。房址中除出土农具、工具之外，还有不少兵器。有的陶片上印有“军厨”字样的戳记，有的刻“昌平”字样。从各方面的情形来看，这里不是一般的农村，参照“昌平”和“军厨”等戳印，推测该遗址是西汉后期以降辽东郡治所襄平（王莽时改为“昌平”）县附近的一个屯戍据点。

2. 邵家沟遗址

位于江苏省高邮县邵家沟，是一处东汉末年的聚落遗址，面积甚小[①]。已经发掘的面积约 400 平方米，发现有陶圈水井、窖穴、灰沟等，在灰坑、窖穴和水井等遗迹中出土了铁犁、铁锤、陶纺轮、陶网坠、残漆器、日用陶器以及青瓷器。竹编什物、麻布碎片，并有牛、狗、鱼的骨骸和核桃、瓜子等，证明这里是江淮地区的水乡农村。遗址中还出土了“天地使者”封泥和符箓木牍，对了解汉末道教在当地农村的流行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3. 三杨庄汉代田宅

位于河南省内黄县南部梁庄镇三杨庄北，地处黄河故道。该遗址 2003 年 6 月在对硝河实施疏浚时发现，同年 7~12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对其中的西部两处遗存进行了部分清理，确认这些遗存为汉代宅院建筑遗址，因黄河的一次大规模洪水泛滥而被整体淹没。2005 年初，又发现了两处宅院遗存，同年 3~12 月河南省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清理。前后两次清理的总面积共计约 9000 平方米[②]。

第一处宅院建筑遗存位于三杨庄村北约 500 米。这一区域已经勘探的面积达 3600 平方米，在钻探范围内，南北部均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遗存，南部发现有道路遗迹，宽约 4 米。清理面积 400 平方米，清理出的遗迹有宅院围墙、正房的瓦屋顶、墙体砖基础、坍塌的夯土墙、未使用的板瓦和筒瓦、建筑废弃堆积、拌泥池、灶、灰坑等。出土有轮盘、盆、瓮等陶器。从已经清理的部分来看，应当为整座宅院的第二进院落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尚未使用的板瓦、筒瓦整齐地垒放在天井内。结合主房东北侧有一堆筒板瓦碎块，西南侧有一小的拌泥池，初步推测主房正在维修过程中洪水来临，维修工作没能完成。由于洪水过后这里成为黄河河道的一部分，所以，维修时的原状得以保存下来。

第二处宅院遗存位于三杨庄村西北，东距第一处宅院遗存约 500 米，该处宅院遗址的揭露较为完整，总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宅院的平面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落南墙及南大门、东厢房、西门房，第二进院落南墙、南门、西厢房、正

---

①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 年第 10 期。

②国家文物局:《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房等。南大门外偏东南约 5 米处还有一眼水井及通往水井的用碎瓦铺设的便道，水井壁系小砖圈砌，井口周围用同样的砖铺砌成方形的低井台；水井的周围还分布有较多的水槽、盆、瓮等陶器和石磨等；水井西侧约 5 米处，有一处特殊的编织遗存，遗迹四角为三块砖摞成的四个呈长方形的砖垛，砖垛内堆积有较多的长宽为 10×5 厘米的砖块，砖块中部刻有可以缠线的凹槽，因而推测该处可能是编织竹席和草席类物品的遗迹。宅院西北角有一处带瓦顶的厕所。在宅院的西侧，还清理出一座形状规范的圆形水池。在该宅院遗址及南大门外水池内，清理出 5 个大石臼、2 个小石臼、石磨、石磙等石器，以及水槽、碗、甑、盆、罐、豆、瓮、轮盘等陶器，还有犁、釜、刀等铁器。主屋瓦顶东侧表层清理出带有“益寿万岁”字样瓦当的筒瓦数件。第二进院落西部地面出土 3 枚“货泉”铜钱等。

第三处宅院建筑遗存位于三杨庄村北，东北距第一处宅院遗存近 100 米。该宅院的建筑遗存也揭露得较为完整，面积大致为 30 米×30 米，宅院的平面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落的南墙及南大门、南厢房，第二进院落的院墙、正房等，宅院四周有院墙。宅院东西墙外分别有一条宽窄、长度大致相当的水沟，西侧水沟分为南北两段。南门外西侧有水井一眼，井壁的砌筑方法和用砖与第二处宅院的水井相同，只是没有砖铺的井台。宅院后有一小型建筑遗存，推测可能为厕所。正房后还发现两排树木残存遗迹，从清理出来的树叶痕迹初步判断多为桑树，也有榆树。南厢房南墙夯土版筑而成，墙体块状结构清晰可辨。特别是该宅院的东西两侧水沟外和后面（北侧）清理出排列整齐、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其宽度大致在 60 厘米左右。有迹象表明，在南门外不大的活动场地南侧，也为农田，且有一条与外界相通的南北向道路。在宅院内外的地面上散落有石碓、小石臼、陶瓮、陶盆等遗物，同时还发现有半枚“货泉”铜钱。

第四处宅院建筑遗存位于第三处宅院遗存东 25 米，大致与第三处宅院东西并列，尚未完全清理与揭露。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宅院遗存。

已清理的四处宅院有以下特征：均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南门外为小范围的活动场地，且各自有水井；宅院之间互不相连，四周由农田相隔；所有屋顶均使用瓦，主房屋顶更是全部用瓦。

总而言之，三杨庄遗址是西汉晚期的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推测为新莽时期河水大规模泛滥而被淹没深埋，因此，整个聚落遗址内的各类遗迹现象能够保存原貌，在目前汉代考古中所仅见。

四、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

秦汉时期，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战国长城被部分衔接，部分被利用，部分则被废弃。或者另行修筑新的长城。与此同时，在长城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的任务。其研究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根据《史

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有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时期，另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

1.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并将其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修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以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经过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内，与原来的燕国长城相衔接。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秦国的这段长城，除了部分利用赵长城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应是蒙恬所扩建。

除过利用赵国长城之外，在燕国长城沿线屡屡发现秦遗址、秦墓或秦遗物。例如，围场县大兴永、小锥山、赤峰三眼井、蜘蛛山、敖汉旗老虎山、奈曼旗沙巴营子等地，都发现带有秦始皇诏书的秦权、秦量以及富有秦文化特征的陶器、砖瓦等，这些都间接地说明秦始皇时代对燕国长城曾经继续利用。

2.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个别地段则直接修缮战国长城，例如，汉代修缮并利用了燕国长城东段。近年来，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所发现的长城遗迹附近，发现了一些城址和遗物，均属于燕、汉时期，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这与《史记·朝鲜列传》所记载的“秦灭燕，属辽东外徼”相一致。如果将文献与实际考察结果相结合，似乎可以说明汉对辽东的燕国长城曾加以利用。

又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修缮并利用了战国时燕国长城的东段，其线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浿水。与《史记·朝鲜列传》所记载的“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相吻合。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①]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

汉代除了积极利用原有长城之外，在长城沿线增设复线，新建边城、亭鄣、烽燧等，派官设署，驻守屯田，这些措施都是前代所不及的。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汉武帝修筑的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有的则称为“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

---

①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弱水（额济纳旗河）自张掖北来，至下游分为东河、西河等河，汇潴于此。汉称居延泽，魏晋一名西海，唐后通称居延海。本为一湖，现绝大部分已经淤塞。

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但一般倾向于复线长城。

由于长城曲折蜿蜒，随地形而高低起伏，不论是战国长城还是秦汉长城，其修筑方法、城墙建制都没有大的区别。一般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做法。平地采用夯土修筑，到了山上则以石块垒砌。大青山后，地势比较平坦，长城大都用夯土修筑；狼山后面，群峰叠嶂，长城都用石砌。夯土修筑与石砌的分界处大约在固阳县北昆都仑河上游。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由于夯土修筑的长城墙身大都毁坏无存，地面上仅能见到墙基痕迹。墙基宽 4~6 米不等，夯层厚 10~12 厘米。石块垒砌的长城，一般先用较大的岩石垒砌平行的两道墙身，中间则以碎石填充。石墙下宽上窄或两壁垂直。较夯土修筑的城墙保存状况要好，高宽一般在 4~5 米。长城经过山地陡坡处，坡下一面垒石较高，坡上一面垒石较低，甚至完全没有。在陡峭的崖壁处，常常利用崖壁作墙身，稍加修整而成。在两山夹峙的山口，则采用土石混合构筑。

3.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所谓鄣塞，即秦汉边塞险要处用于防御的小城，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的地方，形同后代的哨所，一般设置在长城沿线南侧，规模小于边城，并且设有围墙，围墙有石砌也有土筑。平面一般呈方形，每边长数十米到 100、200、300 米不等。南墙设门，门作瓮城形。城的四角向外斜出，形同后代的马面设施。所谓烽燧，是城鄣的耳目，用来报警，设在视野比较宽广的山巅或草原上，沿线罗列，大小高低因地而异，间距 0.5~1 公里。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有的远隔数峰。设在山巅上的烽燧，一般用石块垒砌筑，呈圆柱形或圆锥形，个别周围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燧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呈圆锥形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同，一般基宽 7~8、高 3~4 米，有的四周还筑有围墙。

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再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 300 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燧烽遗址一百数十处。从 1931~1976 年，先后发现木简 3 万余枚。根据木简的记录鄣塞和烽燧的组织体制是将大群的燧烽分为若干部分，由都尉管理。都尉以下设候官、候长和燧长，有时在候官与候长之间设鄣尉。肩水候官所在的大湾鄣塞面积较大，约为 350 米×250 米。肩水候官所在的地湾鄣塞面积较小，约为 50 米×50 米。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鄣塞面积最小，约为 23 米×23 米。鄣塞外筑土台便是烽燧，由燧长主管，附近往往遗有用于执举的竹竿和燃火的苇束。

五、其他

1. 秦弛道与直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治弛道”，集解引应劭曰：“弛道，天子道也，道若古今之中道然。”《汉书·贾山传》记载：“弛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并且在法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如《云梦龙岗秦简》规定：“敢行弛道中者，皆千（迁）（流放边远之地）之。”①

直道，是联结关中和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命大将蒙恬主持修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也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从对秦直道的调查来看，其路线大体上为：由陕西淳化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过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秦九原郡治所（今三顶帐房城址）。在东胜县西南45公里的二顷半村南发现的一段遗迹，残宽约22米，路基断面暴露明显，残存高度1~1.5米，是利用当地的红沙岩土填筑而成。直道沿线的一些地段曾发现秦汉瓦片、人工开凿的豁口，在定边至包头的直道北段，还发现秦汉城址四座。从秦直道的整体情况来看，大约有一半路程修筑在山岭上，一半路程修筑在平原草地上。在近年来的调查过程中，在直道附近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行宫遗址。

2. 姜女石秦汉时期行宫遗址

遗址位于辽宁绥中万家镇南部姜女石附近的滨海地区，为一处规模宏大的秦汉建筑群遗址。自1982年发现以来，经过调查、钻探和重点发掘，遗址的分布范围、建筑特征和年代已经基本清楚②。结合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是秦始皇东巡的“碣石”行宫，汉代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缮、利用。

姜女石建筑群由5处遗址组成，占地25平方公里。面海的3处遗址以石碑地为中心，止锚湾、黑山头为两翼，附之以瓦子地遗址。距海较远的周家南山遗址地势较高，为整体中的一处特殊建筑。在这面海的3处遗址中，每处对面海中都有自然形成的礁石，如同门阙，其中石碑地海中有被称为“姜女石”的三块礁石

①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战：《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遗址石碑第遗址的勘探与试掘》、《辽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1993～1995年发掘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瓦子地一号窑址》，均见《考古》1997年第10期。

高耸矗立，最为壮观，水下有与岸上连接的石通道。这处礁石被认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碣石”，而建筑群就是碣石宫。

姜女石建筑遗址群中，面海的3处遗址是其主体建筑，其中石碑地遗址面积最大，近15万平方米，保存也好。该遗址于1993~1995年间揭露面积约6000平方米。从勘探、发掘情况来看，该遗址利用原地势，以夯土垫垒筑成“三步台阶状”的建筑台基，台基边沿有曲尺形的宫墙，南北总长487、东西宽256~170米。从夯土台基的分布及墙基的走向看，大致可以分为十个相互连接的建筑区域，每一区域内又有多座房屋建筑。石碑地以秦代建筑为主，出土有秦都咸阳常见的板瓦、筒瓦及云纹圆瓦当，其中的大型夔纹瓦当与秦始皇陵所出相同。石碑地遗址南部在汉代曾增修过。

黑山头遗址从南向北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南部为主体建筑，中间的三组是各单元为其附属建筑，北部为较宽的院落。

瓦子地遗址位于石碑地遗址以北约500米处。三处建筑呈品字形分布。第一组呈H形，在最北面。第二组为长方形，在南面。第三组呈L形，在东南面。

另外，在与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建筑遗址群相距30公里的北戴河金山嘴也发现了一处大型秦汉建筑遗址，可能是与姜女石遗址有一定关系的另一处行宫遗址。

3. 汉代粮仓遗址的发掘

（1）京师仓遗址

汉武帝为了将关东粮食运抵长安，开凿了关中漕渠，在漕渠渠首的岸边即汉代华阴县城（秦为宁秦县）处建设了大型中转粮仓“京师仓”，这处遗址已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①。从发掘结果来看，京师仓建于汉武帝时期，废弃于王莽末年，正与长安城的兴衰密切相关。京师仓规模宏大，由仓城及若干座仓房组成。仓城依自然地势而建，大致呈长方形。经过实测，东西长1120、南北宽700米，周长3330米，面积达78.4万平方米。已经发掘的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不足全城的百分之一，在发掘范围之内发现了6座土木结构的仓房。其中一号仓最大，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2.5、南北宽26.6米，面积1662.5平方米，推测其仓容可达上万立方米。仓设三门，有坚硬的夯土台基，高大的墙壁，内设架空地板，门外有披檐，屋面使用板瓦、筒瓦，建筑既考究又实用。出土的瓦当与汉长安城基本一致，其中的“京师仓当”、“华仓”清楚地表明了其建筑性质。

（2）汉函谷关仓遗址

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处于黄河南岸的二级阶地②。主体建筑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

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79、东西宽35米。由城垣、通道、柱础石等组成。城垣由东、西、南、北墙构成，南北墙之间还有两道东西向隔墙，将建筑等分成三部分。墙基宽5.6~6.3、残高2.5米。墙基和墙体分两次夯筑而成，其间夹杂有一层薄薄的料礓石。墙基为挖槽夯筑起基，槽深1.5米，墙体为夹板夯筑。出土的瓦当之中，有篆体“关”字瓦当，为判断该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证据。

四周城垣之内也为挖槽夯筑，槽深约0.95米。城内和东墙外分布着排列整齐有序、大小两种规格的柱础石，形状近似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大都经过修凿，表面平整。小柱础石长宽约30~50厘米，均匀地分布在墙垣之内，残存南北向13列、东西向102行，南北间距1.4、东西行距1.5米。每单元四周的柱础石均紧靠墙壁，个别还深入到夯土墙内，使夯土墙的壁面形成一个圆弧形柱槽。大柱础石略呈长方形，长80~100、宽40~70厘米，四周墙垣内与东墙外南北向共计5列，墙垣之内有2列；东墙之外有3列，排列不甚整齐，最内1列靠近东墙外侧，中间1列靠近东墙外突出部分，最外1列比较整齐。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另外，在附近的陶窑中还出土了“永始二年造”空心砖，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其修建年代在西汉武帝元鼎三年至成帝永始二年之间，应当是西汉时期国家管理的、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仓库建筑。

4. 鸾亭山汉代祭祀遗址

鸾亭山汉代祭祀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西北的山顶上，属于黄土峁梁地貌，山势极陡，海拔1700米，面积2000平方米。2004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钻探，并于2004年和200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①。

遗址包括上部的圆坛和下部的平台两部分，圆坛周围有汉代夯土墙，墙厚0.7~1.2米，夯土紧密，其下有基槽，基槽宽约2.75米，围墙东部内侧有柱洞。除西部、西北部的2座汉代房址、5个灰坑、2个圆形的灶外，其余遗迹均在圆坛下、夯土墙内。

在平台近围墙的缺口处有一个圆角方形的祭祀坑（K1），深2.8米，其中分层埋有大量兽骨，自上而下连续堆积，均被肢解，个体有几十个。可辨认的种类有牛、羊、猪、鹿、狗及禽类。犬祭坑位于遗址北部的汉代浅沟东部，坑内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以及零星汉代陶片。

在遗址北部的一形状呈半月形浅沟内（G4），清理出土了11套组合完整的玉器，玉器的总数超过50件：器类有圭、璧、玉人三种。组合方式有圭压璧、璧压圭及多件玉璧上下叠压等形式。玉圭长4.4~16厘米，最大者长约16、宽约7厘米。玉璧直径12~22厘米。部分圭、璧上有朱砂痕迹。圭多青玉，璧多白玉。另有与圭、璧共出的一男一女2件玉人。浅沟南、北两侧内有柱洞。

①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

鸾亭山在周代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到了汉代则成为专门的祭祀场所。出土的 50 余件玉器绝大多数为圭或璧，结合遗址的布局结构和所处的地形环境，初步推断它是一处汉代的祭天场所。而汉代祭祀用玉的发现，为了解相关礼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黄展岳：《汉代的城邑与边塞遗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393~410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 年。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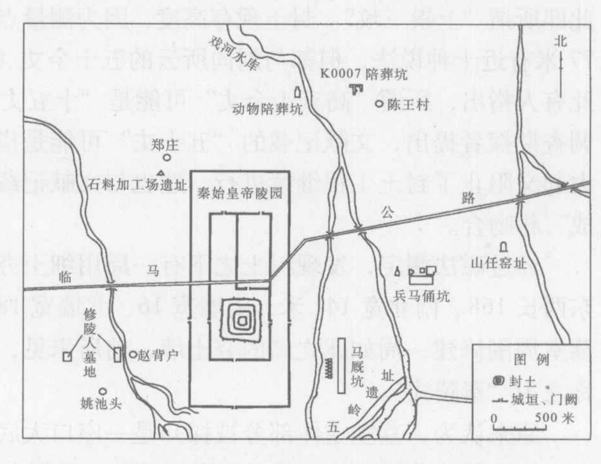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第三节　秦代帝陵与墓葬

一、帝陵

秦始皇陵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帝陵，规模宏大，开创了中国历代皇陵的陵寝制度，对后代帝陵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对于秦始皇陵的调查与研究，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特别是伴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展开，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获得了许多新发现，解决了许



图四　秦始皇陵区重要遗迹分布图

多问题（图四）。文献所载之事，已经逐渐被考古工作者解开面纱。

1. 陵园与封土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陵园平面呈长方形，筑有内外两重围墙。形成一个南北向长方形的回字形陵园。据最新勘探结果，外城周长6321.59（一说 6322 米）米，城内面积 212 万余平方米。内城周长 3870 米，面积78.59 万平方米。

内外城墙在地面上已经看不到任何遗迹。经勘探，外城墙基厚 14 米，内城墙基厚 8.3 米。通过 2000 年度的发掘，得知内城南墙的宽度为 3.5 米，总长为 591.9米。在内城南墙南北两侧分别修建有廊房之类的附属建筑。廊房地面上有一层踩踏面，壁面上涂有彩绘，外侧设有石散水。城墙、廊房、石散水修建在同一夯土基础上。这在中国古代陵寝建筑中属首次发现。内城南墙的夯层厚度不尽相同，一般厚5~8 厘米，夯面平整，而且南北两侧表面均抹有一层 2~4 厘米厚的草拌泥，表面光洁。个别墙段则抹有三层，厚约 5 厘米，第一、二层为草拌泥，第三层也即最外层为厚 1 厘米的细泥，细泥表面涂有粉红、白色彩绘，粉红色彩绘面上依稀有黑色图案，这种在壁面涂彩绘的做法曾经见于秦咸阳宫、秦始皇陵寝建筑。

内外城四边皆有城门：内城北边有二门，其余三面各有一门；外城每面各有一座城门。在两重城垣以内，各种遗迹分布密集，其性质大都与葬制、葬仪有关，是丽山陵园区。外城垣以外的遗迹分布较为分散，除兵马俑坑、马厩坑等特殊设施外，大多数遗迹属于修建陵墓的从属性遗留，因而，可称之为附属区。从陵园内出土的陶文可知，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而陵园则称之为“丽山园”。整个秦始皇陵的陵区，纵横 7500 米，占地 54 平方公里，规模十分巨大。

封土在陵园的南部，系用夯土筑成，略呈平顶方锥状台体。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的话说：“秦始皇葬于郦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整个封土堆中部有两处向内收缩的平台，形成三层阶梯状，此即所谓“上崇三坟”。封土现存高度，因为测量点的不同而有差异，从 35.5 米到77 米有近十种说法，但都与刘向所云的五十余丈（合今 116 米）有较大差距，因此有人指出，所谓“高五十余丈”可能是“十五丈”之误（合今 41.5 米）。最近，调查勘探者提出，文献记载的“五十丈”可能是指原来的设计高度，但秦末农民大起义阻止了封土工程继续进行，这也与文献记载的“覆土未就”、“丽山之作未成”相吻合。

经过磁法测定，发现封土之下有一周用细土夯筑而成的墙，俗称宫墙。宫墙东西长 168、南北宽 141 米，南墙宽 16、北墙宽 18.5、东西墙宽 22 米。封土之下墓室周围修建一周如此之高的夯土墙，前所未见，为一种新的墓葬形制，发掘者称之为“秦陵式”。

原来认为，墓室主体部分被探知是一座口大底小、呈多级台阶状的竖穴式土坑，坑上部南北长 515、东西宽约 485 米，底部东西长约 160、南北宽约 120 米，

深33米多。长方形墓室四边皆有斜坡墓道。封土东侧探出五条墓道，中间一条长达60米；西侧墓道呈“巾”字形；北侧墓道有两条。每侧的墓道皆附有大型耳室，埋藏丰富。如西墓道的耳室中藏有多乘彩绘铜车马或彩绘木车马，有名的一、二号铜车马即由此出土。

经过利用最新的自然科学手段测定，秦始皇陵地宫的开挖范围东西长约170、南北宽约145、深约30米，底部东西长约80、南北宽约50、高约15米。地宫只有东西两条向墓道，而南北墓道不存在。在封土之下的宫墙东西两侧发现了缺口，分别宽57、52米，缺口位置应当就是墓道所在，其宽度应当就是墓道宽度。地宫中可能有石质墓室或石质宫墙的存在。

由于秦始皇陵的墓穴较深，加之有高大的封土堆，探测的结果和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对其认识也只是初步的。但室内应当构筑木椁，椁室用铜加固构造复杂，顶部绘有天象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测出秦始皇陵封土中有极强的汞异常反应，汞含量远远高于周围地区，被认为是地宫内大量水银挥发所致。

2. 寝殿、便殿与丽山食官

寝殿遗址在封土以北53米处的内城西侧，发现一处南北长62、东西宽57米，面积约3534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形状近方形，外环以回廊，发现散水、大量的砖瓦、墙壁碎块、红烧土及灰烬等。根据这一遗址的位置、形状及规格，一般认为它就是秦始皇陵的“寝殿”建筑。

便殿遗址在寝殿以北150米至内城北墙处，即内城西墙与小城墙之间的东西狭长地带，密集分布着多处建筑基址。1976年冬和1977年3月发掘了南部的1~4号建筑基址，这四座建筑呈东西向排列，构成有分有合的一个整体，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各建筑单元以承重墙隔开，室内地面经过夯筑，或铺以石板。堆积物中多见瓦当、陶屋脊等，还发现一种大型夔纹瓦当。该处基址被认为是秦始皇陵的“便殿”建筑。

丽山食官遗址。曾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北内外城之间有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南北长约200、东西宽约169米，面积达33900平方米。1981年11月~1982年5月，又在其南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东西长77.55、南北宽29米的范围内，发现6座大型建筑。遗址内除遗留有大量的建筑材料外，还有各类器物。刻在陶器上的文字有“丽山食官”、“丽山食官右”、“丽山食官左”、“丽邑五升”、“丽邑二斗半，八橱”、“丽山橱”等。此外，曾在遗址附近采集到1件错金银的“乐府”铜编钟。该处建筑或即“丽山食官”的所在地，也就是掌管秦始皇陵园祭祀供膳之处。此外，在丽山食官遗址之北另有两处大型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当属陵园管理官员、侍奉陵寝的宫人及守护、勤杂人员的园寺吏舍建筑群。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将秦始皇陵直接称为“郦山”，如始皇三十五年，“隐

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郦山"、"葬始皇郦山"等。考古发现的"丽山"陶文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证明了"丽（郦）山"是当时对始皇陵的称呼。

3. 地宫的阻排水系统

秦始皇陵的阻排水系统是一个新的发现，位于封土的周围。始皇陵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潜水呈东南向西北流动，阻水系统将地宫以东、以南、以西区域与地宫完全隔断，使得不同深度的潜水不能进入地宫。阻排水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阻水系统，由位于封土东、南、西散侧以下、平面呈"U"形的阻水渠组成；另一部分为排水系统，由位于封土西侧阻水渠以外的明井暗渠组成。阻排水系统的发现，对于理解文献中的"穿三泉"、"下彻三泉"、"下锢三泉"有一定的帮助意义。发掘者认为，所谓"穿三泉"、"下彻三泉"就是在地宫的建筑过程中起到排导地下水的作用；所谓"下锢三泉"就是阻排水系统在地宫建成后有阻水作用。

4. 陪葬坑

截止目前为止，在秦始皇陵陵区范围内发现了180座形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对先秦某些葬俗，如车马坑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并对汉代帝陵制度有一定影响。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陪葬坑。

（1）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就在陵园东门外约1公里处的西杨村。1974年村民打井发现，随后进行了初步发掘。1979年建成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兵马俑坑共有三个，另有一个尚未建成的空坑。其中一号坑最大，平面呈长方形，位置靠南。二号坑次之，为曲尺形，居东北。三号坑较小，呈凹字形，处于西部。未建成的四号空坑居中。均为土木混合结构的地下建筑，其构筑方法是：首先在挖好的大坑内，沿周壁筑夯土二层台，并在坑内顺向夯筑多道夯土隔墙（有的书上说是开挖大坑时预留的隔墙），为承重墙，隔墙之间形成一条条过洞，过洞底部用青砖铺地，两边立有木柱（转角处二柱或三柱并立），立柱上置枋木，枋木上密排棚木，棚木上铺苇席，最后以灰土或泥土覆盖。俑坑前后有斜坡式门道，门道口用立木封堵，填土夯实。俑坑从地表至坑底深5米左右。过洞内置陶俑、陶马、木质战车等。

一号坑东西长210、南北宽62米，面积13020平方米。俑坑东西两端及南北两侧各有五个并列的斜坡门道，包括门道在内，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俑坑四周为连通的回廊式结构，中间有东西向的十道隔墙，隔墙之间形成宽约3.25、长210米的9个过洞，过洞和四周的边廊内皆放置兵马俑。其中，每个过洞内有四列手执兵器的步兵俑呈纵向排列，均面向东方，每隔一定距离置战车1辆，车前有陶马，车后有车兵俑。四周边廊内均为步兵俑，面朝外，即面朝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这样，9个过洞共有36列纵队，再加上四周的兵俑，构成一个长210、宽62

米，有前锋、后卫、侧翼，并且以步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一号兵马俑坑迄今已发掘的部分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三，据排列密度估算，整个俑坑内有武士俑和军吏俑约6000件，驷马战车40乘，陶马160匹。

二号坑呈东北角凸出的曲尺形，东西各有斜坡道四条，北侧2条。该坑东西通长124、南北通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二号坑只发掘了约三分之一，其他部分已经清理至棚木。二号坑由4个单元构成：东北部为弩兵俑群，在其中部的四个过洞中为蹲姿弩兵俑，两两成排，周围回廊为立射袍俑和铠甲俑。北部靠西的三个过洞为骑兵俑群（前有两乘战车），4匹马为一排，前有铠甲骑士，共计12列8排。骑兵俑群南部3个过洞是以步兵、战车为主混合编队的俑群。俑坑南部的8个过洞则为纯粹的驷马战车编组，战车后站立车兵俑，每个过洞有8乘战车，整个二号俑坑计有弩、车、步、骑俑939件，陶马472匹，战车89乘。与一号坑同样，陶俑、陶马皆面向东方。

三号坑平面呈向西的“凹”字形，东面正中开斜坡道一条。不包括斜坡道在内，东西通长17.6、南北通宽21.4米，面积520平方米。由于三号面积较小，加之又呈凹字形结构，故中间不设承重墙，只是在坑周筑夯土二层台，以搭建棚木。三号坑约可以分为三部分：正面前庭置驷马华盖车1乘，后有4个甲士俑。左（北）厢两列16个铠甲仪卫俑除前面的两个面向东以外，其余的皆相向而立。右（南）厢42个铠甲仪卫俑排列疏密有别，也相向而立。

秦兵马俑形象地展现了秦代军队的兵种组成、编列和武器装备情况。从兵马俑的组合来看，秦代的军队组成是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力，虽然步兵的数量多，但战车显然居于首要地位。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其形制、大小与商周以来的单辕驷马战车并无明显差异。车上一般有甲士3人，配备远射、格斗与卫体三类兵器。证明秦代仍然把战车当成主要的作战手段，车战仍然是战斗的主要形式。车后跟随的徒卒多半使用戈、矛、戟等长柄兵器。在军阵的前方、侧翼和后卫，往往布置弓弩手。秦俑军阵中车、骑、步、弩的混合编列，可能反映了秦军在实战中运用“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狭隘）则多其弩”（《孙膑兵法·八阵》）的布阵方法。

兵马俑坑出土了数千件实用兵器，除个别的铁镞和铁铤铜镞外，全为青铜铸造。而南方的大国楚国和北方的燕国在战国晚期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铁兵器，与它们相比秦有点逊色。但从观察和检验的结果来看，秦国对于青铜兵器的制造极端重视，传统的青铜兵器制作水平，到秦代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模拟战士的陶俑，因兵种和身份的不同，披有几种形制不同的铠甲。骑兵的铠甲较短，以便于乘马；一般步卒和车上的铠甲，甲身较长，且有披膊；御手所著铠甲，甲身最长，有盆领、长披膊和护手甲。这些铠甲无疑是模拟当时实用的甲衣雕塑的，它们表现细腻、准确，结构精密，甲衣形制和编缀方法已经形成一套制度，中国古代铠甲的特点这时已经基本具备。

陶俑、陶马如同真人、真马，制作程序大致为：按俑、马的不同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套合、粘接，再进一步雕塑出五官、须发、铠甲、衣纹等细部。因其形体高大，估计是单独入窑烧造（陶俑或是几个一窑），烧成后再施彩绘。兵马俑陶塑神形兼备，堪称秦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由于数以千计的大件陶质雕塑品，不可能长途运输，雕塑和烧造的作坊应当即在陵区附近。

（2）石质甲胄坑

位于封土东南部内外城之间的下陈村北，坑东西长 128、南北宽 105 米，面积 13440 平方米，为土木结构的坑道式建筑，与兵马俑坑构筑方法大体相同。1998 年夏秋之际，在坑的东南部进行了试掘，共清理出石质铠甲 80 多领、石质头盔 38 顶。石铠甲和石头盔均用质地均匀、颜色青灰的石灰岩片和铜条编连而成，四领一排有规律地摆放着。这些石质铠甲按真人的大小比例制作，较为笨重，不会用于实战，当属明器。石铠甲坑的规模与一号兵马俑坑相当，现今只试掘了一小部分，因此，对于其内涵的全面了解还有待于时日。此外，在石质铠甲坑以南 40 米处，还钻探出一个长 72、宽 12~16 米，两端分别由斜坡道的从葬坑，坑内分布有东西向的过洞三条。在此坑的中部过洞内出土了一件蟠螭纹大铜鼎，通高 60 厘米，重达 212 公斤，是迄今所见的最大的秦铜鼎。此外，还发现十多件大型陶俑，这些陶俑均裸露上身、着裙，动作造型各具姿态，与兵马俑严肃的风格截然不同，可能是宫廷取乐用的倡优、角斗士之类。由于该坑只试掘了一小部分，其性质待定。

（3）马厩坑

秦始皇陵发现马厩坑两处，一处在陵西内外城之间，一处在陵园外墙东侧。陵西内外城之间的马厩坑有两座，规模巨大。其中一座马厩坑是两斜坡并行的双门道，面积 580 平方米。另一座为曲尺形，面积 1700 多平方米，坑内每三匹马置于一木栏之内，作卧姿，密集排列，约有真马百匹。出土直立陶俑 11 件，当为管理马厩的官吏和守护人员。

位于陵园东墙外的马厩坑，在长 1900、宽 50 米的范围内估计原有 400 个马坑，但因遭到破坏，已探明的仅有 130 个坑，其中 93 个坑情况比较清楚，包括马坑 74 座、跽坐俑坑 4 座、俑马同坑 6 座，不明者 9 座。这些坑基本呈东西两行并列，目前已经清理了 51 座。马坑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一般长 2.4~3.5、宽 1.2~2.8、深 1.6~2.8 米。每坑 1 匹马，马是被杀死后放入木箱之内的，马头前有陶盆、陶罐和陶灯，属于饲养工具和照明器具。俑坑的跽坐俑亦置于木箱中，高 63~71 厘米，是饲养马的圉人。俑前放陶罐、陶灯、铁锸、铁镰、铁斧等。俑马同坑的陶俑也为跽坐俑。马厩坑中出土器物中有的刻有文字，如“大厩”、“中厩”、“小厩”、“宫厩”、“左厩”等，这些厩名是研究秦代厩苑制度的珍贵资料。

（4）动物坑

动物坑共发现两处，一处位于陵西内外城之间的西门以南，南北长 80、东西

宽 25 米，面积 2000 平方米。坑呈方形或长方形，共 31 座，呈南北向 3 行排列，一般长 1.6~2、宽 0.6~1.2、深 1.8~3.6 米。其中西排 8 座，东排 6 座，内放陶跽坐俑。中间一行 17 座，坑内发现有动物骨骼，盛放在有盖的长方形瓦棺之内，动物种类主要为鹿、麂和杂食类动物，也有飞禽。坑中还有用来饲养动物的陶罐、陶盆。估计这些动物是皇家苑囿中的珍禽异兽。

另一处动物坑位于陵园外城墙之北 750 米处。这是 1 座土木结构的地下建筑，平面呈南北向的"甲"字形，北端有斜坡道。主室南北长 23.5、东西宽 10、深 6 米。主室中间为甬道，两边以土隔梁为界，各有对称的 8 个小间。该坑曾经被大火焚烧过，从残存的动物骨骼来看，有类似鹤的大鸟，也有鸡、猪、羊、狗、獾、鳖、鱼等动物。该动物坑发现许多陶俑残片，当属饲养动物的"圉人"。

（5）K0006 号陪葬坑

位于陵园内城以内、封土的西南角，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由斜坡门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和后后室略微错位，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整体呈竖穴式，沿坑周壁设置有宽 0.5~1 米的生土二层台，生土二层台收分较大，至坑底宽 1.5 米。沿生土二层台周壁有一周夯土二层台，顶宽 1.3~1.5、底宽 0.8、高 2.7 米。夯土二层台土质坚硬，夯层均匀，每层厚 8~9 厘米，夯窝圆形圜底，直径 5~7 厘米。斜坡门道呈口大底小的梯形，残长 15、东端宽 7、西端宽 3.5 米。在斜坡门道和坑体结合处的北壁发现一处高 2.5、宽 0.13、深 0.05 米的凹槽，槽内有立柱朽痕。在斜坡门道近底部发现南北向平砌的木封门，门外侧填土夯实至坑口。前室长 10.6、宽 4.05 米，在南部有一长 3.8、宽 2.9 米的厢房，共计出土 12 件真人大小的陶俑及陶罐、铜钺等，并发现木车遗迹一处。后室长 20.2、宽 3.9 米，出土有马骨骼等。后室北壁坑口外有一高出坑口的东西向夯土台，随坑形向西延伸至前室，长 28.5、宽 0.4、残高 0.2 米。由于陪葬坑北侧紧邻陵墓封土，此夯土台可能是挡水墙，用来防止陵墓封土的地表水灌入坑内。

K0006 号陪葬坑是陵园中少见的未被火烧过的陪葬坑，木结构完整。坑体上部均覆盖有一层棚木，棚木多为方木，个别为圆木，长 5.7~5.8、宽 0.2~0.4 米。夯土二层台的周壁原以板木垒砌构成主室的厢板，除后室南壁西段的厢板保存完好外，其余厢板均坍塌于坑底。另外，除斜坡墓道之外，坑底均以经过修整的木板铺地，铺地木虽然已经腐朽，但迹象大多保存完整。关于该坑的性质，有马厩坑之说，有散骑常侍性质陪葬之说，发掘者认为是九卿中主管司法的廷尉官府机构的象征。

（6）K0007 号坑

该坑平面形制城"F"形，为地下坑道式土木建筑结构，由 1 条斜坡道、2 条南北向过洞和 1 条东西向过洞组成，总面积 978 平方米。坑内出土与禽鸟基本等身的青铜禽鸟 46 件，种类有天鹅、鹤、鸿雁 3 种。姿态各异，逼真生动，或站、

或卧，有的闲步，有的觅食。青铜禽鸟的陪葬坑用以象征禽苑，属首次发现。另外出土15件陶俑和一些小型器物。

5. 陪葬墓

在秦始皇陵发现陪葬墓三处：一处位于内城东北，一处位于内外城之间，另一处位于陵园东墙外偏南处的上焦村。

内外城东北小城内的陪葬墓，墓地范围南北长520、东西宽320米。已探出28座中小型墓葬，均为南北向，由东西作3行排列，平面呈“甲”字形的墓居多。由于未经发掘，具体情况不明，但能在陵园之内辟地而葬，形制为甲字形，墓主身份应当较高，推测可能是秦始皇后妃宫嫔的埋葬区，小城也象征后宫之地。

内外城之间的陪葬墓，位于西门以北的内外城之间，墓地范围东西长170、南北宽90米，面积15300平方米。该墓区探出墓葬61座，形制有甲字形、长方形、曲尺形、刀形，钻探中未见任何遗物，似为空墓，大概是预先造好墓穴，之后不久秦亡，未能入葬。

上焦村陪葬墓①，位于上焦村西，共17座。墓为东西向，南北一字排列，间距2~15米。1976年冬至1977年初，试掘了其中的8座，其中7座墓主身首异处，尸骨狼藉，表明大多数是被肢解后埋葬的。另外1座墓葬仅在棺中放置一把铜剑，未见骨架。墓主除个别较年轻外，其余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性别为5男2女。这批墓葬等级较高，但死者身首异处，当为非正常死亡。从死者年龄、尸骨状况和随葬品中刻有“少府”字样的宫廷用品等情况来看，推测他们的身份可能是被秦二世胡亥、赵高杀害的秦公子、公主，其中也可能包括秦始皇原来的某些近臣。

6. 修陵人墓地

修陵人墓地是指修建始皇陵的刑徒或身份较低的普通人的墓地。他们都为修建始皇陵而亡，死后一般就地埋葬，埋葬非常简陋。有的为乱葬坑形式，骨骼层层叠压；有的使用简陋的竖穴土坑墓葬。比较重要的有赵背后村墓地、山任村墓地、姚池头村墓地、五砂厂墓地等。

赵背后村墓地已经钻探出100多座，并发掘了其中的32座。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深1~2米。大小不等，视埋人多少而定。小的土圹长1.1、宽0.56米，最大的土圹长10.6、宽1.1米。一个土圹一般埋葬两三人，也有埋一人或十多人的。葬式一般多采用踡曲特甚的屈肢葬，只有极少数采用仰身直肢葬。仅见一具瓦棺，其余都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在部分尸骨上覆盖有当时的筒瓦、板瓦残片。在这些残瓦片中，在18件之上有刻字，多数刻在板瓦的里面，内容包括地名、服役性质、爵位名称、姓名等。经过初步鉴定，被埋葬者多为男性青壮年，另有个别的妇女和小孩。其中6具尸骨明显是杀戮后埋葬。

①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山任村墓地利用废弃窑场埋葬死者。在两座陶窑遗址西侧总面积 76 平方米的废弃窑场内，清理出层层叠压、摆放凌乱的人骨 121 具，年龄在 15~45 岁之间，其中 20~25 岁左右的成年男性占绝对多数。伴之出土的有大量绳纹板瓦、筒瓦碎片及陶片，铁锛、铁锸、铁铲等生产工具和铁环等刑具，还有两枚“半两”铜钱等。个别瓦片及陶器上有“骊”、“郑亭”、“大水”、“工”等戳印文字。这两座陶窑被废弃以后，借用窑场的低洼地势，掩埋了因修建始皇陵而死去的劳动者。从出土的铁质刑具及凌乱的人骨推断，死者为秦始皇帝陵修建提供劳役服务的身份较低的普通人或刑徒。

姚池头村墓地为乱葬坑形式。在村南台地断崖上，发现残长约 60、厚约 0.8 米骨骼堆积层，骨骼叠压少则两层，多则五层，该墓地曾经出土铁钳等刑具。

五砂厂墓地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考古勘探发现墓葬 220 座，墓葬内有砖棺、瓦棺、木棺等几种，个别墓葬发现陶器等随葬品。

这些墓地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修筑陵墓相吻合。

二、秦代墓葬

目前考古发现的明确的秦代墓葬，数量不多，以湖北云梦睡虎地①和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陪葬墓为例进行介绍。

1. 云梦秦墓

云梦秦墓的形制均为土坑木椁墓，墓葬规模较小。墓坑平面呈长方形，没有墓道。墓坑口长 3 米多，宽 2 米多。墓底略小，一般在 3 米以上。有的坑壁上留有可供上下的足窝。葬具均为一棺一椁。墓坑的上部填五花土，椁室周围填青灰泥，都经过夯打。椁室由盖板、底板、左右侧板、前后档板平铺垒砌而成。底板下面还有两根枕木承垫。外椁平面呈“Ⅱ”形或横“Ⅱ”形。椁室内设置棺室和头箱，有的还有边箱。椁室、头箱、边箱分别用横梁隔开，其上加盖顶板。有的在横梁之下置双扇门，可以开阖。棺室放置木棺，头箱、边箱放置随葬品。木棺呈长方盒形，髹漆，内红外黑。棺的四壁板、盖板、底板，均由两块厚木板用边搭榫相接，并用小木栓加固。木棺近两端处各有一道麻绳痕迹，应当是吊棺下葬的系绳。

椁盖上铺有一层杂草或树皮，盖板下垫芦席。在杂草上有马头骨或牛头骨。有的在坑壁上掏小龛，龛内放置羊骨和陶釜甑。出土秦简的 11 号墓内放置木车一乘，木足泥马三匹，彩绘俑两个，墓底四隅有灰烬痕迹。这些迹象，应该是入葬后填土前举行的祭祀仪式的遗存。由于尸骨大部分已经腐朽，从残存的骨架来看，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以丝织衣物裹尸，尸体上以草席覆盖。

①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

随葬品有漆器、木器、竹器、陶器、铜器、文书工具和食物。漆器数量占大多数，器形有耳杯、圆盒、盂、壶、勺、匕、尊、卮、盘、耳杯盒、奁等。漆器大都为木胎，只有卮、小奁、小盒等较轻巧的漆器为夹纻胎。木器有俑、轺车、马、木梳、篦、璧、佩、六博具。竹器有提篮、笥、篓、扇、笄。陶器主要有三类：一为日常生活用的瓮、罐、钵、茧形壶、釜、甑；二为模型明器灶；三为礼器鼎、钫。铜器以礼器为主，有鼎、盒、壶、勺、匕、鋗、盘、匜、鍪以及镜、带钩。文书工具有墨、石砚、毛笔[①]、铜削。个别墓葬还随葬木牍、竹简。食物类有粮食、肉食品和瓜果等。

云梦秦墓沿用楚国流行的土坑木椁墓，但随葬的陶器有很大变化，无论器形、种类都与关中地区同期墓葬接近。说明秦攻占楚国都城郢城之后，秦的葬俗在这里得到推行。此后数十年间，这一带原有的楚文化风格逐渐被秦文化风格取代了。

2. 秦始皇陵的陪葬墓

秦始皇陵陵园东墙外的上焦村陪葬墓，1976 年进行了考古发掘[②]。墓葬形制分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和土圹洞室墓，两者都有长斜坡墓道。有的还有耳室。其中的两座仅在木椁内用档板隔出棺室、头箱、足箱三部分，未另外置棺。葬具多采用一棺一椁。葬式仅 1 座墓的骨架完整，为仰身直肢葬，其余被推测系肢解后埋入。随葬品与一般秦墓无甚区别，每墓随葬十几件至二三十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陶器上有戳印的陶文，如“栎阳”、“亭”等，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品的鼎、豆、盒、罐、缶、盆、蒜头壶、釜等，明器类的仓等。铜器有釜、甑、鍪、剑、带钩、铃、印章、半两钱等。铁器有灯、刀、斧、锛、锸等。玉器有璧、璜等。还发现殉牲的遗骸。

参考文献：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 1999》，科学出版社，2000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 2000》，文物出版社，2006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 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①毛笔在战国时期墓葬中多有发现，但绝大多数都是将笔毛用线缠于笔杆头上，笔套只用一竹节。云梦秦毛笔将笔毛纳入笔杆的毛腔中，形同现代毛笔，而且竹管笔套的中间两侧镂空，取存方便，比战国毛笔有很大进步。

②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2 期。

第四节 汉代帝陵与墓葬

一、帝陵与诸侯王、列侯墓

（一）西汉帝陵

汉代帝陵继承秦始皇陵的制度而有所改变。汉代皇帝和秦始皇一样，生前便开始建陵，一般将这种做法称为预筑之制寿陵。为了建陵和筹备各种珍贵的随葬品，耗费极大。少府属官中有东园匠，生产东园秘器，专为皇帝制作丧葬用品，诸如棺椁、金缕玉衣和各种明器。

在西汉帝陵之中，除文帝霸陵在西安市东郊凤凰嘴、宣帝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的三兆镇之南以外，其余 9 帝的陵墓都在渭水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自东向西依次为景帝阳陵、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哀帝义陵、元帝渭陵、平帝康陵、成帝延陵、昭帝平陵、武帝茂陵。西汉帝陵制度的特点概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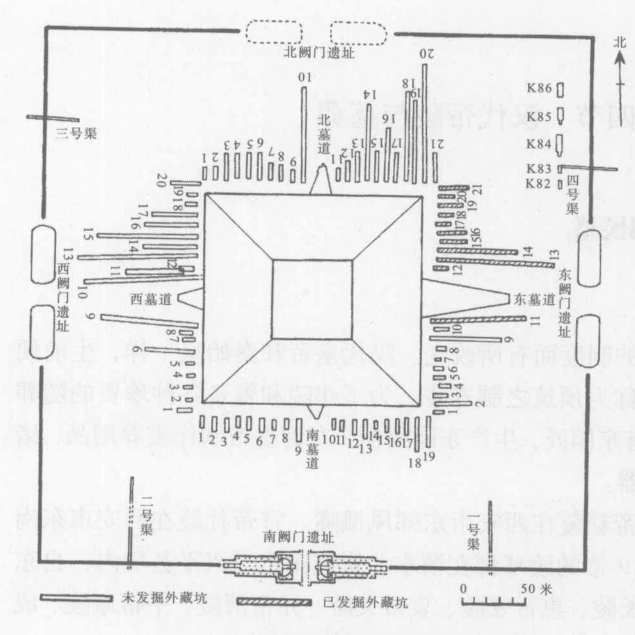
1. 西汉帝陵的构筑分为两类：一类为“以山为陵”或者说“因山为藏”，陵墓开凿于山崖中，不另筑封土，属于崖墓之类，仅汉文帝霸陵 1 座。另一类为封土为陵，在西汉 11 座帝陵当中，这种构筑方式占了 10 座。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高大的方形覆斗状封土，一般底部约 150~200 米见方，高约 20~30 米。其中以茂陵的封土最大，底部东西长 229、南北宽 231、高 46.5 米。封土之下有巨大的地宫，为设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式土坑，平面呈“亚”字形。如景帝阳陵、宣帝杜陵均钻探出 4 条墓道，四面正中各有 1 条，东墓道为主墓道，与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所载的“设四通羡门”相吻合。推测地宫内棺椁用所谓“梓宫[①]、便房[②]、黄肠题凑[③]”之制，属于正藏部分。

---

①梓宫：在汉代，帝王的棺木用梓木制作而成，称为“梓宫”。《汉书·霍光传》颜师古对“梓宫”注云：“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宫。”《庄子·杂篇·天下》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如果将棺和椁分别计数，应是天子五棺二椁，诸侯四棺一椁，大夫二棺一椁，士一棺一椁。但应当注意的是，汉代的“梓宫”并不是天子所专用，有时太后、皇后也能享受。如《汉书·外戚传》中提到“共王母及丁姬”的棺木皆名梓宫。此外，皇帝的宠臣死后也有被赐以“梓宫”的。

②便房：原指迎宾的侧室。墓葬中的“便房”，是汉代帝陵中的设施。汉成帝昌陵中就有便房，据《后汉书·礼仪》有一段皇帝进入墓室的情况：“黄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寻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竭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升车归宫。”这里所说的柩前，即是“梓宫”之前。便房则是到梓宫前歇脚的房间。但是“便房”也不是帝陵所独有，皇帝也常赐宠臣以便房。如霍光死后，宣帝赐“便房”、“黄肠题凑”各一。黄贤死后，哀帝也“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内为便房刚柏题凑”。

③黄肠题凑：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霍光死，汉宣帝赐其“璧、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



图五　汉景帝阳陵陵园平面图

2. 西汉帝陵都修建有陵园。陵园都以封土为中心，周围以夯土构筑围墙，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每边长 400 米左右，个别陵园规模较大，四面正中各开一门，称司马门，东司马门为正门。门道宽 15 米，门外立一对土木结构的门阙。土阙长 40、宽 15~20 米左右。通过对景帝陵园南门的发掘，得知门阙为土木结构的三出阙。陵园规模，如高祖长陵陵园围墙边长 780 米；景帝阳陵陵园围墙边长 418 米，墙宽 3~3.5 米（图五）；武帝茂陵陵园的夯土围墙，东西长 430、南北宽 414 米，墙宽 5.8 米；宣帝杜陵陵园围墙边长 433 米，墙宽 8~10 米。景帝以前，帝后使用同一陵园，自景帝以后帝后之陵分别设置各自的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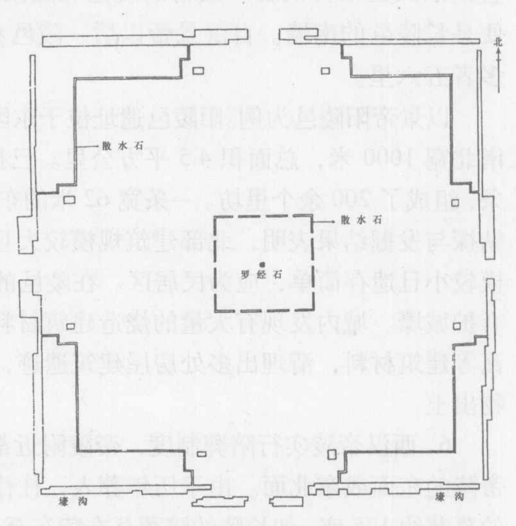
3. 西汉实行皇帝与皇后合葬制度，但同茔而不同穴。后陵一般是在帝陵的东面。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惠帝张皇后陵在安陵西面，武帝李夫人陵和元帝王皇后陵分别在茂陵和渭陵的西北。不把她们埋在帝陵的东面，应当另有原因，属于非常制。后陵陵园和封土较帝陵为小，如宣帝杜陵的后陵陵园边长 335 米。只有吕后的封土几乎与长陵同大。

4. 汉承秦制，西汉帝陵地面上设寝殿、便殿和祠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据记载，寝殿为陵园之内的正殿，殿内陈列皇帝的“衣冠、几仗、像生之具”，并有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侍奉如生前。寝殿之旁又设便殿，以象

具”。颜师古注引苏林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端头皆向内，故曰题凑。”所谓外藏椁，颜师古注引服虔云：“在正藏外，婢妾之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正藏”与“外藏”是相对而言的两个概念，“正藏”则是指放置梓宫的藏室，即内椁室。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题凑”结构，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缺乏实物证据。从已有的汉代考古材料可知：“题凑”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层层平铺、叠垒，一般不用榫卯；二是“木头皆内向”，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木条）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方式衍生出来的。“黄肠”则因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椽），以木色淡黄而得名。“黄肠题凑”皆发现于竖穴木椁墓中。例如，长沙象鼻嘴 1 号墓、北京大葆台 1 号墓等都使用了黄肠题凑。

征“休息闲宴”之处。在高祖长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都曾发现大规模的寝殿建筑基址。其中杜陵寝殿建筑经过正式发掘，其位置紧靠陵园东南，周围有夯土筑成的围墙，称为寝园。寝园呈正方形，东西长174、南北宽120米，其东侧为寝殿，西侧为便殿。寝殿东西长74.3、南北宽37.5米，中为殿堂建筑，周围有回廊、散水，设置两门及六阶。便殿东、南、北三面夯筑围墙，西面有廊，分堂、室、院三组建筑。

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京师自高祖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以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为起始，以后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设庙，并成为定制，但一般距离封土较远。庙中藏主[①]。各庙都有自己的名称，如文帝霸陵庙名“顾成”、景帝阳陵庙名“德阳”、武帝茂陵庙名“龙渊”、昭帝平陵庙名“徘徊”、宣帝杜陵庙名“乐游”、元帝渭陵庙名“长寿”、成帝延陵庙名“阳池”等。在景帝阳陵陵园东南300米处发现一处遗址，整个遗址呈圆丘状，中部高，周围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260米，由围墙、四面的门址、四门址旁的井、四角的曲尺形配房、门址与中心建筑之间的通道以及中心建筑等组成，整个遗址呈“回”字形布局。从遗址的位置、规模、建筑特点及出土的四神纹空心砖、玉璧、玉圭等推测，该遗址可能即是阳陵陵庙德阳宫遗址（图六）。宣帝杜陵东北也发现一处夯土台基，平面近方形，根据其地势、位置和大量的龙凤纹空心砖，推测可能是陵庙遗址。



图六　汉景帝阳陵陵庙遗址平面图

除上述礼制性建筑之外，还曾经在高祖长陵发现“斋园”、“斋一宫当”、“斋园宫当”等文字瓦当，可能陵园之内还有举行祭祀礼仪前专门斋戒的建筑。

如何利用这些礼制性建筑祭祀死去的皇帝，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殿，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关于“游衣冠”，据《汉书·叔孙通传》应劭注云：“月旦出高帝衣冠，备法驾，名曰游衣冠。”

5. 西汉帝陵有陵邑之制。最初建陵邑是为了将齐、楚之地的大姓和有功之臣迁至陵邑之中，这样可以削弱地方势力，进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地位。自此

①主：简单地说，就是为死者所立的牌位。

而后，往往将高官富豪迁到各陵邑中，将有实力的豪族控制在长安，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巩固政权的措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汉王朝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之时，再进行强迫移民，导致老百姓破产的事件屡有发生，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最初修建陵邑以巩固政权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到了汉元帝永光四年（前 40）便下诏宣布废除陵邑之制，自元帝渭陵开始，陵邑便不复存在，一直到东汉也未再恢复。最初的陵邑和陵园相连或距离较近，如长陵陵园的北墙便是长陵邑的南墙。自汉景帝以后，陵邑和陵园有了一定的距离，少者一二里，多者五六里。

以景帝阳陵邑为例。阳陵邑遗址位于东区陪葬墓园的东部略偏北，东西长 4500、南北宽 1000 米，总面积 4.5 平方公里。已探明东西向街道 11 条，南北向街道 31 条，组成了 200 余个里坊。一条宽 62 米的东西向主街道，将陵邑分为南北两部分。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北部建筑规模较大且内涵丰富，应为官署区；南部建筑规模较小且遗存简单，应为民居区。在陵邑的南部探明一段 970 米长的城墙，墙外有护城壕。城内发现有大量的烧造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的陶窑，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清理出多处房屋建筑遗迹，且有大量生活用具、封泥、货币等文物出土。

6. 西汉帝陵实行陪葬制度，帝陵附近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位置一般位于帝陵的东面或东北面。由于历年葬入，往往形成规模较大的墓地。现存有封土堆的墓葬约 175 座。如长陵的陪葬墓在陵东至今尚有高大的封土 70 余座，排列有序，有名的大臣萧何、曹参的墓在陵园东司马门外大道之北。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和金日磾的墓也都在陵的东面。陪葬墓的封土小于帝陵，有覆斗形、圆锥形、山形等。

以对阳陵的钻探结果为例，陪葬墓区以司马道为中心，南北宽达 1500 米，占地 3.5 平方公里。在这一范围内钻探出大中小型墓葬 5000 余座（包括陪葬坑），其数量远超过地上已知的封土数。这些墓葬以壕沟相隔，形成若干不规则的棋盘式墓园。墓园一般呈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这种墓园或属于家族茔园，即功臣贵戚陪葬于阳陵，并且子孙也可以埋葬于此。它们属于文献所记载的“郡国”墓园。

在陪葬墓中，有的墓前陈列有石像生。如武帝茂陵霍去病墓的墓冢建成山形，坟冢上下有数十尊大型动物石圆雕，有卧马、跃马、蹲象等，其中以“马踏匈奴”最为有名。这些石圆雕的特点是借助石材的自然形状，以简练的手法稍加雕琢，即成生动逼真的形象。有的陪葬墓还有陪葬坑，如曾经在位于茂陵东南 1000 米处的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墓附近，发掘了 30 多座陪葬坑，出土了一批“阳信家”铜器，其中的鎏金铜马、鎏金铜竹节熏炉华丽无比。经过发掘的帝陵陪葬墓有咸阳杨家湾 2 座属于高祖长陵的陪葬大墓，推测可能是汉代初年周勃夫妇的墓葬。在该墓墓前的多座陪葬坑中，还出土了 3000 多件高约七八十厘米的彩绘骑兵俑，虽

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高大，但也阵容庄严，气势非凡。

7. 西汉帝陵除去地面建筑之外，封土附近的地下都有规模巨大的从葬坑，这属于帝陵的“外藏”部分，埋葬有数以万计的各类随葬品。其中景帝阳陵的从葬坑的分布范围已经勘探清楚，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从葬坑分为陵园墙内和墙外两部分。墙内的从葬坑以封土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分布，共计86座。各坑长度不等，最长100米以上，最短的仅4米。坑宽3~4米，坑口距地表深5~11米，坑深3米左右。坑内埋葬有数量十分惊人的骑兵俑、步兵俑、动物俑以及车马、兵器、生活用器等。陵园东墙外的从葬坑以司马道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区在96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有24座坑，20世纪90年代对其中的14座进行了试掘，发现密集排列的陶质人俑、家畜家禽俑以及陶、铁、铜质的生活用器。陶俑出土时所穿的丝绸之类的衣服已朽，所以多为裸体状态。像这样有大量陶俑随葬的从葬坑，其他帝陵也有发现。如武帝茂陵陵园的西、南、北三面钻探出数量不少于阳陵的从葬坑。文帝霸陵的窦皇后陵园西墙以外曾经发掘从葬坑47座，也出土了陶俑、禽兽遗骨等。

（二）东汉帝陵

据文献记载，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个陵都在河南省洛阳附近，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但尚未证实。其余诸陵，更难以确定。东汉的帝陵虽是继承西汉的制度，但推测地下的墓室为砖筑或砖石混合建筑，其棺椁亦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但除木棺以外，可能也采用砖和石料，可称“黄肠石”。

从汉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周围不筑垣墙而改用“行马”（一种临时性的竹木做的屏篱）。此外，在封土之前建石殿以祭享，这也是东汉的新制。据后世有些文献记载，原陵神道前置石人、石马，但有待证实。汉明帝时，在原陵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称为“上陵”，以后成为定制。与西汉一样，陵园附近亦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最近，在河南洛阳市孟津县和偃师白草坡发现并钻探了东汉帝陵陵园及其园内的建筑遗址，这在东汉帝陵的研究史上尚属首次①。其中的大汉冢位于洛阳市孟津县三十里铺村南，现存封土直径130、高19米，是邙山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座封土。封土外围发现一圈夯土环沟，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墓，墓道南向。封土西侧有3座规格很高的陪葬墓，封土南侧、东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南侧基址保存了东西3排、南北13行夯土墩，面积约2100平方米。东侧基址全部由夯土筑成，面积约5600平方米。封土的东北方约150米处也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址群，东西宽约400、南北长约500米，面积20余万平方米。建筑遗址群内发现纵横交错的夯土墙、夯土基址、半地穴房屋和人工沟渠。北部建筑外围有环壕，

①国家文物局：《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环壕内侧构建双重夯土墙。墙内由并列成组的庭院房址组成，结构规整且复杂。南面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发现有大型的夯土台基、夯土墩台和夯土围墙。

白草坡帝陵陵园遗址位于偃师庞村镇白草坡村东北，是万安山北麓高坡和伊洛河谷地交接边缘。帝陵封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被完全夷平，经钻探，地面以下原封土堆的直径 125 米。墓葬坐北朝南，为砖石混合结构，墓道宽 10 米。帝陵陵园遗址位于夷平封土堆的东北方约 100 米，是一处外围筑有夯土墙的建筑遗址群。经调查钻探，南北长 380、东西宽 330 米，面积约 12.5 万平方米。遗址内是纵横交错的夯土墙、夯土基址和人工沟渠。南部有大型夯土台基，北部房屋建筑基址规模较小。对建筑遗址群的西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 3800 平方米。发现了外围的夯土墙和内部的房屋基址。墙由墙体、基槽、散水、砖沟组成。房屋基址分为三组，东、中、西部各一组，每一组均有房屋、庭院和粮窖。东组房址和中组房址保存较差，西组房址保存较为完整。遗址中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给排水系统，包括主水渠、支水渠、小水渠和蓄水池，个别地段还发现道路遗迹。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陶质建筑材料和一些生活器皿。综合调查、发掘的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测这次发掘区域有可能是陵园内的园省遗址。虽然发掘面积有限，但是对于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实属首次。此次发现的各类遗迹和出土的建筑材料非常丰富，对于探索洛南东汉帝陵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一直不甚明了的东汉帝陵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重要意义表现在对东汉帝陵有了初步的概念：东汉帝陵的方向坐北朝南，在地势的选择上可能背山面水；地面封土堆呈圆形；陵墓内部结构为砖石混筑，平面呈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封土的东北方有大规模的园省类建筑，周围有夯土围墙，墙内有大型建筑群；地面立碑等。

（三）诸侯王和列侯墓

汉承秦制，实行二十等爵制，最高一级为列侯。列侯之上则为诸侯王。西汉初年所封列侯，主要是开国元勋，其后只有诸侯王子弟等望族宗戚及少数重臣才能封侯。在文、景、武帝之时，为了加强皇权，对诸侯王及列侯进行过一系列的削弱政策，使其势力日益衰落。但终汉一世，对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分封诸侯王的政策没变，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方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木椁墓，另一类为崖洞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的形式。

对于诸侯王和列侯墓的研究是汉代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截止目前为止，有大量论著发表。其中俞伟超先生对汉代诸侯王墓与列侯墓的系统论述最具代表性[①]，而且被学界广泛引用。他着重探讨了其渊源、形制等内容，并大体理清了诸侯王墓和列侯墓的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轨迹，将其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①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的形制分析》，《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 西汉前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诸侯王墓普遍实行“梓宫”、“明堂”、“后寝”、“便房”、“黄肠题凑”组成的“正藏”与“外藏”，这种制度源于周代制度。周代制度和汉代制度的基本内容即所模拟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也有学者将外藏椁的渊源追溯到商代。商代晚期的大墓中的大量殉人一般置于墓圹内的棺椁之外、二层台、墓道或墓外，相对于主椁室的正藏系统，已经具备了外藏的特征。另外，这类大墓的墓道或墓外还单独掘坑殉葬车马，也具备外藏椁的特征。至春秋战国时期，有些大墓在棺椁之外或墓室之外另筑椁室，内置礼器、宴饮用品或车船马等，已经成为规整的外藏椁。至汉代，外藏椁成为皇帝、诸侯王等大贵族丧葬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①]。

另外，长沙和南越的诸侯王、列侯墓的“黄肠题凑”还表出现多种因素杂糅的特征[②]。如长沙诸侯王、列侯墓的“黄肠题凑”的回廊呈分室形式，或4个，或7个，或12个不等，与战国楚墓椁内分室有关。葬具中的套棺棺盖呈弧形，与战国楚墓棺盖一致。葬具中的雕花笭床也流行于战国楚墓。因此，长沙地区的葬制是汉制中杂糅楚制，而以楚制为主。南越王墓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后部又纵向并排分成三室的平面格局，与两广地区西汉前期的大型木椁墓的形制相一致。墓内随葬品的放置、各室的用途以及殉人情况，则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相一致。这些特点应是本地传统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两广地区的葬制则是一种杂糅汉、楚和越制的融合体，尤以百越葬制杂糅楚制为主。

2. 自汉武帝至东汉前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基本采用两个发展系统，即凿山为藏的崖墓和穿土为圹的“黄肠题凑”墓。尽管崖墓的形式和穿土为圹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前者的格局仍然由“明堂”和后寝形式的“正藏”与左右耳室形式的“外藏”构成。“黄肠题凑”墓则大体上延续西汉前期的样式，只是到后期出现用石材作为“题凑”的形式。

3. 东汉后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诸侯王墓、列侯墓与地方豪强墓的形制已经相混淆，基本上采用砖砌的有前、中、后三室的墓葬。这一变化表明，当时的豪强势力几乎可以随便使用原来的诸侯王的墓制。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是由于东汉后期土地兼并所有制的膨胀，地方豪强极度发展所致。

二、墓葬

（一）分类

汉墓与前代相比，其特点之一，是墓的形制和构造富于变化，种类较多。按

①李如森：《汉代“外藏椁”的起源与演变》，《考古》1997年第12期；刘振东：《中国古代陵墓中的外藏椁》，《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②高崇文：《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制初探》，《考古》1988年第4期。

其建筑材料，主要有竖穴土圹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①]。在这些墓葬之中，除木椁墓是竖穴式以外，其余各类都是横穴式，这在先秦少见或不见。

1. 竖穴土圹墓

按照身份可以分为木椁墓、刑徒墓和贫民墓。

（1）木椁墓

其形制基本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木椁墓。主要流行于西汉前、中期，在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甚至于延续至东汉前期。墓室一般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规模较大的墓往往设有斜坡式或阶梯式墓道。也有一些特例，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墓道就为曲尺形。在一些木椁墓中还注意防腐，例如湖北和湖南境内发现的一些西汉时期的木椁墓，继承战国时楚国的传统，用一种密度很大的白色或青色的膏泥填在棺椁周围，密闭性强，有很好的防腐作用，可以使尸体和随葬品保持不朽。

木椁墓的棺椁使用承袭周代的礼制，有一定的等级，《庄子·杂篇·天下》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但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是很严格。

（2）刑徒墓和贫民墓

与统治阶级的陵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刑徒墓和贫民墓。它们反映了秦汉时期的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的情形。

A. 阳陵附近的西汉刑徒墓

墓地在陕西省咸阳市景帝阳陵西北约 1 公里处，面积达 8 万平米，所埋筑陵刑徒，估计在万人以上。墓坑排列无序，有的略呈长方形，有的不成形状。坑内或埋一人，或埋多人。尸骨有颈上带铁钳的，也有在脚上带铁镣的。

B. 洛阳附近的东汉刑徒墓

在河南省偃师县，离东汉都城洛阳约 3 公里，时代属东汉中期。发现刑徒墓 500 余座。都是仅能容身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坑排列紧密，间隔余地极少。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尸骨上多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除少数墓内有一两枚铜钱外，大多没有随葬品。墓中放置一二块残缺的砖，上刻文字，记明刑徒所属的监管机构、有无技能、死亡日期，对砖的研究说明，刑徒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监狱，被强迫从事各种劳役。这些墓的年代，自安帝永初元年（107）到永宁二年（121），前后不到 14 年。说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刑徒们不断死亡，有的墓是将先死者的尸骨从墓坑中挖出来，另埋新死的刑徒。

C. 贫民墓

在河南省洛阳市发掘了一批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的贫民墓。墓地离当时河南县城较远，处在低洼地带。葬具都很简陋，有的用陶棺，有的用砖块稍加垒砌，有

①王仲殊：《秦汉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的仅用瓦片覆盖尸体，也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仅有几件简陋的陶器或几枚铜钱。

2. 土洞墓

又称洞室墓。战国中晚期已经开始出现，但数量很少。到秦汉时期，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量流行，并延续到以后各代。土洞墓的墓室为横穴式的土洞，前部一侧或两侧往往设耳室。墓道多为长方形竖井式，也有狭长斜坡式。这种墓构造较简单，规模不大，墓主属于下层人物。

3. 空心砖墓

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西汉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大量流行，到东汉即告绝迹。在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墓道多为竖井式。西汉前期，墓室呈长方形，形状像木椁。到了西汉中后期，顶部往往砌成屋顶状，前壁作成门的形式，显得像房屋的样子。墓室内的砖面上印有花纹和图案。河南洛阳西汉后期的个别墓里还绘有彩色的壁画，题材有天象、“四神”、神话人物及历史故事等。这种墓的墓主多为中下层人物。

4.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到东汉已流行全国，并盛行于以后各个时代。墓室用小型的长方砖砌成，有时局部使用楔形砖和榫卯砖。顶部或券筑成圆弧形，或叠涩成穹隆状。墓的大小不一，往往附有耳室。贵族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除后部的主室外，多设前室、中室或侧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第。诸侯王等大贵族的墓，沿袭西汉木椁墓中的黄肠题凑之制，但用方石代替柏木，如河北省定县的中山简王刘焉墓。

汉代贵族官僚的砖室墓，往往施彩色壁画，其题材主要是显示墓主人的身份、经历、日常生活和产业财富等。通过对汉墓（包括空心砖墓、砖室墓和石结构墓）壁画题材内容进行概括，大致可归纳为七类：（1）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2）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3）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4）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5）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6）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7）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第1、2、3、4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第5、6、7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①]。

①俞伟超、信立祥：《汉代壁画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东汉时，在四川境内的砖室墓中，有时在砖壁之上另外镶嵌一种模印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这类墓则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的内容和材主要有五类：(1) 墓主经营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如播种、收获与弋射、桑园、采莲、井盐生产、市集交易、践碓舂米、酿造等。(2) 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尊贤养老、讲学授经等。(3) 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阙、宅院、粮仓、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4) 神话故事，如伏羲、女娲、西王母、仙人六博等。(5) 描绘社会习俗方面的内容，如社日期间树下成群男女相会、野合等的高禖图，反映了一种原始风俗的遗痕。各类画像砖在墓室中的排列顺序，一般近门处为门阙画像，向内依次为车骑出行、生产活动、墓主享乐生活方面的内容，西王母等仙人一类画像砖多嵌装在后室或侧室后壁较高的位置上①。

另外，其他地区也发现有画像砖，如陕西、江苏、江西、湖北、云南等地东汉时期一些砖室墓的小砖侧面，也往往有模印的简单图像，内容多为仙禽神兽、车骑、祥瑞图和荆轲刺秦王一类历史故事等。但这些画像砖，无论从形制、风格，都与四川地区的迥异。

5.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主要流行于东汉一代。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南阳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墓室多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用，绝大部分在石材上雕刻有各种画像题材，因此将带有这类题材的墓又称为“画像石墓”。墓葬的规模往往巨大，墓主人一般为贵族官僚。除主室之外，还有前室、左右侧室。顶部除平铺之外，有的则叠涩成覆斗状。墓门门额和门扉有的也用石材制成。随葬品与当地同时期墓葬相近。其中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全部用石材建成，规模大，构筑齐整，画像内容丰富，雕刻精致，是画像石墓的典型。有的石室墓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除石刻画像以外，还绘有彩色壁画。辽宁省辽阳市附近的汉末、魏晋石室墓，施彩色壁画而无雕刻。

画像的内容和题材丰富多样，可概括为八类：(1) 生产活动类，主要是表现墓主庄园和手工业作坊内生产劳动场面的耕作、放牧、射猎、纺织等。(2) 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类，主要有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等。(3) 墓主生活类，有燕居、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六博等。(4) 历史故事类，主要是宣扬忠孝节义，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和古代圣贤故事。(5) 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四神和象征神仙世界的奇禽异兽等。(6) 祥瑞类，多是从天人感应论引伸出来表示吉祥的事物，如蓂荚、神鼎等。(7) 天象类，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云气。(8) 图案花纹类，一部分为边饰花纹，主要有菱纹、穿环纹、垂幛纹、三角纹、流云纹、龙云纹等。另一部分作为建筑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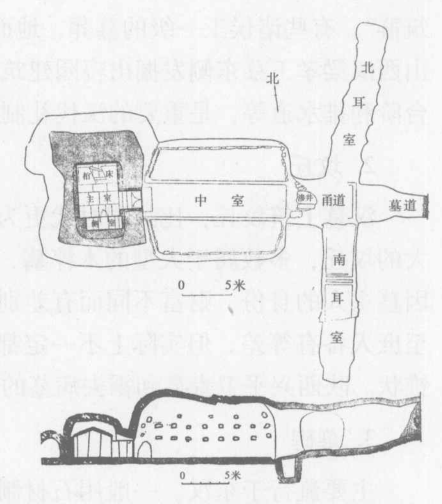
①俞伟超、信立祥：《汉代画像砖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饰而出现，如藻井中的莲花、门扉上的铺首衔环等。一般是前4类刻于墓室四壁，第5、6、7类刻于墓门、墓顶，第8类中的边饰花纹部分作为其他类的装饰而散见各处[①]。

画像雕刻技法主要有六种：（1）阴线刻，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如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墓的车骑出行画像。（2）凹面刻，把物像轮廓内剔成凹入的平面，再以阴线刻划细部。（3）减地平面阴刻，在平滑的石面上，将物像轮廓外减地，使物像呈平面凸起，细部再用阴线刻出或用朱线墨线勾绘。（4）浅浮雕，将物像轮廓外减地，使物像略呈弧状凸起，如山东安丘汉墓画像。（5）高浮雕，减地后物像弧面浮起较高，细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如山东安丘墓门额的卧鹿像。（6）透雕，把物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立体的圆雕。每种技法因时间、地域之别，又存在着一定差异。不同的技法是决定画像石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②]。

6. 崖墓

这类墓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横穴式墓室，形制、规模大小不一。墓道有的为狭长的横穴，有的则为小型的竖井。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均有发现。东汉时，四川境内特别流行，并延续到三国和六朝时期。诸侯王或列侯墓，如满城汉墓（图七）和曲阜九龙山汉墓，在山崖间穿凿巨大洞穴，全墓可分为前室和后室、耳室等部分。有些墓葬的结构非常复杂，如在河南永城保安山2号崖墓，由东西2个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34个侧室，以及回廊、隧道、灯龛和排水设施等组成。这是目前发现的西汉诸侯王墓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墓葬。其墓道、甬道、前庭及各侧室门道，均用巨型塞石封堵，总计6000块左右，每块重约1吨，上面多有刻字，包括塞石的尺度、干支记时、崖工姓名、宫室方位等[③]。四川境内的汉代崖墓，往往几十个墓聚在一起，形成一片很大的墓地。有的大墓在崖壁上雕刻画像，其题材与石室墓中的画像亦有相似之处。



图七　满城汉墓（刘胜墓）平、剖面图

①俞伟超、信立祥：《汉代画像石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太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②俞伟超、信立祥：《汉代画像石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③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二）地面设施

主要有墓园、坟丘、墓碑、祠堂、墓阙、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等[①]。除坟丘是继承战国时代的旧制而加以发展以外，其余都是汉代新兴的。一般情形是，墓域最前方是一对墓阙，由此往后，神道两侧置动物和人物的石雕像，然后是祠堂，其后是墓碑，最后是坟丘。有的大墓，以坟丘为中心，墓域周围筑垣墙。汉代墓域的这种设施，对后世有很长远的影响。

1. 墓园与寝园

汉代墓葬的地面建筑中有墓园的存在，目前发现的墓园还不多见，在汉魏洛阳城西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墓园遗址。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190、南北约135米，总面积约25650平方米。墓园四周有夯筑土墙，转角处增设附属建筑。墓园以内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墓主人的坟墓，东部则为大型殿基为主体的墓侧建筑群[②]。有些诸侯王一级的墓葬，地面还有寝园等礼制性建筑，如在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孝王墓东侧发掘出寝园建筑遗址，包括围墙、寝殿、堂、回廊、院落、石台阶和排水道等，是重要的汉代礼制建筑。

2. 坟丘

汉墓上筑坟丘，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除崖墓以外，各类墓上都有。现存较大的坟丘，多数属于大型的木椁墓、砖室墓或石室墓。坟丘都用夯土筑成，规格因墓主人的身份、财富不同而有差别。汉律规定，列侯坟丘高4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等差，但实际上不一定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一般的坟丘，呈截尖方锥状。陕西兴平卫青墓和霍去病墓的坟丘，分别像庐山和祁连山，则是例外。

3. 墓碑

主要流行于东汉。一般用石材制成。碑身呈长方形，上端顶部呈圆弧状或等腰尖角状的圭形，碑额穿一圆孔。碑文记述墓主人的家世、经历。多作颂扬之词，并记明其死亡日期。碑阴一般刻立碑的门生、故吏等的姓名，有时还刻其所资助的钱数等。汉代墓碑见于著录的甚多，有的墓碑保存至今。如天津武清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墓墓碑完好无损，并附有长方形覆斗状碑座。

4. 墓阙

墓域设门，门外立阙，开始于西汉。东汉时进一步流行，多用石料作成，往往雕刻各种画像，并勒题额，或标官职、姓名，或记营造年月。现存石阙如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阙、四川省新都县的王稚子阙和雅安县的高颐阙（图八），都属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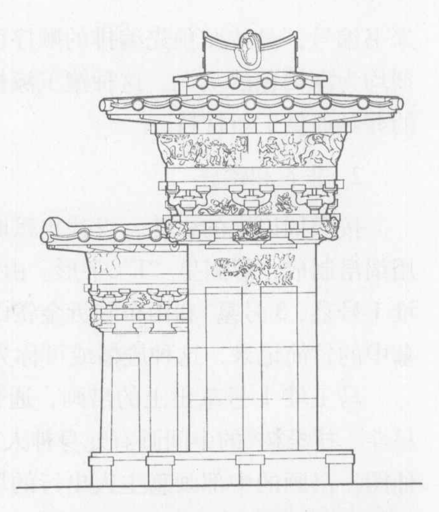
①王仲殊：《秦汉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汉时的墓阙。

5. 祠堂

又称祠室，或称宗舍，诸侯王的祠堂则称祠庙。墓前建祠堂始于西汉，东汉时进一步流行，供祭祀之用，其渊源或可上溯到商周时代的墓上建筑物。西汉中期的满城汉墓附近有祠堂遗迹，推测为木构建筑，屋顶铺瓦。东汉时期的祠堂多用石料建成，壁上往往雕刻各种画像，现存的实例有山东省长清县的孝堂山石祠和嘉祥县的武氏石祠。



图八　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立面图

6. 人物和动物石雕像

西汉时已出现，如霍去病墓前即有石人和石兽，但仅为特例，而且形象不够规格化。普遍流行并成为定制，则在东汉时期。人物雕像主要为亭长或门卒等，以示守卫墓域。动物雕像有狮、虎、马、羊等类，前两者多附双翼，或刻文字，标明为天禄、辟邪，含有镇墓之意。

（三）葬具和葬俗

与战国时代相比，汉代在葬具形制、尸体处理方式和合葬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

1. 棺椁

木椁墓中的棺椁，承袭周代“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礼制，按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其规格从一棺一椁到五棺二椁，有再重、三五七重的区别。中国古代棺、椁并称，两种同属葬具，但木椁墓中的木椁其实是墓室内的构造，故称椁室。在砖室墓和石室墓等横穴式墓中，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有时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内葬具则有棺无椁，而且除个别例外，棺也不再是双重或多重的了，因此，周代棺椁的旧制在横穴式墓中已不存在。西汉棺的制作是以榫卯拼接，有时用“细腰”合盖。东汉则普遍使用铁钉。贵族官僚的棺材，常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满城汉墓（窦绾墓）、江苏徐州楚王陵等墓葬中，出土了镶玉漆棺。其中满城汉墓所出者为最早发现。通过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镶玉漆棺进行复原，可知棺外壁则镶嵌玉璧 26 块，前后各嵌大型玉璧 1 块，左右侧壁及棺盖各嵌玉璧 8 块，皆作两行排列，每行 4 块，这些玉璧是在髹漆木棺上挖槽嵌入的。棺的内壁则嵌满玉版，玉版共计 192 片，绝大多数为长方形，部分玉版的背面残存

朱书编号，是按照预先编排的顺序而粘合于棺内周壁。镶嵌玉版和玉璧所用粘合剂均为深褐色的灰泥。这种镶玉漆棺未见于文献记载，它的出土为研究汉代贵族的葬具提供了新材料。

2. 非衣和铭旌

按照周以来的丧礼，汉代出殡时张举一种旌幡，入葬时覆盖在棺上。它们都用绢帛制成，形制呈“T”字形。由于其上绘有彩色图画，故称帛画。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3号墓[①]和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②]中都发现了这种旌幡。据马王堆1号墓中的竹简记录，这种旌幡或可称为“非衣”。

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帛画，通长20.5厘米。上部画天上的境界，在日、月、星斗、扶桑树[③]的中间画有蛇身神人，在弯月下画一女子腾空飞翔，当为墓主人升仙图。帛画的中部画墓主人出行的场面，画有一老妪身穿曲裙长袍拄杖而立，两侧侍立有男女五人跪迎、相随。帛画的下部画地下境界，有一巨人站立在两条大鱼上，双手托着象征大地的平板。巨人周围画灵龟、鸱号等神物。

马王堆3号墓的帛画长23.3厘米。上部也画天上的境界，在日、月、星斗、扶桑树的中间画有蛇身神人，在弯月下画一裸露上身飞翔的男子。出行场面表现的是一男子，头戴冠，身着红袍，腰间佩剑，袖手缓行，前后有九人作恭迎、随行状。帛画的下部画地下境界，有一巨人站立在两条大鱼上，双手托着象征大地的平板。巨人周围画灵龟、鸱号等神物。

类似的旌幡，在甘肃武威东汉墓中也有发现，往往没有图画，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籍贯、姓名，代替了非衣中的肖像，这便是“铭旌”。

还有一类帛画，主要描绘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其作用与壁画相似。例如，在马王堆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两幅帛画，分别贴于棺板两侧。右侧板上的帛画为长方形，长212、宽94厘米。画车马仪仗场面，现存百余人，数百匹马和数十乘车。左侧棺板上的帛画与右侧帛画相似，但破损严重。从两个残片来看，内容主要有房屋建筑、车骑、奔马以及妇女乘船的场面，比较形象地再现了墓主人生前优裕、豪华的生活。

3. 葬式

战国时期盛行的屈肢葬，到西汉前期即告绝迹。从西汉到东汉，仰身直肢的葬式成为定式。

---

①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②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

③扶桑：神话中的树木名。《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郭璞注：“扶桑，木名。”陆机《日出东南隅》：“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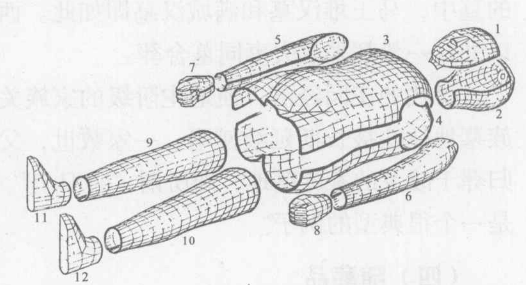
4. 葬玉

大概为了使尸体保持不朽，出于对玉的迷信，从西汉到东汉，葬玉开始普遍增多。主要流行四类葬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

（1）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玉柙，为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缕编成。始于西汉前期，其流行仅限于两汉，曹魏黄初三年（222），魏文帝曹丕吸取了汉代诸陵由于敛以“金缕玉衣”而被盗的教训，废除了玉衣之制。死后身穿玉衣入葬，目的在于使尸体不朽。从出土的实物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皇帝和王侯的玉衣都可以使用金缕，但也有使用银缕、铜缕者，玉衣的分级尚未形成严格的分级制度；但到了东汉时期，则按一定的等级执行，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葬以“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从而形成了金、银、铜缕玉衣三个明确的等级①。

玉衣的外观和人的形象一样，可以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裤筒、手套和鞋都是左右分开的。玉衣的各部分都由玉片组成，玉片之间以金丝、银丝、铜丝、丝线等加以编缀，故称“金（银、铜、丝）缕玉衣”。如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玉衣全长 1.88 米，由 2498 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 1100 克（图九）。窦绾的玉衣全长 1.72 米，由 2160 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 700 克。从刘胜玉衣的个别玉片背面残存的编号数字来看，玉衣的制作使用了人体模型，先在模型上划出纵横的行格，然后逐格编号，制作玉片，根据人体各部位的不同形态，设计出数以千计的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玉片。有些玉片的背面残存玉璧花纹，玉衣手套中所握的璜形玉器也是用玉璧改制而成的。



1. 脸盖　2. 头罩　3. 上衣前片　4. 上衣后片　5. 右袖筒　6. 左袖筒　7. 右手套　8. 左手套　9. 右裤筒　10. 左裤筒　11. 右鞋　12. 左鞋

图九　满城汉墓（刘胜墓）“玉衣”的结构

此外，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也出土了金缕玉衣，但盗掘者将金丝抽去，只留下一堆散乱的玉片②。徐州东汉彭城王刘恭出土了银缕玉衣，玉片 2600 多片，银丝重 800 克。山东曲阜九龙山 3 号汉墓，出土了 1 件“银缕玉衣”，从其中出土的“庆忌”字样的铜印推测，可能是死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的第三代鲁王刘庆

①卢兆荫：《试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1 年第 1 期；《再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9 年第 10 期。

②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8 期。

忌的墓葬。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丝缕玉衣，其结构和金缕玉衣基本一致，应该是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①]。

（2）九窍塞

九窍塞是用来填塞或遮盖死者死者的双目，充塞或遮盖死者的耳、鼻、口、肛门、生殖器等 9 个窍孔，目的是为了防止体内“精气”由九窍逸出。含在口中的玉称为琀，一般制作成蝉形。在汉代非常普遍，可能是由于蝉的生活史的循环可以象征变形和复活。

（3）握玉

在汉代，将死者手中所握的玉称为握玉，西汉初年主要为璜，东汉时期握玉演变成豚形。

5. 合葬与家族墓地

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采取异穴合葬的方式，即两人分别葬在并排相邻的墓中，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即如此。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为之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墓合葬。

汉代的庄园经济，使地主阶级的家族关系十分紧密。表现在丧葬制度上，家族墓地往往被长期延续使用，一家数世，父子兄弟并葬。死在异乡的人，也必须归葬于故乡的家族墓地，即所谓“归旧茔”。陕西华阴的弘农杨氏的家族墓地，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四）随葬品

汉代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就是把死人当作活人看待，即所谓的“谓死如生”、“事死如生”。所以，墓室形制和结构都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并尽量把活人所用的器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牲畜之类也制作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图一〇）。从目前所发现的汉墓来看，其随葬品要比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②]。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等许多西汉前期的墓中，与战国时期的墓一样，存放着用竹简编成的簿册，记录各种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遣策”。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江苏海州汉墓等西汉前期和中期的墓中则有长方形木版（木牍），书写着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可称“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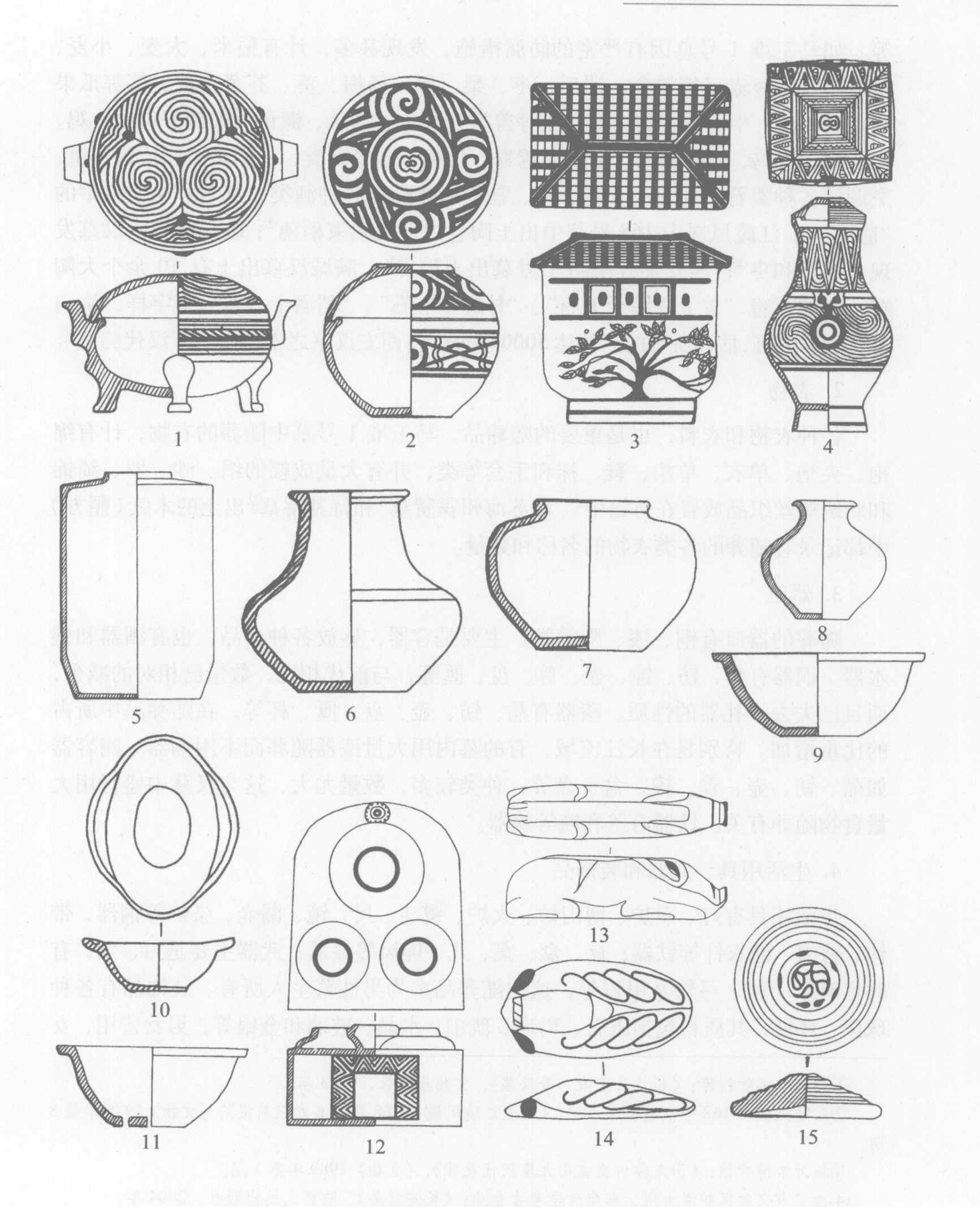
1. 食物

食物是汉墓的主要随葬品，但不易保存，所以发现数量相对较少。从其种类来看，主要有粮食类、瓜果蔬菜类、动物（禽、畜、鱼）的肉类以及饮料类的酒

---

①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西汉南越王“丝缕玉衣”的清理与复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②王仲殊：《秦汉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图一〇　西安西北医疗设备厂二号墓出土器物图

1. 鼎　2. 盒　3. 仓　4. 钫　5. 仓　6-8. 罐　9. 盆　10. 耳杯　11. 甑
12. 灶　13. 石豚　14. 玉蝉　15. 饼（未注质地者均为陶质）

等。如马王堆1号墓因有严密的防腐措施，发现甚多，计有稻米、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等粮食，甜瓜、枣、梨、梅、杨梅、葵、芥菜、藕、笋等瓜果和蔬菜，猪、牛、羊、狗、鹿、兔等兽类，鲤鱼、鲫鱼、鳜鱼、银鲴等鱼类，鸡、鸭、鹤、斑鸠、雁、喜鹊、麻雀、鸳鸯、竹鸡、雉等禽类，它们多被作成饭、饼，烹调成各种羹肴，加上糖、蜜、酱、盐等调味品和各种酒类，其名称见于墓中的"遣策"①；江陵凤凰山168号墓中出土陶仓内发现四束稻穗②；临沂金雀山汉墓发现了栗子和枣③；西安芙蓉南路1号墓出土稻谷④；满城汉墓出土有10余个大陶缸，有的写着"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字样，缸内都有酒的痕迹，估计所装的酒共达5000多公斤⑤；西安汉墓之中还出土了汉代美酒⑥。

2. 衣物

各种衣物和衣料，也是重要的随葬品。马王堆1号墓中随葬的衣物，计有绵袍、夹袍、单衣、单裙、鞋、袜和手套等类，并有大量成幅的绢、纱、罗、绮锦和刺绣等丝织品放置在竹笥中⑦。江苏海州霍贺墓⑧和侍其繇墓⑨出土的木牍（赗方）中都记录着随葬的各类衣物的名称和数量。

3. 器皿

随葬的器皿有铜、漆、陶等类。主要是容器，盛放各种食品，也有酒器和盛水器。铜器有鼎、钫、锺、壶、尊、盘、匜等，与前代相比，数量已相对的减少，而且已失去了礼器的性质。漆器有鼎、钫、壶、盘、匜、杯等，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增加。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的墓内用大量漆器随葬而不用铜器。陶容器如鼎、钫、壶、瓮、罐、盆、盘等，种类较多，数量尤大，这与汉墓中盛行用大量食物随葬有关。铁器有釜和甑等炊器。

4. 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

生活用具有灯、熏炉、博山炉、火炉、熨斗、尺、镜、漏壶、染炉等铜器，带钩、剪刀、缝衣针等铁器；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武器主要是刀、剑，有时也有矛、戟、弓弩及甲胄等，这类随葬品多为男性墓主人所有。装饰品有各种珠佩、环璧，其质料包括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玻璃和金银等，男女皆用，女

①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②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整理小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③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

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西安市文物局：《华夏文明故都丝绸之路起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

⑦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⑧南京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

⑨南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性尤多。

5. 书籍

汉墓中往往有书籍随葬，主要有帛书、简牍等。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随葬有《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帛书[①]；安徽阜阳汉墓中随葬有《诗经》、《苍颉篇》等竹简[②]；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随葬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等竹简[③]；武威汉墓中随葬有《仪礼》及有关医药的简牍[④]等。汉代用书籍随葬之风甚盛，只是大多数墓由于缺乏保存条件，未能遗留而已。

6. 钱币

汉代对货币的重视已日益加深，汉墓中用铜钱随葬也成为风气。有大量随葬品的官僚贵族的大墓中也仍然要添上一些铜钱，以作为财富象征。西汉虽然已盛行用铜钱随葬，但往往数量不多。东汉则逐渐增加。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后期墓为例，随葬铜钱竟达 2.8 万余枚。除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等铜钱以外，有的还用金饼随葬。在长沙一带还盛行用泥质冥币随葬。

7. 印章

印章一般刻印文，中国古代称为“坏”，后作“玺”，亦称为“图章”。西周至于春秋时期的古玺尚无可靠的例证发现，一般认为约起源于春秋末期。现在所言的古玺，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当时的官、私印均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称为玺，一般只称为印。其材质以铜质为多，亦用金、银、骨、玉石、木、琉璃及琥珀等材料制作。

与其他各代相比，汉代流行用印章随葬。有官印，也有私印，质料有铜、银、金、玉石、水晶等类，一般多为男性所用。如长沙马王堆 2 号汉墓出土的“长沙丞相”印文的铜印、“利仓”印文的玉印[⑤]；西安龙首原 170 号汉墓出土的“陈请士”印文的玉印及水晶印[⑥]；长沙杨家湾 401 号墓出土了“刘骄”印文的龟钮银印[⑦]。也有个别女性墓主人也拥有印章，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铸有“窦绾”、“窦君须”印文的铜印，即为一例。有些印章之上未刻文字，应当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玉印；西安龙首原 170 号汉墓出土 4 枚印章，其中 2 枚玉印章未刻文字[⑧]。诸如此类的发现还有很多。

---

①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年。

②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6 期。

③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④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⑤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7 期。

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⑧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8. 陶质明器

西汉前期，贵族官僚主要是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专为随葬而制作的陶质明器显著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陶仓和陶灶，到西汉中期大量流行。此后，诸如井、磨、杵臼、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特别是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就愈多。东汉墓中的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质容器、陶质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品如铜器和漆器则反而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这一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对随葬品的观念已经有了显著改变。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都制作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纳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显得更有意义。

9. 车马和船的模型

使用实用的车、马殉葬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山东曲阜鲁王墓和北京大葆台的燕王或广阳王墓[①]即是例证。但是，这些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而不像商周大墓那样在墓外另设车马坑。从目前的发掘结果来看，只有诸侯王一级的墓葬才以实用车马殉葬，诸侯王以下等级的墓葬未见。在汉武帝以前虽然有车马随葬，但不甚普遍。汉武帝至元帝时期则普遍盛行，晚期又趋于消亡。据统计，汉初至文景时期的 5 座诸侯王墓中，只有临淄齐王墓殉葬了 4 辆车马。汉武帝至元帝时期的 12 座诸侯王墓或王后墓，均殉葬有实用车马。而属于中晚期的 2 座诸侯王墓则未发现殉葬车马。从殉葬车马的数量来看，除文帝时期的临淄王墓殉 4 辆车马、武帝时期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分别殉 6 车和 4 车之外，其余的诸侯王墓均以 3 辆车马为主，特别是宣、元时期的诸侯王墓无一例外。据研究，这 3 辆车就是载衣冠至墓穴的魂车，葬柩之后，衣冠由柩车送至寝庙，而 3 辆魂车则葬入墓中[②]。

以木质车马模型随葬，在西汉初年已经出现。如湖北关沮西汉初年至文景时期的汉墓中出土一辆木质车马，包括车、马及御手[③]，但还不普遍。西汉后期以后，不再使用实用车、马殉葬，普遍流行木制或陶制车马模型。据文献记载，即使是帝陵也不例外。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地汉墓之中，还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

10. 俑

在汉代，人殉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特殊例子[④]之外，已经

①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②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 年第 2 期。

③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 年第 6 期。

④在洛阳东关东汉时期墓葬的墓道填土中发现了 10 个殉人个体，文见《文物》1973 年第 2 期《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

看不到人殉的情形。作为替身，木俑和陶俑被放置在等级较高的墓中，这些俑多为男女侍者，有时也有杂技和乐舞人等。咸阳杨家湾西汉前期的 4 号、5 号墓[①]，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周勃夫妇，墓南设有 10 个陪葬坑，其中埋有大量陶俑。有步兵俑 1800 多个，骑兵俑 580 个，士兵们手执武器，身披铠甲，行列整齐有序，应当是模拟军队的样子。

有的墓里还随葬有铜俑。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随葬一批铜质车马模型和兵士、奴婢的偶像，共计武士俑 17 件、奴婢俑 28 件，其中背上有“张氏奴”铭文的 8 件，有“张氏婢”铭文的 4 件；铜马 39 件，其中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铜马俑；铜车 14 辆，包括斧车 1 辆、小车 2 辆、大车 3 辆、牛车 1 辆、辇车 3 辆。此外，还有铜牛 1 件、铜灯 1 件等。这组铜俑应是身份为边郡大吏和将领的墓主人出行仪卫的模拟[②]。

11. 买地券

在东汉墓中，有时还随葬购买墓地的契约，一般放置在墓内，使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称为“买地券”。又称“墓别”、“地券”。东汉时期的地券一般模仿简策的形式，多刻于长条形铅版上，也有极少数刻于玉版或陶柱上。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是模仿日常生活中的地契制作而成。券上所刻文字，有时还强调要将墓地范围内所埋葬的其他死者都变成他的奴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土地兼并和广大农民因破产而沦为奴婢的实情。自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所用的材料也不同。

12. 镇墓瓶与镇墓文

东汉中期，特别是后期，还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书写镇墓文的“镇墓瓶”。但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镇墓文不仅见于镇墓瓶上，还书写于买地券上或其他器物之上。

从目前所见的镇墓文的内容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1）纪年日月。（2）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生者除殃，为死者解适。（3）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间官吏的管理。（4）说一些利生人或后世子孙的吉利话。（5）有的镇墓文还说东、西、南、北或青帝、白帝之类的话语。虽然镇墓文大体有一定格式，但书写者并不完全拘泥于这套格式，几乎每篇都不完全相同[③]。

陶瓶等上的朱书文字的作用在于使生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帝使者”之类的名义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有的镇墓瓶上还画有符箓，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就收藏有 1 件

---

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③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巫道关系》，《文物》1981 年第 3 期。

画有符箓的镇墓瓶[①]。东汉后期巫道流行，镇墓瓶及镇墓文的出现应与当时的巫术有关。很有意思的事，为了达到目的，有时还要辅之以贿赂或奉献。例如，"谨奉金银□以谢"；"谨奉黄金千斤两用镇冢门，地下死籍消除，无他央（殃）咎"。

为生者除殃，为死者解适。所谓解适、除适，就是解除罪谪之意。"适"是"谪"的假借；"解"即解除之意。常见的表达此类意思的镇墓文有："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生人除罪过。""故书丹书铁券，□及解适，千秋万岁，莫来相索。""立冢墓之□，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所以也有人把这类陶瓶称为"解适（谪）瓶"，把书写于其上的文字称为"解适（谪）文"[②]。如宝鸡市铲车厂汉墓出土了2件镇墓瓶，其上朱书文字为："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阿丘镇解诸适殃，葬犯墓神墓伯，行为不便，今日移别，殃害须除。死者阿丘等无责，妻子子孙姪弟，实皆困累大神，如律令。""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雎方镇解诸适殃，葬犯墓神墓伯，不为生人者，今日移别葬，家无殃，死者雎方等无责，子孙子□姪弟，困累大神，为生人后世子孙，如律令。"[③]

13. 殉牲

在西汉早期的一些墓葬之中还有殉牲现象，主要是狗、羊、马、牛、猪等。例如，西安西北医疗器械厂10座汉墓出土有殉葬的马、羊、狗的骨骼[④]。以动物殉葬主要见于战国以前，而且设置腰坑，将殉葬动物放置在腰坑中。但到了西汉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殉葬的动物主要放置在墓道、耳室和墓室之中，没有固定的位置。此外，有些等级高、规模大的墓葬不仅墓内有殉葬的动物，还有专门的陪葬坑，放置动物的骨骼。例如，咸阳杨家湾4号墓，不仅墓室之中有殉葬的羊骨骼，还有专门的陪葬坑放置马、牛、羊、猪等。

14. 石碑

在汉墓中，也有以石碑随葬的现象，实际上充当了墓志的角色，但比较罕见。如在河南偃师南蔡庄发现的东汉晚期肥致墓（169）南耳室之中出土石碑一通，碑身高98、宽48、厚9.5厘米。碑晕首，刻隶书6行28字。碑身有阴线刻的界格，每格一字，竖行19行，忙行29字，共计484字。下有一长74、宽44、厚12.3厘米的长方形方趺，座前部横排刻出3个圆盘，各盘内均刻一耳杯[⑤]。

参考文献：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百年学府聚珍——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
③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年第3期。
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与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参考资料》第6辑,1982年。
黄展岳:《西汉诸陵的勘查和陪葬墓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410~41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王仲殊:《秦汉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器物

一、秦汉时期的陶瓷器

秦汉时期的陶瓷器主要分为建筑用陶和日用陶瓷器两大类。

(一)建筑用陶

秦汉时期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在当时的制陶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其产品质量还是样式品种以及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进步和扩大。建筑用陶主要有砖瓦和排水管道。后者主要埋设于地下,都是一端大一端小的陶水管,可以鱼贯套合而成。

1. 砖瓦

秦代砖的种类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新因素,如五棱砖、曲尺形砖、楔形砖、子母砖(榫卯砖)等,这些砖形制特殊,有特殊的用途。五棱砖可能用于屋脊;曲尺形砖似乎用与屋角拐接之处;楔形砖和子母砖(榫卯砖)用于构筑墓室的拱券部分。秦代的砖,还有方形和长方形之分。如在秦都咸阳城所发现的方形铺地砖有素面和花纹砖两类,花纹有太阳纹、平行线纹、米格纹、小方格纹等。在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砖呈长方形,其上都饰有细绳纹。

汉代的砖在形制上与秦代的砖相似,也有长方形、方形等形制,质地以青灰色为主。方形砖多用来铺地面。在晚期还出现小型长方形砖,主要用于墙壁、墓葬等建筑。

瓦有板瓦和筒瓦之分,瓦的内面一般有麻布纹,实际上是制作过程中以麻布衬垫形成的印痕。外面则主要饰绳纹,绳纹有粗细之分。

2. 瓦当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秦汉瓦当纹饰多样,其图案或文字随时代而变化。特别是瓦当的文字,对当时的地名、宫殿、官署仓廪、

陵墓祠庙、苑囿等的考订，是很重要的依据。因此，秦汉瓦当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北宋中期初见著录，清乾隆初年已有专著问世；1949 年以后，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瓦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秦汉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秦汉瓦当绝大多数为圆瓦当。但在秦和西汉前期仍有半瓦当；西汉中期以后，半瓦当显著减少，东汉时近于绝迹。瓦当的制作方法不一，从只有当心而无边轮的“与天无极”圆瓦当陶范看，可能是先模制当心，后加边轮而构成完整的瓦当；“千秋万岁”范则为带有边轮的完整瓦当形式，说明当坯是一次成型的。早期半瓦当为素面或饰绳纹，至战国时期，各国的半瓦当图案各具特色，其中云纹一类，为秦统一后所沿用。秦汉时期的瓦当纹饰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图案和文字（包括图案和文字结合的）两大类。

（1）瓦当图案

有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人物纹等（图一一）。

动物纹瓦当有麟、凤、龟、兔、蟾蜍、鹤、马、鹿等，而以西汉晚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造型最为完美（主要用于礼制建筑）。在所有的瓦当图案中，动物纹所占比例不大。动物纹在秦早期流行单一的动物纹样，如始皇陵所出的奔鹿、立鸟等。秦代瓦当图案还有一种变形动物纹，如具有卷云纹意匠的“四兽”瓦当之类。秦始皇陵及辽宁省绥中县秦行宫遗址出土的巨型“半瓦当”，其表面所饰夔纹应当是模仿铜器、玉器的手法，也是一种变形的动物题材。汉代瓦当的动物纹除了四神之外，其他动物纹较少见。

植物纹主要为树木、树叶、葵花纹、嘉禾等。以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莲花”纹最为典型，其他多为变形或零星花瓣、茎、叶与云纹、葵纹相组合。

几何纹主要以各种云纹图案为主，也有网格纹、三角纹等。云纹瓦当始见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汉。秦和西汉初的云纹瓦当变化多端，计有对称外卷、对称内卷、S 型反卷及左旋或右旋排列的单卷云纹；瓦当中心或呈泡状或作各式图案，如方格、菱形格、井字曲尺以及葵变涡纹、叶瓣之类。秦代还有整体作左旋或右旋的“葵纹”图案。至西汉中期，带中心圆泡的四象限的云纹构图成为通用的模式。

人物纹比较罕见，有狩猎人物纹、人面纹、蹴鞠纹等。

秦汉瓦当的图案构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面不分区，用单一的动物或其他图案填满整个当面；一种是当面分区，图案结构基本上是在边轮的范围之内，用弦纹把瓦当分为内外两圈，再用直线把内外圆间的面积等分为四个扇面，填以各种云纹样式，内圈则饰方格纹、网纹、点纹、四叶纹和树叶纹。

（2）瓦当文字

文字也是秦汉瓦当的重要装饰。发现的文字瓦当属于秦代的数量较少，而以


夔纹半瓦当


变形夔纹瓦当


凤纹瓦当


龟纹瓦当


蟾兔纹瓦当


葵纹瓦当


莲瓣纹瓦当


青龙纹瓦当


白虎纹瓦当


朱雀纹瓦当


玄武纹瓦当


维天降灵瓦当


鼎湖延寿瓦当


亿年无疆瓦当


延年益寿瓦当


长乐未央瓦当


羽阳千岁瓦当


长生无极瓦当


常生无极瓦当


鹿甲天下瓦当


延年瓦当

图一一 秦汉瓦当

汉代最多。文字少则一字，多至十余字不等，而以四字最为常见；有单纯的文字及文字与图案相结合两种类型。文字多为篆书，隶书较少，也有鸟虫书。其内容可分三大类：

建筑题名。这类瓦当主要为宫殿、官署、陵寝、仓、关、祠堂等建筑所用。如秦的"羽阳千岁（秋）"（羽阳宫，陕西宝鸡东关），西汉的"长陵西神"、"长陵西当"（长陵宫殿所用）、"宗正宫当"（宗正寺所用）、"鼎湖延寿"（鼎湖宫所用，陕西蓝田焦岱镇）、"京师仓当"（京师仓所用，陕西华阴）、"黄山"（黄山宫所用，陕西兴平）、"成山"（成山宫所用，陕西眉县）、"上林"（上林苑所用）、"甘林"（甘泉宫所用，陕西淳化）等。

记事志念。如西汉初的"汉并天下"、"汉廉（兼）天下"、"维汉三年大并天下"，在北方边塞地区所见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以及东汉西海郡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等。还有一种文字瓦当长达十二字："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吉祥语。这类文字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以四字最为流行，也有一部分为五、七、八、九字，极少数为两字或三字。如"延年"、"甲天下"、"千秋万岁"、"与天无极"、"与天毋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常生无极""延年益寿"、"亿年无疆"、"富贵宜昌"、"富贵无央"、"延寿长相思"、"千秋万岁余未央"、"千秋万岁与地无极"、"延寿万岁常与天久长"等。

（二）秦汉陶瓷器

1. 秦汉陶器

（1）秦代陶器

以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的红陶和黑陶。由于秦代时间短暂，许多地方的产品与汉代陶器不容易区分，而关中秦故地的陶器特征明显。

从出土物来看，主要有茧形壶、盆、釜、盂、豆、罐、瓮、仓等。一般用泥条盘筑，轮制而成，造型圆正规整。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有茧形壶，也被称为"鸭蛋形壶"，腹部向两侧横延，成形难度较大；窖底盆，出土于秦都咸阳，口径 100、底径 50、高 60 厘米，口和底均作椭圆形，口沿外卷，腹部略向外凸，厚实坚硬，出土时节节相套，可能为贮藏粮食之用；陶仓，明器，秦始皇陵出土的器身较矮，上面模拟两面坡式或圆形斜坡式屋顶，仓身正面开扁方形门洞或窗户。秦代陶器的另外一个惊人的成就是陶俑的塑造和烧成。

（2）汉代陶器

汉代用泥土作坯胎、经入窑烧制的器物。主要是各种饮食器、储藏器等容器，也包括其他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因年代和地区的差异，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纹饰及烧成温度等都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为灰陶、硬陶、

釉陶三大类。

A. 灰陶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已经普及到全国各地。汉代灰陶容器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在制作技术上已经达到更高水平。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质地坚实。凡属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的旋纹，以及一些局部的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基本上是素面的。

西汉前期，少数容器如瓮、罐之类，偶尔还带有一些不甚明显的绳纹；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则基本上绝迹。有些灰陶器绘有彩色花纹，称“彩绘陶”，其花纹是陶器烧成后才绘描上去的，易于脱落。这种“彩绘陶”只发现于墓葬中，不见于居住址，可见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有些灰陶器表面涂漆，是模仿当时的漆器。战国时期流行的陶豆在西汉前期还偶有所见，但不久即消失。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陶钫，盛行于西汉，东汉时已不见。战国末年出现的造型奇特的“茧形壶”，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此外极为少见。陶鼎、陶锺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流行时期甚长。其他如瓮、罐、盆、尊、盘、碗等，在整个汉代都大量存在，它们的形态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演变。西汉前期少数带有绳纹的瓮、罐尚为圜底，从西汉中期以后，除了三足器和圈足器以外，几乎所有器物都为平底。还有一些日常用具如案、灯、熏炉以及扑满之类，既非饮食器，亦非一般的贮藏器，为前代所少见或未见。

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汉代还盛行制作各种明器，种类甚多，数量很大，主要也属灰陶系统。最初出现的是仓和灶，在秦代和西汉前期的墓中即有所见，但普遍流行则在西汉中期以后。其他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农田和陂塘等模型，以及猪、羊、马、狗、鸡、鸭等动物偶像，自西汉中期以后，相继出现，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均增多。在汉代，还有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用于随葬。

B. 硬陶

流行于长江以南，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江苏南部等地区，用当地一种密度较大、含铁量高、粘性较强的粘土制成，温度高的烧成后胎质呈紫褐色。与灰陶相比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故称硬陶。汉代硬陶继承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一般圆形容器主要采用轮制，器物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有波状纹、锯齿形纹等。器物的种类，多为瓮、罐、壶、盒、碗等容器。有些器物，如匏（葫芦之类，也称为瓠）形壶、三足罐（盒）、四联罐或五联罐等，在形态上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C. 釉陶

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的出现，是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这种釉色的烧成温度约为 800℃左右，胎质呈砖红色。由于釉药中含有多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又由于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开始出现

于西汉中期，先在陕西中部和河南流行，西汉后期迅速普及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东汉时期，在长江流域也有所发现。

棕黄色釉陶出现较早，绿色釉陶出现较晚，但到东汉时后者大量流行，较前者更为普遍。器物种类有鼎、钟等仿铜器，也有仓、灶、井、楼阁等模型以及鸡、狗等动物模型。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变质，只见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铅釉陶器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汉通西域以后，受到西亚方面釉陶的影响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西亚的釉陶与汉代铅釉陶同属低温烧成，但釉的成分不同，两者未必有关。南方各地的硬陶有时有一层薄釉，或黄或绿，颜色都很浅，烧成温度甚高，是属于商周以来传统的青釉。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期，有一种附有双耳的陶瓶，胎壁呈紫褐色，甚坚硬，颈部和肩部施较厚的绿色釉，也属青釉系统。

陶器作为最普遍的生活用品，制作比较容易，所以多为私营的小规模作坊所制造。但汉代各地官营的手工业作坊也制造陶器，而且陶器上往往印有戳记，如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印有“河亭”“河市”字样，河南陕县汉墓中出土的陶器印有“陕亭”、“陕市”等字样。根据汉河南县城遗址的发掘，可以判断印有“河亭”字样的年代较早，属于西汉前期；印“河市”字样的年代较晚，属于西汉后期。戳印“亭”和“市”的意义相同，都是指汉代各城市中由官府管理的手工业和商业区。

2. 秦汉青瓷

一般将东汉时期作为中国瓷器发明的开始，而将此前的瓷器一律称为原始瓷器。原始瓷器是处于原始阶段的瓷器，因其皆是青瓷，故一般也称原始青瓷。用高岭土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1200℃高温烧成。胎体烧结后呈灰白色或褐色，击之可发出清脆之声。早期瓷釉是用石灰石粉碎后加适量的粘土配制而成的，又称石灰水釉。以钙的氧化物为主要助熔剂，三氧化二铁为主要着色剂，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绿色或灰青色。青釉透明，表面有玻璃质层。胎与釉结合紧密，不吸水或吸水率低。早在3000年前的商代已经出现原始青瓷，最初发现于郑州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址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墓中，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处也都有出土。西周时原始青瓷制作工艺有所提高，出土范围更广。江南地区原始青瓷出土量及器形比北方黄河流域多且丰富。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生产得到较大发展，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生产范围，都是前代所不及的。从器物出土情况和窑址调查看，原始青瓷的生产地以长江以南为主，其中浙江的江山、绍兴和萧山地区比较集中。由于原始青瓷胎中杂质较多，故烧结后胎中气孔偏大。又由于釉料配制简单，掌握烧造技术有一定难度，因此釉色不稳定。这些缺欠决定了它的原始性。到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发展为成熟的瓷器。原始瓷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不甚规整，胎薄厚不均匀。战国时期虽然采用轮制成型，但拍印纹饰后器物内壁凹凸不平，釉厚处呈青绿色，薄处呈灰青

色。初期的主要器形有豆、碗、尊、盉、罐、盆、瓮、壶、簋、器盖等饮食器。北方从商至春秋，原始青瓷种类变化不大。江南地区在商代晚期器形、种类明显增多，出现双耳簋、盂、浅盘、深圆腹圈足尊、盉等，战国时出现鼎、锺、盉、錞于等仿青铜礼器。特别是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大量青瓷器证明了南方青瓷器的发达。江西清江吴城还出土瓷双孔刀及纺轮。器物多以素面为主，兼有水波纹、附加堆纹、叶脉纹、网纹、方格纹、篮纹、S 纹、乳钉纹、圆圈纹等。

（1）秦代原始瓷器

1977 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与灰陶扁平盖同出土的几件原始青瓷盖罐。在灰陶扁平盖的顶面分别刻有阴文小篆“左”、“丽山童人官”和“右”、“丽山口口口食官”等字样，从而判断与其共存的原始青瓷盖罐当是秦代原始青瓷。青釉盖罐的盖作扁圆形，上有半环形纽，盖下有子口与器身密合。胎质细密坚硬，烧成温度较高，但铁含量较重，呈深灰色。盖面和器身外表均满施青褐色釉，釉层不够均匀，有聚釉现象。盖罐的轮廓线柔和，盖与器身的比例协调，体型的大小适度，是一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储盛器。

（2）西汉原始瓷器

汉代是瓷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但在西汉初期，由于经过楚汉战争和与匈奴的长期战争，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包括瓷器生产在内的手工业发展缓慢。西汉初期，青瓷日用器皿不多，主要是仿青铜礼器，如壶、瓿、罐、鼎、盒、锺、敦等。西汉中期，仿青铜礼器的青瓷器日渐减少，实用器增多。西汉晚期的青瓷器以壶、瓿、罐、钫、尊、洗、盆、勺为主，已经不见仿青铜礼器。西汉青瓷原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比例提高，这就需要在较高温度中烧成，然而当时的窑炉尚未改进，从而导致汉初青瓷比不上战国青瓷，有的坯体没有烧结，处在釉陶水平上。胎釉含铁量高，瓷器颜色呈酱黄、酱褐和黑褐色，黑褐色瓷器到东汉时期发展成为黑瓷。西汉瓷器成型用陶车手工拉坯，器身和器底分别制作，然后粘接而成。釉层普遍加厚，由于含铁量增高，釉色大多呈褐绿色或酱褐色，器物内壁旋一层薄釉，外壁只在口沿及肩上部施釉，腹中部和下部露胎。瓷器装饰主要在肩部刻划的两条阴弦纹构成的装饰区间内刻划水波纹、云气纹、卷草纹、人字纹等。有的粘贴细细的泥条，压成凸弦纹，或在流动的云气之间刻划神兽、飞鸟，动感强烈，很有气势。

（3）东汉瓷器

东汉时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都符合瓷器的标准。器形主要是四系罐，特征为大口、扁圆腹、平底。同样的四系罐在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的曹氏墓中也有大量发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说明当时青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瓷的出现是中

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西汉常见的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物，到了东汉逐渐消失，日用器物类，诸如罐、壶、瓶、碗、盆、盘、洗增多。新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形如五联罐，主体是一个侈口直颈罐，颈部较长，在肩部四周粘接 4 个同样的小罐。再如人形灯，灯碗成浅盘形，灯座塑成一巨人形象，人的眼、鼻都刻划出来。口部刻成方形孔，胸前抱一硕大老鼠，人的肩、手和腿下均攀爬许多老鼠。背面釉下刻“吉祥”二字。

东汉的瓷器装饰，主要是一些工艺简单的刻划水波纹、弦纹，香熏上镂刻三角纹，壶类器物的肩部粘贴铺首。五联罐上有的贴塑猴子和爬虫等。

东汉青瓷与春秋、战国、秦、西汉原始青瓷相比，质量有很大提高。浙江出土的标本胎体透光性增强，已完全烧结，显气孔率和吸水率降低，分别为 0.62%和 0.28%，烧成温度已达到 1260℃~1310℃，抗弯强度达每平方厘米 710 千克。通体施玻璃质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增强，胎釉结合紧密牢固，胎釉交界处可看到相当多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成并形成一个密合层，使釉层不易剥落。

但东汉青瓷毕竟还比较粗糙。首先，泥料的选择、坯泥的捏炼也都欠精致，在显微镜下能看到层状长方形小孔，气泡明显，还残存少量的云母残骸和杂质。湖南地区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些青瓷，浅灰胎，釉层薄而均匀，釉色很淡，说明青釉如果减少含铁量，以弱还原焰焙烧，其釉色可以很浅淡，如果以氧化焰焙烧，即有烧出白瓷的可能性。

其次，从装饰花纹来看，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也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却是划时代的一步。

东汉时期，在烧造青瓷的同时，也烧造黑釉瓷。如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名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汉墓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亳县的建宁三年（170）等纪年墓中出土的黑釉瓷，证明其烧造时间应在东汉中晚期。

3. 窑和作坊

烧制灰陶的窑，一般构筑在地面上，为就地挖坑筑成。窑室一般为长方形或扇面形，由工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窑床、烟囱等部分构成。规模不大，多以木材等为燃料。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以煤炭作为燃料的烧制技术。长方形陶窑以河北省武安县午汲古城遗址发现的为例，窑室在平地上开挖，窑室较宽、较高，

火道不长。扇面形的陶窑以河南巩义白河村三号窑炉为例。该窑为汉代，除窑室顶部坍塌外，其余部分保存较好。长3.7、宽2.3米。由工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烟囱、出料口组成。工作坑呈长方形，长2、宽1.5、深1米。工作坑和火膛内尚有灰烬堆积。火膛后端宽1.6、火膛底距窑床面0.95米。窑室平面形状大致呈扇面形，直径1. 95、窑室残高1.5米。烟囱位于窑室的最后面，有烟道和窑室相通，烟囱平面大致呈圆形。出料口窑室东南部，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1.2、宽0.7、深0.8米，底部高出窑床面0.6米。窑内出土物不多，多为泥质灰陶片，器形有板瓦、筒瓦、罐、豆、瓮及盆等①。

烧制硬陶和青瓷的窑，以浙江省上虞等地发现的为例，窑筑在山脚的坡面上，窑身细长，前低后高，有一定的倾斜度。后者有利于通风，使烧制的温度能提得更高。

二、汉代铁器

汉代铁器包括各种农具、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各地汉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按制造方法不同，可分为锻件和铸件两大类，分别以块炼铁和生铁作材料。由于冶炼技术进步，许多锻件和铸件已达到钢的标准。汉代铁器的制造和使用量很大，已普及全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铁器关系到国计民生、军备国防，制铁业成为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西汉初期，各地制铁业多被控制在诸侯王和富商手中。汉武帝时在各地置铁官，垄断全国的制铁业，并实行专卖政策。东汉前期，承袭西汉制度，冶铁业仍由国家专营。但豪强地主势力强大，私设工场，自造铁器，官府不能禁止。章和二年（88）和帝即位，宣布盐铁开禁。此后各地冶铁业多为豪强地主私营。

1. 铁器的种类和效用

铁农具有犁、镢、锸、铲、锄、耙、镰等。犁上的铧，一般是全铁制，比战国时的铁口木铧要进步得多。为了防止铧的口刃磨损，多采用在前端套铧冠的方法。为了提高翻土的效率，还在铧上装置犁镜。犁、镢、锸、铲等和前代相比，也有一定改进。双齿或三齿的铁耙，用于耙地松土，为前代所未见。铁镰有各种形式，用于刈割禾穗和禾茎。由于铁农具的广泛应用，汉代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

铁工具有斧、锛、锤、凿、刀、锯、锥、钉等。铁斧的普遍使用，有利于森林的砍伐，使长江流域和边远地区的开发加速。又由于使用了各种铁工具，木工和石工的效率大大提高。汉代造船业突飞猛进，应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有关。用于谷物加工的转盘式双扇石磨的出现和迅速普及，石室墓、石祠堂、石阙以及各种石雕像、石刻画像的流行，都是与铁工具的进步分不开的。

在兵器方面，铁器的优越性更为突出。铁制的长剑在西汉前期就取代了战国

①国家文物局：《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以来较短的青铜剑。柄首呈环状的大铁刀，在西汉时出现，是一种新兴的武器。商周以来长期流行的铜戈也在西汉中后期被铁制的矛和戟所代替。西汉时的矢镞虽然有不少是铜质的，但铤部多已改为铁制，而铁镞也开始流行。到东汉时，终于代替了铜镞。由于铁制技术的发展，铠甲的质量和性能有显著的提高。满城汉墓出土的1件铠甲，是由2800多片细小的铁片编成的鱼鳞甲，制作精致、完善。在防守上也大量使用铁蒺藜。由于汉王朝掌握了各种先进的铁兵器，所以能对付北方民族强大的骑兵。景帝时，晁错分析汉朝与匈奴作战的军事形势，就指出优越的武器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

铁制生活用具有鼎、炉、釜等容器和炊器，还有带钩、镊子、火钳、剪刀、厨刀以及钓鱼钩和缝衣针等等。铁釜的广泛使用，为炊事提供了方便，在河南省南阳瓦房庄发现的一件大铁锅，直径约2米左右，可能是煮盐用的。厨刀从各种别的刀类中分化出来，专门按庖厨的需要而制造。汉代的剪刀，和世界各地初期的剪刀一样，是用一根两端具有锋刃的铁条弯曲而成，利用钢铁的弹性而操作。铁制的缝衣针，不仅用于缝制衣物，而且在刺绣方面显示了优越性。度量用的尺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其刻度和花纹有的用金丝镶嵌。汉代盛行铜灯，但东汉时铁灯也很流行，洛阳等地汉墓中出土的"十二枝灯"等制作得相当精致。到了东汉中后期，镜子也有许多是铁制的，花纹多属"夔凤纹"。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一枚铁镜，用金丝和银丝镶嵌花纹，十分精致。

2. 铁官和作坊

传世的"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和"临淄铁丞"等封泥[①]，是西汉初期诸侯王自设铁官、经营冶铁业的物证。从汉武帝时开始，中央政府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其分布东起山东、江苏，西到甘肃，东北到辽宁，西南到四川、云南之间。各地铁官所制的铁器，有时有铭文作标志。例如，河南郡所制的有"河一"、"河二"、"河三"字样，南阳郡所制的有"阳一"、"阳二"、"阳三"字样，河东郡所制的有"东一"、"东二"、"东三"字样，"河"、"阳"、"东"等都是郡名的简称，"一"、"二"、"三"等则是各郡铁官所属作坊和工场编号。

1949年以来，经过广泛地调查，在北京市清河镇、山东省腾县、江苏省徐州市等许多地点发现了制铁工场的遗址。特别是河南省发现的制铁工场和作坊已达十余处，其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温县招贤庄、郑州古荥镇等遗址都经过大规模发掘，为了解当时的冶炼设施、操作过程和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巩县

①封泥：也称为泥封、艺泥。春秋末期出现了印玺，封泥也随之而产生。中国古代的书写工具主要为简牍，在封缄公私信函时，在简牍之外再加以检（即刻有横向小木槽的木片），然后用绳索将检捆缚起来，在槽内捺上湿泥将绳结盖住，再用印章在泥上打出印文。若一份文书的简很多，可把简放在绢囊之内，口上用绳扎住而加检封缄。封发物件，也采用此法。这种钤印有印章的土块称为"封泥"。主要流行于秦、汉、魏、晋时期，唐代以后消失。

铁生沟遗址位于矿山附近，所发现的炼炉很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都较少，可以认为这个制铁作坊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南阳瓦房庄遗址在当时南阳郡治所宛县城内，远离矿区，这里的作坊主要是利用从别处运来的生铁锭和废旧的铁器作原料，进行熔炼，以制造各种器物。由此可见，汉代的冶铁工场，有时因各种条件不同，在业务上各有侧重。山东省腾县宏道院出土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形象地显示了东汉时冶铁工场中用皮囊为炼炉鼓发风及其他操作的情形。

3. 冶炼技术水平

汉代铁器中用块炼铁作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经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的“百炼钢”。满城汉墓出土的佩剑还经过表面渗碳和刃部淬火，使剑刃坚硬、锋利，而脊部仍保持较好的韧性。另一方面，汉代铁器中用生铁作材料的铸件，除了有许多是经过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以外，到西汉中期还有了不少“灰口铁”[①]的铸件，后者更具有硬度较低、脆性较小、耐磨、滑润性能良好等特点。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镢是“展性铸铁”的制品，而车轴则为“灰口铁”铸件，说明当时已掌握了不同种类铸铁的性能而加以应用。西汉中期，还发明了利用热处理使铸铁在固体状态下脱碳成钢的技术，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镞便采用了这种工艺制成。到了西汉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用生铁炒炼成钢的新方法，主要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状态，加以不断地搅拌，利用空气中的氧使之脱碳，以获得不同含碳量的钢，可称“炒钢”。山东省苍山汉墓出土有错金铭文“永初六年（112）五月丙午造卅湅（炼）大刀吉羊宜子孙”的大刀[②]。徐州东汉墓也发现过类似的“东汉建初二年五十炼”钢剑[③]。这些实物都是用炒钢为材料，经过反复加热锻打而制成的优质钢件，所谓“三十炼”“五十炼”等只是表明反复锻打的次数，带有宣传产品的意思。用生产效率很高的生铁大量地作为制钢材料，这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冶炼技术的提高，还表现在燃料的使用上。从对巩县铁生沟遗址的发掘来看，当时使用的燃料主要有木柴、原煤、煤饼等三种。煤饼用煤末羼和粘土、石英制成。根据不同的原材料，使用不同的燃料，一般原煤和煤饼被用于冶炼。原煤和煤饼的使用，是当时冶炼技术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现在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用煤遗存。

三、汉代铜器

汉代铜器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调器、用具、兵器、度量衡

---

①灰口铁：含有石墨的铸铁，其中的碳分主要呈石墨形式。因为断口呈深灰色而得名。这种铸铁有优良的铸造、切削、耐磨、润滑、消振等性能。

②刘心健等：《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文物》1974 年第 12 期。

③徐州博物馆：《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炼钢剑》，《文物》1979 年第 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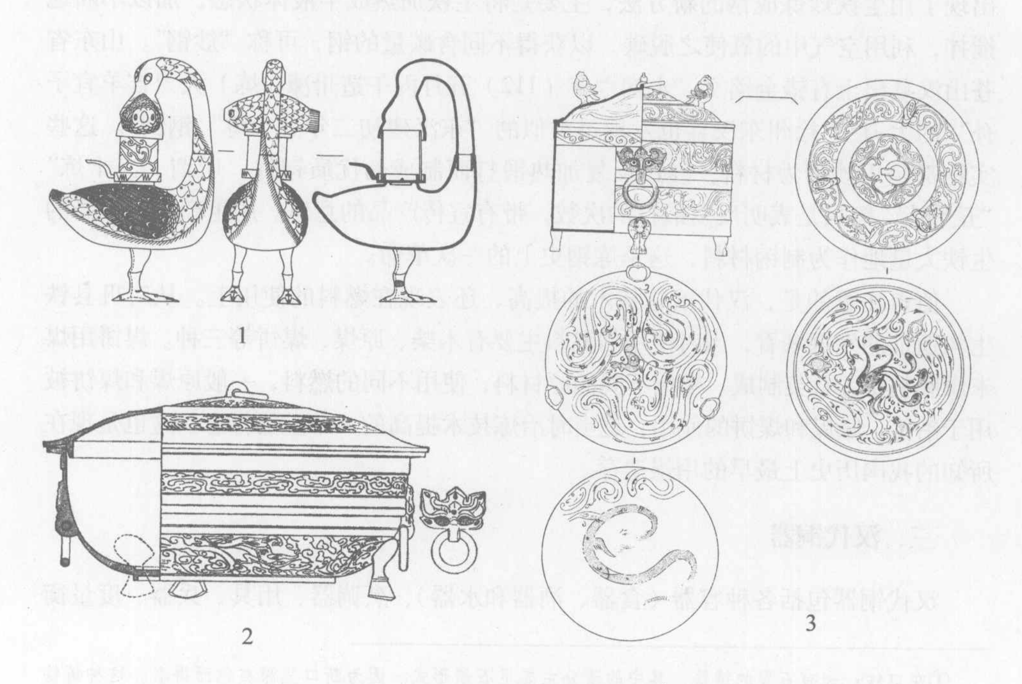
器、乐器、铜镜等等。与商周时代相比，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匈奴、东胡、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铜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风格，与一般的汉代铜器不同。传世的铜器，在宋代至于 20 世纪前期的许多金石学书籍中，就有著录。1949 年以后，在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又有大量新发现，为研究汉代铜器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资料。

1. 种类和形制

（1）汉代铜制的容器在种类和器形上与前代相比有许多变化。例如，周代流行的簠、敦、簋等食器已经绝迹，豆在西汉时尚偶有所见。鼎、锺、壶、钫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它们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而其中的钫只流行于西汉。其他盘、杯、尊（图一二，2、3）、卮、鉴、銗、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有汉代的特点。

（2）烹饪器如釜、鍪等，有的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有的为汉代所新创。还有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而出现的铜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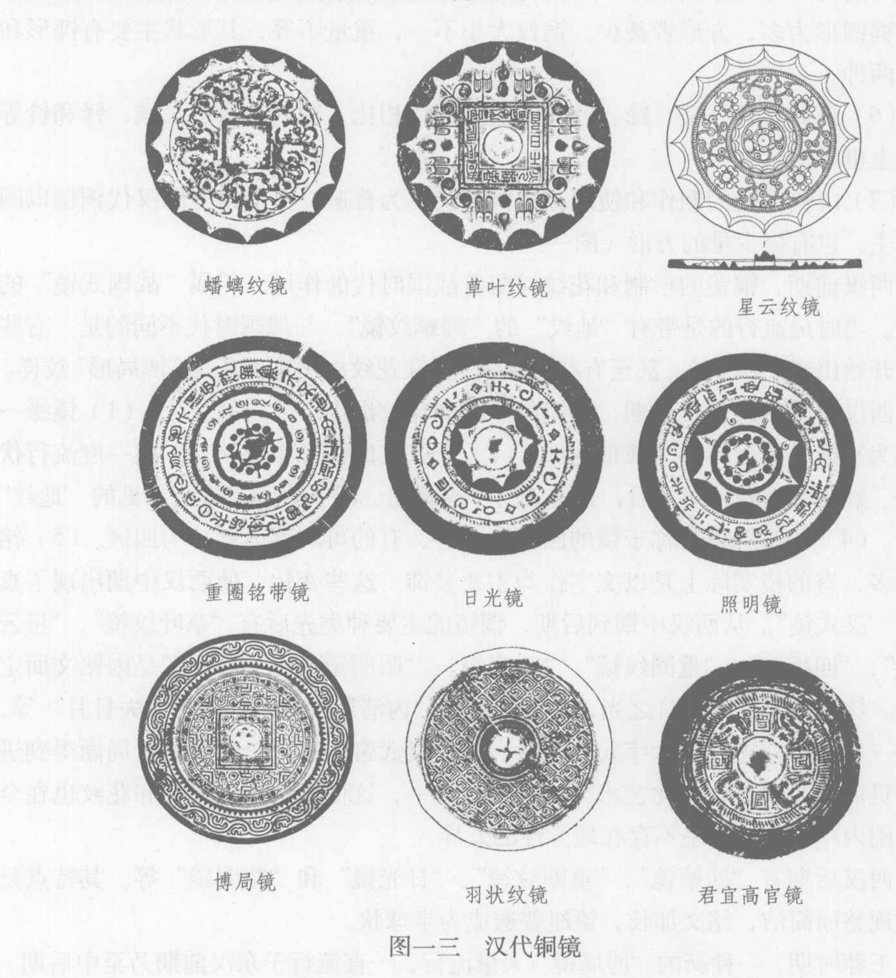
（3）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灯和熏炉。铜灯样式甚多，有"高灯"、"行灯"、"雁足灯"、"鹿卢灯"等类。特别是一些模拟人或动物形状的铜灯，制作精美，造型生动。



图一二　汉代铜器

1. 山西朔县西汉晚期墓雁鱼灯　2. 雷台汉墓铜尊　3. 西安芙蓉南路 1 号汉墓铜尊

例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户灯”①；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凤鸟灯”②；山西朔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雁鱼灯（图一二，1）③；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二枝灯”④；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牛形错金铜灯⑤等。熏炉亦有各种样式，博山炉是主要的一种，为汉代所新创。汉代的熏炉造型精美，制作精良。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竹节铜熏炉⑥等。其他铜制的用具，如案和熨斗之类，使用甚普遍。文具有铜书刀，偶尔也有铜砚盒。记时用的铜漏壶也有发现。



图一三　汉代铜镜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③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④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⑤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⑥咸阳地区文管会等：《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4）到西汉，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铜戈也在西汉中后期为铁矛和铁戟所取代。汉代铜制兵器主要是弩机和矢镞，弩机始创于战国时期，汉代在设计上颇有改进。矢镞主要流行于西汉，其铤部多改为铁质，到东汉则为铁镞所取代。

（5）度量衡器有尺、量和权。铜尺的长度一般都为当时的一尺。甘肃省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合当时的 4 尺。江苏省仪征还出土了东汉的圭表尺[①]。铜量分斛、斗、升、合、龠五种，而新莽嘉量则集五者于一体。河南省陕县出土的新莽铜撮，容积为龠的 1/5。有的铜量，特别是小型量，有的容积也不合整数。量的主体以圆形和椭圆形为多，方形者甚少。铜权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

（6）乐器有钟、钲、铎、铃等。但和前代相比，钟的制造量大减，铎和铃等的出土也不多。

（7）汉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目前出土的汉代铜镜以圆形为主，也有极少量的方形（图一三）。

西汉前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保留着战国时代的作风，仍属“战国式镜”的范畴。当时最流行的是带有“地纹”的“蟠螭纹镜”。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有些镜上开始出现一些铭文。甚至有些蟠螭纹镜，在花纹中出现了所谓“博局形”纹样。

西汉中叶的汉武帝时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1）镜缘一般都为平缘，断面不再呈弧形内凹。（2）三弦纹的桥形小纽消失，在一度流行伏兽纽、蛙纽和连峰状纽之后，普遍流行半球状纽。（3）战国式镜上常见的“地纹”消失。（4）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的中心，有的可均称地划分为四区。（5）铭文增多，有的镜实际上是以文字作为主要装饰。这些变化，使西汉中期出现了真正的“汉式镜”。从西汉中期到后期，铜镜的主要种类先后有“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昭明镜”等，后两者是因铭文而定名的。铭文内容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等，多为三字句、四字句或六字句。当时，随着汉武帝以来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更趋统一，这使得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化，几乎不存在地方性的差异。

西汉后期有“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等。其特点是花纹规整而简洁，铭文加长，镜纽普遍成为半球状。

王莽时期，一种新的“博局镜”大量流行，一直流行于东汉前期乃至中后期。其花纹除镜纽外的“博局纹”外，有时还有青龙、白虎等“四神”的图像和子、丑、寅、卯等“十二时”的文字。这是阴阳五行思想在铜镜上的反映。从这一时

①南京博物院：《东汉铜圭表》，《考古》1977 年第 6 期。关于这件器物，有人认为是天文测量仪器，有人认为是道家的计时工具。参见车一雄等：《仪征东汉墓出土铜圭表的初步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李强：《仪征汉墓出土铜圭表属于道家用器》，《文物》1991 年第 1 期。

期开始，铜镜铭文中也开始出现纪年。

东汉中后期，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双头龙凤纹镜”等，都是以图案化的动物为花纹装饰。长江流域还出现神兽镜和画像镜，前者以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类为主纹，后者除神像和兽形以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等图像。

东汉铜镜的铭文，有长短两类。长铭如“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多为七字句。短铭如“君宜高官”、“长宜子孙”、“位至三公”等，仅 4 个字。有纪年铭的铜镜也逐渐增多。铭文中往往言及制镜者，如“尚方作竟（镜）”、“王氏作竟（镜）”、“青盖作竟（镜）”等。“尚方作竟”说明系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镜，但私营的作坊也多滥用“尚方镜”的铭文。从铭文可知，洛阳、丹阳、广汉、会稽、吴郡等地是当时铜镜的铸造中心。

汉代铜镜的花纹，纹样的设计多对称于镜面的圆心，可称“心对称”。到了东汉后期，有些铜镜如有“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头龙凤纹镜”和“重列式神兽镜”，其花纹则对称于镜面的直径，可称“轴对称”。

2. 造型、纹饰与装饰工艺

汉代铜器的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比较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此相对应，纹饰相当简素，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往往素面无纹。但另一方面，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则相当发达。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糟钟”、“错金银鸟篆纹壶”、“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徐州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砚盒和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建武二十一年（45）铭鎏金铜酒尊等，代表了这种工艺的最高水平。此外，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多有用细线镂刻花纹的，纹样有各种鸟兽及几何图案等，非常细致、流畅。

从已知的汉代铜器来看，其装饰工艺主要有鎏金、错金银、錾刻等技法。

3. 工官、作坊和铜矿

在当时的都城长安、洛阳负责制造御用和官用铜器的工官，是少府的属官尚方令丞和考工令丞，后者东汉时属太仆。根据铜器的铭文，尚方分左、中、右三部分。中上方所制器物有鼎、锺、壶、鐎斗、灯等，种类最多。弩机则为中、左、右三尚方所共制。考工所制铜器有鼎、锺、钫、灯、弩机等，与中尚方相似。但铜镜都为尚方所制，不属考工的制品。度量衡器的制作，多由大司农主管。汉王朝政府在丹阳郡和河东郡设铜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出售。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除以制作漆器而闻名以外，也制作铜器。前述有建武二十一年纪年铭的铜酒尊为蜀郡工官所造，其铭文说明制作铜器的工匠按职务不同可分为“铜涂工”、“雕工”、“湅（炼）工”和“造工”等。

私营的铜器作坊也很多，其产品有时在铭文中标明价格。满城汉墓出土的一

件铜钫和一件铜鋗分别在铭文中记明购自洛阳和河东，后者买价为 840 钱。

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并参照铜器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①的堂狼②和犍为属国（东汉时期分犍为郡南境置犍为属国都尉）的朱提（今云南昭通）、越巂郡③的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和青蛉（今云南大姚县）等处。在河北省兴隆县的寿王坟和山西省运城县的洞沟分别勘察到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铜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铜锭。

四、秦汉时期的漆器

（一）秦代漆器

所谓漆器就是髹漆的器物。秦代漆器主要以生活用具类为主，有奁、盒、尊、盂、壶、扁壶、耳杯、盘、匜、梳篦等。从出土地域来看，主要出土于湖北地区，漆器的总体特征比较多地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特征。从已经发现的秦代漆器的胎质来看，有木胎（厚木胎、薄木胎）、竹胎、夹纻胎等。木胎漆器中厚木胎器物较少，薄木胎器物较多。竹胎漆器主要有竹筒、竹篇、兵器的柄部。夹纻胎漆器的数量也不多。

木胎的制作一般采用斫制、挖制，并且出现了薄木胎卷制技术。例如，扁壶和圆壶一类容器两半分别挖制，然后再粘合在一起。长方盒一类容器则主要是先斫制，然后再粘合。有些圆筒形器如尊、卮、奁等，器壁用薄木卷制而成，然后再分别与厚木胎的器盖、底粘合。

夹纻胎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器型，作为内模，然后用多层麻布或者缯帛附于内模上，逐层涂漆，干实以后，去掉内模，便剩下麻布或缯帛的夹纻胎，这便是所谓的脱胎法。以之制作的漆胎，称为夹纻胎。

秦代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几何纹、云纹、花卉纹、鸟兽纹等，也有人物故事图案。几何纹主要有圆圈纹、菱形纹、点纹、方格纹、三角纹、波折纹等。在各类纹样之中，一般采用复合纹样进行装饰，鸟兽纹作为主体，几何纹作为辅助和衬托，使得整个漆器的图案显得和谐优美。采用的颜色主要红、黑、褐、金、银等五种，其中红、黑二色使用最多，一般在黑漆上用红、褐漆绘花纹，也有在红漆器上用黑漆绘花纹的。还出现了银箔装饰工艺、金粉或银粉填涂花纹的工艺技术。

秦代漆器上往往烙印有“某市”、“某亭”等文字。例如，云梦睡虎地秦墓出

①犍为郡，西汉建元六年（前 135）置，置所先后多次变化。辖境相当于近四川简阳河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贵州绥阳以西，岷江下游、大渡河下游、金沙江下游以东，云南会泽、贵州水城、金沙以北地区。

②堂狼，犍为郡境内的山名，在今云南省鲁甸县。

③越巂郡，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置，置所在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于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

土的漆器上有“咸市”、“咸亭”、“许市”、“市”、“亭”等烙印文字140余处，它们都是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区中进行管理的官署。有的漆器上还针刻有“女里张”、“安里□□”、“钱里□”、“宦里□”、“小女子”、“小男子”、“大女子”等[①]。某“里”应是漆器作坊所在地的小地名，其后面的文字应是制造漆器的工匠名，说明秦代漆器的制造存在“物勒工名”的制度。有的烙印文字则是表示制造漆器的工序和工艺技术，如“素”、“上”、“包”、“告（造）”等。

（二）汉代漆器

汉代漆器的种类和品目甚多，饮食器皿有鼎、壶、钫、尊、盂、杯、盘等，化妆用具有奁、盒等，家具有几、案、屏风等，但以饮食器皿为主（图一四）。在各地汉墓中漆器多有出土，一般已腐朽，也有保存较好的。如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和云梦大坟头等地汉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大、种类多、保存极好，完美如新，是研究汉代漆器的重要资料。贵州省的清镇、甘肃省的武威以及朝鲜的平壤、蒙古的诺彦乌拉等地墓中出土的汉代漆器有详细的铭文，对研究当时的工官制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代漆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是珍贵的器物。所以，《盐铁论·散不足》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玉锺”、“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有些漆器上刻有“大官”、“汤官”等字样，是主管皇家膳食的官署所藏之器；书写“上林”字样的，则是上林苑宫官所用之物。据新莽时期的漆盘铭文，当时长乐宫中所用漆器，往往在器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如“长沙王后家般（盘）”、“轪侯家”、“王氏牢”等作为标记，以示珍重。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有轻巧美观等优越性，故为汉代统治阶级所爱好，制作极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容器。

1. 胎质及制法

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也有少数为竹胎。木胎的制法有轮旋、割削和剜凿、卷制等几种，不同器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2. 花纹和装饰

漆器上施花纹，有下列几种方法：

（1）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料，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大多数漆器的花纹都用此法绘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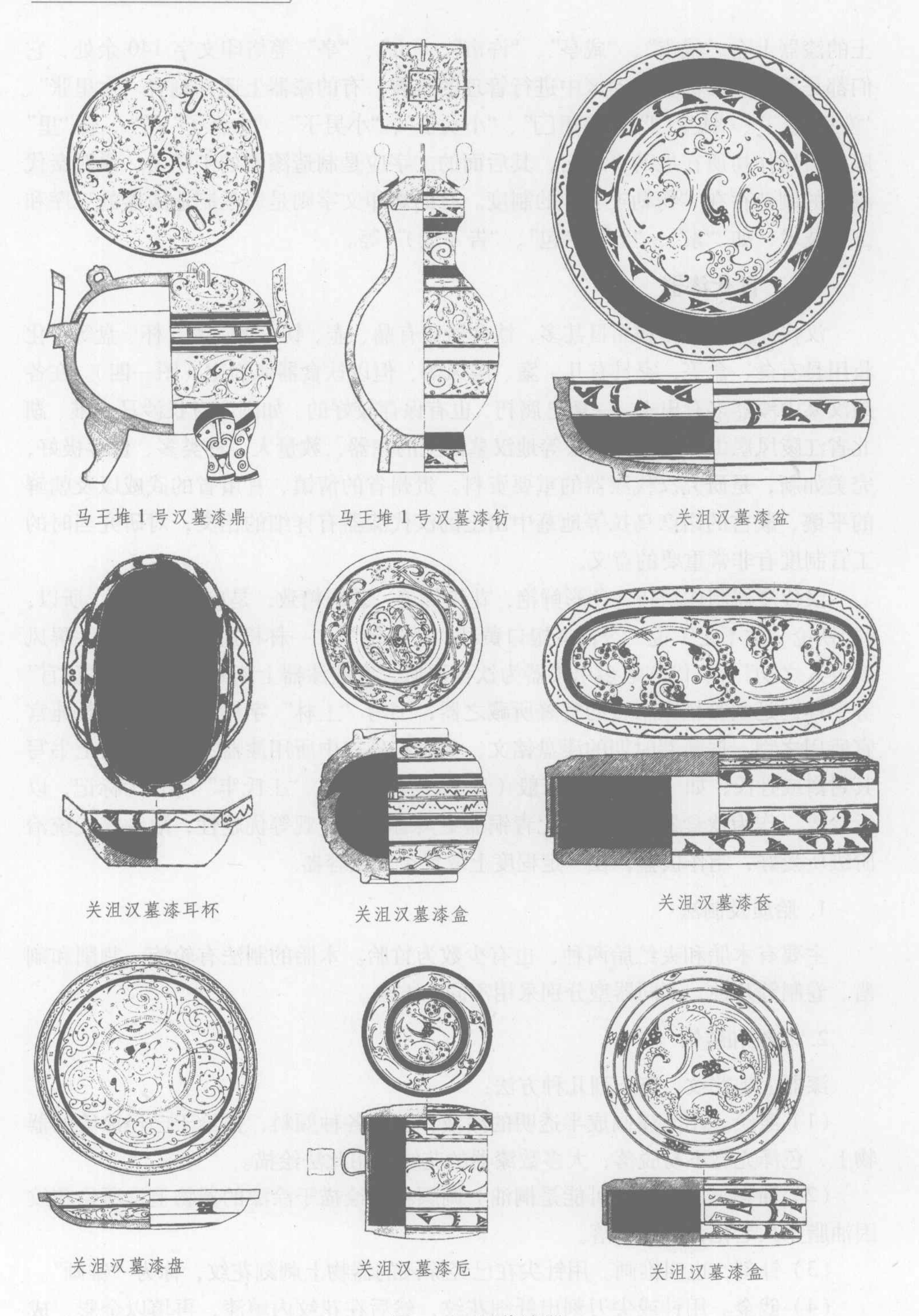
（2）油彩。用油汁（可能是桐油）调颜料，绘描于涂漆的器物上，所绘花纹因油脂年久老化，易于脱落。

（3）针刻，也叫锥画。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

（4）戗金。用针或尖刀刻出纤细花纹，然后在花纹内填漆，再填以金彩，成

---

①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马王堆1号汉墓漆鼎
马王堆1号汉墓漆钫
关沮汉墓漆盆
关沮汉墓漆耳杯
关沮汉墓漆盒
关沮汉墓漆奁
关沮汉墓漆盘
关沮汉墓漆卮
关沮汉墓漆盒

图一四 汉代漆器

为金色花纹，其效果类似于铜器上的金银错花纹效果。

（5）金银箔贴。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呈现出类似“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畅，最常见的有图案化的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和各种几何形纹，也有近于写实的兽形、鸟形和鱼形等图纹。西汉前期的漆器花纹富丽而繁复；东汉的漆器，花纹比较简素。金银箔贴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少数漆器的花纹是神仙、孝子及其他以人物为主的故事画。金银箔贴的花纹则有飞禽、走兽、车马、人物及各种几何图案，等等。

（6）堆漆。在漆器表面用漆堆起凸起的装饰，然后再在上面描绘纹饰，类似浮雕的效果。

西汉中期以后，流行在盘、尊、盒、奁等器物的口沿镶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杯的双耳上镶镀金的铜壳，这便是所谓的“银口黄耳”或“釦器”。有些漆器如尊、奁和盒的盖上常附有镀金的铜饰，有时还镶嵌水晶或玻璃珠。

3. 作坊和工官

汉代许多地方都出产漆器。西汉前期，制造漆器的手工业作坊，多为地方官营，设在郡国的治所。广东省广州西村、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湖南省长沙马王堆和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等地西汉前期的墓中出土的漆器，分别有“蕃禺”、“布山”、“莒市”、“成市”的烙印，同时又多有“市府”烙印，说明他们分别是在南海郡的蕃禺（今广东省广州）、郁林郡的布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城阳国的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和蜀郡的成市（今四川成都）制造的，而主管部门则为各个城市中管理工商业的官署——“市府”。四川的漆器制造业最盛，成都的产品大量运销到长沙和江陵等地。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中出土的漆器有“女（汝）阴”烙印，并在铭文中记明负责制造的官吏和工匠的名字，说明诸侯王和列侯也自设手工业作坊，制造各种器物，其中包括漆器。

大约在景帝到武帝的前期，汉朝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工官，其中蜀郡（治所在成都）和广汉郡（治所在梓潼）的工官大量制造漆器。主要供宫廷使用，所以器物铭文中多有“乘舆”字样。当时朝廷也用以赏赐边郡的官吏和少数民族的首领，所以，蜀郡和广汉郡工官所制造的漆器，也大量的在贵州省的清镇、蒙古的诺彦乌拉等地被发现。这些漆器的年代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 85），最晚为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4. 工匠和工官的组织体制

据铭文，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中制造漆器的工匠，按工种不同，分为“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或“铜扣黄涂工”、“画工”、“䵼工”、“清工”、“造工”。素工是制木胎的。髹工是漆工。上工有时作“桼工”，可见也是漆工，髹工是初步涂漆，上工则是进一步涂漆。铜耳黄涂工和铜釦黄涂工是在漆杯所镶铜耳和漆盘、漆壶等所镶铜箍上镀金的。画工是在器物上画花纹的。“䵼工”的性质曾

有许多争论，但以雕工的可能性为大，其任务不仅雕刻铭文或花纹，主要是在漆器上精心刮磨，使其产生光泽。清工是将制成的漆器加以修整、洗净，实际上是检修工。“造工”是工场主任。在同一工场中，髹工人数最多，上工、黄涂工、画工次之，洀工又次之，清工和造工人数最少，各仅一人。在年代较早的昭帝始元二年的漆器铭文中，工人只有髹工、画工和洀工，只是在成帝以后的漆器铭文中才增加了上工、黄涂工和清工。这说明到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同一个工匠有时兼任两种以上的不同任务。

工官中的官吏，有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长主要是行政负责官员，丞是他的副职，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相当于县令和县丞。掾是长丞之下的办事官吏。令史是掌管文书的官吏。护工卒史为中央政府的少府所特派，在工官中居监视、督察的职位，职位不高，但权力很大。在昭帝始元二年（前85）的漆器铭文中，护工卒史之名在长、丞之后，在成帝阳朔二年（前23）的漆器铭文中，才开始将护工卒史之名列在首位，以后遂成功定制。这说明，从成帝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的控制权。设在首都长安的工官也有制造漆器的，其产品在甘肃武威和朝鲜的平壤被发现，工官名称为“考工”、“右工”和“供工”。“考工”和“右工”都是少府属下的工官；“供工”可能即为“考工”，也可能是另一工官，但亦属少府管辖。这些设在长安的工官，既制造铜器也制造漆器。所制漆器的铭文表明，作坊中的工人也有“画工”、“洀工”和“涂工”的分工。官员有“令”、“右丞”、“掾”、“令史”、“啬夫”等。“令”是主要负责官员也即首官，“左丞”和“右丞”都是其副职，后者主管漆器制造。从考古发现的情形来看，长安工官的产品在数量上可能不如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多。

5. 汉代漆器的分期

汉代漆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西汉前期、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西汉前期是指汉武帝以前的时期，漆器庄重实用，以木胎居多，夹纻胎数量有限，一般只见于诸侯王和列侯墓中。釦器不多见，金银箔贴花漆器更少见到。这种情况可能受到当时工艺条件的限制，或者与文帝禁止使用金银铜锡等随葬有关。西汉后期是指汉武帝以后的时期，漆器器型与前期区别不大，但夹纻胎和釦器的比例明显大增，金银平脱漆器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漆器的主要特点。纹饰也较前期复杂，出土数量以江淮地区最多，而且保存完好。东汉漆器发现数量较少，但在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之中出土了一些漆器附件，其中釦器的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发现的漆器不多，可能与当时盛行的砖室墓环境使漆器不易保存有关，更可能与当时青瓷器的崛起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习惯有关。

五、简牍、帛书

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与纸，是当时重要的书写工具，也是秦汉考古研究的

一类重要内容。特别是简牍，发现数量不仅巨大，而且内容丰富，简牍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它一般用竹、木制成，流行时间大约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 5 世纪~公元 3 世纪）。纸张普遍使用之后，简牍才逐渐被废除。目前发现最早的简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晚的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出土的晋简。简牍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的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策等。

（一）简牍的基本概念

简在书写以前，必须经过修治。木简一般要将写字的部分打磨光滑；竹简则需要经过火烤，将其烘干，使之易于书写，并起到防腐防虫的作用，这一过程称之为“杀青”。

1. 种类与形制

根据已经发现的简牍形制，可以分为五种[①]。

（1）简：是简牍的最基本形式，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一般长约 23 厘米，相当于汉尺的一尺。也有一些简因不同的需要而长度有所变化。一般每简抄写一行字，宽度约在 0.5~1 厘米左右。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 2 厘米左右，每简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它和普通简一样，也可编联成册。

（2）牍：是一种比“两行”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至 6 厘米，实际上已成版状，所以《说文》解释为“书版”。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质。牍多用来写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敦煌、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中发现的木牍多是记随葬品的“赗方”即“遣策”。

（3）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有的则直接用树枝刮削而成。断面一般多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分 3 面或 4 面书写，也有多至 7 面的。长度都在 30 厘米以上，有的长达 82 厘米。在居延、敦煌发现的觚多用于抄写檄书、小学字书（如《急就篇》、《苍颉篇》等），或作临时记事起草之用，有时也用于练习写字。

（4）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用“两行”式的宽简题署收信者的名称和传递方式，如“肩水候以邮行”。另一种是传递机密书信和财物时所用的加封泥盖印章的封检。机密书信用上下两片木牍做成，下牍称函，用以书信，上牍称检，封盖函牍，检上有捆绳的刻沟和置封泥的方孔，以便绳封盖印。传送财物时施于囊袋上的封检，只有一片木牍，中间凹下，以便绳封盖印。

（5）楬：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有的首端作半圆形，中间有一小孔，有的首端两侧各刻一凹口，皆作系绳之用。多系于薄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犹如标签，所以也被称为“签”。

---

①徐苹芳：《简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除以上五种形式的简牍之外，在居延和敦煌的烽燧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从旧简上削下来的带字的薄片，称为“削衣”或“柹”。

2. 简牍的材料

简牍的材料多为就地取材。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和河南信阳楚墓、湖北云梦秦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都是竹简。居延、敦煌的烽燧遗址中出土的都是木简。通过对 1944 年敦煌出土的木简进行鉴定，得知其树种有青杆①、白毛杨、水柳和柽柳，都是杨柳科和松柏科的木材，其中的削衣多为杆儿松之类，以其不产于本地，取材困难，故将废简削去一层，重新书写。居延汉简的材料与敦煌汉简的大致相同，还有一种非常坚硬的类似枣木的材料。居延、敦煌的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很少数的竹简，有的是书信，有的用来抄写《苍颉篇》和医方，大概是从中原带过去的。

3. 简册的修治编联

简册的编联有一定的方式。抄写书籍，多先用丝绳（这种丝绳称为纶）将简编联成册，然后书写。编册以前，为防止丝绳松动，多在简两侧编绳处刻三角形契口。根据简的长度决定编绳的道数，一般 23 厘米左右即汉一尺的简，多编两道，长简有编五道的，如《武威仪礼》简丙本就是编五道。现存最完整的简册原物是居延简中的“永元器物簿”，两道编绳犹在。很多文书档案简册，由于是先书写，然后才编联成册的，所以在简上没有刻契口，也没有留下编绳处的空隙。简册的复原在简牍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考古发掘中应认真分辨简的出土状态和次序，然后结合简册的书写格式和内容，进行复原，将零碎片段的单简上的文辞，恢复成较完整簿册式的文件或书籍，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史料。

（二）简牍与帛书的发现与研究

1. 秦代简牍

在墓葬中出土了数批秦代简牍，是研究秦代各类制度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对于经过焚书坑儒的秦代而言，秦代简牍的发现，尤其难能可贵。

（1）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 年 12 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战国末期到秦代的墓葬。其中的 11 号墓出土竹简 1155 枚及残片 88 枚，4 号秦墓出土 2 件写有家书的木牍②。

11 号墓是一座小型木椁墓，入葬时间在秦始皇三十年左右。竹简原藏棺内，保存较好。简长 23~27.8、宽 0.3~0.7 厘米。从出土时残存的编绳痕迹推断，原简

①青杆，也称为白杄，松科，常绿乔木，高可达 50 米。产于我国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甘肃、四川等地高山。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写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

由三道编绳编联，书体为秦隶，所用书写工具为毛笔。其内容分为 10 种：《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

《编年纪》由发现于墓主头下的 53 枚竹简编联而成，逐年记录了从秦昭王元年（前 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秦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及其他重大事件。同时，还记载了一个名叫“喜”的人（墓主人）的生平及其家族的情况，类似于后世的年谱。《编年纪》的内容不但可以与《史记》等书进行对勘，并且可以弥补传世古籍的缺遗。

《语书》共有 14 枚竹简，出土于墓主腹下部，右手之下。篇名写在最后一枚竹简的背面。此篇是秦王政二十年（前 227）四月初二，南郡郡守腾颁布的一道要求人们守法去恶的文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形势。

法律文书是睡虎地秦简的主要内容。《秦律十八种》共计竹简 201 枚，原置于墓主躯体右侧。包括《田律》、《厩苑律》、《金布律》、《仓律》、《工律》、《关市》、《军爵律》、《置吏律》、《傅食律》、《内史律》、《工人程》、《司空》、《均工》、《徭律》、《行书》、《效》、《属邦》、《尉杂》等 18 种。内容涉及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官吏任免、官吏职务、军爵赏赐、徭役征发、工程兴建、刑徒监管、货币流通、市场交易等诸多方面，是研究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重要资料。

《效律》竹简见于墓主人腹下，共计 60 枚。第一枚简背面写有“效”字标题。是一篇首尾完整的法律文书，内容详细规定了核验县和都官物资账目的一系列制度，特别划定了度量衡误差的限度。

《秦律杂抄》竹简见于墓主人腹下，共计 42 枚。各条简文有的有律名，有的没有律名，内容相当繁杂，可能是根据实际需要所概括的一些秦律条文。不少律文涉及军事，是研究秦朝兵制的重要材料。

《法律答问》位于墓主人的颈部右侧，共计 201 枚。内容以 187 条问答的形式解释了秦律的某些条文、术语及律文意图，为研究秦朝诉讼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

《封诊式》竹简位于墓主人头部右侧，共计 98 枚。简文分为 25 节，每节第一枚简简首写有小标题，总标题注于最后一枚简背面。《治狱》、《讯狱》两节为开篇之文，阐述了对官员审理案件的总要求，其他各节记录了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书程序和各类案例，以供官吏学习、参考。其中的案例展示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

《为吏之道》由 51 枚竹简组成，放于墓主腹下。此篇简文分上下五栏抄写，记录了官吏的日常用语，多以四字为句，很可能是学习做吏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在第五栏末尾处，还抄列了两条颁布于公元前 252 年的魏国法律。

《日书》甲种竹简堆放于墓主头骨右侧，共计 166 枚。原简册正、反两面均抄录了文字，字迹小而密。

《日书》乙种竹简出土墓主人足下，共计257枚（不包括残简）。简文写于篾黄面，字体较大。篇题“日书”二字，标于最后一枚简背面。《日书》甲种的字数远远多于乙种，内容也更加丰富。《日书》是一种选择时日吉凶的书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

（2）青川郝家坪秦简

1979年2月~1980年7月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72座墓葬，其中的第50号墓出土了2件战国晚期的木牍[①]。其中1件残损严重，字迹无法辨认。另一块长46、宽3.5、厚0.5厘米，两面共抄录了121字。正面为秦王颁布的《更修田律》，是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3）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6~9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460枚秦简[②]。简册原有三道编绳。简文以古隶体书写于篾黄面，多有小篆之意。各章之间以圆点或竖道划分。简文均无标题，根据内容与竹简形制可以分为三组。

《日书》甲种竹简，共计73枚。内容分为《月建》、《建除》、《亡盗》等八章。

《日书》乙种竹简，共计379枚。内容分为《门忌》、《五行书》、《昼夜长短表》等二十余章。其中有7章与《日书》甲种内容相同，但禁忌条目更多，并有专用之名。

《墓主记》竹简，共计8枚。记述了一个名“丹”的人死而复生的过程及其过去的经历和不死的原因。

这批竹简的内容，可能是当时日者、占人所用的巫书。但其语义内涵则少言鬼神，更重人事，反映了典型的秦文化面貌。

（4）云梦龙岗秦简

1989年10~12月，湖北省云梦县龙岗发掘了9座秦墓，其中6号墓出土木牍1方，竹简约150多枚[③]。6号墓是一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入葬年代约在秦代末年。随葬器物主要有陶瓮、陶釜、漆奁、漆耳杯、漆扁壶、竹笥、竹筒、六博棋等。竹简位于棺内足端，保存较差。简文为墨书秦隶，记录了秦统一后颁布的法律，原简无律名，整理者将之归为五类，并分别命名为：《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其他》等。木牍出自墓主腰部，是迄今所见秦律判词的唯一例证。

（5）江陵杨家山秦简

1990年12月，湖北省江陵市杨家山135号秦墓出土了75枚竹简。该墓没有

①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③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纪年材料出土，发掘者推断为公元前 278 年至西汉建立以前的秦墓。竹简原位于边箱靠头箱一端的椁底板上，内容为遣策，详细记录了随葬品[①]。

（6）江陵王家台秦简

1993 年 3 月，湖北省江陵王家台发掘秦汉墓葬 16 座，其中 15 号墓出土了大量秦简。15 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仅有单棺，下葬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278 年，下限不晚于秦代。竹简出土于棺内足端，共有 813 枚，但保存较差。简册原有三道编纶，简文为墨书隶体，主要内容为《效律》、《日书》和《归藏简》。其中，《效律》内容与睡虎地《效律》相同，但顺序有异。《日书》与睡虎地秦简有同有异。《归藏简》均以易卦开头，继之以卦名和解说之辞，另有一类简，每简均有“邦有……”开头，记录了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及其所兆示的邦国灾难。在棺内头部，还有竹牍一块[②]。

（7）沙市周家台秦简

1993 年 6 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周家台 30 号秦墓出土了竹简 387 枚，木牍 1 件，字体均为隶书。据清理，竹简可以分为三组：甲组有 242 枚，内容为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戎磨日占、五行占、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及三十七年（前 210）的历谱。乙组 75 枚，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的历谱。丙组简共 70 枚，有日书、医药病方、择吉避凶占卜、农事等内容。其中甲、乙两组竹简规格基本相同，长 29.3~29.6、宽 0.5~0.7、厚 0.08~0.09 厘米。丙组竹简制作较为粗糙，有的上面还带有竹节，长 21.7~23、宽 0.4~1、厚 0.06~0.15 厘米。木牍长 23、宽 4.4、厚 0.25 厘米。正面为秦二世元年（前 209）的历谱，背面为该年十二月份的日干支等[③]。

（8）龙山里耶秦简

2002 年，在湖南龙山里耶战国至秦汉时期古城一号古井中发现秦简 3.6 万枚左右。简文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涉及秦的内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苍梧郡等。其中洞庭郡等资料从未见诸文献记载，可补史籍之缺。综合其他出土物的时代特征，并根据简文中的廿五年至卅七年和二世元年、二年等纪年，推测它们当是秦王政（秦始皇）及二世时的遗物。以前一般认为中原政权对湖南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地区的有效管理自西汉初年始，由简文可知秦代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管理；众多的特别是对县乡等基层政权职官的记载，为了解秦王朝行政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珍贵资料。简文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时刻构成

①荆州博物馆：《江陵杨家山 135 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8 期。

②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③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 年第 6 期；彭锦华：《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文物》1999 年第 6 期。

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的管理制度严格而高效。里耶秦简的发现为研究秦时的历史地理、历法，以及探讨其兴起、强大进而统一全国的缘由等，提供了珍贵材料①。

2. 汉代简牍与帛书

（1）1949年以前的简牍发现与研究

A.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②再次来华组织大规模的西北考察。斯文赫定不得不和中国学术团体达成妥协，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外学者合作在内蒙、甘肃和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考察，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方和外方团长。负责考古工作的中方团员是北京大学的黄文弼。1930年，他曾经在 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边塞遗址发现一批汉简。1930年2月，黄文弼越新疆东境库鲁克塔山抵达罗布泊北岸。他本来要调查那里的石器遗址，但意外发现了汉代烽燧，今称"土垠遗址"，从中发掘出17枚汉简。

居延汉简由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发掘工作由瑞方团员伯格曼主持。1930~1931年，伯格曼到内蒙古居延地区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从中发掘出汉简1万余枚，即现在常说的"居延汉简"。这批汉简出自30余个不同地点，其中破城子遗址（甲渠候官治所）出简5200枚，红城子遗址出简3500枚。伯格曼考察的汉代边塞遗址现分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

B.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

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开始考察河西走廊地区。该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成员夏鼐和阎文儒考察了敦煌的小方盘城以东汉边塞遗址，从中掘获汉简48枚。1948年，夏鼐考释了这批汉简，连同原简照片刊于《新获之敦煌汉简》。阎文儒则撰写《河西考古杂记》，介绍了遗址考察及汉简出土的情况。

---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汉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②斯文赫定（1865 ~ 1952），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先后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高原地带进行了多次考察，遍及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历时较长的有4次。第一次，1893 ~ 1897年，取道乌拉尔、帕米尔高原，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直到罗布泊，还到过青藏高原、甘肃和内蒙古，并绘制了500幅地图。考察成果写成《穿过亚洲》（1898）一书；第二次，1899 ~ 1902年，沿着塔里木河行进，在罗布泊附近发现古楼兰遗址，收集到许多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并且提出罗布泊曾经发生移动的假说。出版有《1899 ~ 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1904 ~ 1908）；第三次，1906 ~ 1907年，主要对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进行地理考察。出版有《横越喜马拉雅》（1909 ~ 1912）、《南西藏》（1917 ~ 1922）；第四次，1927 ~ 1935年，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徐炳昶（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瑞双方团长。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进行了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2）1949年以后的简牍发现与研究

A. 居延汉简的新发现

甘肃省博物馆为主的居延汉简考古队，从1972年开始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在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A8）、保格都甲渠第四燧（P1）和肩水金关（A32）三处遗址不断进行大规模发掘，至1982年，先后在居延采集、发掘、核对出土简牍近2万枚，其中包括70多部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简册。原简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今称“居延新简”。

B. 敦煌汉简的新发现

甘肃省和敦煌地方文物部门多次到甘肃西部汉代边塞遗址进行文物普查，主要有以下五次重要发现：

1977年8月，甘肃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汉代烽燧遗址中采集到91枚汉简，现藏嘉峪关市博物馆。这批汉简属于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下属禽寇燧的文书档案。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从敦煌开始，对河西汉塞进行全面调查，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考察时，发现一个斯坦因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同年9月进行了正式发掘，掘获汉简1217枚，原简现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①。

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西北酥油兔汉代烽燧遗址采集到汉简76枚，原简现存敦煌市博物馆。

1986~1988年间，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又在敦煌西北汉代边塞遗址陆续采集到汉简137枚，原简现存敦煌市博物馆。种类主要有简、两行、牍、封检、觚、削衣等，所用材质有竹、云杉、胡杨、红柳等，属于就地取材。属于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的文书档案。这批汉简的内容有诏书、律令、爰书、檄、记、各类簿籍文牍、历谱、字书等②。

1990~1992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河西走廊西部安西——敦煌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山边发现一个汉代遗址，随即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和纸文书共2.5万余枚、件，其中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簿册多达50余册。这个汉代建筑群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有明显区别，属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类似于后世的驿站。汉简主要出自悬泉置东南侧早期仓址的废墟物堆积中，时代最早的属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07），最晚的属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魏晋时期废弃后，悬泉置改作烽燧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堆积中许多汉代残纸与纪年简共出，为考订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的产生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这些文物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③。

C. 西域汉简的新发现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②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文物》1991年第8期。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1963 年，陈梦家就提出过“西域汉简”的概念。当时的西域汉简主要是指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一组楼兰汉简。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新发现则大大丰富了西域汉简的内容。

198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普查队在洛浦县山普拉发现一处古墓地，并在 2 座墓中发掘出数枚汉简，1 件为汉字封检，写有“□小名□”字样[①]。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古墓年代距今 2085±80 年（经树轮校正），相当于西汉时期，这是目前所知汉简西传最远之地。

1993 年 10 月，中日联合尼雅遗址考察队第五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时，发现 2 枚汉简，其中 1 枚是汉代字书《苍颉篇》[②]。

D. 武威《仪礼》简

1959 年 7 月，甘肃武威市磨嘴子 6 号汉墓出土竹简 600 余枚。该墓为土洞墓，发掘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经过整理，共计有完整简 385 枚，残简 225 枚，多数为木简。9 枚短木简上记录有宜忌之类的数术内容。长简有四道编绳。简文内容为《仪礼》的部分章节，书体为墨书隶体。简文可分为三组：甲本是 378 枚木简抄写的《士相见》、《服传》等七篇《仪礼》；乙本用短而窄的木简著录了与甲本版本相同的一篇《服传》；丙本是写于竹简上的《丧服》。以上三组《仪礼》共九篇，约 2.47 万多字，比熹平石经残经多出近 2 万字。这批简册在经学、文献、汉代简册制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③]。

E. 临沂银雀山汉简

1972 年 4 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 1 号、2 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④]。1 号汉墓所出竹简共编 7500 多号，但完整的简数量不多。竹简原有长短两种。短简全部残坏，内容似乎为占书之类。长简长 27.5、宽 0.5~0.7 厘米，多为三道编绳，少数有两道编绳。此外，1 号墓中还出土了 5 件木牍。

1 号墓所出土简牍主要为文献类，可以分为传世文献和佚书两大类。传世本的有《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孙子》和《六韬》中均有佚篇）。简牍的大部分是已经散佚的书，包括《孙膑兵法》16 篇、《守法守令十三篇》10 篇、《论政论兵之类》50 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12 篇、《其他之类》12 篇。2 号墓出土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简 32 枚。银雀山汉墓出土大量古籍和佚书，为研究历史、哲学、历法、文字、简册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F. 马王堆汉墓的简牍与帛书

1972 年，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竹简 312 枚，木楬 49 枚[⑤]。木简出土于东边箱北端，先以墨书隶体书写，再用两道编绳编联成册。其内容是记录随葬品的

①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 年第 2 期。

②林永建等编：《梦幻尼雅》，民族出版社，1995 年。

③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④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⑤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年。

遣策，也是迄今所见的简数最多的一部遣策。其所列名称与出土实物大部分吻合，为研究汉初的经济史、生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木楬分别出土于西边箱、南边箱和东边箱，原系于各个竹笥顶端，标明竹笥所盛之物品。

1973 年 12 月~1974 年初，在马王堆 3 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简册与帛书，共计竹木简和木牍 610 枚①。其中的 220 枚简为四种古代医书：《十问》（竹简）、《天下至道谈》（竹简）、《合阴阳》（竹简）、《杂禁方》（竹简）。其中《天下至道谈》为简书自题之名，另外 3 篇名目均为整理者所拟。这四种书均与房中术和养生有关。其他简牍为记载随葬品器物名称和数量的遣策，多与出土实物一致。

3 号墓东边箱的一个漆盒内出土了大量古代帛书。整理者将其甄别为 20 多种古籍，其中大多数为佚书。

《春秋事语》。原无标题，约 3000 字。全书 16 章，每章提行另起。只有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未见于史籍，其他史事均可核定历史年代。该书记事简约，但详尽记录了当事人的谈话和后人的评论。部分内容可以和《春秋》三传、《国书》等书相参引，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世的史料。

《战国纵横家书》。原无标题，共 1.12 万多字。全书分为 27 章，只有 11 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该书是三种史籍的汇编，是一部十分珍贵的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

医书类：原均无标题，整理者分别定名为：《足臂十一脉灸》、《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以上五种合抄为一卷），《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以上三种合抄为一卷），《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以上三种各抄为一卷）。

数术类：原均无标题，整理者定名为：《式法》、《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等，均为佚书。

帛图类：共有 7 种，分别为《导引图》、《街坊图》、《地图》、《驻军图》、《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天文气象杂占图》。

G. 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 年 12 月~1984 年 1 月，湖北江陵县张家山三座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了 1000 余枚竹简。其内容有：《奏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涵盖面极广②。

1985 年秋和 1988 年初，又先后清理了两座汉墓（M127、M136），共计出土竹简约 1130 枚。其中 M127 出土了竹简 300 余枚，但保存情况较差，其中残断竹简约 130 余枚；M136 出土竹简 829 枚，保存情况基本完好，只有少量断简③。

M127 所出竹简简文内容皆为《日书》，内容分若干小标题，如“祠日”、“八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②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③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 年第 9 期。

者八风”等，标题下为具体内容，包括择日、吉凶、禁忌等事项，与云梦睡虎地出土《日书》大致相同。按其形制可以分为窄长形和宽短形两类。窄长形简长35~36.5、宽0.6~0.7、厚0.1~0.2厘米。用三道丝线编联。竹黄面用墨隶书文字，字迹清楚。宽短形简长17.4~17.6、宽0.7~1.1、厚0.2~0.25厘米。简以两道丝线编联，文字一般书于竹黄上。墨书隶体，字迹清晰。竹青面也有字迹，墨痕脱落甚多，已经难以辨识。

M136所出竹简放在头箱南端的一个长方形竹笥中，这些竹简用麻织品包裹。竹简出土时保存基本完好，色泽淡黄，竹黄面墨书，隶体，字迹清晰。竹简可以分为以下7组：

①184枚。简长29.8、宽0.6、厚0.08厘米。字迹规整，自题篇名为《功令》，内容为西汉初期戍边杀敌立功的具体记功方式和详细规定，以及官序的替补续列，部分简头有编册号，但缺号较多，内容不全。

②93枚。简长26.3、宽0.7、厚0.1厘米。简头仅少量有字，无书名，内容为养生修身之道类的食气却谷之法，与马王堆帛书中的《却谷去病》篇相同，但内容更为完整。

③44枚。简长30、宽0.5、厚0.1厘米。字迹较潦草，自题篇名为《盗跖》，内容为孔子见盗跖，此篇即为《庄子·外篇·盗跖》。内容完整，与现存版本文字内容基本一致。

④10枚。简长23.5、宽0.6、厚0.1厘米。无题名，内容为记载宴享及饮食器皿等。

⑤70枚。简长37.2、宽0.5、厚0.1厘米。文字内容为历谱。该书以干支编排日历，形式及排列方式与银雀山汉简历谱相似，自题名为《七年质日》，考订年代为汉文帝前元七年。

⑥372枚。简长30、宽0.6、厚0.1厘米。字迹规整。所载内容为汉律15种，各篇皆有题名。

⑦56枚。简长25、宽0.7~1、厚0.15厘米。字迹潦草，是记载随葬物品名称和数目的遣策。

H. 连云港尹湾汉简

1993年2~4月，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6座长方形竖穴石坑西汉墓。其中2号墓出土了1枚木牍衣物疏。6号墓墓主足部出土23枚木牍和133支竹简，共4万余字，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东海郡行政经济情况的官府簿籍、数术类简册、历谱、衣物疏、记事日记及迄今所见最早的俗赋《神乌傅》六类材料。这批简牍为我们研究汉代郡级行政制度、数术、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

I. 海州西汉霍贺墓木方

1973年3月，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发现一座西汉木椁墓，墓主人为霍贺。共计

①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竹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出土陶器、铜器和铁器等 90 余件，包括木方 7 块，其中 1 块有文字，隶体墨书，长 22、宽 6.5 厘米。主要是记载随葬品的名称和件数的遣策[①]。

J. 定县 40 号汉墓（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汉简

1973 年，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但由于该墓早年被盗被焚，竹简被扰乱，并且已经碳化成块，完整的竹简很少。经过整理，共整理出 9 种古籍：《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仪》、《保傅传》、《太公》、《文字》、《六安王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 · 占卜》、《六韬》等残简[②]。

K. 安徽阜阳汉简

1977 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 1 号汉墓（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出土了竹简、木简和木牍[③]。其中的竹简经过整理，内容包括：《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员程》、《行乞》、《相狗经》、《楚辞》中的《离骚》与《涉江》、《刑德》、《日书》、《干支表》（可能是《刑德》、《日书》的附属）。木牍内容有：《孔子家语》、《说苑》、《新序》。

L. 南越王宫署木简

广州南越王宫署的井内出土了 100 余枚木简，根据内容判断，主要是籍簿，这是广东地区第一次发现简牍[④]。

M. 榆次木楬

1971 年，在山西榆次市王湖岭西汉墓葬中出土木楬 1 件，上端呈半圆形，并用墨汁涂抹，下端呈长方形，一面用隶书书写“□笥”。长 5.7、宽 4、厚 0.3 厘米[⑤]。

N. 仪征胥浦 101 号墓出土简牍

江苏胥浦 101 号西汉墓出土的简牍，按其形制可分为竹简、木牍、木方、木觚。按文字内容可以分为“先令券书”、遣策等。“先令券书”是墓主人朱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一类的文书。该墓葬的年代为汉平帝元始五年（5）[⑥]。

O.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

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 M115（墓主人为马良）中，出土一批汉代木简，其内容涉及兵法、军法与军令、目录[⑦]。

P. 旱滩坡木简

---

①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 年第 3 期。

②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湖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 年第 8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文物》2001 年第 5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文物》2001 年第 5 期。

③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署遗址发现木简》，《考古》2006 年第 3 期。

⑤王克林：《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文物》1974 年第 12 期。

⑥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 101 号西汉墓》，《文物》1987 年第 1 期。

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

1989年8月，在甘肃武威柏树乡下五畦大队的旱滩坡发现一座东汉墓葬，其中出土木简16枚，出土时编缀痕迹清楚，由两道编纶缀联而成。木简为松木质，长度一般在21厘米左右，宽度不一，大多数宽约1~1.1厘米，只有1枚宽0.2~0.3厘米。简文为单行墨书。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养老受王杖之制和关于王杖授受之律令；另一类为关于坐赃为盗、虫灾、火灾等刑律。根据其中的建武十九年（43）的纪年，可知属于东汉初年[①]。

六、汉代碑刻

汉代碑刻在西汉时期发现甚少，绝大部分属于东汉时期。这些文字石刻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材料，其中的纪年石刻则可以作为判断绝对年代的依据。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对汉代碑刻有所记述。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汉代碑刻占了很大的篇幅。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是第一部研究汉碑的专著。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和翁方刚的《两汉金石》，也是研究汉碑的重要著作。

1949年以后，汉代碑刻又有新的发现，如南阳张景碑、天津武清县鲜于璜碑、南阳许阿瞿墓记、河南偃师买田约束券、江苏邳县缪宇墓记以及北京八宝山秦君神道阙等。此外，通过对洛阳东汉太学遗址的发掘，新发现一批石经残石和碑趺。

1. 种类和形制

根据形制和用途的不同，汉代文字石刻可分为碑、碣、摩崖、墓记（志）、石经等几类：

碑长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趺即碑座，碑身刻文字，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题额，也称碑额。汉代的碑文多为篆书。汉碑一般为方趺，个别也有龟趺的。碑首有圭形和圜形之分，而以为圭形碑首为多。在碑首和碑身之间有穿（即圆孔）。汉碑一般没有纹饰，但也有极少数在碑首刻龙和四神图像。

碣为立石刻字，形制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无严格规制。后世碑碣的名称往往混用。

摩崖系利用天然崖壁进行刻石。现存最早的摩崖为东汉时期的褒斜道石刻。褒斜道是由今陕西省宝鸡市南越过秦岭山脉，沿褒水至于汉中，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与汉中、四川地区的交通要道，至迟在西汉时期已经开通，但也有人认为开通于秦惠文王九年（前316）。

墓记（志）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未成定制，有的自称为墓记，但未见有自称墓志的。有的略近方形，有的长方形，也有圭形似碑的。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

①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文物》1993年第10期。

墓内石壁上。还有刻于墓祠内的。魏晋以后墓志逐渐定型。

石经的碑身为长方形，两面刻字，形制与碑相似。另外，还有附刻于建筑物上的文字，如阙身上所刻的题记，以及墓室“黄肠石”上的刻字等。

2. 碑刻的内容

大体可分为颂功、记事、契约、墓碑和墓记（志）、经典 5 类，其中以颂功、记事及墓碑 3 类发现较多。

（1）颂功碑刻有些除记颂某人的功德外，往往在碑阴及碑侧刻有立碑的门生故吏的姓名和资助钱数。

（2）记事碑刻包括各类事件、诏书、奏文、公文文书等内容。

（3）契约碑刻有买地券、买山刻石、约束石券等。如 1973 年河南偃师县出土的《汉侍廷里父老僤[1]买田约束石券》，隶书，记述汉章帝建初二年（77），侍廷里父老僤共 25 人集钱买田为集体共有，并规定了使用办法，特立此约束石券，以便共同遵守[2]。关于此约束石券，学者们多有争论[3]。

（4）墓碑和墓记。墓碑和墓记（志）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经历、死亡日期，以及对死者的颂词。墓碑立于墓前，碑阴和碑侧常刻有门生和故吏的姓名，有的刻死者的家族世系。

七、货币与度量衡

（一）秦代的货币与度量衡

1. 钱币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开始推行其统一币制的政策。根据《史记 · 平准书》记载：秦始皇“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秦半两的形制为圆形方孔，内外无郭，“半两”二字为阳文，背面平素。以两、铢为单位，1 两=4 锱=24 铢。

虽然文献记载秦半两“重如其文”，但出土实物并非如此。主要表现为薄厚不一，方孔大小不同，字迹粗细也有区别，并且周边多有流铜现象，这说明秦半两的标准化程度不高。若按钱文，秦半两的重量应当为 8 克，即半两=12 铢=8 克。但据实测结果，大多数钱币重 4~6 克，远不够半两。也有个别秦半两重 8 克以上。从出土的秦半两来看，其特点为：秦半两并不是史书记载的“重如其文”，直径大多数在 2.5~2.77 厘米，多重 4~6 克；钱文为阳文，但不如战国时期文字那么高挺，

---

①僤：大、盛之意。《诗经 · 大雅 · 桑柔》：“逢天僤怒。”

②洛阳地区行署文物处：《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③林甘泉：《“侍廷里父老僤”与古代公社组织残余问题》，《文物》1991 年第 7 期。

背面平素；文字为小篆，字体逐渐呈方形，“半”字下面的平划及“两”字上面的平划较长；半两钱早期内外无郭，晚期个别的开始出现外郭。

2. 度量衡

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秦国的度量衡制为标准，并在其上刻诏书加以推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前 209）又在有的量器、衡器上加刻自己的诏书加以推广，但标准未变，其诏书内容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矣，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秦度的单位有引、丈、尺、寸、分，其换算为：1 引=10 丈=100 尺=1000 寸=10000 分。秦 1 尺约合现在的 23.1 厘米。

秦的量制单位有斛、斗、升、合、龠，其换算为：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秦量的每升约在 194~216 毫升之间，而以 200 毫升左右为多。秦量多为铜质和陶质，铜量有方形（升）和椭圆形（量），有柄；陶量则多为圆筒形。考古发现的秦量主要有 1 升量、2 升半量、三分之一斗量、半斗量、1 斗量 5 个级别。秦律规定，量的误差范围不得超过 5%。例如，1982 年，在陕西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发现 1 件铜质秦量，椭圆形，短柄，有方形銎，可以安柄。口部长 20.8. 宽 12.5. 深 6.1 厘米，重 1275 克。以水检测，实测容量为 980 毫升。在其左右外壁上分别刻内容相同的秦始皇诏；外底刻秦二世诏，秦二世诏书带有勾识（∠）。柄部铭文有“右”、“北私府”、“半斗、一”、“私”。“北私府”是秦宫中的收藏单位，“半斗”是容量，“一”是编号，“私”是北私府的省称[①]。

秦的衡制单位有石、钧、斤、两、铢，其换算为：1 石=4 钧=120 斤；1 斤=16 两；1 两=4 锱=24 铢。据实测，秦 1 斤约在 234.6~273.8 克之间。又根据高奴权实测，秦 1 石（120 斤）重为 30.75 公斤，1 斤约合 256.26 克。作为衡器的秦权大多数半球形，也有的呈瓜棱形。质地大多数为铜质，少数为铁质，偶尔也有陶质的。秦权的重量有：1 斤、5 斤、8 斤、16 斤、20 斤、24 斤、30 斤和 1 石 8 个级别。根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效律》规定，1 石的允许误差范围在 0.4%，半石权以下允许误差范围为 0.8%。

（二）汉代的货币与度量衡

1. 货币

两汉时期的货币可以分为半两钱、三铢钱、五铢钱、新莽钱、东汉五铢等。

①陈孟东：《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文博》1987 年第 2 期。

（1）半两钱

西汉前期铸造的半两钱主要有：汉高祖时期，铸造三铢半两。吕后二年（前186），铸造八铢半两，考古发现的实物直径 2.7~3 厘米，重 4.8~5.3 克。吕后六年（前 182），铸四铢半两，直径 5 分，约合 1.15 厘米，所以又称为“五分钱”。文帝五年（前 175），铸造四铢半两，考古发现的实物直径 2.2~2.5 厘米，重约 2.5~2.8 克。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铸造四铢半两，面有外郭。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前期的钱币来看，主要是汉文帝铸造的四铢半两。当时郡国豪强和诸侯王往往自行铸钱，钱文也为半两，但极为轻薄，直径仅 1 厘米左右，后世称为“榆荚钱”。

（2）三铢钱

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铸造三铢钱，钱文为三铢，面有外郭。考古发现和传世品都很少，直径 1.8~2.2 厘米，重 2.2 克。

（3）五铢钱

五铢钱的铸造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五年，罢半两，行五铢钱。”

最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外郭而无内郭，背面则内外郭俱备。钱直径 2.5 厘米左右，重约 3.5~4 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等原因，所铸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的肉厚。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铸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可能。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

但到了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下令禁止诸侯王私自铸钱，把铸币权收归中央，集中在都城长安铸造，并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的锺官、辨铜、均输（技巧）三官分别负责铸造、监制、发行。由于五铢钱的铸造收归上林三官主管，所以又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一般直径 2.3 厘米，重 3.5 克左右。五铢钱自武帝至平帝共铸造了约 280 亿枚。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钱，这个时候的货币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

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钱型整齐，直径2.5~2.55厘米，穿直径约0.97厘米；正面仅有外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超过4克；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到了西汉晚期，出现了剪轮五铢①，还有一种小五铢，直径1.2厘米。这两种五铢钱的出现，是西汉晚期货币贬值的具体体现。

（3）新莽货币

王莽在其摄政和称帝期间，曾经发行新的货币，按其形制可以分为泉、刀、布三种。

泉钱: 圆形方孔，有内外郭。居摄二年（7），始铸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9），始铸小泉直一、幺泉直一、幼泉直一、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合起来称为六泉。地皇元年（20），王莽还铸造了货泉和布泉。

布钱：形似东周货币，上部有圆孔。始铸于始建国元年（9），计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共计十布。地皇元年（20），还铸造了货布。

刀币：上部为圆形方孔钱，下部为直刀形。始铸于居摄二年（7），有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

在新莽货币中，以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布泉最为常见。王莽时期的货币，将以前的计重货币改为计值货币，独创了我国货币的十进位制，这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王莽货币铜质好，铸造精美，钱文书法规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是我国古代货币中的珍品。

（4）东汉货币

东汉初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货币十分混乱。到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6），重新铸造五铢钱，称为建武五铢，圆形方孔，有外郭无内郭。直径一般在2.5厘米，重3克。稳定了货币，但好景不长。从东汉中期开始，币制又渐趋混乱，所铸五铢钱质量低劣，重量往往只有2~2.5克。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大量剪轮五铢和綖环五铢②。这两种钱币的大量出现，说明东汉后期的货币贬值和货币流通的混乱。除建武五铢之外，还有其他货币。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新铸五铢钱，一般重3.6克。这种五铢钱的背面自穿孔的四角铸出四道斜线，直抵外郭。这四道斜线又被称为“四角决文”。所以，

①所谓剪轮五铢，就是边轮被剪去的五铢钱。

②所谓綖环五铢，就是钱穿被凿去的五铢钱。

汉灵帝所铸造的五铢钱又称为“四出五铢”或“角钱”。因为其发行量少，发现不多。民间传说四出五铢象征汉家天子下堂四道而去，也就是说汉家天下即将完结。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曾经铸造过一种质量非常低劣的钱币，直径1.6~1.8厘米，重0.8克，内外无郭，且无钱文，因此称为“无文钱”。

此外，西汉时期开始铸造铁钱，汉墓中曾发现铁半两钱。此后铁钱不断出现，王莽时有铁制的大布黄千，东汉晚期有的墓中还曾出土过铁五铢。

2. 度量衡

西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因袭秦代的度量衡，王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西汉时期度量衡相差不大。东汉建武年间，曾经整顿过度量衡，并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大致与西汉相同。这个时期所用的度量衡单位与换算也基本相同。

（1）度

长度单位有分、寸、尺、丈、引，为10进位制。

根据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尺和曲阜九龙山汉墓出土的残铜尺推算，西汉时期的1尺约折合23.2~23.5厘米。也有些尺子超过这一范围，如河北阳原三汾沟西汉晚期墓出土的残木尺复原长23.8、宽1.5、厚0.4厘米[①]。这一长度与东汉后期的1尺相当。

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的1尺，根据传世的始建国元年（9）嘉量测定，约折合23.1厘米。在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了1件骨尺，尺度长23.1厘米。在尺子的刻度的空白处用针刻云气纹、云气纹之间刻龙、虎、羊、锦鸡等飞禽走兽[②]。

东汉前期1尺，根据传世的建初铜尺，约合23.5厘米。东汉后期1尺，根据各地发掘出土的铜尺和骨尺测算，约合23.8厘米。河南卢氏县城关镇西北街村发现的东汉彩绘骨尺长23.2、宽1.7、厚0.3~0.4厘米[③]，与新莽时期更为接近。山西朔县西汉末至东汉初年墓葬出土的骨尺长22.8、宽1.6、厚0.3厘米[④]，则小于建初铜尺。

（2）量

量度单位有龠、合、升、斗、斛（石）。基本换算为：1斗=10升=100合=200龠；1斛=10斗。

据江苏铜山崖墓出土的铜量及各地汉墓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铜器测算，西汉时期的1斗约合2000毫升。据传世的新莽嘉量[⑤]进行测算，新莽时期的1斗约合2000

---

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②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③卢氏县文管会、牛森林、牛爱国：《河南省卢氏县出土一件东汉彩绘骨尺》，《考古》1992年第7期。

④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

⑤新莽嘉量：是王莽是建国元年（9）所制作的标准量器。形如带双耳的圆筒，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下为龠，共有五种标准容量。嘉是美好和标准之意，嘉量即标准量器。原物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莽嘉量制造技术精湛，比例准确，是研究当时量制的重要依据。

毫升。龠以下的容量单位还有撮、圭。5 撮=1 龠；4 圭=1 撮。东汉时期，据大司农平斛[①]和光和铜斛测算，1 斗约合 2000±40 毫升。

（3）衡

重量单位有铢、两、斤、钧、石。基本换算为：1 石=4 钧=120 斤；1 斤=16 两；1 两=24 铢。西汉衡制以满城汉墓出土的“三钧”铁权测算，1 斤约折合 249.9 克。从各地出土的西汉有铭铜器测算，西汉单位重量的数值差异较大，而以 1 斤折合 250~254 克居多。据传世的光和二年（179）铜权测定，东汉 1 斤约合 250 克。

八、汉代玉器

1. 分类

按照用途大体可以分为仪礼上使用的玉器、葬玉、装饰器、浮雕及圆雕的美术品、实用玉容器四大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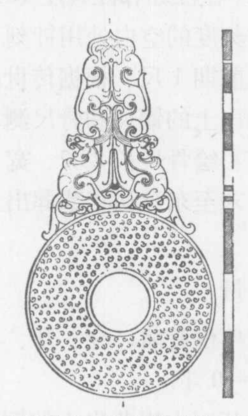
第一类：礼器。

中国古代仪礼上使用的玉器，主要有璧、圭、琮、璋、璜、琥[③]六类，被称为六种瑞玉。但到了汉代，仪礼上的用玉主要有璧、圭。如在甘肃礼县鸾亭山汉代祭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主要为璧、圭。其他的璜、琥只作为佩饰使用，琮、璋在汉代制作的数量已经非常少见。

玉璧，是一种圆形圆孔的玉器。就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玉璧来看，主要有平



1.蒲纹玉璧



2.透雕双龙卷云纹谷纹玉璧

图十五 汉代玉璧

①大司农平斛：1953 年在甘肃古浪县出土，实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5）由大司农颁发的标准铜量，呈圆筒形，高 24.4、口径 34.5 厘米，腹部左右有对称的短柄，外壁刻铭文一行，内容为“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实测容量为为 19600 毫升。柄的上方有凸起的方框，用来镶嵌官府鉴定容积后所作的检封，出土时检封已经无存。“平”指官府鉴定的标准量值，“平斛”即标准之斛。传世的东汉光和二年（179）的大司农铜斛，形制与其相近，实测容积为 20400 毫升。东汉时的大司农掌管各郡国的钱谷金帛，所以，中央官府制定的标准量器与衡器，往往由大司农颁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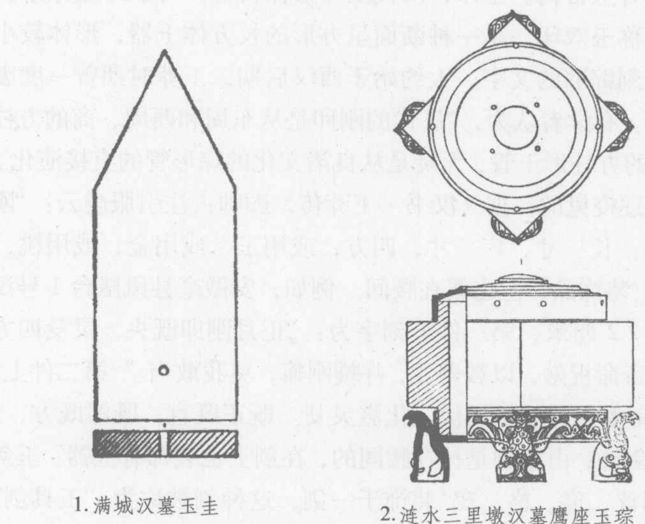
②夏鼐：《汉代的玉器》，《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③琥：虎形或装饰虎纹的玉器，以白琥祭西方。

素无纹的玉璧；表面饰蒲纹或谷纹的玉璧。蒲纹是浅浮雕的六角格子纹，犹如编织的蒲席（图一五，1）；谷纹小若谷粒，有的上面刻有旋涡纹；有的则在蒲纹或谷纹璧之外，装饰一周图案化的纹样；还有的在蒲纹或谷纹璧之外，另加一组或几组透雕的动物纹。在所有的玉璧之中，以加透雕的玉璧最为精美（图一五，2）。汉墓中发现的玉璧数量很多，其用途已经不限于仪礼，有的放在死者胸部或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之间，有的则镶嵌在棺椁或铜枕之上作为装饰。在汉代，玉璧还可以穿连起来作为房间墙壁上的装饰。较小的玉璧还可以作为杂佩中的组成部分，悬挂在腰带上作为装饰物。还有一些大孔之璧，孔大于体的可以称之为瑗，孔大而体又窄细的可以称之为环。

玉圭，是一种上端尖锐的长方形玉片。与玉璧比较起来，汉代的玉圭数量不多。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玉璧 25 件，而玉圭只有 3 件（图一六，1）；刘胜妻窦绾墓除过棺木上镶嵌的 26 件玉璧之外，还出土 18 件玉璧，而玉圭则无；甘肃礼县鸾亭山祭祀遗址出土的玉璧与玉圭比较，也是玉璧多，玉圭少。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的粗管，最初见于江苏南部的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前 3300~前 2250），其形状比较细长。汉代的玉琮发现数量极少。如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 1 件（图一六，2），上面有银盖，下面套有以银鹰为足的银底座；满城汉墓也出土 1 件，但已经被改制成盒。


1. 满城汉墓玉圭　　2. 涟水三里墩汉墓鹰座玉琮

图一六　汉代玉圭、琮

第二类：葬玉。

主要包括九窍塞、握玉以及玉衣、嵌玉漆棺等。另外，在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还发现了专门用于随葬的玉兵器，有玉戈、螭龙玉饰等。

第三类：装饰玉器。又可分为随身装饰物和器物上的装饰物两类。

佩玉之风在商代已经出现，到了战国则出现了“组佩”，即由多件不同种类的佩玉和璜、璧等与串珠组成，这些可以视为随身装饰物。从目前的出土实物来看，组佩主要由玉璧或玉瑗、玉璜、玉舞人、玉觿等组成，其上均有小圆孔。

玉璜，是一种半圆形或弧形的扁平玉器，上端有一小孔，或者在两端各有一小孔。

玉心形佩，呈心形，所以被称为心形玉佩。由于其形如射箭时戴在右手拇指上的韘，所以也被称为韘形佩饰。如西北医疗设备厂170号汉墓出土的心形佩[①]。

耳饰，汉代的耳饰主要为珥，由珰和坠珠组成。珰，又称为瑱，塞在耳垂上钻穿的孔上。瑱的形状略似束腰喇叭状，有纵贯全身的细孔，可以穿线，下部可以系一珠或一耳坠子。耳饰之中还有作为耳环使用的玉玦。玉玦在商代已经出现，在战国墓葬之中，小的玉玦经常在死者的两耳旁边发现，应当是作为耳饰之用，但汉代已经少见或不再使用。

有装饰作用的实用物，主要有玉觿、玉笄、玉印、玉刚卯、玉剑饰等。玉觿，是一种爪形佩玉。它的末端呈爪状，可以解结。玉笄，汉代男女均使用笄，男人不仅用以“卷发”，而且用以“连冠于发”。玉带钩，在汉代比较常见。如满城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江苏铜山小龟山汉墓、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北庄汉墓等，都出土有玉带钩。玉印，汉代玉印形体较小，可以印绶穿系，悬挂于腰间。玉刚卯，又称玉双印，是一种断面呈方形的长方体玉器，形体较小，中有孔可以穿线。四面刻辟邪的文字。大约始于西汉后期，王莽时期曾一度废止，东汉时期又恢复使用。有学者认为，“汉代的刚卯是从东周和西周、商的方柱形玉管退化而来，而商周的方柱形玉管，无疑是从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的直接演化。”[②]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驱逐疫鬼的。据《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引服虔云：“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着革带佩之。”虽然算不上装饰品，但也佩在腰间。例如，安徽亳县凤凰台1号汉墓出土了2件刚卯，高约2.2厘米，第一件上刻字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黄白，四色是当。帝命祝融，以教夔龙，庉蠖刚瘅，莫我敢当。”第二件上的刻字为：“疾日严卯，帝命夔化，慎玺固伏，化滋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③]玉剑饰，由于剑是挂在腰间的，在剑上也装饰有玉器。玉剑饰的使用始于战国，将剑首、璏、格、珌[④]装饰于一剑，这种剑被称为“玉具剑”。剑鞘上的带扣，俗称昭文带，多数学者认为是璏。在考古发掘中，墓葬中出土的这类剑

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马承源：《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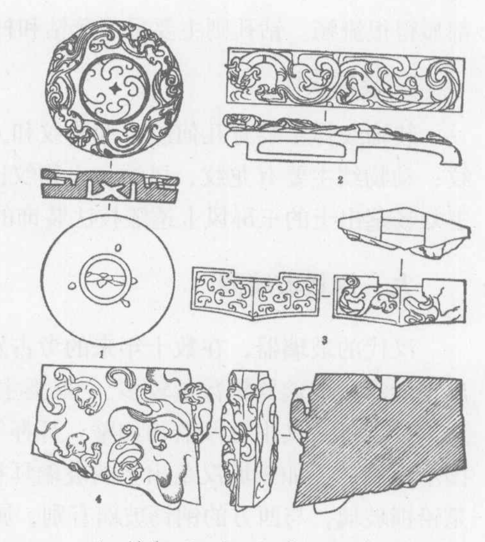
③亳县博物馆：《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

④珌：音bi，古代刀剑之鞘末端的装饰。《诗经・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珌。”毛传：“珌，下饰也。”

饰的数量很多。如满城汉墓出土一把铁剑，四者俱备（图一七）；西北医疗设备厂1号墓出土1件玉璏[①]。

第四类，圆雕和浮雕的美术品。

圆雕类美术品以咸阳汉昭帝平陵附近发现的玉马最具有代表性。通高7厘米。马呈奔驰状，胸部刻有羽毛，骑马者为一羽人。除此而外，还发现了一些玉熊、玉鹰、玉辟邪、玉豹等圆雕玉器。如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1件玉豹栩栩如生[②]。



1. 剑首 2. 璏 3. 格 4. 珌

图一七 满城汉墓（刘胜墓）铁剑上的玉饰

第五类：实用玉容器。

玉容器的出现时代很早，商代已经开始出现玉簋、玉盘等，秦阿房宫遗址也曾经出土1件玉高足杯[③]。汉代的实用玉容器，目前发现的主要有玉高足杯、玉卮、玉耳杯等。如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2件玉高足杯、1件玉卮、1件玉耳杯[④]；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1件谷纹玉高足杯[⑤]；咸阳马泉汉墓出土1件素面玉高足杯[⑥]。有些汉代的玉容器和其他金属合体使用，一般下部为金属座，上部置玉杯等。如西安汉墓出土的鎏金高足玉杯，下部的足为鎏金铜座，上部杯身为玉，两者嵌合而成[⑦]。

2. 玉器的材料和治玉工艺

汉代玉器中有许多仍使用绿色或黄褐色的玉料，但另一方面，乳白色的羊脂玉大量增加。汉代玉料的来源，大部分是由和阗输入的软玉。

汉代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治玉技术，但是已有所改进。汉以前的玉器多是在扁平玉片上加浅浮雕。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增多了。汉以前的玉器纹饰的制作技术，主要利用细砂研磨成浅浮雕的花纹。汉代由于技术的改进，镂孔花纹和表面细刻线纹增多了，浮雕和素面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有所提高，主要采用皮革或木质物。造型或纹样的加工，则主要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线刻等技法。但也与石像、木刻等有区别，仍然采用琢磨工艺。器物的轮廓线和刻纹，也

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③西安市文物局：《华夏文明故都丝绸之路起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
④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⑥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明珠新家园M54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都显得很流畅。钻孔则主要采用管钻和杆钻。

3. 装饰纹样

装饰纹样主要有几何纹、动物纹和人物纹等。几何纹主要有谷纹、蒲纹、云纹；动物纹主要有龙纹、凤纹；人物纹比较少见，比较典型的有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屏风上透雕技法装饰的东王公、西王母[①]。

九、汉代玻璃器

汉代的玻璃器，在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不断有所发现。特别是在广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玻璃器物数量较多[②]。器类主要有璧、高足杯、耳杯、盘、碗、鼻塞、珠、耳珰等，其中有些器物如璧、耳杯等，其造型属于中国传统器形，应当是中国本土制造。如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耳杯、玻璃璧，不仅器形，成分化验也证明是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有别，属于中国本土产品[③]。通过对广西合浦出土的汉代玻璃器进行检验分析，它们也为铅钡玻璃，应当是中国本土产品。此外，在汉墓之中还发现一些用铅钡玻璃制作的"玻璃衣"作为"玉衣"的替代品，这些玻璃衣片上常见动物纹、草叶状纹等，有的还填以金箔，反映了汉代玻璃制造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和生产能力。

十、秦汉金银器

在以往的研究中，秦汉金银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秦汉时代的金银器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齐东方先生在其《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略有涉及。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专门论述秦汉金银器的论著，可以说，对这一时期金银器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目前的发现主要见于墓葬，如山东西汉齐王墓陪葬坑[④]、徐州狮子山楚王陵[⑤]、满城汉墓[⑥]、南越王墓[⑦]等。从出土状况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大都是一些诸侯王或者贵族墓葬，反映了当时的上层社会流行以金银器随葬的风气。到目前为止，虽然在各类发掘简报或报告中未对秦汉的金银器加工工艺进行报道，但大体上以铸造为主。秦汉金银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主要脱胎于同时代的铜器和陶器的造型，器类主要有传统的盒、碗、盘、洗、壶、杯、匜、印章、各类装饰品等。装饰纹样也受到同时代青铜器影响，与

①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②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

③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④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⑤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⑦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青铜器的纹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常见的主要为云气纹等，部分纹样鎏金，也有一些器物素面无纹。

十一、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主要有玻璃器和金银器。外来的玻璃器在河南洛阳东汉墓葬中出土1件东罗玻璃瓶①。外来的金银器在淄博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1件凸瓣纹银盒，高11、口径11.4厘米②；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出土1件类似的凸瓣纹银盒，盒高10.3、口径13厘米③。据研究，这种凸瓣纹银盒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安息器物④。

参考文献：

夏鼐：《汉代的玉器》，《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林剑鸣编译：《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徐苹芳《简牍》、徐光冀《汉代碑刻》等，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中国学术》2001年第2辑，商务印书馆。

第六节 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是秦汉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有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面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的影响。特别是西汉中叶以后，随着汉王朝政府在各边境地区增置郡县，在西域设都护府，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更趋密切。

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汉代遗存

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和东胡，后者分乌桓、鲜卑两部。就中国境内而言，匈奴活动范围在内蒙古大部和新疆北部，乌桓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北部；鲜卑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北部。东汉时，南匈奴入居塞内，北匈奴西迁，鲜卑遂据其故地。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

①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②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③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族遗迹主要为墓葬，匈奴遗迹有西岔沟、客省庄、上孙家寨、西沟畔、补洞沟、倒墩子等墓葬或墓地，鲜卑遗迹主要有榆树老河深墓地、帽尔山墓地。

1. 西岔沟墓地

西岔沟墓地位于辽宁省西丰县的西岔沟小山岗上，面积约为8000平方米，推测共有墓葬500座左右。墓地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到后期。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其中的63座[①]。墓地所在地为当时辽东郡长城之北，所出文物对研究古代汉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已发掘的全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为坐西向东、排列有序的单人葬，头向西。位于墓地中心的墓葬多随葬长短兵器、马具和较贵重的金银饰；处于墓地东西边缘的墓，大多只有一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服饰品。似乎反映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出土随葬品共13800余件，有兵器、马具、工具、器皿、服饰以及许多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在出土的大量铜铁兵器中，有刀、剑、矛、矢镞和鸣镝等。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多面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透雕铜饰。这些铜饰有的表面鎏金，饰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和几何纹图案，有几件铸有骑士出猎和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有铁钁、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佩饰、货币（半两、五铢）等。

这些遗物反映了该部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有人认为这批墓葬可能属于匈奴部族集团，至于是匈奴本族，还是匈奴“属族”，有待研究；也有人认为可能属于东胡族的乌桓人。

2. 上孙家寨匈奴墓

上孙家寨匈奴墓在青海省大通县大通河西岸，1977年进行了发掘[②]。这里是一处东汉墓地。被发掘的墓葬为砖室墓，其形制和随葬品与其他东汉墓无异，如随葬的铜镜、五铢钱以及仓、灶、井等明器，完全与汉文化的特征相一致。其中的一枚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钮铜印，证明墓主为匈奴的酋长，说明南匈奴入居内地后，已完全与汉族融合。

3. 客省庄匈奴墓

在陕西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140号）。随葬品有透雕铜带饰、铜环、金环、铁饰等匈奴遗物，特别是其中的双人角斗纹长方形透雕铜带饰，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的特点。墓葬年代约在西汉前期，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死于长安的匈奴使者[③]。

---

①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4期。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4. 西沟畔墓地

1980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西沟畔清理发掘了9座汉代匈奴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头向北，其中2座墓内殉有羊、马骨胳和狗头骨，说明仍有杀牲以殉的葬俗，但已不普遍。墓穴大小和随葬品多寡有明显差别。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内，尸骨头部有包金贝壳饰、长条形金饰片、卷云纹金花片、方形有孔金属珠等达百余件；头骨两侧有金耳坠1对，下联镶金边玉佩和方形金串珠；颈部饰水晶、玛瑙、琉璃和琥珀等各种串珠；腰部左右有包金卧羊形饰牌和包金带具各2件；身体两侧置舞人、龙虎、螭虎、双龙等纹的石佩以及龙纹石锅等，还有铜马、三翼有銎镞及银筒、银匙等。这组墓葬的年代有的早到西汉初期，有的则稍晚①。

5. 补洞沟墓地

1980年，在内蒙古东胜市补洞沟清理了8座汉代匈奴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头向北，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合葬墓，仍殉有马、牛、羊骨胳。出土遗物中，铁器有鼎、鍑、长剑、刀、镞、带扣、带饰、马衔、环等；陶器中的陶罐富有特色，肩部盛行装饰波浪折线纹，而且大都在接近底部处有直径近1厘米的小孔；还出土铜博局纹镜、饰牌、耳环及骨匙、簪、片等。这组墓葬的年代可能为东汉时期或者稍晚②。

6. 倒墩子墓

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发掘了27座匈奴墓，年代属于西汉中晚期。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还有少量的偏洞室墓。流行单人葬，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骨架大多数头低足高。葬具使用木棺，一般置于墓穴左侧或洞室内。也有殉牲习俗。随葬品中具有匈奴特征的器物有陶罐、动物纹铜带饰、铜环、铜带扣等，其中的卷沿圆唇、高颈溜肩、深腹、颈肩处饰刻划波折纹或凹弦纹加波折纹的陶罐，是汉代匈奴墓葬中典型的器物之一。还有一些随葬品来自中原地区，主要有陶器、漆器、铁器和五铢钱，五铢钱几乎每墓必出。据出土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这处墓地属于西汉安定郡属国降汉之匈奴人③。

近年来，在一些汉墓之中还出土过匈奴特征的铜、金带饰，比较典型的是南越王墓、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墓中出土的铜、金带饰，反映了汉代之时，匈奴与中原地区关系的密切。

7. 榆树老河深墓地

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地位于吉林榆树县大坡乡老河深村，共发掘墓葬128座。墓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伊盟文物工作站：《东胜县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年创刊号。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葬由北向南呈长条状分布，排列有序，多数头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埋葬了一批较大的男女或一男二女同茔不同穴的合葬墓，这种合葬墓全是竖穴土坑式。葬具有木棺，葬式为仰身直肢。男性墓在右，女性墓在左；或男性墓居中，而女性墓在两侧。随葬品大多是实用器，比较有特色的是镂空圈足铜鍑。男性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铁制的兵器、工具、马具和动物纹铜带饰，铁器制作规整，有较高的工艺水平，间或有汉式的铁长剑和铜镜。女性墓大多随葬金银饰品及少量铁马具、工具。有用马殉牲的现象，有的墓实行火葬。时代约在西汉至东汉初期。东汉时，这里属鲜卑东界，东与夫余相邻。从墓地反映的民族习俗与史籍记载来看，推定为鲜卑人墓地①。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这批墓葬属于夫余。

8. 帽尔山墓地

帽尔山墓地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郊，墓地范围较大，墓葬分布密集，总数当在七八千座，1989~1997 年共发掘 150 多座。地表多有石堆或石圈作为标志。墓葬以竖穴土坑木椁墓为主，木椁有单椁、双椁和三椁之别。椁室以厚重的大木枋构筑，敷白膏泥，有的则髹红漆，有的筑有棺床，有的带有头箱。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墓葬极其相似。随葬品丰富，陶器以火候不高的素面夹砂褐陶为主，有双耳罐和壶等；金器有带饰、泡饰等；铁器有钁、锸、犁铧、马衔等；铜器有鎏金铜泡、人头形车辖饰、釜、镜、腕饰、马镳、带扣等；漆器有耳杯、勺等，还有丝织品和大量玛瑙珠。特别是其中 18 号墓出土的一幅铁马镫和一批丝织品引人关注。马镫由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而成，形制与集安高句丽墓葬所出者相似，是我国最早的马镫之一。丝织品中的一副帛画残片，出土时折叠置于木椁一角，展开后残长 42、高 36 厘米，其上以墨线描绘几组二方连续图案，图案由带箭头的十字形和伸展如指的树木组成，间隙中有两道平行而曲折的虚线通过。整个图像显示出引导灵魂归天的通路的意味，可能是丧葬中的引魂幡②。关于这批墓葬的族属有鲜卑和夫余两说。

二、新疆地区的汉代遗存

1. 民丰尼雅遗址和墓葬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约 100 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若羌西南约 150 多公里干涸的尼雅河两岸。遗址以北纬 37°58′ 45.3″、东经 82°43′ 13.5″的佛塔为中心，沿古尼雅河道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分布范围南北长约 30 公里，东西宽约 5 公里。其间散落房屋居址、佛塔、寺院、城址、冶铸遗址、陶窑、墓葬、果园、水渠、涝坝等各种遗迹约百余处，是新疆古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又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大型遗址之一。尼雅遗址是文献中记载的“精绝”

①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 年。

②刘景文、方起东：《吉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国故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伍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东汉后期为鄯善所并，后受魏晋王朝节制。因其地处汉晋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道，出土的文物不仅反映了地域文化特色，更为研究西域史、"丝绸之路"史、东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翔实资料。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尼雅遗址。他于1906年再度对该遗址进行盗掘。斯坦因两次共盗掘53处遗址，掘获佉卢文木简721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还有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建筑物件、工艺品和稷、粟等粮食作物。同时，还对遗址进行了测绘。其考察成果公布后，轰动了世界。斯坦因之后，1905年美国人亨延顿、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等亦接踵而至。此后，斯坦因于1913年和1931年又来过两次。1949年以后，新疆博物馆等单位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抢救性清理。1959年发掘的东汉夫妇合葬墓是新疆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两具干尸和一批珍贵文物，其中蓝底卉染棉布残片和棉布裤，被认为是我国迄今所见的最早棉织物。从1989年起，新疆文化厅与日本小岛康誉为首的有关学术团体，有计划地开展了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调查与考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据1959年调查，遗址分南北两部分。南部范围较小，仅有十余间破坏严重的残房舍半露于沙面；北部范围较大，露出沙面的房舍约有数百间。这些房舍均用红柳编成骨架然后墁泥为壁，室内地面则用麦草羊粪等合泥铺墁。1959年，在北部发掘房舍十幢，平面呈长方形，进门处有甬道通向屋内，沿屋墙周围有宽约1米的"小土炕"。屋内正中有一根立柱，柱下有整块木头制成的木础。出土遗物中的木制品有针、锥、瓢、勺、桶、大木槌、纺轮、箭杆、捕鼠夹子、刻花木板等。铜器有顶针、戒指、"长宜子孙"残镜以及东汉五铢和方孔小铜钱等。铁器有斧、小刀、残镰刀。陶器有残砚、大花缸及绿釉陶、素红陶和划纹陶片等。毛织品均为残片。农作物有麦子、青稞、糜谷、干蔓菁，以及盐和干羊肉、羊蹄、大量兽骨、毛皮等。此外较重要的发现还有佉卢文、古和田文木简66枚；在房舍以东约400米左右发现炼铁遗迹一处，残存有炉址，烧结铁、矿石、炭渣和冶铸银、铜首饰的小坩锅等。

尼雅遗址的墓葬区分布在房舍西北2公里左右的沙漠中，有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暴露于沙面上。1959年发掘的一具木棺为四矮足长方箱形，长约2米。木棺直接埋于沙中，无墓圹。棺盖上铺毛绳织成的毯子一条，棺内四周塞满厚约20厘米的红柳枝，其外侧抹一层厚约2厘米的黄泥。棺内尚存夫妻合葬干尸两具，男右女左，男黑发高鼻高颧骨，女头发多辫。两具干尸所着衣物、枕头、面罩以及覆盖尸体的织物等均为丝织品。种类有"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和手套，以及鸟兽葡萄纹绮、菱纹绮、纹罗、绢和缣、刺绣等丝织品。随葬品有藤奁盒、粉袋、木梳、丝线、绣花绸袋、"君宜高官"铜镜、铜戒指、项珠；

骨制弓、木箭筒、木箭、金片；木纺轮、木豆形器、木杯、木叉；陶瓶、陶罐；小羊骨架及小铁刀、残蓝白花布等等。时代大体相当于内地的东汉时期。从遗址中所出铜镜残片和东汉五铢钱，以及1959年在民丰县采集的一方炭精制的汉“司禾府印”印范等资料判断，尼雅遗址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比较繁荣了。

2. 和田地区

（1）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遗址位于和田县南25公里的玉珑喀什河西岸。1958年调查时，发现有方形的内外城墙遗迹[①]。1977年和1979年再次调查时，城墙遗迹已无存，仅留有许多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②]。这些土墩以西南部较密集，在土墩上及其周围发现数百个沙质或卵石制的圆形石础。在遗址中部还发现4座残陶窑址，其周围散布许多陶片、残陶器以及炼渣、红烧土等。陶片以深浅赭色为主，多为素面夹砂。器形有盂、钵、单耳罐、把杯等。遗址北端发现一口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钱约45公斤。在大缸南100米处发现土墙痕迹、石础、烧成木炭碎块的木柱，以及佛像残块、泥塑壁饰、壁画残片等，显然是一处寺庙遗址。初步分析，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似为汉代于阗国的一个府城。遗址西南部台基分布密集地区可能是官衙或贵族居住区；陶窑一带可能是工商业生产区；东北部可能是一般居民点和寺院区。

1958年，在玉珑喀什河东洛浦县城南30公里的阿其克山还发现了陶质鼓风管、烧结铁、敷满赤铁粉末的石凿、石锤以及五铢钱和大历通宝钱等。据此可认为这是一处汉唐时期于阗国的开矿炼铁遗址。

（2）山普拉墓葬

1984年，在和田地区发掘了山普拉墓葬群[③]。墓群分布面积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此次共发掘清理墓葬52座。形制有两类：一类为方形竖穴墓或称方形土坑棚架墓，大都为多人合葬。如1号墓中有133个个体，2号墓中有146个个体，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以中年死者为多，占70%。另一类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多人葬和单人葬，有的以木棺为葬具。木棺有圆形、半圆形、木盆形、船形、梯形、长方形，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俯身直肢和侧身直肢。另在1号和16号墓旁各有一殉马坑。随葬器物丰富，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毛棉丝织物、弓箭以及食品等。出土木器较多，其中用胡杨木挖刻的木盘最多。陶器数量仅次于木器，陶色有黑和浅红两色，器形有单耳小口高颈壶、双耳鼓腹平底罐，黑色陶器上有山形纹和波纹，还发现很少的彩绘陶器。铜器有手镯、耳环、镜和小件装饰片。铁器有镰刀和小刀。毛织物很多，大部分为墓主人随身穿着的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②李遇春：《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1年第1期。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衣服。一般外穿彩色条纹或方格纹毛布衣服。妇女穿裙子，内衣用毛纱或毛罗缝制，衣服边缘往往缝有彩色或绣花的毛绦带。还有毛布缝制的裤子、毡或毛布制作的帽子、毡袜和长、短筒毡靴。随葬品中还有毛织地毯和一块蓝印花棉布，最罕见的珍品是一件彩色缂毛人首马身纹织品。随葬食品有放置于盘内的羊头、羊肉、羊羔，放于死者两腿间的羊前胸，在死者头部有小羊皮袋，内装面粉、炒面、油饼和点心。这批墓葬的时代，经碳十四测定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时期。

3. 阿拉沟竖穴木椁墓

1976~1978 年，先后在乌鲁木齐市南矿区阿拉沟东口发掘 85 座古墓，其中 4 座竖穴木椁墓为最重要[①]。这 4 座墓都有块石封堆，四周以卵石围砌成长方形石围墙。墓圹位于石围墙中部，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室内填石积沙，填石体积巨大。沙石下为木椁，圹底以松木纵横叠置 3~8 层构成高约 1 米的椁室；椁底有的铺圆木；椁顶依次覆盖圆木、木板和苇草。个别的墓内有木棺痕迹。葬式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每墓入葬一或两人，个别人骨架的头骨上有孔径 5 毫米的小钻孔。随葬品以金器居多，较重要者有虎纹圆金牌、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带、虎形方金箔牌，以及各种兽面金饰和各种佩饰等。银器有略近方形、矩形、盾形的银牌。铜器有高足承兽铜方盘，被认为是拜火教的祭祀用品，是典型的塞种文化器物。铁器有小刀、三棱形镞。小铁刀往往与马、羊骨放在一起，可见肉食在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陶器均为细泥红陶，打磨光洁刷酱红色陶衣，器形有小钵、小把杯、筒形带流杯、浅腹盘等。漆器仅存一件胎朽皮存的红漆绘云纹盘，花纹与马王堆汉墓所出的近似，反映了与内地紧密的关系。此外还有珍珠、玛瑙、货贝、木盘、木车模型和绫纹罗织物印痕等。据碳十四测定，这 4 座墓的年代约相当于战国到西汉时期，与漆器的时代基本一致。死者似为当地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

4.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

土墩墓分布于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等县境内。因地面上有圆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多数三五个至二十多个为一组，南北向排列。土墩大小不等，大土墩底周 260 米以上，顶部直径和斜高都在 20 米左右；中土墩底周在 100~150 米之间；小土墩底周不到 50 米，高仅 1 米；但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则基本一致。封土堆内经常发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顶部一般比较平坦，中间下陷成坑；个别的封土表面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士周围环绕方形或圆形的浅沟，大多宽约 1 米，深不过 20~30 厘米。墓室均为土坑竖穴，东西向，南北并行排列。除少数单室墓外，以双室墓或四室墓为主。各墓多有不同规模的木椁结构，个别的还有木棺残迹。葬法有夫妇同室合葬或异室合葬两种，均仰身直肢，头西脚东。葬具仅见一些以毛毡裹尸的残迹，未见棺木。随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葬品一般较贫乏，有些墓只见少量小件器物或无随葬品，但个别大墓的随葬品却较为丰富。如夏台3号大墓，随葬有丝毛织物、金器、骨器、铜器、漆器残片等；棺木侧旁的半月形腰坑中还乱置殉人骨架数具。根据木椁结构和随葬品组合，大体可分为三期①。

早期：木郭结构较为简单。一般以墓圹生土为壁，仅墓口平铺一层原木，有的墓底铺木板，或在墓室四壁下部横置水平方向上下叠压的原木数根，构成一副木框架。陶器手制，形态不规整，器表和口沿内侧饰土红色陶衣。主要器形有罐、钵、碟；个别墓中还出有茧形壶。铁器仅见少量的小刀、锥。

中期：除一部分继承早期的简单木郭之外，新出现完备的木椁室，墓口平铺三层粗厚的原木作顶，原木呈鱼鳞叠压状，其上覆席。四壁有原木构成的椁壁，椁室内四壁隔一定距离立"米"字形交叉木条，椁壁上有铁钉钉挂的毛毡。东西椁壁与生土壁之间有空隙，内填块石。椁底铺原木构成地板，有的残留木棺。陶器质地较细，器形规整，虽仍为手制，但多经刮磨加工，器形除罐、钵外，还有碗、盘、烛台等。铁器较多，除小刀、锥、环首刀外，还发现一件舌形大铁铧，与关中地区的同类器物相近。此外，还有金戒指、金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

晚期：木椁结构与中期同。陶器轮制，制法较中期进步，器形有盆、壶、罐等。

土墩墓的大小有显著差异，随葬品的有无、多寡、贵重程度多有不同，个别大墓腰坑中还有殉人的现象，表明土墩墓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阶级社会。此外，陶器和铁犁铧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并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其中反映与内地有密切关系的遗物，有与秦文化相近的茧形壶，以及与关中地区汉代犁铧及漆器相近的器物。据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推测其为汉代乌孙人的墓葬。

5. 于田城址与墓葬

1994年，在新疆于田县北230公里处发现一处城址，东南距离喀拉墩城址西约41公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维吾尔语称"尤木拉克库姆"，意为"园沙"，被命名为"园沙古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周长995米，南北城垣有城门，门框和门板尚存。城内发现6处建筑遗迹，其建筑形制与楼兰、尼雅等遗址的房屋建筑形制相似。城址周围散布陶片、石器、铜饰件、铁饰件及玻璃珠等。还有大量的野生和家养的动物及鱼类的骨骼，说明畜牧业和渔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房址内散见陶片、麦、粟等谷物，说明也有种植业。在城址周围分布有较密集的渠道，纵横成网，排列有序。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这里是古代扜弥国的所在地。

①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穆舜英、王明哲、王炳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孟凡人：《新疆地区的汉魏遗迹》，《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在城址周围发现6处墓葬，有胡杨树棺葬（将胡杨树掏空为棺）、竖穴土坑树棺葬、竖穴土坑墓、木椁墓等。人骨体质特征明显，深目高鼻，棕色长发，多辫。身着粗、细几何图案的毛布内衣，外着皮衣。有的还戴帽、系腰带。随葬品有少量的陶器、石纺轮、木纺轮、木梳、木碗、铜饰件、铁饰件、玻璃珠等。

园沙城址及其周围墓葬的年代，上限在西汉以前，下限在东汉或其后[①]。

6. 楼兰平台和孤台墓地

两处墓地均位于楼兰古城城郊，年代在西汉至东汉之间[②]。平台墓地发掘5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一座带有长斜坡墓道。葬式有单人葬和多人丛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骨器、绢、钱币、石杯等。陶器有杯、罐、豆形灯；木器有长方形木案；铜器有铜镜、耳饰、五铢钱；铁器有镞、耳饰；骨器有弧形器、耳饰。

孤台墓地发掘墓葬1座，为竖穴土坑丛葬墓，墓口盖木和苇帘，墓底有苇床。墓内埋有8具人骨，均仰身直肢葬。随葬品种类丰富，陶器有杯；木器有盘、杯、梳、篦、弓、箭等；漆器有杯、盖、碗；铁器仅有铁环；骨器有刀形器、弓形器；皮革制品有皮带、皮条；丝织品有锦、绮、绢、刺绣，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长乐光明”、“长寿光明”、“登高望”、“王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毛织品有毛布、缂毛、毯、毡；棉织品均为素色面布。

7. 新疆北部的石人石棺墓

在新疆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石人石棺墓。其中以阿勒泰的克尔木齐、富蕴的可可托海周围和吐尔洪乡、温泉的阿尔卡特草原分布比较密集。1963年，在克尔木齐发掘了32座石棺墓[③]。

墓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单人竖穴石棺墓，墓前立面向东方的石人像。一类为坟院制石棺墓，墓葬地面有用块石或片石围成的长方形石围墙，似乎为一个家族茔区，围墙长宽达数十米。围墙的东部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围墙内往往埋多座石棺墓，形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个别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以数块片石围成象征性的石棺。石棺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长方形石棺长2、宽1米左右，往往以不太规整的片石板竖砌出石棺四壁，高低不齐，较为简陋。方形石棺则形制规整，每边长约2米，以4块巨型花岗岩石板为壁，上部覆盖厚达20厘米的巨石为盖。葬式比较复杂，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较少，个别的还为俯身直肢葬。竖穴土坑墓均有封土，竖穴石棺墓有的则不见封土。封土一般呈圆

①岳峰、于志勇、张铁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岳峰、于志勇、张铁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新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形，有的封堆则用卵石堆成或覆盖卵石。殉人墓约占三分之一，多见于单人葬的大石棺或坟院制的大石棺中，而不见于竖穴土坑墓。殉人一般被肢解埋入，置墓主旁或墓主下，有的上下叠压，有的头骨成行，一般殉数人，多达二十余人。

随葬品较贫乏，放置无规则。平素无纹的石器是一大特色，有罐、钵、把杯、灯、杵、臼、细石镞等。陶器有罐、钵、把杯、灯、镞、俑、杵、臼等，以罐为主。陶器既有手制，也有轮制，质地疏松、夹砂，多素面无纹，个别的器物有几何形划纹和压印波纹。铜器有刀、矛、镞、镜、马具等。铁器有小刀、剑、锛、带扣、钉等。骨器有羊距骨、桃形骨饰、骨带扣等。克尔木齐32座墓的延续时间很长，其上限可早到战国西汉之际，下限似可晚到隋唐。

石人石棺墓是个复杂的问题，从克尔木齐的32座墓来看，其时代前后延续千年左右。在这期间，新疆北部草原地区先后有匈奴、柔然、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及其别种或属部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去一般将石人石棺墓笼统地称为突厥墓似乎不妥当的。因此，加强对这类墓葬的调查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西南地区的汉代遗存

1. 滇池区域的滇墓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①、呈贡天子庙②、江川李家山③、昆明羊甫头④等地，发掘了大量的滇墓。这些墓葬都是土坑墓，地面无封土，坑壁不平整，有的挖在岩石的空隙间。一般有长方形木棺，较大的墓葬使用髹漆木棺。大中型墓以出土青铜器为主，青铜器以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为多，重要的有剑、戈、矛、钺。也有不少生产工具，重要的有锄、斧、镰、锯。青铜器的器形和花纹有强烈的地方民族特色。典型器物有：尖头锄、粗茎剑、空首钺、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动物透雕牌饰、圆盘状牌饰，以及用软玉或石髓制作而成的璧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采用的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曲肢葬、解肢葬、叠葬、合葬等，个别大墓的腰坑中发现有人殉现象。墓葬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期⑥：

第一期，大约相当于战国后期到西汉前期，也有人认为在公元前250至50年之间⑤。这一时期墓葬的随葬品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女性一般随葬纺织工具，不见青铜兵器；男性墓葬随葬铜兵器，不见纺织工具。铜兵器与纺织工具不共存于一墓之中，是第一期墓葬的特点。

---

①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②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谷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

⑤米歇尔·皮拉左里著，吴臻臻译，莫润先校：《滇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⑥黄展岳：《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第二期，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至晚期。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兵器、生活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或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流行铜车马饰，铜铁合制的兵器和工具。常见的有铜柄铁刃长剑、铜銎铁矛、方銎铜斧、小铁削。铜枕、伞盖以及铸有牛形器盖的壶、杯、尊、勺等生活用具已经很少见，而汉式的罐、釜、甑、洗、熏炉明显增多。半两钱、五铢钱取代海贝。漆器、弩机、三棱镞和四叶纹镜、昭明镜等汉式镜也很常见。

第三期，大约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乎绝迹，内地输入的器物占绝对优势。开始流行陶明器随葬，铁制作凹口锄、条形斧、长剑、环首刀，取代铜铁合制器。

第四期，为东汉时期。墓葬形制多样，一类当地人称为“梁堆”，即带有高大封土的墓葬，主要分布于云南东北部、中部及滇西大理、保山等地。其墓主人主要为中央委派的外来官吏和中央政府任命为官吏的地方豪族以及他们的亲属。这类墓的封土高 3~10、直径 10~20 米。少数有墓碑，墓砖流行菱形花纹等。封土之下的墓室随时代早晚而不同，东汉早期延续青铜时代的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东汉中晚期演变为平面呈长方形带墓道的券顶砖室墓，一般为单室，少数有前后室，个别墓葬亦见前室、双后室及带耳室者。随葬品主要有铁刀、铁剑、铜器、铜壶、钱币以及俑、摇钱树、家禽、家畜、水塘水田、房屋、仓、灶、井、釜、甑等陶模型明器。一类为崖墓，主要分布于滇东北。墓室开凿在岩石山陡坡之处，均为带墓道的券顶洞室墓，有单室、前后室和多室之分，墓门以砖封堵。随葬品与“梁堆”墓大体相同，仅少见陶俑，没有摇钱树和水塘水田模型。一类为地面无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大型墓葬带有长斜坡墓道，有木棺、木椁。

2. 黔西北的“夜郎”墓

“夜郎”墓在贵州赫章、威宁境内发掘了 220 多座[①]。墓葬特点表现为：地面无封土，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无墓道，不见砖石墓，规模很小，构筑简单。墓坑一般长 2、宽 1 米左右，最长不超过 3 米，最宽者也不超过 2 米。多数墓葬不见棺木痕迹，只有少数墓葬发现部分朽木或漆皮，可能是棺木葬具的痕迹。多数墓葬的人骨已腐朽无存，有人骨者均为仰身直肢葬。有些墓葬采用二次葬，以纺织物或草席包裹人头，也称为“套头葬”，置于铜鼓、铜釜或铁釜内，不用棺木，不葬死者的躯肢，是当地葬俗的一大特色。由于汉初这一带属于夜郎，汉武帝以后为犍为郡的汉阳县，推测其为夜郎的遗存。

随葬器物一般只有几件陶器，或少量的青铜器、铁器、珠饰品。随葬最多的也只有十多件，小墓和丛葬者则一无所有。陶器以罐类居多，均手制，火候很低，

①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2 期；《赫章可乐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 年第 2 期。

质地多为夹砂陶，少见泥质陶。陶色分红、灰两种，不见黑陶。陶器多素面，有纹饰的陶器多刻划纹，此外还有绳纹、镂空、叶脉纹等。有的陶器口沿、腹部刻划符号，目前所见约40余种，虽然无法识读，但应是文字的雏形。铜器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带有民族特征的锄、剑、戈、矛、釜、鼓、手镯、发钗、条形木梳、牛头形带钩、各种扣饰以及玉石珠饰；另一种是与中原内地相同的弩机、镞、鍪、带钩、镜、半两钱、五铢钱、汉人姓氏的铜印。还有锸、斧、剑、环首刀为主的铁器以及漆器。从随葬的铜铁器比例来看，在已经发掘的夜郎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各类遗物1200多件，其中铜器达400余件，居各类器物之首。在铜器中，大型铜器较少，多系小型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再次是兵器和生产工具。铁器类180余件，种类有锸、钁、铧、刀、剑、釜、削、钎、带钩等，这些铁器的形制大多与中原汉式器物无异。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有镂空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曲棒式铁带钩等。此外，在随葬的陶罐中还发现稻谷、大豆等农作物品种。这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它与滇墓中的小型墓极为相似。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也与滇墓所出相同或近似，说明滇文化遗物在贵州高原西部地区分布甚广。

东汉时期，滇、夜郎故地原有民族特征的遗物全部消失，贵州、云南等地发掘的东汉墓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些东汉墓中，除了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摇钱树等模型明器以外，已普遍流行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随葬井、仓、灶、屋、鸡、狗、侍俑等模型明器和釜、甑、壶、罐、碗等生活用具，与中原和邻近省区的东汉墓已经融为一体

3. 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墓

川西的大石墓在四川省西昌、冕宁、喜德、德昌等县境内发掘了数十座。其构造是在地面上利用巨石砌成墓室，有的在墓门外立大石，有的在墓室上加封土。墓内埋葬人数较多。年龄性别各有不同，尸骨零乱，系分多次葬入。早期墓葬年代在西汉之前，随葬品除大量的粗质陶器外，有剑、镯、环等少量铜器，也有刀、镞等石器。晚期的墓葬年代相当于西汉时期，随葬品中铜器增多，出现了铁器，而石器不再存在，个别墓葬还有汉式铜印。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大石墓可能属于当时的邛都等族。

石棺墓在四川省汶县、理县和茂汶县境内发掘数十座。其构造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砌石成壁，形状如棺。一般多为单人葬，少数为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只有少数陶器，个别的墓葬有许多铜器和铁器，它们都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但也有从中原输入的半两钱。墓葬年代为西汉。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这些墓葬可能属于冉駹族。

四、南越国的墓葬与遗址

1. 南越王墓的发掘

公元前 214 年，任嚣为南海尉，设郡治于番禺并建城。秦末汉初，赵佗继任南海尉，他乘中原战乱据地自立，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王。

1983 年，对位于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眛墓进行了发掘，墓室位于岗顶下深 20 米处，用 500 多块红砂岩大石筑成，是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墓葬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有 3 室，后部有 4 室，共 7 室，墓底铺有木板。全墓长 10.85 米，最宽处 12.5 米。斜坡墓道残长 10.3 米。墓前（南）有放置随葬品的外藏椁。墓主尸骨置于主室中，用一棺一椁盛殓。墓主身穿丝缕玉衣，身佩成组玉佩饰，腰两侧各有铜剑 5 把。出土印章 9 枚，其中"文帝行玺"金印、"帝印"和"赵眛"玉印，确认了墓主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孙子，即第二代南越王赵眛。陵墓中有殉人 15 具。

南越王随葬品共 1000 多件（组），包括有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漆器、丝织衣物，以及牲肉、水产品和水果等。其中青铜器和玉器有不少为国内首见。铜器中有编乐器 3 套，反映汉、楚、越特色的铜鼎 36 件，铜镜 39 件，饰羽人船纹的提筒 9 件，匈奴式浮雕动物纹牌饰 10 件，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 22 件。玉器共 200 多件，除组佩外，还有璧、玉具剑饰、角形杯、高足杯、盖盒、璜、环、带钩等①。

2.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

1995~1997 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广州市中心中山四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石筑方形蓄水池、曲流水渠、回廊散水、砖砌水井等建筑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石、砖、瓦等建筑材料②。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分别于 1995、1997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石筑方形蓄水池与曲流水渠组成的园林水景

砌筑人工园林水景所用的石料是黄白色砂岩石。陂池壁和曲流水渠底部铺石的砌筑方法相同，都是用不规则的砂岩石板拼砌而成。石片完全随石料自然破裂的走向稍微加工即行使用，拼砌时随形就势，并无定制。拼砌后所呈现的视觉效果犹如瓷器的"开片"效果。

蓄水池平面略呈方形，口大底小，底部平坦。揭露部分仅是其西南部，北边和东边分别被楼房所压，其余部分经过了钻探。池口现存南北长 19、东西宽 20 米，池口到池底坡长约 11 米，斜坡 13~15 度。池壁的上部已经遭到后世破坏，仅在南

①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②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 1995 ~ 199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9 期。

坡和西坡处尚存几块平铺石板，推测池子周边以石板作水平铺砌，池底有一层河卵石与碎石。

曲流水渠位于蓄水池的西南面，有弯月状石池、渠陂、石板斜口和排水的木质暗槽等。其走向是由北而南，急转向东连接一个弯月形石池，再朝西蜿蜒曲折，长逾 150 米，横贯整个遗址。石渠底部从东端到西端的水平落差为 75 厘米。水渠的两壁用规格不一的砂岩石块垒砌而成，有方形、条形，也有片状的，大多数修琢略呈梯形，宽边朝里，层层相叠，顶层有收分①。渠底以石板作冰裂纹状的视觉效果进行铺砌，石板上铺满灰黑色的河卵石，河卵石长 15、宽 12 厘米。其间还以 30 厘米大小的黄白色大卵石铺成“之”字形进行点缀。渠底还发现少量龟鳖残骸。

在曲流水渠的东头筑有一个弯月形石池，其外壁（东侧）用石块垒砌成圆弧形，内壁（西侧）即曲流水渠之壁，也呈弧形，整体状如弯月，底部以大石板平铺。石池南北长 7.9、东西宽 5.77 米，现存高 1.5~1.72 米。池中直竖两列巨型石板把石池分隔成三部分；石板外侧各立一根八角石柱，柱头有一凸榫，表明其上部另有构件相接。从池底发现的瓦片等来看，顶上可能有木构架的上盖。

曲流水渠的中段设有两个渠陂，当中相距 32.8 米，由 2 块弧形石板合并成宽 1.1、高 0.21 米的拱桥状，横置于渠底，用以阻水和限水。当流水经过渠陂时形成阻力，掀起波浪，与渠底的灰黑色卵石相映衬，形成粼粼碧波的景象。如果进水闸口关闭，渠陂高出渠底就起了限水作用，渠水仍有蓄水而不至于干涸。

曲流水渠的西端还有一座平桥，由两块大石板并列横跨于渠壁上。桥长 1.8、宽 2.3 米。石板平桥的北侧有步石，尚存 9 块，每石间距 60 厘米。步石长方形，长 57、宽 31、厚 8 厘米。最西端则为出水闸口，内层是一个凿有凹槽的方形石框，以纳木闸板；外层竖置石箅。水闸西接排水木槽，由两块杉木刳出凹槽并合，木槽外宽 70、内宽 44、高 22 厘米，上有木板为盖。

（2）回廊散水

回廊已经塌毁，仅存部分散水，为直角曲尺形。利用长方形素面砖与河卵石铺成斜面状，内侧以砖竖砌作边，外侧设方木。散水之南尚有一段排列比较密集的木桩。散水周围还发现回廊塌毁时散落的大量瓦片、瓦当等建筑材料。

（3）砖砌水井

井壁以扇形砖砌筑，底部铺有石板，井口内径 0.86、深 8.8 米。其修筑程序应当是：择地开凿一个直径 3.3 米的井穴，凿至出泉水处，先铺上一层小石子和细沙，起过滤作用。然后平铺 5 块经过修整的石板，当中一块方形石板，边长 60、厚 6.5 厘米，在方形石板的四周直接续接 4 块石板，方形石板的正中和四边共凿有 5 个出水眼。在砖井壁与井穴之间用纯净的红黄色的山岗土夯筑，把井穴之外的杂

①收分：即逐步收缩减少之意。古代修建墙壁等建筑，常用收分方式，使墙身下宽上窄。

质完全隔断，以保持井水的纯净。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木辘轳和取水用的铁桶，井中填埋有大量砖、瓦、瓦当、焦木、灰烬等，全是南越国时期的遗物，表明该井是南越国灭亡后毁坏的。

参考文献：

穆舜英、王明哲、王炳华:《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乌恩《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遗迹》、孟凡人《新疆地区的汉魏遗存》、黄展岳《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均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482~494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于志勇:《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新疆文物》1998 年第 1 期。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考古

魏晋南北朝考古从3世纪初三国鼎立算起，到6世纪末期隋统一为止，经历了将近4个世纪。在此期间，若干割据政权的存在时间较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和部分汉人的流动、迁徙，特别是统治集团之间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而且加速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边远地区和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隋唐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反映在考古学上文化上：地方特色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边远地区遗迹增多；不少遗迹、遗物突出了军事需求。同时，反映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刻、绘画得到发展，形象地说明这种外来的宗教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分区叙述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考虑这一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地域性较强，本章在论述过程中，主要参照宿白先生为魏晋南北朝考古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①]，将城址与墓葬按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东北地区、新疆地区来论述，而其中的一些可以归纳的遗存，如瓷器、货币与度量衡、简牍、佛教遗迹、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等则放在一起进行论述。

第一节　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指南界淮河，北迄燕山，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这些区域内有一些重要城址，也发现了大量墓葬。

一、重要遗址

（一）城址

中原地区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城址有魏晋及北魏的洛阳城址、魏邺城遗址、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址。这一时期的城址与汉代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魏晋改建邺城、

①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洛阳，重点在集中宫苑衙署和加强西北隅的军事据点。北魏扩建洛阳城和东魏北齐新建邺南城，除了进一步利用旧有的防御设施以外，还扩大并规整了居民区（坊里），调整并对称地安排了工商业区（市），因而都城中人口集中和工商业发达这些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北魏洛阳和北齐时期的邺城都营建了众多的佛寺。有名的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已进行了发掘，北齐邺城的兴圣寺也开始了勘察。

1. 邺城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12.5 公里，南距安阳市区 18 公里，城址包括南北毗连的两个城址。

北邺城的大部分在今漳河以北，北临故漳河。相传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平袁绍后，开始大营此城以为国都。魏文帝即位之后移都洛阳，乃以其为北都，成为曹魏时期的五都之一。十六国时期的后赵（335~350）、冉魏（350~352）、前燕（357~370）均建都于此。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534~577）建都于南邺城，北邺城仍在使用。邺城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先后有六个王朝建都于此，长达 370 余年。

历史上的漳河由于频繁泛滥和改道，北邺城遗址遭到的破坏极为严重，保留在地面的遗迹极少。所以，对此城形制、布局的了解在借助于文献资料的同时，考古钻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同时，由于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35 年，北平研究院曾进行过实地调查；1957 年，俞伟超对邺城进行过调查[①]；1976~1977 年，河北省和临漳县进行过勘探[②]；从 1983 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的邺城考古工作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发掘。1983 年秋至 1984 年主要在北邺城发掘，1985 年开始对南邺城进行勘探[③]。

根据《水经注·漳水注》记载，北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经过实地勘探，东西长 2400、南北宽 1700 米，实际范围小于文献的记载（图一八）。城墙为夯筑，筑墙时先挖基槽，但已全部埋于地下，地面无任何痕迹。经过钻探，南墙已大部分探出，位于漳河北岸，长期被水冲刷，起着河堤的作用。南墙经过发掘的一段宽度为 16.35 米。东墙探出部分，长 1300 米，宽度为 15~18 米，发掘部分宽度为 15.35 米。北墙只探出 350 米长的一段，宽度为 16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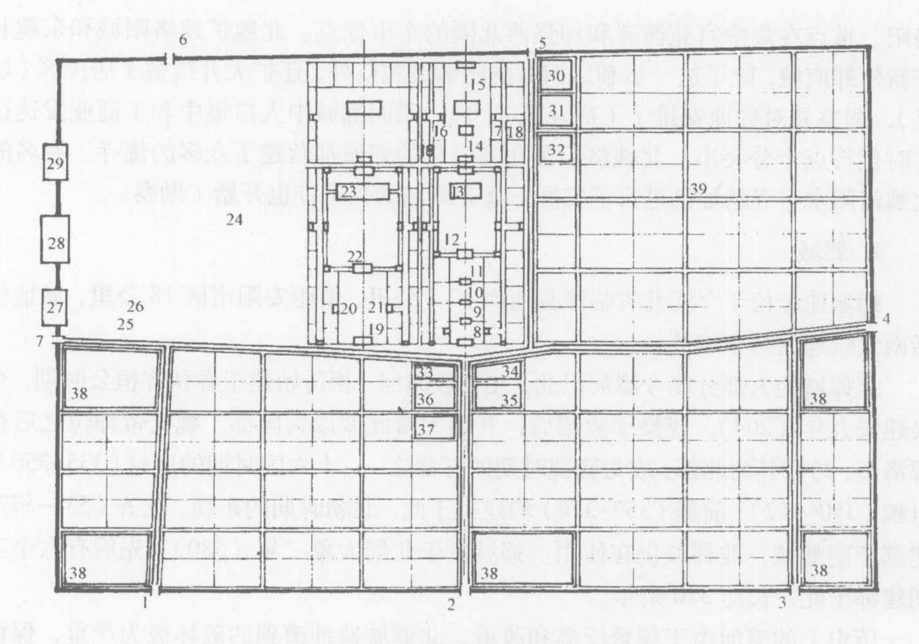
根据《水经注·漳水注》记载，北邺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金明门。”经过钻探，在东墙南距城墙拐角约 800 米处发现了建春门遗址，门道宽 22 米，外有瓮城，但因

---

①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 年第 1 期。

②河北省临漳县文保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 年第 4 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7 期；《河北临漳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 年第 3 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 年第 1 期。



图一八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

1. 凤阳门　6. 厩门　11. 升贤门　16. 木兰坊　21. 长春门　26. 白藏库　31. 宫内大社　36. 御史大夫府
2. 中阳门　7. 金明门　12. 听政殿门　17. 楸梓坊　22. 端门　27. 金虎台　32. 郎中令府　37. 少府卿寺
3. 广阳门　8. 司马门　13. 听政殿　18. 次舍　23. 文昌殿　28. 铜爵台　33. 相国府　38. 军营
4. 建春门　9. 显阳门　14. 温室　19. 南止车门　24. 铜爵园　29. 冰井台　34. 奉常寺　39. 戚里
5. 广德门　10. 宣明门　15. 鸣鹤堂　20. 延秋门　25. 乘黄厩　30. 大理寺　35. 大农寺

未发掘，瓮城年代不详。在北墙发现了广德门遗址，门道宽20米。

经过实地勘探，城内大道也有所了解，共勘探出道路6条。其中东西向大道一条；东西向大道以南，有南北向大道三条；东西向大道以北，有南北向大道两条。东西向大道即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大道，路面宽约13米。东西向大道以南的三条南北大道，分别通过凤阳门、中阳门、广阳门。通过中阳门的大道长730、宽17米，是北邺城内最宽的道路，并且直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应当是北邺城的南北向主干大道。通过凤阳门的大道长800、路面宽13米，发掘之时在道路两旁发现有沟，沟宽0.6~1、深0.55~1.1米。通过广阳门的大道，只探出南北长150米的一段，路面宽也在13米左右。东西向大道以北的两条大道，东面的一条通过广德门，探出长度450米，路面宽约13米。西面的一条仅探出70余米，是否通过厩门尚不能肯定，路面宽10米。由勘探结果可知，北邺城内的道路最宽者为17米，其次为13米，再次为10米，而以13米宽者为主。

经钻探，在东西向大道之北的中央部位，发现十多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大小不等，夯土台基较大者有3处：一处东西长57、南北宽35米；第二处南北长60、东西宽39米；第三处南北长75、东西宽45米。均距地表3.5米以下。这里

推测为北邺城的宫殿区。在宫殿区以西，铜爵（亦作雀）台、金虎台的东北一带，也发现4座夯土台基，其中面积最大者东西长70、南北宽40米。根据《魏都赋》李善注云："文昌殿西有铜爵园"、"铜爵园西有三台"，这一带应是曹魏时期铜爵园的位置所在，后赵时期在此修建九华宫，夯土台基的具体情况有待于发掘证明。在宫殿区以东，发现夯土建筑基址。据《魏都赋》云："亦有戚里，置宫之东。"这一带应当是戚里之所在。另外，在城东南钻探出的夯土建筑基址，很可能是后赵时期的东明观遗址。

经调查，地面上仅存的遗迹就是位于北邺城西北隅的两个夯土台基。经过考证，认为这两个夯土台基是三台中的金虎台和铜爵台。其中南端的金虎台台基呈长方形，南北长120、东西宽71、高12米，顶部有70~80厘米厚的瓦砾堆积。铜爵台在此台之北约83米处，南北长50、东西宽43、高4~6米。根据文献记载，三台中的冰井台约在铜爵台之北85米处，但此台的台基大概早年被漳水冲毁，除满眼白砂之外，别无遗迹可寻。甚至钻探至地下8米，仍然是沙土。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五年（210），冬，作铜爵台。"《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六》引《邺都故事》云，曹操遗命诸子把自己的遗体葬在邺之西岗，要妾伎住在铜爵台上，早晚供食，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唱歌，诸子时时瞻望西陵墓田。金虎台建于建安十八年（213），冰井台建于建安十九年（214）。

根据左思的《魏都赋》等文献的一些具体描述，并结合钻探结果来看，北邺城的布局特点为：（1）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大于南区，以北区为主体。北区中部为宫殿区，宫殿区以东为贵族所居的戚里及官署，以西为苑囿铜爵园，苑内置武库、马厩、仓库。南区大部分为居民里坊，只有少数官署。（2）在全城中轴线的位置上开辟南北干道，南通大城正南门——中阳门，北达宫殿区。整个布局区划明显，交通便利，克服了东汉洛阳城宫殿区分散，东西向交通不便等缺点。这种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时期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3）西城垣中部偏北，以城垣为基础修建金虎、铜爵、冰井三台。这里不仅是饮宴赋诗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的军事作用。它实际上起军事堡垒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因此，曹魏之后，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政权，对三台对加修缮，经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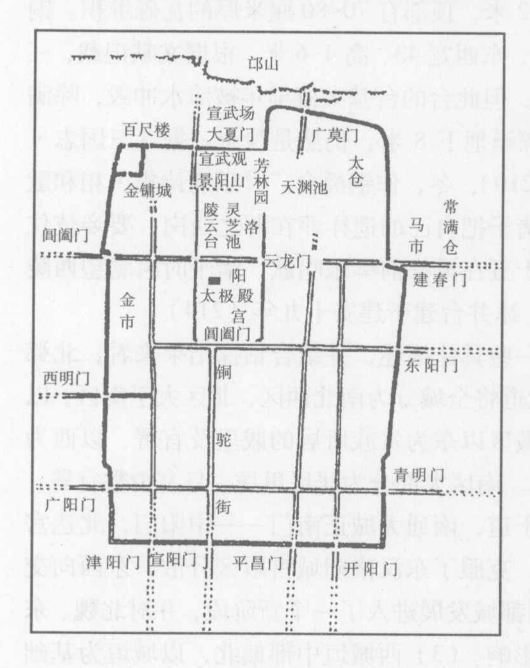
北邺城的这种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宫苑集中于城区北部，而把南部城区划分为一个个居民里，从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布局。这种布局为此后的历代都城所继承，世代相沿成为定式。特别是高耸坚固的"三台"，虎踞于西北城隅，显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魏晋时期洛阳城西北角修建的金镛城，应当是这种做法的延续。

东魏、北齐的南邺城则是参考了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并利用了曹魏北邺城的南垣向南营建的新都城。据文献记载，南邺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八里六十步，

东西宽六里。经过钻探，南北长约 3600、东西宽约 2800 米，城内布局与北邺城相似，城外侧筑有马面，东南角和西南角为圆角，体现了该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共有 14 座城门，东西城墙各 4 座，南北城墙各 3 座。南面正门朱明门经过发掘，有双阙存在。其布局大体继承了北魏洛阳内城和北邺城的形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2. 魏晋洛阳城址

220 年，曹丕代汉，舍弃为魏王时的都城邺城而定都洛阳，而这时的洛阳已经十分残破。魏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在政治上表明魏是汉王朝的继承者，二是洛阳地处中原，更利于南平吴蜀的活动。



图一九　魏晋洛阳城复原示意图

根据调查发掘并结合文献记载，得知魏晋洛阳城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魏晋改建洛阳城，重点加强了西北隅的军事据点（图一九）。魏明帝曹睿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部筑建金虎台、铜爵台、冰井台等三台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修建了金镛城。金镛城北依邙山，地势高亢，可以俯瞰洛阳全城，具有制高点的作用，实际上是一座军事堡垒，时称“洛阳堡”。经过勘查得知，金镛城始筑于曹魏时期，由 3 座南北毗邻的小城组成，彼此有门道相通，总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 1048 米（一说 1080 米），东西宽约 255 米（一说 250 米），总面积 26 万平方米。城墙夯筑而成，墙宽 12~13 米。共有城门 8 座：最北一城，西墙和南墙各一门；中间一城，西墙二门；南面一城，四面各开一门。各门的豁口狭窄，均为 1 个门洞。城内发现 20 余处夯筑台基及一些道路、水池遗迹。

关于魏晋时期洛阳城的宫殿问题，究竟是废弃了东汉时期的南宫，实行了单一的宫城制度，还是继续东汉洛阳城的南北宫城之制，目前尚不能完全肯定。

另外，由于魏晋时期战争频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洛阳城的西、北城墙外壁及金镛城的外壁设置了许多墩台，其形制和效用如同后来的“马面”[①]，这是

①马面：凸出城墙外部的方形或长方形建筑，其修建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防御观察范围，增强防御能力。

目前所见的我国内地古代城址中最早的马面实物，是中国古代城制上的伟大创举。洛阳城西、北城墙共计发现马面 7 座：西墙北段 4 座，北墙东段 3 座，间距约 110~120 米。平面形制均为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 19.5 米×12.5 米，小的 18.3 米×8.3 米。金镛城外马面多数已毁，仅存 11 座，形制与前者相似。这些马面是魏晋时期所筑，个别的在北魏时期曾以小砖修葺加固。

1984 年，对洛阳城北城墙一号马面进行了发掘，取得了有关马面建筑的较为完整的资料。马面依城墙而建，平面略呈方形，通体夯筑，现存夯土厚度 4.4 米，由基础和地上两部分构成。基础部分在原地挖出口大底小的方形基槽，然后逐层夯筑而成。基槽分别打破了汉代和魏晋时期地层。地上部分在基础之上逐层版筑而成，并由基础部分的东、北、西三面分别向内收缩 0.6~1.3 米，现存高度 2.1 米。马面周壁未见包砌砖石的痕迹。从发掘情况来看，一号马面始建于魏晋时期，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大约已遭到较严重的破坏，所以，北魏营建洛阳的过程中，在加宽城墙的同时，又以修削过的马面为中心，重新建筑了马面，新建之马面较之魏晋旧物更为高大、雄伟①。

3. 北魏洛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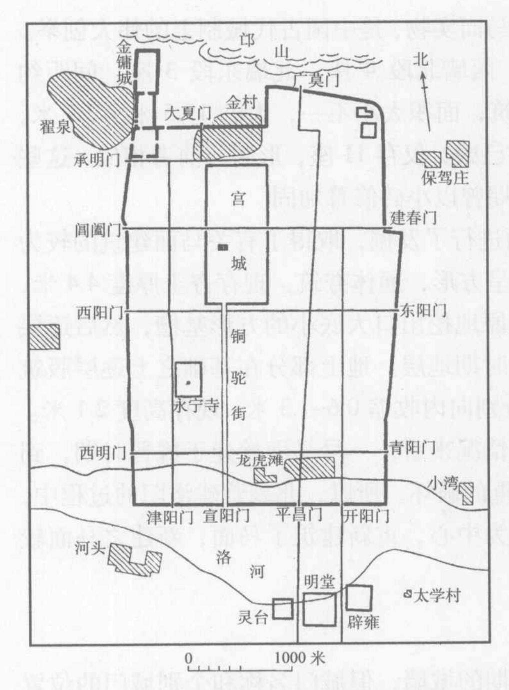
北魏洛阳城仍然利用东汉、魏晋时期的城墙，但城门名称和个别城门的位置有所变化，而最大变化是对城的布局进行了重大改造。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变化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根据勘探得知，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微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宫城遗址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其中东、南、西三面城墙保存尚好，北面已经无迹可寻。东西墙长 1400、南北墙长 660 米，面积为大城的十分之一。正殿为太极殿，位于宫城的前部，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正对。已经探出四座宫城城门，南面和东面各 1 座，西面 2 座。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道豁口宽达 46 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西墙南起第一门，位于西墙中部稍微偏北处，与宫城东门东西相对，门道宽 25 米，门外筑有双阙，应是宫城的西墙正门（图二〇）。

宫城内殿址密集，已经发现的夯土台基有二三十处，主要殿基均建于阊阖门以北的南北中轴线上。正对阊阖门的一座长方形殿基，东西长约 100、南北宽约 60 米，基址高出地面约 4 米，周围有成组的殿基拱卫，当是宫城中主体建筑。

由于宫城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许多街道也有许多变更，目前共探出街道 8 条，东西向横街 4 条，南北向纵街 4 条。也由于南宫的废弃，在广莫门—平昌门之间有了一条纵贯全城南北的大街。在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是朝会之所，北半部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 8 期。



图二〇　北魏洛阳城平面示意图

为寝宫所在。东西向大街西阳门—东阳门大街从宫城南墙外通过，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面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囿，南面则分布着官署、寺院、贵族的宅邸。又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的宣阳门相对，所以，阊阖门至宣阳门之间的大街——铜驼街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在其两侧分布有宗庙、社稷、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有名的永宁寺就在铜驼街的西侧。经过考古钻探，沿铜驼街两侧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台基，大约就是这些建筑的旧基。

城门的位置和名称有些发生了变化，在西、北、东三面城墙共计探出城门 10 座：西墙 5 座、北墙 2 座、东墙 3 座。

西墙自南而北依次为：北魏的西明门（汉、魏、晋时期的广阳门）；北魏的西阳门（东汉的雍门，魏、晋时期的西明门，北魏时期废弃，在其旧址北移约 500 米，新建西阳门）；魏、晋、北魏的阊阖门（东汉的上西门）；北魏的承明门（北魏新建）。

北墙自西而东依次为：魏、晋、北魏时期的大夏门（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时期的广莫门（东汉的谷门）。

东墙自北而南依次为：魏、晋、北魏时期的建春门（东汉的上东门）；魏、晋、北魏时期的东阳门（东汉的中东门）；北魏时期的青阳门（东汉的望京门，魏、晋时期的清明门）。

南墙已被冲毁，根据《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北魏时期的城门自东而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汉的平门）、宣阳门（汉的小苑门）、津阳门（汉的津门）。

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遗址是大夏门，城门豁口内曾发现两道土墙，暗示其原来有三个门道，其他城门均为一个门道。在东西墙的一些城门外还发现夯筑的双阙遗址。

北魏洛阳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外郭城的修建，同时还修缮了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墙[①]。根据文献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在整个外郭城内划分出 320 个方形的坊，每坊四周筑有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 8 期。

坊墙，每边长 300 步，合当时的一里。这样，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以外，位置在宫城以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面朝后市”的传统。

洛阳城内遍布佛教寺院。在北魏迁洛时即安排了佛寺，开都城设计的前所未有的先例；孝文帝以后，由于北魏政府任命的管理佛教事务的沙门统带头破坏禁令，洛阳城内的寺院急剧发展。据《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北魏晚期洛阳城内的寺院竟然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有的里坊如建阳里竟然兴建了10座寺院。

综上所述，北魏落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较，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开创了先例。

（二）矿冶遗址

现已发现的冶铸遗址，多分布在东距洛阳不远的晋南、豫西地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山西运城洞沟铜矿的矿洞；一处是渑池铸铁作坊遗址。

1. 运城洞沟铜矿

山西运城洞沟铜矿的矿洞有东汉光和二年（179）、中平三年（185）刻铭，紧接中平三年后有魏甘露纪年（256~259）刻铭，可知此处铜矿到魏末仍在开采[①]。因此，矿洞内发现的铁锤、铁钎等采矿工具和炼制的铜锭等遗物，以及矿洞附近分布的冶炼遗址，都有可能是魏晋时代的遗迹。

2. 渑池冶铁作坊遗址

渑池冶铁作坊遗址位于河南渑池车站南侧，涧河的北岸，属于东汉至北朝时期的冶铁作坊遗址[②]。遗址南北长 250、东西宽 220 米。在遗址北侧，发现一处大约为北魏时期的铁器窖藏。坑为圆形袋状，其中共有铁器 4195 件，内有铁范 152 件，器类 60 种以上。最多的是农具，其次是手工业工具和兵器。其中有近 300 件铸有产地铭文，较多的铭文具有魏晋字体的特征。

铁范 152 件，其中包括铁板范、双柄犁范、犁范、锸范、镞范、斧范、镰范、锤范、碗形器范、锄形器范等。部分铁范上铸有铭文，如“渑”、“津”、“阳成”、“周左”、“渑左”、“渑池右”等。

铁器 4043 件，包括手工工具、农具、兵器、生活用具及其他。其中手工工具和机械构件有铁钻、锤、鼓风管、六角承、圆承、凹字形承、铁齿轮、尖刃斧、夯头、凿、小锛等。农具有双柄犁、犁镜、犁铧、耧铧、镢、镰、锸、锄等。其中犁铧最多，共出土 1101 件。很多农具铸有铭文，大部分为产地，如“渑左”、“渑右”、“新安”、“新安左”、“夏阳”、“绛邑冶右”等。兵器有斧、镞、矛、剑、镦等，其中斧最多，达 431 件。生活用具及其他器具有釜、鏊、甑、灯、案形器、炙炉、铁权、车饰、网坠等。

---

①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1962 年第 10 期。

②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 8 期。

铁材共出土750公斤，都是白口铁，其形状一种是三角形铁锭，一种是圆形铁饼，还出土铁质很差的渣块烧结铁。

铭文中的地名，均涉及当时的官冶作坊，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渑池在西汉就驻铁官，后赵时期继续建立官营冶铁业。新安在汉代属弘农郡，渑池铁官兼管新安作坊。夏阳，今陕西韩城，汉代在此设铁官，直到南北朝。这些都是规模较大的冶铁之所。绛邑，今山西曲沃。阳城，今登封告城。这些铭文反映了这批铁器主要来自渑池、新安、韩城、曲沃、登封等地。

经化验和研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钢制农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如528号"新安"镰和277号"黾口口"斧（口为"某某"），是由白口铁铸件[①]脱碳而成钢，并对刃口采取了渗碳硬化工艺；又如420号"新安"铧范，已接近现代高强度铸铁的低硅灰口铁铸件[②]；还有257号"陵右"斧的銎部，发现了可以代替锻钢的类似现代球墨铸铁[③]的球墨组织等。这类高水平的冶铸技术，虽然在汉代多已出现，但渑池窖藏进一步表明魏晋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推广。冶铸技术的提高，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得传统的铜兵器绝大部分为铁兵器所取代。铁制身甲的完备与流行、马铠的使用等都出现在这时期，显然不是偶然的。

魏晋时期完成的三门峡人门左岸栈道和重修汉中褒斜栈道以及北魏大事兴建褒斜工程，还有北魏以来大规模开山凿窟和细密流畅的石刻线雕的盛行，更与当时大量生产锋锐的铁工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帝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朝代更迭频繁，先后即位的皇帝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皇帝陵墓的发现和研究，与秦汉、隋唐时期的帝陵研究比较起来，尚处于初步阶段。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帝陵位置的确认。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战乱导致社会凋敝，形成"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局面，已经没有西汉时期那么强大的经济能力修建规模巨大的帝陵了。另外，在曹魏时期，盗掘墓葬成风，甚至设置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负责挖掘大墓来解决军费等问题。由于墓葬大量被盗掘，使得人们对于厚葬产生恐惧心理。出于对墓葬的保护，曹魏政权大力提倡薄葬。由于曹氏政权崇尚节俭，讲究薄葬，没有修建像汉代帝陵那样大规模的帝陵。从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状况来看，魏晋时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后来的司马氏政权继承了曹魏时期薄葬的政策，也大量实行薄葬。经过调查和发掘

①白口铸铁：不含石墨的铸铁。所有碳分，除微量溶于铁外，都呈化合碳状态，主要呈碳化三铁的形式。因断口近乎白色而得名。

②灰口铸铁：含有石墨的铸铁，其中的碳分主要呈石墨形式。因为断口呈深灰色而得名。这种铸铁有优良的铸造、切削、耐磨、润滑、消振等性能。

③球墨铸铁：一种具有优良机械性能的灰铸铁。一般在浇注前，在内铁液中加入少量球化剂（通常为镁、稀土镁合金或主要含铈的稀土合金）和孕育剂（通常为硅铁），使凝固后在铸铁中形成球状石墨，其强度和韧性比其他铸铁为高。有时可以替代锻钢和铸钢。

的帝陵仅有几座。

（一）西晋陵

西晋帝陵位于洛阳邙山，共计有5陵。山南自东而西为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晋惠帝司马衷的太阳陵，山北为晋宣帝司马懿的高阳陵和晋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在这5座帝陵之中，只有峻阳、太阳二陵是晋立国后所建，其余都是在曹魏时以臣礼下葬，入晋后才改为陵的。通过钻探得知，司马昭的崇阳陵和司马炎的峻阳陵，都是依山面南而建，各为一大陵区①。

崇阳陵区有墓葬5座，均坐北朝南，其中1号墓位于墓地最东端，居尊位，推测为司马昭的崇阳陵。

峻阳陵陵区有墓葬23座，均坐北朝南。墓地内墓葬布局主次分明，排列有序，显示出死者生前的尊卑关系。推测这处被当地人称为“峻陵儿”的墓地，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所在地。

从这两座帝陵的情况来看，西晋帝陵都位于陵区的东端，都是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司马昭的崇阳陵墓道长46、宽11米，室墓长4.5、宽3.7、高2.5米。周围有陵垣的遗迹，其中东垣长384、北垣长330、西垣长330米，南垣已无迹可寻。其形状为北窄南宽的梯形，南北最长约400、最宽约250米。还发现与守卫帝陵有关的遗址两处。司马炎峻阳陵墓道长36、宽10.5米，墓室长5.5、宽3、高2米。未发现陵垣遗迹，推测可能在修建之时就未建陵垣。

（二）北魏陵

北魏早期的帝王死后都葬于盛乐的金陵，具体地点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盛乐是北魏早期都城。根据《北史》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赐六年（409）葬于盛乐金陵。此后葬于金陵的北魏皇帝还有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太子、文成帝拓跋睿等。平城时期，葬在大同的有文明太皇太后永固陵，陵之东北有高祖孝文帝为自己修建的寿宫——万年堂②。

孝文帝迁洛之后的诸位皇帝的陵墓多位于洛阳以北至邙山一带。据1946年出土的文昭皇后墓志推测，河南孟津官庄村东之大冢就是北魏孝文帝长陵；根据近年来出土的十余方墓志均言葬景陵，据其可推测洛阳邙山乡望朝岭村至冢头村一带的大冢，就是宣武帝的景陵；邙山乡上砦村南的大冢就是孝庄帝的静陵；长陵、景陵以东15公里的太仓村东北、西山头村一带即是孝明帝的定陵③。通过调查和发掘的北魏帝陵主要有永固陵、万年堂、长陵、景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②为了表述方便和系统性，将属于北方地区的平城时期文明太皇太后的永固陵和为孝文帝所建的万年堂也纳入本节。

③郭建邦：《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及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1. 永固陵

1976年，在山西大同市北25公里西寺儿梁山（古名方山）的南部，清理发掘了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永固陵”[①]。冯氏的陵墓自北魏太和五年（481）开始修建，历时八年，至太和十四年（490）入葬。现存封土高大，坐北向南，底边略呈方形，上部呈圆形，南北长117、东西宽124、高22.87米。俗称“祁皇坟”。在封土之南约600米处，现存一处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遗址，分布有柱础、砖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原来树碑用的石龟趺。这里可能是文献上记载的“永固石室”的遗址。这种在陵前建石殿的做法，是对东汉旧制的延续。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记载：“（齐高帝建元三年，482）夏，四月，魏主如方山。冯太后乐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是，不须祔山陵也。’乃为太后作寿陵，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上，欲以为庙。”又据《水经注·漯水注》记载：“方山西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两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在该处建筑之南约200米处，有一处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应当是文献中所言的思远灵图的遗迹。

墓室砖筑，建于封土的正中，由墓道、前、后两室以及甬道组成，全墓总长23.5米。主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4、东西宽6.83米。四壁微向外凸呈弧形，向上内收成四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雕刻莲花图案的白砂石。南壁开门，以券顶甬道与前室相连，甬道前后两端各安有一道石门。石门两侧龛柱雕饰精美，各浮雕一个手捧莲蕾面带笑容的赤足童子，体态丰腴，衣带飘飞，高约37厘米。童子下方，又各雕一口衔宝珠的长尾孔雀。石门礅雕作虎头状，造型浑厚有力。前室券顶，平面呈长方形，长4.2、宽3.85、高3.9米，地面还保留有部分铺地方砖。其前接墓道，墓道左右两壁石砌而成，长5.9、宽5.1、高5米。

此墓早年屡遭盗掘破坏，至今墓内还保留有金正隆和大定年间盗掘时留下的题记，随葬品所剩无几，只清理出一些残石俑、铁矛、铁镞、铜簪、玻璃小环等物和一些陶器残片。

冯氏陵墓工程浩大，一方面可能与其长期执掌朝政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魏礼制的特殊性。拓跋氏原始残迹保存极为严重，母系家族特殊权势长期存在，这也是冯氏陵墓制度超越常规的原因。另外，冯氏陵园的布局富有佛教色彩，特别是把陵园与佛寺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对北朝晚期统治集团陵墓的影响很大[②]。

---

①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②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2. 万年堂

万年堂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虚宫”，位于永固陵的北面，两者相距不足1公里。《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号曰‘万年堂’云。”封土高约13米，上部为圆形，底部基座呈方形，边长约60米。墓室为砖筑，主室平面近方形，长5.69、宽5.68米，顶部四角攒尖，顶部中心嵌有一块雕刻莲花纹的白石。主室前有拱券顶甬道与前室相连，甬道已经遭到破坏，残长10多米，宽2.46、高2.51米。甬道之中原设有前后两道石门，但已残毁，在一段残存的门框上浮雕有手握剑的武士图像。前室及墓道均在盗墓时被破坏，已被拆毁。

3. 长陵

孝文帝长陵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第一代帝陵，位于河南省孟津县朝阳乡官庄乡东约0.8公里，地处洛阳北面的邙山之巅，瀍河的西岸。陵园坐落在一个大致东南—西北走向的黄土山梁上，中部高隆，四周低矮，起伏平缓。海拔高度270~277.5米。在地面上保留有一大一小两个封土堆。1946年2月，教文帝文昭皇后的墓志从小冢中被盗掘出土，根据其出土位置和内容确定了长陵的位置。1958年，对长陵进行了最初的调查。2004年进行了调查和钻探，这是目前最为详细的一次调查[①]，为进一步了解北魏时期的帝陵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长陵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443、南北宽390米，面积17万平方米。陵园四周构筑有夯土墙，墙中央设门，外侧开挖壕沟。墙宽2~3.8、残存厚度0.1~1.6米。墙外侧的壕沟与墙垣相距0.5~3米，断面呈梯形，宽2~4、深0.2~1.8米。经过考古钻探，发现了西门、南门遗址，其中南门遗址保存相对较好，为三门道结构。

陵园之内有2座封土，属于异穴合葬。孝文帝的大冢位于陵园中轴线偏北部，平面呈圆形，现存最大直径103、高约21米。夯土筑成，夯层厚约10厘米。封土外侧下叠压一条环形夯土沟，外缘直径111.5、宽1.5~3.5、深0.1~0.4米。

墓道南向，为长斜坡式，完全覆盖在封土堆之下。封土南侧21米处有1对对称的石礅，为石像生的基座。再向南46米处，有2对对称分布的长条形竖穴土坑。从墓道、石礅、方坑在一条中轴线上的情况来看，这里应当是原来的神道位置。

陵园内的小冢即文昭皇后陵，位于孝文帝陵西北约106米，平面呈圆形，现存封土直径42、高约15米。封土南侧发现长斜坡墓道，一部分墓道叠压在封土堆之下，一部分没有被封土堆叠压，没有发现明显的神道遗迹。据文献记载，文昭皇后陵名终宁陵。

在陵园之内2座封土堆之东南方向约60~90米附近，发现3处建筑基址，其

①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工作报告》，《文物》2005年第7期。

中孝文帝陵封土堆东南发现 1 处，文昭皇后陵封土堆东南发现 2 处。这些建筑基址平面形状不规则，应当与祭祀有关。

4. 景陵

宣武帝景陵位于洛阳邙山乡望朝岭村至冢头村一带，具体位置在长陵之南，也即旧传之“汉冲帝冢”。1991 年对其进行了发掘①。

景陵封土堆平面略呈圆形，平顶，直径 105~110 米，现存高度 24 米。封土堆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 10~15 厘米，也有超过 20 厘米者。陵墓墓道和墓室全部覆盖在封土堆之下。在封土堆之南约 10 米的墓道延长线西侧，发现 1 尊连座高 2.89 米，身穿广袖长袍双手拄剑的武士像。

陵墓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前后室组成，全长 54.8 米。甬道内设置三道封门墙，并有一重石门。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为四角攒尖式，高 9.3 米。墓室壁厚 2.9 米，结构严密，十分坚固。地面铺砌石板，西侧壁下为石棺床。由于盗扰严重，出土物较少，主要有方形四足砚、龙柄盘口壶、四系盘口壶、钵、唾盂等青瓷器，其中具有南方风格的青瓷器，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方关系有重要意义。

北魏帝陵制度也散见于文献记载，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诏，涉及当时的帝陵制度：“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掩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后广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余外事，有所不从……”。

通过对永固陵、万年堂、长陵、景陵的调查发掘，可知北魏时期帝陵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1）陵墓的构筑为砖石结构，建筑材料使用制作精良的青砖和雕刻精美的石材。（2）陵墓封土前后有所变化，永固陵的封土为方形，万年堂的封土上部为圆形，基座为方形，而长陵、景陵的封土则为圆形。（3）均由墓道、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4）墓室壁面均无壁画。（5）随葬品主要为陶、瓷、铜、铁质地的器物以及小件装饰品。（6）洛阳北魏帝陵的兆域之内，集中埋葬了许多拓跋鲜卑贵族。此外还葬有曾经与拓跋氏同属于一个大氏族的帝室十姓的贵族，以及同属一个联盟的兄弟氏族的死者。这是鲜卑族族葬之风的反映。与汉代帝陵以文武大臣陪葬的习俗有所不同。（7）设置方形陵园，陵园之内采用异穴合葬，应当是受了汉代帝陵的影响。（8）由早期的墓门雕刻武士或在墓内随葬武士像，到了晚期演变为在陵前树立石像生。（9）根据文献记载，北魏统治者每临大事都要谒陵，陵园之内应当有较大规模的祠庙建筑②。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 年第 9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 年第 9 期。

（三）西魏永陵

西魏永陵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留古镇东南 3 公里的黄土台塬上，是西魏文帝与皇后的合葬陵墓。2004 年 4~7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永陵范围、规模及陵园建制、布局等进行了调查与钻探。钻探资料表明，永陵陵区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开挖壕沟，东西壕沟长 560 余米，南北壕沟长 370 余米。陵墓位于陵区中部偏北，坐北朝南，神道长约 597、宽 1.6~3.3 米，在神道两侧残留有石虎等石刻。另外，在陵区还发现 20 余处建筑基址。

（四）北周武帝孝陵

北周武帝（北周第三个皇帝宇文邕）孝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 1000 米处，属于渭水与泾水之间的黄土塬区北部，海拔 470 米，地势高亢，平坦开阔。1994 年 9 月~1995 年 1 月进行了发掘清理，并确认是武帝和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①。武帝在临终之时，遗诏说："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通过对孝陵进行发掘和钻探，没有发现封土堆、陵前石刻、陵寝建筑等遗迹，可见武帝孝陵就是按照其遗诏行事的。

孝陵坐北向南，全长 68.4 米，由长斜坡墓道、5 个过洞、5 个天井、4 个壁龛以及甬道、土洞式单室组成。不论是从结构还是规模而言，与一般北周时期的大型墓葬没有大的区别。

1. 墓道：呈斜坡状，系由原地面直接下挖而成，上部开口大体呈长方形，南端宽 2.8 米，北端宽 2.6 米，两壁基本垂直，其中填土经过夯打，并夹杂有少量砖渣，还发现砖质残夯头 2 件、铁镞 1 件、釉陶球 1 件。填土的上下部分夯打程度有所不同，距离开口 1.5 米以下的填土基本看不出夯层，距离开口 1.5 米以上的夯层厚度 20~28 厘米。

2. 过洞：5 个过洞，均为拱形土洞，较墓道、天井要窄，宽度在 1.9~2.1 米。第一过洞最长，长 3.3 米，其余过洞长度在 2.6~2.9 米之间。由于第一至第三过洞顶部坍塌，高度不详，第四、五过洞顶部保存较好，高度在 2.1 米。

3. 天井：5 个天井，平面均呈长方形，但天井四壁不完全垂直，一般为东西向口窄底宽、南北向口长底短。如第一天井，口部南北长 2.9 米、东西宽 2.5 米；底部南北长 2.8、东西宽 2.75 米。

4. 壁龛：4 个，分别设置在第四、五天井的东西两壁，两两相对，各龛大小不同，龛门均以土坯封堵。

5. 甬道：南北长 3.9 米，甬道口外砌有土坯封门。以中间的木门为界，可分为内外两段。外段呈斜坡状，宽 1.6 米；内段地面平直，宽 1.7 米。甬道因盗洞而坍塌，原高度不详，推测不低于 2.1 米。地面用砖铺砌成人字形，原来涂有红颜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2 期。

色。木门仅余门槛、门砧，门槛长 1.9 米，东西两端分别插进甬道墙壁上开挖的方洞内。

6. 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北壁有后龛，南北长 5.5、东西宽 3.8 米。地面用条砖铺砌成斜人字形，顶部坍塌，原高度不详，西、北两壁残高 1.3 米。墓室东西两侧分别发现棺椁残痕，其中西侧棺椁痕迹比较清楚，椁痕南北长 3.0、东西宽 1.54 米；棺痕南北长 2.24~2.43、东西宽 0.95 米。后龛在北壁中部偏东，平面呈梯形，前小后大，地面未铺砖，龛前口宽 1.96、后壁宽 2.36、周壁残高 1.3 米。龛内中部偏北发现木箱朽痕，长 1.28、宽 0.97 米。在朽痕范围内清理出龙首柄三足铜鐎斗等。

7. 随葬品：由于多次被盗掘，出土物遭到很大的破坏，主要有陶俑、模型明器、陶器、铜器、玉器、金器、印玺、志石。

陶俑有笼冠俑、小冠俑、风帽俑、兜鍪甲士俑、侍女俑、镇墓武士俑、持箕俑、踏碓俑、鸡、狗。陶器包括各类造型的陶罐，模型明器有井、灶、仓、磨、碓。铜器有鐎斗、带具（带扣、带銙）。玉器有佩、璜、嵌珠，可知其身着朝服而葬。金器有金花、金花瓣、金套管、金印玺。其中的“天元太后之玺”，金质，玺与纽分模合铸，榫卯镶嵌而成。麒麟纽、阳刻篆书。边长 4.45、宽 4.55、通高 4.7 厘米，总重 802.56 克。

墓志两方，一方为周武帝的志石，一方为其皇后阿史那氏的志石。“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志石，石灰岩质，正方体，志盖为盝顶斜刹，文字为阳刻篆书。志石边长 0.85、志石厚 0.11、志盖厚 0.14 米。“周武德皇后志铭”志石，四边无纹饰，志面阴刻楷书 7 行，满行 7 字，共计 48 字：“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廿三日乙（甲）未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徂谥曰武德皇后其月廿九日壬寅合葬于孝陵。”其中的乙未的“乙”，后被改刻成“甲”。

三、墓葬

中原地区魏晋北朝墓葬依据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一般分为曹魏、西晋（即 3 世纪~4 世纪初）、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以前（即 4 世纪初~5 世纪末）和北魏迁洛以后至北齐、北周（即 5 世纪末~6 世纪 80 年代）三个时期[①]。

第一期：曹魏、西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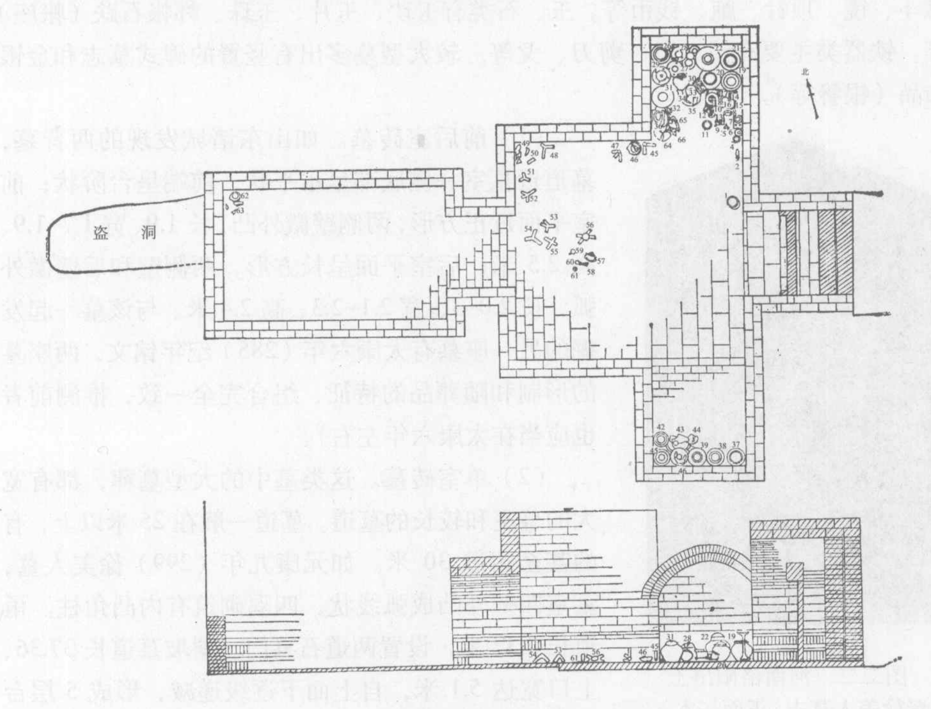
1. 曹魏时期

曹魏墓发现较少。但从已经发现的墓葬来看，曹魏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多室砖墓，与东汉晚期墓葬接近，一般有前后两室，前室近方形，设置有左右两个耳室，耳室之内放置陶器；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前后室之间以甬道相连；前室之前有甬道和长斜坡墓道。这种平面布局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形式。总体上而言，比东汉时期有所简化。

---

①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在洛阳涧西16工区发现前后室砖墓1座，由长斜坡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斜坡墓道长23.5米；前室为方形，地面用大砖铺地，由于顶部塌陷，结构不明，长3.38、宽3.25米，出土有曹魏正始八年（247）铭的一套铁帐架（帐钩），左右各设一个耳室，耳室内多贮陶器；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券顶，长3.2、宽1.95米，为棺室；连接前后室之间的甬道长1.02、宽1.06、高1.36米。前室之前的甬道长1.62、宽1.26、高1.88米，正中安装一道青石门（图二一）。左侧耳室出土陶俑、陶磨、陶井、猪圈、家畜家禽模型，右侧耳室出土带盖陶罐，陶器之外还出土有铜器（鋗[1]、熏炉）、铁器（灯、帐架等）、玉器（杯等）、漆器等。该墓形制与东汉晚期墓相似，出土的器物如四横耳陶罐、陶灶和陶侍俑等已多似西晋墓，可能是一座接近西晋的晚期曹魏墓[2]。



图二一　曹魏正始八年墓葬平、剖面图

在河南偃师杏园村也发现1座曹魏时期的墓葬（M6），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前后室平面均呈较窄的长方形，前室两侧设有耳室。随葬的陶器有壶、鼎、奁、案、盆、盘、耳杯及仓、灶、猪圈、鸡等模型明器。其年代与前述正始八年之墓年代相当[3]。

①鋗：音 xuan，盆形平底有环的小锅子。

②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2. 西晋时期

西晋时期墓葬在其都城洛阳附近多有发现，在山东、河北南部、陕西和北京地区也有不少发现。从目前已经发掘的西晋墓葬来看，主要有前后室砖墓、前后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这几类，也有一些竖穴土坑墓。一般都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几部分组成。有的墓葬在甬道之中还设置石门。总体上来看，西晋时期墓葬由多室向单室过渡，所以，单室墓特别是方形单室砖墓更为流行。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玉器、铁器等，而以陶器为主。陶器类有帐座、釉陶小罐、盘口壶、空柱盆、槅（多子盒）、牛车、镇墓兽、武士俑和男女侍俑、家畜家禽俑、模型器（井、仓、灶、磨）等。铜器类主要有鋗、弩机、带钩、透雕铜扣、鐎斗、镜、顶针、甗、钱币等。玉、石类有玉玦、玉片、玉珠、帏帐石趺（帐座）等。铁器类主要有镜、刀、剪刀、戈等。较大型墓多出有竖置的碑式墓志和金银饰品（银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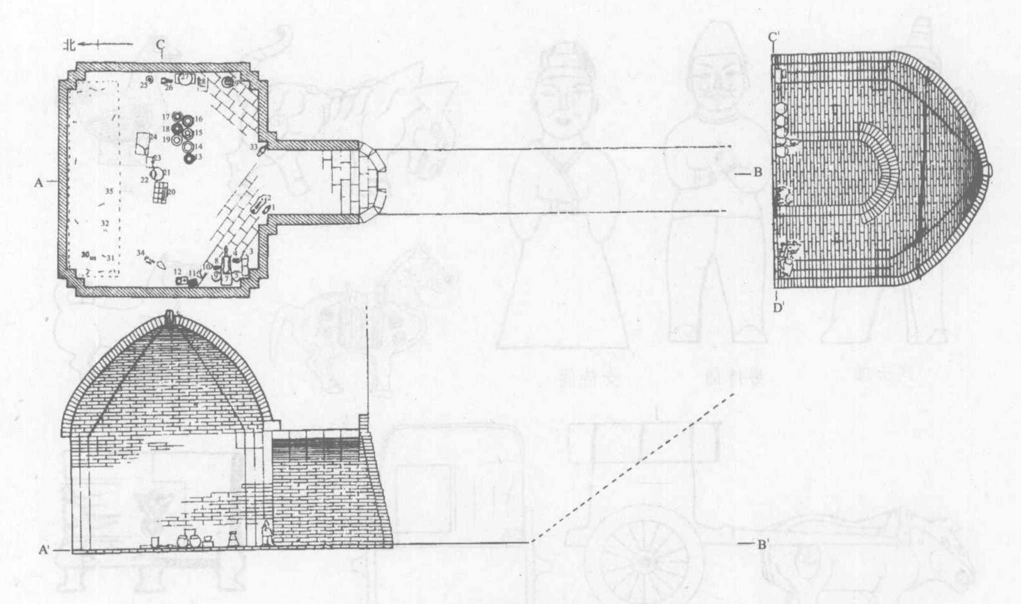
图二二　河南洛阳出土西晋徐美人墓志（正面拓本）

（1）前后室砖墓。如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墓，墓道近墓室一侧底部呈水平状，前端呈台阶状；前室平面近正方形，两侧壁微外凸，长 1.9、宽 1.7~1.9、高 2.5 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和后壁微外弧，长 2.0~3、宽 2.1~2.3、高 2.4 米。与该墓一起发掘的另一座墓有太康六年（285）纪年铭文，两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的特征、组合完全一致，推测前者也应当在太康六年左右①。

（2）单室砖墓。这类墓中的大型墓葬，都有宽大的墓室和较长的墓道。墓道一般在 25 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 30 米。如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墓室四壁外凸成弧线状，四隅砌筑有内凸角柱。甬道长 2.37 米，设置两道石墓门。斜坡墓道长 37.36、上口宽达 5.1 米，自上而下逐级递减，形成 5 层台级。墓葬遭到盗掘，出土物有铜鋗、铁刀、石帐座、碑式墓志，其中的圭形碑式墓志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遗物（图二二）。据墓志可知是“晋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墓②。

中型墓葬虽然也有砖筑的墓室和较长的墓道，但规模要小。如洛阳春都路西晋墓，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单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二三）。坐北朝南，墓道呈长斜坡状，内填五花土，长 12.1、宽 0.94 米。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 1.32、宽 0.94、高 1.56 米。墓室平面近正方形，四角砌筑角柱，地面铺砖，

①诸城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2 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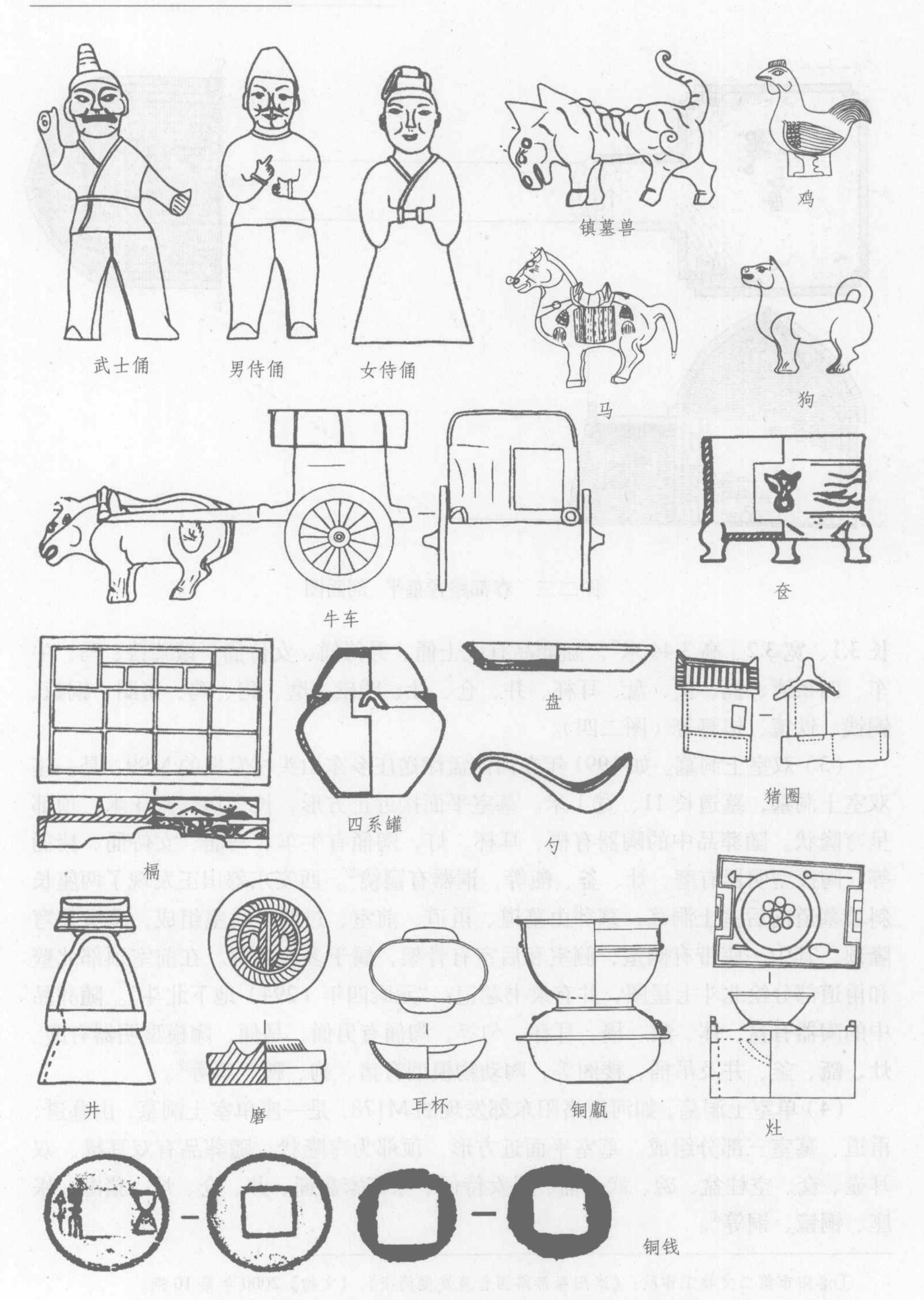
图二三　春都路晋墓平、剖面图

长 3.1、宽 3.2、高 3.44 米[①]。随葬品有武士俑、男侍俑、女侍俑、镇墓兽、马、牛车、四系罐、槅、奁、盘、耳杯、井、仓、灶、践碓、磨、狗、鸡、猪圈、铜甗、铜钱、铁镜、银簪等（图二四）。

（3）双室土洞墓。如 1991 年在河南孟津送庄乡东山头村发掘的 M99，是一座双室土洞墓，墓道长 11、宽 1 米。墓室平面接近正方形，长 3.14、宽 3 米，顶部呈穹隆状。随葬品中的陶器有槅、耳杯、灯，陶俑有牛车、马俑、女侍俑、猪俑等，陶模型明器有磨、灶、釜、甑等，铜器有铜镜[②]。西安东郊田王发现了两座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过洞、后室组成，墓室呈穹隆顶。其中一座带有侧室，侧室和后室有骨架，属于多人合葬。在前室顶部北壁和甬道部分绘北斗七星图，并有隶书题记："元康四年（294）地下北斗"。随葬品中的陶器有盆、钵、罐、槅、耳杯、勺等，陶俑有男俑、马俑，陶模型明器有磨、灶、甑、釜、井及吊桶、楼阁等，陶动物模型有猪、狗、鸭、鸡等[③]。

（4）单室土洞墓。如河南洛阳东郊发现的 M178，是一座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为穹隆状。随葬品有双耳罐、双耳壶、奁、空柱盆、碗、武士俑、男女侍俑、家畜家禽俑、井、仓、灶、猪圈、帐座、铜镜、铜等[④]。

①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10 期。
②310 国道考古队：《洛阳孟津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 年第 1 期。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西安东郊田王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5 期。
④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1 期。



图二四 春都路晋墓器物组合（未注质地者均为陶质）

（5）竖穴土坑墓。比较简陋，圹穴面积约3平方米左右。少数墓葬使用葬具，葬具包括木棺、陶棺和用小砖砌筑成的狭小棺室。随葬品很少，常常仅有一两件陶罐。

第二期：十六国迄北魏迁洛以前。

此期墓葬发现不多，中原地区现知的地点，有陕西西安和咸阳、河南安阳、山西大同等。主要的墓葬形制有前后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竖穴土坑墓等。墓葬制度极不统一，以大批陶俑随葬是这一阶段墓葬的重要特点，个别墓葬绘有壁画。特别是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银碗、鎏金银盘、银高足杯、银长杯等，有些是外来的输入品，既有萨珊朝波斯的产品，也有来自巴克特利亚的产品，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1）前后室土洞墓。西安草场坡发现的带长斜坡墓道的前后室土洞墓[①]，随葬器物80余件，包括陶牛车、甲马武装仪仗俑和20多件男女侍俑和女乐俑。咸阳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的前后室墓，均有长斜坡墓道，前室多为方形，穹隆顶或覆斗顶，后室多为梯形或长方形，前室和后室均有甬道。有的前室带有平面呈长方形、梯形等形制的侧室。而且往往为多人合葬墓，后室或侧室有骨架遗留。这种墓葬似为汉代“前堂后室”墓葬形制的延续。墓葬中出土了陶牛车、男女侍俑、仪仗俑和各类陶罐、陶模型明器[②]。

（2）单室土洞墓。西安嘉里村方形单室土洞墓出土有男女侍俑、陶牛车，与洛阳西晋墓接近。咸阳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的单室土洞墓，均带有长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多为方形，顶部为穹隆顶，墓室之前有甬道，甬道基本位于墓室前部正中位置，有的带有侧室，有的以砖封门，随葬品与前后室墓类似[③]。

（3）竖穴土坑墓，以安阳孝民屯发现的5座十六国时期墓葬为代表。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带有头龛，除其中的M197墓之外，头龛内都有牛骨，有的还有犬骨、马骨。另外，M154发现了一套鎏金铜马具，包括鞍具、辔具、銮饰，共计123件。特别是出土的单马蹬，与东北及南京所出土的单马蹬不同，而且年代较早，为马蹬由单马蹬向双马蹬演变而来的观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发掘者推测，这类墓葬的主人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入居黄河流域的鲜卑人[④]。

第三期：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时期。

此期墓葬的发现地点较普遍，数量也较多。在洛阳附近多北魏墓；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多东魏、北齐墓，北齐墓另一个较集中的地区是山西太原及其附近；陕西汉中发现西魏、北周墓；陕西西安、华县、咸阳和宁夏固原多发现北周墓。此

---

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场坡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②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十六国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外许多地方发现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赞皇李氏墓群、山东临沂崔氏墓群等。特别是东汉时期立在墓前的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茔地等做法，在经过曹魏西晋时期一段沉寂之后，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洛阳涧河两岸还发现成批的竖穴砖棺和竖穴洞室墓，这类小型墓面积窄小，一般不随葬陶俑，随葬品只有几件烧成温度低的陶器，有的随葬有少量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和永通万国等铜钱。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随葬品较少的竖穴土坑墓。

1. 北魏墓葬

（1）墓葬形制及地面设施

主要流行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一般由斜坡墓道或竖井式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大多位于墓室前部正中，也有个别的墓道略偏于一侧。墓室平面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平直或略向外弧出，顶部一般为穹隆形，也有呈四角攒尖式。各墓多于墓室西侧或北壁之下砖砌棺床，棺床前陈放陶俑和其他随葬品。有些墓葬结构复杂，设置有石门。

墓葬之上有圆形封土。如北魏元乂墓的封土堆平面呈圆形，底部直径约 35、高约 20 米①。

（2）随葬品

主要有陶俑、陶瓷器、金属器、墓志等。

A. 陶俑

陶俑主要有镇墓兽、各类武士俑、文吏俑、男女侍俑等，还有骆驼、马、羊、鸡、狗、羊、猪等动物模型。

B. 陶瓷器

陶器主要分为日常生活用品和模型明器。日常生活用品有帐座、罐、盘、碗、灯、壶等。陶模型明器有牛车、井、仓、灶、磨、猪圈等。瓷器有碗、四系罐、青瓷莲花尊等。

C. 金属器

铜器类有簪、唾盂、镜等。铁器类有剪刀等。

D. 墓志

一般为石质，方形，带盖，盖呈盝顶形。如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525）墓出土的墓志，盖为盝顶，无字。志石边长 58 厘米，刻志文 33 行，满行 33 字，有方形界格；其夫人（544）墓志盖为盝顶，无字，志石边长 79 厘米，刻志文 28 行，满行 28 字②。

---

①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 年第 12 期。
②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文物》1992 年第 8 期。

（3）壁画

较大型的墓葬之内绘有壁画。从残存的墓室壁画来看，多分上下两栏或三栏，上栏画四神，下栏画车马。墓室的东壁一般绘制墓主人夫妇坐帐图，顶部绘天象图（图二五）。

图二五　北魏元乂墓星象图摹本

（4）葬俗

仰身直肢，同穴合葬。在洛阳一带先后发现了许多北魏时期的石棺，说明当时除木棺椁之外，还使用石棺，而且这些石棺之上雕刻有非常精美的纹饰。

2. 东魏、北齐墓葬

（1）墓葬形制及地面设施

从目前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的平面形制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墓，个别为前后室墓、圆形单室墓、半圆形单室墓。

A. 方形单室墓中，有砖室墓或土洞墓，其中砖室墓占多数，土洞墓较少，还有极个别的石室墓。一般由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出，顶部为穹隆顶，也有四角攒尖式。各墓多于墓室西壁或北壁之下砖砌棺床，棺床前陈放陶俑和其他随葬品。有些墓葬结构复杂，设置有石门。如山西祁县白圭镇北齐天统三年（567）韩裔墓，墓道为竖井式，底部呈斜坡状[①]。

石室墓在山东临淄发现1座埋葬于北齐天统元年（565）的崔德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未作清理，情况不明。甬道长2、宽1.04米。墓室平面呈正方形，边长3米，底部平铺石板，墙壁用石板叠砌而成，在东、西、南三壁的中部各有一个方形石柱竖立壁间，用以加固墓壁。墓室顶部已经塌陷，推测可能是四角攒尖式。石门由门楣、门框、门扉组成，门扉上浮雕有莲花、忍冬纹饰[②]。

B. 前后室墓比较少见。如河北赞皇李希宗墓，由长斜坡墓道、前后甬道、前后室组成。其中甬道与墓室砖筑。甬道长近2米，纵券顶。前后室均呈方形，前室长3.71、宽4.04米；后室长4.39、宽4.5米。前室放置李希宗夫妇墓志、仪仗和其他明器，后室放置棺木及部分生活用品。

C. 圆形单室墓，根据建筑材料又可以分为砖室和石室两类。

①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圆形单室砖墓。如河北平山的崔昂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土圹，甬道和墓室砖筑。甬道前端有石门。墓室平面略作圆形，直径10米左右，穹隆顶。墓室北部依墙壁用砖砌筑出半圆形棺床，棺床之前放置随葬品①。

圆形单室石室墓。如在山东临淄发现的14座崔氏家族墓，大多为平面呈圆形的石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未作清理，情况不明。墓室和甬道为石砌，甬道较短，墓室墙壁以加工过的不规则的石条作人字形斜砌，并以石灰抹缝，顶部为穹隆顶，个别的绘有壁画。在这些墓葬中或安装石门，或以石块封门。其中的三号墓（崔混墓），平面呈圆形，直径3.8米。顶部呈穹隆形，已经坍塌，残高4.5米。设置有石墓门，墓门宽1.2、高1.6米，由门框、门楣、门扉组成②。

D. 半圆形单室墓。如北京王府仓发现的北齐墓，是一座半圆形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半圆形，顶部可能为穹隆形，墓室西侧有女性骨架一具③。

上述在河北北部、山东临淄发现的平面呈圆形或半圆形的墓葬，仅见于这一地区，形制较为特殊，可能是这一地区独有的墓葬形式。

墓葬的地面设施主要为封土堆。从娄睿墓的封土来看，底部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7.5、南北宽约21.5米。封土堆上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东西约6、南北约5米。残存高度约6米多。从对封土发掘情况来看，修建之时并未认真夯筑，仅是将泥土和沙石掺合在一起的一堆混合土而已，约堆积三四厘米或五六厘米才随意夯打一下，若不仔细观察，很难判断是否经过夯筑，夯窝就更不清楚了④。

（2）随葬品

随葬品有陶俑、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及玻璃器、墓志等。

A. 陶俑

陶俑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主要随葬品之一，陶质分为红、灰两色，均模制，表面施白衣并加彩绘，有的还贴金为饰。俑的种类多样，有镇墓兽、持盾镇墓武士俑、武士俑、仪仗俑、男女侍俑以及马、驴、牛、羊、骆驼、猪、狗、鸡等动物模型等。其中武装的仪仗和伎乐女侍俑为大宗，不论数量和种类都比以前更多，造型更加精美。

B. 陶瓷器

陶器有日常生活用品合模型明器两类。日常生活用品有碗、盘、壶、罐、唾盂等。模型明器有井、仓、灶、碓、牛车等。

瓷器有碗、四系罐、高足盘、青瓷莲花尊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低温铅釉陶器日益增多，器类主要有盘、鸡首壶、碗、瓶、灯等。特别是一种模仿

①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④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西方金属器上捶鍱花纹效果的堆塑贴花的装饰技法，在陶瓷器上流行起来。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陶灯、陶壶，库狄回洛墓出土的陶壶等。这种情形和这阶段墓中不断发现的西方货币、西方器物以及"胡人"形象陶俑等一样，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方面的密切联系。并出现了单彩、二彩的釉陶器。如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瓶、娄睿墓中出土的二彩盂。这类釉陶的烧制工艺，为以后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C. 金属器

铁器类有铁剑、铁锄等。铜器类一般出土较少，仅两三件。山西太原库狄回洛墓出土了60余件鎏金铜器，属于比较特殊的现象，有盒、盘、唾盂、瓶、碗、鐎斗、高足杯、环、烛台。此外，还出土五铢、常平五铢等货币。金银器有装饰类的金戒指、金饰品等，容器类有外来的金银器和传统器物造型的金银器。

D. 玉石器及玻璃器

玉佩饰，由各类珠子、玉璜、玉佩组成。石质类主要有帐座、灯、砚台等。石灯主要摆放于墓室四隅。玻璃器主要为外来的器物，凸花玻璃碗、磨花玻璃碗等。也有一些玻璃装饰品，如山西寿阳县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的玻璃珠①。

E. 墓志

墓志平置，带盖方形，盖面一般篆书，也有楷书者，志文一般楷书。例如，北齐库狄回落墓出土的墓志呈方形，边长81、厚11厘米；盖也呈正方形，边长81、厚18厘米。盖面篆书"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库狄顺阳王墓铭"；志文楷书，31行，行31字，共930字。娄睿墓志盖呈盝顶，楷书阳文，志石刻铭13行，有阴线界格，行30字，共866字。

（3）壁画

在大型墓的墓道和墓室壁面原都绘有壁画。就残存情况看，墓室壁画多分上下两栏或三栏，上栏画四神，下栏画车马。墓道壁画有的分栏，有的不分栏。分栏者分上下栏或三栏，绘墓主人出行与归来的仪仗。墓道壁画不分栏者，也以各类出行仪仗为主，如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墓道两侧壁画②，保存完好，面积达320平方米。东西两壁壁画的中心内容是各由五十三人组成的仪仗出行列队。东壁的仪仗队伍前绘朱雀、神兽、青龙等，西壁与青龙相对的位置绘白虎。青龙、白虎通长4.5米。出行的仪仗均手执戟盾、鼓乐、旄幡、伞盖等。墓室北壁绘墓主人坐帐图。如高润墓、徐显秀墓、崔芬墓等。特别是崔芬墓的壁画出现了屏风人物画，显示了和南朝的交流。墓室顶部绘制天象图。如磁县湾漳北朝墓的墓室顶部，以蓝灰为底色，绘有白色的银河，并有星宿散于天空。墓门之上也绘有壁画，一般为青龙、白虎。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出现了绘制地衣的现象。如河北磁县湾漳

①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北朝墓的墓道地面绘制的图案，分为三纵列，中间绘八瓣仰莲，直径达 1.35 米，两侧较窄，绘缠枝忍冬莲花的二方连续图案。三列图案以暗红色栏框相间。整个绘画的面积约 120 平方米。

（4）葬式与葬俗

一般为仰身直肢，夫妇同穴合葬。大中型墓的葬具附近出玉璜、玉佩和各种珠饰，表明墓主人原具朝服而葬。

3. 西魏、北周墓葬

（1）墓葬形制及地面设施

A. 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有的墓道带天井和过洞。

例一，陕西咸阳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是一座单室土洞墓。墓道呈斜坡台阶状，墓道内填土经过夯打。墓室平面略呈梯形，穹隆顶，长 2.74~2.86、宽 2.8~3、高 1.55 米。四壁及顶部均涂白灰，原绘有壁画，已脱落。墓室西壁之下为生土棺台。甬道宽 1.18、高 1.22 米。甬道之内发现有木板，应是墓门的门板。随葬品有镇墓兽、甲马俑、马、驴、骆驼、狗、鸡、仓、灶、磨、井、房屋、碓、陶碗、陶盘、陶壶、永安五铢、墓志等①。

例二，宁夏固原天和四年（569）北周李贤墓，是一座单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室组成。长斜坡墓道位于墓室前方正中，上口宽 1.3、底宽 1.5、长 42 米。墓道内的填土经过夯筑，上部夯层较薄，厚 0.2~0.3 米，夯土坚硬干燥；下部夯层较厚，厚约 0.5~0.7 米。墓道之中有三个天井和三个过洞。甬道长 2.2、宽 1.35、高 1.55 米。西侧设置一小龛。距离甬道口 0.25 米处，东西两壁各有一上下贯通的凹槽，其内有朽木痕迹，可能原来安装有木墓门。墓室为土洞式，平面近方形，长 4、宽 3.85 米，顶部因为塌陷，形状不明。葬具已经腐朽，位于墓室西部。男性为一椁一棺，女性为一棺，女性位于男性之西②。

B. 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有的带天井和过洞。例如，作为 2005 年全国重要发现的北周李诞墓就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③。

在北周时期，有些墓葬地面上不封不树，没有任何标志。但有些墓葬的地面仍然有封土，以李贤墓为例，封土堆底径 12.5、高 5 米，逐层夯筑，夯层厚 8~12 厘米。在有些墓葬的地面设施中还有石刻。如西安咸阳飞机场尉迟运和贺拔氏的合葬墓，地面封土无存，但在其南面有石人 3 尊、石虎 2 尊、石羊 2 尊④。

（2）随葬品

①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②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1 期。
③国家文物局：《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④负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

A. 陶俑

陶俑是西魏、北周墓的主要随葬品之一，陶质分为红、灰两色，多为模制或半模制作，特别是半模制作的陶俑是西魏、北周陶俑的特色。表面施白衣并加彩绘。俑的种类多样，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甲马俑、吹奏骑马俑、男女侍俑、文吏俑、武官俑，以及马、骆驼、鸡、狗、猪等动物模型。

B. 陶瓷器

陶器有日常生活用品和模型明器两大类。日常生活用品有罐、盆、砚台等。模型明器有井、仓、灶、磨、碓、房屋、鸡舍等。瓷器较少，有碗、盘口壶、唾盂等。

C. 金属器

铁器有铁刀、铁剑、铁剪、铁镜等。铜器有铜熨斗、鎏金铜带扣、铜钵、铜镜、铜印章、五行大布、货泉、货布等。金银器有金戒指、鎏金银壶、银提梁小壶、银熨斗、银剪刀、银镊子、银钵、银匕、银簪。

D. 玉石与玻璃器

大中型墓的葬具附近出玉璜、玉佩和各种珠饰。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玉璜、玉佩、白石珠、玛瑙珠、小料珠，它们原来应当是组佩。玻璃器主要是一些输入的西方器物。如李贤墓出土的凸花玻璃碗；咸阳北周王士良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①]。

E. 墓志

这一时期的墓志与东魏、北齐一样，平置于墓室之内，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盖呈盝顶形，志石呈方形。盖面一般阳刻篆书或楷书，如北周李贤墓志盖刻阳文楷书“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同墓出土的李贤妻吴辉墓志盖刻阳文篆书“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志文一般楷书，以线刻方格为界格。

（3）壁画

墓室、墓道壁画都不分栏，只绘一列武装侍卫和侍女、女乐，墓室顶部绘制天象图。壁画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的生活，与东魏、北齐墓的壁画有一定的差异。

（4）葬俗

大中型墓的葬具附近出玉璜和各种珠饰，表明墓主人原具朝服而葬。一般多采用夫妇同穴合葬，葬式采用仰身直肢。

参考文献：

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①负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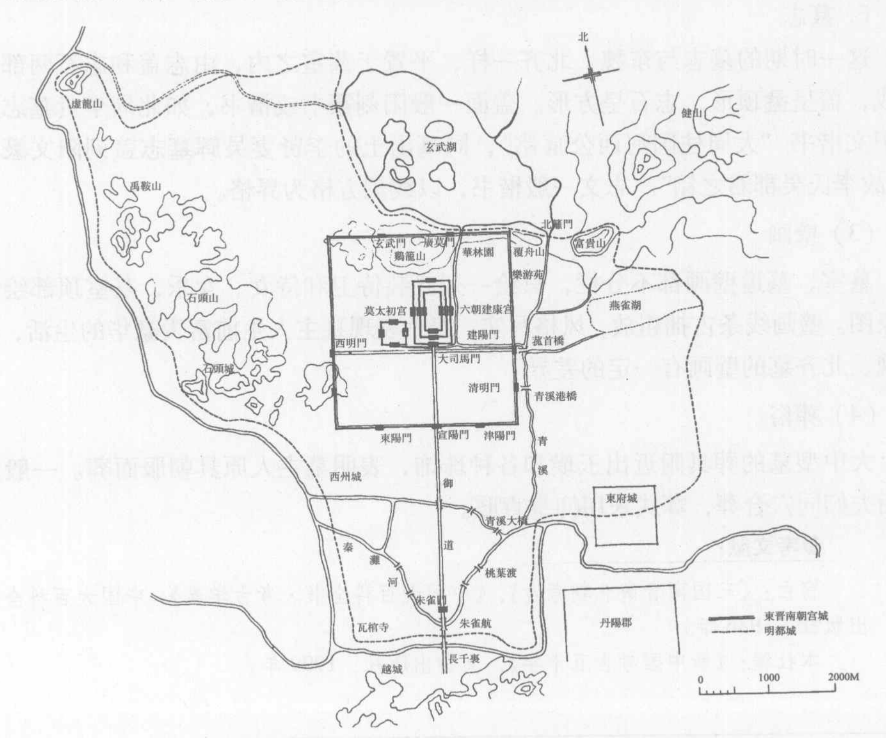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即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遗迹是墓葬和青瓷窑址，也有少数城址。

一、城址

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都城建业——建康城和湖北鄂城的吴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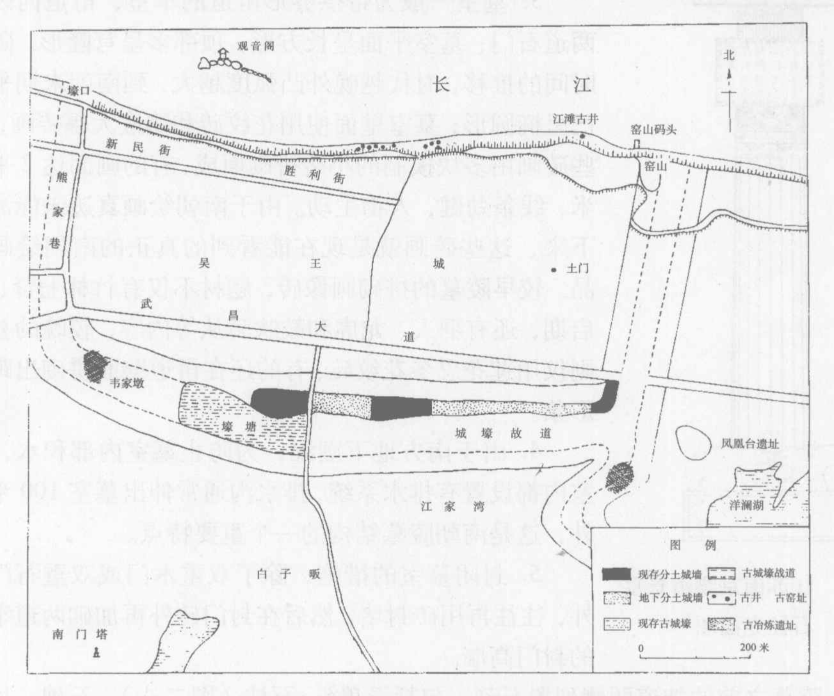
魏黄初二年（221），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晋室南迁后，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称建康。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又在吴宫殿的基础上，正式修建宫城，城共两重。东晋改建的建康城，布局模仿洛阳城。据《建康实录》记载：外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宫城“周约八里”，“初皆以土墙竹篱为之”，东晋末年始部分用砖。据《南齐书·高帝纪》记载，南齐建元二年（480）正式建“都墙”，全部用砖。梁天监十年（511），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筑第三重宫城。这种三重结构的城市布局（图二六），在南方地区较为罕见，与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有密切关系。隋灭陈后，将建康城夷为平地。建康城如今在地面上几无遗存，过



图二六　东晋南朝建康城平面想象图

去有人推测建康宫城位于南京工学院西侧进香河和东侧珍珠河之间，南京工学院曾多次发现莲花瓦当和唐以前琉璃瓦件，推测是东晋以来宫廷建筑的遗物。近年，于明代钟阜门西发现明内城墙下压有一段较早的夯土城垣，有人估计这是南朝建康城北垣的遗迹。在城外发现了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同时，还发现了砖筑城墙基址。从这些零散的资料，还难以推测建康城的轮廓，但砖筑城墙基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建康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吴王城即魏黄初年（220）孙权始都的武昌城，其遗址在今湖北鄂城市以东一带。1980 年进行了钻探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1]。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图二七），东西长各约 1000、南北长度约 600 米，城墙夯筑而成，其中东墙和南墙保存较好，



图二七　湖北鄂州古武昌城平面示意图

墙基宽 10 余米，夯层中夹杂有大量汉代灰色绳纹陶片。城墙之上设置 5 座城门，城门位置均已勘探清楚。北墙临长江以之为天堑，东、西、南三面均有人工开掘的城壕。经钻探，城壕一般宽 50~70、深 5 米。其中南面城壕现在仍残留有长 270、最宽处 90 多米的水面。在一段保存较好的南墙外，发现一处突出的土台，应当是六朝武昌城的“马面”遗迹。在城墙的四角发现了面积不等的夯土基址，应是与设防有关的基址。城内北部原来似乎有子城，大概是武昌宫的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郭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再西为武昌港口樊口。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六朝

①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

时期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二、东晋、南朝陵墓

（一）东晋、南朝陵墓的基本特征

通过调查发掘，得知东晋、南朝陵墓有以下共同的特征①：

1. 选择背依山岗，面向平原的地势作为葬地。

2. 依山开凿大型墓坑，加铺多层底砖后，在其上砌筑墓室。墓室砌筑完毕之后，即在其上填土夯实。

3. 墓室一般为带拱券形甬道的单室，甬道内设置两道石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多呈穹隆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越晚外凸弧度越大，到南朝末期平面已呈椭圆形；墓室壁面使用花纹砖和镶嵌大幅砖画，这些砖画由多块模制的小砖拼砌而成，有的画面达 2 平方米，线条劲健，人物生动。由于南朝绘画真迹未能流传下来，这些砖画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真正的南朝绘画作品。较早陵墓的拼砌画像砖，题材不仅有竹林七贤、荣启期，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等内容；较晚的墓壁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砖，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

4. 由于南方地下潮湿，为防止墓室内部积水，墓室内都设置有排水系统，排水沟通常伸出墓室 100 米以外，这是南朝陵墓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5. 封闭墓室的措施，除了双重木门或双重石门之外，往往再用砖封堵，然后在封门砖外再加砌两道牢固的封门高墙。

图二八　江苏南京梁萧景墓石柱立面图

6. 陵墓之前的神道两侧列置石刻，包括石兽②、石柱（图二八）、石碑，均为夹神道而立的对称布局。目前所见石刻主要属于南朝时期。

（二）陵墓举例

1. 南京富贵山大墓

墓葬依山而建。其修筑方法是先在距离地面 9 米处的山上开凿一口宽底窄的长方形墓坑，长 35、底宽 6.85、口宽 7.5、深 4.3 米。在墓坑底铺砖 7 层，下面 6 层采用平砖错缝横铺，最上一层斜铺成席纹，然后在铺地砖上砌筑墓室和甬道。砖墓筑好之后，然后再填土夯实，使其与两旁的山梁平齐，不起坟。墓室平面呈长

①杨泓：《南京、丹阳的东晋、南朝王陵》，《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关于南朝陵前的石兽有天禄、辟邪、麒麟、狮子等多种名称。

方形，长 7.06、宽 5.18 米，左右两壁平直，后壁外凸呈弧线状。顶部呈拱券顶，用楔形砖起券，已经全部塌毁。墓室与墓坑的间隙以黄胶土夯实。甬道平面呈长方形，筑于墓室之前，顶部为券顶，长 2.7、宽 1.68 米。甬道中发现有两道基槽，可能原来安有木门。墓门以砖封堵，此外，在封门砖之外又加砌两重封门墙，外凸呈弧形。墓室前部正中设置有泄水井口，其上覆盖带菱形漏孔的井盖，与下面的排水沟连接。排水沟开凿在墓坑底石上，用砖砌筑，石槽和砖砌沟壁间的缝隙用夯土填实。现存排水沟的长度 73.3 米，加上墓内一段共计 87.5 米，估计原来的总长度在 100 米以上。在距离该墓约 400 米处，发现一高 1.25 米的方形石碣，石碣下铺砖两层，石碣正面刻有三行二十六字铭文："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巳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晋恭帝司马德文是东晋末代皇帝，死于刘宋永初二年（421）九月，后依晋礼以帝王制度下葬。因此，富贵山大墓是晋恭帝的陵墓[①]。

2. 丹阳胡桥鹤仙坳大墓

依山开凿墓坑，墓坑长 18、宽 8、深 4 米，墓室砌筑在墓坑之中。在墓前 510 米处，还保留有石刻神兽，左为辟邪，右为天禄。推测该墓可能是南齐萧道成称帝后，为其亡兄萧道生（景帝）重建的陵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9.4、宽 4.9、高 4.35 米，四壁外凸呈弧形，上部收聚成穹隆状顶，顶部已经坍塌。墓室底部铺砖 9 层，前壁开门。墓室前部正中设置泄水阴井，下通排水沟。排水沟通过甬道底部直通墓外水塘，全长 190 米。围绕墓室外壁，还砌筑有一端接墓室外壁，另一端接墓坑石壁的挡土墙二十三道。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 2.9 米，其中原来设置有两重石门，现仅存门额上的石拱券，上面雕刻有平梁、叉手等仿木结构。墓门之外设置两道封土墙，其间填有厚 25 厘米的石灰。墓内壁面行镶嵌有用模子制作的大型砖画，在砖画周围的壁面，则用带有莲花纹、莲花网纹、缠枝莲花纹、双钱纹或双钱网纹的花纹砖砌筑，排列有序，纹饰华丽，可能是模拟当时宫廷中华丽的织锦壁衣。虽然这些砖画遭到破坏，但根据出土的残砖可以进行大致的复原。通过复原得知，甬道两侧壁面是狮子纹砖，墓室四壁按照方位分别设置四神图像，左右两壁前半段的上部分别为四神图像中的青龙、白虎，后半段的上部则各有半幅竹林七贤图，下部则是仪卫和鼓吹骑从等题材的砖画。这些大幅砖画，都是由许多块用模子制作好部分画面的小砖，按照原设计在墓壁上拼成的。为了砌筑时不引起混乱，在砖侧面刻画有砖画名称的简称、方位、数字，如"大虎上行第二"、"右立戟第三"等。说明从设计到施工，都有精密的规划[②]。

3. 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

墓坑开凿在罐子山北麓，长约 45、口宽 11、底宽 9 米。推测这座墓葬可能是

①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 年第 4 期；李蔚然：《南京富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 年第 5 期。

②南京博物院：《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大型砖刻壁画》，《文物》1974 年第 2 期。

陈宣帝陈顼的陵墓。墓室四壁的弧曲非常大，平面已呈椭圆形，长 10、宽 6.7、高 6.7 米。墓室内壁用花纹砖排列成华丽的图案。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呈券顶，其内设有两道石门。在拱券石上雕刻平梁、叉手等仿木结构。甬道两侧有用砖拼砌的大幅狮子砖画。墓室之上的填土中，距离墓顶向上 80 厘米处，铺有一层厚 20 厘米的碎砖层，用来保护墓顶。全部填土及封土共厚 13、直径 35 米。由于遭到盗掘和破坏，出土物比较少，有 1 件玉玦及一些残碎陶器、残青瓷碗、残鎏金铜泡等，还有 1 件残高 40 厘米的女俑，表面涂有白粉，绘有红彩[①]。

三、墓葬

发现地点较为普遍，但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差异大，所以地方特点比中原地区突出，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三区[②]。其中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墓葬资料多，系统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长江中下游墓葬

一般分四期：第一期为东汉末至吴初（3 世纪初~3 世纪中叶）；第二期为吴中期至东晋初（3 世纪中叶~4 世纪初）；第三期为东晋至刘宋（4 世纪初~5 世纪中叶）；第四期为齐、梁、陈三朝（即 5 世纪中叶~6 世纪）。

第一期：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前后室砖墓、单室砖墓。

1. 前后室砖墓。大多为规模较大的大型墓，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平面多近方形，有的在左右附有耳室，墓门之前筑有较短的甬道，甬道之前接长斜坡墓道。后室较大，平面呈长方形，顶部为券顶。全长 6~9 米。这一期墓葬与当地东汉晚期墓葬差异不大，表明在孙吴初期东汉旧制还没有较大的改变。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东吴墓葬从形制到随葬品等方面，也与中原地区曹魏墓相似。

大中型墓随葬品多陶器；青瓷器数量较少，器类主要有形体扁宽的罐、盘口壶、熏炉和五联罐式谷仓、蚕茧形虎子；另有漆器、铜器和铁兵器。漆器有槅、钵、盘、碗、盒、奁盒、圆盒、洗等；铜器有镜、货币等；铁兵器有刀、矛、剑等。还多随葬砖等质地的买地券、名刺木简、木方和五珠钱。

例一，江西南昌吴高荣墓，是一座由甬道、前后室、前室的左右耳室等组成的砖室墓，总长 6.18 米。甬道长 1.55、宽 1.2、高 1.2 米，单券。前室为横长方形，双层券顶，长 2.84、进深 1.35、高 2.2 米。前室左右各设有一耳室，大小相等，长 1.09、宽 0.6、高 0.65 米，单层券顶。前后室之间没有甬道，仅在右侧砖砌一道短腰墙。后室为长方形，双层券顶，长 3.25、宽 1.68、高 1.45 米。墓室平底，地面铺砖，呈人字形。随葬品有陶器、青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石器、竹

---

①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 年第 6 期。

②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木器等。其中陶器有仓、灶、井、臼、畜禽寮、盘、罐、鐎斗、盆、炉、灯等；青瓷器有罐、钵、盅、壶等；漆器有槅、钵、盘、碗、盒、奁盒、圆盒、洗等；金银器有金手镯、金发钗、金挖耳、银发钗、银唾盂、银小刀等；铜器有洗、炉、镜、博山炉、釜、货币等；铁器有刀等；石器有臼、石黛砚等；竹木器有竹尺、木梳、木圭、木简、木方、木屐等[①]。

例二，武汉任家湾黄武六年（227）墓的随葬品保存完整。墓主人的棺木置于后室，棺底满铺铜钱，名刺木简出土于木棺之内，大约是墓主人的随身之物。铅券压在棺木之下。在后室四隅均堆放铜钱，共计出土3600多枚。在前室之中出土有铅耳杯、铅盘、铜洗、漆唾盂、陶炉等器皿以及铁剑、铁矛等兵器。墓葬的左耳室放置陶灶等模型器物，右耳室放置各型陶罐和釉陶罐[②]。与曹魏墓葬比较相似。

例三，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是一座前后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残存随葬品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60多件，器形有耳杯、盘、案、盒、壶、樽、奁、槅和凭几等[③]。

2. 单室砖墓，以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墓前设甬道。这类墓大多为中型墓。随葬品与前后室墓类似。

第二期：这一时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墓葬与第一期相似，可分为前后室墓、单室墓。

1. 前后室砖墓。多为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的穹隆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龛，墓室之内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槅。东吴中晚期的前后室墓葬，虽然形制上仍然继承了东吴早期的形制，但随葬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较多地使用青瓷器皿和青瓷质的模型器。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现了反映佛教信仰的遗物，如有些俑的额部出现了类似佛的“白毫相”的装饰，谷仓罐上贴塑佛像，随葬装饰佛像的带扣，甚至还出现了独立的陶质佛像。

例一，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是一座由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的砖室墓，各室和甬道顶部均为券顶。前甬道长1.26、宽0.9、高1.07米。前室平面略呈横长方形，长2.84、进深1.72、高2.28米。后甬道长1.45、宽0.9、高1.05米。后室平面略呈长方形，长4.12、宽2.16、高2.13米[④]。

例二，江苏宜兴周氏（西晋平西将军周处）家族墓中的1号和5号墓规模最大。1号墓（周处墓，297）全长13.12米，有前后室，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前室后部两侧和后室前部偏右处各砌筑一个砖台，用以放置随葬品。

---

①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②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④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3期。

5号墓全长11.26米，前后室，前室左右各附一个长方形耳室。因为墓葬遭到盗掘，主要出土物为青瓷器，有罐、壶、盆、碗、盘、熏炉、堆塑人物罐（也称为魂瓶）等，还有一些模型器、金银饰、铜弩机、铜盒、铁镜等①。

2. 单室砖墓。这类墓多为中型墓葬。一般前附甬道，墓室呈长方形，券顶。甬道一般位于墓室前端正中，也有一些甬道偏于一侧，个别的还带有耳室。有的墓葬带有斜坡状墓道。一般墓砖上模印有花纹，主要有钱纹、米格纹、人面纹等。也有的模印年号，如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墓出土的墓砖上模印有“元康八年太岁在戊午八月十日造”②。这一时期的小型墓较前一阶段变化不大，新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做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的瓷器，如罐、碗之类。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随葬品中青瓷器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新出现的器形有一盘二耳杯的组合、扁壶、槅（多子盒）、熊足砚、动物形插器（蛙形水注、狮形插器等）、唾盂和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堆塑阙楼人物的谷仓罐、球形熏和附有兽足的茧形虎子。较晚又出现了陶牛车、陶马和陶俑。此外，棺内多葬金银饰品。铜器类有镜、砚、砚滴、三足炉、灯、熨斗、盆、洗、釜、耳杯、弩机、刀、削、钱币等。铁器类有鐎斗、镜、刀、剑、戟等。玉器类有带钩、佩饰（璜、心形佩）、剑饰（首、格、璏、珌）、环、珠、豚等。有的墓葬之中还出土玉卮、玉尊、玉璧等。从出土玉佩、珠饰等的墓葬来看，墓主人原来可能是衣朝服入殓的。漆器有凭几、盒、匕、箸、耳杯、奁、盘等。木器有梳、印章等。玻璃器有碗、珠等。金银器有金印、银印、金钗、簪、环等。滑石类有滑石豚等，应当是用于手握。使用墓志的墓葬增多。

在一些墓葬之中还随葬有滑石等制作的墓券，其内容与遣策相同，为随葬品的清单。也有随葬买地券者，主要为长方形版状，质地以铅、锡为主，多为单面刻字，也有双面刻字者。例如，安徽当涂县龙山桥乡双梅村发现1件凤凰三年（274）锡质买地券③，呈扁长方形。长35.8、宽4.3厘米，重350克。其内容为：“吴故夷道督奋威将军诸暨都卿侯会稽孟赟。息男一为赟贾男子周寿所有丹杨无湖马头山冢地一丘，东出大道，西极山，南北左右各广五十丈，直钱五十万，即日交毕。关连桥刺奸，齐谨破券，以解是为明。凤凰三年八月十九日对共破券。”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出土1件铅买地券，长17.7、宽5.5、厚0.15厘米，正面刻字，满行35字④，其内容为：“永宁二年二月辛亥朔廿日庚子杨（扬）州庐江郡枞阳县大中大夫汝阴□□□□□□丹阳郡□宁县赖乡漈湖里地方员五顷八十亩直钱二

①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②衢县文化馆：《浙江嵊县街路村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

③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当涂县发现东吴晚期地券》，《文物》1987年第4期。

④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百万即日交□□方庚辛北方壬癸中英戊几证知家前如律令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南京柳塘村西晋墓出土 1 件铅质买地券，略呈长方形，残长 25.2、宽约 2.5 厘米。双面刻字，一面内容为“……六年十一月十日……戊王母以大康五年八月十五日丧亡今”，另一面内容为“……丘后四地……东西南北百步……夏……禁固又铜券为……”[①]

例一，浙江衢县街路村元康八年（298）墓，为砖筑券顶，由甬道、墓室组成，两者均呈长方形。墓室长 5.45、宽 1.8、高 2.4 米。甬道长 1.75、宽 1 米。耳室位于墓室一侧，平面呈长方形，长 1.45、宽 0.9、高 1.2 米。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有罐、壶、钵、碗、洗、唾壶、槅、虎子、碟以及铁鐎斗、铁刀、铁削、货泉等[②]。

例二，湖南长沙安乡西晋刘弘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和墓室砖筑而成。墓道呈斜坡状，残长 6.2、宽 1.4~1.6 米。墓道与墓门衔接处有一个 2 米见方的土坑（即阴井），坑底有用条形砖砌筑而成的排水道，排水道截面呈三角形，残长约 10 米。甬道口以三层砖封门，厚 1.14 米，高、宽均 1.8 米，券顶。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四壁微外弧，边长 3.6 米，砌法为四隅券进式，顶部为穹隆顶，高 4.2 米。墓室中央横砌棺床，长 3.6、宽 0.86 米。墓室内近中心的部位发现一个铁帐架。随葬品有龟纽金印 2 枚、嵌绿松石龙纹金带扣 1 枚、金钗 1 件；银质带扣外框 1 件；玉器有印 1 枚、尊 1 件、卮 1 件、谷纹璧 3 件、雕镂龙纹璧 1 件、心形佩 2 件、璜 1 件、装饰件 3 件、猪 1 件、带钩 2 件、璏 1 件；铜器有错金弩机 1 件、盒 1 件、剑 1 件、刀 1 件、瓶 1 件、镊 1 件；铁器有贴金匕首 1 件、戟 1 件、刀 1 件、剑 1 件、镜 1 件；青瓷器有堆塑灯、龙柄灯、双系盘口壶、四系盘口壶、盘口壶、唾盂、耳杯、盘、碗、尊、方壶、扁壶、槅、盆、虎子等[③]。

例三，周氏家族墓的 3 号和 6 号墓，都为单室墓，全长 6.1 米。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④]。

第三期：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和南郊戚家山谢鲲墓地等。这类大族墓葬多大中型墓。墓壁有的砌灯龛、直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等人物砖画。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前后室砖墓，这种形制是对前期墓葬形制的继承。
2. 长方形单室砖墓，结构简单，规模较小，顶部为券顶。
3. 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这类墓葬之中，形制多样，既有甬道位于墓室正中的凸字形墓葬，也有甬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葬。同时，还出现了新流行的形

---

①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邓府山吴墓和柳塘村西晋墓》，《考古》1992 年第 8 期。
②衢县文化馆：《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墓》，《考古》1974 年第 6 期。
③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 年第 11 期。
④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第 4 期。

制，主要有墓室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甬道加长的单室砖墓。

例一，在浙江东阳县李宅镇发现的“元加（嘉）四年（427）”墓，由甬道、墓室组成，甬道位于墓室前方正中。墓葬总长5.05米①。

例二，南京象山7号墓，墓室平面略近方形，穹隆顶，前部带有券顶砖甬道。该墓全长5.3、宽3.22、高3.42米。在两侧和后壁都砌筑有直棂假窗，假窗上段各砌一灯龛，龛内放置作为灯盏用的青瓷小碗。墓葬之内出土了大量青瓷器、铜器、金银器、陶俑、玻璃器以及金刚石戒指等②。

4. 吕字形砖墓，即在甬道前端砌筑出类似小室的双室墓。

随葬瓷器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渐成组。鸡首壶流行，耳杯两端上翘，多做圆形，新出现碗托、三足炉和六蹄足砚。器物上流行用莲花纹饰。墓志数量增多。较晚墓中出现了刘宋时期所铸的四铢铜钱。在南京发现的大中型东晋墓中，至少有4座出土了推测为罗马制造的玻璃器，其中一座还同出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这类西方器物的出土，为东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证。从有些墓葬出土大量的玉佩饰来看，墓主人是采用朝服而葬的。玉石器有玉印章、玉琀、玉豚、各类佩饰、石豚等。

第四期：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长方形砖室墓、“吕”字形墓、竖穴土坑墓等几种，墓葬形制基本继承了前期的特征。随葬品主要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滑石器等。在一些墓中还发现祭台。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576）的棺床前部放置有一长方形石祭台，长1、宽0.82、厚0.08米③。

1. 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

在这类墓葬之中，有些规模较大者可能是皇室陵墓，都遭到严重破坏，随葬品残存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帏帐石趺、石凭几、石俑等，也有少量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

中型墓则无石门，全长皆在9米以下，砖多素面无纹饰，但随葬品一般保存较好，瓷器如罐、壶、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长发展，瓷器上出现莲瓣装饰，新出现的器物有装饰繁缛的莲花尊，一盒五盏的组合器、粉盒、细颈瓶、高足盘和六至八个水滴形足的砚。晚期墓葬中出现陈朝铸造的太货六铢铜钱。如湖南长沙发现的2号墓，全长6.9米；甬道长2.16、宽1.36、最宽处1.48米；墓室长4.74、后端宽2.18、中间最宽2.35米。其中出土有“齐永元元年”纪年铭文砖。

2. 长方形单室砖墓，结构简单，规模较小。如浙江苍南县藻溪发现的“元嘉廿八年（451）”墓，券顶。甬道长1.38、宽0.7、高1.4米；墓室全长4.6、宽1.4、高2.1米④。

①赵宁：《浙江东阳县李宅镇南潮墓》，《考古》1991年第8期。

②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④温州市文物处：《浙江苍南县藻溪南朝墓》，《考古》1986年第7期。

另外，河南南部临近湖北发现的邓县画像砖墓，出土了一块书有“在吴郡”字样的墓砖，可以大致推定它属于南方地区这阶段的墓葬[①]。548 年，侯景乱梁以后，襄阳及其以北地区，即已隶属北朝，因此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晚于本阶段的中期。该墓画像砖中表现的丧葬习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态以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种类和造型，都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内容和形象极为相似。反映出齐梁时期宛洛一带和汉水一线，不仅是南北时有军事冲突的区域，同时又是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学习的重要地区。

（二）闽广墓葬

福建、两广地理毗邻，各方面联系密切，吴、晋、南朝的墓葬情况也较接近。两地发现较早的六朝墓多属西晋晚期；东晋以后的墓葬数量多，分布的区域逐步扩大。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已，经济凋敝，人民大量南迁，江南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岭南地区更是如此，在西晋末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两广地区现已发现的两晋南朝墓中，纪年铭文中常见“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情景。

这一地区墓葬的结构，除与长江中下游类似的长方形小型砖墓和前建甬道的中型砖墓外，两地都有在墓室内加砌砖柱的做法。

1. 西晋墓

墓葬形制主要有前后室砖墓、带甬道的长方形砖室墓、长方形砖室墓，后两者结构简单，墓室均券顶。墓室结构除与长江中下游类似的长方形小型砖墓和前建甬道的中型砖墓外，两地都有在墓室内加砌砖柱的做法。前后室砖墓比较典型的有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是一座中型墓，由墓道、挡土墙、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均为券顶。全长 7.9 米。墓道未发掘，挡土墙高、宽均为 2.44 米。挡土墙的下部正中是墓门，以砖封堵。前甬道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1.25、高 1.38 米。前室呈横长方形，长 2.7、宽 1.83、高 2.3 米。左右两侧各附一耳室，形制、大小基本一致，长 0.9、宽 0.8、高 0.75 米。后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 1.3、宽和高均为 1.2 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3.54、宽 1.74、高 1.6 米[②]。

2. 东晋南朝墓

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砖墓、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等形制，有些墓葬双室或三室并列，个别墓葬为多室墓。也有数量不多的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的顶部均券顶。墓内均设置有通往墓室之外的排水设施。长方形单室砖墓，一般结构简单。带

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 年。
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 年第 9 期。

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有的墓室后部砌筑棺床。如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甬道长1.78、宽1.38米，墓室全长4.8、宽2.16米。墓室后部砌筑有平面呈方形的棺床，边长2.1米，高7厘米[①]。双室或三室并列墓，如广东曲江南华寺发现了一座双室并列砖室墓，双室之间设置砖隔墙。隔墙的前后两端分别砌筑一个可以使双室相通的小拱门，拱门之间的隔墙还设置有四个方形小窗[②]。多室墓包括前、中、后三室，比较少见，如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③]。

随葬品既有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鸡首壶、唾壶、钵、碗、砚以及动物模型、屋、仓、禽舍等的陶瓷器，也有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随葬品，而且这些有地方特色的随葬品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福州、南安墓多出青瓷插器、子母盏盘（附在大圆盘上成组的小盅——五盅盘）和动物形虎子。苍梧晋墓出土仪仗俑。永福、寿城南朝墓瓷骑马俑、瓷抗旗俑、瓷侍从俑以及陶武士俑、陶击鼓乐俑等。融安齐梁墓出滑石明器，种类有俑、猪、帐座、勺、钵、甑、盘以及买地券等。据（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金石》记载："滑石，桂林属邑及徭峒中皆出。"融安旧属桂林郡，是盛产滑石的地区。建瓯梁墓和广州六朝晚期墓所出附有女厨俑的陶灶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这些墓葬在结构和随葬品方面的特点，有不少和闽广相邻的赣湘两地的六朝墓有一定的联系。此外，英德、曲江[④]的齐墓中，发现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9~484）所铸的银币，反映出5世纪后期经南海溯北江北上的这条交通路线的繁荣。

（三）川黔滇墓葬

四川、贵州、云南发现的蜀晋南朝墓葬的地点颇为分散，较重要的有自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昭化、广元绵阳的崖墓，贵州安顺、平坝以小型石板构筑的石室墓，云南姚安砖石合砌墓和昭通的石室墓。

1. 四川地区

成都、巴县、忠县、大邑、西昌发现的蜀汉墓一般为中小型的单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平面呈"凸"字形。有些早期墓为长9米以上的大型多室墓。随葬品多存汉制，有一般陶器和陶俑、水田明器以及少量铜器（釜、洗）和钱币。钱币有魏"五铢"、"直百五铢"、"定平一百"等。彭县、大邑、西昌的蜀汉墓中还嵌有各种内容的画像砖，内容包括神涂郁垒、六博乐舞、西王母、建木、轺车出行、天仓、天阙、方相氏等，与东汉时期相比，画像图案的线条变浅变细。这一带的两晋墓葬均为单室砖墓，平面呈刀形。南朝时期的不仅有单室，也有双室墓。单室墓与两晋时期相同，双室墓平面则呈不规则的"十"字形。有的墓葬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7期。

②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7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7期。

还带有斜坡墓道。出土器物主要有青瓷四系罐、碗、盘口壶、鸡首壶、深腹饼足碗、莲瓣纹深腹碗、瓶、六系盘口壶和铜鐎斗等。成都、西昌一带还发现成汉[①]时期墓葬，为单室砖墓，平面呈“凸”字形，墓外有排水沟。随葬有陶武士俑和陶猪、陶罐、陶钵等。

昭化县宝轮镇发现的两晋南朝的崖墓，都是狭小的单室墓。建造之时先凿出短短的墓道槽口，将斜坡的崖石修平，继而开凿方形墓门，再向内开凿出平面略近长方形的拱顶墓室。墓室的面积很小，最大的一座仅长2.72、宽1.08、高0.87米。一般墓室长仅在1.8~2.2米。墓室两壁，时代较早者近于直线，时代较晚者呈弧线，前壁明显窄于后壁，使得墓室平面略呈底宽口窄的袋状。墓内一侧常设棺台，有石质的，也有用砖平铺的，大体上仅能放置一个死者。也有个别的墓葬采用双人合葬。墓门一般用砖封堵，墓室底部前低后高，便于排水，而且墓前凿有排水沟。墓葬之中放置的随葬品比较贫乏，一般有一些陶质和青瓷质的日用器皿，罐、釜、甑、碗、四系盘口壶、唾壶等。此外，还有铜镜、铁剪、铁兵器、铜钱、琉璃饰。墓葬中随葬的青瓷器，总体上由矮胖向修长发展[②]。

广元绵阳间的崖墓多长方形单室，也有并列墓室前附同一前室的。蜀汉时期墓多陶器；晋墓瓷器增多，有盘口壶、钵、釜、甑、唾壶等；南朝墓瓷器种类和形态的变化与长江中下游墓相似。如广元鞍子梁西晋崖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门以砖封堵。墓室前低后高，后部为棺床。全长4.76米。夫妇二人合葬。随葬品有青瓷盘口壶、陶钵、釜、甑及五铢铜钱[③]。

2. 贵州地区

贵州的魏晋南北朝墓葬仅在安顺、平坝有发现，以小型石板构筑的石室墓为主，也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据统计，在已经发掘的41座这一时期墓葬中，石室墓29座，竖穴土坑墓9座，砖室墓3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贵州地处山区盛产石料有关[④]。随葬品主要有青瓷器和涂黑的红、灰软陶罐为主。这一地区蜀汉西晋墓的随葬品与四川接近；东晋以后的随葬器物多与两广近似。

3. 云南地区

云南的魏晋南北朝墓主要集中在滇东、滇东北，即当时云南郡治的姚安和朱提郡治的昭通。此外的滇西地区、大理一带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俗称“梁堆”，一般聚族而葬，地面有坟丘。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墓。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

①成汉（304 ~ 347），是东晋时期的賨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②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③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四川广元鞍子梁西晋崖墓的清理》，《文物》1991年第8期。

④宋世坤：《贵州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由于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以及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姚安发现的咸宁四年（278）大中大夫李某砖石合砌的大型墓，随葬品既有地方特色浓厚的附把陶环和绳纹陶仓，也有和四川蜀汉墓相似的铜釜、甑和鐎斗。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也是一座由天然石块和砖砌筑而成的前后室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组成。墓室墙壁和顶部用石块砌筑，地面铺砖。砖侧模印有"大康十年（289）造吉羊（祥）"铭文。墓道位于墓室北侧，长 2.3、高 1.4、顶宽 0.5、底宽 0.8 米。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券顶，长 3.45、宽 1.85、高 2.05 米。甬道长 1.4、上宽 0.5、下宽 0.65 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4.15、宽 1.8 米，后部以泥沙筑一棺床。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铁俑（铁芯彩绘）、铁刀、陶马、陶灯、陶罐、陶钵、陶碟等①。昭通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②，是一座砖石混合结构的盝顶方形单室墓，墓室边长 3.2、高 2.2 米。墓道长 3.4 米，两侧设有小龛。地面有高 5.2 米的坟丘。墓室之内绘有壁画，壁画分栏，后壁上栏绘流云、莲花、骑士、骑士射猎及玄武，下栏正中绘墓主人坐像，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墓主人坐像的右上方有墨书题记 8 行，楷书略带隶意。左壁上栏绘流云、阙、鸟、獐、白虎、太阳等，下栏绘持幡及骑马执矛的汉族部曲 18 人。右壁上栏绘流云莲花、玉女、獐、鹿、青龙、三足乌、人面虎身兽、阙等，下栏绘彝汉部曲 39 人及骑士 4 人。前壁上栏绘流云、朱雀及六瓣圆形图案 4 枚，下栏绘房屋及一执刀人。根据题记，该墓的修建年代在东晋太元十一年至十九年（386~394）之间。此墓形制和部分壁画内容与两晋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大中型墓颇为类似。

参考文献：

杨泓等：《魏晋南北朝墓葬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第三节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指辽河以东，鸭绿江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考古发现有魏晋十六国墓葬和高句丽遗迹。

---

①大理市文管所：《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9 年第 8 期。

②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 年第 12 期。

一、魏晋十六国墓葬

北自沈阳，南迄大连，都发现了魏晋时期墓葬。辽阳以北多砖室墓，辽阳附近多石板墓，大连地区多小石板墓。

辽阳是平州和辽东郡治所襄平所在地，附近多平顶石板墓，类型复杂。较大型墓砌出前中后三室；中型墓砌出前后两室；小型墓只具棺室。前两种有壁画，前室左右都各砌一大一小的耳室，大耳室壁绘墓主人饮宴，小耳室壁绘庖厨、马厩；砌出三室的，其后室壁绘庭院楼阁，前中室壁画无存，按当地汉末壁画之例推知前室壁绘墓主人出行。小型墓无壁画。三类墓共出的器物以装饰品为多，有钗、环、镯和两端作叉形的铜饰件；陶器多粗厚的罐、钵；还有两端上翘的石灰枕。大中型墓有陶明器，如井、灶、俎和圆案、耳杯、豆、长颈瓶等。三道壕发现的一座小型墓中，出有太康二年（281）纪年铭的瓦当。上王家村一座较晚的前后两室墓，前室砌出抹角叠砌式的石板平顶；耳室壁绘墓主人右手执麈尾，端坐于后列曲屏的方榻上，方榻上绘顶饰莲花的朱帐，随葬器物有陶盘、铁镜和南方地区烧造的青瓷虎子，这座墓的时间大约已晚到十六国时期。

沈阳东郊发现的券顶砖室墓有前后两室和三室连建两种，随葬器物中有辽阳石板墓常见的石灰枕和两端作叉型的铜饰件，后者也常见于中原晋墓，常见于中原晋墓的还有釉陶小罐、位至三公镜、铁镜和盒、奁等漆器。

大连营城子小石板墓多叠涩收顶，石板间用贝壳灰粘合，有前后两室和后室分砌左右两种，随葬品多陶器，有罐、长颈瓶、圆案、耳杯和井、灶、俎、仓之类的明器，还有少量铜镜和剪轮五铢铜钱。

二、高句丽遗迹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在玄菟郡境内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王都于桓仁县。据《好太王碑》记载："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又《魏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弃夫余，东南走，遂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衲衣，一人著藻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邹牟和朱蒙当系音转，应为一人。学术界普遍认为，沸流水即今浑江，桓仁县五女山山城就是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建都的纥升骨城。汉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孺留王（也琉璃明王）将王都迁往国内城，五女山山城作为高句丽初期的都城，前后大约40年的时间。

目前发现的高句丽遗迹，主要分布在长白山脉南段以南，以桓仁为中心的浑江流域和以集安为中心的鸭绿江北岸，长白山脉以北多高句丽晚期遗迹。可将高句丽遗迹分为城址、墓葬两大类。

（一）城址

高句丽城址主要有山城遗址和平原城遗址两种。

1. 山城

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多因山势修建，形制不规整。一般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 2 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 1~2 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 200~1000 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①。山城比较典型的山城有五女山山城和丸都山城。

（1）五女山山城

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的早期都城。位于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东坡，东临浑江，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 1540、东西宽约 350~550 米，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南墙长 424、东墙长 1847、北墙长 475、西墙长 2008 米，城周总长 4754 米。其中天然城墙总长 4189 米，约占城墙总长的 88%；人工修筑的城墙总长 565 米，约占城墙总长的 12%。西连悬崖，东、南、北三面城垣皆以自然石板堆砌，并利用山的坡度，外高内低，现墙外侧高 3~6 米，内侧高 1~2 米。西墙、北墙、东墙北段等部分还利用了自然陡峭山崖为壁。山城整体分为山上和山下两部分。山上部分位于山城的西部和西南部，海拔高度平均在 800 米左右，西南部地势比较平坦，周围峭壁如削，相对独立于周围山势，南北长 600、东西宽 110~200 米，是主要的活动区域，城内遗迹大部分都在这里，如居住遗址、哨所遗址、蓄水池、瞭望台等。山下部分位于山城东部、北部和东南部，虽然为较为平缓的坡地，但遗迹较少。五女山山城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具有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特点②。

（2）丸都山城

丸都山城位于吉林省集安市西北 2.5 公里的高山上，是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的同时修建的守备城——尉那岩城。丸都山城成为高句丽的都城是从第 10 代王山上王时期开始的。197 年，山上王在王位争夺战中被其兄接连三天围困在王宫，大抵有鉴于此，遂于此年春二月“筑丸都城”，并于 209 年“移都于丸都”。曹魏正始五年（244），幽州刺史毌丘俭攻伐高句丽，丸都山城遭到了空前破坏。342 年春，高句丽第 16 代故国原王才着手对山城进行修葺，并于同年秋天“移居丸都城”。然而，故国原王住进丸都城不到四个月，前燕慕容皝又一次攻陷高句丽，“烧其宫室，

①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 年。

毁丸都而还”。这一次毁灭性的破坏，使丸都城彻底成为历史遗迹。

该城平面略呈椭圆形，西北高，东南低。城墙构筑于临河的断崖和陡峭的山脊上，于山脊的凹陷之处，以整方石材或碎石垒砌，东墙完整处高 6 米，外侧筑女墙。内外侧皆垒砌经过人工修治整齐的长方形巨大石块，内低外高，中填河卵石。城内有蓄水池、瞭望台、宫殿建筑等。现存门址 5 处，其中南门凹入，便于两翼扼控。山城总长 6951 米①。

高句丽为了拱卫都城，在通往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的水陆通道上重重设防，构筑了一系列控扼拒守的哨卡、关隘和城堡。在陆路上，由国内城通往浑江流域的道路有两条，北道越老爷岭（也作老岭），沿苇沙河，宽阔平坦。南道沿新开河，登板岔岭，盘旋而下，崎岖难行。《资治通鉴》卷九十七也记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在沿途的山上都发现了城址，这显然是卫护都城的山城等。

在北道，高句丽筑关马墙（也作关马）山城，控扼北道。其遗址在集安西北 35 公里的热闹屯东南，其所在位置是北道上最为深险的峡谷，利用对峙的高山，以砾石修建东北南三面城墙，构筑城堡。是高句丽“筑断为城”实例之一。同时还修筑哨卡，如大川哨卡，位于清河乡东北 2 公里苇沙河北侧，东南距关马墙山城约 10 公里，以石材因势构筑在高约 20 米左右的一段伸进河谷的山崖上，平面略呈圆形，周长 153、基宽 4、残高约 1 米。可以居高临下控扼通路，也可以对苇沙河下游地带进行监控。

在南道修建霸王朝山城和望坡岭关隘，用来拱卫都城。霸王朝山城遗址位于新开河口霸王朝屯东北 2.5 公里处的山巅，凭山脊构筑，以经过修筑琢的石材垒墙，周长 1260 米。南北有门，并有瓮城。望坡岭关隘利用山险，构筑全长 26 米的宽厚石墙，横截通路。

散布在长白山脉的西北侧，南自沿海的大和尚山城，东北经复县、辽阳、抚顺、西丰、辽源等地，以迄吉林龙潭山城一线的山城和在长白山南麓南通平壤的要冲凤城东南发现的乌骨城址，都是 4~5 世纪以后高句丽晚期山城的遗迹。

2. 平原城

平原城遗址主要修建于平原地区，是相对于山城而言的，目前发现的高句丽平原城遗址数量较少。位于吉林省集安市的国内城址是典型的一处。今集安市即因国内城修建，集安城的北垣犹存当时的规整石垣。

公元 3 年，随着朝鲜半岛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高句丽（前 37~668）由纥升骨城（即五女山山城）迁都到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自此以后直至 427 年，国内城一直是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427 年以后，高句丽迁都平壤。

国内城遗址位于鸭绿江右岸，通沟河口东侧。国内城是一座坚固的石城，城墙全部以长方形和方形石条垒砌，由于年代久远，几经修葺，城墙大部分已经失

①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 年第 6 期。

去原貌。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东墙554.7、西墙663.6、南墙751.5、北墙715.2米，城周长2686米。城墙以巨大的花岗岩奠基，墙面以长方形石材垒砌，厚约10米，石墙外侧由下而上逐层收分，残高3~4米。南、北、东三面设有壕沟。城墙四面墙垣每隔一定距离修筑一马面。四面的马面数量不等。从马面残存的痕迹看，北墙8个，西墙、南墙、东墙各2个，共计14个。每个马面的长宽稍有差异，一般长8~10、宽6~8米。城墙四隅有角楼遗址。现存6个城门遗址，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均有瓮城。

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国内城城墙最初并非石筑，而是夯土修筑，其石墙垣的规模和轮廓，基本上是由夯土修筑的城垣确定下来的，土筑城垣的年代应在高句丽迁都之前。据《三国史记》卷十三记载："（琉璃明王）二十二年（3）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迁都而不筑城，应当意味着当时国内已经有了一座可以利用的城址。可利用的城址是怎样的一座城呢？从其结构和形制来看，国内城土筑城垣与西汉古城十分相似，而其位置又在西汉玄菟郡辖境之内，因此，国内城最初的土筑城垣有可能是西汉玄菟郡属下的某个县城址。又唐代张楚金《翰苑》卷三十引雍公叡注引《高丽记》云："不耐城，今名国内城，在国东北六百七十里，本汉不而县也。"虽然这条记载所云的国内城位置不确定，但却明确表明国内城是在西汉县城的基础修建的。

城内中部和北部发现的建筑遗迹，多以石材构筑地基，出土础石、兽面或莲花纹瓦当和残瓦，规模宏大，非同一般民居，可能是高句丽王室建筑的遗迹。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国内城东门外也有大量发现，其中一座保存完整，面阔2间，东西宽40、进深20米，周绕回廊，并设有火炕，烟道埋于地下。出土有石础、瓦当和各种残瓦，大约也是王室建筑的遗存。这些发现，说明当时城内主要建筑与东墙外侧的建筑群是连成一片的，其布局与城址轮廓不甚协调，分明缺乏统一的部署和规划。这一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句丽的旧城国内城，是在西汉旧城基础上建起来的。

（二）墓葬

高句丽墓葬一般建在地面上，有积石墓和封土墓两种，有些石室墓中绘壁画，而且多集中桓仁、集安一带。

1. 桓仁地区

桓仁地区是高句丽把都城迁往丸都以前的政治中心，这里发现的高句丽墓葬都是积石墓，绝大多数是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叠砌墓室并封顶，随葬品有陶罐、陶壶、铁刀、铁矛、铁镞、铁马具、鎏金铜饰片和银镯等。位于浑江东岸的高力墓子村附近的墓群，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处，南北延续长达1000余米，墓葬可以分

为大中小三型，不论规模大小都是在地面上用自然石块叠砌墓室。

大型积石墓以其中 15 号墓为代表，该墓包括两个墓室，基坛南北长约 13、东西宽约 10、高约 1.2 米，先砌成南半部，然后接砌北半部。基坛以上再铺砌高约 0.6 米的墓室，也是先砌南室，然后接砌北室。围绕基坛四周垒砌一周宽约 1 米的围墙。由于山坡南高北低，为了保护基坛不致于坍塌，又于北面围墙以外加砌一道宽约 1.6 米的护墙。尸体和随葬品置于墓室地面上，然后再上面用石块封盖。

中型积石墓，没有基坛、围墙和护墙，用石块和石板砌筑出平面呈长方形的墓室，一般长约 2、宽约 1 米，前面留有甬道，墓室有单室、双室和三室。顶上一般用石块封砌，有的墓室四周还用较大的石块支护。少数中型墓葬除封石之外，还加封一层封土。

小型积石墓结构简单，用石块或石板叠砌成长不足 2、宽约 1、高仅 0.5 米的长方形墓室，没有甬道，顶部使用石封。也有的仅用小石板立支四壁，并于顶上盖一石板而已。

经过清理的中小型积石墓中都没有发现随葬品，只在大型积石墓中发现少量的铁质武器和马具，有刀、矛、镞、衔和带扣等，此外还有一些陶罐、陶壶和鎏金铜饰片、银镯、铜镯等装饰品。

2. 集安地区

高句丽迁都丸都，政治中心也就移到了今集安市。集安的高句丽墓葬，除了有类似桓仁地区的积石墓群外，也有单独存在的用修琢整齐的巨大石块砌建的大型积石墓，其中有宽敞墓园的应是高句丽王室墓葬。集安积石墓多随葬陶器、釉陶器和鎏金铜马具。积石墓的年代，上可及汉代，下迄 6 世纪。这一地区的高句丽墓可以分为两大类：积石墓和封土墓。

（1）积石墓

积石墓以碎石、砾石、石条等为封，以构筑方式分为：方丘状积石墓、方坛积石墓、方坛阶梯形积石墓、方坛阶梯形石室墓和封石洞室墓，这也基本代表了它们的发展演变序列。

方丘状积石墓，以碎石或砾石堆成墓基，于上部建长方形椁室，再封以碎石或砾石，形如方丘。

方坛积石墓，以经过修琢的巨形石块或长方形石条垒砌方坛，椁室居上，再用碎石和砾石为封，出土有五铢、货泉、黄釉陶壶、鎏金铜质或铁质马具等。

方坛阶梯形积石墓，以巨形石块或石条筑成 2~5 层方坛，逐层内收呈阶梯状。椁室居上，有单室和多室之分，积石为封。

方坛阶梯形石室墓，多为王陵。如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等。其中的将军坟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 31.58、高 12.4 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构筑，共 7 级，墓室位于第 5 级中部，长宽均为 5、高 5.5 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墓

顶石条边缘有柱洞，出土有铁链和瓦当，原来可能有建筑。墓壁每面有3块巨石倚护，气势宏伟，筑造精致。在坟墓的四周，有30米宽的石铺地面，以象征墓园。后侧有一列陪葬墓，是筑于基坛上的石棚（石室）。

封石洞室墓，墓室砌筑于地表，呈简单的抹角垒砌，用巨石盖顶，积石为封。

（2）封土墓

封土墓根据其构筑方式可以分为：方坛封土石室墓、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土石混封石室墓和封土石室墓，这也基本代表了它们的发展演变序列。

从发展变化的情况来看，积石墓的年代较早，以后积石墓又和封土墓有一段并存的过渡阶段，晚期的墓葬则多是封土石室墓了。集安地区的高句丽积石墓所处的地势较高，多在山顶或山坡上；封土墓所处的地势较低，多在山脚和河旁的阶地上。

3. 高句丽墓壁画

壁画石室墓多分布在集安洞沟附近，外封黄土，内用石砌方形墓室，有单室和多室之分。壁画石室墓多出黄釉陶器、鎏金铜马具、金饰件等。从墓主人的身份来看，这类墓大多是高句丽王室贵族的墓葬。其年代约始于4世纪，最晚的下限可能到7世纪初期。根据壁画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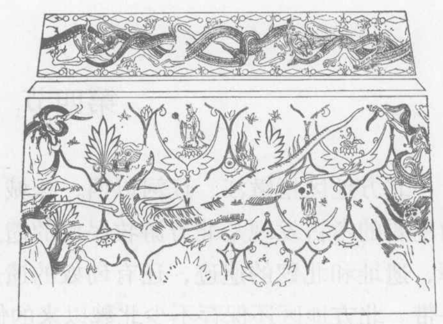
早期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上半叶，壁画多绘于白灰壁面上，以描绘贵族生活为主。如角抵墓，墓室由前室、甬道和后室组成，顶部以抹角叠涩构成穹隆式藻井，其上绘制日月星辰，墓室四壁绘制墓主人坐于杌上，妻妾侍宴，二大力士于大树下奋力角抵，白发老翁依仗观看，车马待驾。壁画运笔朴拙奔放，单线平涂，设色单纯。

中期为5世纪上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壁画在描绘贵族生活的同时，出现了四神图。如三室墓，平面呈曲尺形，由甬道相连，墓室方形，抹角叠涩藻井。第一室四壁绘宴饮、狩猎、攻城、出行。第二室四壁绘制力士、武士，藻井绘制日月星辰、仙人骑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第三室四壁绘制托梁力士，藻井绘制飞禽、走兽、莲花等。长川1号墓绘制有佛像和莲花等。舞蹈冢绘制有狩猎、舞蹈等。

晚期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壁画直接绘制于石面上。如五盔坟四号墓[①]（图二九），顶部为抹角叠涩顶。东西南北四壁分别绘制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像。衬托以火焰网状图案。藻井绘制伏羲、女娲、牛首人、锻铁治轮羽人、伎乐、仙人、日月星辰、龙虎缠斗、骑兽仙人等。线条遒劲有力而富有变化，装饰富丽堂皇，布局严谨，代表了高句丽壁画的艺术水平。从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和形式，都能看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

①吉林省博物馆：《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2期。

图二九　五盔坟四号墓壁画

4. 其他

高句丽城址、墓葬以外比较重要的遗物就是好太王碑。好太王碑全称为《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也称好大王碑、广开土王碑、广开土王陵碑、永乐太王碑。位于吉林省集安市集安镇东南 4 公里，太王陵东 500 米处。碑为方柱形，系用一块巨大的角砾凝灰岩巨石略加修琢而成，高 6.3 米，面宽 1.4~1.85 米。四面环刻碑文，汉字，阴刻，书体为隶书。东南为正面，11 行；西南为第 2 面，10 行；西北为第 3 面，14 行；东北为第 4 面，9 行。共计 44 行。每行 25~41 字不等，总计 1775 字。碑文内容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的神话传说和建国经过，并简述好太王的业绩、享年、葬期和立碑等事；第二段记述好太王南征北战广开土境的功业；第三段记述好太王陵守陵人烟户[①]的来源、家数和有关制度。

参考文献：

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 年 6 期。

杨泓：《高句丽墓葬的新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王承礼：《高句丽遗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好太王碑》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①烟户：是指好太王死后为其守墓的人家，具体分为国烟和看烟。国烟是由城民担任，看烟则由谷民担任；共三百三十家，组织结构为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其身份地位已非可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而是农民或农奴。

第四节 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指嫩江、辽河以西，长城以北，西迄新疆以东的广大地区，本区域内主要的考古发现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和魏晋墓葬。前者有被推测为鲜卑的墓葬、遗址和北魏的遗迹，还有匈奴的遗迹；后者多集中在甘肃西部的酒泉、敦煌一带。北方地区还保存不少北魏以来的佛教遗迹。

一、拓跋鲜卑遗迹

鲜卑是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民族之一，自东汉时见于史书记载以来不断发展壮大。考古发现的拓跋鲜卑的遗迹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里河镇嘎仙洞[①]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告祭祖先的石室铭，一般据以推论拓跋鲜卑早期游牧地点在大兴安岭北端东侧嫩江支流甘河上游一带。后来，拓跋鲜卑从东北南下。据《魏书·帝纪·序记》记载："南迁大泽方千里，厥土昏莫沮洳。"大泽即今呼伦池，池东南有沼泽（沮洳）区域。拓跋鲜卑南下过程中先抵呼伦池东，因遇沼泽而改向西移。到3~4世纪初，其活动范围逐渐集中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和山西大同一代，并逐渐从部落联盟转向初期国家。在他们南下、西移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遗迹，宿白先生依据这些遗迹，探讨了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②]。

1. 札赉诺尔的遗迹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里河镇嘎仙洞西南约千里的满洲里木图那雅河东岸的札赉诺尔发现大约1世纪的墓群，有人推测是《魏书·序记》所记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方千里，厥土昏莫沮洳"时期的遗迹。该墓群绝大部分是竖穴桦木棺单人葬，葬式皆仰身直肢，头向北。棺外两侧或棺盖上，或棺前端小龛内置马头或牛、羊头，棺内外散置蹄骨。有的棺底还出有一列羊距[③]骨。随葬器物种类丰富，陶器为灰褐色夹砂粗陶，有手制大口陶罐、小杯和轮制小罐，以大口平底罐和单耳罐

---

①嘎仙洞遗址发现于1980年7月，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处的一道高达100米的花岗岩峭壁上，距离地面25米。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宽19米，洞内宽敞，面积约2000平方米。洞中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至乌洛侯国祭祀鲜卑远祖时所刻的祝文，纪年为太平真君四年（443）。祝文刻在距洞口15米的西壁上，共计19行201字，字体古拙，介乎隶楷之间。内容与《魏书·礼志》所载李敞祝文基本相同。这一重要发现，证明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旧墟石室。（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

②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③距：羊、鸡等动物的附足。

最具特色；骨器有骨制弭[①]、镞、鸣镝[②]、锥、衔、扣；铜器有高足鍑、钏、透雕的动物纹带饰；铁器有镞、环首刀、矛和各种珠饰，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博局纹镜、漆奁和织"如意"二字的锦片等[③]。

2. 南杨家营子的遗迹

南杨家营子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北，乌尔吉木伦河上游，这里发现了居址和墓群，出有与札赉诺尔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小杯，骨制的弭、镞。墓葬也多是竖穴土坑，葬式单人仰身直肢葬，有的使用铁钉钉合的木棺。殉牲也用马、羊的头、蹄，也出现用途不详的羊距骨，但数量较少。此处遗迹与札赉诺尔关系密切，但陶器、骨器的制作较札赉诺尔为精细。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可知其时代较札赉诺尔为晚。因此，估计南杨家营子遗迹有可能是拓跋鲜卑从千里外的大泽南迁途中所遗留。据《魏书》记载，此后拓跋继续南移，"始居匈奴之故地"，即今戈壁之南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恰在河套东部乌兰察布盟发现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遗址可相互联系的两处墓群。一处位于集宁北、土牧尔台西南的二兰虎沟，一处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东北方。前者出有与南杨家营子相似的手制陶壶和陶铃、与札赉诺尔相似的铜鍑和三鹿纹铜牌饰。后者有与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相似的手制大口陶罐和铜钏，与札赉诺尔相似的双耳陶钵。这两处墓群均为竖穴土坑仰身直肢葬。二兰虎沟墓出有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的长宜子孙镜，百灵庙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钱。这两处墓群有可能是拓跋鲜卑迁移到匈奴故地的遗迹[④]。

3. 二兰虎沟墓地

二兰虎沟墓地位于内蒙古集宁市北察右后旗寒乌拉山，面积约1万平方米，密集地排列着许多竖穴土坑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陶器有汉式的和土著的两种，后者为手制的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为附有单耳、双耳或三耳的罐。铜鍑也附双耳。许多透雕的铜牌铸成动物形，也有少数为几何图案形。随葬的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四乳镜和铸有"大吉"铭文的铜铃，表明他们与汉文化有了一定的联系，也说明这批墓葬已经接近东汉中晚期[⑤]。

4. 完工墓葬

完工墓葬位于札赉诺尔东南约40公里的海拉尔河南岸，多为竖穴土圹桦木椁

①弭：弓末的弯曲处。《诗经·小雅·采薇》："象弭鱼服。"郑玄笺："弭，弓反末别者，象骨为之。服，矢服也。"

②鸣镝：响箭。古称"嚆（音 hao）矢"。

③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⑤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的丛葬墓。这种丛葬墓有两种形式：一种如 1 号墓。该墓下层发现 26 具人骨，位于墓内北部头向西北的一具仰身直肢骨架，左侧置石、骨镞，西侧排一列陶器，头部附近出有 1 件牛角状器，显然是 1 号墓的主要入葬者。其余 25 具不同性别的人骨，姿态不同地置于其四周和上面，而且多肢体分离，很可能是早年死亡，后来迁葬的二次葬。该墓上部出有牛、马头骨，墓内还殉牛 8 头、马 10 匹和狗 3 只。另一种丛墓葬，在桦木椁内仰身直肢的骨架排列有序，随葬器物置于头、脚两侧，殉牲置于椁上。出土的陶器有各种手制陶壶和鸭形陶器；骨器有弭、镞、鸣镝、锥、匕等；还有石镞、铁镞、铁刀、铁环和铜带饰、镂孔铜铃以及各种珠饰；此外，还有来自汉族地区的陶鬲、丝麻织物和漆器残片。从葬制和随葬器物观察，完工墓葬较札赉诺尔墓葬为早，但又与之有较多联系。因此，有人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类型的遗迹[①]。

此外，在完工和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不少处这两种类型相类似的遗迹，它们大约都是文献记载的鲜卑这一系统的遗迹。

二、慕容鲜卑遗迹

3 世纪后半叶，在辽宁西部地区出现了鲜卑族的一支——慕容鲜卑。慕容鲜卑在我国北方广大的土地上活跃了 200 余年，先后建立了几个燕国，是十六国时期立国最多的强大部族。曹魏初年，慕容鲜卑部的莫护跋率部进入辽西，从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拜率义王，始建国于大棘城（今辽宁省义县西北）北。西晋太康六年（285），慕容廆立。太康十年迁到徒河的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元康四年（294）又迁都于大棘城。东晋咸和八年（333），慕容皝称燕王。咸康七年（342）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370 年燕为前秦所灭。

分布在辽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的石椁墓，被推测为慕容鲜卑的遗迹，其中主要的发现有辽宁义县保安寺村发现的石椁墓。这批墓葬时间较早，在长方形土圹中叠砌石椁，石椁内置铁钉木棺，随葬品除陶器以外，还有金银饰品和琉璃、玛瑙等珠饰。其中三鹿纹金饰牌构图与札赉诺尔等地所出的铜饰牌极为相似，反映出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之间的联系。另外，在辽宁北票房身村也发现了慕容鲜卑的石椁墓群，石椁有大小之别，随葬品一般有轮制陶罐、漆器、铜镜和金饰，同出有綖环铜钱，时间约在 3~4 世纪。较大的石椁内置铁钉木棺，金饰较多，有缀悬可以摆动的金环、金片的金花冠饰，有人认为文献记载慕容氏上层喜戴的“步摇冠”，大约即附有这种冠饰。

3 世纪中期以后，大批汉族人逃亡到辽西，与慕容鲜卑杂居，“遂同夷俗”。朝阳姚金沟村发现的后燕建兴十年（396）昌黎太首崔遹墓[②]和北票将军山发现的北

---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区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
②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 年第 3 期。

燕王室冯氏墓群[1]，都使用了这里流行的石椁墓制。从已经发掘的冯素弗墓，可以看到更为浓厚的鲜卑习俗，但该墓也显示出较多的汉文化传统。墓中出土的 5 件罗马玻璃器，大约是经过北方柔然领域传来的，可以推知 5 世纪初北方草原一线在东西交通路线中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例如，北燕冯素弗夫妇墓，采用同坟而异葬，两墓紧邻，圹边最近处只有 20 厘米，而且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圹石椁墓。以第 1 号墓（冯素弗墓）为例，土圹上大下小，修饰规整，壁面光平。圹口长 8.1、宽 4.46~5.2 米，圹底长 6.25、宽 3.4、深 3.8 米。在土圹的西壁上，有一个凹入的龛台，龛内置釉陶壶和灰陶罐各 1 件，上置牛的腿骨、肋骨和鱼骨等，可能是祭品的余骨。在土圹之中，以灰白色砂岩砌筑长方形椁室，顶部以 9 块长大厚重的石条横铺。椁底用大小不一的石板分三行纵铺，石板下面的土层经过夯平。椁室长 4.25、宽 1.34~1.53、高 1.7~1.75、壁厚 0.4 米。整个椁室封闭严密，石缝间都塞有碎石块，盖、底的缝隙并填有木炭，盖面缝隙外部抹以石灰。椁室内部通墁一层石灰，彩绘壁画，顶部绘天象图，有日、月、星辰和流云，四壁绘墓主人家居、出行等场面。石椁的周围和椁盖之上填以黑褐色土，并经过夯打，夯层厚约 15 厘米。在距离椁顶 20 厘米处的填土中，还铺有一层放置得很不规则的大块封石。椁室之内葬柏木画棺一具，形制为长方匣形，前大后小，前高后低。根据残存部分复原得知，棺长约 210 厘米；前宽 90、高 110 厘米；后宽 60、高 65 厘米；壁厚 10 厘米。棺的左右两侧和前挡（棺的两头叫和，前和就是大头，后和就是小头）各为 7 条木枋并成，每枋上下两个并接面分别凿出榫卯相接，接缝处木枋的里外两个侧面又用木制的银锭形细腰嵌接，非常牢固。后挡是一块整板。木棺的两侧下部各钉有两个铁环。地面还有长 10、宽 6、高 2 米的东西土岗一道，应是原来封土的一部分。随葬品多达 470 余件，其中有龟纽金质“范阳公章”一方，龟纽鎏金铜质“车骑大将军章”一方，鎏金铜质“大司马章”和“辽西公章”各一方，由此可知墓主人是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冯素弗，他死于北燕太平七年（415）。

三、北魏城址

（一）都城

拓跋鲜卑在 87 年大败北匈奴之后，进入乌兰察布草原，经两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并在 258 年定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和林格尔县北 10 公里的土城子古城）。

1. 盛乐城

目前为止，明确的北魏遗迹多发现在内蒙古大青山以北，南迄山西大同一带。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始祖神元帝力微入居塞上。258 年力微迁于定襄之盛

[1]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 3 期。

乐，迄道武帝天兴元年（399）又迁都平城，拓跋氏的活动中心多在盛乐一带。盛乐古城为定襄郡成乐县址，城址依托小山丘，南傍宝贝河，为内、外重城。外郭城平面北宽南窄，形状不甚规整，东西宽1550、南北长2250米，郭城内文化层堆积较薄，只有少量北魏时期的瓦件。郭内东南隅有南北两内城，其中北内城为唐宋以来所建，南内城为汉魏遗迹。南内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残长670、南北宽655米，城内文化层堆积较厚。城内除汉代遗物外，多出北魏瓦件和铁制农具、兵器以及大量的牲畜骨骸和骨器。这些汉以后遗物的年代，虽然不能肯定都在5世纪以前，但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拓跋长期重视盛乐的物证。盛乐城东凉城小坝子滩曾发现一处金银器窖藏，出土一批兽纹金饰和驼纽"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重要遗物。金饰中的一件透雕四兽纹样的牌饰，背面刻出"猗㐌金"三字，猗㐌即神元帝力微的孙子猗㐌（桓帝），明确了这批遗物的所属，也反映了拓跋鲜卑与西晋王朝之间的关系。

盛乐城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西河子也曾发现一批金饰件，工艺水平较凉城金饰牌为高。有用细金丝编织的长128厘米的管状龙形链饰；有上部装饰多枝鹿角状物的马头形冠饰，鹿角与马耳的尖端缀悬桃形金片。这种金饰件上都嵌有白、蓝、绿等色的玻璃小片。马头形冠饰上的桃形金片形状与作用，都和北票房身村慕容氏墓葬所出步摇冠饰相似，估计这批金饰件的年代相当于3~4世纪的西晋晚期。拓跋鲜卑居塞上后，亦用步摇装饰。

盛乐城东南40公里的美岱村发现大约是4世纪末的拓跋贵族的砖室墓群，随葬器物主要有细泥轮制陶器，鐎斗、勺、灯等铜器，漆鞘铁刀和较多的铜钱，这些都已和当时中原汉族墓葬没有太大差异，但随葬品中保存了与札赉诺尔墓葬相似的铜鍑；与南杨家营子墓葬相似的铜铃；墓中还出有铜制的羊距骨，这应是拓跋鲜卑墓葬中常见的羊距骨的仿制品。此外，一座墓内还随葬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同样形制的护军铜虎符过去曾在平城遗址中发现。

2. 平城

398~495年，平城为北魏都城，其遗址在今大同市城区及其附近。根据文献记载，平城在内城的东、西、南三面筑有郭城，周回三十二里。内城，也称中城，有城门12座，北部为宫殿区，皇宫占中部和西部，称西宫；太子宫在东部，称东宫。两宫各自修建宫城。在西宫的南门之外有御道，形成都城的中轴线，道东为太庙，道西为社稷。内城的南半部为衙署、庙社、贵胄甲邸和驻军。外郭之内筑有坊、市，形成网格状街道，南部为主要居住区。这种在郭城之内修建坊市的做法，影响了迁都后的洛阳和隋大兴城。内城之北为内苑，分北、东、西三苑，北到方山，东到拜登，西到西山。苑中有离宫等游玩设施，也有园圃、鱼池等生产区，西苑则为狩猎区。南郭城及城外，渠道纵横，池塘布列，是较低洼的地带。仿照汉洛阳先例，在南郊建明堂。北魏祭天原在城西进行，到太和十二年，也仿洛阳制度，

在南郊筑天坛。

历年在大同城北到火车站一带发现北魏捺印花纹的灰黑色陶片、大瓦和“富贵万岁”、“忠贤贵永”瓦当，车站东北还发现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推测这一区域可能是宫城、衙署的范围。在火车站以北还发现东西向城墙，另在火车站以东发现南北向城墙，很可能是宫城或内城的城墙[①]。大同南郊出有雕刻精致的石砚、银器、铜器以及成批的鎏金铜具，还发现排成一列有方形础石的建筑遗址，应是平城南部的一处宅第遗址[②]。明堂辟雍遗址已被发现，平面呈圆形，直径达 290 米。明堂位于遗址中央，为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 43 米。外围是环形水沟即辟雍，周长 900、宽 6~15、深 1.4 米，皆用砂岩块石砌壁。该遗址的发现，为寻找北魏平城的城垣及中轴线提供了重要证据[③]。

（二）其他城址

呼和浩特北傍的大青山南北麓分布有较多的北魏小型城址。这些小型城址多属北魏时期所建的镇城，有的只设南门或南北门，城内的主要防区都遗有高大台基。镇城之北或增建郭城，或阻有河流；有的还建有与镇城相呼应的外围据点。这些镇城是北魏抵御柔然、屏蔽平城的军事重地。已发现的军镇城址，可初步考订的，有位于乌兰察布盟内武川县西南的武川镇城址、四王子旗乌兰花的抚冥镇城址、察哈尔右翼后旗的柔玄镇城址，有位于巴颜淖尔盟乌拉特前旗的沃野镇城址和包头市固阳县的怀朔镇城址，有位于呼和浩特西北 5 公里的坝口子村的白道城址。另外，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石子湾也发现一处军镇城址。在这些军镇城址中，经过考古调查的有 4 处。

1. 坝口子村土城

呼和浩特西北 5 公里的坝口子村土城，有人考证是有名的白道城址，城东西宽 360 米，南北长度因北城墙无存而不明。城内南部距南墙约 170~190 米处筑有东西向土墙一道，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城内西距城墙约 150 米处又有南北向土墙一道，将南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内发现北魏晚期石佛背光残片，还发现了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一世（531~579）银币 4 枚。白道城是大青山诸军镇的后方据点。

2. 土城梁古城

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内武川县西南约 20 公里处，由南北二城组成。南城纵长约 130、横宽不足 100 米，南墙正中开门，城内中部偏北有建筑台基，遗留有北

---

①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遗迹——北魏遗迹》，《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文物出版社，1972 年。

③刘俊喜、张志忠：《大同发现北魏明堂辟雍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 年 1 月 12 日。

魏时代的瓦当、箭镞、铁犁等器物。城外东、西、北三面也散布有与城内相类似的建筑构件。北城位于南城正北，两城相距约50米，南北纵长400多米，东西宽300多米，城内遗物与南城基本相同。有人考订该城是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所筑的武川镇城址。

3. 石子湾古城

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石子湾村东，城北临河流，东西为起伏的山岭。城南北长约240、东西宽约160米。城内多台基遗址，除北魏时期的建筑材料外，还有绳纹砖和卷云纹瓦当，城内东、西、北三面都有较厚的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北魏文化层①。

4. 卓库伦古城

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乡西南约15公里，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五边形，东西长约1300、南北宽约1000米。城址的西南隅建有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子城，东西长约220、南北宽约360米。城内南街与东街在城址中心汇合，呈明显的"丁"字形相交。据考订，该城为北魏时期的怀朔镇城址②。

四、大夏和吐谷浑城址

（一）大夏城址

4世纪末，游牧于朔方一带的匈奴、鲜卑诸部，在南匈奴遗族赫连勃勃统率下，逐渐强大。《晋书·安帝纪》记载："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国号夏。"并于大夏凤翔元年（413），"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又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记载："（叱干）阿利性巧而残忍，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关于其名称，《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记载："赫连勃勃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据《水经注》卷三记载，统万城是利用汉代奢延县城旧址改建而成。该城于赫连昌承光三年（427）被北魏攻克，其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先后又被建为统万城、夏州、朔方郡治所③，至北宋淳化五年（994）被宋太宗下诏毁废④。但后来仍为西夏所据，谓之"平夏城"，李继迁徙绥州吏民之半入住，至元朝始废⑤。统万城元代之后寂然无闻，到了清道光年间，时任陕西怀远县（今陕西横山县）知县何丙勋奉榆林太守徐松（一说李熙铃）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一

①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白灵淖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

③（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④《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九《废夏州旧城诏》。

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一。

说为道光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前往踏查，写出禀稿，后刊布于世，统万城遗址遂渐为学界所知[①]。20 世纪 50、70 年代分别对其进行过调查[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于 1976~1977 年 3 次调查并试掘，并写成《赫连勃勃与统万城》一书，1990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考古调查的同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于 1964 年 7 月对统万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先后在《地理》1965 年第 1 期及《文物》1973 年第 11 期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与《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两文。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不仅开拓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也开拓了统万城研究的新领域[③]。

统万城遗址在今陕西靖边县城北 55 公里处，其遗址分东西两城，平面均呈长方形，两城外围有郭城。西城和郭城都用略带青灰色的夯土版筑。东城是后来所建，所以西城应当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七记载，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门为朝宋门，东门为招魂门，西门为服凉门，北门为平朔门。城墙外侧建马面，其中南墙马面每座长 18.8、宽 16.4 米。在城的四隅都建有突出城外的角楼，这种将角楼台基加宽的做法，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城内中部偏南残存平面呈长方形高约 10 米的建筑台基一处，附近出土有花纹方砖和大瓦，当是大夏的宫殿遗址所在。

郭城东西城墙垣相距 5 公里，南北城墙情况不详，可知其面积相当宽广，但其中可肯定为大夏时期的遗物却极为稀少，可能是赫连勃勃建都后仍没有改变畜牧经济的缘故。

（二）吐谷浑城址

吐谷浑原是慕容鲜卑的一支，3 世纪末西迁，6 世纪于青海湖西岸建都城伏俟城，其遗址即青海省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外郭城用砾石叠砌而成，东西宽约 1400 米，北面城墙已毁，长度不详。郭城内偏东处有南北向内墙一道，西部有长、宽近 200 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东壁开设一门，城内就西垣建方形台基，约是宫殿所在。台基向东有街道直通城门，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据《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这既说明了古城地面遗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出西徙青海的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仍以随水草畜牧为主。伏俟城西通若羌，东联西宁、兰州。5~6 世纪，吐谷浑又向西占据今新疆境内“丝绸之路”南道。因此，祁连山南的中西交通曾兴盛一时。西宁旧城内

①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②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 期；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遗址勘测记》，《考古》1981 年第 3 期。

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序一》，三秦出版社，2004 年。

曾发现 1 件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其中外来银币约在百枚以上，后来搜集到的 76 枚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时所铸，可以认为这批银币是 5~6 世纪经过伏俟城附近的中西交通线往还频繁的证物。

五、平城墓葬

主要为北魏迁洛以前的墓葬。墓葬形制有前后室砖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竖穴土坑墓等。前两者多为汉人或汉化了的鲜卑人墓葬，后两者多为鲜卑人墓葬，两者在随葬品和葬俗上有很大差异。汉人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多与中原地区型类似，而鲜卑人墓葬的随葬品多为各类陶罐等，并殉葬动物骨骼等，保留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些墓葬中出土有外来的金银器、玻璃器等，是研究平城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遗物。

1. 前后室砖墓，有的带有耳室。

典型的有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主室平面近正方形，长 6.12、宽 6.01、高 5.2 米，四壁外凸略呈弧形，上部内收成四角攒尖式；前室较小，四壁平直，也为四角攒尖式，东侧有一个小耳室，南壁开门，门前甬道长 3.7 米；斜坡墓道长 28 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10 个字。墓葬虽然早年遭到盗掘，但仍然出土了大量陶俑和陶器、瓷器、铁器、石雕、漆木器、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还有一方延兴四年（474）姬辰墓志①。另一座比较重要的前后室砖墓是北魏封和突墓，墓中出土了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②。

2. 单室砖墓，多为带天井和过洞的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

例一，山西大同北魏宋绍祖墓，是一座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葬具使用了石椁，石椁的内壁绘有壁画。出土了大量的陶俑、模型明器等③。墓主人可能是一个汉化了的鲜卑人。

例二，大同市沙岭发现的 7 号墓，是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壁画分布在墓室四壁和甬道的顶部、侧部，保存基本完整，总面积约 24 平方米。北壁壁画分上下两栏，上栏绘奇禽异兽，下栏绘车马出行。车马出行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从上到下共排列 7 排，分别绘有列队的侍女、导骑、骑乐、仪仗等，队伍中间是一辆高大华丽的车。东壁正中绘一高大的建筑物，庑殿顶，鸱吻上翘，顶中间站立一只金翅鸟。建筑内挂有帷幔，里面端坐男女二人，应为墓主人夫妇。建筑物周围有车辆、马匹、人物等，两侧各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南壁的主要内容是宴饮和庖厨。围隔的步幛弯弯曲曲，将场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绘有居住房屋和数量较多的乐伎、侍仆、食物、

①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 年第 3 期。
②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7 期。

酒具以及马匹，是一幅场面较大的群宴图。西部绘有粮仓、装满货物的两轮车、红顶卷棚车以及4个顶部可以开启的毡帐。大的毡帐中有端坐和站立的女性，周围放置许多食物和温酒尊等生活用具，还绘有持物忙碌的侍仆和伴奏表演的乐伎。西壁壁画绘于墓室入口两侧，红边作框，其内各绘有一个双腿分开站立、单手高举盾牌的武士。甬道顶部则绘汉晋时期常见的伏羲、女娲神话题材。伏羲、女娲为人面蛇身，头戴花冠，眉目清秀，下半身交缠在一起[①]。

3. 单室土洞墓，墓道分为竖井式和长斜坡式。

大同南郊发现了54座竖井式墓道单室土洞墓[②]，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一般呈梯形，底部平坦，顶部由墓门处向后倾斜，靠近墓门处有的设置小壁龛。墓道平面呈长方形，直壁竖井式，底部一般为缓坡状，向墓门方向倾斜。墓门的宽度与墓道相同或相近。葬式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数双人合葬或其他葬式。随葬的陶器主要放置在木棺前后及两侧。棺内或骨架上及周围发现的陶器，估计是原先放置在棺盖上，棺木腐朽后塌陷所致。有的在壁龛或棺前殉葬牲畜和家禽，兽骨多属头骨或部分肢骨。这些墓葬可能是鲜卑人的墓葬。

大同南郊发现了95座长斜坡墓道土洞墓[③]，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窄长的梯形、刀形或方形，而以窄长梯形平面的墓葬数量最多。这些墓葬的陶器明显带有鲜卑陶器的特征。

墓室平面呈窄长梯形的墓葬长3米左右，宽1米以上，墓室顶部由前向后倾斜，有的墓葬还在一壁或两壁设小龛，小龛置之中有兽骨。墓道平面呈长方形，略窄于墓室，长5~10米，宽1米左右，底部呈斜坡形。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个别的侧身，也有双人单棺合葬者。随葬品多放置在棺前，种类主要有陶罐、铜器、金银器、玻璃器、铁器、漆器等。如M107出土了13件随葬品，其中有素面银钵1件、波斯刻花银杯1件、银钏1件、银笄1件、铜头饰1套、铜面饰1件、玛瑙珠1组、陶罐5件、残漆盘1件等。M109出土的随葬品有陶罐4件、壶1件、盆1件、陶罐内置石灯台1件、铜罐1件、铜盘1件、铜环1件、金耳环1件、铁剪刀1件、铁镜1件、鎏金刻花银碗1件、玻璃碗1件，铜盘内置漆耳杯和木盒各1件，还有核桃、红枣、松籽、果核等。

墓室平面呈刀形的墓葬，墓道偏于墓室一侧，墓室长约3米，最宽处约1.5~2米。墓室内置单棺或双棺，葬式为仰身直肢。如M79的墓室长2.2、宽0.6~1.6米；墓道平面呈长方形，上窄下宽，上口长8.7、宽0.6、底宽0.8米。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陶罐3件、漆器1件。

墓室平面近方形的墓葬数量较少。如M112，呈不规则方形，墓道位于墓室南

①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部，长 9.94、宽 0.73。墓室北侧墙壁之下置石棺床，棺床侧面浮雕忍冬纹、水波纹、花瓶和铺首衔环。棺床内填黄土，床面用 4 块不太规则的石板平铺，周围散存烧土和灰土，灰土中包含少量碎陶片及动物骨骼。棺床上未见葬具，人骨架保存完整，床侧随葬小型陶器 3 件。

4. 竖穴土坑墓

大同南郊发掘了 17 座竖穴土坑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有的近似梯形，墓口一般较墓底略大，四壁规整，底部平坦。一般长约 2.5、宽约 1、深约 2 米。葬具均朽，仅留棺痕，前部高宽，后部低窄。葬式多采用仰身直肢葬，少数侧身或俯身。随葬品较少，多为陶器，一些墓中发现兽骨①。

六、河西魏晋十六国、北朝墓葬

甘肃西端的酒泉、嘉峪关和敦煌一带，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多分布在戈壁滩上，坟丘多由砾石堆成，排列有序的坟丘的四周保留有砾石堆砌的方形茔域围墙的遗迹。茔域内的墓葬，多于砾岩中挖凿洞室，大中型墓还在洞内砌砖室。酒泉、嘉峪关多大中型墓，敦煌多中小型墓，两地曹魏、西晋墓和西晋末十六国墓区别较大。有些大中型墓葬绘壁画，也是这一地区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然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接近河西的宁夏彭阳新集发现的北魏墓葬②，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十六国以后的墓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曹魏、西晋墓有具前、中、后三室的大型墓，较多的是前后双室的中型墓。这两种墓都是砖室墓，墓门拱券之上砌出有建筑雕饰和彩绘的高门楼，墓室多附有耳室，嘉峪关墓墓室壁面多嵌砌画砖或绘小幅壁画，主要内容有庄园耕牧、采桑、打场、放牧、酿造等生产场面，墓主人出行、狩猎、宴饮等生活场面，与军事防卫有关兵屯、营垒、坞壁的场面，以及建筑装饰图案的莲花等③。其中的新城 1 号墓墓主人持扇坐榻上，侧有“段清”榜题，该墓随葬陶器、铜铁镜等都与中原魏晋墓相似，还出有剪轮五铢铜钱，是酒泉一带魏西晋墓的典型实例。敦煌佛爷庙发现的翟宗盈墓，墓室无壁画，画砖也只嵌砌在高门楼上，但高门楼上还有复杂的建筑雕饰，随葬品多陶器，所出长方形陶槅与中原魏西晋墓相近。

西晋末十六国墓，酒泉丁家闸曾发现的具有前后室的中型砖室墓，无耳室，墓门上方的门楼低矮，只有简略的彩绘。墓室壁画除与前期内容近似者外，出现了

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8 期。
②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 年第 9 期。
③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 年。

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神兽和各种云气纹样，墓主人持麈尾①坐榻上，前置凭几，上绘曲柄盖，与前期简单的墓主人形象不同。随葬器物除陶器外，还有铁镜、铜饰、铜钱和漆盒、石砚等②。敦煌多单室洞室墓，无壁画；较大的洞室墓除陶器外，还随葬有蝉纹金饰片、铜饰、铜钱、铁剪刀和云母片等；较小的洞室墓随葬品只存有陶器、铁镜和少量铜钱。

北朝墓葬，多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和过洞的单室墓，地面设施有封土堆。有的封土堆之下有土筑的房屋模型③，非常罕见。

参考文献：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杨泓：《鲜卑遗迹的发现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第五节　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的遗迹和遗物，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若羌、民丰附近和库车、拜城、新和一带。

一、吐鲁番一带的遗迹

吐鲁番盆地在汉通西域以前，姑师（后改称车师）于此立国，王都设置在今交河故城。汉通西域以后，神爵二年（前60）战败匈奴，击破姑师，遂于其地设屯田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改屯田校尉为戊己校尉，治所设在高昌壁。晋咸和二年（327）至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废戊己校尉设高昌郡，治所也随之易名为高昌城。沮渠氏承平元年（442）迄麴氏延寿十七年（640），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先后在此建立高昌国，都城均设置在高昌城。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沮渠无讳破车师，车师王舍国率部分臣民逃奔焉耆，吐鲁番盆地遂完全置于高昌国的控制之下。

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枢纽，是新疆地区通向内地的重要地点，附近发现的遗迹有城址、墓葬和少量佛教遗迹。

---

①麈尾：即拂尘。魏晋人清谈时常执的一种拂子，用麈的尾毛制成。《世说新语》：“王夷甫（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麈，兽名，似鹿而大，其尾辟尘。

②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

③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

（一）城址

1.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吐鲁番西约50公里的哈拉和卓附近。该城肇始于汉魏晋时期的高昌壁，以后又历高昌郡治、高昌国都、唐西州州治和高昌县治、高昌回鹘国都等几个阶段，前后历时1400余年，俗称“高昌故城”。元末明初荒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人克列缅茨、德国人格林威德尔和勒柯克、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先后到高昌城址进行调查和劫掠文物。斯坦因还测绘有高昌古城图。1928年和1930年，黄文弼曾先后两次到此进行调查、发掘。

现存城址是高昌回鹘时期在唐代高昌城的基础上改建增筑而成。遗址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周围约10公里，平面略呈不规则方形。城墙残高约5~11.5米，夯筑而成，夯层厚8~12厘米。城墙有弧线及内凹现象，墙外筑有较密集的马面，遗存5座城门缺口，个别的还有瓮城残迹。

内城大致位于外城中间，城周约7公里，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城墙夯筑，西墙和南墙保存较多，北墙仅余部分残迹，东墙已毁，城门无存。内城主要为宫城及寺院遗址。外城有寺院和民居遗址。残存遗迹中，比较重要的有四处：

（1）内城中部偏北的堡垒式建筑，平面略呈不规则圆形，周长约700米。内有残高约15米的土坯塔及一些殿基残迹，俗称“可汗堡”，似为宫城。

（2）外城北部中部建筑基址群，规模较大，与宫城关系密切。

（3）外城东南部有塔基和残窟，窟内残留壁画。

（4）外城西南部有四合院式寺庙遗迹，残存有多层龛的塔基及附属建筑残遗迹，城内遗物种类繁多，其中以回鹘时期的摩尼教壁画、经典、文书，佛教壁画、塑像、经典及各类文书的数量最多而且最为著名。回鹘之前的遗物以唐代的居多，但以北凉承平三年（445）《凉王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最负盛誉。传统的观点认为，该碑是在1902~1903年间，由德国格伦威德尔率领的普鲁士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于高昌故城的一所废弃寺院中发现，并运回柏林的。最近，新的观点认为，此碑是1882年出土于高昌故城，1902年冬德国人格伦威德尔率领的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在胜金口进行发掘时，听到关于此碑的消息，从当地挖宝人手中买下，运回柏林。

2.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吐鲁番西约10公里处的雅尔乃孜沟村。黄文弼先生在对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考释中说，汉时曾在此设交河壁。晋时此地属高昌郡。高昌国时为其一个郡。唐贞观十六年（640）以后，为高昌郡的交河县城。后又归回鹘高昌。19世纪末，到中国探险的人大多到过该地进行所谓的发掘、考察，使得城址遭到很大破坏。清徐松到此进行过考察，据其《汉书·西域传补记》云：“交

河县有交河水，源出县北天山。今吐鲁番广安城西二十里雅尔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

交河故城建在雅尔乃孜沟中间的土崖上。土崖表面现在距水面约 30 米，南北长 1650 米，最宽处约 300 米。建筑遗址主要集中在崖上的中部和南部。由于沟中之水在土崖北端分流，在南端合流，故名交河。《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王国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名交河。”现在的居民呼其为“雅尔和图”。“雅尔”，突厥语义“崖岸”；“和图”，蒙古语义“城”，可合译为“崖城”。由于其地理位置是地控天山南麓，北接匈奴，西去龟兹的交通要道，而且土地适宜耕种，因此从汉开通中西交通时开始，便成为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

在城的东侧和南端各保留一处延伸到崖下的路口，应是原来的出入通道。东侧通道路口两侧崖壁高约 5 米以上，两侧崖壁上凿有对称安装门额的方孔，门外是循崖上下的颇道。崖上建筑群外侧没有城墙围绕，只在较低的西南崖边有一段断续的土墙。建筑群中央有一条南北长约 350、宽约 10 米的大街。大街北端是城内最大的寺院，大街南端和东侧各有巷口通往城外。大街两侧是高而厚的土墙，没有向街的门户。由大街分出的纵横小巷将建筑群分割为若干区，只在小巷两侧才有院落的门户。中央大街以西以北是寺院集中的区域。各个寺院的建筑大都左右对称，中央的殿堂里都有坛座或龛柱。中央大街以东的区域，院落既不方正，房间也很狭窄，各院落的建筑物更少对称的布局，推测可能是居民区。

在城址中普遍采用适用本地自然条件的建筑技术，即“减地留墙法”，这种建筑技术在新疆地区非常流行。一般在土崖地面上挖去墙与台基以外的生土，使之形成墙与台基。城中建筑物多用生土墙支撑屋顶。多层建筑物则在相对的墙面上对称地挖出椽孔，用椽承接楼板。有的下层是生土墙或券顶窑洞，上层以版筑、泥垛的墙壁支撑木构顶架。屋顶多用泥土覆盖，极少用瓦修葺屋顶，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干燥，雨雪极少。在城西南 1.5 公里的河水右岸有一处佛教寺院，有 7 个并列的洞窟，窟内尚存壁画和回鹘文题记。

城西与城南隔河有交河世家大族的墓地。墓地依姓氏分别修建茔域，地面上用自然石块垒成茔墙和封土、墓道的标帜。高昌至唐代的墓葬都是有墓道的洞室墓，墓内的埋葬习俗与墓志风格多与晋唐之际的墓葬相同。

这两处重要城址，由于唐以后的多次破坏，已经辨认不出早期的面貌。但两城都保留了大批古代墓葬，这批墓葬中属于唐设西州以前的，可分两期：前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和车师墓葬；后期是麹氏高昌墓葬。麹氏高昌始于北魏景明元年（500），亡于唐贞观十四年（640）。

（二）墓葬

1. 魏晋十六国墓葬

多分布在哈拉和卓古城之北的哈拉和卓和西北的阿斯塔那两地。目前发现最

早的纪年墓，出有晋泰始九年（273）买棺木券。最晚的出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0）残文书，当是阚氏高昌时期墓葬。

墓葬大都前设斜坡墓道，有的墓道为竖井式，墓道后凿洞室墓室（也被称为掏洞墓）。墓室有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方梯形两种，均长3米左右。方形墓有的附耳室。两种墓室的顶部多作盝顶。少数方形墓中绘有壁画，内容有墓主人席地坐像，也有厨事、出行、耕牧、果园、葡萄园和日月等。葬具多用木棺，棺盖作两面坡式，有的木棺前档板上画出七星；有的使用梯形木架式葬具，下面铺芦柴。时代较晚的多无葬具，尸体横陈在后壁前。随葬品多置棺前或尸体头部附近。时代较早的多木器，有盘、耳杯、碗、勺、灯座、衣架，有的还有彩绘木俑和木马、木牛车；时代较晚的多改用陶器，有盘、碗、壶、罐、釜、甑、灯等，部分陶器外壁出现彩绘的莲瓣纹饰，出现"代人"木牌。纺织品多麻、毛、棉织物和单色绢，较早尚有刺绣、锦和织成履，较晚则多出绞缬①和蜡缬②的绢片，也有少量的刺绣。此外出土有漆器和五铢钱等。纸质的衣物券有被保存下来。

还发现较小的竖穴土圹墓，这类墓个别用棺，多数用破毡、柴草捆绑尸体入葬，一般没有随葬品，有的仅有罐、碗、盘之类的陶器。

墓葬类型差别显著，和内地相似。较大的方形墓壁画内容与酒泉魏晋墓接近，随葬品中如木制器皿、明器和丝织品，也和酒泉魏晋墓、武威东汉晚期墓类似。以上情况反映出这个时期大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高昌直接、间接为凉州所属的历史事实。

2. 车师墓葬

车师人墓葬分布在交河古城北，多为西北、东南向的竖穴土坑墓，头向西北，直卧穴底，无葬具。随葬带把陶杯或一浅陶钵，有的有内置双杯的盘形钵。杯钵多手制，器体厚重，陶质含砂，器底有熏痕，显然都是直接触火供烧烤用的器皿。有的墓还出兽形铜环和铜片。这类墓出土的带有莲瓣装饰的陶钵和上述与西晋时期流行的一盘两耳杯相类似的钵杯组合，似可说明这类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迟到

①绞缬：又称"撮缬"、"撮晕缬"，民间通常称"撮花"，是我国古代纺织品的一种"防染法"染花工艺，也是我国传统的手工染色技术之一。《一切经音义》："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也。"它依据一定的花纹图案，用针和线将织物缝成一定形状，或直接用线捆扎，然后抽紧扎牢，使织物皱拢重叠，染色时折叠处不易上染，而未扎结处则容易着色，从而形成别有风味的晕色效果。东晋时，此种工艺已在民间流传。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紫缬"和"鱼子缬"图案。隋唐时期，绞缬更是风靡一时，史料记载的绞缬名称就有大撮晕缬、玛瑙缬、醉眼缬、方胜缬、团宫缬等。在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绞缬织物上的针眼和折皱至今仍依稀可见，显示了唐代高超的绞缬技术。北宋初，绞缬工艺仍然盛行。但在宋仁天圣年间，惟有兵士方可穿戴缬类服装，民间禁止使用缬类制品，这项规定直到南宋时期才被废除。

②蜡缬：又称蜡染。用蜡在织物上画出图案，然后入染，最后沸煮去蜡，则成为色底白花的印染品。由于蜡凝结收缩或加以揉搓，产生许多裂纹，染料渗入裂缝，成品花纹往往产生一丝丝不规则纹理，形成一种独特的装饰效果。

北朝以后。这类墓的形制和随葬品差别不大，反映了当时居民贫富分化还显著，与哈拉和卓古城北大小贫富相差悬殊的墓葬相比，族别有所不同。文献记载这里是车师前王庭所在地，推测这类墓即是"有城郭田畜"的车师人的墓葬。

比上述墓葬年代较早的汉代车师墓葬，在交河故城西北发掘了55座。墓葬形制以竖井式墓道的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墓为主。葬具分为三种：一是墓底铺草，墓口搭棚；二是使用木棺；三是使用尸床。埋葬方式主要为合葬，也有部分单人葬。合葬以夫妇合葬为主，也有男女二人与婴儿合葬、多人合葬等方式。普遍存在殉葬马（驼）现象，殉葬坑为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竖穴土坑。其中的2座石堆墓，地表有直径15~40米的圆形石堆，墓室位于石堆之下，在石堆之下墓室外围的地面上用土坯垒成高0.6、直径10米左右、平面呈圆形的围墙，环绕围墙分布多个附葬墓和殉马（驼）坑，殉马（驼）坑成排布列，每坑殉1~4匹马（驼）[①]。

3. 麹氏高昌墓葬

麹氏高昌时期墓葬遍布于哈拉和卓古城北和雅尔湖古城西、南两面，与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最大的不同表现在，较普遍地出现了家族茔地，即多为两座以上以至数十座排列有序的墓葬群。每个墓群都有砾石围墙。这种家族墓说明麹氏高昌的一些豪宗大族世代相继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权。

墓葬形制略同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较大的方形墓，但耳室逐渐消失，室顶渐趋平圆，四壁出现了外凸的弧线。由于墓道后侧出现记录墓主人姓名、官职和入葬年月的墓表，可据此了解麹氏高昌纪元的顺序，了解各茔城内墓葬排列的一般规律和按姓氏排列的特殊规律；同时还可了解一墓兴建后，可以继续入葬，有的前后相距竟达三四十年。此外，又大体清楚了高昌官制，为识别高昌墓葬的等级差别提供了重要根据。

高昌墓葬的等级差别反映在墓葬形制上。高昌第二级官吏的墓室，平面方形，边长4米左右，自第三级以下，则以长3米左右前窄后宽的方梯形墓室为多。葬仪和随葬品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同，但和魏晋十六国时期相比，木棺稀见。墓室中出现了粉饰的土尸床，有的尸体下部垫苇席，时代较晚的有在死者的眼上置波斯银币，口中含波斯银币或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墓室顶部或尸体上钉悬或铺盖大幅绢地的伏羲女娲彩绘像，有的墓壁还悬挂绢质的壁衣。丝织品中较多地出现了6世纪中叶以后中原织造的锦、绮之类的高级织物。流行随葬小型的非实用的绢制冥衣和卧具。这时出现了一种帽套式的绢制面衣，面衣前部缀饰一块长约20、宽约15厘米的织锦，织锦下面相当眼的部位，缝缀了一片铅质的"眼罩"。陶器质量粗劣，形体变小，但种类数量显著增多。陶器外壁彩绘规整的仰覆莲瓣纹。延昌时期（561~601）之后陶器纹饰开始简化，制作更加粗糙。罐、瓿之属向高发展，小型陶器如碗、盏、灯之类增多。出现了"高昌吉利"铜钱，还出现了纸钱和蒲草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俑。一些高昌墓中还发现了完整和剪残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提供了高昌生产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资料。一座较晚的高昌墓中还发现了1件粟特文书，它大约可作为高昌文字“兼用胡书”（《周书·高昌传》）的物证。

二、若羌和民丰附近的鄯善遗迹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中部以东，属于鄯善领域。鄯善遗迹以若羌和民丰附近的发现最为重要。

（一）若羌附近的遗址

1. 楼兰古城遗址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的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上，属于若羌县。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床的最近地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岸28公里。具体经纬度为东经89°55′22″，北纬40°29′55″[①]。楼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139~前129）后上书汉武帝，说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今罗布泊）”。楼兰古城不仅是楼兰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在汉晋时期对西域的开发和经营中起过重要作用。它在繁荣了几个世纪之后，随着罗布泊自然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湮灭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云：“故城禅国名耳。”由此可知，至迟在北魏时期楼兰古城已经废弃。又根据城址中发现的有纪年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推测废弃时间应在前凉时期，较大可能在前凉后期。

楼兰古城遗址是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所谓探险热潮的兴起，在地理考察中偶然发现的。最先到达这里的是瑞典人斯文赫定。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考察时，他的一名随从、罗布人于得克因为迷路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城。翌年，他又来到这里，挖掘了许多木简、残纸和其他珍贵文物。接踵而至的有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他们从这里掠取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使得世界为之震惊，也使楼兰古城闻名中外。我国学者于1979年至1980年间，曾经3次深入罗布泊腹地，对楼兰古城遗址及其周围墓葬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从调查和发掘的结果来看，城址平面略呈方形，按照复原线计算，东面城墙长333.5、南面长339、西北两面均长327米。城墙夯筑而成，夯土中夹红柳、芦苇枝。城内东北有土塔，塔附近应是寺院遗迹。城西部是大小宅院遗址。城中部偏西南的建筑遗迹规模较大，曾出土丝毛麻织品、铜镜片、铜铁镞、大小五铢铜钱、陶灯、木制用具和各种装饰品，还出土有用汉文、佉卢文、粟特文写在木简

---

①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牍、绢、纸上的各种文书。汉文文书的数量最多，其中有外地寄给西域长史的函件和西域长史府掾属承办的文件。汉文文书纪年最早的是魏嘉平四年（252），最迟的是前凉沿用的西晋纪元——建兴十八年（330），可知此城址应是魏晋前梁时期西域长史治所所在地。

城内的水道从城址的西北角经过三间房官署遗址附近伸向城址的东南角，基本上呈对角线状穿城而过。水道北端与流经古城以北附近的干河床相接，南端与流经古城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从水道比较平直规整的走向来看，可能是人工开凿而成的。

城址西北郊有烽燧遗迹，东北郊有墓群分布，北郊有佛寺址。1980 年 4 月，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发现魏晋时期木简 63 枚、佉卢文[①]残木牍 1 枚[②]。

2. 海头古城遗址

海头古城遗址位于罗布泊的西南缘，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重镇，当时的西域长史府曾一度驻扎这里。楼兰废弃后，海头古城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要冲。斯坦因将海头古城编号为 LK 古城。1988 年，新疆文化厅组织罗布泊文物队在楼兰古城西南找到了“海头”等两座古城，测绘了这两座古城的地形图，在国内是第一张，并采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填补了罗布泊地区考古的空白。关于海头古城的历史资料很少，《西域地名词典》的“海头”云：“海头，三国、魏地名。魏、晋时为西域长史治所。故址在今罗布泊北岸之楼兰故址。”此说关于海头古城的位置有误，将海头古城和楼兰古城混淆。

LK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墙长 163、南墙长 82、西墙长 160、北墙长 87.5 米，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城墙多为夯土（间红柳和胡杨枝）建筑，只有东墙北段局部用土块垒砌。城墙残损严重，一般残高约 3~5.4 米，顶部残宽 1.5~6.5 米，墙基厚度约 7 米。城门开于东墙南端，门宽 2.3 米，门道两侧壁底部有木础，其上各有 9 根立柱，门内一侧有两个横木与木础连接构成门框，门框是用断面长 27、宽 20 厘米见方的方木榫卯相连构成。城门已经倒塌，木材均散乱分布在城门内外。在古城西南约 300 米处有一建筑台地，台地长约 20、宽约 8~10、高约 2 米，其上散布着许多有榫卯结构的木材，有柱础、八角柱等，地表还可见陶片、铜镞、冶炼渣等。东北角和东南角以至整个东墙已被流沙覆盖；南墙下是一长 40、宽 20、深约 2 米的洼地。城的南半部建筑物保存较多，虽大部已被流沙掩没，但仍可辨房屋的遗迹。房屋主要为木柱框架编排红柳枝、芦苇外抹草泥的“木骨泥墙”式建筑。框架多已倒塌，但仍有个别柱子与架底横木相连而耸立着，也发现保存完好

①佉卢文：古印度的一种文字，横书左行，属于塞姆（闪）语系的阿拉米文系统。公元前 5 世纪~公元 3 世纪盛行于印度半岛西北部。4 ~ 5 世纪，因为受到梵文排挤，逐渐绝迹。

②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 年第 7 期。

的柱础、斗拱等。

3. 米兰遗址

米兰遗址位于新疆若羌县城东 80 里处的米兰地区，遗址东西长 11.4、南北宽 4 公里，分布于 45.6 平方公里的范围，由佛寺、古灌溉渠道、烽燧、唐代吐蕃戍堡和周围分布的魏晋时期的古建筑群遗址，以及汉代屯田水利工程设施和伊循城遗址所组成。遗址距米兰河 3 公里，城西南及东北残存土块建筑的佛寺 3 处、佛塔 8 座和古灌溉渠道，城西部、北部分布烽燧 2 座。遗址的年代为汉至唐。学术界认为今若羌米兰是文献记载的汉代西域楼兰国之伊循城所在地，是鄯善国的一个重要屯田地区。汉昭帝元凤四年（前 77），鄯善（古楼兰国）王尉屠耆请求汉王朝派一将领兵到此屯田积谷，汉王朝即派一司马和吏士 40 人屯田伊循。

20 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曾在此地进行发掘，盗走了塑、壁画等大批文物。20 世纪 50 年代，在米兰遗址发现了完整的汉代渠道等水利工程系统和埋在沙漠下的大片良田。1973 年，又在米兰古河道边发掘了唐代吐蕃戍堡遗址。

伊循城址内有两座佛寺即东大寺和西大寺。东大寺是米兰遗址中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分上下两层，高约 6 米，外面有较高的院墙，寺内建有一个长 12、宽 2.4、高 0.6 米的佛龛，龛内尚存半浮塑的菩萨和天王像，其下面四周还存有卷云柱头浮塑。佛殿废墟东侧的建筑物下面，尚存大型坐佛塑像和遗弃在地上的大佛头。西大寺是与东大寺相对而建，以长 12.2、宽 5.6 米的长方形须弥座式基座为中心，外绕走廊，基座上建有直径 3 米左右的圆形建筑物。寺院布局形式代表了西域早期的佛教寺院特征，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城外还有其他佛寺 3 座。位于城址西南及东北的佛塔群中，均为土块建筑。其中两座在城西南，相距约 40 米。一座有长宽均 9 米的方形围墙，中心为土坯垒砌的直径约 2.7 米的圆形矮佛塔，塔周围有一宽 1.2 米的残断回廊。塔下部有壁画残块、丝、麻布碎片等。1907 年，斯坦因从回廊外壁揭走了带有浓厚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另一座在其南侧，形式相同，中部有直径约 4 米的塔，围墙长宽均 12 米，回廊宽 2.1 米，围墙内有数间僧房。斯坦因在回廊壁上揭走有佉卢文题记的“维萨达罗王子本生故事”壁画及下部的一组青年男女群像。现残留有零星的陶片和火烧痕迹。第三座寺院在古城东北约 2 公里，主建筑为两层土坯垒筑，高约 6 米，上层呈方形，土坯间残留有木柱，方形基座上有壁龛。现东墙和南墙的壁龛仍存，东墙上是一排等距离的泥塑希腊式柱头；南墙有 6 个龛，内有彩色泥塑半浮雕式的立塑像。其东残留一塔基底部，塔基之东还有一组建筑基址。附近地面散布陶片、残石磨盘，小饰件、铁器等物。1907 年，斯坦因从寺院内盗走一尊 0.9 米高的大佛头。

佛塔 8 座，均残，一般高约 36 米，基底宽约 4~10 米，有的夯土筑成，有的土坯砌筑，有的上部是中空的圆形覆钵，塔顶都已残破。在城址西南约 1.8 公里的

5座，彼此相距几十米到几百米，地面遗物只有陶片和残铜、铁件。城址南约300米有两座佛塔，其北面是一处冶炼址，周围散布有铜、铁炼渣、坩埚和火烧痕迹。城址东北约2公里处的一座佛塔，从其棱角等残迹看，塔基座原来是等边多角形。

烽燧2座，均残塌。呈方形。其中1座在古城西南约1.8公里处，底部边长宽均6、高6米，下部为夯筑，上部用土坯垒砌，现存9层，宽约4、高约1.2米。另一座在古城东北2.5公里的红柳沙丘中，全部为土坯筑成，底部边长约6、残高约6、上部宽约3.8米。地面散有少量红陶片。这两座烽燧同古城的大土台遥遥相对，组成了严密的防卫设施，扼守在交通线上。

古灌溉渠道由1条总干渠、7条支渠和许多斗渠、毛渠所组成，呈一扇形由南向北展开。所灌范围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干渠高大、笔直、整齐，长约8公里，宽约10~20（包括堤宽）、高约10米左右。7条支渠各宽约3~5、高约2~4米，长3~5公里。每条支渠上都有许多斗渠，每条斗渠上又有毛渠。斗渠多系双向开口，即在支渠的两侧相对开设斗渠。总干渠和所有支渠都建在地形较高的位置上，所以整个扇形地面没有不能上水的。在渠道周围发现小麦遗物和犁沟痕迹。

以上年代不迟于4世纪的鄯善遗迹，大部于20世纪初遭到破坏。

吐蕃时期戍堡，为吐番占领时期所建，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面积约4000平方米。堡墙夯土筑成，夯土层中夹有红柳枝，一些地段或夯层上部用土坯和红柳枝相间砌成。东西长约70、南北宽约56、残高约6~13米。西墙有一宽5~6米的缺口，似为城门。四角建有角楼，高6~9米。堡东北部有一面积达400平方米的建筑物基址，为堡内主要建筑。北部为建筑密集区，遗迹构成一斜土坡，自坡底至城的北墙依坡盖屋，清理了43间房屋基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均用土块建成，屋顶较平，房内有灶炕，房间大小一般在12~17平方米左右。其构造形式与《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屋皆平上，高至数丈”相类似。在这批房屋基址中，曾出土陶器、铁器、毛织品、皮革甲片、小麦、青稞及吐蕃文木简和文书等遗物300多件。城南墙有一长20、宽12、高12米的土台，土台顶上立有木杆，似为烽火台。堡址的东西两侧，排列着众多的魏晋时期的佛塔和规模宏大的寺院遗址。据史书记载，东晋高僧法显等，在西去天竺或东归故里的途中曾在这里讲法拜佛。

（二）民丰尼雅附近的遗址与墓葬

1. 居住遗址

尼雅遗址内的建筑遗迹比较分散，成组的建筑多是以多房间的大型居室为主，附近散布着一些窄小的房间。这种布局和成组建筑遗址内等级差别悬殊，反映出当时这里的阶级关系。经过清理的一处大型居址，南北长9.75、东西宽5.5米。大门后设甬道，通向大厅。大厅内沿壁建有一米宽的土炕，厅中央立木柱。柱下有木础。甬道、大厅的地面和炕上散置佉卢文木牍，炕上发现颜色鲜艳的提花毛织物残片和带羽的残箭杆。在其他一些大型居住址内外，采集到大批木器，有牲畜

颈栓、大木篦和木刷，有大小木勺、木桶、木楦头（制鞋制帽时所用的模型，多用木头做成）和纺轮；也有少量的金属器如铁镰刀和“长宜子孙”铜镜片、大小五铢钱等；陶器有罐、砚；骨角器有角杯和骨板。另外还发现成堆的粟粒和完整的麦穗、干萝卜、盐块等。有的居室遗址旁布置了花园，花园里还有已干枯了的桃、苹果、梅、杏等果树和桑树、白杨树。过去的盗掘者破坏了这里的大型居住址，如其中壁面绘卷花图案的大厅。这类居住遗址中的遗物，被盗掘者搜掠去的有雕刻立狮状腿的残木椅、残六弦琴和织成几何纹样的毛毯等。

以上情况显示出这里多品种的农牧生产和各种手工业品的制造，特别是工艺品、建筑技术和雕绘艺术的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盗掘者搜掠去的遗物中，最重要的是700多件用佉卢文书写的印度俗语木牍、帛书、羊皮文书和与一部分佉卢文书同出的48枚汉文木简。汉文木简有晋泰始五年（269）纪年，可推知这批佉卢文文书的大致年代。经研究，佉卢文文书有鄯善官吏的公文，有私人往来的函件和契约、簿籍，还有与佛教有关的各种记录。这批文书提供了大约100年间5个鄯善王的先后顺序，为复原3~4世纪的鄯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汉文木简有敦煌太守和凉洲刺史的文书，有西域长史转写来的晋朝诏书和晋朝给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国国王的诏书抄件，还有河西州郡行文到这里逮捕犯人的文书和敦煌太守下发的过所以及这里官吏所过录的过所底簿等。这批汉文木简有力地表明西晋王朝的政令在这里行使有效。

2. 佛寺遗址

1995年，在尼雅遗址首次发现了佛殿遗址。平面呈“回”字形，长5.3、宽5.2米，面积约28平方米。中部有方形基础，回廊绘制有佛、菩萨等壁画。出土有铜饰件、木柱头、木雕佛像和佛像壁画等。佛殿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佛教在“丝绸之路”南道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3. 墓葬

（1）汉晋时期的贵族墓葬

在尼雅遗址发现8座汉晋时期的贵族墓。其中以胡杨木等树干刳挖成的船形棺墓5座，矩形箱式棺木3座。有夫妻合葬、单人葬等葬式。随葬品多寡不一，木棺外侧一般置陶罐、木器座、木碗等，木碗、木盆之内放置食物等。男性随葬弓矢、腰刀等，女性随葬纺轮及丝毛织品。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墓葬，以矩形箱式棺安葬者一般葬2~3人，随葬品丰富。如其中的3号墓，为一座矩形箱式棺墓，男女二人合葬，仰身直肢。男女主人身上覆盖锦被，身穿锦袍、锦裤、锦袄、绸衣、红呢绣花靴、皮底色花凉鞋，均覆盖锦质面衣。男主人头戴白绸风帽，女主人额部扎一条几何纹丝质组带，耳垂有一组珍珠、金叶耳饰，佩戴红绢珠形项链。男主人生前用过的弓箭、弓袋、刀鞘、束发锦带以及女主人的裙均挂在各自的木

叉上。女主人生前用过的铜镜放在一锦袋中，并与梳篦、化妆品、针线、头发置于漆奁盒之内。其他随葬品有木盆里的羊腿，上插木柄铁刀。木碗内可见干缩的葡萄、梨、糜谷饼等。这处贵族墓地出土的织锦类图案丰富，有龙、虎、狮、豹、马、鹿、骆驼、孔雀、鸟、舞人、辟邪、骑马武士、猎人狩猎、游鱼、大雁、云气纹、茱萸纹等。间织小篆字体的吉祥语是织锦的一大特色，主要有“王侯合婚千秋万岁宜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世毋极锦传二亲”、“千秋万岁宜子孙”、“登高明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恩泽万岁孰常葆二亲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还有一些记事文，如“讨南羌”等。

（2）尉犁营盘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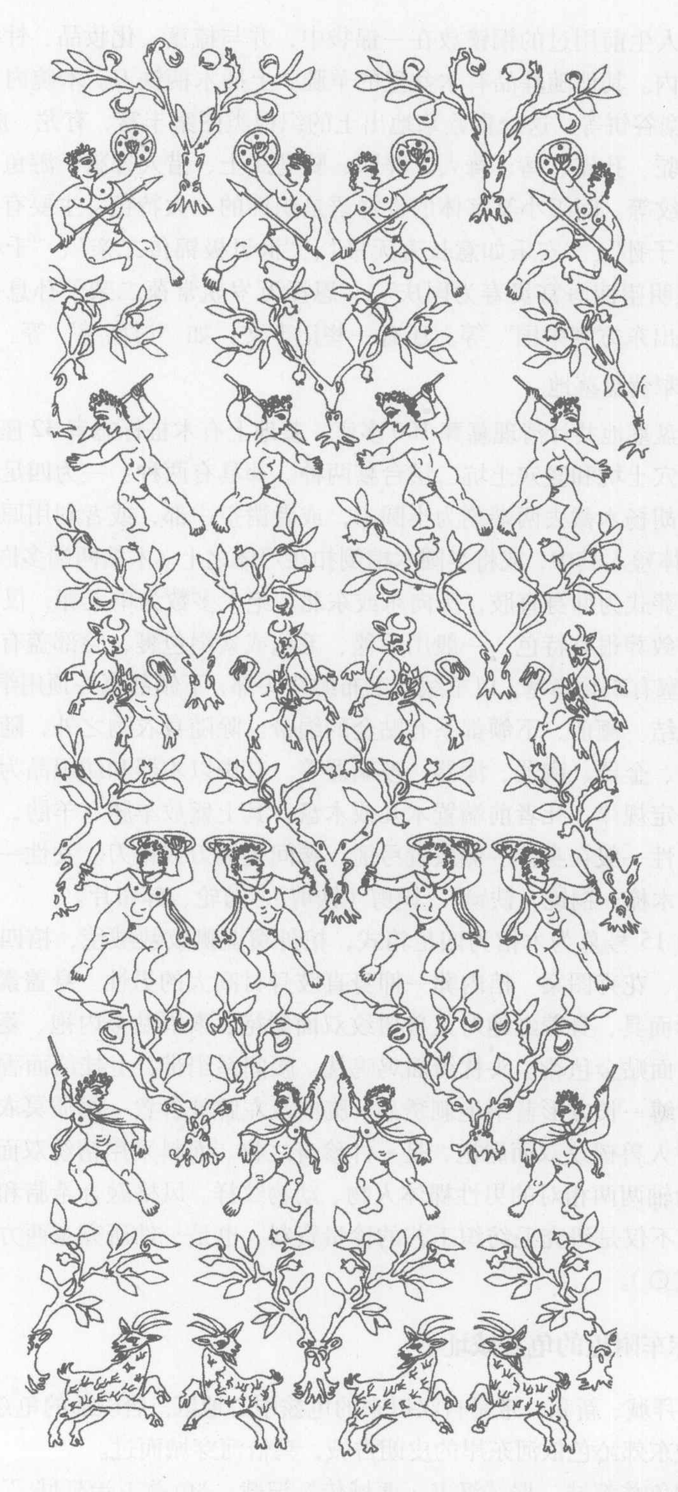
尉犁营盘墓地共计清理墓葬100多座，墓地上有木桩标志者32座。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坑二层台墓两种。葬具有两种：一为四足矩形箱式木棺；二为将胡杨木截去两端刻为半圆木，或者凿空中部，或者利用原有的自然空槽，或将尸体殓入其中，或将半圆木棺倒扣在尸体之上。木棺两端多嵌有木板，棺口盖木板。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或东北。绝大多数为单人葬，仅1例男女合葬。尸体的敛葬很有特色，一般用毛毯、毛毡或素绢包裹，脸部盖有丝织或毛织物，鼻孔内塞有织物鼻塞。以羊绒或毛布缠绕头部，下颌部至头顶用绢带扎系。长发在脑后挽结。额前、下颌都系有贴金的绢带。除随身衣物之外，随葬品主要有木器、铜器、金器、陶器、漆器、玻璃器等。其中以木器和纺织品为主。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规律，死者前端置木几或木盘，其上盛放羊腿、羊肋，旁置一木碗或木罐。男性一般在身体一侧放置弓箭，腰间置铜刀或铁刀。女性一般在头一侧放置奁盒、木梳、铜镜（铁镜）、铜剪（铁剪）、纺轮、碎布片。

其中的15号墓为木棺为四足箱式，棺外覆盖狮纹栽绒毯，棺四壁及棺盖满绘圆圈卷草、花卉图案。棺内葬一仰身直肢身材高大的男性。身盖素绢衾，面覆麻织人面形面具，身着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素绢贴金内袍、菱纹四瓣花毛绣长裤、绢面贴金毡靴。头枕绮面鸡鸣枕。腰间系绢带，上挂绮面香囊及丝质小饰件。左臂缚一长方形蓝绢地刺绣品，胸前及左腕处各置一绢质冥衣。特别是其中的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是一件珍奇之物。面料采用精纺双面罽，通织出以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男性裸体人物、动物纹样，风格融合希腊和早期波斯艺术于一体，不仅是研究毛纺织工艺的珍贵资料，也是一件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品（图三〇）。

三、库车附近的龟兹城址

库车、拜城、新和一带是自汉以来的龟兹中心地区。唐以前的龟兹都城址，即今库车旧城东郊沁色依河东岸的皮朗古城，乌恰河穿城而过。

汉代的龟兹都城，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治延城。”其城址即皮



图三〇　红地对人兽树阙纹袍纹样

朗古城。城墙夯筑而成，平面略作方形，周长约 7 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大城周十七八里”出入不大。东、北、南三面城墙保存较好，西城墙已经湮没。北墙长约 2075、宽 6~8、残高 3.8 米；东墙长 1608、宽 1.5、残高 7.6 米，夯层厚 20~30 厘米；南墙长 1809、宽 2.8、残高 3.5 米，夯层厚 15 厘米。东墙外侧设马面，间距约 40 米。乌恰河贯穿城内，流向西南。城内分布不少高大的夯土基址。在城中部有一高台基址，南北长约 25、东西宽约 15、高出地面 3.2 米，当地人称哈拉墩，可能是唐以前的龟兹王宫遗迹。其余基址有的应是古代寺院遗址，有的可能是内城墙的残存部分。

据《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都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载：“(吕）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皮朗古城三重城垣的情况已不能完全辩识，但新和西南的于什格提古城和沙雅北的羊达克沁大城都有可能是属于唐以前“城三重”的城址。两城皆夯筑，内城中土阜起伏，当是官衙基址。于什格提城内城至中城相隔约 60 米，中城至外城相隔约 240 米。羊达克沁大城面积较大，外城周长约 3351 米，内城周长约 510 米。龟兹当时流行三重城，大约既反映内部阶级关系的紧张，又表明外来侵略力量的强大。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代以后、唐代以前的龟兹都城即羊达克沁城，隋唐之际龟兹迁回库车旧城，并名之为伊罗卢城①。

参考文献：

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 年第 7、8 期。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年。

岳峰、于志勇、张铁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第六节　瓷器与瓷窑遗址

瓷器，是指由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其化学成分主要是氧化硅和氧化铝，并含有 10%以下的氧化铁、氧化钛、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锰等。瓷胎烧结以后，质地致密，不吸水或吸水率极低，胎呈白色，较薄者又具有高度的透明度和一定的机械强度，

①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 年第 7、8 期。

击之有清脆的铿锵声。瓷釉透明，呈玻璃质层，不吸水。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器的烧造技术发展很快。从墓葬的发掘品看，作为主要随葬品的陶器已被青瓷器逐渐替代。这时期的瓷窑，大部分发现于南方地区，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分布最为密集，有的窑址烧造时间延续几个朝代。

一、南方地区的瓷器与瓷窑遗址

吴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青瓷窑址，多分布在浙江和江苏靠近浙江的个别地点，在湖南也有发现。

浙江青瓷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所谓龙窑。一般以粘土或砖坯、砖等依倾斜的山坡建筑而成，因其形如龙身而得名，是南方地区流行的烧制陶瓷器的窑炉形式。由窑门、火膛、窑室、排烟孔等部分组成。顶部呈拱形，整体平面呈很狭窄的长方形，与地面有一定的夹角，火焰由下部的窑头至上部的窑尾，与窑身平行流动。龙窑最早出现于商代，如在浙江上虞李家山发掘的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龙窑遗迹全长5.1米，倾斜度16度，建筑简陋，结构简单。这个时期的龙窑，既烧印文硬陶，也烧青瓷器，陶瓷同窑合烧。此后，龙窑逐渐加长，倾斜度和结构不断改进，到东汉中期结束了陶瓷同窑合烧的状况，出现了专烧瓷器的龙窑。三国时期的龙窑长度已经超过10米。浙江上虞安山发掘的吴窑保存完整，全长13.32、宽2.1~2.4米，由前部的半圆形火膛、中部长10.29米有倾斜度的券顶窑床和后边六个排烟孔所组成。上虞帐子山发现的晋代残窑，窑床内保存的窑具自前向后排列有序。这个现象表明该窑已充分利用了窑床后部，因而有人推测当时有可能解决了龙窑分段烧成的问题。所以，丽水吕布坑发现的南朝窑已向装烧面积加大、窑室券顶跨度缩小的窄长形式发展。中国南方系统的窑室——龙窑，从南朝时期就开始走向定型化。南方地区的瓷窑遗址主要有浙江境内的上虞窑、萧山窑、德清窑、余杭窑，江苏境内的宜兴均山窑等。

1. 上虞窑

分布于曹娥江中游两岸，自东汉即烧造瓷器并一直延续至唐宋，其时代既长，窑址分布也密集，窑近百座，仍建于山坡，呈长条斜坡状。在这一时期使用的窑具已比东汉时复杂，出现齿形、钉形支垫、垫柱等。主要产品为碗、带系壶、折沿洗、熊足砚、辟邪水注等。施淡青色釉，器上饰划、印纹，有水波、莲瓣、网纹和由龙、凤、鸟、兔等动物组成的带状印纹。在南京赵士冈出土的赤乌十四年(251)纪年青瓷虎子上有“会稽上虞师袁宜造”的刻字，说明上虞的瓷窑有专门从事制瓷的工匠，而不是一般的小民窑。

2. 萧山窑

萧山窑位于萧山县境内，其分布范围也较广，以进化区茅湾里一带的窑址时代最早。窑床形制及窑具与上虞窑相同，器物以螺旋纹碗为主，胎较薄，质细硬。

在上董村和石盖村的窑址发现的产品种类较多，器形有碗、熊足砚、带铺首的盘口壶、鸡首壶、灯盏等。釉色特征明显，呈青绿、淡青或青中带黄，在器物口沿部施加褐色彩斑，成为两晋青瓷的装饰特征。

3. 德清窑

德清窑的青瓷与上虞、萧山窑相同，但德清窑除生产青瓷器外，还生产黑釉器。黑釉器用红色粘土或在瓷土中加适量紫金土做瓷胎，胎色多呈砖红、紫或浅褐色。黑釉的釉层厚薄不一，厚处呈漆黑色，薄处呈焦黄色。器形有双系罐、鸡首壶、盘口壶（壶肩饰方形桥式纽）、碗、盆、熊足砚等，以素面无纹占多数。青釉器胎多为灰色，施化妆土，青釉色调较深。

4. 余杭窑

余杭窑为生产黑釉器的瓷窑，主要产品是鸡首壶，分大中小三型，产量很高。此外，还有碗、钵、罐、瓶、盘口壶、盆、器盖及少量划花间篦划纹碗。从已发现的纪年墓——杭州兴宁二年（364）墓中出土的黑釉器可以说明，黑釉器出现的年代不晚于东晋兴宁二年。

5. 宜兴均山窑

宜兴均山窑烧造的时代延续很长，早在东汉即烧制青瓷，也发现不少三国两晋至南朝时期的窑址，一直到宋元时期仍烧造。窑床为长条斜坡形的龙窑，窑具有匣钵①、齿形垫托、垫饼等。匣钵的出现，标志着瓷器烧造工艺上的一大进步。产品以钵、双复系罐、带铺首的盘口壶等为代表；釉色浅绿微黄，或称蟹青色，胎黄白色；纹饰与上虞、萧山窑产品相似，在肩腹部印有斜方格网纹，联珠纹、羽毛状纹等，在南京发现的有纪年的甘露元年（265）墓中出土的青瓷羊，釉色青绿，其上刻划的纹饰及造型、工艺都相当精美。它与宜兴周处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及南京地区六朝墓内出土的青瓷器，可能都是均山窑的产品。

南邻浙江的宜兴丁属镇一带，也发现多处西晋时期的长型瓷窑址，出土的窑具主要有柱状、覆盆状的窑座和齿口钵状的窑垫。烧造的碗、钵、罐等，多压印网纹装饰带。丁属镇东北的大浦，是太湖西岸的重要港口，附近曾发现满装丁属均山所烧青瓷器的沉船，可见这里的产品当时还大量向外地输出。

6. 湘阴窑

湘阴窑，因唐代湘阴隶岳州，所以也称岳州窑。窑址位于湖南省湘阴县城湘

①匣钵：瓷器焙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的匣状窑具，以耐火粘土制作，形状一般为筒形或漏斗形，也有的呈“M”形、碗形、钵形和椭圆形等。出现于东晋南朝时期，唐代开始普遍使用。坯件装在匣钵里焙烧，避免了烟火与坯件直接接触和窑顶落砂等侵扰，使坯件受热均匀，釉面洁净，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匣钵耐高温，胎体结实，承重能力强，层层叠摞不易倒塌，因而可以充分利用窑内空间，增加装烧量。匣钵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是中国制瓷工艺的一大进步，为瓷器的优质高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江沿岸，绵延10余公里。通过对湘阴县沿江马路马王坎窑址的清理发掘，了解到该窑早期瓷器的生产情况。主要烧造青瓷器，兴盛期在西晋至唐初，唐初以后衰落。瓷窑采用龙窑形式，发现南朝和隋代龙窑各1座。在南朝地层中发现1件底部印有“太官”字样的盏托碗，在唐初地层中也发现1件精致的底部刻有“官”字的匣钵。说明该窑在南朝至唐初曾经专门烧制过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在南朝残窑和东晋地层中出土的匣钵，将我国使用匣钵装烧瓷器的历史由以往所说的隋代提早到东晋。在东晋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口沿和器底内有釉下彩的碗、钵，为长沙窑的釉下彩工艺找到了源头。器形有碗、钵、盅、高足盏、多足砚、盏托、唾盂、虎子、莲花尊、龙柄壶、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等。釉色有虾青、豆青、青褐等，釉面饱满莹润，极少剥离，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①]。

二、北方地区的瓷器与瓷窑遗址

在北方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却出土了一批多种釉色的瓷器，其中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出土的青釉莲花尊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其形制、胎釉与南方瓷窑中所出青瓷有显著区别，它胎体厚重，釉色青中透黄，堆贴花纹。胎土所含成分也与南方青瓷不同。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发现的东魏、北齐纪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都具有这种特征。除青瓷器外，在这时的墓葬中还出现了白瓷器和黑瓷器。如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506）崔昂墓中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河北赞皇北齐武平六年（576）李希宗夫妇墓出土的黑釉瓷碎片，其釉色漆黑有光泽。与南方窑内出土的黑釉瓷，在器形、胎釉上也不同，应是北方瓷窑的产品。此外，在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墓及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安阳北齐范粹墓等纪年墓中出有酱褐釉、黄釉瓷器。对于北方地区瓷窑遗址的寻找和探索，一直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至目前为止已有突破，但北方地区发现的魏晋时期瓷窑遗址仍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寨里窑和白河窑。

1. 寨里窑

寨里窑遗址位于山东淄博淄川区城东约10余公里，年代为北齐时期。它发展较早，持续生产的时间颇长，是北方青瓷一个重要的产地。

寨里窑青瓷，胎骨一般较薄，带灰白色，火候较高，没有黑斑现象，釉色深浅不一，有带青褐色的，也有青黄色的。早期釉层很薄，釉面烧成后斑驳不匀；晚期改进了施釉工序，采用二次上釉，使釉层加厚，明亮润泽。器形以碗、盘、缸为最常见。碗的造型与南方青瓷略同，深腹、直口，有些在碗壁上饰莲瓣划纹，粗壮质朴，显然是北方的风格。盘的底部有些划同心圆纹或莲瓣纹。缸多有四系，或作弧形，或为桥形。还有高足盘、玉壶春瓶式瓶、带子口的青瓷盒。这类器物都施满釉，由轮制成型，修整不甚细致，底足多挖成内凹形，带有早期瓷器的特征。

①何介钧：《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值得注意的是寨里窑也制造一种精美的莲花瓣尊，虽不及北朝墓葬出土的莲花尊，但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肩部与系之间饰有联珠人面纹，玲珑精巧，颇为罕见。该类器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繁缛，是寨里窑代表性的青瓷产品。

寨里窑生产的青瓷器，制作还不成熟，釉面厚薄不匀，还原气氛控制较差，釉色青黄不一，胎与釉结合不甚紧密，常发生剥落现象。且装烧方法比较原始，只用垫柱托烧，盘、碗都由支具叠装，烧好后四面留有不甚美观的疤痕，影响产品质量。后期虽有所改进，仍未能克服这些缺陷。

2. 白河窑

白河窑址位于河南巩义北山口镇白河村，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带，总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2005 年 4 月~2007 年 12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①]。发掘面积 2400 余平方米，发现瓷窑 6 座，灰坑以及沟、灶等遗迹百余个，首次发现了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北魏瓷窑——二号窑。

二号瓷窑残长 13.7 米。由窑前工作坑、火膛、窑室和烟囱组成。其中工作坑平面为长方形，长 6.1、宽 6、深 0.7 米。工作坑东部地面和东壁均有一层烧结面，推测应为当时烧窑时除放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存高度 1.1 米，后壁用耐火砖平铺 9 层后与窑床相平。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 4.7、宽 3.35 米，窑室壁残存厚度 0.22 米。烟囱部分被破坏。火膛内出土大量青瓷、柱形支烧和三叉支烧等窑具，也有少量的白瓷出土。根据该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推定，它是以烧制青瓷和白瓷为主的北魏瓷窑。

发现的瓷器有青瓷、白瓷和黑瓷。青瓷以碗为主，皆为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壁较厚，器内满釉，内底积釉现象较为明显，器外壁半釉，底无釉，口沿外饰弦纹一道。另有盘、豆、钵、盆等，胎体一般都较厚重，大都有流釉现象。白瓷主要有杯、碗等小型器物，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没有垂釉现象。黑瓷很少，主要是碗，器形与青瓷和白瓷相同。

白河窑址出土的青瓷，与洛阳汉魏故城内出土的北魏青瓷造型完全一致，为北魏皇室使用青瓷找到了产地。过去陶瓷界认为，中国早期白瓷以河南安阳范粹墓（北齐武平六年，575）曾经出土的 9 件白釉瓷器为代表。白河窑址出土的白瓷虽然数量不多，但将白瓷的出现提早到北魏时期。特别是北魏白瓷与青瓷伴出于同一瓷窑，反映了北方制瓷业正由烧制青瓷向烧制白瓷转化这一发展趋势，为研究中国早期白瓷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①国家文物局：《2007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 年。

参考文献：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七节　简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继承了秦汉时期简牍的基本种类和内容。简牍的种类有简、牍、楬、检等。内容主要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信札、杂类等。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湖南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于1996年7~11月，在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发现吴的简牍10万余枚，种类和内容丰富，基本上可以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情况。简牍所记年号最早的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的为吴孙权嘉禾六年（237）。种类有简、牍、楬、封检、封泥匣等，竹木简多编连成册。从简牍的残存状况来看，先编缀后书写，书写时在编缀处留出空档，一般为上下两道编连。牍多以木板为之，极少数用竹板做成，长与简略同，宽窄不一，厚度均超过竹简。楬为长方形，两面书写，中部留有三角形缺口，用以系绳。封检和封泥匣分别为长方形和长条形。内容包括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信札、杂类等。关于这批简牍的所属，被认为是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①]。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多为遣策及名刺。遣策类，如高荣墓发现2枚木方[②]，形制完全相同，内容与汉代遣策相类似，但书写方式等与汉代略有区别，如在随葬器物前加“故”字等。名刺类，如江西南昌高荣墓出土木简21枚，文字内容基本一致，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③]；江西南昌晋墓（吴应墓）出土5件木简，形制大小相同，长25.3、宽3、厚0.6厘米。墨书，内容为：“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④]；湖北武昌吴墓（M1）中出土木简6枚，长24~25、宽3.3、厚0.4厘米。其内容为“童子史绰再拜问起居，广陵高邮字浇瑜”[⑤]等

在新疆还曾发现其他文字的简牍。如1980年4月，在新疆楼兰古城址的三间房官署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木简63件，佉卢文木牍1件[⑥]。内容涉及官名、地

①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

②江西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③江西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④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

⑤鄂州县博物馆：《湖北鄂州四座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2年第3期。

⑥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第7期；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

名、簿书、名籍、屯戍、廪给（吏士吃粮的收支记录）、器物、买卖等。从楼兰发现的木简来看，曹魏西晋时期，不仅在楼兰设置长史，还设置都督。长史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戍守屯垦。而都督之职可能是统帅和管理西域诸国的军队。在楼兰出土的许多魏晋时期的纪年简和中央朝廷的诏令文书，表明曹魏西晋对经营西域的重视，楼兰与当时的中原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隶属关系。那种认为西晋时期中原王朝无力经营西域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楼兰地区的吏士，除了耕垦、牧养、作工、戍卫之外，也从事一些买卖活动，有的官吏还使用奴婢，出租土地。另外，楼兰出土的木简所采用的字体，反映了我国书法在魏晋时期正处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并行的阶段，书写材料也由简牍向纸张发展。

据统计，在新疆发现的佉卢文木简共约1000件，其形制可以分为封检、牍、楬三种[①]。以木质简牍书写文字，是汉文化的重要特征，佉卢文的书写采用这种形式，反映了中原和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

第八节　货币与度量衡

一、货币

（一）三国时期货币

三国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货币的使用也随之分裂。曹魏文帝黄初二年（221）曾明令废止五铢钱，使人们以谷帛相交易。可是，实施谷帛交换以后，在流通上发生了明显的弊病，出现了“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的现象。因此，在魏明帝初年（227）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从此以后，曹魏一直延用五铢钱，未有更改。

孙吴政权曾数次铸造货币，嘉禾五年（236）曾铸造“大泉五百”；赤乌元年（238）铸造“大泉当千”。目前考古发现的这一地区的货币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其中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过去被认为是西晋和十六国时期铸造，通过对吴朱然墓的发掘[②]，说明它们至迟在249年已经开始铸造。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在攻取成都后，因府藏空虚而铸造“直百钱”。从传世和出土的蜀的货币来看，有“五铢”、“直百五铢”、“直百”铜钱。史书上记载的刘备所铸“直百钱”为“直百五铢”还是“直百”铜钱，迄今尚无定论。“直百

①刘文锁：《1991年尼雅遗址调查简报》，《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五铢”钱较大，大者直径 2.8 厘米，重 9.5 克，小者则重不足 3 克。“直百”铜钱大者直径皆在 2 厘米以内，重约 2 克，轻小者则不足 0.5 克。一般认为，“直百五铢”中的重大者应系刘备初铸之钱，而减重的“直百五铢”、“直百”铜钱则为刘蜀日趋衰落时的铸币。

（二）两晋时期货币

西晋时期，未铸造新钱，一直沿用汉、魏旧钱。东晋建立之初，沿用孙吴旧钱。东晋之时，江南各种铜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比轮就是说这种钱大如车轮，是民间的夸张俗语，可能指孙吴所铸造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钱中钱身重大者；四文大概是说这种中等大小的钱币可以当作四枚小钱使用。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中的旧钱，以汉代五铢钱为大多数，其中又以剪轮五铢居多。所以，所谓的四文钱可能就是指完整的五铢钱以及重量与它相当的钱币，而这种铸造良好的货币，按其重量流通，大致可以当四枚剪轮五铢使用。相传晋元帝时期沈充铸造了一种小五铢，钱文为五朱，体薄量轻，直径 1.8~2.2 厘米，方穿甚大，边长 1 厘米，重 1.5 克，俗称沈郎钱。唐代李商隐诗云：“谢家飞絮沈郎钱”。又因其轻小如榆荚，唐代李贺诗云：“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王建诗云：“绿榆枝散沈郎钱。”

西晋之后，北方地区进入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政权。这些王朝的货币经济多数实物化，或者沿用汉魏旧钱，仅少数几个铸造了新钱。

后赵石勒于 319 年自称赵王时铸造了“丰货”钱，钱文不记重，是对西汉以来五铢钱制的一个突破。钱文篆书，文字肥硕，横读，钱径 2.4 厘米，重 2~3 克。

在四川，成蜀李寿改国号为汉之后，于汉兴年间（338~343）铸造了“汉兴”钱，钱文采用“汉兴”纪年，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这种钱币分两种，一种是钱文直读的隶书钱，一种是钱文横读的篆书钱。形体薄小，文字粗浅多漫灭。直径 1.7 厘米，重 1 克，少数钱背铸有川、王等字。

北凉（一说前凉）永安时期铸造了“凉造新泉”，钱文篆体，对读，圆形方孔。大者直径 2.4 厘米，重 3 克；小者直径 1.8 厘米，重 1.5 克。

大夏赫连勃勃于 419 年铸造了“大夏真兴”钱，是我国最早的国号加年号钱，极为罕见。圆形方孔，钱文隶体，旋读。

（三）南朝时期货币

刘宋时铸造过四铢、孝建四铢、永光、景和等几种货币。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开始铸造四铢钱，这次铸币结束了西晋以来约一个半世纪政府未尝铸钱的不正常情形。但新钱的轮廓、形制仍然大致仿效汉五铢钱。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铸孝建四铢钱，面文为“孝建”，背文为“四铢”，后来又除去背文，只留下面文“孝建”二字。前废帝永光元年（465）二月、景和元年（465）九月，又铸造了永光、景和年号的二铢钱。铸造景和钱时，还允许民间私铸。当时还有一

种更为轻薄的钱，叫作“鹅眼钱”，“一千钱不盈一掬”。另一种綖环钱则“入水不沉，随手破碎”。这些劣质钱币“十万枚不盈一掬”，因而造成“斗米万钱，商贾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宋明帝即位后，先禁止鹅眼钱、綖环钱，继而禁止民间铸造，同时官铸也停。到泰始二年（466）三月，所有新铸货币全都禁止流通，而且只允许古钱流通，物价才逐渐趋于稳定。

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形制的特征是“肉好周郭”，即钱的面背皆有内郭和外郭。另外，还铸造了一种没有外郭的五铢钱，即所谓“公式女钱”。但当时民间大量使用的货币还包括各种以往的货币，如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各种钱币轻重不一，流通非常混乱。

梁武帝于普通四年（523）又开始铸造铁钱，是一种背部有四出文的铁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大量铸造铁钱。铁钱的出现，使得梁朝的货币流通状况更加恶化。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行使铁钱约十年，即到大同以后，出现了“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的现象。又《魏书·岛夷萧衍传》记载，侯景之乱时，物价狂涨，“米一斗八十万”、“卖一狗得钱二十万”。在铁钱币值暴跌之后，民间交易实际上又恢复了各种旧铜钱的流通。但由于铜价高，铜钱缺少，因而在流通中出现了“短陌”现象。所谓短陌，是流通中铜钱不足而发生的一种货币流通现象，是“足陌”的对称。所谓“足陌”，即钱数足百，没有折扣。而短陌即不足百钱而作百钱之用，如“以九十为百”、“八十为百”、“七十为百”等皆如此。

梁末，还铸造了“四柱钱”、“二柱钱”，与私铸的鹅眼钱并行。所谓四柱钱，就是在五铢钱正、背两面各铸两个凸起的星点，正面的星点一般在钱穿的上下，背面的星点一般在钱穿的左右；二柱钱就是在五铢的正面铸造两个凸起的星点，一般在钱穿的左右，也有个别的在钱穿的上下。

陈朝之时，于天嘉三年（562）改铸五铢钱，以一枚五铢钱当十枚鹅眼钱，对梁末以来混乱的货币流通开始进行整理，使五铢钱逐渐在流通中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到了太建十一年（579）又铸造“太货六铢”，这种钱面背肉好周郭整齐，篆文清晰，重如其文，是六朝时期货币中最为精美者，在当时一枚太货六铢当五铢十枚使用。这种作价，实际上对民财的榨取，因而招致不满，陈宣帝死后，便废太货六铢而专用五铢。

（四）北朝时期货币

北魏时期先后铸造了太和五铢和永安五铢。太和五铢，是一种年号和记重合体的货币。圆形方孔，钱文篆体，对读，分为面有内郭和无郭两种。直径 2~2.6 厘米，重 2.5~3.4 克。永安五铢。圆形方孔，有外郭，钱文篆体，对读。直径 2.3~2.5 厘米，个别直径仅 2 厘米，重 2~3.5 克。永安五铢钱后铸过两次。据《魏书·杨播

传附子杨侃传》记载，永安二年（529），北魏孝庄帝听从杨侃的建议，始铸永安五铢。又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东魏迁邺之后，因私铸钱币滥恶过甚，于武定初（543），高欢、高澄遣使至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

北齐时期，铸造了常平五铢，圆形方孔，有外郭，钱文篆体，对读。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北齐天保四年（553），改铸常平五铢。

西魏时期，铸造了大统五铢，钱文篆体，直径2.3~2.5厘米。

北周时期，先后铸造了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三种货币。布泉铸造于保定元年（561），圆形方孔，钱文篆体，直径2.5~2.6厘米，重4克以上。五行大布铸造于建德三年（574），钱文篆体，直径2.6~2.7厘米，重3~克。永通万国，圆形方孔，钱文篆体，直径2.5~31厘米不等。官铸者精美，私铸者较烂。

二、度量衡

1. 尺

魏晋时期，每尺的长度增至24.5厘米。曹魏时期一尺约合24.17厘米，蜀汉一尺约合23厘米。南北朝时期则比较混乱，南朝基本上沿用秦汉旧制，但量值略有增加，每尺长约25厘米，北朝每尺长29厘米。

江西南昌吴高荣墓出土竹尺1件，长24.2厘米①；安徽南陵县麻桥吴慕出土木尺1件，两端原来有铜包镶，分为十等分，每寸间用铜钉三粒，其一端有圆孔系线，残长24.1厘米。按十等分复原，实测长度近25厘米②；南京西晋时期水井之中发现象牙尺1件，呈长方形，两面均只有一半有刻度，另一半素面。刻度部分分为五等分，每分为1寸，以3个圆点纹样分隔，寸长2.3~2.5厘米不等。尺的一端有一圆形穿孔。长24.3、宽2.6、厚0.6厘米③；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出土骨尺1件，出土时24.2厘米弱，宽1.6厘米。两面皆刻有刻度，为十寸，其中一面又在寸的分度内刻十分的刻度，并在寸和五分的分度线上，刻一至三个圈形纹。尺的一端有孔，以作系绶之用④；江西南昌晋墓中出土木尺1件，共计十等分，长24.5厘米⑤；广西梧州富民巷坊南朝墓中出土铜尺1件，经复原约长24厘米⑥。

2. 权

北朝时期的权仍以铁权为主，器形分为两类：一类与秦汉时期的权相类似，呈半球形，上有鼻纽；另一类更接近现代秤砣，形态有瓜式、葫芦式等，体积小，重量无规律可寻。

①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②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发现西晋水井》，《文物》2002年第7期。
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⑤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
⑥梧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富民巷坊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9期。

参考文献：

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九节　佛教遗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各类遗迹及遗物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佛教遗存。具有代表性的遗迹有石窟寺及佛教寺院，各类单体佛教造像也开始出现并流行，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

一、石窟寺及其分区

所谓石窟寺，是指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由于石窟开凿之处往往洞窟密集，故也有"千佛洞"、"万佛洞"之称。中国的佛教石窟与佛教一样，渊源于印度，大约始于3世纪左右。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宿白先生将中国的石窟寺分为四个区域，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以及西藏地区[①]。这四个区域的石窟寺，均据当地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状况，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进行开凿。各区时代有早有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互相影响。

新疆地区的石窟寺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1）古龟兹地区。以库车、拜城为中心，主要石窟有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千佛洞和克孜尔尕哈石窟等，是新疆地区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2）古焉耆地区。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3）吐鲁番地区。在新疆吐鲁番附近，主要有吐峪沟和伯孜克里克石窟。这一地区的石窟以克孜尔石窟开凿年代最早，大约从3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3世纪。古焉耆和吐鲁番地区石窟寺开凿年代略晚，大约从5世纪开始，最晚的洞窟可能延续到13世纪。新疆地区的石窟寺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洞窟的构造一般采用泥塑和壁画相结合的制作方法，有的石窟还以土坯垒砌洞窟。形制多塔庙窟（亦称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以塔庙窟、大像窟为中心的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塑画题材在6世纪以前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的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故事。绘画技法为西域流行的晕染法。6世纪以后，出现大乘佛教题材的千佛、阿弥陀佛等净土题材。绘画技法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寺数量较多，分布很广，是中国石窟寺的主要部分。按自然区域，可分为四小区：（1）河西区。主要位于甘肃黄河以西河西走廊的敦煌、酒

①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

泉、张掖、武威附近。敦煌附近以莫高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5世纪一直延续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寺地点还有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酒泉附近主要有文殊山石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附近主要有马蹄寺和金塔寺石窟寺。武威附近有天梯山石窟。这些石窟寺地点亦大多开凿于5~6世纪。河西地区的石窟寺一般以泥塑和壁画相结合的方法修造，有的洞窟也采用石胎泥塑的方法。形制主要流行中心柱窟和佛殿窟，有少量禅窟、僧房窟和大像窟。塑画题材多释迦、交脚弥勒、倚坐佛、三佛、七佛、释迦多宝、千佛，以及本生、因缘、佛传故事。6世纪以后敦煌莫高窟流行各种经变画，8世纪以后密教题材开始流行。绘画技法，5~6世纪初受西域晕染法的影响，6世纪中叶前后受中原绘画技法的影响。（2）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南北窟寺、泾川王母宫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炳灵寺和麦积山石窟以泥塑或石胎泥塑与壁画相结合的方法为主，也有石雕作品。开凿年代约为5世纪初。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无量寿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龛像。南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和须弥山石窟皆为石刻，开凿年代略晚些，大约为5世纪末或6世纪初。洞窟形制多佛殿窟，也有利用天然洞穴进行雕造者，还有少量中心柱窟和禅窟群。6世纪中期以后，麦积山出现大量的仿木式窟檐建筑样式。麦积山和须弥山还出现窟内仿木式框架结构形式的洞窟。造像题材流行无量寿佛、维摩文殊、三佛、七佛和千佛等。6世纪中期壁画中出现西方净土变、涅槃变等。（3）陕西区。以西安附近及陕北地区最为集中，石窟寺的规模一般较小。主要有彬县大佛寺、麟游慈善寺石窟、药县药王山窟、宜君福地石窟、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子长钟山石窟、志丹城台石窟等。多为石雕。陕西地区石窟寺的开凿年代较晚，个别龛像可早到6世纪，7世纪时石窟的开凿地点增多，11~13世纪时陕北地区的开窟风气较盛。洞窟形制流行大像窟、佛殿窟与佛坛窟等。造像题材为无量寿佛、释迦、弥勒佛、三佛、千佛等，也有佛道合开的洞窟。（4）晋豫及其以东区。这是石窟寺开凿的中心地区，以皇家经营开凿的石窟寺为主流，主要有5~6世纪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6~7世纪开凿的邺城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等。受主流石窟影响而开凿的有5~6世纪开凿的河北张家口下花园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南渑池鸿庆寺石窟、水泉石窟、洛阳万佛洞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小南海石窟，山东驼山石窟、云门石窟。石窟均以精美的石刻作品闻名于世。形制多大像窟、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以及成组的双窟，也有少量禅窟或禅窟群。较晚的洞窟出现佛坛窟和摩崖大像。洞窟外观较多地模拟佛寺建筑，云冈、响堂山、天龙山都有仿木式窟檐建筑，响堂山石窟还在窟檐之上设置覆钵式顶，构成独特的塔形窟。山东地区多为摩崖龛像。5~6世纪前期，造像题材主要流行释迦、释迦多宝、三世佛、七佛、交脚弥勒菩萨、交脚佛、维摩文殊以及连环画式的佛传、本生故事画。6世纪

中期开始流行西方无量寿佛、西方净土变、倚坐弥勒佛、思惟菩萨以及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弥勒佛或释迦、阿弥陀和弥勒佛为组合的三佛题材。邺城地区石窟内还刊刻佛经。7~8 世纪，反映各佛教宗派信仰的题材较为流行，如反映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观世音菩萨，反映华严信仰的卢舍那佛及华严三圣，此外，密宗供奉的大日如来、十一面观音、多臂观音，三阶教所奉的地藏菩萨像也比较多见。

南方地区，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地点较广，其中以江南、四川和云南较为集中。年代较早的是 5~6 世纪开凿的南京栖霞山石窟、浙江新昌大佛，6 世纪开凿的四川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石窟，7 世纪开凿的巴中西龛等石窟。8 世纪以后四川石窟寺的开凿由北向南扩展，梓潼、大足、安岳、资中等地都有大量发现。此外还有 9~11 世纪开凿的云南剑川石窟、10~14 世纪开凿的杭州西湖周围石窟等。南方石窟主要以摩崖龛像为主，开凿洞窟较少。栖霞山无量寿佛窟和新昌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川北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石窟有少量的中心柱窟、佛殿窟和佛殿窟内中央设佛坛的佛坛窟。摩崖龛一般流行双重或三重龛形，有的为屋形龛。各地的造像题材各具差异。栖霞山石窟主要流行无量寿佛、释迦多宝和三佛等题材。四川地区流行阿弥陀佛、倚坐弥勒、菩提瑞像、观世音菩萨像和天龙八部等题材。西方净土变题材也较为流行。8 世纪中期以后密宗题材广为流行，主要有毗卢遮那佛、药师琉璃光佛和药师经变题材、圣观音、如意轮观音、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救苦观世音等。另外，北方毗沙门天王和地藏菩萨像在四川石窟中也较流行，同时还出现了刻经洞窟。杭州西湖周围的许多龛像就是利用天然溶洞雕造的。吴越国和两宋时期开凿的龛像主要流行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另有弥勒佛、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像、罗汉群像和手持长柄钺的天王像。元以后流行毗卢遮那佛、无量寿佛、文殊菩萨、各种佛母、麻曷葛剌佛等藏密题材。云南剑川石窟流行弥勒佛、阿弥陀佛、释迦佛、华严三圣、观音菩萨、毗沙门天王和大黑天神、八大明王以及最具地方特色的帝王窟、阿嵯耶观音、梵僧观音。

西藏地区是中国晚期石窟寺的主要区域之一，分布区域较广，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昌都地区以摩崖造像为主。西部阿里地区主要开凿石窟寺。现存年代最早的是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该窟为一中心柱窟，四面单层开龛式。由吐蕃松赞干布的藏妃茹雍主持开凿。阿里地区石窟寺主要集中在扎达县古格故城附近的东嘎村和皮央村附近。石窟开凿于 11~16 世纪，主要窟形有佛殿窟、佛坛窟、僧房窟、仓库窟和禅窟等。窟中塑像一般都已不存，但保存了大量色彩鲜艳的壁画。四壁多分层绘制，主要位置都绘有各种藏密佛像、菩萨像、曼荼罗、护法神像以及各宗派的高僧像。阿里地区的石窟寺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壁画的晕染法、对兽纹和环形联珠纹，都是西域及河西一带所流行的。

二、中原地区的佛教遗存

（一）佛教遗存概况

中原地区发现的佛教遗存，有零散的造像和寺院遗迹。寺院遗址可分为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两种。

1. 早期的佛教造像及造像碑

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佛教遗物，是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像。这种早期铜像都有较浓郁的中亚风貌，其中以有后赵建武四年（338）铭的释迦坐像最具典型性[①]。此后，现知有纪年的造像，已迟到北魏太武帝废佛（446）前不久，这些造像与和平元年（460）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初期的作品接近。452 年，北魏恢复佛法以后，铜石造像同时流行，造型题材都与同时期的石窟相同。北魏迁洛（494）后，特别在北魏分裂（535）以后的北朝晚期，又流行造像碑[②]。这时的造像和造像碑，在一些细部和雕刻技法上都出现了地区差异。以河北定州为中心的关东作品精细繁缛，关中地区的作品则简朴、不重装饰。

1996 年，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中发现了 400 余尊佛教造像，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绝大多数在 5~6 世纪，主要为北齐时期，还有部分隋唐时期的造像。这批造像的题材因时代而有变化，北魏、东魏造题材有弥勒佛、释迦佛、西方三圣、飞天、荷莲、龙、塔等，北齐造题材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西方三圣、弥勒佛、卢舍那佛及卢舍那法界中人、观世音菩萨、太子思惟菩萨等，代表了以青州为中心的造像工艺水平，佛像多身着贴体的袒右式或通肩袈裟，绝大部分保留彩绘贴金，装饰华丽，雕刻细腻，在以往罕见。其特征表现为：北魏、东魏时期造像的秀骨清像特征被北齐丰腴壮硕的身体造型所取代。同时，造像细腻婉约的气质、繁复华丽的装饰特征，为北齐其他地区所少见。北魏、东魏时期的造像为背屏式浮雕，北齐的这类造像几乎消失，主要为单体圆雕造像，面部大多丰满圆润，和北魏造像厚重的服饰相比，北齐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露出健康优美的身体及其曲线，颇具"曹衣出水"的韵味，印度造像的艺术风格成为主流。

---

①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②造像碑：中国古代以雕刻佛像为主的石刻。全形似碑，其上开龛造像，多为佛教造像，极少数与道教有关。多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有时也有线刻的供养人像。盛行于北朝时期，多发现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现存实物以北魏时期的最早，而以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时期的数量最多，说明其最盛期在北朝晚期。至隋代衰落，唐代仅偶有发现。其造像题材和造型风格等方面的特征，一般近于同时期的石窟寺艺术。但因雕刻于碑石上面，故多系高浮雕作品，且形体较小，雕琢得更加精细，是研究当时宗教艺术及宗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依造像碑的形状与题材，大致可以分为扁体碑形和四面体柱状两类，以前一类为多。扁体碑形造像碑又可分为有碑额和无碑额两式，主要像龛雕于碑体正面，碑阴及碑侧有的也雕像龛，但多是造像人题名及供养人像等。四面体柱状造像碑四面宽度大致相同，均有雕刻。（杨泓：《造像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 年版）

2. 石窟寺

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开始开凿石窟寺，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石窟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 169 窟，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的造像龛。此外分布在自甘肃东部以东广大中原地区的石窟，大都开凿在 5 世纪中叶以后的北朝时期。主要石窟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甘肃庆阳南北石窟寺、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除麦积山多塑像和少许壁画外，多是石雕造像。

中原地区的北朝石窟，可分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类，两类石窟又各可分前后期，前期的年代是迁洛阳前后的北魏，后期为东、西魏迄北齐、北周。前期的佛殿窟，较早尚存有方形委角接近椭圆形的平面，较晚则流行三壁三龛式的方形窟。前期塔庙窟的特点是平綦窟顶和多层或单层四面开龛的塔柱。晚期石窟盛行雕饰前室和窟口，佛殿窟流行雕出华丽的帐饰和仿木结构的窟檐。塔庙窟有的在窟口崖面雕出上设覆钵的佛塔形象，有的石窟则取消了塔庙窟的主要标志——塔柱，完全同于佛殿窟的布置。两类石窟前后期造像内容大体近似，主要题材有释迦、弥勒、释迦多宝、三佛、七佛、千佛等，前期较晚出现无量寿佛，后期出现面积较大的西方净土。无量寿和西方变的出现反映出南朝佛教对中原的影响；前此比较重视禅观的北朝佛教，开始发生变化[①]。

3. 佛教寺院遗址

目前发掘的魏晋时期佛寺遗址仅有 2 座，一为永宁寺[②]。熙平元年（516）胡太后所建的洛阳永宁寺，其平面呈长方形，永宁寺塔位于寺院正中，塔北为佛殿遗迹。这是现知唯一的可以大体复原的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另一为北魏永固陵陵园之内的思远佛寺[③]，也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这些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佛寺遗址的发掘，反映了北魏时期以佛塔为重的寺院布局。宿白先生指出，佛寺之中重视佛塔，与石窟寺中的塔庙窟的设计为同一渊源，既上承汉末笮融在广陵起重楼浮屠祠的传统，又都属于尚未脱离外来佛寺布局影响的中国早期寺院布局阶段。与之相对应，也有一些院落式布局的寺院，这类寺院多为宫殿改建，或者舍宅为寺，有些在后来修建了佛塔。

（二）重要石窟寺

1.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 13 公里的龙门口。东西两山对峙，伊水穿流其间，形成天然的门阙关隘，故东汉以来就有伊阙之称。约从北魏太和十七年

①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第 3 期。
③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北魏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 年第 4 期。

（493）开始，达官显贵利用西山天然洞穴（即古阳洞）凿龛造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龙门石窟开始了由皇室经营的大规模开凿活动。这在《魏书·释老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景明初（5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508~512），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学者们都认为：这三所洞窟就是现在龙门西山宾阳三洞。《魏书·食货志》记载，到了"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以孝明帝、胡太后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竞相在洛阳城郭大造佛寺。此时龙门石窟的开凿也达到了鼎盛。534 年，北魏分裂以后，洛阳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并一度成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争霸的战场，以至沦为废墟。洛阳佛教遭受沉重打击，寺院荒芜，石窟开凿也基本停止，偶见零星补凿或续凿的小龛像。到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来自长安的魏王李泰为其生母长孙皇后在龙门宾阳南洞雕凿大像，李唐皇室才在洛阳龙门陆续开凿石窟。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置东都，以后高宗则天长期留居东都。著名的卢舍那大像龛便是高宗所开凿，则天皇后出脂粉钱助营而成。这一时期皇室臣僚在龙门的开窟造像活动达到了高潮。到玄宗天宝以后，洛阳为"安史乱军"所占，石窟开凿基本中止。经过北魏至唐诸朝陆续营造，龙门石窟形成了横跨东西两山、南北长达 1 公里的石窟群。现有编号窟龛 2345 个，造像 10 余躯，浮雕石塔 40 多座，碑刻题记 2780 品，其中有纪年者 700 余品，是中国石窟题记最多的一处，尤以"龙门二十品"驰名中外。龙门石窟的营造高峰是北魏和唐两个时期。

北魏营造的洞窟主要有古阳洞、莲花洞、宾阳中洞、火烧洞、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路洞；北魏营造北齐时完工的有汴州洞；北魏开窟中辍、唐代继而造像的有宾阳南洞、宾阳北洞、药方洞、赵客师洞和唐字洞等。龙门魏窟是在承袭云冈石窟北魏洞窟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窟形主要仿自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马蹄形、穹隆顶的草庐形式，最为典型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

古阳洞居西山南部，是龙门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大窟，原系天然洞穴。太和十七年（493）以后，一批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陆续在此修整洞窟，发愿造像。窟内后部雕一佛二胁侍菩萨像，据学者的研究，这铺造像是为孝文帝雕造的。主尊释迦佛为高肉髻，面相长圆，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台座上。菩萨头戴花蔓冠，冠侧宝缯先上折再下垂于头两侧。脸庞清秀，面含微笑，颈下戴桃尖形项圈。双肩敷搭披巾和璎珞，含胸挺腹，姿态优美。窟内左右壁上下各有三层大龛，每层各四龛，窟顶和四壁雕满各式各样的小龛。这些大小龛像大都有施主造像发愿文，包括了北魏皇室成员、贵族和高僧。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就在古阳洞。

宾阳三洞是龙门最典型的魏窟，仿云冈石窟模式而开凿。所以这种洞窟形制与昙曜所凿五窟和第 5 窟有相似之处。洞窟的开凿从景明初一直持续到正光四年（500~523），其中南洞和北洞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未能完工。宾阳中洞窟

门上雕双龙交缠形象，门外两侧各开一屋形龛，龛内雕力士像。门甬道南侧浮雕大梵天，北侧浮雕帝释天。窟内主尊造像为三世佛，正壁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侧壁各雕一立佛二菩萨像。前壁自上而下雕刻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对坐说法图、萨埵太子本生、大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礼佛图后被盗劫国外。

方形三壁三龛式窟是龙门比较常见的窟形，比较典型的是胡太后之舅皇甫度所开凿的皇甫公窟，洞窟完工于北魏孝昌三年（527），是龙门魏窟中惟一有纪年的洞窟。窟内正壁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思惟菩萨。南壁龛雕弥勒菩萨，北壁雕释迦多宝佛。龛下均有精美的礼佛图。窟顶有大莲花，八身伎乐天手持各种乐器作凌空飞舞状，姿态十分优美。另外还有圆形或圆角方形的三壁设坛式窟，如慈香洞、六狮洞等；纵长方形的火烧洞等。其中火烧洞崩塌严重，但正壁南侧还有东魏孝静帝母子的造像龛题记，窟门楣上雕刻了汉式传统的二身天人乘龙的形象，有人以为是东王公和西王母题材，十分罕见。

龙门有许多洞窟外观雕出屋脊、瓦垅等仿木建筑窟檐，或雕出火焰尖拱门楣，这是云冈石窟完整仿木窟檐的简化形式，但使用并不普遍。穹隆顶上一般都雕有一朵大莲花，周围环绕一圈细腰长裙、飘逸自如的伎乐飞天，有祥云烘托，象征着天穹。宾阳中洞和皇甫公窟等窟的地面上也刻出以莲花为母题的装饰图案。各大窟内还有大量的小龛，形制多样，变化复杂，有方形龛、圆拱龛、屋形龛、帐形龛和盝顶龛等基本龛形，有的甚至两种或三种龛形雕刻在一起，组成新的龛形。龛楣雕刻华丽，由龙、凤、鹿、饕餮、童子、华绳、忍冬纹、火焰纹、联珠纹、三角垂幛纹、垂幔、流苏等组成变幻无穷的装饰图案。楣面还雕刻七佛、佛本行故事、维摩文殊说法以及飞天。

北魏洞窟的主尊造像主要流行释迦牟尼和表现在兜率天宫的交脚弥勒菩萨，还有表现佛法传承的三世佛题材和表现《法华经》题材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此外，还有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定光佛等，但比较少见。除主尊造像外，壁面还雕刻大量连环画式的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等浮雕以及大量的供养人和大型帝后礼佛图。尤其是维摩居士和文殊菩萨问答的题材很多，一般在龛外两侧上方比较显要的位置。这些题材与当时流行《法华经》《弥勒上生经》和《维摩诘经》等佛典以及帝王臣僚热烈崇佛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主尊造像的配置主要有一佛二菩萨和一交脚弥勒菩萨二菩萨组成的“三身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成的“五身式”以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成的“七身式”。在洞窟中佛、菩萨、弟子、飞天和力士的造型，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迁洛前后开凿的古阳洞部分龛像中的佛像和菩萨肩宽体壮，佛身着袒右式袈裟，菩萨斜披络腋，这些都保留了云冈早期造型和服饰的旧样式。宣武帝景明以后旧样式消失。同时古阳洞出现面容清瘦，双肩下削，身材纤细，重在表现人物神与骨的“秀骨清像”形象，这种形象成为北魏流行的新样式。佛像身穿汉族士大夫的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褶层叠稠密，披覆于佛座前。菩萨身披宽博的帔巾，于腹部交叉和交叉穿环。这种样式来源于南朝

造型艺术的影响，同时也符合中原汉民族的审美情趣。这种艺术造型的流行是拓跋鲜卑模拟南朝制度、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具体表现。

2. 麦积山石窟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凿于山体西南、南、东南三侧的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六七十米，栈道重叠多达10余层，险峻异常。由于地震的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194个。其中西崖140窟，时代较早；东崖54窟，多为时代稍晚的大型洞窟。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凿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现存最早的洞窟似不早于5世纪。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相继开凿。唐、宋、明各代多为重新妆銮改塑。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唐代以前的遗存。造像主要是敷彩泥塑，只有少量石雕，总计约7000余躯，是中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遗存的壁画近1000多平方米。该石窟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重新发现，1953年文化部组织麦积山勘察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勘察。1975~1984年对石窟进行全面维修和加固。

（1）早期洞窟

在现存最早的一批洞窟中，第74、78窟是一组双窟。第78窟平面为横长方形，平顶，正壁和左右壁下部有倒凹字形高坛，坛上各贴壁塑结跏趺坐佛一身。正壁佛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立像。正壁两侧上方的圆拱形小龛内，塑交脚菩萨和思惟菩萨，菩萨两侧又有二胁侍菩萨。主尊佛像作施无畏印，两侧佛像为禅定印。佛著袈裟，内穿僧祇支，偏衫遮覆右肩，袈裟衣纹凸起，褶纹密集。佛面相雄健，直鼻大眼，嘴小唇薄，躯体粗壮。菩萨高冠、披发，袒裸上身，下着长裙，帔帛绕臂下垂，体态浑厚。塑像和壁画后代曾重绘、妆銮。1965年，在坛座侧壁剥离出底层壁画，为男供养人画像一列，供养者戴巾帻，着交领、窄袖、束腰长袍，足穿靴。画像旁各有榜题一方，书写供养者籍贯、姓名，其中一方题名中有"仇池镇"字样。供养人的服饰为北魏太和十年（486）改革前流行的胡服式样，"仇池镇"建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如此，则壁画为开窟时期的作品，建窟时间当不会早于446年。也有人认为，壁画乃后代重画，开凿年代应在后秦或西秦时期。属于同期的洞窟还有第165、70等窟，为平面方形的平顶或券顶窟。造像题材主要是三佛、胁侍菩萨、思惟菩萨。

（2）北魏洞窟

遗存的洞窟数量最多，分为前后两期。前期（5世纪中~5世纪末）洞窟除沿用早期形制外，有的平面近于方形，顶部为平顶，左右两壁各凿一大龛，正壁两侧加凿一列或数列小龛。有的在左右壁大龛之外又加凿小龛。造像题材仍以三佛为主，佛两侧胁侍二立菩萨。小龛内除塑菩萨坐像外，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千佛像等。后期洞窟（6世纪初~534年北魏亡）的数量较前期大增。第115窟发现

有“大代景明三年九月十五日”施主张元伯的长篇发愿文，这是麦积山现存最早的一条造窟纪年题记。该窟平面作方形，平顶，正壁的方形高座上塑一结跏趺坐佛，着偏衫式袈裟，作施无畏印，两侧壁有胁侍菩萨立像。墨书纪年发愿文写在佛座前侧，窟内壁画中有羽人的形象。同时期的洞窟还有其他形制，如方形、平顶、左右侧壁各一圆拱大龛；或正壁和左右侧壁各凿一大龛、四壁上方加凿小型列龛；或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套斗形藻井窟等，还出现一些窟形别致的大窟。这一时期的造像题材除三佛外，还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等新的组合。此外还有七佛、立佛、十大弟子和供养人像等影塑或塑像。窟内壁画数量较多，除飞天、莲花等装饰性图案外，还有在窟顶或四壁绘出内容连续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如睒子孝养盲父母、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等。大型经变画有维摩经变、西方净土变等。第127窟的西方净土变，有众多的建筑和人物，组成净土世界的美妙图景，构图谨严，气势宏伟。这是中国石窟中已知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净土变。它反映了北魏晚期净土信仰的流行和影响。这一时期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趋于世俗化，人物体形修长，面容削瘦清秀，具有明显的“秀骨清像”特点。

（3）西魏洞窟

西魏时期洞窟续凿不衰。据《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麦积山再葬佛舍利碑》记载，西魏大统元年（535）再修崖阁，重兴寺宇。《北史·后妃列传》载，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失宠，在麦积山出家为尼，死后凿崖为龛而葬，号寂陵。这些记载均反映了西魏凿窟修寺的盛况。洞窟形制多为北魏后期流行的方形平顶窟，或侧壁无龛，或两壁、三壁均凿大龛。模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崖阁式窟，有了进一步发展。崖阁式窟外雕出八角形列柱，上部雕出屋脊、瓦垅和斗棊等。列柱以内为前廊，在廊的后部再凿出窟、龛。造像题材除三佛等内容外，还有将维摩、文殊像分置于两侧壁相对而坐的布局。塑像组合中，新增了立于佛两侧的童男、童女像。这类世俗人的形象，更为写实。窟内壁上的影塑小像大为减少，而代之以装饰性较强的图案。佛的袈裟多为褒衣博带或双领下垂式，僧祇支前多结小带，下摆衣褶密集。菩萨的帔帛多在腹前交叉、穿环或打结。造像人物的面相由清瘦渐转丰圆。

（4）北周洞窟

北周洞窟遗存数量较多，并开凿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洞窟。中小型洞窟平面多作方形、盝顶。窟内四角雕出石柱，各壁顶端雕出横梁连接四柱，窟顶四坡相交处亦雕有斜梁。窟内三壁各凿 1 龛，或正壁 1 龛、左右壁各凿 3 龛。规模较大的窟多为崖阁式。大都督李允信出资营造的七佛阁，可能是位于东崖最高处的第 4 窟，俗称上七佛阁或散花楼，距地面高约 50 米。窟前为八柱七间的殿堂式崖阁，柱内是高大的前廊，廊顶雕有平棊藻井。前廊后部，凿出 7 座并列的大窟，平面

皆作方形，盝顶。窟内除影塑为原作外，塑像均经后代改塑。第9窟俗称中七佛阁，依山崖凿出7个并列大龛，龛前有木构建筑。第3窟俗称千佛廊，依山崖雕出6列千佛像，像前为人字披顶的长廊。这些窟龛规模之大，为前代所不见。造像题材以七佛为主，佛像旁侧配置弟子和菩萨像。造像人物的面相方圆丰满，体态健壮。佛像的肉髻低平，短颈宽肩，腹部略凸起。衣纹宽疏。菩萨的服饰多样化，出现帔帛自双肩搭下，横于胸腹间二道和佩挂长璎珞等式样。在壁画中出现以绘为主、塑绘结合的新形式。第4窟外顶部的飞天，头部、上身、双足等肌体部位用浅浮雕手法，头饰、服装和其他饰物则用彩绘画出，使飞天形体突出醒目，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

3. 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西南35公里处的小积石山，共有编号窟龛184个。石窟的开凿从西秦一直延续到唐代。

十六国西秦时期开凿的主要是第169窟和第1龛。第169窟为平面略呈不规则椭圆形的天然洞穴，面宽27、深19、高14米。窟口距现在地面高30余米。窟内左、右、后三壁共保存着不同时期的造像71尊以及大面积的壁画。造像多为泥塑或石胎泥塑。由于自然风化等原因，有的造像泥皮剥落，仅存石胎。其中窟内北壁西秦建弘元年塑造的第6龛最具代表性，龛内主尊为无量寿佛，佛面相浑圆，长耳垂肩，眼大，双肩宽厚，身体尤显雄壮，身着袒右式袈裟，右肩有偏衫衣角，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两侧分别为观世音和得大势至菩萨立像，其左上侧为十方佛和西秦建弘元年题记。根据纪年造像的时代特点，比较窟内其他造像，可以看出窟内主要塑像和壁画均属西秦时期。如第7龛立佛像亦面相浑圆，双肩宽厚，身体雄壮，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单薄贴体，透出健壮的躯体，衣褶稠叠，下垂感很强，颇有中印度秣陀罗佛像样式的特点。造像和壁画题材均为大乘佛教的内容，主要有表现西方净土的无量寿佛、观世音和得大势至菩萨，表现《法华经》题材的释迦多宝，此外还有《维摩诘经》中的维摩像、《华严经》中的十方佛，遗迹释迦说法、三佛、五佛、七佛等题材。

北魏时期的重要洞窟有第126、128和132窟。三窟相邻，均为方形覆斗顶，三壁设坛，坛上雕像，主尊为释迦多宝佛，左为交脚弥勒菩萨，右为结跏坐佛，构成了三佛题材。造像形象为典型的“秀骨清像”样式。

三、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

北方地区的佛教遗迹主要是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

（一）石窟寺

主要分布在河西、雁北两区。重要的石窟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

窟、肃南金塔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最东边的一处是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西区多塑像、壁画，大同、义县石窟皆石雕。北方地区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天梯山下层塔庙窟——第 1 窟，该窟下层壁画多存中亚风貌，有可能是北凉沮渠氏割据凉州时期（401~439）的遗迹。除天梯山以外，各地现存石窟多北魏复法（452）以后所开凿。石窟的种类有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禅窟和禅窟群。依据各类窟形制和造像的变化，可以分四期[①]。

第一期，约北魏复法之初，石窟主要是椭圆形平面的大像窟，窟内主像高大。主要造像是三佛，其中未来佛——弥勒，多作交脚菩萨的形象。

第二期，为孝文帝迁洛以前，大像窟减少，多佛殿窟和塔庙窟。佛殿窟多作方形或长方形平面。有的设有前室。窟内后壁前置主像，也有的开大龛内设主像，主像的题材多释迦或弥勒，也有释迦多宝对坐像。左、右、前三壁流行上下多栏式的布局，有的上下诸栏排列佛龛，有的上栏开龛、下栏作长卷分格形式的雕绘。其内容多本生或佛传，也有维摩、文殊。较晚出现了七佛和作出斗拱的屋顶龛，窟口有的雕出简单的窟檐。塔庙窟中建方形多层四面开龛的塔柱，四壁布局略同佛殿窟的左、右、前壁。佛殿窟、塔庙窟这时都盛行双窟的布局。第一、二期石窟，以位于北魏都城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为典型，当时其他地点开窟造像大多受到云冈样式的影响，远在河西的敦煌莫高窟似乎也不例外。第二期还出现了大型禅窟和较小的禅窟群，禅窟一般少雕饰，其主像无论云冈、莫高，均多交脚的弥勒形象。

第三期，为迁洛以后迄西魏，佛殿窟流行后壁开龛和三壁三龛式的方形平面，出现了满布千佛的佛殿窟。塔庙窟塔柱层数增多；又有由多层向单层发展的趋势。出现与佛殿窟布置相似的小型禅窟和禅窟群；后者除附设禅室外，几与方形的佛殿窟无殊。第三期各类窟的主要造像题材与二期相似，但流行较大面积的千佛布局，个别窟出现了无量寿佛；在人物造型方面，第三期与以前有较大的差别，秀骨清像的出现和褒衣博带的流行，是其特殊的时代特征。

第四期，为北周时期，石窟多分布在莫高窟，主要是后壁开龛的方形佛殿窟；少数塔庙窟单层塔柱，四面各开一龛。造像题材变化不大，千佛和佛传数量增多，有的布置到窟顶；个别洞窟出现涅槃像和卢舍那佛。人物形象向丰满发展。龙门宾阳洞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组合，这时才出现在莫高窟第 439 窟主龛和第 290 窟、第 428 窟塔柱正面。

1.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位于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 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高数十米的断崖上，南北绵延 1.5 公里。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佛教文化及其艺术传播的主要中转站。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已经修塔建寺蔚然成风。莫高窟的创建充满着神秘色彩，原存于莫高窟第 332 窟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是

①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这样记载其营造历史的："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后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自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②]由此可知，莫高窟的开凿始于4世纪中叶以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又相继开凿，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不过现存最早的洞窟大约为北魏时期，而碑刻所记4世纪中期沙门乐僔、法良禅师所开凿的洞窟早已踪迹难觅。根据现存洞窟的分布情况，莫高窟可分为南北两区。由于北区主要是僧人和工匠居住之地，保存塑像和壁画的洞窟很少，所以现有492个编号洞窟大多集中在南区，是莫高窟的精华所在，上下达五层之多。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对北区洞窟做了发掘清理工作，同时也做了编号，这样莫高窟实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五座。根据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和塑画特点的演变，莫高窟可分为四个大的发展时期：即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时期，前后延续了一千年，这在中国石窟寺中是绝无仅有的。敦煌莫高窟为我们保存了各个朝代的塑像和壁画，是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北朝时期现存北魏、西魏、北周等北朝洞窟36个（有少数北魏洞窟可能开凿在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有三种：（1）主室两侧壁凿有小禅室的禅窟。西魏时期的第285窟是典型代表。该窟主室平面方形，覆斗形顶，正壁凿一大龛，两侧各凿一小龛、南北壁各凿出4个小禅室。（2）"中心柱窟"。平面作长方形，窟内凿出方形塔柱，柱体四面开龛塑像，窟顶前部多作"人字披"形，后部为平綦顶。这是北朝时期的典型窟形。（3）方形平面的"覆斗顶窟"。正壁（西壁）大多开凿一大龛。覆斗顶窟于北魏末、西魏初出现，一直沿用到元代，只是在龛的形制和位置上略有变化。窟中所塑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主像两侧多有二夹侍菩萨像，此外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菩萨像和禅僧像等。北周时期，佛的两侧出现二弟子像，成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铺五身的组合。

塑像背部多与壁面相连，个别较小的菩萨像是头部模制后接在躯干上。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贴有影塑千佛、供养菩萨和飞天等像。窟内顶部和四壁满绘壁画，顶和四壁上部多为天宫伎乐，四壁下部为药叉或装饰花纹。中部壁面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位置适中，醒目突出。北周时期，这类故事画题材增多，并且还画到人字披或窟顶四坡上。佛传故事画除降生、出游四门、降魔、初转法轮等片断外，还有内容连续的长幅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有尸毗王割肉贸鸽、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头、睒子深山奉养盲父母、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阇提搬兵复国、须达拏太子施舍、善事太子入海求宝等。因缘故事有沙

①宿白：《<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弥守戒自杀、五百盲贼成佛、须摩提女请佛、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等。这类故事画的构图，除方形或长方形的单幅式外，多为横卷连环画的形式。北魏时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用青、绿、赭、白等色敷彩，色调热烈厚重。西魂以后多用白色壁面为底色，色调趋于清新雅致。北朝佛教重视禅行，这一时期的石窟内容多与僧人们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2.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州山（州，一作周，又称武州塞）南麓，武州川北岸。原称石窟寺，又称恒安石窟或北台石窟寺。明代为防边患，在该窟旁设立云冈堡，故近人调查时称为云冈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余，现存主要洞窟53个，小龛1100多个，造像5.1万余躯，分作东、中、西三区。这里的石窟是由北魏皇室和高僧经营的国家石窟大寺。大窟多建成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间，较小窟龛的开凿则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末（524）。近代以来，云冈石窟逐渐湮灭无闻。20世纪初，平绥铁路修通后，重新引起世人注意。中国学者陈垣、叶恭绰等人，曾著文报道。1949年以前，云冈石窟被盗劫和破坏的佛像，达1400余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云冈作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和测绘。1949年以后，对石窟进行大规模的修葺，并发掘了窟前遗迹和被泥沙淹埋的洞窟。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中原北方地区开凿较早、以北魏洞窟为主体的石窟，曾给予各地石窟很大的影响。它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并为北朝大石窟的代表。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的中后期。其创建年代有文成帝和平初年与兴安二年（453）二说。自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平城（今大同市）作为北魏都城近百年之久。武州塞地当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与都城平城间往来的交通要冲，自明元帝始，这里又为北魏皇室行幸祈福之地。云冈石窟于此开凿，遂成为都城附近的佛教胜地。北魏佛教主要来源于北凉。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迁凉州僧徒3000人及宗族吏民3万户于平城，造成了如《魏书·释老志》所记："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的局面。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应是来自北凉的工匠。北魏佛教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成为抬高皇帝政治地位和维护皇室权威的工具。道武帝时的沙门统法果，曾带头礼拜皇帝，声称皇帝即当今如来，拜天子乃是礼佛。文成帝兴安元年，造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454）又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5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铸释迦立像5身。这是北魏佛教泛滥，佛教造像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与道教之间，在北魏有过激烈斗争。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焚毁佛像和佛经，坑杀沙门。这次废佛事件，却成为促成云冈石窟开凿的间接契机。史载兴安元年文成帝即位，下令恢复佛法。明年，召凉州名僧昙曜至平城。和平初，任昙曜为沙门统，奉以师礼。由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开窟5所，镌建佛像各

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云冈北魏石窟可分三期。

（1）北魏第一期石窟

这一时期的石窟共有 5 个，即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偏西的昙曜五窟（16~20窟）。这 5 窟即相传为太祖以下 5 帝各凿一像的遗迹。其开凿的顺序依次为第 19、20、18、17、16 窟。各窟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仿印度草庐式。洞窟前壁均设有长方形窟门和高大的明窗。主像以三世佛为主，正壁主尊均为高达 15~17 米的佛像。还有释迦和交脚弥勒菩萨，外壁雕千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中主要位置。佛面相方圆，两肩齐亭，深目高鼻。上身内着僧祇支，外着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菩萨袒上身或斜披络腋，戴高宝冠，胸佩项圈、短璎珞、戴臂钏，下着羊肠大裙。飞天着装和菩萨相同，大裙下露足。衣纹厚重凸起，线条简洁。从造像特点中，可以看到中亚犍陀罗艺术和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兔罗艺术的某些影响，甚至有西部长安造像样式的影响。

（2）北魏第二期石窟

主要在中区及东部的一部分，开凿于文成帝以后至迁都洛阳以前（465~494）。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为双窟，一组为 3 个窟。此外，第 3、11 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和第 20 窟以西若干小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顶多雕平棊，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出现世俗供养人行列。太和十三年前后，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菩萨头戴花鬘冠，着帔帛，大裙下摆飞扬。飞天在此期后段穿短衫，有的不露足。题材突出释迦，主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还有依据《法华经》雕出的释迦、多宝佛和依据《维摩诘经》雕出的维摩、文殊对坐像，以及修持“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本生、佛传浮雕及七佛、供养天人等。

双窟中开凿年代最早的是第 7、8 窟，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年。佛装交脚弥勒、天龙八部护法像和供养人行列，最早出现在这组窟中。第 9、10 窟为双窟，据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①，可大致推定建于太和八至十三年，最早出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屋形龛等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第 5、6 窟主像均为三世佛，佛像已着褒衣博带式佛装。这种改变，是和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太和十年开始的服制改革措施相适应的。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在这组窟中明显表现出来。大型连续的佛传故事雕刻，也出现在第 6 窟中心塔柱及后室四壁。但这组窟开凿较晚，且尚未完工，说明距南迁不远。

这一时期双窟形制的出现，应当与北魏冯太后曾两度临朝称制，朝野权贵多并称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二圣”的历史背景有关。

---

①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

（3）北魏第三期石窟

洞窟主要集中在西部，开凿于迁都洛阳后至正光末年（494~524）。此期多为不成组的中小窟，补刻小龛较普遍。佛的面像清癯，长颈削肩。全为褒衣博带式佛装，大衣下摆褶纹愈益重叠，延昌以后为密褶式平行线条。菩萨面像亦趋瘦削，上身着短衫，帔帛交叉处穿璧，大裙下摆呈锯齿状，并向外伸展。飞天上着短衫，大裙曳地，不露足，腰折作V字形。龛楣、帐饰日益繁复。题材流行释迦、多宝与维摩、文殊，佛传故事较多，弥勒与释迦并重。此期窟龛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中心柱窟，窟中雕佛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龛；第二种为千佛窟；第三种是四壁重龛式中小窟，后壁主像多为上龛弥勒，下龛释迦；第四种是三壁三龛式中小窟，这是新出现的洞窟形制，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释迦龛。

总的来看，第二期以后，石窟和龛像增多，第三期中小窟龛成为开凿的主体。这表明在迁都洛阳前后北魏佛教的泛滥及其在平城中下层民众中的蔓延。现存铭记中的窟主身份，第二期尚有皇室和上层官宦，第三期则最高不过将军、太守，更多的是无官职的信徒。此外，在延昌、正光间铭记中，已出现乞求托生西方净土世界的要求。

（二）佛教寺院遗址

酒泉、大同和内蒙古固阳都曾发现较重要的佛寺遗迹。酒泉石佛寺湾子遗迹前后出土北梁时期的大覆钵粗相轮式的圆形小石塔7件，其中较完整的是承玄元年（428）造“释迦文尼得道塔”。该塔台基下部线雕供养菩萨、力士，并附有八卦符号，上部环刻《增一阿含经·结禁品》中的一段和发愿文；覆钵部分有8龛，内雕七佛和交脚弥勒；相轮最上的盖石有线雕的北斗星座。类似的石塔，敦煌也有发现。这批石塔给中国早期佛塔造型和佛像形象提供了新资料；塔上出现的八卦等线雕，似与中国早期佛教和道术相通有关。大同附近近年发现佛寺遗址多处，重要的有方山永固陵前以佛塔为中心的思远佛寺遗址和大同东门外御河东岸的北魏佛寺遗址。两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佛和菩萨的塑像残体，有的还保存了贴金敷彩的痕迹。内蒙古固阳城库伦古城西北隅发现的北魏遗址中，也出土不少类似的塑像残体，还发现了壁画残片，该古城被考订为卫护平城的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城址。以上三处遗址所出塑像，造型与上述石窟寺院第二期较早阶段的造像相似。北魏建都平城时期，平城附近的佛教寺院，开山凿窟则雕石造像，地上建寺则绘壁塑像，为迁洛以后所沿袭。

三、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

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有零散出土的有关遗物和少量寺院遗迹。长江中下游自吴末迄东晋的墓葬中，多出土附有佛像的器物。如湖北武汉永安五年（262）墓

所出镂雕立佛的鎏金带饰；鄂州塘角头六朝早期墓中出土的佛像[①]，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独立出现的佛像。其次有浙江武义、湖北鄂城、湖南长沙等地吴末西晋初墓出土的有坐佛形象的夔凤镜。再次是长江中下游和浙江等地两晋墓中随葬的谷仓罐上出现的佛像。这一阶段的佛像，从其所在的位置和造型等方面推测，与此后单独雕铸作为供养的佛像意义不同。

南方单独雕铸的佛像，现存最早的是刘宋遗物，有四川成都出土的元嘉二年（425）净土变石刻和传世元嘉十四年、二十八年两件鎏金铜坐像。刘宋造像较同时和稍后的中原北方造像为清秀。南朝清秀造像大约到5世纪末向庄重端雅发展，四川茂汶所出齐永明元年（483）无量佛和弥勒佛石刻可以为例。

南方开窟凿像之风远逊于北朝。所开凿的石窟龛像主要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摩崖龛像。其中两地的大龛原皆前接木建殿阁，主像和外观均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有别。南京栖霞山石窟以南齐永明二年至梁天监十年（484~511）营造的高9.68米的无量寿佛大像龛为中心，分布大小窟龛290余个，造像500余尊。无量寿佛大像龛平面略呈椭圆形，敞口式，龛前曾有连接岩面的木构建筑。龛内正壁设坛，坛上雕无量寿佛。佛面相近方圆，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两侧分别为立于覆莲座上的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其他窟龛也有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的形制及三壁三龛式窟。新昌石城山摩崖龛像以永明四年（486）创建、天监十五年竣工的弥勒佛大龛为中心，在其西北有两个毗连的大小岩洞，洞内满布千佛。弥勒佛大龛平面略呈横椭圆形，前壁敞开，露顶，龛内正壁雕佛座，座上雕大像一躯。经后代重妆，现存佛像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身高13.23米。据文献记载，原像的样式为倚坐弥勒佛，发作螺髻，右手施无畏印，是弥勒龙华树下成佛、普度众生、共成佛道的形象，与重妆后的佛像有很大区别。

南方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龛，但已发现的寺院遗迹甚少，较重要的一处是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该地先后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萧梁时期的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之孙益州刺史萧范所造螺发、着通肩袈裟的释迦立像，可以视作南朝后期佛像的典型。梁像中有较多的形象组合复杂的造像石龛，有的龛背镌刻祈求往生西方无量寿国的铭文。南朝佛教造像突出无量寿佛和弥勒佛，反映出人们对西方净土的祈求和对弥勒成佛后世间安宁的向往。这和中原北方重禅观，着意于自身的解脱，因而流行雕塑释迦和弥勒菩萨等形象有所不同。四川广元古栈道的崖面上多凿窟龛，较早的窟龛造像与中原北魏晚期石窟类似，而皇泽寺第9窟最具代表性，其窟形和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极为接近，它们应属中原地区系统，与江浙一带南方地区的窟龛不同。

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四、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存

（一）吐鲁番地区

哈拉和卓古城附近的古塔和城东吐峪沟石窟中曾发现不少 3 世纪和 5~6 世纪的写经。约从 5 世纪起，各族统治集团在吐鲁番地区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上述写经中出现多卷沮渠安周称凉王时（444~460）的供奉物，即是一例。沮渠安周不仅写经，从原存哈拉和卓古城内的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中还知他在高昌兴建尊崇弥勒的佛寺。460 年，沮渠氏为柔然（茹茹）破灭之后，在柔然控制下的统治高昌的阚氏政权继续奉行佛教，所以吐鲁番附近曾出土有柔然永康五年（468）的写经。

吐峪沟石窟东南区第 4 窟是吐鲁番地区早期洞窟之一壁画上的汉文榜题的字体和 5 世纪迄 6 世纪初的写经相仿佛，估计这里的早期石窟即开凿于此时。这种早期石窟，其形制有正中设坛的方形窟，也有长方形中立塔柱的塔庙窟。窟内塑像早已毁坏，壁画题材有本生故事和千佛等。石窟形制和壁画内容都与 5 世纪略晚的龟兹石窟相似，可以推测吐峪沟早期石窟与龟兹石窟关系密切。

哈拉和卓古城北柏孜克里克和雅尔湖古城西南交河南岸的山崖间，现存唐以前的塔庙窟和吐峪沟第二期石窟，大约都开凿在麹氏高昌时期。壁画中的千佛逐渐代替了本生故事，窟顶出现彩绘的抹角叠砌式平棊，有人认为这些因素有可能源于东边的河西诸石窟。

（二）龟兹地区

自 3 世纪末起，龟兹迭遭侵犯。5 世纪中叶以后又相继役属柔然、嚈哒和突厥。龟兹统治者为了自身安全和统治人民的需要，除兴修坚固的城堡外，还大力乞灵于佛教。大约从 5 世纪末起，大乘教派开始在小乘的龟兹得到发展。在库车、拜城地区尚存不少石窟寺院。皮朗古城东北有名的雀梨大寺保留了规模颇大的遗址。

1. 石窟寺的分期

7 世纪以前开凿的石窟寺院，以拜城克孜尔石窟数量最多，从 6 世纪后期起，该石窟走向衰落，而库车的石窟特别是库木吐喇石窟日益繁盛。另外，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也有一定数量。3~6 世纪的龟兹石窟大体可分三期①：

第一期年代大约相当于 3~4 世纪。这一期石窟多平面近方形一侧附有甬道的僧房窟，这类窟一般无塑绘。其次是以中心塔柱为界分前后两部分的塔庙窟，塔庙窟塑像早毁，壁画内容前部主要绘因缘、佛传、本生和弥勒菩萨，后部画涅槃。再次是以大立像为界分前后两部分的大像窟，前部都塌毁，只存塑绘痕迹，后部塑绘涅槃。

---

①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第二期年代大约相当于 5 世纪。塔庙窟、大像窟情况略同前期，较晚的塔庙窟中出现卢舍那壁画。僧房窟数量相对减少，但出现大型僧房窟。流行开凿方形窟，方形窟有的类似佛殿，窟中设坛，原置塑像，壁画绘佛传和弥勒菩萨；有的后壁绘高僧，类似讲堂。这一期石窟成组的现象极为明显，典型组窟多以 5 座塔庙窟为主体。

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 6 世纪。此期各类窟多有简化的趋势。塔庙窟出现千佛壁画。大像窟后部缩小，有的类似隧道。克孜尔石窟早期僧房窟，这时较多地被改造为塔庙窟、方形窟和长条形小型窟。改造后的各类窟壁面有的绘制千佛。洞窟类型和壁画题材的变化，反映出龟兹佛教逐步复杂化。

2. 寺院遗址

4 世纪即已著名的雀梨大寺的遗址，位于皮朗古城北约 13 公里的苏巴什村北的铜厂河（库车河）两岸，遗址隔河东西对峙，分别称为东寺和西寺。

东寺遗址主体建筑的东、南、北三面围墙保存较好，东墙有的部分还存有马面。围墙内自南而北连接有 6 组建筑遗址，自南第二组以大塔为中心，西壁开一列佛龛，东壁下列 4 个僧房址。其他 5 组建筑址，则是环绕佛殿址或塔址列置僧房的遗迹。主体建筑围墙外墙北部和东部分布着零散存在的大小不一的僧房遗迹。

西寺遗址与东寺遗址不同处是没有大范围的围墙，西南方有墓地，最北部有僧房窟群。西寺遗址内有 6 组以上的建筑遗址，皆位于铜厂河西崖上。最南一组外围墙保存较好，平面略呈方形，四隅尚存角楼基址，门开在南壁正中，门外附有方形瓮城，围墙内中部有一方形佛殿遗址。西寺遗址的各建筑遗迹内，也多僧房遗址，最北端就高起的山坡开凿的僧房窟群，其中最大一群有十多个僧房，有的僧房窟壁上还保存坐禅高僧的影像。东、西寺遗址虽都有唐以来改筑和扩建的遗迹，但都保留了龟兹自古以来流行小乘佛教重禅观、多僧房的突出特点。西寺遗址西南的墓地分布不少唐以前的僧人墓，近年在一座僧塔左侧发现了洞室墓，墓内木椁大部完好，棺上彩绘方菱形边饰并贴附描金缠枝忍冬纹样的素绢，这种忍冬花纹在内地流行的时间是 5 世纪后期。此处墓地曾多次被盗掘，盗掘者从这里攫取了不少精致的圆形舍利盒。盒木胎，外贴麻布，布上先饰彩绘，贴金箔，然后刷油质透明涂料。其中最精致的一件，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该盒盖上画执箜篌、琵琶、笛等乐器的有翼童子 4 人，每人外绕联珠圈，珠圈间饰以对禽；盒身外壁绘戎装舞人 7 人，其中 2 人着猪头面具，描绘工丽生动。它不仅是龟兹的珍贵工艺品，更重要的是给“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卷一）的龟兹，增添了新的伎乐资料。

约处龟兹西南境外、位于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寺院遗址，曾被盗掘出大批较完整的塑壁、壁画和塑像；寺址附近的墓地，也曾发现圆形舍利盒等遗物。寺址的年代约属 4~5 世纪，是现知新疆西部重要的一处佛教遗迹。

参考文献：

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马世长《敦煌石窟》、丁明夷《龙门石窟》、丁明夷《云冈石窟》，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

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 年。

第十节 铜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属于汉式镜的范畴。由于南北分裂，社会经济状态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推移而变化，而且还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三国和西晋时期，黄河流域因汉末战乱，铜镜铸造业不很发达。曹魏在洛阳恢复尚方工官，制作铜镜的是右尚方。所铸铜镜，都是东汉以来北方流行的旧样式。新兴的所谓"位至三公镜"，也是由东汉后期的"双头龙凤纹镜"演变而来。长江流域由于汉末未遭动乱，经济发展较快，铜镜铸造业尤为兴盛。吴郡的吴县、会稽郡的山阴和江夏郡的武昌是吴的最重要的铜镜铸造中心。所铸铜镜不少与北方相同，但画像镜和神兽镜始终是南方的产品。尤其是神兽镜，铸造量最大，其种类除东汉以来的"环状乳神兽镜"外，还流行新的"同向式"、"重列式"和"对置式"神兽镜。在吴的铜镜中，有的还用佛像作图纹。和汉代一样，少数精致的铜镜在镜背镀金。吴镜的铭文多有纪年，有时还记明工场的所在地和工匠的姓名，如"会稽师鲍"、"吴郡胡阳张元"等。

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已，铜镜铸造几乎完全停顿。南方的东晋保持安定，铜镜铸造业得以维持。所铸铜镜仍以神兽镜等为主，但镜的图纹趋向简化。

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沿用东汉以来的旧式镜，而且数量甚少。南方的宋、齐、梁、陈，铜镜的生产也逐渐衰退，神兽镜、夔凤镜等质量粗陋，花纹简化，而各种粗制滥造的小铜镜不断出现。

第十一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

这一时期与中外文化相关的遗迹主要有定居中国的粟特人、罽宾人的墓葬；遗物则主要为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廷帝国（东罗马）、波斯、粟特等的金银器、玻璃器、铜器、货币等。

一、外来移民墓葬的发现

近年来，在陕西西安发现了一批北周时期外来移民的墓葬，主要为昭武九姓

（粟特人）及其后裔们的墓葬，有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以及罽宾人李诞墓。昭武九姓胡活动于在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这一地域在汉魏被称为粟弋或粟特。粟特人以“善贾”著称，主要信仰祆教，南北朝以后大批徙入中国新疆和内地，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操纵着国际商贸活动，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粟特人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北周时期在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1. 安伽墓

安伽墓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坑底寨村西北约 300 米处，西距汉长安城遗址 3.5 公里，地处西安北郊龙首原。2000 年 5~7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墓葬坐北朝南，方向 180 度，墓葬全长 35 米，由斜坡墓道、5 个天井、5 个过洞、砖砌拱券形甬道及砖砌穹隆顶墓室组成。

第 1 至第 4 天井东西两壁及过洞、甬道入口上方原绘壁画，但已大部剥落毁坏，现仅存第 3 至 4 天井及第 4 过洞、甬道上方部分图案。天井壁画为拄剑武士形象，第 4 天井壁画武士高 125 厘米，头戴兜鍪，身着袍，领口、袖口及下摆涂红彩，脚蹬黑靴，双手于胸前握剑，剑尖着地，双脚外撇呈一字形。第 4 过洞入口上方绘红彩莲花图案。

封门砖墙两重，均为平铺错缝垒砌。第一重高 2.27、宽 1.4 米，砌砖 28 层；第二重高 2.1、宽 1.4 米，砌砖 22 层。第二重封门墙烟熏痕迹明显。

石质墓门高 2.24、宽 1.46 米，由门额、门楣、门框、门扉、门礅及门限组成，其中门额、门楣及门框刻有图案。门扉有凸起的乳钉，上下各两排，每排 5 枚。门墩上各有一蹲狮，均张口露齿，颈刻卷毛。门额半圆形，高 66、宽 128 厘米，正面减地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上承圆盘的仰覆莲，盘内置薪火，火焰升腾。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头戴花冠，跣足，飘带飞扬，右侧者弹奏曲颈琵琶，左侧者抚弄箜篌。飞天下方各有一人身鹰足的祭祀，卷发，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似戴口罩，胁下生双翼，长尾上扬，双手持神杖伸向供案。案为三足，涂黑色，上置瓶、叵罗、盘等器皿，瓶内插莲花等吉祥花叶。高瓶贴金，其他器皿涂白，花叶贴金或涂绿彩。左右侧下角各跪一人，左侧者披发，身着圆领紧身衣，腰束带，左手置于贴金熏炉上；右侧者卷发，头戴帽，身着翻领紧身衣，右手置于熏炉上，左手持一方形物。画面阴刻部分涂红彩。门楣长 132、高 16、厚 12 厘米，中部线刻兽头，两侧线刻缠枝葡萄并以贴金连弧纹做兽须。左右门框高 136、宽 14、厚 12 厘米，线刻缠枝葡萄并饰贴金连弧纹。

石门后为砖砌拱券形甬道，长 2.45、宽 1.23、高 1.6 米。

墓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 3.5、东西宽 3.7、顶高 3.3 米，中部偏北放置一张保存完好的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

石榻长 2.28、宽 1.03、高 1.17 米，由 11 块青石构成，其中石屏 3 块、榻板 1 块、榻腿 7 块。石屏内面有贴金浅浮雕图案 12 幅，榻板前、左、右三面有图案画 33 幅，榻足线刻力士承托图案 11 幅。左侧石屏长 93、高 68、厚 8 厘米，后端上都有榫与后屏相应位置以卯套合。刻绘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及野宴图。后屏宽 205 厘米，高度及厚度与左右屏相同。左端侧面上部有一卯，右侧正面上部凿一榫，与左右屏相应位置榫卯相接。左右两端顶部各凿半个束腰形凹槽，与其对应，左右屏相应位置也凿有凹槽，凹槽中嵌束腰形木制或金属块固定整个围屏。后屏共刻绘六幅图案，自左向右依次为乐舞图、宴饮狩猎图、居家宴饮图、民族友好交往图、野宴商旅图及居家宴饮舞蹈图。右侧石屏宽 1.02 米，高、厚与左侧屏及后屏相同。左端上部有一榫，与后屏相应位置的卯相接。共刻绘三幅图案，从左至右依次为狩猎图、宴饮舞蹈图及出行图。榻板正前方及左右两侧减地刻绘动物头像图案 33 幅，其中正前方 17 幅，左右两侧各有 8 幅。主要有狮、鹰、牛、猪、龙、鸡、象、马、犀牛等。榻腿 7 条，其中前面 4 条，后面 3 条。前面均有线刻基本相似的图案 11 幅，皆兽头人身，毛发耸立，圆睁双眼，张口露獠牙，一足着地，一足抬起，作承托石榻状。

甬道内出土石墓志一合。墓志盖边长 47 厘米，减地刻篆书“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12 字。志石与盖同大，上刻细线格，志文楷书，共计 303 字。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安伽，字大伽，姑藏（今甘肃武威）昌松人”，曾任“同州（今陕西大荔一带）萨保、大都督”①。

2. 康业墓

康业墓位于西安北二环底寨村，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据墓志记载，墓主人是康居国王的后裔，名业，字元基，历任魏大天主、罗州使君、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等职，卒于大周天和六年（571），被诏赠为甘州刺史。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为长斜坡状，宽 1. 58 米。甬道平面略呈梯形，北宽南窄，长 2.16、南宽 1.42、北宽 1.5 米。甬道两壁发现有壁画痕迹。墓室为土洞穹隆顶，平面近方形，边长 3.3~3.4、壁高 1. 6 米。墓室近甬道口处置墓志一方，北侧中部靠北壁置围屏石榻一具，置于墓室中部的墓志与石榻之间有一层草木灰。石榻之上置骨架一副，头向西，仰身直肢，骨架之上有数层丝绸痕迹，腰部出土有铜带扣及腰带饰件，手侧出土布泉 1 枚，口中含东罗马金币 1 枚。封门一道，以绳纹条砖竖置错缝平砌。石门位于甬道之中，由门楣、门扉、门框、门限和门砧构成，门扉内侧正中有两对铺手衔环，上部两对连有一铁环，内穿木杠，以固定门扉，下部两对锁一铁锁。

墓志青石质，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方形，盝顶，素面，边长 45.5、厚 8.5 厘米。志石方形，边长 46.5、厚 13 厘米。志文 21 行，满行 20 字，共计 397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字，介绍了墓主人的生平、族属等。

围屏石榻青石质，由围屏、榻板和榻腿构成。围屏由四块长方形石板构成，东、西两侧各一块，北面两块。榻板长方形，榻面较粗糙，未经打磨，南侧及东西两侧有线刻图案。榻腿5个，均圆雕成狮子形。

甬道、墓壁有壁画，其做法为直接在壁上涂一层白灰，再在其上绘画，保存较差，仅能辨别出每屏画面的界线，每壁四幅画面。线刻主要分布在门楣、门框、围屏内侧、榻板正面及两侧，画面局部有贴金装饰。石门线刻主要分布在门楣和门框之上。门楣正中一兽面纹，两侧各为一青龙、白虎。门框顶端各立一凤鸟，之下各为一守门人物。门扉素面，饰三排（每排5个）门钉，门钉表面贴金。围屏线刻共十幅画面，东、西两侧各两幅，北面六幅，画面局部有贴金装饰，画面两侧及上部饰贴金柿蒂纹[①]。

3. 史君墓

史君墓位于西安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西距汉长安城5.7公里，距北周安伽墓约2.2公里。系夫妇合葬。墓葬坐北向南，形制为长斜坡土洞墓，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全长47.26米。墓道位于墓室南，南宽1.7、北宽1.48、水平长40.96、坡长41.30米，坡度15度。共有5个过洞和5个天井，天井平面为长方形，均略比过洞宽。甬道为拱券顶，长2.8、宽1.5、高1.9米。墓室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3.7、南北宽3.5米，由于墓室已被盗扰，顶部情况不清，现四壁残高仅存0.5米。墓葬使用了石门、石椁和石榻，这些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内容涉及汉文化、祆教和佛教等内容。出土有金戒指、金币、金饰品等文物。

封门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为两重封门，第一层为砖砌封门，第二层为石封门，石封门由门楣、门框、门扉、门槛、门墩等8块石头组成。门楣和两侧立柱上均浮雕缠枝葡萄、忍冬、伎乐等。伎乐头顶带有头光，造型、神态各异，尤其是手持的乐器各不相同，有箜篌、曲颈琵琶、横笛、筚篥、排箫等。其中右侧门柱的上部两伎乐还有未雕刻完的迹象，为研究北周雕刻步骤提供了参考。门扉分左右两扇，两扇石门上均饰彩绘贴金，彩绘大部分现已脱落，仅存飞天和莲花等图案。每扇石门上均有浮雕石泡钉，分4行，每行6个。

墓室中部偏北出土一石椁。石椁东西长2.46、南北宽1.55、高1.58米。坐北朝南，面阔5间，进深3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和椁顶三大部分组成。在椽头、瓦当、斗拱、立柱等部位均贴金。石椁墙板四面分别浮雕有宴饮、出行、狩猎等题材的图案。在人物脸部和服饰、动物身上和佩饰、建筑构件以及山水树木等部位施有彩绘或贴金。雕刻内容与风格带有十分明显的异域特

①国家文物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北周康业墓——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申报材料》，2005年。

色。在墓室淤土中，还发现一长方形石刻残块，上面分别有汉文和粟特文文字。从汉文部分可释读出墓主姓史名君，为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及其妻康氏分别为史国和康国人。

墓葬壁画十分简单，画工在原生土壁上涂一层很薄的白灰浆后，直接作画。而且壁画面积有限，分布于过洞上方和墓道、天井靠过洞两侧、甬道和墓室周壁，每幅画均有分栏，最大幅面为 1.7 米×0.88 米。由于壁画保存情况较差，所绘内容多已不清[①]。

4. 李诞墓

李诞墓位于西安市北郊南康村，南距坑底寨北周康业墓约 500 米、安伽墓约 650 米，东距井上村北周史君墓约 2000 米。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单室砖墓。葬具使用石棺，其上有阴线雕刻的图案。左侧棺板中部刻一龙纹，龙身修长，呈腾飞状，周围布满如意云纹。右侧棺板线刻一虎，张口露齿，双目圆瞪，身有条状斑纹。前档板中部刻一门，门框涂红色，门上有三排乳钉，乳钉贴金。门楣上线刻尖拱形门额，两侧各有一只飞翔的朱雀。门柱两侧各有一守护神相对立于覆莲座上，面均略向内侧，头后有圆形头光，卷发束髻，深目高鼻，耳轮较大，戴有耳坠，上唇有外撇的八字须，颈部戴宽带形项圈，上身袒露，身披帔帛，缠绕于双臂，末端下垂至莲座，腰穿短裙，跣足，右手持戟。门下方正中为一亚腰形火坛，火坛分三层，周壁饰三角纹并贴金，中间为一层台面，之下悬挂铃形饰物。火坛上烟雾升腾，火坛两侧向上伸出两枝莲朵。后档板刻玄武，玄武之后立有守护神，头后有圆形头光，以带束发，结成花状，深目高鼻阔嘴，上身袒露，肌肉发达，形象威猛，右手握长柄环首刀，举于头上方。盖板线刻伏羲女娲图，左侧为女娲，右侧为伏羲，均作人首蛇身，未相交。上身着敞口交领宽袖衫，身饰鳞片。伏羲戴小冠，双手捧弯月于头上方。中间有浮云，周围为星宿。

采用夫妇合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口含为东罗马金币，随葬有了方形盝顶墓志。据墓志记载，李诞是罽宾国人，北魏正光自罽宾国来到中国。该墓是目前所知的第一座明确记载为婆罗门种罽宾国人的墓葬[②]。

从上述几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移民墓葬的发现来看，外来移民已经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华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普遍采用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制；普遍采用墓志；有的墓葬采用中原地区的石棺等，而且石棺上线刻青龙、白虎等图案也是华化的重要标志。但粟特人葬具上的线刻多与祆教信仰有关，说明他们在宗教上仍然信仰祆教，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华化较其他因素要缓慢得多。但这些外来移民的后裔则不同了，有的已经改信佛教。最典型的莫过于《宋高僧传·释神会传》（卷九）所载："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于岐，遂

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1 期。

②国家文物局：《2005 中国主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

为凤翔人矣。"《宋高僧传·僧伽传》(卷一)也记载，僧伽是西域何国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信仰祆教，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改信佛教了。

二、外来遗物的发现

从目前西方遗物的发现地点来看，大都位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地区。

1. 金银器

西方金银器输入中国从汉代已经开始，如西汉齐王墓出土的凸瓣纹银盒[①]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输入的外来金银容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甘肃靖远发现的东罗马鎏金银盘[②]；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中出土的萨珊朝波斯狩猎纹银盘、银长杯、银高足杯[③]；大同北魏墓出土鎏金银碗1件、鎏金高足银杯1件[④]；大同北魏城址发现的多曲银长杯、银碗[⑤]；广东遂溪南朝窖藏出土的粟特银碗[⑥]等。其中宁夏固原县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高37.5、颈高6、流长9、最大腹径12.8、足座高8厘米。腹部以捶鍱技法装饰一周突起的人物纹样，共有6人，为男女相对的三组[⑦]。这些外来金银器，其产地包括萨珊朝波斯、东罗马、巴克特利亚、粟特等地区，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2. 铜器

大同北魏平城遗址窖藏中出土铜高足杯3件，被认为是具有强烈的希腊化色彩，其制造地很可能就是巴克特利亚[⑧]。

3. 货币

(1) 东罗马金币

东罗马金币发现的数量不多。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合葬墓发现3枚，分别为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二世舅甥共治时期所铸造[⑨]；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2枚[⑩]；西安北周李诞墓出土1枚，为查士

---

①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②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③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⑤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⑥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⑦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⑧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⑨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⑩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丁一世时期铸造[①]；宁夏固原北周田弘墓出土 5 枚[②]，其中 1 枚列奥一世时期（457~474）铸造、1 枚为查士丁一世（518~527）时期铸造、2 枚为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二世（527~565）舅甥共治时期（527）铸造、1 枚为查士丁二世（527~565）时期铸造。

（2）萨珊朝波斯银币

北方地区发现的萨珊朝波斯银币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址或墓葬中。如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出土 20 枚，其中沙普尔二世时期的 10 枚、阿尔达希二世时期的 7 枚、沙普尔三世时期的 3 枚[③]；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石函中发现了 41 枚萨珊朝波斯银币[④]，属于耶斯提泽德二世时期（438~457）的 4 枚，卑路斯时期的 37 枚[⑤]。其中 1 枚耶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边缘，压印有一行嚈哒文字的戳记，所以有些银币可能是经由嚈哒而流通到中国来的，反映了当时波斯、嚈哒和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

南方地区的南朝窖藏、墓葬等也出土了一批萨珊朝波斯银币，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情景。如广东遂溪县南朝窖藏中出土约 20 枚，其铸造年代大约在沙普尔三世至卑路斯（383~484）之间[⑥]；广东英德南齐墓出土 3 枚，均为卑路斯时期铸造[⑦]；广东曲江南华寺南朝墓中出土了 9 枚被剪过的萨珊朝银币[⑧]。

4. 玻璃器的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主要有罗马玻璃器、萨珊朝波斯玻璃器和印度玻璃器。对于这些外来玻璃制品，西晋时期的潘尼《琉璃碗赋》中有形象描述：“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近几十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批外来玻璃器，主要包括罗马玻璃器、萨珊朝波斯玻璃器、印度玻璃器等。

（1）罗马玻璃器

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了 5 件玻璃器[⑨]，质薄透明、闪淡绿色或深绿色，器形有鸟形水注、侈口直筒形凹底杯、圜底小钵、残高足器等。这批器物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的器物造型不同，特别是其中的鸭形水注，造型和阿富汗伯古拉姆古城遗址

①国家文物局：《2005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②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勉诚出版（株），2000 年。
③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
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 年第 5 期。
⑤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石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 年第 5 期。
⑥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 年第 3 期。
⑦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考古》1961 年第 3 期。
⑧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 年第 9 期。
⑨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 3 期。

大约 3 世纪的堆积中出土的罗马制造的鱼形玻璃水注的造型极为相似，应当是罗马的输入品。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发现的网目纹玻璃碗和杯[1]、南京象山 7 号东晋墓出土的直筒形刻纹玻璃杯[2]、南京大学东晋墓出土的玻璃杯[3]、南京市石门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碗盏残片[4]等，也属于罗马玻璃器。

（2）萨珊朝波斯玻璃器

萨珊朝波斯玻璃器是指在伊朗高原制造的玻璃器，造型浑厚，喜欢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它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特别是发展了冷加工工艺，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

我国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萨珊朝波斯玻璃器主要有：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玻璃碗 1 件[5]；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 1 件乳钉玻璃碗[6]；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圜底玻璃碗[7]；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玻璃碗 1 件[8]；山西大同南郊第 107 号墓出土 1 件玻璃碗[9]；江苏句容春城南朝宋墓中出土 1 件玻璃碗[10]；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 1 件玻璃碗[11]；陕西咸阳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1 件玻璃碗[12]；新疆楼兰出土的玻璃碗和类似的玻璃残片，其中的玻璃碗由斯坦因盗掘出土，出土于一座 5~6 世纪的墓葬之中[13]；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佛寺中采集的玻璃残片，该遗址的年代大约在 4~5 世纪[14]。

通过研究，可知这些萨珊朝波斯玻璃器的特点为：均为钠钙玻璃；制作工艺采用模制或无模吹制；装饰纹样采用突起的凹球面、小凹球面、乳突或对刺；装饰工艺则采用磨琢、热粘或钳夹[15]。

（3）印度玻璃器

1994 年，在汉魏洛阳城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发掘时，发现了 15 万余枚小玻璃珠[16]。据研究，这批玻璃珠为不规则的圆柱形，直径 1~5、孔径 0.5~2、高 1~6 毫

①张季：《河北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 3 期。
②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③南京大学历史学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 年第 4 期。
④李鉴华　屠思华：《南京石门坎六朝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 年第 9 期。
⑤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⑥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⑦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⑧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 年第 3 期。
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⑩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⑪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1 期。
⑫負安志：《北周墓葬出土的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
⑬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⑭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⑮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米。据不完全统计，珠子的色彩斑斓，但每一枚珠子只有一种颜色，其中黑色数量最多，占 31.2%，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 17.9%，黄色不透明的占 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 14.3%，无色透明的占 7.2%，深蓝色透明的占 4.3%，白色不透明的占 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 3.5%，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 1.9%。无色透明和深蓝色珠子的透明度较好，可以看到少量气泡和未熔的杂质。黑色、黄色、砖红色和豇豆红色珠子呈不透明状。通过测定，它们是钠钙玻璃。这类玻璃珠在中原地区不多见，但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遗迹朝鲜半岛南岸都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相当长。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称这类珠子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并认为首先在印度阿里喀满都生产，这个地区是亚洲玻璃器的一个制造中心，兴盛时期从公元前 3 世纪持续到 10 世纪，并且这类玻璃珠及其生产技术沿海岸向东传播。永宁寺西门遗址发现的这批玻璃珠产地目前只能笼统地说是印度玻璃[①]。

这批玻璃珠子的制作方法是将玻璃液以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小珠子。这种方法被称为拉制法。以拉制法制作的珠子的特征为：珠子的基本形态为圆柱形；玻璃中气泡为圆形，气泡长径的方向与穿孔平行；穿孔一般光滑，没有粘结物[②]。

5. 其他

（1）金刚石

南京象山 7 号东晋墓出土 1 件镶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③]。金指环呈扁圆形，素面无纹，直径 2.2 厘米。指环上有方斗状孔，长宽各 4 毫米，内嵌金刚石一粒，作八面体，锥体尖端向外，直径 1 毫米。当时能把非常坚硬的金刚石固定在金环上的束腰形方斗内的焊接方法，是一种特种工艺。金刚石只产于锡兰（今斯里兰卡）、波斯、印度一带。夏鼐先生指出：“金刚石名词在东汉晚期的佛经译文中已经见到。”《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三引《晋起居注》记载：“咸宁三年（277），敦煌上送金刚，……可以切玉，出天竺。”说明金刚石来自印度。《宋书·夷蛮传》记载：“呵罗单国，治阁婆州。元嘉七年（430）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南史·西南夷传》又记：“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 (428)，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由于金刚石极硬，往往用以刻玉。《元中记》云：“金刚出天竺、大秦国，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铁刀削木，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时，当作大金环著手指间，开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内环中，以刻玉。”南京王氏墓出土的金刚石指环，素面无纹，镶在金环上的金刚石稍突出于四方形斗状方孔的平面，很可能是作削玉之用。

当时，南海和西方各国与中国贸易，常先到交趾，然后北上。故南朝各代，和

①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0 年第 1 期。
②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0 年第 1 期。
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苏门答腊及爪哇岛上的诸国，经常遣使往来，并赠送金刚指环、玉盘和各种香料及赤白鹦鹉等礼品。这些文字于史书屡见不鲜，可说明当时金刚石产自印度等地，来自南海，由贸易商人或作为贡品输入中国。

（2）青金石

镶嵌青金石的戒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多次发现。如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中出土1件金戒指，重11.5克，其上镶嵌蓝灰色青金石，并刻一鹿纹，周围绕联珠纹[①]；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1件，戒指呈环状，戒面正中镶嵌一平面圆形蓝灰色青金石，圆形石面上阴雕一人双手举一弧状物，弧圈两端各垂一囊状物。戒指最大外径2.4厘米、内径1.75厘米、青金石戒面直径0.8厘米[②]；固原南郊北周宇文猛墓也曾经出土1件类似的金戒指。在此后的隋唐时期也曾经发现过青金石装饰的戒指或项链。如内蒙古土墨特右旗毕可齐镇发现1枚[③]、宁夏固原唐史诃耽墓出土1枚[④]，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上也镶嵌有青金石[⑤]。

青金石是一种以蓝色为基调的宝石，主要有天蓝、深蓝、浅蓝、绿蓝等颜色，还有一类是在抛光面上出现满布繁星似的金点。它不产于我国，主要产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这些金戒指上的青金石应当是从这一带输入的。

①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②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③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货币》，《考古》1975年第6期。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三章　隋唐五代考古

隋唐五代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阶段，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启宋元，自隋代建立至后周灭亡（581~960），共约38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达，在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秦汉考古一样，隋唐五代考古是历史考古学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阶段，城址、墓葬、佛教遗迹与遗物、陶瓷器、金银器等的研究都比较系统、深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使得隋唐五代时期的遗迹与遗物中，充满异域文化色彩，对它们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考古的一个特色。但也存在严重不足，例如，在考古发掘中重大型墓葬，轻视小型墓葬，使得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而言，局限于对上层社会的研究，而无法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甚至出现某些偏差。在遗物研究中背离考古学基本精神的现象经常发生，如将典型器物与宝物混淆，以挖宝为目的考古发掘大有人在。这是将考古研究庸俗化、降低研究目标的一种表现。夏鼐先生早就指出：脱离实际，脱离历史，将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①]。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应当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城址

一、城址的发现

现已发现的隋唐城址近20处，最重要的是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扬州城遗址。其他隋唐城址主要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它们分别为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古城遗址、唐沙州城和寿昌城（二城皆在甘肃敦煌县）、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唐单于都护府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隋唐胜州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唐天德军城（内蒙古乌

①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拉特前旗阿拉奔乡北古城）、隋大同城（天德军城西南约 2 公里）、唐丰州城（天德军城西南约 30 公里）等。此外，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及实地调查推断，辽宁朝阳即唐营州之所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红柳河上大弯沟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的宥州城。一般的都城、州府城的城墙夯土筑成，最近在江西南昌发现了唐代砖筑的城墙，在江西高安也发现了一段外表包砖的夯筑城墙[①]。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唐代城墙的建筑方式增添了新资料。

二、城址的分类

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都市建设传统，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场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深沟高墙的里坊之内。根据宿白先生的研究，隋唐时期的城址可分两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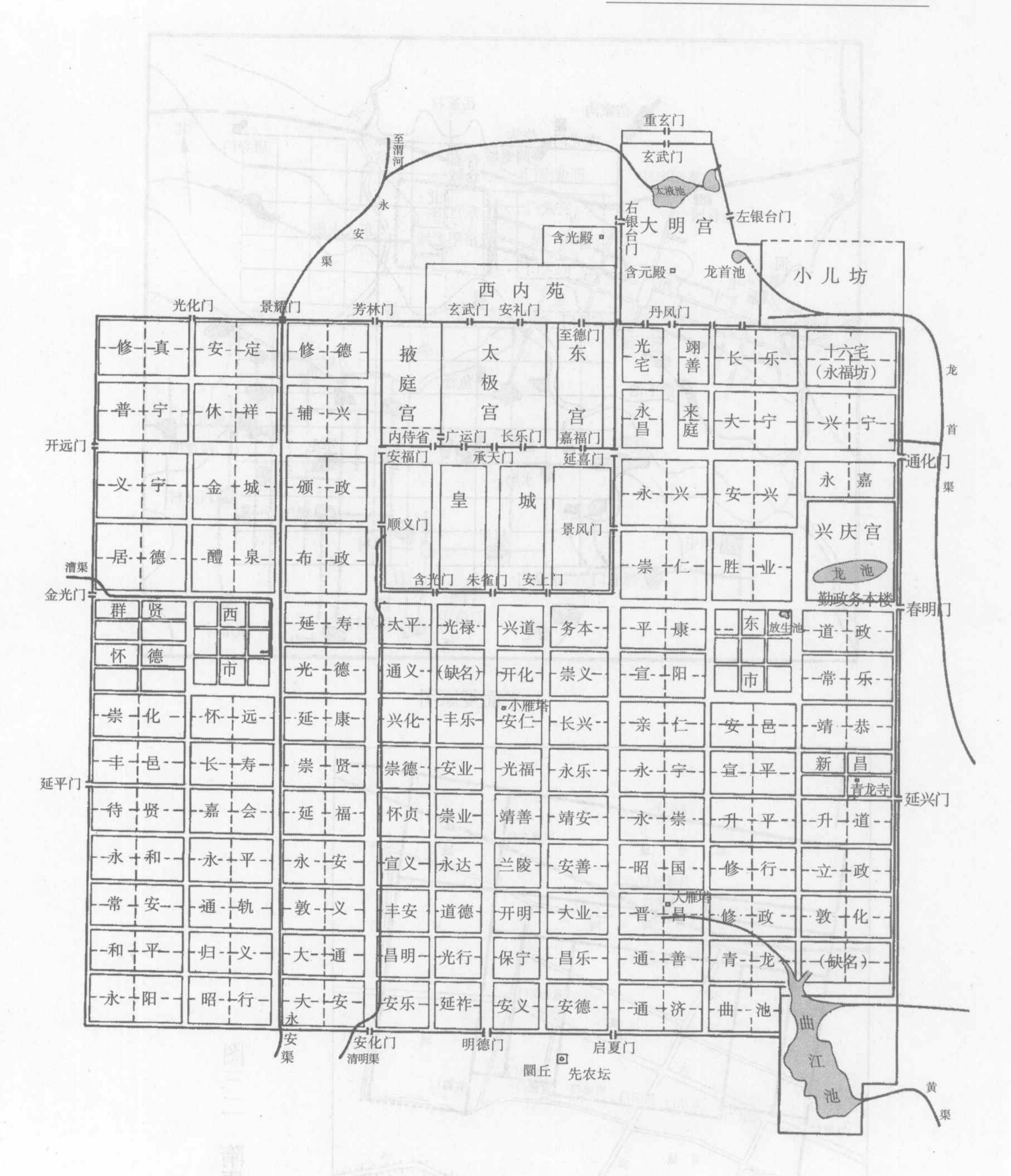
1. 隋唐的都城

都城中又可分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始建于开皇二年（582），初命名大兴。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 36.7 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地面为里坊区，由 11 条南北向的大街和 14 条东西向的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 110 坊及东西两市。其整体设计，显然是以宫城的正南门承天门、皇城的正南门朱雀门、朱雀大街及郭城的正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结构严禁，规划整齐。大兴——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7 世纪以后相继以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该城的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兴——长安城的坊多作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皇城以南及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为东西向横街的“曰”字形布局，其余各坊为十字形布局。十字形布局的各坊，每坊被十字街分成四个区，各区内又设置十字街，整个坊被分为 16 个区块。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市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图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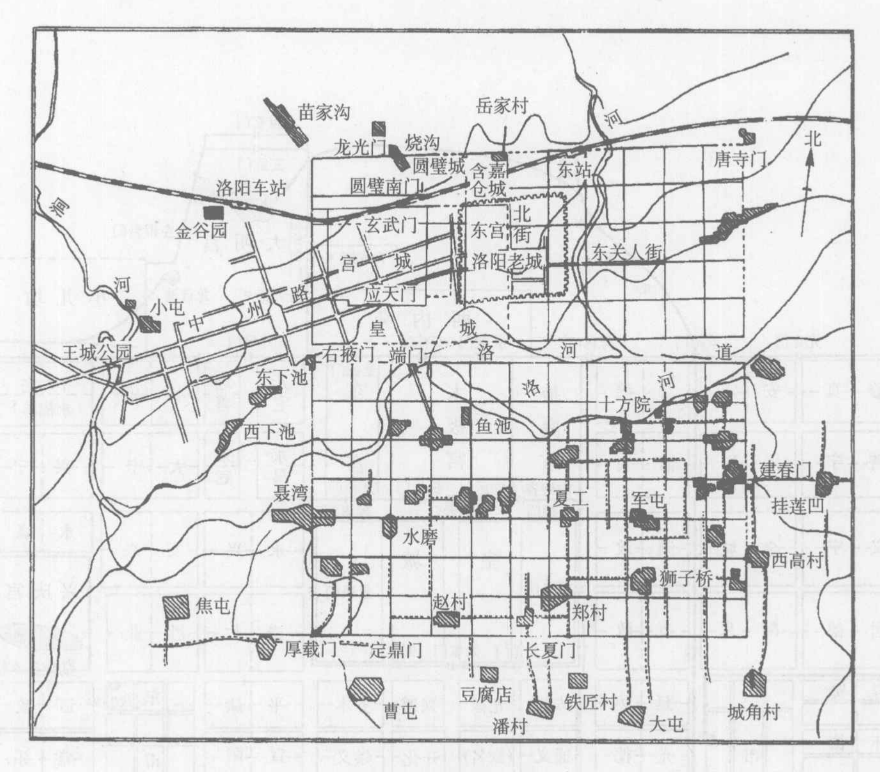
隋唐都城的第二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其地位仅次于大兴——长安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大兴——长安城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 27.5 公里。其宫城、皇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

①彭适凡：《江西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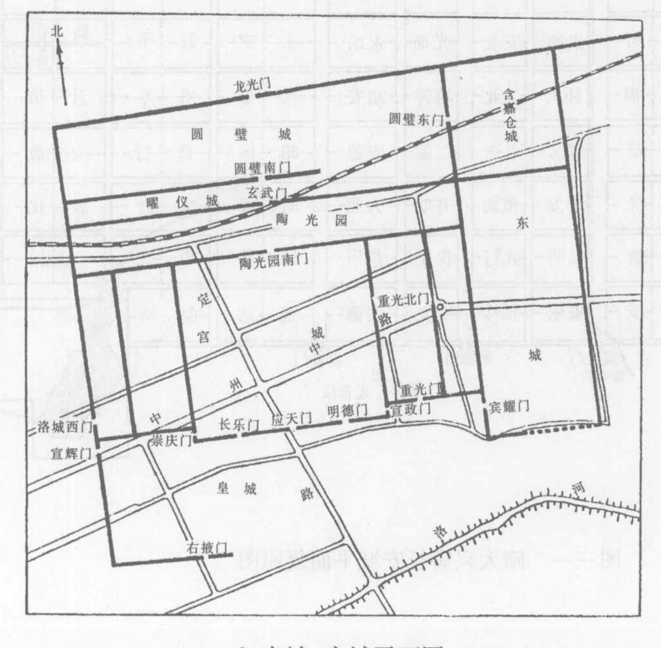
②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纲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图三一 隋大兴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1 平面复原图



2 皇城、宫城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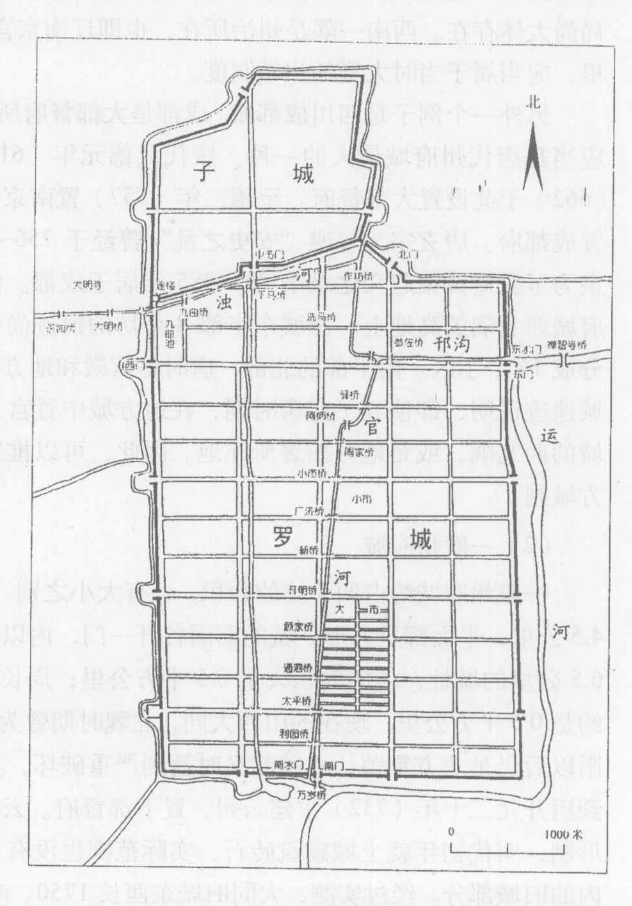
图三二 隋唐洛阳城

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的端门通往郭城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虽也是棋盘式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的位置也不像长安城那样左右对称，而在城东部洛河两岸设南北二市，于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和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宫城、皇城地处全城最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护卫，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小的多，却多设一市，市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的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图三二，1、2）。

隋唐扬州城不属于都城（图三三）。由于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也不同于一般地方城市。江都宫（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罗城西北隅蜀冈上，城市布局和洛阳城有某些相似。扬州是隋唐时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及国际贸易十分发达。重视水路运输，是它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内河道纵横，并与流经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相通。

2. 隋唐的地方城市

隋唐大多数地方城市的布局，都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部署的，不论是较大的州城还是较小的州县都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到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



图三三　扬州城平面示意图

从唐代晚期起，传统的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在已知的隋唐地方城址中，按照其规模大小，又可以划分为大型州府城、一般州府城和小型州府城及县城。这类地方城市的布局基本相同，都以十字街分成四区后，每区又设十字街。

（1）大型州府城

这种城的平面布局呈方形，城内设置十六个坊。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唐代幽州城址即是一例。唐武德七年（624）于幽州设置大都督府，九年（626）改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又改为大都督府。936 年，幽州成为契丹辖地，并于此建立南京，因袭唐幽州城未改变。1150 年，金扩展其东、西、南三面建中都。金中都遗址已经勘察清楚。在金中都范围之内，可以看到两种街道布局，即里坊式和长巷式，后者分布在前者的东、西、南三面，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布局是后来扩展的。唐幽州为十六坊的面积。法源寺所在的坊，由大小十字街道分割成 16 个小区，其布局尚大体存在。西南一隅是州治所在，也即辽南京宫城所在。十六坊周长近 10 公里，应当属于当时大型的州城制度。

另外一个例子是四川成都城。成都是大都督府所在地，其面积相当于 16 个坊，应当是唐代州府城最大的一种。唐代武德元年（618）改蜀郡为益州，龙朔二年（662）于此设置大都督府。至德二年（757）置南京于此，上元元年（760）罢京，置成都府。唐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曾经于 756~757 年居于成都。后来，唐僖宗为了躲避黄巢起义之难于 881~885 年居于成都。他们均以官署为宫，其位置在府城西北隅的高地上。唐城东半部 8 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坊由大小十字街道划分成 16 个小区。西半部的北部，唐时是宫殿和地方衙署所在地。成都旧城内的唐城遗迹说明，即使到了盛唐时期，在地方城中置宫，其方位还沿袭旧制选在所在城的西北隅，或是地方衙署所在地。因此，可以推知在西北隅设置衙署应当是地方城制。

（2）一般州府城

一般州府城约占四个坊的面积，也有大小之别。大的周长 6.5 公里，小的周长 4.5 公里，平面都呈方形。城的四面各开一门，内以十字街道分割成四个坊。周长 6.5 公里的城址，坊的面积大于 0.5 平方公里；周长 4.5 公里的城址，坊的面积大约是 0.5 平方公里。现在的山西大同，北魏时期曾为都城，称为平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仍是北方重镇，六镇起义时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因为战乱而多有废置，直到唐开元二十年（732）重建云州，置下都督府。云州城在辽金时因设西京而未改形制，明代初年就土城砌筑砖石，实际范围也没有大的改变，至今仍为大同市区内的旧城部分。经过实测，大同旧城东西长 1750、南北宽 1810 米，平面基本呈方形。旧城主要街道是十字街，将全城划分为四个区，每区的面积比唐代 0.5 平方公

里的标准坊要大。横街北面西部的区块在明清时期是府衙、总镇署所在地，应当是沿用了前代衙署的旧城。明初在横街北面东部的区内兴建了藩王府。横街以南的两个区内各置十字街道的情况非常清楚，其中东南部又由小十字街道分割成四个小区，还可以进一步在个别小区中看到设有更小的十字街道的情况。整个大同旧城发现了四个层次的十字街道，因此可以推测这是唐代旧城的延续，即云州城遗留下来的街区痕迹。这个现象很重要，它明确地反映了唐代地方城市的规划布局也是采用大小十字街道的区划法。最小的十字街道分割成的小方块，可能就是当时城内的最小居住单位。

另外，在一些州城中，由于皇帝曾经巡幸或作为一时的避难之处，也模仿洛阳城的布局，在西北隅设置宫殿。如196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托克托西南的黄河南岸发现了俗称十二连城的隋唐胜州榆林城址。城址东西宽1165、南北长1039米，周长4387米。城址西北隅设有子城，子城外东、南两面都有接近方形的坊的遗迹。《隋书》卷三记载，大业三年（607）炀帝幸榆林城。《元和郡县志》卷四记载："隋榆林宫在城内，大业二年置，因榆林郡为名，其年炀帝北狩，陈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宫。"从遗迹来看，胜州榆林宫的位置，西北隅的子城应当是唯一的入选之处。隋以后，唐在胜州设置下都督府，子城大约就成了下都督府和州治所在。

（3）小型州府城和县城城址

这种类型的城大约仅有一坊之地。今北京市的顺义县旧城，是唐开元四年（716）建置的顺州城，城址范围一直沿用到明清。顺州只有一个属县即怀柔县，所以顺州城实际上也就是怀柔县城。该城周长2公里，方形，四门十字街道。一坊面积的城也是唐代县城的制度。如河北吴桥县旧城是唐代安陵县城，山西虞乡镇旧城是唐虞乡县城址，陕西临潼唐昭应县城，这些沿袭唐代县城旧址的城，后世虽然有所变动，但都保持了方形、周长2公里余、开四门、内置十字街道的基本布局。

三、都城遗址

（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

隋唐两代的都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隋灭北周以后，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一带营造新都，隋文帝杨坚命宰相高颎等总督其事，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和营造。于开皇二年（582）兴建，开皇三年即迁入新都宫城，定名大兴城。关于大兴城的名称由来，有三种说法：一说隋文帝尝封大兴，故以名（《长安志》）；一说宫之太极殿本大兴村，故因用以名（《两京新记》）；一说隋文帝梦洪水浸没都城，故改营大兴（《资治通鉴》）。大兴城的面积达83.1平方公里，是现存

明清之西安城的7倍。唐建国后仍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仅作了局部修建和扩充。唐长安城的经济、文化，以及对外贸易往来较之隋代大有发展。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末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昭宗迁都洛阳，并令拆长安宫室屋木自渭水浮入黄河运往洛阳。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国都320余年，至此，全部废毁。

隋大兴唐长安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长安城的形制，不但是中国中世纪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邻近国家都城的形制。因此对长安城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早在盛唐时期的韦述即著有《两京新记》，将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作了较详的叙述。其后北宋宋敏求所著《长安志》中，又作了补充和研究。北宋吕大防作图刻石以期永垂后世。此图仅残存一部分，是至今保存的隋大兴唐长安城最古老的地图，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南宋的程大昌、赵彦卫等所著的《雍录》和《云麓漫钞》，对长安城也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元代李好文作有《长安志图》。清代学者徐松对长安城作了大量考证研究，著有《唐两京城坊考》。作为大唐帝国都城长安，对当时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都城建设极有影响，渤海上京龙泉府城的规划，即仿效长安设计。邻国，特别是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不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长安，而且如太极殿、朱雀门、朱雀街等宫殿、门和街道的名称也是袭用长安城的。因此，日本学者也关心长安城的研究。20世纪初，日本人足立喜六曾对长安城进行了研究，著有《长安史迹考》。1949年以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75年对城址进行了初步勘探；1957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大兴唐长安城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局部发掘。从而对城址的布局、坊市的形制、宫殿的分布及其建筑基部的结构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通过勘察所得的有关都城布局上的许多关键性的数值，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基础。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1. 外郭城

又名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城墙遗迹保存在地面上的仅北城玄武门附近和南城安化门处尚各有一小段，残高仅1~2米。其余则仅存城基部分。城墙全用夯土版筑，仅在城门处内外表面砌砖壁。墙宽一般在12米左右，有的仅存3~5米。据记载，外郭城高一丈八尺（约5米多）。城墙外侧有与城墙平行的城壕。

外郭城每面3个门，除北面的芳林门（隋称华林门）、景耀门、光化门和西边

的开远门已被现代建筑所压或破坏外，其他各门址均已探查清楚。城门的形制除明德门是五门道外，其余各门都是三门道。明德门是南面正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位于长安城的中轴线上，规模宏大壮观。经发掘实测，门址东西长 55.5、南北进深 17.5 米。门墩为版筑夯土，表面砌砖壁。门道宽均 5 米。

2. 宫城

南连皇城，北接禁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492.1、东西宽 2820.3 米，周长 8.6 公里多。宫城南面正门隋名广阳门，唐改为承天门，北面为玄武门。承天门遗址东西残长 41.7、进深 19 米，三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这是其他门址所未有的设置。宫城的中部为太极宫（隋名大兴宫），正殿名太极殿（隋称大兴殿），是皇帝的正衙，位于宫殿区的南部，与承天门南北相对。宫城东部为太子居住的“东宫”。据记载东宫分中、西、东三部分，依此复原东宫宽度应是 830 余米。宫城西部是掖庭宫，为宫女居处，东西宽 702.5 米。据记载掖庭宫之北有太仓，南有内寺省。

3. 皇城

亦名子城，位于宫城之南，北与宫城相接，中隔横街，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的东西两墙相接。平面亦为规整的长方形，南北长 1843.6 米，东西宽与宫城同，周长 9.2 公里。皇城南面三门，西面二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门。东面两门虽未探得，但据西城二门的位置可以确定。皇城内的街道除北面横街之外，只探得安上门内的南北大街，街宽 94 米，两侧均有 3 米宽的排水沟。据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 7 条，南北向街道 5 条，“皆广百步”。各街之间设置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

4. 街道

外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 11 条，东西向大街 14 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及东西六门的 6 条街道，是主干大街。6 条街除南面通延兴门和延平门的东西大街宽 55 米外，其余 5 条街宽皆百米以上，特别是明德门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宽 150~155 米，是现今北京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宽的 2 倍，这样宏伟的大街在古今世界都城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他不通城门的各街宽在 35~65 米之间；顺城街宽为 20~25 米。各街路面皆起拱，两侧建有宽 2.5 米左右的排水沟，仅朱雀大街两侧沟宽 3.3、深 2.1 米。

5. 坊

是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述南北 11 条和东西 14 条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城内划为 110 个坊，其中城东南隅 1 坊被划入芙蓉园内。各坊面积不一，朱雀大街两侧的 4 列坊最小，南北长 500~590、东西宽 550~700 米；在上述 4 列坊之外至

顺城街的6列坊，南北长同前，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的6列坊最大，南北长660~838、东西宽1020~1125米。坊四周都筑有坊墙，墙基宽2.5~3米，除朱雀大街两侧的4列坊只开东西两门设东西向的一条横街外其余均是四面开门，中设十字街，街宽皆15米左右。十字街将一坊划为4个区，据在永宁坊东部的发掘所知，在坊的东北一区内还设十字形小巷，巷道残宽近3米。可能每个区都有十字形巷，则一坊即为16个区，出入交通比较方便。这些坊内分布着居民住宅、官衙、寺观等。坊门早开晚闭，并设兵看守，宵禁后禁止开门出入，以便于控制和管理。

6. 佛寺和道观

几乎遍布长安各坊。如西南隅的总持寺和庄严寺各占一坊之地，朱雀街左右的兴善寺和玄都观分别占靖善坊和崇业坊的全坊，其建筑均极豪华、壮丽。慈恩寺占进昌坊的一半，有十余个院，房屋多达1987间，僧人有300之多。慈恩寺著名的大雁塔，至今犹为游览胜地。荐福寺占开化、安仁两坊之地，寺在路北的开化坊内，塔在路南的安仁坊内，当时称为别院，即今之小雁塔。著名的密宗道场青龙寺，在东城延兴门里街北的新昌坊内，有塔、殿等遗址多座。

7. 东市、西市

是长安城两个商业区。东市，隋称都会市；西市，隋称利人市。经过勘察、发掘，已究明其形制和布局，平面均呈长方形，四周有版筑夯土墙，每个市的面积两坊之地。西市的范围，实测南北长1031、东西宽927米。市的北、东两面围墙的基址宽4米许。围墙内有沿墙街道，宽皆14米。市内有宽16米的南北和东西向平行街道各两条，各街两端开门。4条街交叉呈井字形，将市内划分为9个区，每区都四面临街，店铺临街而设。已发掘的店铺面阔4~10米不等。可证当时的商业相当繁荣，所以西市素有“金市”之称。

东市的形制与西市相同，实测其范围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大小几与西市相等。部分围墙基址宽6~8米。街道经勘探仅发现西街的北部和南街的西部各一段，街宽近30米，较西市宽近一倍。市东北隅有不规则椭圆形池址一处，东西直径180余米，南北160米。池周岸经夯筑，据发掘所知，池深3~6米。此池东南80余米处，尚有一较小的椭圆形池址，两池之间有渠道相连。大池的引水渠道在该池的东北隅，渠道的方向与兴庆宫“龙池”的西南部对照，池水有可能是由龙池引入。这一池址，是当时文献记载中的东市“放生池”。长安城内的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但在各坊中亦有分散的小饮食业、邸店和手工业作坊等。

8. 大明宫

在太极宫东北面禁苑内的龙首原高地上。始建于太宗贞观八年（634）。高宗龙朔二年（662）又经扩建，次年迁入大明宫听政，终于取代了太极宫，成为唐代主要宫廷。

9. 兴庆宫

在外郭东城春明门内街北。开元二年（714），因兴庆坊是（旧称隆庆坊）玄宗的藩邸置为宫，十四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十六年竣工，玄宗即常在此听政。天宝十三年（754）又筑兴庆宫城，并起城楼。兴庆宫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250、东西宽 1075 米，周长 4.6 公里多。宫城四面设门，正门兴庆门在西城偏北部。宫城内南部有东西长 915、南北宽 214 米的水池，名龙池。龙池以北为宫殿区，南为皇帝宴游之园林区。著名的勤政务本楼与花萼相辉楼即在宫城的西南隅。勤政务本楼东西长 26.5、南北宽 19 米，面阔 5 间，进深 3 间。在发掘中出有琉璃瓦及大量莲花纹方砖等，表明其建筑相当豪华壮丽。

唐玄宗时期除修建兴庆宫外，还先后于兴庆宫东侧附外郭东墙建筑了一道北至大明宫、南至芙蓉园曲江池的夹城作为复道，以便皇帝往来潜行，夹城遗址已勘察和发掘。

10. 渠水

通长安城内的主要渠水有 4 条。隋建大兴城时，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 3 条渠，分别从城东和城南引浐水、潏（泬）水、洨水入城，以解决宫苑环境等用水。三渠的部分渠道已探查清楚。龙首渠从东南引浐水北流，分为 2 支，南支至通化门北侧入城，然后南折入兴庆宫入龙池；北支至郭城东北隅西折入禁苑，注入大明宫东内苑北部之龙首池。清明渠从城南引潏水由安化门西侧进城，经大安坊东折，沿安化门大街东侧北流，至太平坊断缺。据记载，此渠经过皇城进入宫城内注为三海（南、西、北三海）。永安渠引洨水从安化门以西 1000 米处进城，其断续的遗迹沿大安坊之西的南北大街东侧向北，经过西市以东至北城门东侧入禁苑。出城后偏向东北行，渠宽 10 多米，至大白杨村东北分为 2 支，一支北去渭河，一支向东从九仙门以北 130 米处进入大明宫，然后向东南注为太液池。在太液池东端引出一渠东出大明宫东墙偏向东北行，可能是流向鱼藻宫内。唐天宝元年（742）又于西城开了一条漕渠，引潏水自金光门北侧入城，然后南折过金光门大街再东折，至西市东北隅又沿市之东墙向南，至西市南街东端北侧入市。在西市内的一段长 140、宽 34、深 6 米。

11. 芙蓉园、曲江池

芙蓉园位于外郭城东南隅，地势高亢，向南起伏延伸形成丘陵地带，因筑城不便，隔于城外。经勘察，知芙蓉园周围有墙，其东墙北端接外郭城东墙，向南 1000 余米又西折 400 米而断缺。西墙在曲江池西侧的山脊处发现有南北长 80 余米的一段，向北与外郭城南墙北折处相对照。未发现南墙遗迹。据文献记载，在曲江池南建有紫云楼及彩霞亭等，可知芙蓉园的南面肯定也有围墙。据实测，芙蓉园东西广 1400 余米，南北长约 2000 多米，周长约 7 公里。芙蓉园本是秦汉之宜

春苑，隋建新都名芙蓉园，并建有离宫。

曲江池隋名芙蓉池，位于芙蓉园的西部，处于东西二丘陵之间的峡谷中。南北狭长，两岸屈曲极不规整，池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最宽处600余米，周长约4公里多。池底最深处距现在地表6米多。曲江池引水渠道有两条，分别在池的南北两端的东侧，引黄渠之水入曲江池。

综上所述，隋大兴、唐长安城在总体设计上，是按照中轴对称的原则规划出来的。加上结构严谨、区划整齐，显然是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布局的发展和完善。但在宫城南面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是从隋筑大兴城开始的。这一变化，将宫城与其他区域隔离，从而加强了宫城的防卫。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还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的条件，如都城的东部有所谓“六坡”的岗阜高地横贯城内，为了达到控制各坊的政治目的，在这些高地上布置官衙、王府、寺院和道观等建筑，除起到了监督作用外，并增强了城市的立体感。此外，风景区芙蓉园、曲江池也与都城结合为一体，不仅美化了城市，而且也提供了游览之所，为古代城市规划一大创举。

（二）隋唐洛阳城

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其近郊。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诏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于洛阳营建东京，次年春正月建成。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东逾瀍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其规模仅次于大兴城，但平面布局和形制则是隋唐都城的另一种形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4年对隋唐洛阳城进行了勘察；1959年，又着重勘察了宫城、皇城和周围诸小城的平面布局；1960~1965年，继续勘察了街道、里坊及市场位置，同时对宫城遗址进行了发掘。1982~1986年[①]及1988年[②]，先后对洛阳城乾元门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1989~1993年，又对上阳宫园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水池、廊坊、水榭、石子路、假山及水渠等遗迹[③]。1992~1993年，对位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进行了发掘[④]。1997年1月，对郭城东面最南的永通门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⑤]。

通过调查得知，隋唐洛阳城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其中宫城、皇城在郭城的西北角，宫城在皇城之北，宫城北面有曜仪城、圆壁城前后重叠，又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上阳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等：《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东面有东城，其北有含嘉仓。郭城东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为里坊区。其宫城、皇城选择在郭城的西北地势高亢之处，其注意安全防御的色彩远甚于大兴城。严格的里坊规划，强化了对城内市民的控制。城内三市的位置都依傍河渠而设置，比大兴城更多地考虑了商业的繁荣。

1. 外郭城

外郭城的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城墙基址宽 15~20 米。整个城址南宽北窄，形状略近方形，但南北两城墙偏向东北，东城墙偏向西北，西城墙洛水以南部分向外凸出，是沿洛水的弯曲地势兴建的。经过实测，东墙长约 7312、南墙长约 7290、西墙长约 6776、北墙长约 6138 米，东西城墙下发现有石板铺砌的下水道。1981 年，对一段西墙的发掘，墙体宽 8.7、残高 1.6 米。墙基部有宽 9.8、深 1.7 米的基槽。墙体两侧用砖包砌，墙外加筑有河卵石散水及 1.8 米宽的砖道，并开挖有一条宽 13、深 2.5 米的护城壕，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城防体系。

全城共设置 8 座城门，东、南两面各 3 座，北面 2 座，西面无门。东面 3 座自北而南依次为上东门（隋曰上春门）、建春门（隋曰建阳门）、永通门。南面 3 座自东而西依次为长夏门、定鼎门（隋曰建国门）、厚载门（隋曰白虎门）。北面 2 座自东向西依次为安喜门（隋曰喜宁门）、徽安门。经过勘察或发掘的城门遗址有定鼎门、厚载门、建春门、永通门等，这些城门均为三门道。其中定鼎门是外郭城南面的中门，也即洛阳城的正门，门址宽 28 米，左右两门道各宽 7 米，中间门道宽 8 米，门道之间的两道隔墙各宽 3 米。长夏门位于定鼎门以东 2255 米处，门址宽约 30.5、进深 18.5 米，三门道均宽 7.5 米，门道之间的两堵隔墙均宽 4 米。厚载门位于定鼎门以西 1060 米，门道均宽 5.45 米。建春门为外郭城东面的中门，门址宽 21 米，三门道均宽 5 米，门道之间的两堵隔墙均宽 3 米。郭城东墙南面的永通门遗址则经过了发掘，门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 21.75、东西残长 13 米。共有 3 个门道。南门道南北宽 4.8、东西残长 12 米。门道内发掘出柱础石、排叉柱遗迹、门砧石、门限石、车辙等。柱础石位于门道南北两侧，平面呈长方形，直接安置在门道底部纯净的黄色夯土上。每块柱础的中部，均凿有 1 个长方形榫窝，其东西长 18~22、南北宽 10.5~12、深 10 厘米。中门道形制基本同于南门道，南北宽 4.95、东西残长 6.1 米。门道内清理出柱础石、门砧石、立颊、将军石、门限石、排叉柱遗迹等。门限石长 1.25~1.45、宽 0.65、厚 0.3 米。

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在洛河以南有南北向街道 12 条，东西向街道 6 条。在洛河以北勘察出南北向街道 4 条，东西向街道 3 条。街道两旁均有排水沟遗迹。其中定鼎门大街是郭城中的主干大街，又称天门街，现存的宽度还有 121 米。城市居民的住宅区，隋曰“里”，唐改称“坊”。《唐六典》及《旧唐书·地理志》均记载：洛阳东都城内“凡一百三坊”，由郭内的纵横街道所构成。目前已经勘察出 64 坊，其中洛河以南 55 坊，洛河以北 9 坊。其余一部

分为现在的洛阳城所叠压，另一部分则被洛河冲刷而无存。坊的平面呈正方形或近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周围有坊墙，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置十字街。如经过考古勘探的明教坊，南临外郭城南城墙，西临定鼎门大街，北为宜人坊，东为乐和坊，现存北坊墙的西段240米及西坊墙北段114米。坊墙系夯筑而成，残宽1.4~2米。坊中有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一条，在坊内十字相交。东西向街长500、宽14米；南北向街残长340米（原长530米），宽也为14米。坊内东西街和南北街均与坊外的大街相通，4个坊门开在四面坊墙的中部。

《唐六典》及《旧唐书·地理志》均记载：洛阳城内"三市居中"，即隋丰都市（唐曰南市）、隋通远市（唐曰北市，迁至临德坊）、隋大同市（唐曰西市，迁至固本坊）。北市在洛河以北，占一坊之地，依傍漕渠，据《元河南县志》卷四记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在洛阳龙门石窟也有北市商人凿龛题记的遗迹，如"北市香行社"、"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丝行琢凿"等。由此可见，北市工商业繁荣之一斑。西市、南市在洛河以南，其中以南市规模最大，占两坊之地，市内有纵横街道各3条，四面各开3门。据《元河南县志》卷一记载："其（南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西市占一坊之地。由于洛河冲刷，两市遗迹已经荡然无存。

1992年10月~1993年5月，对位于城东南部永通门内履道坊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居进行了发掘。根据白居易《池上篇》并序中的详细描述：其故居位于履道坊的西北隅，"地方十七亩，屋宇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被改为普明禅院，北宋时称大字寺园，在唐宋两代都是著名的园林。发掘的面积达7000平方米，出土了生活用具、文房用具以及建筑构件等2000余件文物，发现了中庭和东西厢房遗址。中庭平面呈方形，东西宽5.5、南北长5.8米，东西两端通过回廊往北与东西厢房相连，回廊各长1.52、宽3.2米。厢房东西相对，各长约8.9、残宽4米。东西厢房往北各连一段回廊，再往北遗迹中断，推测这两段回廊可能与上房相接。中庭南侧散水往南12.6米处有门庭遗址，东西长5.9、南北宽1.45米。由此可推测白居易故居为南有门庭，北有上房，是一座含有前后庭院的两进式院落。出土的经幢上刻有"唐大和九年"及"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内容，证明了白居易晚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还在院落的南面探出大片的池沼淤积土，并发现通过一条小渠道与西侧的伊水渠相通，可能为白居易诗中的南园遗迹①。

2. 宫城

在郭城的西北隅，南北略短，东西稍宽，东北角向南内凹，南面中段向外凸出。城垣夯筑，内外砌砖。东墙长约1275、南墙长约1710、西墙长约1270、北墙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长约 1400 米，一般宽度在 15~16 米。南面正中的应天门（隋曰则天门，因避武则天讳而改称），东西两侧有向外凸出的对称的两堵夯墙，相距 83 米，各宽 17.5 米，这就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左右连阙"。应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曰兴教门）、西边的长乐门（隋曰光政门），以及北面的玄武门、西面的嘉豫门等均已经勘察出来。东宫在宫城东南隅，自为一城，东西 330、南北约 1000 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西北部有九州岛池。在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北向南有大片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殿的殿址。考古调查中，在宫城西部陆续发掘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殿、亭遗址。在宫城的西南角发现了夹城城墙，夯土筑成，长 180 米，夯层一般厚约 16~18 厘米，质量较宫城城墙的夯土差，土色为纯黄色，夹城西端与外郭城相接[①]。

九州岛池是洛阳宫城内的一座宫廷花园。据《两京新记》卷三记载："其池屈曲，象东海之九州岛。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九州岛池遗址位于宫城的西北部、陶光园南 250 米处，东西长约 205、南北宽约 130 米。在池北东西两侧各有 1 条宽 5 米的渠道向北延伸，南面东南角也有 1 条渠道遗迹，可能是九州岛池的进水或出水口。在现有的九州岛池范围之内，已经探明 5 座小岛，均为生土台基，岛呈椭圆形或近圆形，并在其中的 3 座岛上分别发现亭台建筑遗址各 1 处[②]。在九州岛池的周围还陆续发现过不少建筑基址，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池的东南部清理亭式建筑和廊坊遗址各 1 处。其中亭式建筑呈八角形，直径为 13.2 米；廊坊遗址共 7 间，每间东西长 4.43、南北宽 3.4 米。1982 年，在池的东侧清理殿亭基址和亭式建筑各 1 处，殿亭基址呈方形，坐北朝南，残存部分南北长为 10.5、东西宽 7.6 米；亭式建筑略呈方形，南北长 8.23、东西宽 7.5 米，四角保存有石柱础或柱础石坑。1987 年，在池的西南部发掘 1 处廊坊基址，廊坊建筑呈东西向，南北并列，其间以甬道相连。在两座廊坊的东端，还发现两条并列的砖砌下水道，从东北方向进入九州岛池。

3. 皇城

位于郭城的西北隅，围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东西两侧与宫城之间形成夹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六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由于洛水北移，皇城东南部已被冲毁，仅西墙保存较好，长约 1670 米，南墙仅存约 540 米，东墙北段尚存 1115 米。皇城城墙为夯筑，内外砌砖，宽约 14~16 米。唐时又在夹城南端添筑了南墙，宽约 9 米多。

《唐六典》卷七记载：皇城南面三门，中为端门，左为左掖门，右为右掖门。东面一门，即宾耀门。西面二门，南为丽景门，北为宣耀门。其中皇城的正门端门和左掖门遗址已不存在。右掖门遗址经过发掘，是洛阳城内保存比较好的一座

①洛阳博物馆：《洛阳发现隋唐城夹城城墙》，《考古》1983 年第 11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东都城 1982 ~ 1986 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 年第 3 期。

城门。门址宽24、进深17.5米，三门道，门道均宽6米。门道之间的两堵隔墙也各宽3米，城门残高2.15米。门道两侧采用砖壁夹柱的结构，每侧用13根立柱起架，立架上架过梁，其上建筑门楼。木制门扉设在门道中央，向内开启，门上有门钉和圆泡形门饰，残高3.75、宽1.75米。门道两侧壁面经粉饰。在最中间的柱础石上，有结构完整的门框石、门砧石，门限下面平铺石板3方，在右门道内的石板上留有清晰的车辙痕迹，宽1.25米，印证了当时“左入右出”的制度。

近年来，对皇城内的隋子罗仓进行了勘察，发现了一排4座仓窖，并对其中的2座进行了发掘[①]。据《大业杂记》记载，在皇城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窖，窖别受八千石。”通过发掘证明，子罗仓的粮窖形制和含嘉仓基本相同。其建筑程序是：先挖一个口大底小的椭圆形土窖，窖底用黄土夯打，夯土上覆有5层防潮层，由上而下为木板层、蒲草层、木板层、锯末碎木混合层、蒲席层。与含嘉仓的不同的是，子罗窖壁上的木板是固定在墙壁上的，并在窖底中心部位发现一竖穴柱洞。推测子罗仓粮窖是在窖底中心部位立柱，以支撑用圆木搭成的伞形顶架，顶架上铺草席和草束，表面涂抹草拌泥，以防雨隔潮。

4. 宫城、皇城周围的小城

曜仪城和圆璧城。曜仪城在宫城之北，平面呈狭长形，东西长约2100、南北宽约120米。圆璧城在曜仪城之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110、东端宽590、西端宽460米。曜仪城北面的圆璧南门，圆璧城北面的龙光门，均为单门道建筑。

东城及含嘉仓城。东城在皇城之东，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270、东西宽约620米。东城之北有含嘉仓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615、南北约725米。1971年对含嘉仓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其城墙为夯筑而成，残存城墙的宽度约17米，每层夯土的厚度约为6~8厘米。仓城之内粮窖分布密集，东西排列成行，行距一般为6~8米，部分行距仅3米左右，也有个别行距宽达15米左右。粮窖之间的距离一般在3~5米，也有个别不足2米。历年来共发掘粮窖19个，其形制一般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仓口直径8~16米，最大者18米；底部直径4~12、深5~7米，最深者11.7米。在已经发掘的160号仓窖中还保留有大半窖已经炭化的谷子，推测该窖当年储存的谷子约在50万斤左右。通过发掘和解剖，可知仓窖的建筑程序是：第一步是挖土窖，并将窖壁和窖底修整光滑；第二步是对窖底进行防潮处理，其处理程序为：一是加固夯实；二是进行火烧；三是铺设红烧土碎块和黑灰等拌成的混合物。然后，在其上铺设木板和草。粮窖周壁都镶有木板，木板作横向排列，可能是便于随着储存粮食的增加而逐渐增高。粮食储存

①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都皇城内仓窖遗址》，《考古》1981年第4期。

完毕之后，有的在上面铺席子，席子上堆糠草、土予以封闭。有的则在上面用木架、席子、草拌泥等构成伞形顶架，以覆盖粮窖①。这种粮窖结构合理，简单坚固，具有较强的防潮和防火性能。它既体现了我国地下储粮的优良传统，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创造力。在粮窖之内出土了许多铁制生产工具以及带字的铭砖 30 余块，铭砖上的文字多为阴刻，也有少数为墨书。这些铭砖详细地记录了每个粮窖的位置、储粮的来源、品种、数量以及入库时间、经手人等，是入仓时的原始记录凭证。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凿窖置屋，皆铭砖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粟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铭。"考古发现的实物和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可以看出当时对粮仓的管理有严密的措施。根据砖铭记载，粮食入仓时间是在武则天天授、长寿、圣历年间。粮食中有江南的租米和华北的租粟，分别来自苏州、楚州、滁州、邢州、冀州、德州、魏州、沧州等地，大多数是经过漕运进入洛阳的。

东西隔城。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还有长方形的小城址各 1 座。因为与宫城和皇城相隔离而被称为隔城。东隔城南北宽约 275、东西长约 520 米。西隔城南北长约 275、东西宽约 180 米。在西墙正中稍偏北，发现门址 1 座，为单门道结构，宽约 10 米。

5. 明堂遗址的发掘

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在洛阳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处的东北角，发现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②。殿基用红褐色土夯筑而成，平面呈八边形，在中心位置发现一圆形大柱坑，坑口直径 9.8、坑底直径 6.16、深达 4.06 米。坑底有 4 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石础，柱础上刻有细线两周，中心处有一方形柱槽。该殿基遗址的位置、形制和建筑特点，与文献记载的明堂相符合。

明堂初为隋之乾阳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之乱，焚乾阳殿。高宗麟德二年（665）依旧址造乾元殿。武则天垂拱四年（688）毁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撑、欂，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武则天执政时期，曾经在此宴飨群臣，接受朝贺，发布政令。又于明堂北造天堂，以贮佛像。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火烧天堂延及明堂。复命更造明堂、天堂。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新明堂成，号曰"通天宫"。玄宗开元五年（717）幸东都，更明堂为

①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 年第 3 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含嘉仓 1988 年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3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3 期；王岩：《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的几个问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乾元殿。开元十年，复以乾元殿为明堂。开元二十七年，毁明堂上层，改修下层为新殿。开元二十八年，佛光寺起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

从考古发现的遗迹来看，文献记载的明堂建于乾元殿旧址，在应天门内，即宫城的中轴线上。距离应天门为 200 步或 205 步，折合 294 米或 301 米。由应天门遗址至发现的遗迹实测距离为 450 米，且恰在中轴线上。同时考虑到由应天门至乾元殿，中间尚隔有永泰门和乾元门，二门也应当占一定的距离。因此，实际距离与文献的记载比较接近。另外，从基址中心的大型柱坑来看，底部巨大的柱石应当是明堂所立中心柱的位置。

6. 圆形建筑基址

1977~1979 年，在洛阳定鼎北路和唐宫东路交叉口的东侧，南距明堂遗址约百余米，东距宫城中轴线约 50 余米之处，发现一建筑遗址。遗址为一圆形高台式建筑，夯土筑成，直径 65.8、残高 1.2 米。台基周围残存有宽 4、深 0.5 米的包边基槽，推测其基座是用青石包砌。台基上面中部有一大型柱洞，口径 14.8、底径 13.8、深 2.5 米。柱洞周壁全用特制的大型青石块修砌，石缝整齐严密，中部有一周二层台，宽 0.5 米。柱洞底部用夯土夯成一个正方形凹面，边长 4、深 0.1 米。凹面内是用 3 块条石组成的方形柱础石，在其中心挖有一直径 0.32、深 0.3 米的榫洞，柱础石表面以榫洞为中心阴刻直径 0.89 米的圆圈，可知其上原来立有直径 0.89 米的木柱。围绕柱洞的夯土台上，还排列有内外两圈柱础石。在大型柱洞外 6 米处，排列内圈柱础石，一周为 15 个。在内圈柱础石外 9 米，排列外圈柱础石，一周为 23 个，每个柱础石的间距为 4 米。柱础石均由上下两层共 8 块青石组成，其间铺垫厚 4~6 厘米的沙子，应是为了减缓上面建筑物的震动而采取的措施。在对该遗址发掘过程中，在柱洞底部发现木炭和壁画痕迹，还出土 1 件鎏金造像，其上刻有“维大唐神龙元年岁次己巳四月庚戌朔八日丁巳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用此功德滋（资）助皇帝皇后圣化无穷，永究（久）供养”。很可能是一个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①]。

7. 上阳宫

上阳宫位于禁苑之东、皇城的西南隅。唐上元中，由司农卿韦弘机修建。其方圆一里余，正殿为观风殿，正门为提象门，皆向东。另有仙居殿、麟趾殿及亭廊、水榭等，其内广植花木，宛若仙境。高宗及武则天曾经在此听政，后中宗复位，迁武则天于上阳宫，死于仙居殿。唐玄宗等也常居于此宫，德宗以后，或因洛水泛滥，上阳宫被废弃。1989~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上阳宫园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水池、廊房、水榭、石子路、假山等遗迹，以及砖、瓦、鸱尾、垂兽、螭首等建筑构件[②]。该遗址位于皇城南墙以南 40 米，东距右掖门约

①方孝廉:《四十年来洛阳隋唐以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2 期；姜波:《唐东都上阳宫考》,《考古》1998 年第 2 期。

250 米。东部有一水池，东西残长 53、南北 3~5、深 1.5 米左右。地势西高东低，入水口在西侧，用青石铺砌而成。池底经过夯筑，上铺河卵石。池岸用太湖石层层垒砌，高低错落，犬牙相间。池中西部有水榭遗迹，岸边发现有廊坊、石子路及假山遗迹。位于水池西北岸的假山以青石堆砌而成，底座近圆形，直径 2、残高 1 米。园林西部发现一段南北向水渠遗迹，宽 1419 米，向南通向古洛水。出土的遗物有专、瓦、垂兽、鸱尾、螭首及铜饰件等建筑构件，许多陶质构件为黄、绿琉璃制品。此遗迹应当是上阳宫内的园林遗迹，可见上阳宫的确华美无比。

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知洛阳城在城市规划方面与长安有显著的不同之处：皇城和宫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位于郭城的西北隅，这样的规划是为了与长安城有所区别，以表明洛阳城下京城一等；宫城除南置皇城外，北建重城，西邻禁苑，东接东城。皇城、宫城本身又都内外砌砖。皇城之南并界以洛河。其戒备坚固严密，又远在京师之上；里坊面积缩小，这是北魏洛阳城旧坊制的恢复。此外，挟洛河而建、漕运便利也应是重要特征之一[①]。洛阳城的这些布局特点，充分反映了它在唐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 年。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 6 期。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 年第 6 期。

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年。

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 年第 4 期。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 年第 3 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 年第 8 期。

洛阳博物馆：《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1 年第 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 年第 1 期。

---

①关于洛水贯都的做法，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从隋唐三百年间的实际效果来看，使洛水贯都并非成功之举。首先，洛水不断泛滥，造成严重破坏。《唐会要》记载，永淳二年（682），“洛水溢，坏天津桥，损居人千余家”。如意元年（692），“洛水溢，损居人五千余家”。神龙元年（705），“洛水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溺死者数百人”。开元八年（720），“东都穀、洛、瀍三水溢，损居人九百六十一家，溺死者八百五十一人”。开元十四年（726），“瀍水暴涨，入洛，损诸舟租船数百艘”。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水患已经成为东都洛阳的最大灾难。第二，东都洛阳被洛水分为南北两部分，洛水出入之处成为最大的缺口，枯水期无限可守。隋末杨玄感、李密攻东都，都舍洛南而直攻洛北。隋末唐初与王世充的战争中，唐军占西苑，王世充放弃洛南和洛北坊市，只守宫城和皇城，以皇城南面洛水北岸为主战场。安史之乱时，叛军也置洛南不顾，自东面攻入洛北区，西攻上阳宫戏园，孤立的皇城宫城也不能收。巨大的洛南区由于洛水阻隔，对保卫洛北区基本不起作用。所以，不论从城市生活还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看，让一条不能控制的河流穿城而过，实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参阅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陵墓

一、帝陵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则天母杨氏的顺陵具已进行过反复的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昇墓和李璟墓、广州的南汉王刘晟墓和杭州的吴越王钱氏墓也都进行了发掘。

（一）隋代帝陵

有隋一代（582~618），先后有两位皇帝登基执政，即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隋书·后妃列传》记载："文献独孤皇后仁寿二年八月葬于泰陵。"《隋书·高祖本纪下》记载，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四年（604）秋七月死于仁寿宫，同年十月与皇后独孤氏合葬于太陵（也作泰陵），"同坟而异穴"。据《扶风县志》记载："隋文帝泰陵，在县东南四十五里三畤原上，地九顷余，城垣遗址尚存，殿、庭、门、库久废，历代碑碏折，镌诸朝绅像犹有存者，今并亡矣。"

据调查，泰陵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东南的五泉乡王上村（今属杨陵区）旁。陵台位于陵园中部偏南，封土为陵，陵台现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南北宽38米；底部现残存东西长166、南北宽160米。陵垣大部分已毁，唯北面尚有残垣存在，残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最宽处5.5米，夯筑而成，夯层厚约10~12厘米。经过钻探，陵垣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756、南北宽652米，每面陵垣中部和四角都发现有大量的残砖断瓦，说明应当有门阙和阙楼之类的建筑。在陵的东南部0.5公里处有文帝祠庙，四周也有围墙，南北长414、东西宽362米①。

隋炀帝是隋代第二位皇帝，其陵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北雷塘村。隋炀帝于大业十四年（618）被宇文化及弑于江都，当时由宫人草草埋葬在吴公台。一说江都太守陈稜求得其柩，略备仪卫，将其葬于江都县西吴公台下。唐平江南，改葬雷塘。雷塘又称雷陂，相传是吴王曾经在此修建钓鱼台。炀帝陵"陵土仅高七八尺，周二三里"，当地人称"皇墓墩"。

（二）唐代帝陵

昭宗以外的唐代十八个皇帝的陵墓，分布在关中渭水北岸的三原、礼泉、乾县、富平、蒲城、泾阳诸县。

①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1. 唐陵的构筑

（1）以山为陵。是唐代帝陵的主要建陵方式，也是唐代帝陵的一大特征。这种营建方式，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如汉文帝霸陵的修建就是以山为陵，其他诸如河北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等也是如此。据调查，唐代以山为陵是从营建唐太宗昭陵开始的，此后相沿成制。一般是以相对独立的山体作为修建之所，玄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部。关于这些山陵的墓道，曾对乾陵和桥陵进行过试掘①，其中桥陵的墓道水平长 70、宽 3.78 米。墓道中以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填封，石条以铁细腰（也称为铁栓板）套接，熔铁灌缝，坚固异常。其他诸如定陵、泰陵、建陵、崇陵、简陵等陵的墓道也采取了类似的修筑方法②。有关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资治通鉴》卷二百八《中宗神龙元年》记载："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固其缝。"据调查，乾陵墓道呈正南北的斜坡形，长 63.1、宽 3.8、深 19.5 米。全部用石条填砌，从墓道口至墓门共 39 层，每层石条厚 0.5 米，石条之间用铁细腰嵌住，其上部为夯土。

（2）封土为陵。即依地势高亢之土原营建陵墓。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形制如汉代帝陵。这种营陵方式是对秦汉以来帝王陵墓建筑形式的继承和发展。陕西境内的十八座唐陵中，只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封土为陵。截止目前为止，唯一经过发掘的唐僖宗靖陵为研究封土为陵的帝王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僖宗是唐代的第 19 位皇帝，他死亡之时唐王朝已接近灭亡，陵墓设施非常简陋，是一座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全长 44.7 米。坐北向南。斜坡墓道长 35.6、底部宽 2.7 米，有整齐的台阶。甬道长 4.1、宽 2.2~2.5 米，东西两壁各开两龛。墓室横长 5.78、进深 4.5 米，东、西、南三壁开 8 龛。棺床以石碑、石块、砖等砌筑而成，长 4.4、宽 3.1 米。墓道两壁残存壁画绘制侍臣、门吏、依仗等，墓室壁面小龛和甬道小龛中绘十二生肖图案。这种在龛内绘制十二生肖图案的做法，在唐墓中尚不多见，但在五代时期的王陵中较为普遍，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棺床以武则天时期的宠臣杨再思、豆卢钦望等人的墓碑筑成，反映出唐王朝衰落的程度，似乎不能作为唐代开国以来帝陵制度的代表。

2. 唐陵陵园的基本形制和布局

唐代的帝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可分为三个阶段：玄宫、神道和乳台以南至鹊台之间的兆域，这三个阶段的相对高差在 50~100 米。唐代帝陵陵园与汉代的有所不同，唐陵陵园以南门为正门，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而

①陕西省文管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 年第 1 期；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②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北京。

汉代帝陵陵园则多以东门为正门。唐代陵园的这种设计思想显然受了唐长安城的影响，并且一直影响着以后历代帝王的陵园设计。

不论是封土为陵，还是以山为陵，一般在陵园中心构筑陵台，台南置献殿，陵台四周通常环筑内外两重陵垣，陵垣整体呈四方形，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前设神道，又称“司马道”。也以四神命名，东、西、南、北分别为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朱雀门以南有三重阙，第一重位于朱雀门外；第二重位于神道南端华表以南，即乳台；乳台之南土阙即鹊台。

陵园四门设包砖土阙。通过对乾陵的阙进行发掘，得知其为三出阙，基础铺石条，其上夯筑阙台，外部包砖。东、西、北三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南门外除置武士、石狮外，由北向南夹神道列置颂碑、文武侍臣、石马及御马者、瑞禽瑞兽、华表等石刻。这种石刻组合方式大概从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固定下来。也有呈不规则形的陵园，如德宗李适崇陵东西长南北窄、顺宗李诵景陵、宣宗李忱贞陵等都呈不规则形。如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分为内城和外城，陵台位于内城正中梁山山腰上，陵园南面设三道门。内城的南、北、东、西四面城垣长度分别长 1450、1450、1582、1438 米，均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残存门址均为三出阙。

（三）五代陵墓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均为割据一方的唐朝藩镇，其陵墓沿用唐陵的某些制度。从对割据西南的前蜀、后蜀，割据江南的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陵墓的调查或发掘看，五代陵墓与唐代一样，大都以山为陵。只因其偏居一隅，政治势力弱小，经济力量不足等客观条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雄伟壮观。

前蜀主王建墓[①]与南唐主李昪、李璟墓[②]，墓室分别为石结构、砖石混合结构和砖结构，皆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后蜀孟知祥墓，则是三个并列的穹隆顶圆形石室。南唐二陵墓室四壁影作仿木建筑的柱、枋、斗拱等。棺床建于中室（王建墓）或后室（南唐二陵）。墓内最主要的随葬品是哀册、谥册、谥宝等，王建墓后室还出土有墓主的圆雕石坐像。南唐二陵以大量男女陶俑随葬，陶俑种类多，刻画细腻，代表了内宫中不同职分的人物。五代陵墓的某些制度，又为宋代帝王陵墓所继承。

吴越国陵墓发掘了若干座。如葬于唐光化三年（900）的钱宽墓[③]，当时其子钱镠尚未称吴越王，所以其墓室仅具前后室，后室顶部绘有天文图。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及其妃子吴汉月的陵墓为前中后三室，后室四壁雕刻四神十二生肖像。后室顶部均有线刻天象图。在苏州七子山也发现一座具有前中后三室的墓葬，全长

①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②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 年。

③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近15米，后室中央设置棺床，中室附设耳室，推测是钱镠之子广陵王钱元璙家族的墓葬[①]。此外，经过发掘的还有钱元玩墓[②]等。近年来，又发掘了钱元瓘元妃马氏之康陵[③]。

吴越国王陵采用的石材，基本以红色砂砾岩为主，这种石材不产于杭州，应当是从外地运来的。封门和门框则以大块的石灰岩凿刻。后室都有雕刻，内容、布局、施色都完全相同。四壁上沿雕刻宽带状牡丹花纹，每组图案以一大一小的牡丹纹组成，上面着有颜色。大花心施金色，花瓣涂红色，叶着石绿色。小花着色不同，花瓣红色，叶金色；中部为四神浮雕；下部为十二生肖，每个生肖各居一尖拱形龛。墓室顶部刻有天象图。墓内设有排水设施。在石室之外，又以砖砌筑拱券。

二、墓葬

（一）分类

1. 竖穴土坑墓

一般为平民墓葬，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也有个别的贵族墓葬采用这种方式，但比较罕见，如隋李静训墓就是一座带长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④]。

2. 砖室墓

隋唐时期的砖室墓，按照墓室的多少，可以分单室砖墓和双室砖墓。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多过洞的形式，此类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较高。也有的墓道呈竖井式，以单室墓为主。在南方地区主要流行单室砖墓，一般先挖竖穴土坑，然后在其中砖砌券顶墓室。

3. 土洞墓

隋唐时期的土洞墓，按照墓室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室和双室两类，以前者多见，后者较少见，仅在西安发现一座前后室土洞墓即温思暕墓[⑤]。主要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大型墓葬主要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和多过洞的形式，此类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小型墓多为竖井式墓道单室墓。

（二）地面设施

1. 墓园

在一些身份比较高的墓葬，还有墓园存在，如已经发掘的节愍太子墓墓园，平

①苏州市文官会等：《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2期。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象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
③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唐温绰、温思暕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2期。

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 170、东西宽 143 米，四面环绕夯筑围墙，四角有角阙，南墙设双门阙。通过对昭陵陪葬墓进行调查，发现一般的陪葬墓也有墓园存在。

2. 坟丘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地面残留坟丘的墓葬不多，而坟丘保存相对完整的隋唐墓，主要见于唐代帝陵的陪葬墓。从帝陵陪葬墓的坟丘来看，唐墓坟丘主要有三种形制，一为象山形，这是一模拟较特殊的坟丘，仅见于李靖墓、李勣墓。二为覆斗形，这类坟丘与封土为陵的帝陵形制相一致，一般是等级比较高的贵族官僚使用。三为圆锥形，属于常见的坟丘形制。

3. 石刻

石刻是隋唐墓葬地面设施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一定品级的人才可使用。据《隋书·礼仪三》记载："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竭。"未见有关石人、石兽的规定。《唐六典》卷四记载："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可见，在墓前立碑是隋唐墓葬所共有的特征，而石人、石兽在唐代也有明确的规定。从遗存的唐代各类石刻来看，人臣墓前主要陈列石虎、石羊、石人及石碑。其安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对称形式，一为非对称形式。前者是在神道两侧分置，后者则将同类石刻安置于神道一侧。墓前陈列石刻以及石人、石兽者主要见于帝陵陪葬墓，此外的墓葬地面设施中则所存不多。

4. 经幢

据《大汉原陵秘葬经》"庶人幢碣仪制"条记载："凡下五品至庶人，同于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罗尼经》，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石幢长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或九尺，按九宫。庶人安之，亡者生天界；生者安之，去大富贵。凡石者，天曹法生有石功曹，安百斤，得子孙大吉也。或云，常以虚丘加家体，天梁下安之，大吉。安幢幡法，当去穴二百步安之，即吉庆也。"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经幢的存在。如西安唐成王李仁与妃合葬墓中发现石幢顶，是目前发现经幢等级最高的墓葬[①]；高克从墓石经幢[②]，题记"为亡故义监军监军使、通议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高可从。夫人戴氏、长男公球、次子公，愿亡者领受功德，建造者罪灭福生，同洽此福。维大中二年岁次戊辰三月辛卯日朔二十三日建立。"刘文经幢[③]，题记为"彭城郡刘文奉为先亡父坟茔处建立尊胜影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 年第 7 期。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 年。

③《陕西省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 年。

幢一所”；张惠达经幢[1]，题记为“维大唐开成四年岁次己未十月己酉朔二十四日壬申，孤子张惠达等奉为亡考妣坟茔所建立尊胜陀罗尼经幢一所，永为福利”。

（三）葬具与葬俗

1. 葬具

（1）木棺

木棺是隋唐墓葬的重要葬具。虽然比较完整的木棺非常少见，但考古发掘中常见这样一种现象，即墓室之内残存朽木、板灰、铁钉等，这都是采用木棺进行埋葬的证明。从残存的棺灰痕迹观察，木棺一般是头部大足部小，平面呈梯形。

（2）石棺石椁

使用石棺石椁的墓葬一般等级都比较高，被认为是隋唐墓特别是唐墓等级的标志之一，而且皆出自殊礼。据《通典》卷八十六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者。”《唐六典》卷四也有相类似的记载：“凡葬，禁以石为棺椁者，其棺椁禁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者。”但也有一些特殊现象，在山东嘉祥发现1座唐代石室墓[2]，墓室全用青石垒砌而成，墓主人为汉王司马，身份并不很高，下葬于贞观十年（636）。至少说明禁止以石为葬在初唐时期还不严格。在这些石棺椁之上多有线刻，其内容有：①建筑构件：瓦当、滴水、勾头、门、窗等。②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③翼兽。④武士。⑤男女侍从。⑥伎乐、飞天。⑦星相图和十二生肖。石棺床则多见于三品以上，三品以下的仅见安菩、宋氏等人。

石棺、石门、石棺床一览表

墓主人	品级	下葬年代	墓葬形制	葬具	资料出处
李静训	皇室贵族	大业四年（608）	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	庑殿顶石椁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寿	淮安靖王（正一品）	贞观四年（630）	单室砖墓	歇山顶石椁	《文物》1974年第9期
新城公主	正一品	龙朔三年（663）	单室砖墓	木棺、石门、石棺床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郑仁泰	开国郡国（正二品）	麟德元年（664）	双室砖墓	拱顶石椁	《文物》1972年第7期
李重润	懿德太子	神龙二年（706）	双室砖墓	庑殿顶石椁	《文物》1972年第7期

---

①《陕西省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

②李卫星：《山东嘉祥发现唐徐师謩墓》，《考古》1989年第2期。

续 表

墓主人	品级	下葬年代	墓葬形制	葬具	资料出处
李仙蕙	永泰公主	神龙二年（706）	双室砖墓	庑殿顶石椁	《文物》1964 年第 1 期
李贤	雍王（正一品）章怀太子	神龙二年（706）	双室砖墓	庑殿顶石椁	《文物》1972 年第 7 期
韦泂	汝南郡王（从一品）	景龙二龙（708）	双室砖墓	石椁	《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6 期
韦洞	淮阳郡王（从一品）	景龙二龙（708）	双室砖墓	石椁	《文物》1959 年第 8 期
杨思勖	骠骑大将军、虢国公（从一品）	开元二十八年（740）	单室砖墓	石椁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
薛儆	驸马都尉、上柱国（正二品）、开国郡公（正二品）、殿中省少监（从四品上）	开元八年（720）	单室砖墓	石椁	《唐薛儆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
高元珪	左威卫将军（从三品）、上柱国（正二品）	天宝十五载（756）	单室砖墓	石棺床	《文物》1959 年第 8 期
李凤	虢王（正一品）	上元二年（675）	单室砖墓	石棺床	《考古》1977 年第 5 期
李仁	成王（正一品）	景云元年（710）	双室砖墓	石棺床	《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 年
李贞	越王（正一品）	开元六年（718）	单室砖墓	石棺床	《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唐安公主	正一品	兴元元年（784）	单室砖墓	石棺床	《文物》1991 年第 9 期
万泉县主薛氏	正一品	景云元年（710）	双室砖墓	石墓门、砖棺床	
金乡县主	正二品	开元十二年（724）	单室土洞墓	庑殿式顶	《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 年
安菩	安国大首领（五品）、定远将军	中宗景龙三年（709）	单室墓	石门、石棺床（中间填土，外围石条）、木棺	《中原文物》1982 年第 3 期
高力士	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	宝应二年（763）	单室砖墓	石门，石棺床，以石板围砌，上面铺石板，中间填土和砖渣及条砖。	《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惠昭太子	正一品	元和四年（809）	单室砖墓	墓室地面铺石板，棺床以青石围砌，中间填土，上面铺砖，石门，木棺。	《考古与文物》1992 年第 4 期
阿史那怀道			单室砖墓	双石门，歇山顶式石椁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 年）》，文物出版社，1997 年

（3）琀

使用琀是古代传统的葬俗之一，在汉魏时期非常流行，其形状主要为蝉形。在已发掘的隋唐墓中，有很多墓葬都出土了琀，已经不再使用汉魏时期的蝉形，而大量使用铜质“开元通宝”、银质“开元通宝”、各类珠子、外来货币（主要有输入的各类萨珊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等，其中以“开元通宝”铜钱最为常见。

（4）握

《释名·释丧制》云：“握，以物著尸手中，使之握也。”隋唐的握有豚形，也有蚕形，多为滑石制品。此外，手握钱币的现象也比较多。

（5）陀罗尼经咒

在中晚唐时期的一些墓葬之中还随葬陀罗尼经咒。这类经咒一般放置在臂钏所附带的盒子里。如西安西郊一座唐墓之中出土 1 件手写经咒绢画，约 26.5 厘米见方，画面中心部分为三眼八臂菩萨，菩萨右下方为供养人。在其周围围墨书古梵文经咒十三行。绢画边缘部分有以墨线绘的置于莲台上的宝瓶、法轮、法螺贝、宝幡等法器①。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佛教信仰有很大关系。

（6）纸钱

纸钱（此处所言纸钱是指一种用来祭祀鬼神的明器）的使用是中国古代葬俗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在现代中国的丧葬仍然在延续。它一方面是节俭思想的具体反映，另一方面更说明纸的发明及普遍使用，对中国古代丧葬习俗起了重大影响。那么，它开始于何时呢？

据《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记载：“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相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又据《新唐书》卷一百九《王玙传》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乃用之。”以纸钱为鬼神事，魏晋以来始有其事，在目前已经发掘的魏晋南北朝墓葬之中，随葬实用货币的数量大为减少，这一点也为《封氏闻见记》所载情况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纸钱在唐代较为盛行，此可作为唐墓随葬铜钱数量比汉代大为减少的原因的一个好注脚。

众所周知，纸是西汉时期发明的，经过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纸张的发明年代不断提前），但在汉代纸的使用仍不普遍，大量汉简的发现就是证明。两汉时期厚葬之风非常盛行，特别是一些贵族墓葬更是如此。以各类钱币随葬在当时不仅非常普遍，而且数量巨大。随葬的货币之中，往往以实

①陕西省博物馆、李域铮、关双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文物》1984 年第 7 期。

用货币为主，也有使用泥质冥币随葬者。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丧葬习俗中以纸钱代替实用货币，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出于对墓葬安全的考虑，也是促成使用纸钱的一个重要契机。《汉书》就记载了孝文帝陵所埋钱币被盗掘一事。这充分说明当时人已经注意到厚葬给墓葬带来了不安全因素，于是便“率易从简，更用纸钱”。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纸钱为沿途抛撒或焚烧，这为探讨当时的纸钱如何使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纸钱在埋葬过程中皆被焚烧，所以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纸钱的存在比较困难。从文献记载来看，纸钱与实用货币有所不同，而更接近东汉以来的“摇钱树”。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记载的“积钱如山，盛加雕饰”，此类东西在如今陕西关中的丧葬习俗中仍可见到。

（7）葬式

自西汉以来，仰身直肢葬已经成为主要的葬式，并被以后各时代所继承。考古发现的隋唐墓葬的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

（8）聚族而葬

聚族而葬是中国传统的葬俗之一。在汉代以及魏晋时期就已经存在此类现象，隋唐继承了这一传统习俗。在当时经济状况下，血缘关系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从而使族权得以强化。隋唐时期的归旧茔就是聚族而葬的具体体现。从隋唐墓志来看，附葬先茔的现象非常普遍。如西安出土的304号墓墓志记载：“他乡飘泊，谅非吾土；窀穸匪安，灵榇归故。”[①]反映了归旧茔思想的存在。它实际上就是中国人“落叶归根”思想的具体体现。例如，在陕西韩城小金盆乡村发现了唐代白氏家族墓地，经过清理的有白敬宗墓等[②]，就是当时聚族而葬的一个好例证。

（9）招魂葬

招魂葬是针对一些非正常死亡而又已丧失埋葬地点的人实行的葬制。唐中宗赵后及睿宗刘后、窦后为武后所害，莫知瘗所，而招魂葬之[③]。又据《大唐故恒山愍王荆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墓志铭》记载：“妃苏氏招魂合祔”[④]

《唐会要》卷三《皇后》记载：“中宗皇后赵氏，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和思皇后。皇后初为英王妃，母常乐公主得罪，妃坐废，幽死于内侍省。中宗崩，将葬于定陵，莫知瘗所，将行招魂祔葬之礼。太长博士彭景直曰：‘招魂葬，礼非古，不可备棺椁置辒辌，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遂以皇后袆衣于陵所寝宫招魂，置衣魂舆，以太牢告祭，迁衣于寝宫御榻之右，覆以夷衣焉。”依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②呼林贵、任喜来：《陕西韩城小金盆村唐代白氏家族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

③（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九《祔葬变礼条》。

④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文物出版社，2000年。

《唐会要》之记载可知，所谓招魂葬即衣冠葬，或者是与之接近的形式。唐诗中对招魂葬的描述则更为形象，如张籍的《征妇怨》云："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从已知的实例和文献记载来看，凡是战死，或非正常死亡者，在重葬之时尸体难以寻觅的情况下，一般实行招魂葬。

（10）殉葬

目前已经明确知道的殉葬发生在商周时期，安阳殷墟遗址发现有大量人殉现象，但春秋晚期以后便不再流行，隋唐时期的殉葬更属罕见，但也有一些特殊例子。如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有大量人殉现象。其中有34座墓殉葬墓，共计殉葬87人，被殉葬者位于墓道、墓室、天井、墓主棺上，殉人最多的墓葬达12人。被殉葬者的人骨完整者16人，骨骼齐全但放置散乱的4人，是被砍杀和肢解的。无头骨而肢骨齐全的8人，是被砍头后埋葬的。还有头骨和肢骨不全的3人，是被腰斩、刖足的。有部分骨骼的23人，也是被肢解造成的。这些殉葬人与墓主同时埋葬，多随意抛置，不见棺木，显然不属于正常死亡。推测是异民族的战俘或奴婢一类的下层人。这批墓葬的年代在盛唐至中唐时期[①]。这一发现属于比较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唐代葬俗的一般规律来对待。

（四）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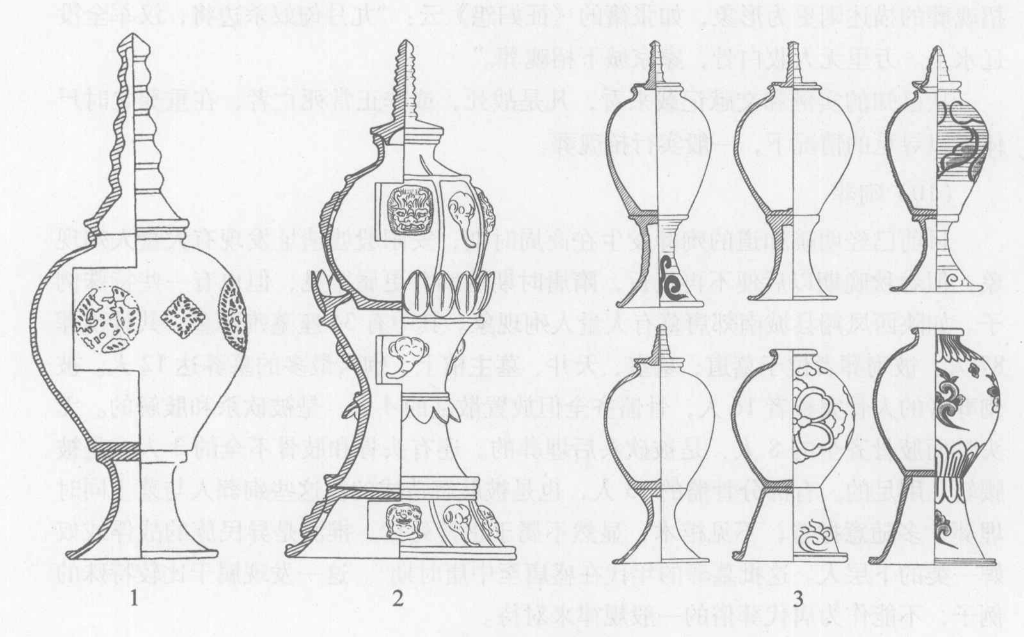
1. 陶器、陶俑和三彩器

（1）陶器分为日常生活用陶和模型明器。日常生活用陶的陶质可分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和细泥黄灰陶等。器形主要有带座塔式罐（图三四）、瓶（图三五，1、2）、灯盏（图三五，3）、双耳罐（图三五，4~6）、壶、碗、砚台等。在有些陶罐上施红色彩绘，个别的上面还贴有剪纸，如陕西陇县原子头唐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罐上贴有剪纸（图三四，1）[②]，这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剪纸实物。模型明器主要有井、仓、灶、碓、房屋建筑等（图三六）。唐墓最为常见的塔式罐，由盖、罐和座组成，其形状如印度的覆钵塔而得名。

（2）陶俑是隋唐时期墓葬的主要随葬品之一，以红胎为主，均合模制作而成，表面饰白色陶衣或者粉彩，有的贴金。种类多样，主要有镇墓兽（图三七，1、2）、天王俑（图三七，3）、侍俑、官吏俑，其中的武士、天王、镇墓兽变化明显，具有典型的分期意义。动物模型有骆驼、马、牛、驴、羊、猪等。在南方地区如湖北地区的墓葬之中，还常见一种陶俑，为人面鸟身状，从南北朝墓葬中的题记来看，这类俑一为"千秋"，一为"万岁"。河北一带的墓葬之中所出镇墓兽类与中原地区有一定差异，反映了地方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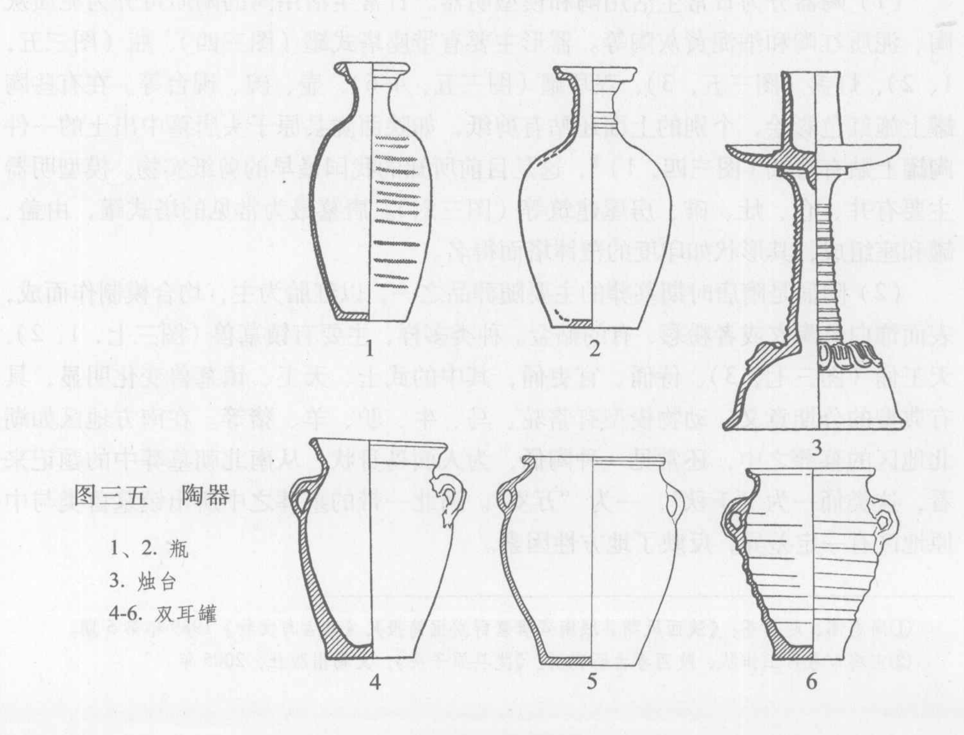
---

①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②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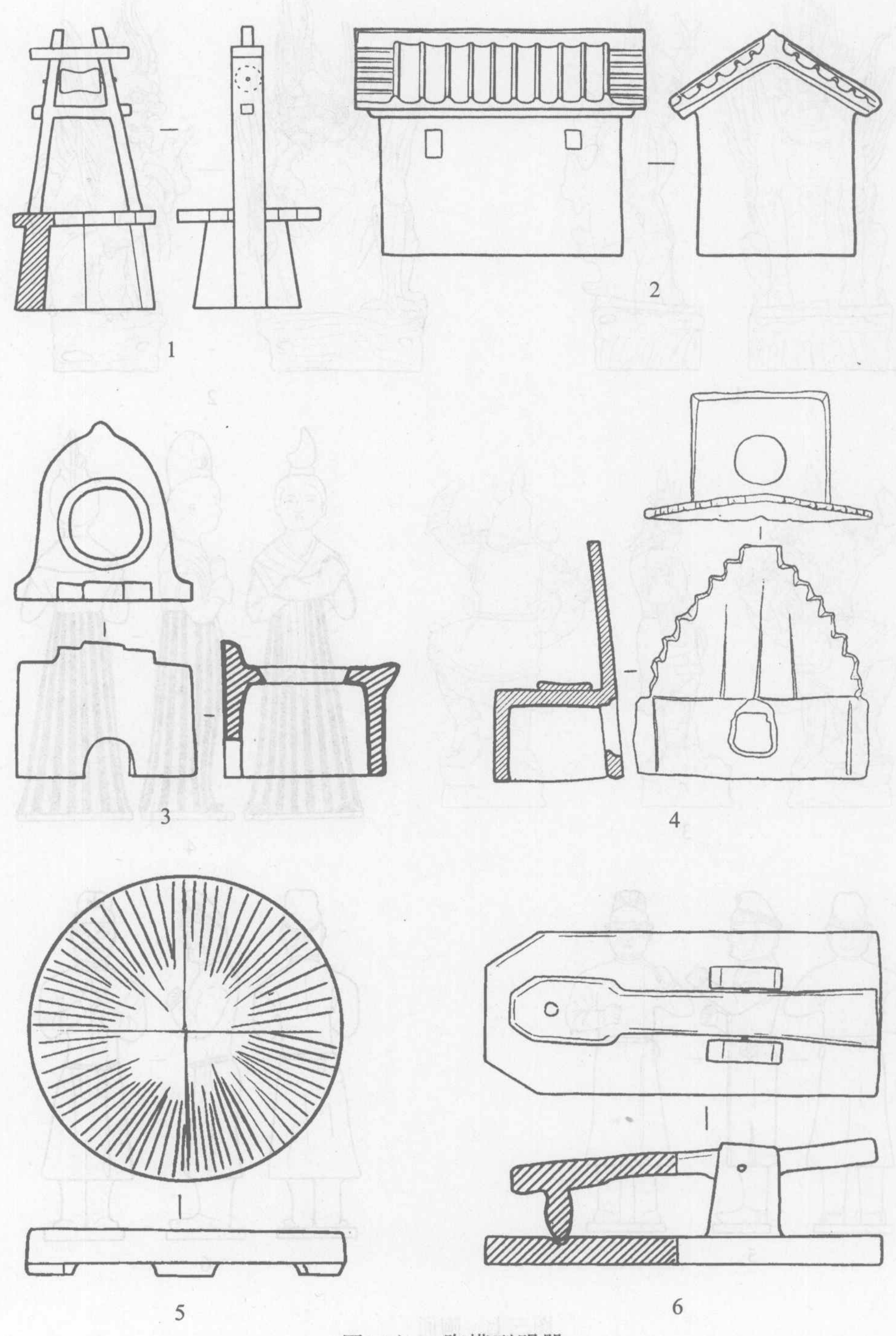
图三四　塔式罐

1. 陇县原子头贴有剪纸的塔式罐　2. 唐节愍太子墓陶塔式罐　3. 西安郊区唐墓塔式罐



图三五　陶器

1、2. 瓶
3. 烛台
4-6. 双耳罐



图三六　陶模型明器

1. 井　2. 仓　3、4. 灶　5. 磨　6. 践碓



图三七　陶俑

1、2. 镇墓兽　3. 天王俑　4. 三彩女俑　5. 三彩牵马俑　6. 三彩男俑

（3）三彩器是一种美术陶器。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主要出土于唐代墓葬之中；居住遗址除寺院之外，几乎未见；可能主要作为随葬品或供养品使用。其种类与其他陶器相类似，比较精美的有各类男女俑（图三七，4~6）。发现地域北至辽宁，南至广东，西至甘肃、宁夏一带，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2. 瓷器

主要为实用生活品，有四系罐、执壶（注子）、高足盘、七星盏盘、碗、茶托、高足盏、唾壶、烛台、灯盏、扣盒等。

3. 铜器

铜器也是隋唐墓中的重要随葬品，但和陶瓷器比较起来，数量较少。常见的主要有镜、盆、钵、碗、盘（高足盘、三足盘、平底盘）、杯、钱币等。其中以铜镜的数量最多，有的出土时放置在梳妆用的奁盒之内，有的则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更有的铜镜则为两半，可能有其他象征意义。在一些墓葬之中，还可以看到铜龙，或呈蹲坐状，或呈行走状。如北京史思明墓中的蹲龙[①]；洛阳唐墓中出土的鎏金行走铜龙[②]；西安郭家滩唐墓也出土1件[③]。

4. 铁器

主要有铁铧、铁剪、铁刀、铁熨斗、铁提梁小铁桶等，而以铁剪最为常见。铁剪以弹压式为主，也有部分为铆合式。另外，还有镇纸之类的铁器，如西安东郊韦美美墓出土的兔镇。晚唐时期的墓葬之中，还出现了以铁牛与铁猪、铁十二生肖等随葬的现象。这与当时藩镇割据，战争频繁，人们对现实社会极度的失望，寄希望于未来有密切关系。据《大唐新语》卷十三《纪异》记载："铸铁为牛豕之状象，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富贵贵贱，闲愚寿夭，尽系于此。"因此，以铁牛、铁猪作为随葬品，不但用来镇墓，而且将希望寄托于将来，并求得子孙富贵。

5. 金银器

金银器也是隋唐墓葬中比较重要的一类随葬品。从目前所见的金银器来看，主要有杯、碗、盘、盒及各类装饰品，其中以各类盒最为常见。

6. 玉、石册

玉、石册分为册文、谥册和哀册三类。册文主要记录死者生前被册封官职等的情况。谥册主要内容为对死者进行追谥。哀册则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意。质地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②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大道唐墓（C7M1724）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4期。
③陕西省博物馆、王仁波：《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80年。

有玉、石之分。主要见于一些高等级墓葬之中。《唐大诏令集》等文献中有些册文、谥册和哀册有所记录，出土物和文献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如惠昭太子墓葬中出土的玉册，分为册文和哀册，均汉白玉质，形制相同，大小规格略有区别，通长28.2~28.5、宽2.8~3.1、厚1.1~1.2厘米。玉册的两侧边近顶端和底端1.5厘米处，各有一个直径1厘米左右的穿孔，应当是连缀玉册时的穿孔，其中有的册下端仅有一个穿孔。玉册正面镌刻文字，其内填金。落款处文字较小，字数较多。所有册文刻字均为楷书，镌工也精①。可与《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八《册邓王为皇太子文》相互比较。李凤墓中出土5块册文刻石，分别属于武德八年、贞观十二年、贞观十四年、显庆三年、麟德元年的册文②。节愍太子墓出土谥册和哀册，为汉白玉制作而成，呈长条状，长27~27.3、宽2.7~2.9、厚0.4~0.6厘米，上下横向穿孔，可用线连接。正面镌刻文字，字体为阴刻楷书，字内填绿色③。惠庄太子墓出土的哀册，为汉白玉制作而成，正面镌刻文字，字体为阴刻隶书，字内填金④。让皇帝李宪墓中出土让皇帝和恭皇后的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均汉白玉制作而成。其中让皇帝的哀册有完整者，两面打磨光滑，长28.6~28.8、宽2.8、厚1.2厘米。正面阴刻楷书，字口填金⑤。北京史思明墓出土了44枚玉册，其中8枚较完整。包括谥册、哀册各1套。质地为汉白玉质，形制规整，均为长条形。每枚均刻字，最多11字，行书题，字口填金。每枚上下两端1.5厘米处均有直径0.3厘米的小孔，以便编缀。玉册长28.4~28.6、宽2.8~3.2、厚1.2~2.1厘米⑥。

7. 墓志

隋唐时期，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以墓志随葬都比较常见。一般分为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盖一般多用篆体书写；志石方形，一般楷书，内容为死者身份、经历等。据《封氏闻见记》卷六《石志》记载："古之葬者亦有石志，但不如今代贵贱通为之耳。"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以墓志随葬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封氏闻见记》所引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王俭所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礼无此制。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制墓下题版，文原此旨。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纪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考古发掘也充分证明了这段评价文字。一言一蔽之，欲不朽而已。但不论怎样，这些墓志保留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唐惠昭太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②富平县文化馆等：《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5期。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唐代墓志在墓室中基本位于墓门之后的甬道之中，也有的位于墓室与甬道的衔接之处，和文献的记载基本相温和。如《通典》卷一百三十九引用《开元礼》云："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置设讫，掩户，设关鑰。"《新唐书·礼乐志》："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

从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隋唐墓志来看，隋唐墓志的质地以石质为主，也有砖、瓷等。石质墓志一般呈方形，盖呈盝顶，四面有斜刹并装饰线刻花纹，花纹内容主要为四神、十二生肖及各类花草、动物图案。志石侧面一般较为粗糙，也有线刻花纹者。如河南偃师发现的唐李嗣本墓志，长、宽均 80 厘米，通高 23 厘米。志盖盝顶，上刻楷书"大唐故李君墓志之铭"九字，字周围按地支方位依次刻十二生肖图案。志盖四刹刻卷叶、云朵、瑞兽图案，一侧魏仙人擒虎，一侧刻二狮相争，一侧刻兽追奔鹿，一侧刻怪兽扑羊，以流云、花枝填补空间。志盖侧面分别刻卷云纹。志石侧面分别刻相对奔驰的对兽，有狮子、天马、羊、鹿等，其间填以云气纹①。呈长方形的石墓志也有发现，如高力士墓志为横长方形，长 112、宽 78 厘米②。还有一些墓志的形制比较罕见，如山西太原隋浩喆墓志③和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志均呈龟形④。石质墓志之外，砖墓志也较为流行，志文刻写和墨书、朱书。目前所见的瓷墓志多为唐代越窑烧造，形制有砖形、罐形、罂形等。例如，1934 年在浙江慈溪县鸣鹤场附近山中出土的唐长庆三年（823）姚夫人墓志铭，形制为长方形砖状，通体施淡橄榄色釉，首行刻"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志中记载姚氏死于长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月八日葬于上林湖东皋山⑤。

另外，隋唐墓志略有区别，隋代墓志在志文标题下不署撰写者姓名，唐代墓志开始在墓志志文标题下署撰者、书者姓名。

8. 买地券

买地券是为死者在地下购买土地以安居的标志。与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相比较，隋唐时期北方地区不大流行，主要见于南方地区。如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610）墓中出土一块买地券，陶质，长方形，长 34、宽 16.1、厚 2.3 厘米。周边刻花纹，文字以细线为界格，竖写而成⑥。江苏镇江唐墓也曾经出土买地券⑦。也有朱砂写成的买地券，如江苏武进隋墓中出土的一块朱砂买地券⑧。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等：《山西襄垣隋代浩喆墓》，《文物》2004 年第 10 期。

④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9 期。

⑤周丽丽：《唐越窑长庆三年姚夫人墓志》，《文物》1978 年第 7 期。

⑥熊传鑫：《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⑦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⑧武进县文化局：《武进县湖塘乡南朝、隋唐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6 年。

（五）壁画

隋唐时期的大型墓葬之中，均有壁画。三品以上的大墓葬，壁画的内容更加丰富。比较重要的唐墓壁画，主要发现于两京地区，在山西、宁夏等地也有发现，而以长安地区更为集中。

1. 壁画题材

大致可以分为：（1）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2）狩猎：猎骑、架鹰、架鹞、驯豹等。（3）仪仗：车骑、伞、骆驼、戟架等。（4）宫廷生活及家居生活：男女侍、乐舞、打马球、宴饮、农耕、六鹤屏风等。（5）礼宾：鸿胪寺官员、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宾客。（6）建筑：阙、城、楼阁、寺院、道观及斗拱、枋、平綦等。（7）天象：金乌、蟾蜍、银河、星斗等。

唐墓壁画以人物为主，以简练的线描、鲜明的色彩，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种人物形象。初唐时期的仕女具有清秀、修长的体态，其线条为铁线描。盛唐时期的仕女则大髻宽衣，丰厚为体。

2. 绘画技法

隋唐墓葬壁画的绘制工序大都分为墙壁处理、起稿、定稿、白描、着色等几个步骤。常用的颜色有土红、石青、石绿、石黄、银硃、硃磦等。宫室画的枋、斗拱、桯采用了单线平涂的画法。人物衣饰采用晕染法，大型龙虎及图案花纹则运用叠晕的方法，层次分明，色调鲜明。特别是对多种矿物的调配，增强了色泽的亮度和固定性能，在经历千余年以后，迄今颜色犹能保持鲜艳明快的效果。

3. 壁画分期

目前，隋唐墓葬壁画的研究以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研究最为深入。根据壁画的布局和内容的发展变化，长安地区唐墓壁画大致分为五个发展阶段[①]。

第一阶段，约为6世纪晚期至7世纪前期，布局和内容延续北朝旧制，墓道、天井、墓室三部分的壁画分为上下两栏，全部壁画以最后一个天井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单元，前部单元主要是描绘墓主人外出游猎的场面，后部单元主要是描绘墓主人的内宅生活及附属建筑物等。

第二、三阶段，约为7世纪中期到8世纪前期，是唐代壁画特征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时期，壁画都是单栏形式，全墓壁画的布局趋向一元化。内容除各种出行仪仗、卫队之外，出现了各种影作的仿木结构，配合以男女侍从，突出了墓葬的宅院化特点。第三阶段，乐游内容更加增多，其中有些题材还表现出受中亚的影响。

第四阶段，约为8世纪中期至9世纪之初，墓道壁画趋向衰落，墓室壁画流行墓主人像和人物屏风画。

①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第五阶段，约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是第四阶段壁画的简化，屏风画的内容以云鹤、翎毛取代了人物。

（六）分区和分期

在隋唐王朝直接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均发现隋唐墓葬，其中以西安、洛阳地区数量最多西安地区已发掘清理2000多座，洛阳地区估计也有数百座。其次，如山西太原、辽宁朝阳、新疆吐鲁番、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广东北江流域及其沿海、福建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也都是隋唐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

隋唐时期，国家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各自具有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在江南尤其突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提出了隋唐墓葬的分区问题。根据全国隋唐墓葬的发现状况，可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即西安地区、洛阳地区、朝阳地区、湖北地区、湖南地区、扬州地区、广东地区、福建地区、新疆地区。

1．西安地区

这一地区的隋唐墓葬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的纪年，在中国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其邻近的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在两京地区，以对西安隋唐墓的研究最为充分。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西安地区唐墓的分期开始进行研究。1962年，曾将西安地区唐墓分为3期[①]。1966年，又有学者根据1955~1961年在西安郊区所发掘的175座隋唐墓资料，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隋至初唐（6世纪晚期~7世纪晚期）；第二期，盛唐（7世纪晚期~8世纪中期）；第三期，中晚唐（8世纪中期~10世纪初期）[②]。也有学者依据西安地区百余座隋唐墓葬形制的变化，将该地隋唐墓分为七期：第一期，隋；第二期：隋末至唐高宗初年；第三期：高宗初年至中宗时期；第四期：玄宗时期；第五期：肃宗至德宗时期；第六期：德宗至宣宗时期；第七期：宣宗至唐亡[③]。宿白先生在研究西安唐墓形制时将其分为3期：第一期，高祖、太宗时代，即618~649年，属于唐代开创时期，墓葬各方面的情况和隋代相似，唐代特征尚未形成；第二期：高宗到玄宗时期，650~756年，属于唐代特征形成和发展时期。如果再仔细区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高宗、武则天至玄宗之前（650~712）为前一阶段；玄宗时代（712~756）为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重点是唐代特征的形成，后一阶段的重点是对唐代特征的继续和发展。第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③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三期：自玄宗以后至唐亡（756~907），这一期时间虽长，但墓葬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因循、简化，清晰地勾画出唐王朝逐步衰落的景象[①]。在论述中采用宿白先生的三期说。

第一期：隋至高祖、太宗时代（581~649）。隋和唐墓的各方面情况相似，唐代特征尚未形，属于唐代特征的开创时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墓室四壁通常较直而无弧度。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其中镇墓俑只用武士、镇墓兽而无天王。镇墓兽一个人面，一个兽面，皆兽身，蹲坐、蹄足。其他人物俑体态清瘦、亭亭玉立而欠生动。

第二期：高宗到玄宗时期（650~756），属于唐代特征形成和发展时期。如果再仔细区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高宗、武则天至玄宗之前（650~712）为前一阶段；玄宗时代（712~756）为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重点是唐代特征的形成，后一阶段是的重点是在特征的继续和发展。

高宗年间，单室砖墓墓室四壁稍向外弧出；前后室砖墓开始出现，但它的前墓室面积比后墓室小、而与天井同大。武则天至中宗时期，单室土洞墓一般为纵长方形墓室，墓道与墓室在一条直线上，形成所谓直背刀形墓。这时的前后室砖墓，如神龙年间的懿德太子墓[②]、永泰公主墓[③]、章怀太子墓[④]，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前后室面积相近，前室面积比天井大得多，应是唐代前后室砖墓的典型样式，而且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开元以后，尚未发现有前后室砖墓，最常见的仍是单室砖墓和土洞墓。玄宗时期，单室砖墓变化不大，单室土洞墓却有明显变化。这时的单室土洞墓，多为直背刀形墓和墓道偏于墓室一侧的曲背刀形墓，墓道长度逐渐缩短，天井及小龛数量减少，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有的墓葬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有的墓葬墓室由规则长方形改呈梯形。墓内多随葬童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

高宗时，天王俑基本上已代替了武士俑的地位，通常作成脚踏卧兽的样式。镇墓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往往在肩部塑出几根短而粗的鬃毛。其他人物俑仍体态清瘦，亭亭玉立。武则天至中宗时期，天王俑分两类：一类脚踏卧兽；另一类脚踏俯卧式小鬼。镇墓兽一类蹲坐、兽蹄，长鬣耸立，肩附双翼，形象较凶猛；另一类头生角，握蛇，爪状足。其他人物俑，造型匀称，胖瘦适中，体态生动。玄宗时期，天王俑流行脚踏蹲坐小鬼的样式。镇墓兽一类头有角，肩生翼，蹲坐，兽蹄；另一类面目狰狞，长鬣直竖，四肢舞动，手握蛇，脚踏怪兽，爪状足。其他

①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②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③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④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人物俑，面颊丰腴，身躯肥胖，神态可掬。但天宝时，人物身段已欠匀称，应是陶俑制作艺术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

第三期：自玄宗以后至唐亡（756~907），这一期时间虽长，但墓葬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因循、简化，清晰地勾画出唐代逐步衰落的景象。这一时期的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与前一期差别不大，但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小，带小龛的墓葬较少，而且有的将小龛开在甬道壁上，还有的将小龛开于墓室四壁。德宗以后，各类墓葬普遍采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其竖井部分平面多呈梯形。约在宣宗前后，还出现一种折背刀形墓，这种墓由平面作梯形的竖井墓道和平面呈梯形的墓室两部分构成，是唐末富有特征的墓葬形制。这一时期，带小龛的墓，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镇墓兽有相貌狰狞手握蛇者，制作简化草率。其他人物俑，虽模仿开元、天宝时期俑的外形，但造型呆板，且过于肥胖臃肿。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

与分期相适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唐六典》的规定。

2. 洛阳地区

1983 年开始钻探、发掘的杏园唐墓，共发现 69 座，墓主多为中小官吏，其中 37 座出土有墓志，按照墓志的纪年，时间最早者为长寿三年（694），最晚者为中和二年（882）。以这批墓葬资料为主要依据进行的研究，确立了洛阳地区的唐墓分期。徐殿奎的《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①一文，为洛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分期建立了一个标准，改变了以前以西安地区隋唐墓的分期代替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局面。依据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分为四期：即隋至初唐时期、盛唐时期、中唐时期、晚唐时期。

第一期：隋初唐时期。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18）至唐高宗年（683）。墓葬形制以铲形墓为主，棺床靠近北壁之下者居多，墓室近方形，四壁向外弧出。随葬品的组合按性质可以分为四大组：第一组以镇墓兽或武士俑为代表；第二组为表现墓主人出行情况的牛车及仪仗俑群；第三组为表现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和乐舞俑等；第四组为庖厨明器和家具器具模型。比较典型的有镇墓兽、莲花座侍吏俑、女侍俑等。

镇墓兽蹲坐于近似三角形的平托板上。人面镇墓兽，脸稍上仰，大耳垂肩，表情和善，背有竖毛两簇。兽面镇墓兽，头部鬃毛卷曲似狮，张口龇牙，墨绘出眉、眼、鼻、嘴和胸毛。背有竖毛两簇。武士俑身披铠甲，头戴圆顶兜鍪，肩有重叠

①徐殿奎：《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 年第 3 期。

状披膊，身着明光铠，圆盆领，腰束带，下着裤，足蹬靴，左手按一狮面盾牌。在中型墓葬中极为普遍。据史籍记载，明光铠流行于北朝末年，盛行于隋及唐初。《唐六典》将明光铠被列为甲制铠类的第一种。在细部结构上，隋代的明光铠还可明显的分出早晚两段。较早的标本，胸背中心向左右分作两个大型圆护；较晚者自领下居中纵束甲绊，至胸以下打结，然后左右横束到身后。纵束甲绊的两侧是两个大型圆护，这种形态一直延续到初唐。莲花座侍吏俑，在此期前后均极少见，只流行于隋至初唐时期。女侍俑造型变化比较明显，隋代女侍俑多作执炊、捧物状，头梳低平髻，身着长裙。初唐女侍俑，头已改梳螺髻、丫髻、单刀半翻髻、低矮双鬟髻，而且形体修长，细颈削肩，身着短袖长裙，与盛唐女侍俑十分接近。还有极个别的出土墓龙、仪鱼、人首鸟等。

第二期：盛唐时期。

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墓葬形制多单室土洞墓，墓道呈长斜坡状，甬道呈过洞式，墓门一般向南，墓志多摆放在甬道之内。墓室平面一般呈规则的纵长方形，甬道口开设在墓室拿壁偏东处。刀形墓出现，即墓道和墓室的一侧在一条直线上。

随葬品仍以四大组合为主体，镇墓兽的形象比初唐时期凶猛，头肩部加饰的火焰状竖毛明显增加，而且加长。眼、耳、鼻等细部更加形象逼真。贴金粉彩的镇墓兽，胸领涂金，胸部彩绘多层的宝相花装饰。武士俑（天王俑），前期执盾武士俑及按盾的形象，此期均已不见，而出现了形象威武、二目圆睁的武士俑和面容狰狞的天王俑。在盔甲上也有很大改变，在圆顶兜鍪和尖顶兜鍪上都另加装饰。护耳外沿上翻，披膊饰成龙首状，铠甲下摆处饰流苏，内衬长裙垂至靴面，整体造型上威武而秀美。女侍俑普遍为高髻、细颈、削肩的修长造型，面容比前期丰满。发髻基本淘汰了前期的低平髻，部分保留了单刀半翻髻，普遍盛行的是高螺髻、双鬟髻、博鬓抛髻，还出现了骑马女侍俑。男侍俑冲破了前期呆板、单调的形象，面部的细致刻划使得其形象也极为生动。一些出行的牵马或骆驼俑多用胡人装束，头戴毡帽，身穿窄袖长衣，腰系皮囊包裹，制做十分精确。骑马男侍俑，头戴幞头，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衣，下着裤，足蹬靴，双手牵缰，雕塑细腻，也为前期所不见。唐三彩出现并流行，并成为盛唐时期墓葬的一个显著特点。另外，实用器的铜器、金银器增加。

第三期：中唐时期。

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这一时期墓道缩短，出现竖井式墓道。墓室呈纵长方形，出现十二生肖壁龛。刀形墓比较流行，棺床位置靠近墓室西壁。

随葬品的四大组合制度开始解体，表现礼仪的俑群锐减，唐三彩突然消失。陶俑一般火候较低，模具模糊不清。镇墓兽两耳如扇，周身鬃毛减少，尾部无毛。天王俑面容凶狠，脚下踩小鬼，风帽套衣俑制作粗疏。此前习见的细颈、削肩女侍

俑被体态臃肿的宽袖长衣俑所代替。发髻上的复杂高髻演变成单调简朴的垂发梳髻。动物俑从前期的直立状演变为跪卧状，尺寸明显缩小，脚踏底板中空成环状。十二生肖俑在这一期尚多见，形态以站立者居多，兽面人身，穿宽袖长袍，双手拱立。大量使用铜器、金银器、瓷器作为随葬品。

第四期：晚唐时期。

从宪宗元和元年（806）直至唐亡（907）。墓葬形制和结构基本保持中唐时期的风格，如墓葬基本坐北向南，墓道、甬道衔接在墓室南壁偏东处，平面呈直背刀形，仍流行带台阶的斜坡墓道。墓葬形制多为纵长方形，四壁掏挖12个壁龛的习俗仍在延用。新出现的墓葬形制是梯形、双梯形墓，而且在晚唐时期墓葬中最富有代表性。梯形墓是指墓室北宽南窄，双梯形墓是指墓室与墓道均北宽南窄。

小型砖室墓比较多见，墓室平面一般呈方形，四壁单砖叠砌，并微向外弧出，四角相互叠压，以穹隆顶居多，有的顶部则呈椭圆形，也有的近似覆斗形。

随葬品的组合及特征：（1）此前兴盛一时的随葬品如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已经全部消失。个别墓葬之中出土少量半身侍俑，工艺极为简陋。（2）大量实用瓷器进入墓内，构成了随葬品的新内涵，包括白瓷碗、瓷注子、瓷粉盒、瓷唾盂等。尤其是一种矮胖带盖的白瓷罐成为主要随葬器物。（3）铜匜、铜刀增多，铜钵减少。铜镜不但数锐减，而且质量低劣，图案模糊。以圆形为主，其次是方形和委角方形。中唐时期的团花镜、瑞兽镜、绶带镜、平脱镜，这一时期仍然用来随葬。（4）实用的铜印章也被随葬。（5）滑石器作为随葬品大量出现，其种类包括罐、盘、盏、盒、枕等。（6）用银筷、银勺、银钗等随葬更加普遍。（7）被视为镇邪压胜之物的铁牛、铁猪、铁犁等，在晚唐时期的墓葬之内普遍出现。晚唐时期的随葬品组合中，许多器物的出现与葬师的说教有关。唐代末年的战乱，为葬师的迷信之说创造了社会环境，并使之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系于此。”“凡墓内安长生灯者，主子孙聪明安定，主子孙不患也。墓内安金石者，子孙无风疾之患。”“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于墓内，以助身道……铸铁为牛豕之状象，可以御二龙。”

3. 朝阳地区

朝阳是隋唐时期的营州，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周围数十里唐墓比较密集，已经发掘的唐墓有150多座。这一地区的唐墓，除朝阳之外，还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此区唐墓随葬品情况与两京地区无大的区别，唯朝阳唐墓所随葬的俑中，多为未经焙烧的泥俑。墓葬形制的最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顶部呈圆形券顶，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一般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也有方形单室砖墓、船形单室砖墓、竖穴土坑砖棺墓、竖穴土坑墓等形制。

（1）圆形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韩贞墓[①]、朝散大夫墓[②]、柴油机厂墓[③]等。天宝三载（744）的韩贞墓，是一座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及左右耳室组成的墓葬。主室及耳室平面皆为圆形。主室后部设置棺床，其上安置尸骨两具，应为韩贞夫妇。棺床左前方放置陶瓷器多件，其中1件双耳罐内装有骨灰。右耳室空荡无物，左耳室后部设尸床，其上安置骨架1具。据推测，左耳室骨架、主室瓷罐中的骨灰，应为韩贞两个次子的。"朝散大夫"墓，由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门及门墙保存较好，墓门上部呈圆拱形，起券三层，两侧门墙上影作两层方柱及斗拱，门顶也有斗拱一朵。甬道内安有石门，墓室直径达12.8米。墓室内以隔墙隔成相互连通的5个小室，最后面的小室安置墓主尸体，其余小室分别放置镇墓兽、陶俑、陶马，或铁、铁锯、铁斧等。朝阳柴油机厂唐墓规模较大，砖筑，由长21米的斜坡墓道、4.5米长的甬道和直径7米的单室组成，出土80余件陶俑，有镇墓兽、武士俑、侍女俑、风帽俑、伎乐俑、骆驼俑、马俑等，在甬道壁龛还出土一男一女2件满施彩绘的石俑，男俑左手架海东青，右手提榻，女俑双手叉于胸前，有当地少数民族的特征。

（2）船形墓。平面呈前宽后窄的单室船形，两侧壁外弧，券顶，多为砖筑，整体形状如一覆船。由墓门、短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门之外的上方有挡土的翼墙。如朝阳市衬布总厂M2，墓室砖筑，全长3.16、前宽1.26、中宽1.44、后宽0.36米。甬道长0.3、宽0.88~0.92米。门为拱形，高1.5米[④]。

（3）方形墓。数量较少，多单室砖筑，墓室平面呈方形，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如朝阳教学研究中心M3，方形单室，墓中出土了东罗马金币等遗物[⑤]。

（4）竖穴土坑砖棺墓。在竖穴土坑之内，以砖砌筑平面呈梯形的棺室，底部铺砖，墓室狭窄，大小仅可容身。如朝阳市衬布总厂M3，墓口全长2、前宽0.4、后宽0.26米[⑥]。

（5）竖穴土坑墓。所见数量较少，平面呈长方形，随葬品较少。如辽宁朝阳纺织厂M4，墓室呈长方形，长2.5、宽1.4米[⑦]。

随葬品主要有双耳瓷罐、盘口瓷瓶、三彩三足罐、黄釉陶碗、彩绘带盖陶罐、灰陶碗、铜盘、铜镜、凫首铁鐎斗、铁鼎以及三彩小狗、滑石狮等。其中的双耳瓷罐、彩绘带盖灰陶罐等是富有代表性的器物。陶俑（泥俑）有镇墓兽、仪仗、仆

①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文物》1973年第6期。
②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文物》1959年第9期。
③顾玉才：《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万欣、贾宗梁：《朝阳市衬布总厂的几座唐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⑤顾玉才：《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⑥万欣、贾宗梁：《朝阳市衬布总厂的几座唐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⑦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北京。

侍、模型明器等。其中的仪鱼和观风鸟，与河北地区墓葬所出者类似。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当地少数民族特点的石俑。

4. 湖北地区

主要发现于武汉一带，这里是长江中游隋唐墓最多的地区之一。流行以花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内设较高的棺床，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随葬陶（瓷）质人物俑、陶动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现较早，还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具为主，器形有高颈球腹盘口壶、内饰叶纹的高足盘、实足小碗、蹄足圆形砚等。此外，还经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则保持了中原地区的形制，有长斜坡墓道、甬道、方形墓室，墓室砖筑，内设棺床，绘制壁画，有的有过洞和天井，有的在甬道两侧设壁龛。比较典型的是唐濮王李泰家族墓[①]。

从随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遗风，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盘口壶、瓷罐、唾盂，则表现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②]。

5. 湖南地区

主要指长沙、常德、湘阴等地，仅长沙一地，已发掘唐墓 500 余座。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墓砖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头部）留生土二层或挖出小壁龛。砖室墓多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其次为前室较小的前后室墓（有的后室附建耳室）和两室并列的双室墓。随葬品以生活用具为主，最多的是施釉和不施釉的陶器，釉陶多施黄褐釉或绿釉，少数墓中发现兼施紫、白、蓝三彩釉者。器形有壶、盘、碗、罐、水注等。其次是瓷器及铜钱、铁器等。瓷器有青瓷、白瓷两类。也随葬陶武士俑、镇墓兽、文俑、伎乐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骆驼等。

从随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期[③]。前后期土坑墓和砖室墓都有发现，但前期砖室墓较多，后期土坑墓较多。

唐代前期墓的随葬品中，主要为陶器，瓷器较少。器形多直颈盘口壶、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以及高足杯、五联罐、圆形五足炉等。陶俑有兽身人面或兽面镇墓兽、人面鸟身俑、武士俑、男女侍俑、女伎乐俑、胡俑等。铜镜多圆形海兽葡萄镜。釉陶器一般施淡绿色薄釉，并有冰裂纹。瓷器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

唐代后期墓的随葬品，陶瓷器的器形有肩部附加荷叶形的盘口细颈壶、浅腹碗、体形较高的注子、长颈瓶、重唇带盖罐、葵花形碗、敞口碗等。其中最典型

①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 年第 2 期；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8 期。

②段鹏琦：《隋唐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③段鹏琦：《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的器物，应是葵花碗和肩部附荷叶饰的盘口细颈壶。俑少见。菱花镜、委角方形镜相当流行。釉陶器一般施黄褐色或深绿色釉。出现胎质厚重、颜色混浊、制作粗糙的白瓷。

6. 扬州地区

扬州地区是长江下游唐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已发掘唐墓在200座以上。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两种，另外还有凸字形、腰鼓形、十字形等砖室墓。砖室墓墓壁常常砌出小龛，墓室内设棺床，棺床与墓壁间留出一砖宽的空隙以排水，墓砖素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较晚的墓内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钵、盘、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盘口壶、罐、盆以及陶砚、铜镜等。随葬陶俑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中、晚唐时期在两京地区唐三彩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地区唐墓中常常随葬三彩器。扬州地区唐墓可分为三期[①]：

第一期，初唐时期。墓葬形制分砖室和土坑两类，砖室墓以单室为主，极个别为双室。单室墓按形制又可以分为长方形和凸字形。砖室墓一般用青砖砌筑，砖以素面为主，也有一些墓砖材用花纹转。随葬品有镇墓兽、文吏、武士，人面鸟身俑和男女侍俑、家禽、家畜等。

第二期，唐中宗至唐德宗时期。以砖室墓和土坑墓为主，小型墓数量较多。砖室墓除前期流行的长方形、凸字形之外，新出现的形制有十字形、腰鼓形。除腰鼓形墓葬之外，其他各类砖室墓通常设耳室、壁龛，随葬品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生肖俑、骆驼俑、胡人牵马俑、男女侍俑。随葬品中的瓷器以日用品为主，有盘口壶、罐、钵、碗、盒等。

第三期：唐宪宗至唐亡。墓葬砖室墓和土坑墓为主，小型墓数量较多。平面形制除长方形、凸字形、腰鼓形外，新出现了蝉形和船形墓葬，除个别墓葬还保留有耳室和壁龛之外，墓葬结构更趋向于简约。一些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员的墓葬也是如此。如扬州大都督府曹参军韦署墓，其长度也仅3.5米。墓葬趋于简约反映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情形。砖室墓的随葬品常见的金属器有铜镜、银镯、铜钱等；瓷器的形制和窑口更加丰富，有盘口壶、罐、瓶、执壶、碗、盘、唾盂、粉盒等。土坑墓除土坑木棺外，还有一种形制简单的平民墓，这些墓葬之内在人骨架周围甚至无法找到墓穴，随葬品极少甚至一无所有。

7. 广东地区

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如韶关、英德、连江、广州、佛山、博罗等地。广东隋唐墓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其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本地区南朝以来的墓葬一脉相承。土坑墓均为长方形墓，一般为就地挖成的窄小长方形竖穴墓坑，

①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墓底有的置数块残砖作为葬具的支垫；砖室墓则有单室、双室之分，而以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单室墓一般为平面长方形的券顶墓，墓底铺砖，墓室后部高于前部，后部设置有棺床，棺木纵置。左右后三壁有的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随葬品摆放在墓室前部及后端。有的墓砖侧面还模印出网纹、叶脉状纹、卷草纹、纪年铭文、吉祥语等。双室券顶砖墓，由两个单室墓并列而成，二者共用一道隔墙，隔墙上设有通道将二墓沟通。墓砖有长方砖、刀形砖、弧形砖三种，分别用来砌筑墙壁和券顶。左右后三壁有的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有的的墓砖的侧面还模印出网纹、叶状纹等图案装饰。随葬品都不多，一般只有两三件，以釉陶四耳或六耳罐、碗、盏、坛等较为常见，陶坛多出于沿海，瓷器少见。个别墓葬出土少量陶俑。1987 年，在广州唐墓中首次发现马、骆驼和人俑等 3 件三彩器，改写了以往两广地区不出三彩器的历史①。

张九龄墓和张九皋墓，是广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砖室墓，形制也与其他墓葬不同。以张九龄墓为例，为带耳室的大型单室砖墓，由甬道、耳室和主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及耳室券顶，主室为四角攒尖式顶。主室近方形，长 4.82、宽 4.8、高 3.5 米，四壁厚度倍于常墓，且于四角砖砌三角形假柱。主室及甬道壁面涂抹白灰，绘有彩色壁画。棺床砖砌而成，平面呈长方形，设于主室中央。随葬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同一地区的其他墓葬，这与张九龄的“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的特殊身份相符合。

从出土墓志和墓砖上的纪年铭文来看，广东地区隋唐墓形制前后没有明显区别，但其随葬品仍然有一定规律可循。据随葬器物中的四耳罐或六耳罐、碗、盏等的形制变化，可将该区墓葬分为前、中、后三期②。

前期，大约相当于隋代至唐中宗时期。罐类器物体形修长，肩部圆鼓，中腹以下急剧收缩，底部向外撇出，具有较浓厚的南朝器物遗风。碗类有深腹碗、浅腹碗。前者器壁近直，饼形足；后者器壁上部稍外侈。盏也为深腹，壁较直。

中期，大约相当于开元天宝及以后的时期。罐类逐步变矮，高度与宽度即高宽比约略相等，底部外撇的现象消失。碗类口部日渐敞开，腹部越来越浅，饼形足器减少，圈足器增多。

后期，大约相当于宣宗大中前后。罐类更加矮胖，其横宽甚至超过了器物高度。近海地区的晚唐墓中，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原地区墓葬中常见的塔式罐那样的器物——魂瓶，也称为陶坛。前、中期陶坛火候不高，釉层附着不牢，后期则近于瓷器。这种陶坛中发现有死者的骨灰，为探讨两广地区的火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

①《广州首次发现出土三彩俑》，《广州日报》1987 年 10 月 5 日。

②段鹏琦：《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8. 福建地区

主要指闽江下游的闽侯、福清，晋江流域的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九龙江流域的漳浦等地发现的墓葬。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种，以砖室墓居多。砖室墓通常为带短甬道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还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龛。墓砖侧面常印植物纹和吉祥语等，如铜钱纹、蕉叶纹、叶脉纹、卷草文等，还有骑射、立射、舞蹈、奏乐人物等。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器形为盘口壶、五盅盘、带座碗、双耳或四耳罐、鐎斗、各类插器、虎子等。其中五盅盘、插器等是富有地区特征的器物。漳浦刘坂乡唐墓出土陶俑 40 多件，是此区唐墓中少见的现象。砖室墓随葬品较为丰富，少者十几件，多者数十件。土坑墓随葬品甚少，一般只有三几件。

据随葬的器物盘口壶、双耳罐、四耳罐、带座碗、插器、虎子等的形制变化，将该区墓葬分为四期。第一期墓约当隋至唐初，第二期墓、第三期墓约从初唐至盛唐（或稍后），第四期墓似已属晚唐时期。因无纪年资料可供参考，这四期墓葬的具体年代不易确定①。

器物的演变规律为：盘口壶和四耳罐，早期器身浑圆，略显矮胖，后来器身逐渐增高，器身最宽处逐渐上移，到最晚一期移至肩部。双耳罐，时间较早者，器体浑圆，平底，时间较晚者器体最宽处升至肩部，底部急收成“高足”。带座碗，最初碗与托分别烧制，使用时将二者吻合在一起，托较平较大，二期以后，碗与座粘合后烘烧，座（托）的直径相对缩小，但高度不断增高。插器，一期造型秀丽，底座大如盘，二期以后器体越来越粗矮，盘形座日益缩小，甚至消失。瓷注子是第四期新出现的器物。

9. 新疆地区

唐王朝的势力进入新疆地区是在唐代初年，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高昌。灭高昌后，建立西域都护府。后来吐蕃进入新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对新疆一带的控制减弱。1959 年以来，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 13 次发掘，清理了西晋、麴氏高昌和唐墓 400 多座，其主要研究成果以发掘简报和专题研究的形式发表。新疆地区发现的唐墓，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也即西州时期②。

墓葬以土洞墓为主，墓道为长斜坡和阶梯式，主室平面出现弧形，并向圆形演变，同时出现前后室墓、带甬道墓及刀形墓。有的在墓道上开凿天井，有的在甬道两侧开凿壁龛。墓室顶部有圆形、纵券顶、横券顶、平顶和盝顶。较大型墓

①段鹏琦：《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穆舜英、王明哲、王炳华：《建国以来新疆的主要收获》，《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葬地面有不太显著的封土，主要用黄土和卵石稍加夯实而成。长安以后的墓葬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如在张氏茔地出土木框联屏绢画3组，分别绘乐舞、牧马、贵妇弈棋等，画风与中原唐墓毫无二致。

随葬品中此前流行的黑衣陶明器减少，流行素面灰陶，且火候降低甚至不加焙烧，器形主要有罐、盘、杯、灯、盂、碗等。各种泥塑彩绘陶俑如天王、武士、文吏、女侍、百戏、镇墓兽等明显增加，大都是草芯、泥胎，外施彩绘。随葬品中有绘有伏羲女娲的绢画。墓志普遍采用砖志，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如左憧憙墓志，为方形，长35、宽34、厚4厘米，志文为楷书，阴刻方形界格，每格一字[①]。从墓志形制、行文方式等来看，与西安地区发现的墓志已无大的差异。以大量的麻、毛、丝织品随葬是这一地区唐墓的一个特点，其中的绢、锦纹饰有联珠天马骑士纹、鹿纹、双人纹、猴头纹、小联珠对鸭纹、红地团花纹、彩条纹、龟甲"王"字纹、对鸟对兽纹、猪头纹、棋纹等，它们的产地主要为中原、西域和中亚。出土的麻布不少有墨书题款，写有缴纳麻布的年月、州县、纳布人姓名等，对了解唐代的租庸调制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木质明器较多，有木建筑明器（殿堂、亭子、假山、房屋）、盘、罐、碗、梳、鸡、鸭、猪等，个别木罐、盘上涂黑地、绘红花。钱币有"开元通宝"、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还有不少面点，如饺子、糕点和馕等。比较珍贵的是，有些唐墓中出土的纸质明器使用的是一些废弃文书，对于研究当时的籍账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就葬俗而言，采用聚族而葬的方式，在茔区内用砾石筑出界限。茔区一般由一二座或三五座墓组成，四周绕浅沟，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0米左右，一边留有神道。以合葬为主，尸体的安置主要采用筑台陈尸的方式，死者口中多含钱币。尸体穿纸鞋、戴纸帽，头部还普遍遮盖织物覆面。还有招魂合葬的习俗，一般用草人代替死者。如在64TAM24主室内葬有一具女尸，其身边有一外缝麻布的草人，大小与成人躯体相当，应是夫亡而尸体无存而采取的招魂合葬的习俗[②]。也有火葬者，如在64TAM34中发现骨灰[③]。

参考文献：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段鹏琦：《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段鹏琦：《隋唐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徐殿奎：《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①张荫才：《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文物》1973年第10期。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第三节　渤海、南诏和吐蕃遗迹

一、渤海遗迹

经过调查和发掘的主要有城址和墓葬。

1. 城址

城址中较重要的有渤海前期都城旧国城（今吉林敦化敖东城）、渤海后期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东京龙原府城（今吉林珲春八连城）、中京显德府城（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及黑龙江东宁城子古城，该城形制与上京龙泉府相似，被认为是渤海率宾府辖下的一座州城。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是最重要的渤海城址，也是唯一经过科学勘察和发掘的渤海都城遗址。它和内地隋唐城址一样，也是封闭式城市，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共设 11 座城门。外郭城用石块掺土夯筑而成，东墙长 3358.5、南墙长 4586、西墙长 3398、北墙长 4946 米。城外有护城壕。宫城居全城北部中央，平面形状呈规整的长方形。四面宫墙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块砌筑而成。东墙和西墙均长 720 米，南墙和北墙均长 620 米。在宫城的东、西、北三面，有禁苑等附属设施。这些附属设施除借用宫墙之外，另筑有围墙，形成宫城的外围。外围东面长 900、南面长 1050、西面长 940、北面长 1096 米。在宫城禁苑之东，有一个南北长 780、东西宽 500 米的长方形区域，四面筑围墙，可能是离宫或者高级贵族的宅邸区。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平面呈横长方形，东面长 447、南面长 1045、西面长 454、北面长 1050 米。其中东、西、南三面围墙已经被夷为平地，北墙保存较好，以石块砌筑而成，同于宫城围墙。在皇城东区的东北部发现了官署遗址。宫城前为"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外郭城之内由南北大街 5 条和东西大街 4 条构成规整的里坊区。西半城有 41 个坊，东半城坊的遗迹保存较差。坊皆作长方形，四面筑坊墙，坊墙里外两侧以石块砌筑，中间部分填土筑城。坊墙东西长 465~530 米，基本相似或接近，南北宽度有两种：一为 350~370 米，一为 235~265 米。坊的内部又以墙垣将全坊分成若干部分或若干院落。城内街道宽度有 100、92、78、65、28~34 米等 5 种规格，所有街道均为土筑。在城内和城外发现 9 座寺院遗址，其中城内 7 座，分布于各坊之内。

2. 墓葬

渤海墓葬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海兰江及绥芬河流域。现

已调查、发掘的渤海墓，集中于吉林敦化敖东城和黑龙江宁安东京城附近。较重要的有吉林敦化六顶山墓群，黑龙江海林山嘴子墓群，海林北站西山及头道河子的三处墓地，宁安大牡丹屯、三灵（陵）屯和大朱屯渤海墓，以及吉林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延边和龙县渤海贞孝公主墓。已发掘的六顶山渤海墓和山嘴子渤海墓可以作为渤海前、后两期墓葬的代表。

渤海墓沿袭高句丽的传统，以石块和石板为主要建筑材料，地面上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和盖顶。大型墓则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以石板或青砖砌墓壁，也用石板盖顶。葬具用木棺。墓内除一次葬人架外，常于墓室一隅堆放数个以至十数个个体的散乱人骨，后者应是二次葬的骨殖。随葬品通常只有一至数件陶器和铜铁质带具，少数墓葬有小件鎏金或金质装饰品。前、后期墓葬形制无大区别，富于时代特征的器物是陶器。前期墓所出陶器作灰褐色或黑褐色，火候较低；后期墓出土的陶器作灰色，火候甚高。山嘴子墓群还出土唐三彩式绿釉陶器。

吉林和龙河南屯发现的两座渤海贵族墓，出土颇具唐代风格的金银饰品多件；渤海文王女贞惠公主墓出土石狮、贞孝公主墓的人物壁画，都有浓厚的唐代艺术风格；两墓所出汉文墓碑，以遒劲楷书书写，碑文完全是模仿唐代碑志文体，表现了渤海文化同唐文化的密切联系。

1991 年，在黑龙江宁安三陵找到了渤海王陵的埋葬区。从发掘的 2 号、4 号墓来看，渤海王陵为大型石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顶部为结构为抹角叠涩藻井。墓道填土中埋葬有陶兽头和兽足、铁镞、蚌壳和陶盆等物品。在甬道两侧、墓室四壁和顶部绘制壁画，题材内容分为花卉和人物图案两大类，人物图案均为女性。采用合葬方式，墓室之内发现 10 余具人骨骼。出土遗物有三彩器等①。

二、南诏遗迹

1. 南诏城址

据唐人樊绰《蛮书》记载，当时南诏城镇约 70 余座。经过考古调查刻确认者不多。比较重要的有大理市境内的太和城、阳苴咩城、龙口城、龙尾城、三阳城、大厘城，洱源县境内的德源城（邓川城）、三营古城，巍山县境内的古城村古城、巄岏山城，弥渡县境内的白崖城，腾冲县境内的西山坝城，昆明境内的拓东城（今昆明）。其中以太和城和阳苴咩城最为有名。太和城遗址在今大理城南 8 公里的太和村西，是皮逻阁至异牟寻迁都（779）前的南诏首府；阳苴咩城，在今大理城西的梅溪南岸，是自异牟寻迁都以后的南诏首府。其他诸城，或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如白崖城），或为供卫首府的要塞和堡垒（如龙口城、龙尾城、邓川城）。

①干志耿：《黑龙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南诏城址大多分布在山顶或山坡上，只有少数建于平地，其军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一般面积不大，城墙的修筑往往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势。位于山坡者城墙走向多依山势，并将墙外山坡削为直壁；位于平地者，常临溪河而建，以溪河为天堑。建筑方法和建筑材料都有一些与内地唐代建筑相近之处，如城墙以夯土筑成，建筑物下筑一大型夯土台基；使用莲花纹瓦当、卷云纹滴水等等。

经过考古勘探、实测的城址仅 2 座：太和城和西山坝城。太和城夯筑而成，面积 3 平方公里；西山坝城位于西山山麓缓坡地带，由内外两重城组成，城墙夯筑而成，内城呈方形，周长 860 米，面积 4.6 平方米。外城面积 25 万余平方米。城中道路最宽者 20 米，路面铺设火山石。

2. 南诏、大理窑址

在大理市下关苗圃山发现 18 座陶窑，均为在土山坡上挖洞筑窑室，由挡火墙、火膛、窑室、烟道、分烟孔等几部分组成，窑室之外有排水沟。从出土的砖瓦来看，不少上面模印有文字，与南诏、大理时期城址、房屋建筑遗址中出土者相同，有的上面有“官”字字样，说明这里可能是官窑[①]。为了解当时的烧制砖瓦的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3. 南诏、大理火葬墓

据《蛮书》记载：“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说明南诏盛行火葬。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等地火葬墓的发现，为文献记载找到了证据。八塔台共发现 304 座火葬墓，墓坑均为竖穴土坑，多圆形，亦有椭圆形、长方形。葬具一般多用陶罐。其中的Ⅰ型罐敛口、双腹，罐盖有塔刹形钮，罐下置须弥座形器座，整体形如塔。Ⅱ型罐与Ⅰ型基本相同，一般无座，腹部外凸，下部饰浮雕莲瓣纹。两型陶罐之内多置一小罐，未烧化的人骨大部分放在小罐中。人骨多点朱，或朱书梵文，骨骼之下置海贝、料珠、铜片、纺织品等。外罐之内则放置长方形铁片、稻谷及少量骨骼。这两型陶罐的时代属于南诏、大理时期[②]。

三、吐蕃遗迹

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吐蕃遗迹主要有赞普墓，还有一些其他遗迹如查拉路甫石窟寺等，遗物主要有《唐蕃会盟碑》等。这里着重介绍吐蕃赞普墓。

吐蕃时期（相当于唐代）的赞普墓，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宗山（穷结宗山）对面的山麓上，占地面积约 1 万平米左右，陵区内约有夯筑土冢 20 座，而不是以前所说的 16 座。有的赞普墓前石狮、纪功碑尚存，墓前和墓顶发现有建筑遗迹。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赞普陵墓分为东西两区即木惹陵区和东嘎口陵区。西陵区的

①王大道：《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②王大道：《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清理简报》，《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

陵墓共计有13座，半数以上规模较大，保存状况好于东区，但多数曾遭盗掘。如1号陵，位于琼结河边，是整个陵区中位置最北的一座，海拔3891米。封土堆底部平面接近方形，整体呈覆斗形，封土顶长95、宽67米，封土底部长130、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东陵区位于西陵区的东北方向约1公里处，共有陵墓7座，主要埋葬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先君先王和意外死亡的赞普、王子。封土堆保存情况较差，多数已经被盗掘，封土堆中央还保留有盗坑遗迹，有的陵墓封土大半已被掘平。与西陵区相比较，东陵区陵墓规模小，封土堆低矮。多数陵墓修建在东嘎沟的河床上，洪水冲刷也使得陵墓遭到很大破坏。东陵区的陵墓从分布范围来看，排列不整齐，间距不等，有的分布集中，有的则较为分散。经过调查的20座赞普墓的封土堆依底部平面可以分为方形和梯形两种，整体呈覆斗形，以前所说的圆形陵墓并不存在。较大规模的封土堆底部边长在100米以上，高出地面约10米以上。封土堆以土石分层夯筑，在侧面可以明显看到夯层①。

据研究，赞普墓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势，诸墓左右排列，冢前列石狮、纪功碑等石刻，有可能是受了汉人葬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六）》，《文物》1961年第4、5期。

段鹏琦《隋唐考古》、宿白《藏王墓》，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第四节　瓷器与瓷窑遗址

一、概况

隋代建立了统一政权，促使经济发展，瓷器生产在手工业经济中也日趋重要。从隋墓中出土的瓷器看，数量、品种都较前丰富，有青、白、白釉彩绘等釉色的精美瓷器。隋代烧制瓷器的窑址在河北、河南、江苏宜兴、安徽寿县、江西丰城、江西临川、福建福州、四川成都、邛崃等地均有发现。在南方有些地区如浙江上虞、余姚、宁波等县，窑址密布达几百处，自东汉或三国就始烧青瓷，延续至唐五代或宋，盛烧不衰，隋代也应继续烧制。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瓷器手工业又由于唐王朝为铸钱而禁用铜器及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瓷茶具的需要量增加，加上对外贸易中瓷器占重要地位等国内外的

①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各种因素，而得到充分的发展。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生产青瓷，北方生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称。此外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①、绞胎瓷器②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青瓷最为有名的越州窑，在唐代有了更大发展，瓷场迅速扩展，新窑大量涌现，窑址遍布浙江上虞、余姚、宁波一带。它的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最大窑场。与越窑齐名的生产白瓷的是邢窑，邢窑址在河北临城县。晚唐勃兴并取代邢窑成为白瓷著名产地的曲阳定窑在河北曲阳县。其余南北各地生产青、白瓷的窑址大都兼烧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巩县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密县西关窑、郏县黑虎洞窑、黄道窑烧白瓷又烧黄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寿州窑由烧青瓷改为烧黄釉瓷，陕西铜川黄堡窑兼烧青釉和黑釉瓷而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长沙窑是以烧青瓷为主的窑，约在中唐以前出现了釉下彩，其源头可追溯至东晋时期的湘阴窑，这一创新打破了青瓷色调单一的局面，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

隋唐北方地区仍用圆窑、椭圆形窑或马蹄形窑，南方地区仍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为主。窑具除原已使用的锯齿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圆形垫饼外，普遍使用匣钵。匣钵的使用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对隋唐时期瓷器的研究，着重在于探讨形制、装饰、釉色诸方面的特点及工艺水平。有学者以西安地区有纪年唐墓中出土的瓷器为标准，将唐代瓷器分为三期。

第一期：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青瓷占绝大多数，白瓷较少，且有的白瓷与青瓷的界限还不十分清楚。青瓷以越窑的产品为最佳，而白瓷有些还不易与青瓷区别开来。施釉比较草率，釉质较厚，且不均匀，往往出现流釉现象。常见凤首壶、龙柄壶、高足盘、四耳罐等较大型器物，小型实用器物较少。装饰手法主要有刻划、模印、贴塑、捏塑等。纹饰主要有凸棱、绳纹、弦纹、连珠、流云、忍冬、莲瓣、动物、人物等。器物通常为平底或附加圆饼状实足。

第二期：唐中宗至唐代宗时期。青、白瓷数量都在增大，白瓷质量有所提高，黑釉、黄釉、酱釉及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丰富，且有内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种瓷器施釉比较仔细，釉色较为纯正，出现了绞釉、绞胎瓷和彩釉瓷器。大型器物渐少，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增多。器底普遍加圆饼状实足或浅圈足。线刻、划花、彩绘等是常见的装饰手法，主要纹饰为莲瓣、宝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简洁洗练。

第三期：唐德宗至哀帝时期。青、白瓷和各种釉色的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现。施釉技术更高，普遍使用了护胎釉，彩釉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①花釉瓷器：又名花瓷，是在釉面上点染彩色斑纹的瓷器，唐代创烧，其要址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如河南鲁山段店窑烧造的花釉腰鼓等。产品主要有腰鼓（也称拍鼓）、执壶、四系罐、瓶、钵等。

②绞胎瓷器：是用白褐两种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胎上即具有白褐相间的类似木纹的纹理。这种纹理变化多端，上釉焙烧即成绞胎瓷器。

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实际生活用器形制多种多样，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产。装饰手法中，墨画、彩斑、釉下彩绘占突出的地位，纹样有花卉、禽鸟、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绘图案等。

二、瓷窑遗址

隋唐瓷窑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经过调查或发掘的窑址就有数十处。这一时期，北方的制瓷业有了较大发展。隋代窑址已发现数处，唐代的制瓷业更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许多著名瓷窑，说明其发展迅速。器物造型和装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规模和烧造地域都不断扩大。

（一）北方地区的瓷窑遗址

1. 安阳隋代瓷窑

安阳隋代瓷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安阳桥附近，北临洹河，也称相州窑。窑址南北长 350、东西宽约 260 米，面积达 9 万平方米。1974 年发现并由河南省博物馆和安阳地区文化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出土了一批瓷器和窑具[①]。2006 年 8~12 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发掘面积 383 平方米，发现灰坑、灰沟、水井等遗迹，出土瓷器 900 余件[②]。发现的窑炉上大底小，略呈圆形，内径约 1 米，窑壁用耐火土建成，厚 0.15 米，残迹高 1.1 米。窑具均用耐火土制成，其中支烧具数量最多，形制复杂，有齿形、三岔形、筒形以及托环、支棒、垫环、垫饼、圈状支具等，说明其烧造技术已经相当先进。瓷器主要有碗、高足盘、高足杯、四系罐、钵形器、刻花壶形器、刻花瓶、器盖等，还发现有男侍俑、武士俑、文吏俑和骆驼等瓷塑，以及碓、房屋等各种明器，用于装饰明器的装饰品也有发现。器胎较厚，胎体致密，胎质较为细腻，胎色灰白，烧结程度较高。器物表里施釉，器表施釉不到底，施釉一般薄而均匀，流釉现象不甚显著。釉色以青釉为主，白釉次之，其中的青釉呈青色透明玻璃质，光泽较强，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青灰、青褐色等。因系叠烧，内底都留有支烧痕迹。同时，也没有发现匣钵之类的窑具，因此，无论是青瓷还是白瓷，均为裸烧而成。有些瓷器上还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装饰，纹饰题材以莲花瓣纹居多，也有忍冬纹、卷叶纹、草叶纹、水波纹等。

在河南安阳地区的北朝至隋墓之中，出土了一些青瓷器，由于在造型、胎质、釉色以及装饰风格上与南方青瓷有较大区别，因而被称为“北方青瓷”。安阳隋代相州青瓷窑的发现，证明了所谓“北方青瓷”至少有一部分是安阳窑的产品。该窑址发现的白瓷，有些器形还保留有北齐风格，为探讨早期白瓷的起源问题提供

①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 年第 2 期。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2006）》。

了重要珍贵资料。

2. 邢窑

隋唐时期的邢窑分为两个阶段即隋代和唐代，这一点已为近年来的发掘所证明。

（1）隋代邢窑

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以北、临城县双井村以南地段，包括邢台市区、内丘县、临城县、隆尧县等。主要分布于内丘县冯唐村、宋村以北，临城县祁村、双井村以南，内丘县西丘村以东，隆尧县双牌村以西的一条狭长地带。总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其中以内丘西关一带瓷窑最为集中，烧制的瓷器质量最佳。

邢台隋代邢窑遗址出土的器物按釉色分为三大类：白釉瓷、黑釉瓷、黄釉瓷，其中白釉瓷占七成以上。器类有碗、钵、壶、瓶、盂、罐、高足盘、瓦、高足尖顶桃形器等。其中碗、杯类器物占全部出土物的 90%以上。碗、杯多斜直深腹，饼状足，口壁尖薄而下腹部及底足厚重，底足均削棱一周，饼足略有内凹，通体挺拔秀气。

产品以圆形器物为主。成型方法以轮制拉坯为主，辅助以捏制、粘接、旋削等技法。器物足、肩、口重点部位的加工都有固定程式，极为严谨。碗、杯、钵类产品是用轮制拉坯方法一次成型，半干时再对器物表面旋削修整。盘口壶、高足盘及各种带系的瓶、罐类产品，则是用轮制拉坯方法分段成型，然后再将各段粘接起来，等半干时再对外表施行修整。三系罐类器物肩部粘贴上去的桥形系，为双泥条合为一体，上端挤压在口沿下，下端双泥条叉开附贴于肩部，形成三孔鼎立的桥形系。

釉层玻璃质感强，釉面开细小纹片较为普遍。黄釉瓷器流釉现象较为突出，杯、碗口沿处由于釉汁下垂，显出浅淡色调。黑釉多呈棕红色，釉面光洁少有暗淡者，施釉方法基本上是蘸釉，对于平底器，如钵、小罐，由于外部没有捉拿的地方，故器物外壁采用刷釉的办法，内部则辅助以荡釉。小罐器形较小，一般施釉较薄，少有积釉和流釉现象，但器物外壁多留有刷釉过程中釉点飞溅出釉区的痕迹。大型钵类产品施釉较厚，外壁釉层多为重复施釉，表现出明显的垂釉泪痕。一般施釉之前，在设计好的釉区内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但所见的所有黑釉瓷器均不施化妆土，直接施釉于器物胎体上。高足盘仅见白釉与黄釉两种，化妆土仅施在盘体内外，盘底与足部未施，直接罩釉。瓦类仅见黑釉一类，采用蘸釉技法施釉。先将整个器物蘸满黑色釉汁，然后再将釉区以外的釉刮去。板瓦因使用在建筑上的位置不同，瓦面上施釉的部位也有变化。

发掘出土的窑具有使用时倒置的蘑菇状窑柱、口杯状窑柱、筒形匣钵、三叉形支架、四齿形支架、齿形垫具及垫圈等。

（2）唐代邢窑

遗址位于今河北内丘境内。内丘在唐武德五年由赵州改隶邢州，唐代瓷窑均

以州命名，故称“邢窑”。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唐代已见记载。李肇《国史补》云：“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陆羽《茶经》赞颂“邢瓷类银”、“邢瓷类雪”。1980年8月，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首先在与内丘交界的临城县发现了多处唐代白瓷窑址，因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最具邢窑特征，故以为这就是“邢窑”。后又据《国史补》记载，在内丘境内广泛进行了调查，又发现邢窑遗址20余处。可知邢窑当位于太行山东麓，广泛散布在内丘县冯唐村、宋村以北，临城县祁村、双井村以南，内丘县西丘以东，隆尧县双碑以西的狭长地带，整个面积约300余平方公里。调查证明，内丘县城关一带的白瓷窑最为集中，器物质量也最高。上述遗址分布地区，除烧制白瓷，还烧青、黑、黄釉等产品，而白瓷中又有粗、精之分，其中粗白瓷居多。《茶经》所赞只是其中精品。邢窑产品以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为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托子、瓶、壶、罐等。碗最具代表性，大多浅式、敞口、碗身呈45度角外撇，口沿往往凸起一道唇边，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微微闪青。内丘城关邢窑遗址出土的白瓷玉璧形碗底中心往往刻划一个“盈”字。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带有划花以及点彩装饰的白瓷标本。粗白瓷亦以各式碗为多。此外，还有壶、长方枕等。唐代后期，邢窑由于原料短缺等原因而式微。邢窑白瓷不仅广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在埃及福斯塔、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以及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都有出土。

3. 定窑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曲阳县城北30公里处的涧滋村，是北方的名窑。通过最新的发掘成果，定窑始烧于初唐时期[①]，修正了以前始于晚唐的说法，中唐已经相当发达，直到元代仍继续烧造。

早期定窑烧白瓷，釉料含铁和钛，以木材为原料，在还原气氛中以1300度的高温烧成，釉色白中闪青，白度高，还有一定的透明性。还烧制黄釉、黄绿釉瓷器。五代时的定窑与晚唐时期的邢窑基本相同。窑具和烧制方法继承了邢窑的工艺技术，有漏斗形匣钵和桶状匣钵，三叉形支钉、椭圆形支圈及圆形垫饼。器物造型也与邢窑相似。器物成型以拉坯为主，一般胎薄细腻，制作精巧。碗为平底或玉璧底无釉，采用一钵一件的支烧法，器体与窑具之间有石英沙粒隔垫。五代定窑使用支圈更间隔装在匣钵内覆烧，有的器物口部不挂釉，称芒口，同时器物外壁也产生了不美观的落灰。仿制金银器的碗、盘、杯，制作出三角形、四方、五方、椭圆形、折腰等形状的器物，除了圈足之外，采用内模压印方法。器物装饰比较简单，有花瓣、瓜棱、叶状等。

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新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五代窑炉形制为马蹄形，长6.5、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坑三部分组成，烟囱呈长方形，窑室方形，火坑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成，以泥涂抹砖面。火坑内有木炭屑，推测用木柴为原料。

五代是定窑的重要发展阶段，根据调查结果，这个时期的生产规模和烧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提高。从五代层中发现的遗物来看，不但白瓷的比重有了显著增加，黄釉、黄绿釉等粗瓷产品基本淘汰，而且器物造型逐渐多样化，也开始出现了题材简单但线条洗练的划花和剔花纹饰，以及圈足满釉、口沿露胎的覆烧器物。这说明五代时期的定窑处于上承晚唐，下启北宋大发展的过渡时期。

4. 黄堡窑

唐代黄堡窑遗址位于陕西铜川和耀县交界的黄堡镇附近的漆水河两岸。20世纪90年代，发掘面积已达11500平方米[①]，展现了原料配备、成型、修坯、装饰、施釉、晾干、装烧和成品等制瓷工序的全过程。

作坊遗址8座，除1座是露天作坊外，其余均为窑洞式建筑。分布在漆水河岸边，其用途各不相同，有的用作原料的制备，有的用作器物成型，有的用作施釉，有的用作存放坯泥料。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可以据其分析产品分工和瓷器烧造组织、生产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窑炉按其形制分为马蹄形、葫芦形，前者为半倒焰式窑，后者为横焰窑。马蹄形窑由窑门、燃烧室、窑室和烟囱组成。窑门至燃烧室、燃烧室底部呈斜坡状。窑室平面呈扇状。两窑的结构基本相同，为馒头形半倒焰窑，体积较大。以木柴为燃料。葫芦形窑前、后室均为圆形，以耐火砖砌筑而成。前、后室之间有火道相连。烟囱在后室的后部，呈椭圆形。窑的规模较小，结构比较原始，实际上属于横焰窑，只能小批量生产，或者进行产品试烧。窑门前有一处砖砌的操作场地。窑具有匣钵、耐火架板、支烧具、垫烧具。器物烧造时都是正烧，分为叠装、套装、单件装。

产品以青瓷为主，也烧白瓷、黑瓷，器物有餐具、酒具、茶具、照明具、化妆具、文房用具、药具、净瓶等。器物多玉璧底。青瓷胎较粗，呈灰色或灰白色，釉色呈泛白、泛回、泛黄的较多。也有透明度较好的青瓷，颜色也比较纯正。装饰有刻花、贴花、印花。白瓷的釉色纯白者较少，泛黄、泛灰者较多。黑瓷胎较厚重，釉色漆黑闪亮。还烧造黄瓷、茶末釉瓷、黑釉刻花添白瓷、花釉瓷、白釉绿彩瓷、白釉褐彩瓷、青釉白彩瓷、青釉褐彩瓷、素胎黑花瓷，种类十分丰富。瓷器上有许多题刻文字，内容包括姓名、器物编号、扎烧时的火位标记、年款、吉祥语等。姓名近20个，如“张缜自造”等等。年款有“大中”、“元和”、“咸通七年三月”等。根据题记和器物特征，唐代产品主要属于9世纪即中晚唐时期。

器物成型主要有轮制、模制和捏塑三种。圆形器物多采用轮制，一般在转盘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上拉坯成型，如碗、盘、钵、盆等。所用转盘皆木质，转盘和立轴的连接部分已经出现专用的生铁铸件和耐磨的瓷质构件。模制的器物主要有俑、狮子、骆驼、马、双鱼瓶等。模分为两半，人物多为前后模制，动物多为左右模制。铃铛则采用上下合模。器物的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绘花等。釉色主要有青釉、白釉、黑釉、黄釉、茶末釉等。施釉前一般先上一层化妆土，蘸釉法和涂釉法兼用，釉色有单彩、多彩、釉上彩、釉下彩等。装烧从盛唐时期开始，一律采用桶形匣钵装烧，大型器物往往采用 2 件匣钵相扣装烧，有些大型器物内还套烧小件器物，充分利用了匣钵内空间。窑具除匣钵外，还有三叉形支垫。

装饰纹样有几何纹、植物纹、人物纹和动物纹等。几何纹有三角纹、弦纹、方块纹、斜格纹、辐射纹、圆圈纹、圆点纹、串珠纹、五曲纹、六曲纹、七曲纹、连环纹等。植物纹有树木纹、折枝花纹、朵花纹、卷草纹等。人物纹比较少见，仅有一幅婴戏图。动物纹有龙、狮、牛等瑞兽；鸾鸟、凤凰、仙鹤、鸭等禽类；蝴蝶、飞蛾等昆虫；鱼、龟等水族。

（二）南方地区的瓷窑遗址

1. 越窑

越窑遗址位于浙江上林湖滨海地区，在这一带发现有 30 余处窑址。早在东汉至东晋这里就烧造青瓷，隋唐五代至北宋初盛烧，这里即唐人陆羽《茶经》中记载的越窑。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器形有碗、壶、瓶、罐、钵、盒、盘等，釉色以青黄为主，光泽晶莹，至五代以后，又有青灰、青绿等色。唐初造型端整，胎体偏厚重，色灰白或浅灰，如注子、天鸡壶、凤头壶、双柄龙首壶、唾盂等，一般器物素面无纹。到后期则胎薄质细、火候高，纹饰渐趋繁缛。装饰手法以划、印为主，兼有刻、雕、镂等技法；线条由粗向细发展，系仿金银器、漆器上的装饰技法；纹饰题材以花卉为主，组成图案形，填以花草虫鱼、鸟兽人物等。在上虞、慈豁、宁波、鄞县、奉化、象山、临海等地的青瓷窑产品与上林湖窑产品很相似，应属于越窑系青瓷窑址。在一些 7 世纪后半叶至 9 世纪末期的纪年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对越窑址的盛烧时代、器形、纹饰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的秘色瓷，大约从宋代开始就变得模糊不清，此后则愈来愈莫衷一是。这种称呼根据宋人的解释是因吴越国钱氏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清代人评论"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但往往都因为文献记载欠详，秘色瓷究竟为何种瓷器，长期以来未有圆满答案。在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曾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1987 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了一批秘色瓷，才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为研究秘色瓷提供了标准器物。同时，由于法门寺塔基地宫封闭于咸通十五年（874），表明秘色瓷的烧造时间至迟也在唐咸通年间，而不是五代时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

少量青黄釉，并出现了银釦加金银饰，说明年代较早的秘色瓷既包括青绿釉，也包括青黄釉在内。器型有瓶、碗、盘、碟等。瓶为八棱形，小口，细长颈，颈与肩转折处装饰三道弦纹，矮圈足。碗均为五花瓣口，分浅形和深形两种。浅形平底内凹，底部留有一周支钉烧痕。深形碗圈足外撇。盘也为五花瓣形，平底内凹，底部留有一周支钉烧痕。另外还有2件漆平脱银釦秘色瓷碗。这些器物制作精美，以青绿釉为主，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所描述的釉色相同。

秘色瓷的秘色虽然是指一种绿色，但秘色瓷绝不能单纯从釉色划分。因为青瓷的烧制往往是同窑不同色，这是由于釉的呈色除原料因素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窑内火焰的不同与变化，而火焰控制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青瓷釉色或深或浅，或淡或浓，不足为奇。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和文献的记载，秘色瓷从广义上而言，就是指越窑青瓷；从狭义上而言，应当是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所以，浙江地区唐五代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除少数青绿色釉的器物可以确定为秘色瓷外，多数青黄色釉的器物也应当属于这个范畴。当然，两种釉色相比，还是以青绿色为上，因此，才有诗人用"千峰翠色"的诗句来形容。唐代越窑青瓷是当时各地青瓷之冠，秘色瓷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根据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唐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实为越窑烧造的贡瓷，是宫廷专用品。

但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越窑的窑工们利用密封的匣钵，烧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产品，他们为这种新产品起名为"秘色"，它既有青绿之色，又有珍奇、隐秘、神秘之意。以为窑工们只看到利用匣钵能使产品变得漂亮，但无从知道为何变得如此神奇，所以，"秘色"是当时窑工们的最朴素的想法，也可能最接近事实。

秘色瓷从本身意义上来说并不神秘，仅是因为使用了匣钵之后，使烧出的青瓷与以往大不相同，其本身则平常而又普通，并不是许多学者想像中的那样，是由一个或几个窑场生产，专门用来进贡的。秘色瓷仅是一个名称，是商品的牌号，它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出现的。在最初，秘色瓷是转指使用匣钵烧造出来的越窑产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则变成了青瓷的代名词，以至于出现了高丽秘色、耀州秘色等称谓。可见，秘色瓷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名牌产品，瓷件修坯精细，釉面莹润，烧成优良。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就以当时人的审美标准，并从饮茶的角度对各地的茶碗进行了评价，将越窑排在了诸青瓷名窑之首，此后的古代文献中时有赞美越窑的记载。如皮日休《茶瓯》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云："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五代时期的吴越国诸王，为了维系王室命脉，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生产秘色瓷以进贡中原王朝，而且越来越精巧。另一方面，经济需求也是越窑发展的一大动力。政治与经济的共同追求，使越窑大量生产秘色瓷，而秘色器的生产使越窑走上了独步宇内的地位。

2. 岳州窑

岳州窑址位于湖南湘阴县城内，主要散布于堤垸一带。堆积最厚处约4米，早

在两晋、南朝时已烧制青瓷，隋唐之际盛烧。产品以碗、杯、盘、壶、罐等器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装饰技法有印、划、点彩、雕塑等，纹饰以莲花、卷草、几何印纹居多，还有人物、鸳鸯、龙头、象首等纹。窑具以匣钵最多，支垫、器托、墩子等也有发现。岳州窑大量使用匣钵，说明烧造工艺已较进步，釉下彩绘的出现是装饰技法上的进步。但与越窑产品比较，其胎釉稍粗糙，纹饰也较简单。

3. 长沙窑

长沙窑也称铜官窑，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从铜官镇至石渚湖约5公里的范围之内，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以上。窑炉为斜坡长条形龙窑，长约40米。窑炉附近有制陶作坊。

在窑址中出土各类瓷器数千件，产品数量和种类较多，据统计达40余种，100多个式样规格，器形有壶、瓶、罐、坛、钵、洗、盂、杯、碗、盏、背壶、盒、香炉、烛台、唾盂、碾槽、炉、器座、镇纸、碟、盘等，而以壶、碗、盘为主。另外还有大量的鸟、狗、猪、象、羊、狮、蛙、鹅、马、牛、龙、凤、鸡等瓷塑动物。胎色灰白，质细腻，外饰护胎釉，再施青或白釉，釉下施黄、褐、绿色彩绘。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以前被认为是我国釉下彩瓷的首创，但最新的发现表明，其源头可追溯至东晋时期的湘阴窑。釉下彩与印、贴、刻、划、剔、雕塑、镂空等技法结合，在瓷器上组成繁缛的纹饰或题字。釉下彩主要是褐、黄、绿诸色；彩绘题材广泛，有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人物、树木、宝塔、云气、山水以及斑点、斑块、山峦形和缨络式图案等，笔法简练，色彩鲜明，画面生动。模印堆贴花是长沙窑瓷装饰手法的另一特色，有双鱼、人物、狮、舞乐、宝塔、葡萄、葵花、荷花、龙、蝴蝶、双鸟等图案，并在贴花处加上褐色斑块，以增强装饰效果。以诗词和谚语作为瓷器装饰，是长沙窑瓷的又一特点。多以褐彩书写在壶的腹部，有五言绝句、六言诗、联句、单句和谚语、成语、俗语、款识、纪年或广告性的文字等。从瓷器上的姓氏文字可知长沙窑的作坊主有张、卞、郑、庞、陈、李、赵、何等姓，他们生产的产品有所分工，每个窑址大都烧造不同的瓷器产品。从窑址中发现的纪年器，如“元和三年”的罐耳陶模，“大中九年”的双系瓜棱形壶腹，“口（咸）通十四年”的罐口沿残片，由此推测长沙窑的生产始于中唐，衰落于五代后期。

4. 寿州窑

寿州窑址位于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幸福乡，距寿县县城约40公里，窑址延续约4公里。寿州窑窑床呈圆形，早在六朝时即烧青瓷，隋唐时盛烧。除青釉外，主要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搅釉瓷等。窑具有匣钵，器物胎色呈白、绛红、灰白、青灰等，质粗细不一。器形有碗、杯、钵、注子等日用器及炉、枕、玩具等。在安徽省肖县、浙江东阳、广东潮安等地也发现生产黄釉瓷的唐代窑址，有的可能是

受寿州窑影响或仿制的[①]。

5. 洪州窑

1979 年，对江西丰城罗湖地区窑址进行了发掘[②]。通过这一发掘，基本解决了洪州窑的所在地问题。据研究，罗湖窑即洪州窑[③]。窑址面积达 15000 余平方米，堆积厚达 6 米。早在东汉晚期已经烧造出成熟的青瓷，东晋、南朝时期逐渐进入兴盛期并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晚唐五代时期衰落，前后烧造长达 800 余年。器形有碗、杯、盅、高足盘、钵等。特别是在南朝早期地层中发现了芒口碗，将芒口碗的烧造历史从定窑的晚唐时期，提前到南朝早期。釉色呈浅青微黄，还有酱褐或黄褐色的盏、多系罐；除莲瓣纹外，碗口沿印一圈圆涡纹是其特征。在南朝早期开始使用匣钵，而且至迟在隋代之时洪州窑已开始烧造玲珑瓷[④]。在江西地区唐墓中出土的器物，与窑址所出相同。

6. 邛窑

邛窑址位于四川省邛崃县的固驿、什方堂、尖山子等地，始烧于南朝，唐代盛烧与长沙窑产品相似的青釉褐绿彩器。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等外，有一种环形板托，此种窑具仅见于四川发现的唐宋瓷窑。唐代常见的器形有碗、盘、杯、碟、壶、罐、钵等，为其主要产品，还有大量动物玩具等瓷塑。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除在青釉下施褐绿、黄、蓝等彩外，无其他装饰。类似产品在成都青羊宫、华阳、灌县的唐代窑址也有发现。

7. 西村窑

西村窑址位于广州市的西北，距广州市中心 5 公里，窑址的中心地名皇帝冈。创烧于晚唐，盛于五代至北宋。窑床为斜坡长条形，长 35 米左右。窑具有圆筒形、漏斗形匣钵及垫饼、垫环等。并发现大批制瓷工具，如印花范模、铜匕、瓷杈、牙盆、乳钵 乳杵及砚 碟等。产品胎质细腻，为白色瓷土，釉色以青为主，并有绿、黑 酱 黄等釉色，质光润。器形以盘、碗等为主，还有碟、杯 瓶 罐、壶、盒、小盂、枕、盏、小罐等，共发现十五种。纹饰技法有刻、印、划、彩绘等，花纹以花卉、草叶、 云纹为主。青釉划黑花瓷器，釉色光润，纹饰苍劲有力，是此窑特有的产品，远稍东南亚国家。

---

①胡悦谦：《谈寿州瓷窑》，《考古》1988 年第 8 期。

②江西省历史博物馆、丰城县文物陈列室：《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③余家栋：《试析洪州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江西丰城洪州窑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 年第 2 期。

④玲珑瓷：是在未干的坯胎上设计图案，然后镂出米粒形状的通孔，用特制的釉填满，并施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瓷器。烧成后，镂空处明彻透亮而不洞穿。

8. 瓯窑

瓯窑不见于唐宋文献记载，但其制瓷成就远远超过婺州、洪州窑。其窑场主要分布在温州、永嘉、瑞安等地。其中窑场最为密集的是瓯江北岸的永嘉灶岩头到大坦坟山一带和温州的西山。唐代早中期的瓯瓷呈黄或淡黄色，釉易剥离。晚唐前后出现纯粹的青色或青黄色，滋润如玉，胎釉结合紧密，极少有剥釉现象。胎呈灰白或淡灰色，釉层匀净。产品种类与越窑大体相同，惟器型略有差异。如唐代的撇口璧形底碗，腹壁作45度倾斜，较越窑为高。晚唐时期的碗、盘、壶、盏托等造型，以模仿花果造型为主。

参考文献：

李德金：《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隋代邢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

第五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遗物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是唐代三彩陶器的简称，以器表装饰绚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属彩色低温铅釉陶，一般用白色粘土作胎，用含铁、铜、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着色剂，并在釉里加入大量炼铅熔渣和铅灰作助熔剂，经过大约800℃的温度烧制而成。釉面呈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颜色，但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胎质有红色陶胎和白色陶胎两类，前者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后者则用瓷土烧成，烧成温度约800~1100℃，比瓷器略低。制作时，先在1100℃高温下进行素烧，然后取出挂釉，再以800℃的火焰复烧。由于复烧时的温度比素烧时的温度低，所以一般不易变形。

唐三彩的制作可以分为6个程序：（1）选料。三彩器非常注重造型和釉色，因此对于胎料的选择不精，胎质中含有石英颗粒等杂质。（2）成型。用模型或轮制及捏塑粘接的方法成型，为遮掩胎质粗糙的缺陷，突出釉色，往往成型后再罩化妆土。（3）素烧。将阴干的坯胎用1100℃左右烧成。（4）挂釉。按照事前设计的图案调配釉料上釉。（5）低温烧釉。各色釉药在800℃的烧造过程中，釉汁熔融流

动相互浸润形成斑斓的色彩。（6）开相。在不着釉的俑头部以朱涂唇，以墨画出眉毛、眼睛、髭须、头发等，以增强陶俑形态的神韵。

据对洛阳唐三彩标本所作的科学分析，器物所施黄、绿、褐、蓝、黑等彩釉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二氧化钛、三氧化二铁、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和氧化铅。氧化铜在黄釉外的各种色釉中普遍存在。蓝釉中，除上述化学成分外，还含有氧化锑、氧化钴。唐三彩的各种美丽釉色，正是利用不同金属呈色剂的特点及控制同一金属呈色剂的不同含量而获得的。

实际上，在20世纪以前的有关文献中，很少见到唐三彩的记载。唐三彩也不是由专家学者给起的学名，而是在古董收藏者中间叫开的。1899年开始修筑陇海铁路，当工程修到洛阳附近时，毁损了一批古代墓葬，从这些墓葬里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唐三彩。它们被运到北京后，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和一些古董商、外国人的重视，于是，唐三彩之名蜚声于文物界①。

现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凤墓。唐三彩工艺在盛唐达到了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扬州一带则有兴起的趋势。迄今所见三彩器包括专供丧葬用的各种俑类、模型器和生活用器在内，绝大多数出自墓葬，遗址中少见，且多为碎片。出土数量最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区是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其次为扬州，其他如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虽有出土但数量不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小黄冶和白河窑，登封曲河窑，密县西关窑；陕西耀县耀州窑；河北内丘邢窑等均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的窑址。此外，近年来，在唐长安城醴泉坊、东市遗址也发现了三彩窑址。

二、唐代金银器皿

金银器皿制造，在唐代是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主要出自窖藏、佛教寺院的塔基地宫和墓葬之中，而以前两者为主。种类多样，可以分为四大类：（1）餐饮具：碗、杯、匜、铛、盘、茶托、瓮、壶、箸、勺、茶具（茶碾、茶罗、茶笼）等。（2）装饰品：钗、笄、簪、臂钏、戒指、带具等。（3）佛教用具：棺椁、函、锡仗、香炉、香宝子、阏伽瓶、如意、莲花等。（4）杂类：筹筒、酒令旗、唾壶、香囊、盒等。科学鉴定表明，唐代制造金银器皿已经综合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鍱、刻凿等工艺，而且各项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齐东方将唐代金银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8世纪中叶以前，第二期为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第三期为9世纪②。

第一期属于唐高祖至唐玄宗前期，是唐代金银器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受外

①梅健鹰、李武英：《唐三彩》，《文物》1979年第2期；齐东方：《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来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主要器类为高足杯、带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和折腹碗，蛤形银盒也较为常见，还有壶、锅、铛、瓶等。其中的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等器物在中国的传统器物中不见，应当是受东罗马、萨珊朝波斯以及粟特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盘、盒类器物以圆形为主，也有一些呈菱花形，少量为葵花形。壶类器物多三足。纹饰盛行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花纹纤细茂密，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流行珍珠纹（也称鱼子纹）地，即在器物表面用圆筒状錾刀錾刻出细密的小圆圈，排列整齐，作为主要纹饰的底衬。还流行宝相花、卷云纹、云曲纹等，这类纹样多与器物的形制有关，即纹样的样式与器体造型相适应，宝相花一般装饰在圆形器物之上，卷云纹和云曲纹多作为边饰。器物的体积小，但比较厚重。绝大多数器物采用捶鍱工艺制成，器表一般先捶出凸凹变化的纹样轮廓，然后再錾刻花纹，许多银器通体鎏金。

第二期属于唐玄宗后期，是唐代金银器的成熟时期，已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过程。高足杯、带把杯、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式壶，葵花形盘流行各种器皿的平面多呈四曲或五曲形。忍冬纹、葡萄纹、三角纹、绳索纹、卷云纹、云曲纹基本消失。宝相花仍可见到，折枝纹、团花纹兴盛。纹样更为写实，分单元布局，留出更多的空白，显得疏朗大方。少数器物尚残留与西方金银器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直接来自西方金银器的影响，而是继承第一期器物的特点，并有所发展。器物的形制和纹样多为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创新之作。

第三期属于唐宪宗至于唐末，是唐代金银器的普及和多样化时期。器物种类大增，目前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的茶具、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蒲篮、温器、筹筒、龟盒、支架等，均属于这一时期。碗、盘、盒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流行花口浅腹斜壁碗、四曲或五曲花形带圈足银盒、葵花形盘等。折枝纹、团花纹继续流行，并更加丰富多彩。折枝纹种类繁多，并以阔叶大花为特点。鸳鸯、鹦鹉、鸿雁、双鱼等成为人们喜爱的题材，同时出现荷叶、绶带纹、叶瓣纹、小花纹、半花纹为主要边饰纹样。纹样自由随意，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珍珠地纹小而浅，也比较稀疏。大型器物较多，但有些器物轻薄粗糙，錾刻的纹样清浅断续，刻铭器物增多。

三、隋唐铜镜

隋唐时期的铜镜，特别是唐代铜镜，在形制上突破了以前单一的圆形，新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方形等多种形制。纹饰装饰多样化，而且更加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装饰纹样可以分为：四神十二生肖、瑞兽、瑞兽葡萄、瑞兽鸾鸟、禽鸟、花枝、神仙人物、卐字、八卦、龙等（图三八）。在隋唐时期的铜镜还有一些使用金银平脱、螺钿、嵌银等工艺装饰铜镜，使用这种工艺装饰的铜

镜，人们称之为特种工艺镜。有关隋唐铜镜的分期，以徐殿奎、孔祥星的意见为代表。

孔祥星将隋唐代铜镜分作三期[1]。第一期为隋至唐高宗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第二期武则天至德宗以前，此期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又分作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以圆形、菱花形镜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纹样过渡。后段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葵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第三期为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镜、卍字镜和瑞花镜，亚字形和圆形镜盛行，主题纹饰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镜形和纹饰，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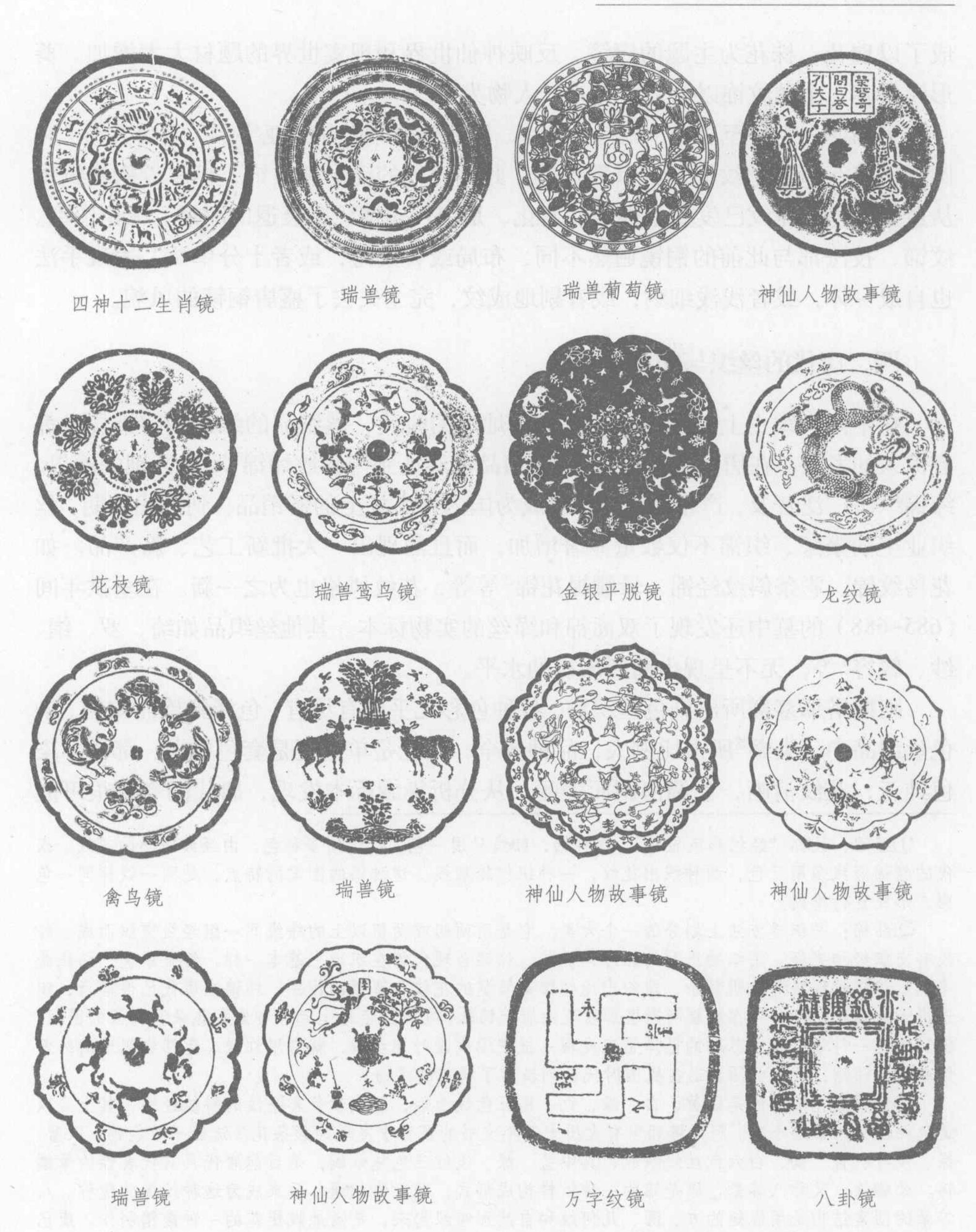
徐殿奎根据偃师杏园纪年唐墓中出土的铜镜，对隋唐铜镜进行分期编年，将隋唐铜镜分为四期[2]。

第一期为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这一时期铜镜的特点有二，一是沿袭传统因素较多。如流行圆形镜形，布局拘束谨严，分区配置花纹，"规矩配置"和纽外大方格，柿蒂纹或连珠纹纽座，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铭文带及善颂善铸的内容等，而这些都是汉代以来铜镜中常见的因素。二是各类铜镜共性多。三类铜镜主题纹饰虽然不同，但镜型、布局、纽座、铭文、边缘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演变趋势也一致，较早多为规矩配置，柿蒂纹和联珠纹纽座，吉祥语铭文带。较晚为绕纽配置，花瓣和素圆纽座，外区变化突出，有的还有铭文带，但有的铭文带已被葡萄蔓枝、卷草所代替。随着内区布局的开阔，瑞兽镜的兽形、四神镜的四神变得丰腴柔健，生动活泼，连团花镜的团花也由紧密而逐渐松散，团花镜较少。

第二期为武则天至玄宗开元末。主要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这一时期的铜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瑞兽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飞禽花枝逐渐居于主要地位。这三类铜镜的主题纹饰分别以瑞兽为主、瑞兽鸾鸟并重、飞禽花枝为主，而且无论内区外区的葡萄蔓枝、蔓茎花草、飞禽蜂蝶都不断增加。此期以分作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以圆形、菱花形镜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纹样过渡。后段流行鸾鸟荷花镜、盘龙镜、飞仙镜、弦纹抛光镜以及银壳金黄色花镜等。

第三期为唐玄宗天宝时期至德宗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盘龙镜。纹饰、形制多样，题材广泛，风格各异，各类铜镜共性较少，是唐代铜镜迅速变化的时期。鸾鸟纹居于主要地位，隋、唐初的瑞兽形态完全消失，四神十二生肖虽然还在流行，但整个形态发生了变化。植物纹摆脱了附属配置的地位，形

①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徐殿奎：《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四神十二生肖镜
瑞兽镜
瑞兽葡萄镜
神仙人物故事镜
花枝镜
瑞兽鸾鸟镜
金银平脱镜
龙纹镜
禽鸟镜
瑞兽镜
神仙人物故事镜
神仙人物故事镜
瑞兽镜
神仙人物故事镜
万字纹镜
八卦镜

图三八 隋唐铜镜

成了以瑞花、株花为主题的唐镜。反映神仙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题材大大增加。葵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

第四期为宪宗至唐亡。流行八卦镜、卍字镜和瑞花镜，亚字形（委角方形）和圆形镜盛行，主题纹饰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镜形和纹饰，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唐代铜镜急剧衰退的时期。无论造型、纹饰、技法都与此前的铜镜迥然不同，布局或者繁缛，或者十分单调，表现手法也自成一体，或者浅浅细刻，或者剔地成纹，完全失去了盛唐铜镜的风貌。

四、唐代的丝织与印染

在中国丝织史上，唐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丝织品的织造和印染技术都有惊人的发展。在唐以前，传统经锦[①]精品已经达到与斜纹纬锦[②]不易区别的境界，纬锦织法广泛普及，产量激增，已经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品。到唐代中期，丝织业空前繁荣，织锦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工艺、新产品。如花鸟纹锦、彩条斜纹经锦、晕繝提花锦[③]等等，花纹风格也为之一新。在垂拱年间（685~688）的墓中还发现了双面锦和绛丝的实物标本。其他丝织品如绮、罗、绢、纱、轻容[④]等，无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平。

阿斯塔那墓群所出染色丝织物，各种色彩几乎应有尽有，色泽鲜艳而均匀。染色丝织品中，染缬[⑤]所占比例大，品种齐全，无论是单色还是套色染缬，都做了染色纯正，花纹清晰，色调协调而美丽。从分析染缬标本发现，唐代的染缬很可能

①经锦：又称“经丝彩色显花”。这种锦，纬线只用一色，经线用多种色，由经线织物的花纹。汉代的经锦经线多用三色，两种织出花纹，一种织作轮廓线。这种锦的图案的特点，是同一纹样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

②纬锦：是织造方法上划分的一个大类。它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而成。经线有交织经和夹经。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纬锦与现代锦在织造上基本一样，经是单色，纬线是多色。织机较经线起花机复杂，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的花纹和宽幅的作品。纬锦在唐代已很盛行，织造得十分精致。1969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唐代锦袜，在大红色地上起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的图案，就属于这一种锦。在前苏联的巴泽雷克发现一批中国战国时期丝绸，就有用红绿二色纬线织造的纬斜纹起花的纬锦，证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创造出了精美的纬锦。

③晕繝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繝，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繝锦。晕繝锦，又称八答晕，原是锦的一种纹样构成形式，即八路相通，后来成为这种纹锦的代称。八答晕的图案结构是用规矩的方、圆、几何纹和自然形组织起来，是满地规矩花的一种最精制作。唐已开始生产，称为大繝锦、晕繝锦。宋称八答晕。两宋这种纹饰进一步发展，变化较多，当时有八花晕、银勾晕、大小晕繝等锦纹。配色富丽，如建筑画晕，在《营造法式》所举材料资料中可以见到。元代称八搭晕。

④轻容：无花薄纱。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王建《宫词》有“嫌罗不著爱轻容”之句。

⑤染缬：即古代丝绸印染。唐代在印染技术上已很成熟。中唐以后穿用染缬品成为社会风尚。在唐代传世的绘画作品如周舫《簪花仕花图》、张萱《捣练图》以及一些唐三彩俑和郭煌唐代壁画中，都可见到染缬品的广泛应用。元代《碎金》一书，记载了九种染缬名目，即檀缬、蜀缬、撮缬、锦缬、茧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此外还有鱼儿缬、玛瑙缬、团窠缬。

已经使用了纸质镂空花板。

五、货币与度量衡

（一）货币

隋唐时期铸造的货币有五铢、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隋统一后，仍铸造五铢钱，但其边郭较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重要转折点。此后，铜钱上不再标明重量单位铢、两等，而代之以“通宝”、“元宝”之类的名称。

1. 隋五铢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堪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隋五铢，圆形方孔，背面有郭，宽边，“五”字交笔较直，特别是“五”字的左边与方孔相连处有一竖笔，是隋以前的五铢所没有的。“铢”字的金字旁上面作三角形。标准的隋代五铢钱，直径 2.5 厘米，重 3.4 克，每千枚重四斤二两。小型的直径 2.3 厘米，重 2.3 克。隋五铢的发行结束了南北朝货币的混乱，对于当时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唐开元通宝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极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有学者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开元通宝，对其进行了分期，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①]。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至玄宗开元时期，即 7 世纪前期~8 世纪中叶为第一阶段。主要流行唐武德四年（621）开始铸造的“开元通宝”。这是一种优质货币，主要特征是：钱文深峻清晰，轮廓十分规整，铜质纯净，铸造精良。钱径 2.4~2.5、孔径 0.7、郭宽 0.2 厘米，重 4.5 克左右。这种铸造考究、模范一致的开元通宝钱，其铸造时期均在初唐时期。开字间架结构均呈三撇状。宝字瘦小，下边的贝部之

①徐殿奎：《试论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 年第 6 期。

内为两短横，不与左右两竖笔相连接。通字的走字边不是断开的四点，而是连在一起似水波，收笔之时向左上勾。甬部的字头扁，上笔开口较大，字也较瘦。高宗武则天时期，个别钱币在文字上发生细微变化，如“通”字的走字边前三笔略显顿折。还有一种“开元通宝”，钱背有一直画隆起。唐高宗麟德元年（664）陕西礼泉郑仁泰出土 1 枚，故有这种直画痕的钱币始铸期不会晚于高宗时期，而且流行时间很长。高宗时期，还出现一种钱径 2.2~2.3、郭宽 0.15~0.2 厘米、重约 3 克的“开元通宝”。此种开元小钱，不但钱文笔法和字体风格模仿初唐货币，而且正面钱文尚清晰，背部穿郭近平，但铜质差，容易锈蚀。很可能是高宗武则天时期民间私铸的一种开元通宝钱，数量不多。

唐玄宗天宝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即 8 世纪中期至 9 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流通月痕开元通宝，即钱背有一月形隆起，形似指甲痕。月痕开元通宝的元字首横加长。通字的走字边前三笔呈似连非连的顿折状，甬部上笔开口较扁，整个字体显得比前期瘦长。宝字下边的贝部内中间两横加长，与左右两竖笔衔接，贝上的尔字部呈三竖道。月痕开元通宝在字体上已经失去端庄、匀称。钱径 2.4~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郭宽 0.2 厘米，重 4 克左右。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月痕开元通宝的铸造年代当在天宝初期。据《唐会要》卷八十九引郑虔《会粹》云：“（欧阳）询初进蜡样，自文德皇后掐一甲痕，故钱上有掐纹。”此说早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否定。还有一种小径月痕开元通宝，钱径 2.3~2.35、穿径 0.65、郭宽 0.15~0.25 厘米，应当是民间模仿官铸产品而私铸的钱币。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至唐亡（907）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请以铜像、钟、磬、炉、铎接归巡院，……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于是，在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下令各州郡自行铸钱，钱背加铸州名及钱监名。“益”（四川）、“京”（京兆府）、“洛”（洛阳）、“昌”（年号“会昌”的省称，扬州节度使李绅铸）、“蓝”（蓝田）、“襄”（襄州）、“荆”（江陵）、“越”（越州）、“宣”（宣州）、“洪”（江西）、“潭”（湖南）、“兖”（兖州）、“润”（润州）、“鄂”（湖北）、“平”（平州）、“兴”（兴元府）、“梁”（梁州）、“广”（广州）、“梓”（东川）、“福”（福州）、“丹”（丹州）、“桂”（郴州桂杨监）、“淮”（淮南道扬州）、“永”（江南道永州）、“并”（并州）等。大小轻重不一，一般径在 2.3 厘米，重 3.4~3.5 克。

唐高宗时铸乾封泉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封二年（666），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唐肃宗时铸乾元重宝。据《旧唐书·食货志》：“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以一当三，乾元重棱小钱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以一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

限。”又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在考古发掘中，乾元重宝比较少见，可能与文献所记载的原因有关。

除铜钱之外，还发现了金、银、鎏金开元通宝。如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 30 枚金质开元通宝，421 枚银质开元通宝；河南偃师杏园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景由墓中出土 2 枚银质开元通宝；洛阳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墓中还发现 20 枚鎏金开元通宝。这类钱币一般不作为流通货币，可能是用来赏赐或有其他特殊用途。合背开元通宝（即面背均铸钱文的开元通宝）在西安何家村窖藏中也有发现，属于特殊例子。

除以上各类主要货币之外，据《新唐书·食货志四》：“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扬州市东风砖瓦厂唐墓中出土 1 枚得壹元宝，钱文为旋读，字体与开元通宝相似。直径 3.6、穿径 0.8 厘米，背面铸仰月痕①。唐末还铸造过“咸和通宝”。这些钱币的流行时间较短，发现数量也少。

3. 五代货币

五代时期各地自行铸币，先后铸造的货币多达 30 多种。后周铸造有周元通宝，《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记载：“（世宗）即位之年（955），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毁天下铜佛以铸钱。”钱文为“周元通宝”，直读，郭阔，铸造工整。钱径 2.4~2.5 厘米，重 3.5~3.6 克。背多有月纹或星月纹。除此而外，后梁曾铸“开平元宝”“开平通宝”；后唐曾铸“天成元宝”；后晋曾铸“天福元宝”、“助国元宝”、“壮国元宝”；后汉曾铸“汉元通宝”；前蜀曾铸“永平元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南唐曾铸“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后蜀曾铸铁钱；南汉曾铸铅钱；楚曾铸铅、铁钱；刘仁恭在幽州除铸铁钱“永安一百”、“永安一千”之外，还以胶泥制钱。闽国曾铸“开元通宝”，有大小钱，大钱用铜、铅、铁铸，钱文书体兼真隶；小钱用铜、铅铸造。大铁钱径 4 厘米，重 28.1 克，背穿上铸巨星纹，或铸“闽”字，下有仰月纹。大铜钱径 4 厘米，重 22.5 克，背穿上铸巨星纹。小铅钱径 2.3 厘米，重约 25 克，背上穿铸“闽”字。闽钱尚有“永隆通宝”、“天德通宝”、“天德重宝”，均为大钱，铁铸或铜铸。

（二）度量衡

隋代以北朝旧制统一度量衡，唐承隋制，每尺长约 30 厘米。根据《唐六典》卷六十六记载，唐代的度量衡分大小二制，小尺一尺二寸为一大尺（合今 29.6 厘米），三小斗为一大斗，三小两为一大两（合今 40 克）。官民日常用大制，调钟律、

---

①张南、周长源：《扬州市东风砖瓦厂唐墓出土的文物》，《考古》1982 年第 3 期。

测晷之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用小制。又据《唐律疏议·杂律》规定，每年的八月校正斛斗秤度，加盖印署后方准使用。凡不按规定进行校正、使用和私造不合格度量衡器具的，都要受到惩处。唐代宫廷常以镂刻十分精美的各种牙尺、木画紫檀尺赠送给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节，流传至今的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的唐代拨镂牙尺。一般铜、铁尺也都刻有各式花纹。民间日常所用为木、竹尺，十分简陋，仅刻有寸的分度线，不用圆圈为尺星，与魏晋尺的形制明显有别。

唐代规定，所铸“开元通宝”钱，每二枚重二铢四絫，十枚重一两。此后，便把两以下的单位叫做钱，十钱为一两。经过唐宋两代，两、钱、分、厘十进位制逐渐取代了铢（24铢为1两）、絫（10絫为1铢）的非十进位制。

参考文献：

国家计量局主编：《中国度量衡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徐殿奎：《试论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
徐殿奎：《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丘光明编著：《中国古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六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隋唐时期，佛道两种宗教都非常活跃。中国南北各地现仍保存的石窟寺，大多包括隋唐时期的洞窟。各地还有大量的隋唐寺院遗址。1949年以来，对石窟寺已经进行了不少调查和研究，经过全面调查和发掘的寺院遗址有唐长安青龙寺、西明寺遗址和渤海上京的两三处寺院遗址。从对这些寺院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一时期的寺院布局已经趋向于多元化，而以多重院落式的布局为主。

关于隋唐时期道教遗迹的调查工作，目前还不够充分，但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如调查了河北龙兴观是唐代北方著名的道观，发掘了西安临潼华清宫老君殿遗址①，调查了四川剑阁鹤鸣山道教石刻②。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道教遗物，主要是一些道教金铜造像。

一、石窟寺

1. 敦煌石窟

隋唐时期为莫高窟的全盛期，现存隋唐洞窟300多个，占洞窟总数60%以上。

①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骆希哲：《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②剑阁县文管所、母学勇：《四川剑阁鹤鸣山道教石刻》，《文物》1991年第2期。

这一时期的典型窟形是平面呈方形的覆斗顶窟。隋代这种窟内正壁一龛的形式虽仍流行，但已出现南、西、北三壁各凿一龛的形式。龛体加深，龛下沿的位置较前代升高。龛口、龛顶近于长方形，龛内平面有的呈凸字形。唐代的龛形有所变化，前期平面多作梯形，龛顶上仰，龛口向左右敞开，便于展示龛内塑像。后期平面作横长方形、盝形顶。龛内有低坛，坛上置塑像。唐前期出现的大像窟高在 30 米以上，其后室平面近于方形，靠正壁为一身石胎泥塑的大倚坐像，像两侧和后部凿出供绕行巡礼的隧道。甬道上方凿出 2~3 个采光的大明窗。前室原建有窟檐式的多层木构建筑。唐后期出现的新窟形，一是方形平面的覆斗顶窟。壁面不凿佛龛，在窟内中部设置方形佛坛，佛坛后部有通连窟顶的背屏，塑像置于佛坛上。二是大卧佛窟。平面为横长方形，盝形顶，后部凿出通窟宽的涅槃台，其上塑涅槃像。唐代洞窟有的在甬道两侧或前室加凿小的耳室。

隋唐塑像风格由于政治的统一而与中原地区更趋一致，塑造形体和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技巧进一步提高，题材内容增多，并出现了前代不见的高大塑像。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为一铺的组合。个别洞窟在塑像组合上增加了二力士、四天王像。此外还出现一佛二菩萨为一组的立像或三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等新题材。隋代塑像面型方圆，体形健壮，较为写实，腿部一般较短。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七身一铺或九身一铺的组合。此外还有七佛像、供养菩萨像和高僧像等。建于武周延载二年（695）的第 96 窟“北大像”，高 33 米。建于开元年间的第 130 窟“南大像”，高 26 米。唐大历十一年（776）营建的第 148 窟，主尊涅槃像长约 15 米，像后站 72 身弟子像，各呈悲容，神态不一，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组彩塑群像。

隋唐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人物造型、敷彩晕染和线描技巧，都达到空前的水平。隋代壁画正值北朝向唐代过渡阶段，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题材外，新出现了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画面一般较小，内容也较简单。唐代壁画的主要题材，是多种经变画，前后期在题材和布局上又有所不同。前期的内容有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一般是每壁一幅经变，同一窟内的题材种类不多。后期经变画种类增多，新出现了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密严经变、楞伽经变、楞严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多种经变汇于一窟，是后期的一个特点。此外还有与经变画相配合的屏风画、佛教感应故事画、瑞像图以及历史人物画等。唐代还出现了如意轮观音、不空羂索观音等密宗题材壁画。供养人像在北朝为数寸小像，到唐代变为二三尺乃至等身高的巨像，且多占据甬道两壁或窟内显著位置，这是耐人寻味的变化。唐后期第 156 窟的张议潮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两幅画中表现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和夫人出行的情景。在横幅长卷式壁画上，仪仗、音乐、舞蹈、随

从护卫等人物分段布满画面，组成浩浩荡荡的出行行列，开创了莫高窟在佛窟内绘制为个人歌功颂德壁画的先例，以后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榆林窟的慕容氏出行图都受到它的影响。唐前期壁画中净土内容的经变画占很大比重，是往生净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反映。后期经变画种类繁多，正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各有所崇的写照。

五代、宋时期，张氏家族统治敦煌之后，在920年前后，敦煌地区的军政大权落入曹议金之手，至1036年西夏占据敦煌，曹氏家族统治敦煌地区100余年，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将近100个。这一时期除新开凿的一些大型洞窟外，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面，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位于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塑像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第61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像，是仅有的一例，塑像虽已毁，但残迹尚存。壁画题材也多沿袭唐代。引人注目的是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图高近5、长13.5米，通贯全壁，面积达6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图中概括了河北道镇州经五台山至太原数百里内的山川地形、城镇，画有城廓、寺庙、桥梁、亭阁、店铺、草庐等各式建筑170多处，并描绘了各种人物的活动场面，生活气息强烈。供养人像更趋高大，一般都在2米以上。第98窟的供养像最为高大，约近3米。曹氏家族统治时期，对莫高窟崩毁崖面进行了整修，绘制了大面积的露天壁画，同时还加修了部分洞窟的木构窟檐和栈道；在位于下层的第55、61、98、100窟等大型洞窟前建有木构殿堂建筑，可以想见当时莫高窟外观的壮观程度。

西夏、元时期，西夏和元代统治敦煌的300多年间，莫高窟的修建、重修活动一直延续未断。西夏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很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銮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元代洞窟数量很少，第465窟规模较大，有前后两室，平面皆作方形，覆斗形顶。后室中部有一圆形佛坛。第3窟为平面方形、正壁开一龛的覆斗顶小窟。塑像均残毁无存。西夏壁画中新题材很少，但在构图和敷彩上却有特点。壁画中供养菩萨行列变得高大，多占据甬道或壁面下部的显著位置。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构图锐意简化，有的几乎与千佛像难以区分。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都过于程式化，显得呆滞缺少生气。色彩多用大面积的绿色为底色，用土红色勾线，整个画面色调偏冷。壁画中较多地使用沥粉堆金手法，这是前代所少见的。莫高窟有77个洞窟的全窟或大部分壁面，在西夏时被重绘壁画，因而遗存的西夏壁画数量十分可观。第465、3窟的壁画，代表了元代两种不同风格的绘画。第465窟的后室四壁和窟顶布满密宗曼荼罗和明王像。四壁下部画有织布、养鸡、牧牛、制陶、驯虎、制革、踏碓等进行各种操作的人物画60多幅。每幅画的左或右上角都贴有小纸条，其上有墨书榜题，上部写藏文音译汉字，下

部写汉文意译名称。壁画内容、构图形式、人物形象以及敷色、线描等，都与当时的汉族画风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和阴森、神秘的情调。此窟有可能是藏族匠师根据藏文佛典，运用藏族绘画技法绘制的。第3窟建于元至正年间，西壁有甘州画师史小玉的墨书题记，壁画以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为主。壁面以细而刚劲的铁线勾描人物形体，用兰叶描和折芦描表现衣纹和飘带的转折顿错，线描技巧造诣很高。第61窟甬道两壁西夏末、元初重画的炽盛光佛和黄道十二宫星象图，是莫高窟壁画中仅见的题材。

莫高窟窟前建筑遗址的发掘，是配合莫高窟加固工程而展开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窟前先后发现五代、宋、西夏、元等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址20多处。遗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砖包台基殿堂建筑遗址，均位于洞窟前面，后部与洞窟连通，前有踏步。殿堂西壁利用窟外崖壁建成，南北两侧夯筑山墙，前墙中部设门，地面铺花砖。这类建筑遗址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另一种是土石基结构的遗址，一般结构均较简单，规模较小，没有台基，也不铺花砖。窟前建筑遗址上原有建筑物，绝大部分和五代至元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前后相连，成为前殿后窟的形式。发掘中还发现了北魏刺绣、唐代绢幡、文书、印本佛像、残碑、塑绘工具和彩绘漆器等重要文物。

2.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的山崖间，这里青山对峙，伊水北流，犹如天然门阙，故称“伊阙”。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494）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仍有续凿。据统计，在南北长约1公里的东、西山上，现有窟龛2100多个，佛像10万余尊，碑文题记3600多品，佛塔40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唐代造像几乎占三分之二。唐代是造像开窟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题材内容丰富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造像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太宗~高宗时期。为初唐造像形式的探索和确立期。这一时期开凿的大窟主要有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后来开凿的潜溪寺。石窟多具前后室，前室为券顶，后室为马蹄形，穹隆顶，莲花藻井。造像列于后壁，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天王）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天王、力士多为浮雕。立像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多数为纪年佛龛。佛装主要为双领下垂式大衣，其次为通肩衣。菩萨戴宝冠，袒上身或着内衣，斜披络腋，中间结带，帔帛横过胸腹之间两道。佛座以低圆覆莲座和束腰八角座为主。造像身躯挺直，少曲线。龛像题材基本与大窟造像相同，阿弥陀佛增多，释迦佛减少；倚坐佛装弥勒佛增加多，已无交脚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比例也增多。永徽六年（655）出现“优填王像”。龛像组合主要为一佛二菩萨和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宾阳南洞正壁5尊大像是魏王李泰为亡母长孙氏做功德而建造，完工于贞观十五年（641）。主尊阿弥陀佛面相方圆，眉高、眼大、唇厚，颈上有三环纹，身

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偏衫，胸下束带，衣纹用圆线条表示，结跏趺坐于叠涩束腰方形台座上，袈裟衣纹披覆于台座前，中间部分呈同心圆状。二菩萨头戴高宝冠，额际露出发纹，面相方圆，颈部也有三环纹，身体直立，胸腹部较平，颈系项圈，身挂粗大的璎珞和帔帛，下穿长裙，裙角垂于圆莲座上。这些都是典型的初唐造像。

潜溪寺在龙门西山北部，洞高9.3、宽9.5、深6.7米。穹隆顶，莲花藻井，主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本尊阿弥陀佛身裹褒衣博带式袈裟，袒胸结跏趺坐于叠涩须弥方座上，面部饱满，静穆自若。立于覆莲束腰座上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胁侍菩萨是唐代龙门石窟大型菩萨造像中最为优美者。护法天王身披铠甲，足踏夜叉，造型威武雄壮。

第二期：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的形成时期，约自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这一期是龙门石窟开窟造像和艺术成就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有纪年的大中型窟龛较多，其中以上元二年（675）完工的奉先寺卢舍那像摩崖龛，咸亨四年（673）完工的惠简洞，永隆元年（680）完成的万佛洞以及东山大万五千佛龛、万佛沟高平郡王洞为代表。西山摩崖三窟、极南洞和东山看经寺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

这一时期窟龛的基本形制基本上为前室平顶，后室为抹角方形圆顶。周壁凿出坛床，布置列像，不再是后壁列像。一铺九尊像的组合较多，主像占据的位置缩小，门外雕刻力士。延载元年（694）的净土洞，为方形平顶窟。从造像遗迹来看，为一铺十一尊像，左右壁雕“九品往生”经变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石窟布局的新变化，由于对佛像崇拜信仰的变化，造像题材也随之变化，阿弥陀佛日益增多。净土宗是当时洛阳流行的主要佛教宗派。武则天时期一种主要的列像窟，就是净土崇拜的石窟。九尊像的组合方式，是龙门石窟唐代净土窟的基本形式。此外，以奉先寺卢舍那佛为主像的华严宗，以地藏菩萨为主像的三阶教，雕刻西土二十五祖的大万五千佛龛、雕刻西土二十九祖的看经寺所代表的禅宗，也都在当地流行。

奉先寺是为高宗及武则天开凿的大摩崖像龛，位于西山南部山腰处，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摩崖佛龛，也是唐代雕刻艺术的瑰宝。佛龛进深38.07、南北宽33.5米。凿有大卢舍那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造像。主佛卢舍那佛高达17.14米，面相丰满圆润，神态安详宁静。头饰螺纹发髻，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卢舍那佛意译为“净满”，是大乘佛教所说的报身佛。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文静虔诚。文殊、普贤二菩萨身饰宝珠璎珞，华贵端庄，表情矜持。二天王身披戎装甲胄，足踏夜叉，威武有力。二力士上身袒露，下着战袍，面目狰狞。二供养人梳双角发髻，身着长裙，足穿云头鞋，温文雅静。群像布局严谨，刀法圆熟，是龙门造像的突出代表，也反映了唐代极盛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在卢舍那佛座左侧束腰部位，有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由碑文可知，工程的主持人是司

农寺卿韦机，奉命检校这一工程的是净土宗大师善导和西京法海寺惠暕，完工于上元二年（675），曾经由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万佛洞是为高宗、武则天及其诸子开凿的另一大窟，凿成于唐隆元年（680）十一月。窟内方形平顶，分前后室。后室高 5.8、宽 6.9 米，主像阿弥陀佛在后室正壁，题材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和二供养人。前室深 2.2、宽 4.9 米，南北两壁满雕 1.5 万尊佛像，窟门外侧雕刻二力士。

看经寺位于东山万佛沟北侧，是龙门石窟最大的一个洞窟。窟为平顶方形，进深 13.9、宽 11.2、高 8.3 米。现窟内东、南北三壁浮雕罗汉像 29 尊，与《历代三宝记》云“西国二十九代”相合，应当是佛教中所谓的“二十九祖”，其开凿年代在武则天时期。这时的佛像主要着通肩衣，其次为双领下垂式大衣。菩萨多袒上身或斜披络腋，帔帛自两肩垂于体侧，双手牵动外扬。大裙中间开衩，两角尖长。佛座以束腰仰覆圆莲座为主。造像肌体丰腴，身姿婀娜，颇具曲线美。

第三期：大约自中宗神龙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705~804），为唐代造像代表形式由成熟转向衰退的时期。这一时期造像的规模和数量远不如一二期。石窟形制大多数为方形平顶窟，前室比第二期宽大。造像组合主要为一铺九尊像。纪年像题材中，弥勒像锐减，阿弥陀、地藏、观音较多。密宗造像在此期盛行。佛装仅通肩衣一种，菩萨多袒上身，手中托各种法器的造像形体已稍嫌滞重，较第一二期已经大为逊色。

二、隋唐时期的寺院布局

一般认为，佛教是公元 1 世纪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内地，随之便出现了佛寺。当时，中国的建筑体系业已形成，匠师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艺术经验，并且已经建造过许多祭祀礼仪建筑和高层楼阁。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石窟寺等，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些传统因素的影响，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适应，佛寺的中国特色也逐渐加强。

佛寺一开始便采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院落式布局。寺中的单体建筑除了某些砖石结构的塔外，也大都采取了木构建筑方式，而砖石塔也大多模仿木构建筑的形象。这说明佛寺的艺术面貌在整体上和世俗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上，除了殿堂里的佛像、宗教陈设、壁画和装饰的宗教题材以外，佛寺本身与宫殿、衙署、住宅等十分相似。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建筑传统体系力量的强大及其高度适应性，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佛教自身的因素。人们认为佛寺是佛国净土的缩影，象征着佛的住所，在这里应当体现出平和与宁静，于是那种尺度近人、含蓄内向、充溢着理性精神的中国木构建筑及群体组合方式，自然也就成了佛寺建筑的蓝本。

早期佛寺的院落式布局，主要有两种形式：（1）以佛殿为中心，和一般世俗

建筑没有多大不同，主要见于中小型佛寺或由官署、住宅改建而成的佛寺。(2) 以塔为寺院中心，在大型的新建的佛寺中居多。隋代佛寺仍然沿用早期的以塔为中心的布局。

唐代及其以后，佛教更重视义理，满足于宣讲义理的需要，以佛殿和法堂等殿堂建筑为主的布局盛行，寺内不一定有佛塔，即使有也常常建在寺的后部或中轴线以外的别院。唐代都城长安的寺院约数百座，一般规模都比较大，有的占有一坊之地规模宏伟，甚至“僭拟宫殿”。已经发掘的隋唐时期的青龙寺遗址、西明寺遗址等，寺院平面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多重院落的形式发展，西明寺的布局就是一个代表。早期寺院布局以洛阳永宁寺为代表，以塔为中心，为前塔后殿式。到了唐代，出现多种形制的布局。多重院落的布局形式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布局形式，其特点为：(1) 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向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也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连成几进院落。(2) 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宅第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各院之间也以回廊联结，每个院落各有其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而且院落数较多，如章敬寺有 48 个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 15 个院。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3) 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得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但不太大的实心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与当时的佛教逐渐趋向对教理经义的重视并开始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4) 此外，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建筑结构转向实质的木建筑结构。(5) 唐代寺院具有公共文化性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如俗讲、说因缘等都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同时佛寺中还出现供人们娱乐的戏场。(6) 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等。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经过考古发掘的唐长安青龙寺遗址，原为隋灵感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东南隅，即今西安市南部铁炉庙村北高地。原范围应占全坊的四分之一，东西长约 530、南北宽约 250 余米，因历代破坏，南部遗迹不存。至发掘前，青龙寺遗址尚存北部东西长 500、南北宽 100~200 米的一段高地，约为原面积的二分之一。寺东部地势最高，未发现建筑遗迹，可能是文献所指的园林部分。已经发掘的部分是位于寺址西部的两座院落和中部的北门遗址。两座院落中，居西一院又称塔院，有早晚两期建筑遗迹。早期建筑遗迹由中山门、塔、殿三部分组成；晚期建筑遗迹包括殿堂、回廊和东西配房。晚期殿堂建在早期殿址上，回廊环绕塔院四周，其中南廊叠压在早期的中山门址上，东西配房位于殿址两侧。早期建筑为隋代寺院，毁于武宗灭佛之时，晚期建筑属于宣宗再次恢复起来的青龙寺。居东一院，仅残存一座殿堂遗址和部分院落，而殿堂基址也是早晚两期遗址叠压在一起，其时代应当与塔院早晚两期建筑相对应。寺周围尚残存部分围墙遗迹，北墙中部有山门基

址一座。西明寺遗址是另一座经过考古发掘的寺院遗址，它位于长安城平康坊西南部。发掘出自南而北排列着的三座殿堂，并由回廊和廊坊相联结，构成三进相对独立的院落。从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这两座寺院的建筑皆由一个个结构严谨的院落组成，已经与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布局有很大的差异。

三、其他佛教遗迹与遗物

各地还发现了一大批与佛教或佛教寺院有关的遗址和遗物，如佛殿、砖塔和塔基、造像、经幢等等。在陕西长安县、耀县、周至、临潼、扶风，山西长治，甘肃泾川，河北，江苏镇江等地发掘了多处隋唐塔基遗址，通过发掘认识到，在隋代已经开始出现安置舍利的塔基地宫，但还是空间狭窄的方形竖穴式地宫。到了唐代则出现了类似带甬道的单室墓葬的地宫形式，而以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等级最高，前有带台基的斜坡状踏步，由前、中、后三室组成，是模仿当时皇帝陵墓而建。在这些塔基地宫中还出土了安置舍利的用具。陕西的隋神德寺、唐庆山寺塔基中出土有安置舍利的套装银盒、金盒、涂金盝顶铜盒以及金棺、银椁等，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舍利容器则有八重宝函及银、玉、水晶等制作的棺椁；在山西、甘肃、江苏的三座塔基中各发现一套安置舍利用的石函及金银棺椁。各地的古遗址内成批发现古代佛教造像，其中较重要的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造像2600多件；陕西西安西郊土门村南出土石雕及“善业泥”造像390件；河南西峡县回车水库工地出土鎏金造像数百件。这些造像中隋唐造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造像上附有隋唐纪年。此外，在四川成都西郊百花潭锦江内还曾发现较多的佛、菩萨、罗汉、供养人等小型石雕像以及有纪年的唐末、五代（前蜀、后蜀）石经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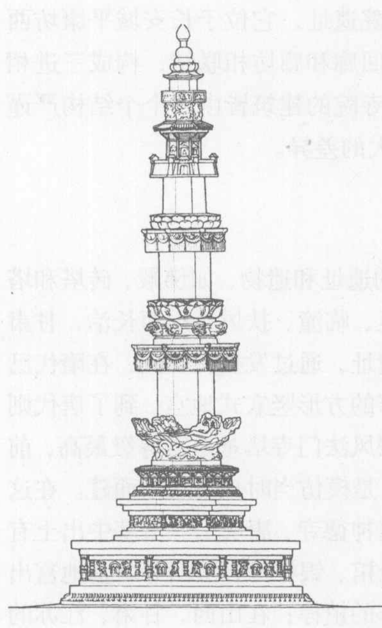
1. 刻经

镌刻石经的根本思想来源于佛教的末法思想，而大规模镌刻佛教经典的直接诱因，是缘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的禁佛之举。当时的僧人面对禁佛，发动护法运动，其情形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据理力争，取得朝廷的宽容；一是埋藏寺中的佛像、经书。与此同时，佛教徒纷纷模仿儒家镌刻石经之例，或刻经于石柱，或刻经于石幢，或刻经于石板，藏于石洞或寺院中。镌刻佛教石经的活动在北齐时期已经盛行，如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①]、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和北响堂山石窟[②]等都有刻经。隋代之时，尽管文帝大力提倡佛教，下令修复毁废寺院，鼓励民间写经造像，但北周武帝灭佛的记忆犹新，所以，佛教徒仍把隋代看作是末法期，继续大量刻经。因此，隋唐的刻经活动也非常盛行。已经发现的隋唐时期主要刻经有：河南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石窟刻经、北京房山石经、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龛、山西太原晋源风峪石经、四川安岳卧佛院刻经等。

---

①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②赵立春、卢合亭：《响堂山石窟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图三九　经幢

2. 经幢

经幢一般可以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分别雕刻，然后再累建成整体（图三九）。幢座多是覆莲花座状，下设须弥座。幢身呈柱状，多呈八面体，上面雕刻经文或佛像等，有的幢身又分为若干段，上面的柱径小于下面的柱径，中间用大于柱身的宝盖相接。盖上一般刻模拟丝织品的帐幔、飘带、花绳等图案，幢顶一般刻成仿木建筑的攒尖顶，顶端托有宝珠。幢体上所刻佛经，主要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阎文儒认为幢的形制“一是根据中国从汉代起在亭四角屋或寺门旁安置桓表（华表）形象；一是仿塔的形制而简单一些”①。陈明达则认为，幢与佛寺中的灯幢有关，幢最初的原物是在立竿上加丝织物制成，石幢则是以浮雕的形式对其加以表现②。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记载，佛告天帝，若将此经书写于幢上，则幢影映在人身上即可不为罪垢污染。也有少数刻心经、楞严经等。刻经所用文字一般是汉字，个别用少数民族文字。从时代上而言，创于初唐，盛行于唐宋时期。唐代经幢的结构比较简单，一般幢身只有一段，最多两段。现存纪年最早的永昌元年八月幢，下半部已经残断，仅存高1.36米的幢身。比较简单的幢以陕西陇县的开元十六年（728）幢为代表，幢高2.1米，幢座是方形石基上的宝装覆莲座。幢体为八边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下刻纪年等。幢顶也作八边形，每边刻一尖拱龛，龛内有一尊坐佛。原来可能有宝珠顶，但已经遗失。比较复杂的幢，可以五台山佛光寺的大中十一年（857）及乾符四年（877）幢为代表，幢身分两段，下段长而粗，上段短而细，中间隔以雕垂幔、飘带的宝盖。顶部是上顶宝珠的攒尖顶。从考古发掘来看，石幢不仅立在与佛教有关的建筑之前，也立在墓葬之前。

参考文献：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莫高窟》1~5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1~984年。

马世长《敦煌石窟》、丁明夷《龙门石窟》、杨泓《经幢》，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龙门石窟》1~2，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1年。

①阎文儒：《石幢》，《文物》1959年第8期。

②陈明达：《石幢辨》，《文物》1960年第2期。

萧默：《中国佛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

第七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和遗物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国际交往活跃。除同邻国朝鲜、日本、越南保持密切关系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中亚、西亚地区；通过海上航线扩大了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国家的联系。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对日本的都城制度有很大影响。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8世纪后半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地布置里坊，显然是模仿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特点。中国隋唐时代优秀的手工艺品也大量运往日本，至今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还珍藏着数千件隋唐文物。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生产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艺技术烧成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伊朗以及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看到，在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唐代，曾积极采用中亚人民喜爱的纹样，织出了大量的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猪头纹、联珠骑士纹锦等，同传统丝织品一起输出国外，满足了西方市场的需要。中国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铜镜等。如中亚的撒马尔罕以及西亚的伊朗、约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中国的瓷器和铜镜。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还发现了唐三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及等国不止一处发现了唐至五代的中国瓷器，印度尼西亚、苏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这些珍贵遗物，都是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一、外来钱币的发现和研究

属于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有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以及日本的和同开宝银钱和铜钱，其中波斯萨珊朝银币数量最多。

隋唐时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发现地点有新疆的乌恰、库车、吐鲁番，陕西的耀县、西安，河南的陕县、洛阳，山西的太原等地，大多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及国内交通干线附近。包括了4世纪初至7世纪中期先后12个王（沙普尔二世至叶兹德格尔德三世）的铸币，而以库思老二世的为最多。当时，波斯银币在中东、近东、东欧同东罗马金币一样是国际通用货币。但中国出土的不一定是作

流通货币使用的。有人认为，新疆的有一部分或曾作为流通货币使用过，另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则主要是墓葬的随葬品、礼佛的施舍品或是古钱和外币爱好者的收藏品。在河西走廊一带，也可能曾经用作流通。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代立国之后，"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东罗马金币共 3 枚，一枚出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毕克镇东北水磨沟口水库工地，是罗马帝国币制改革后的金币"索里得"，是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457~474）时所制，可能是隋唐或更早一些时候，掩埋死去的商人时被埋入地下的；一枚出于陕西咸阳底张湾隋墓，经鉴定为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金币；另一枚出土于西安土门高宗或武则天时期唐墓，是拜占廷赫拉克利乌斯（610~641）型铸币的仿制品，大约 7 世纪中叶铸于中亚细亚。

阿拉伯金币在新疆曾有发现，但多为本地所仿制，且仿制时间较晚。1964 年西安市阿房区西窑头村一座中晚期唐墓中出土阿拉伯金币 3 枚，它们同属伊斯兰古币"第纳尔"，为中古阿拉伯奥梅雅王朝（唐书称白衣大食）所铸，这是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伊斯兰铸币，也是唐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交通的实物证据。

日本货币也有发现。如西安何家村窖藏的日本的和同开宝银钱共 5 枚；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也曾出土和同开宝铜钱。和同开宝银钱和铜钱铸于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都是流通货币，但次年即废。西安所出的和同开宝银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带到中国来的。

二、外来玻璃器的发现

隋唐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主要有萨珊玻璃、罗马玻璃、伊斯兰玻璃等。

萨珊玻璃是指萨珊王朝时期伊朗高原一带生产的玻璃器，是在罗马玻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可以肯定为萨珊玻璃器的有 3 件。1 件是西安东郊隋清禅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凸花玻璃瓶，是典型的萨珊朝波斯的凸花玻璃瓶[①]；一是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细颈玻璃瓶，是罗马后期和伊斯兰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 3 至 7 世纪的玻璃器皿中经常出现；1 件是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发现的凸圈纹玻璃杯，其装饰花纹尤具有萨珊风格。它们都属于钠钙玻璃。

罗马玻璃器在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发现 1 件网目纹玻璃瓶[②]。

伊斯兰玻璃器，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18 件[③]。据研究，这些玻璃器除了 1 件茶托属于典型中国器型，数件素面盘无法确定产地外，主要都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根据其装饰工艺的特点，这批玻璃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 1 件

①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②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记》，《文博》1985 年第 5 期。

③韩伟：《法门寺地宫出土琉璃器皿》，《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 年。

贴花盘口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的贴丝和贴花等热加工装饰工艺。第二类为 6 件刻纹蓝玻璃盘，使用了刻纹冷加工工艺。刻纹以枝、叶、花为主题，运用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等装饰手段，再加上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几何纹饰，构成了繁富华丽的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与贴丝、贴花工艺一样，都是伊斯兰玻璃工匠从罗马继承的工艺，在伊斯兰早期曾盛行一时，但是鲜有完整器物传世。法门寺地宫的这批玻璃盘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根据地宫出土的衣物帐，属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宫，确切的时间记载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刻纹玻璃盘中，有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是至为罕见的珍品，填补了对伊斯兰玻璃器认识的空白。第三类为 2 件印纹直桶杯，无色透明，壁面由五组花纹装饰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艺，这种工艺也源自罗马，但伊斯兰模吹玻璃器器壁较厚，而且底部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法门寺印纹直桶杯的器形和纹饰在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见的。最后一类是 1 件釉彩玻璃盘。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它是将易熔玻璃配上适量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粘合剂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加热而成。一般认为伊斯兰彩釉玻璃的应用在 12~15 世纪，9 世纪的釉彩玻璃少见，所以法门寺发现的伊斯兰早期彩釉玻璃就更显其珍贵[①]。玻璃器易碎难存，传世品外，很难见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门寺早期伊斯兰玻璃器的发现，不仅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人们对伊斯兰早期玻璃工艺的认识。

三、波斯釉陶器的发现

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釉陶器先后发现了若干批，主要集中在扬州和两广、福建地区。这些波斯釉陶的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1965 年，在江苏扬州出土了 1 件高 38 厘米的绿釉陶壶，颈肩之间有对称弯曲的双系，纹饰以波浪纹为主，衬以弦纹。通体内、外壁施以翠绿色釉，至器底有流釉现象，底足微露土黄色胎，胎质较疏松，吸水率较高，但胎釉结合较紧密，无剥釉现象，腹部出现几处粘釉。陶壶系轮制而成，腹部有一道道旋削的明显痕迹。旋削的弦纹和刻划的波浪纹深处凝结着深绿色釉，在壶腹部形成一圈翠绿色釉间隔一圈深绿色釉，使整个壶体颜色活泼而不平淡，给人以鲜明、稳重和美观之感[②]。此外，扬州唐城遗址的中、晚唐地层中还屡次发现波斯釉陶碎片。

1989 年以来，在广西桂林、容县 10 余处不同地点也发现了波斯陶器[③]。1997 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出土一批波斯釉陶片，呈绿釉偏蓝色，胎质疏松，釉色均匀。

---

①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 年第 12 期。

②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 年第 2 期。

③李铧、封绍柱、周华：《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 年第 11 期。

由于破坏严重，所出陶片不能复原。其中1件形制为直口，短颈，颈腹部附耳，耳紧贴器身，无孔，瓶体修长，上广下收，小平底，肩腹部贴饰附加对纹，与五代刘华墓所出釉陶相似[①]。

福建省福州市莲花峰五代刘华墓出土了3件波斯釉陶器。刘华是南汉南平王的次女，闽国第三主王延钧的夫人，葬于长兴元年（930）[②]。墓中随葬的3件孔雀蓝釉陶罐，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3或4个耳环，腹部贴饰半圆弧条纹或平行的绳纹，高达74.5~78.2厘米。这种陶罐的器形、釉色和腹部贴饰的纹饰，都与伊朗发现的9至10世纪所谓伊斯兰式样的釉陶罐相同。

通过对扬州出土的波斯釉陶进行分析[③]，可知波斯釉陶胎质很疏松，吸水率高达30%。胎的烧成温度在1070±20℃~1150±20℃之间。釉的流动点温度在1100℃，与胎的烧成温度接近，说明波斯釉陶采用一次烧成工艺。波斯釉陶的陶胎氧化钙含量高达17%左右，氧化锰含量高达6~7%，这样的化学组成在中国古代陶瓷中极为罕见。波斯釉陶都施绿釉，色调深浅不一。通过成分对比，可知波斯釉陶在化学组成上与中国传统陶瓷釉差别很大。中国的高温釉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低温釉属于铅釉系统，而波斯釉陶属于钠钙系统，这类釉在化学组成上的最大特点是氧化钠含量特别高，高达6.7~10.8%，这在中国传统的陶瓷中从未见到过。通过显微镜观察，波斯釉陶的釉层中存在着大量气泡和残余石英晶体。釉层中的气泡有不少上升到釉层表面处破裂，并在劈裂处留下破裂口。另外，通过测定得知，波斯釉陶的高温粘度系数比铅釉要大，所以，波斯釉陶的釉流动性较差。波斯釉陶在釉面上留下的破裂口未能填平，就与这类釉的高粘度系数有关[④]。

中国境内发现的这些波斯釉陶器，应当都是从伊朗输入的，而且很可能都是通过海路输入的。

四、外来金银器的发现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繁荣，输入的外来金银器在数量上明显较前增多。如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产地，被认为原产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一带，同墓出土的金手镯的也非中国传统造型，被认为原产于印度[⑤]。特别是金项链上镶嵌的青金石，不产于我国，也应当是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一代输入的。1963年，西安南郊沙坡村窖藏出土的鹿纹银碗，腹部呈分瓣形，在口沿下刻有粟特文字，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可知是粟特火祆教徒使用的器物[⑥]。内蒙古敖汉旗

①全洪：《广州出土海上丝绸之路遗物源流初探》，《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③周长源、张浦生、张福康：《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文物》1988年第12期。
④周长源、张浦生、张福康：《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文物》1988年第12期。
⑤熊存瑞：《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文物》1987年第10期。
⑥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李家营子出土的银胡瓶、银带把水器，其中的银胡瓶为粟特银器，而孙机先生认为银带把水器是突厥器物[①]，齐东方先生则认为是粟特器物[②]。

据齐东方、张静研究，唐代金银器皿受到了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将这些外来因素归纳为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廷等三个系统，同时还指出唐代金银器皿中还存在印度、贵霜、嚈哒、突厥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化因素[③]。

五、外来铜器的发现

西方铜器在隋唐时期发现较少。临潼唐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1件人面铜胡瓶，其造型别致，高29.5厘米，凤首龙柄，喇叭形圈足，细颈有凸弦纹三道，腹部为六个高浮雕人面。发掘者认为是印度产品[④]，也有人认为是中亚产品[⑤]。

六、外来宗教的遗迹与遗物

（一）景教遗物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支，因继承聂斯托里的宗教主张，故又名聂斯脱里派（NESTORIANISM）。时人谓之波斯教、波斯经教、大秦教、景教等，与摩尼教、祆教并称三夷教。聂斯托里原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因为主张基督教具有神和人的双重属性，被正统派斥为异端，处以死刑，其信徒逃亡东方，由叙利亚进入波斯，组织迦勒迪教会，约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其传入的路线是由阿姆河南的大夏经过巴克达山，越葱岭，入塔什库尔干到于阗，后取玄奘之归途而至长安。关于景教名称的由来，史无明载，可能是音译。景教传入之后，唐太宗就下诏在长安城义宁坊建立波斯寺，唐玄宗天宝四年（745）改名为大秦寺。唐高宗时，又于各州置景教寺。景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传播，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时，也打击了道教以外的宗教势力，景教在中原便趋于灭绝。从目前发现的景教资料来看，当时信仰这一宗教的信众都是来自波斯和中亚的胡人[⑥]。

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于建中二年（781），由大秦寺僧景净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严撰书。碑文颂扬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的盛况，是研究唐代景教的珍贵资料。明天启五年（1625）出土，地点有三种说法：一为陕西周至；一为长安（今西安）；一为长安与周至之间。出土之后被移至西安府城西的金胜寺，1907年移入今西安碑林。

①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④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县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5期。
⑤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⑥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

碑全高约 2.80、宽约 0.85、厚约 0.16 米。碑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刻立于莲花座之上的十字架。碑背面无字。正面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 70 名景教僧的名字及职衔。正面碑文正书 32 行，行 62 字，分为序、颂两部分。序中记述唐贞观九年（635）大秦景教僧阿罗本至长安，贞观十二年在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高宗时准于诸州置景教寺院。玄宗时令宁国等五王在寺内建坛场，又送五圣写真安置寺内，还令景教僧去兴庆宫作功德，唐玄宗并亲题寺榜。唐肃宗时在灵武等 5 郡重立景教寺院。代宗，每逢诞辰对景教僧赐香颁馔。德宗时任命景教僧伊斯为朔方节度副使，协助郭子仪于戎马军中，伊斯出资重修寺院，发扬景教。此碑被发现以后，不但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也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兴趣，但欧洲曾经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其学术价值愈来愈显得重要。19 世纪初，曾经有人偷运此碑出国，但未能得逞。

2. 景教经幢

最近，在洛阳发现 1 件《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①]。经幢为一不规整的八棱（面）石柱，以石灰岩质上等青石制成。其上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据《经幢记》记载，此幢建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原来树立在一位自中亚移居洛阳、殁后葬于洛阳某地的“安国安氏太夫人神道”。造者为其“承家嗣嫡”亲子。十五年后，又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迁举”，但未说明迁于何处。

经幢除雕刻经文之外，还雕刻有两组图像，分别为两个男性飞天和女性飞天以十字架为中心呈相对飞翔状，它们是唐代景教最重要的美术作品。以往只能看到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雕刻的十字架及其下部莲座和两旁的祥云、花朵，虽然雕刻精致，但整幅图案较小。洛阳经幢上的图像不仅场面大，形象多，而且雕刻工艺精细，形象之庄重与线条之飞动浑然融为一体，让我们领略到更加丰富的景教美术形式和内容。关于他们的性质，张乃翥认为，“这似乎隐含着当时东来景教兼有阴阳二元崇拜的信条。”[②]罗炤认为，这两组男、女性分别组合的图像，形象近似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功用则介于飞天与供养人之间，可能尚不足以达到“崇拜信条”的高度[③]。它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否属于基督教的天使，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摩尼教遗迹

摩尼教是 3 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个世界性宗教，因创始人摩尼而得名，也称为明教。摩尼本人生于 216 年，卒于 277 年。他出生在古波斯首都泰锡封附近的玛第奴的一个贵族家庭，精通天文、善绘画、会幻术，从小受到基督教派的影响。

---

①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 年第 6 期。
②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③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 年第 6 期。

24 岁时创立了摩尼教。摩尼教的思想是在吸收祆教、佛教和基督教等教教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教义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亦即善和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光明与黑暗指世界的两个本原，三际是说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初际之时天地未分，光明与黑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之时，黑暗来侵光明；后际之时，光明与黑暗各归本位。现时为处于中际，人应助光明斗黑暗。教徒应当制欲，不茹荤，不饮酒，不祭祖，白衣白冠，死则裸葬。摩尼教自 3~7 世纪从波斯本土西传至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又从北非传至罗马并进入西班牙半岛。向东则越过葱岭，经中亚传入中国。武则天延载在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唐大历年年间，回鹘使者与摩尼教僧人来到长安，唐代宗为其置大云光明寺。据《唐会要》卷十记载：“回鹘可汗令明教僧进发入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为大云光明。六年正月，敕赐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

现代意义上的摩尼教研究，即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或独立学科的摩尼教的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初吐鲁番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所发现和出土的摩尼教遗迹与遗物，尤其是数以千计的摩尼教写经残片的出土和确认，使摩尼教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热潮。在敦煌发现的 3 部唐写本汉文摩尼教残经，从而确认了摩尼教曾经在唐代流行。这 3 部残经均被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四，分别被命名为《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近年来，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并确认了一批摩尼教石窟。

摩尼教石窟寺主要集中在吐鲁番一带。20 世纪初，德国人在吐鲁番一带发现了数千件佛教与摩尼教的写本、旗幡和其他遗物，但仅确认了四五个摩尼教石窟。近年来，中国学者晁华山对吐鲁番地区的三个石窟群进行研究，大体确认摩尼教石窟 39 个，分布情况为：吐峪沟 11 个，伯孜克里克 19 个，胜金口 9 个。在已经发现的高昌石窟中，许多初建时为摩尼教石窟，后来改建为佛教石窟。在改建过程中，原来的摩尼教石窟壁面用白灰浆覆盖，改绘佛教题材。现在有些石窟的白灰浆层脱落的地方，均露出了初建时的摩尼教壁画痕迹。有的画有粗红网格线，有的写有摩尼教榜文，有的写有帕提亚文和回鹘文摩尼教赞辞，有的则绘有礼赞生命树图，还有的绘有波斯摩尼教信徒。其中伯孜克里克石窟第 38 号窟是明显的摩尼教石窟，壁画中所绘寺院图是一座摩尼教寺院建筑图，寺院是五重台式建筑，寺前有台阶。其中一层台有五个殿堂，即指摩尼教寺院的五堂：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在主室正壁绘生命树与死亡树交叉图。这两株树分别代表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两株树主干两次交叉并由下向上分成三段，表示“三际”即初际、中际、后际。整幅画象征着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论”。在窟的两侧壁绘有宝树果园图，其中的大果树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树下绘斋讲的高师。这些果树

都是摩尼教文献和写本中所说的生命树。摩尼和耶稣经常被绘成生命树。摩尼教教团也常以长满果实的树表示，每个果实即象征教团的一员。树下高师身后燃起五股光焰，表明是摩尼教高级信徒。在阿拉伯文献中，记载有摩尼见萨珊国王时双肩闪闪发光。

吐鲁番的摩尼教石窟兴建于6世纪末期，到10世纪末被封闭，接着又被改建为佛教寺院。在吐峪沟只有礼忏堂被改建和重绘，至于斋堂，由于其建筑、壁画有较多的佛教形式而未被改动。伯孜克里克斋讲堂壁画被白色灰浆覆盖后成为无壁画的佛教窟，礼忏堂和其他大多数无壁画窟则被改建重绘成佛堂。胜金口北寺礼忏堂重绘后成为佛堂，但斋堂和教授堂的壁画因无碍佛教而被保留下来。其原因是983年，回鹘王太子下令拆毁摩尼寺的壁画和塑像，并改建为佛寺。回鹘人抛弃了他们信仰了200多年的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

（三）祆教遗物

祆教即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建。因为该教拜火，以火光代表至善之神，故又称为拜火教。同时，该教还拜日月星辰，故又名祆教。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一时在中亚地区盛行。7世纪时，大食统治波斯后，伊斯兰教流行，迫使祆教徒大批东移。祆教传入中原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6世纪，即波斯邻近的滑国于516年通梁之时，但祆教传入西域应当早于这一时间。

祆教的主要经典是《阿维斯陀》，其教义是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所谓二元论是指自然界有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前者崇拜众善神，后者崇拜各种恶灵。它们各自都有创造的力量，并组织了自己的阵营，之间进行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祆教认为，在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的对峙中，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意志。祆教还把人的活动概括为思想、语言和行为三类，在每一类中又分为善恶两种，并把三善、三恶与天堂、地狱的说教结合起来。从善者可以逐步进入天堂。祆教主张善恶报应，在理论和逻辑上必然承认灵魂转世和末日审判。祆教认为，火是阿胡拉·玛兹达的儿子。火的清净、活力、光辉象征了神的绝对和至善，因此，火是人们所见的正义之眼，对火的礼赞也是教徒的首要任务。祆教视水、火、土为神圣，故葬礼只能实行天葬或鸟葬。

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为数不少祆教遗物。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石椁上的雕刻内容，甘肃天水发现的隋末唐初石棺床、太原隋虞弘墓石椁上的雕刻等，都与祆教有关。这为深入研究祆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另外，1955年西安发现的咸通十五年（874）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汉文和钵罗婆文合刻[①]，也是研究唐代祆教的重要资料。1963年，西安南郊沙坡村窖藏

①夏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

出土的鹿纹银碗，腹部呈分瓣形，在口沿下刻有粟特文字，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可知是粟特火祆教徒使用的器物[①]。

参考文献：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徐苹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晁华山：《寻觅埋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第8期。

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白化文：《本世纪关于摩尼教遗迹遗物的第三次重大发现》，《中国文化》第8期。

周保菁、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①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四章 宋元明考古

第一节 宋元明考古概况

宋元明时期的考古，按朝代包括宋、辽、金、元、明 5 个时期，西夏、大理和西藏不包括在 5 个朝代之内，它们在地区和时代上都自成一个系统。这一时期的考古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相似，涉及的朝代多，头绪繁杂。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表现为，处于我国封建社会从强盛逐渐走向没落的时期，小商品生产发达。

一、分期

对宋元明考古的分期，徐苹芳先生以宋、辽、金、元等朝代为单位进行了论述[①]。

宋代考古可分为三期：（1）前期自北宋统一至英宗时期（960~1068）。（2）中期自英宗以后至北宋灭亡（1068~1127）。（3）后期为南宋时期（1127~1279）。也有先分为中原、江浙皖、湖广和川贵四区，然后再进行分期的。中原地区只限于北宋，分为前、后两期。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则为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所取代。

辽代考古可分为前、后两期，两期的分界限在重熙时期（1030 年左右）。辽代前期应包括自 907 年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的契丹时期，这个时期的考古遗迹较少，到 951 年辽穆宗以后才逐渐丰富起来。近年来，关于契丹早期遗迹遗物的探索是颇引人注目的问题。辽代考古的分区问题，也是近些年才提出来的，辽上京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北部地区，与燕云十六州的南部地区有区别。

金代考古分前、后两期，前期自金太祖建国至海陵王正隆五年（1115~1160），后期自金世宗大定元年至金亡（1161~1234）。

元代考古也分前、后两期，前期自元太祖建国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统一全国（1206~1279），绝大部分是蒙古时期。后期从至元十七年至元亡（1280~1368），是元代统一全国时期。

明代考古因文献资料多，线条发展脉络清晰，一般不再分期。

二、研究内容与特点

在历史考古学中，宋元明考古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它和其他各段的考古

①徐苹芳：《宋元明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学一样，都是以遗迹与遗物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包括：（1）墓葬的研究包括帝陵和普通墓葬，数量众多，而且随葬品中有大量金银等珍贵的器物，所以，在对这一时期的墓葬进行发掘时，要尽量避免挖宝思想的存在，将各项工作按照考古学要求进行。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密闭性能较好，随葬的大量丝麻纺织品和书画等有机质文物往往保存较为完整，在发掘程中还要树立现场保护的意识。（2）宋元明时期的城址数量众多，对它们的调查和发掘，无疑是一项繁重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这一时期的城市布局特点不同于以往，由于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3）宋元时期的手工业遗址，特别是瓷窑遗址与瓷器的发掘与研究，是这一时期考古的一大特色，陶瓷考古学科的研究内容，这一时期几可占半壁江山。（4）在这一时期，佛教从贵族走向世俗化，有关佛教寺院遗址及其塔基数量众多，对它们的发掘与研究，也成为这一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5）宋元明时期与其他时期相比较，地面遗迹和建筑遗留较多，也成为这一时期考古研究的特色内容之一。特别是随着大遗址规划与保护工作的展开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大有可为。（6）宋元明时期是中国对外交通发达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对应，宋元明时期的水下考古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才刚刚起步，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宋元明时期的考古，与隋唐考古相比较，有四个特点：（1）宋元明时期，民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小商品生产发达。（2）文献与绘画等可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的材料丰富，地面上存留的遗迹和建筑物增多，研究领域扩大。（3）宋元明时期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北方地区的辽、金、西夏和元是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全国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惯和文化意识方面都有自己的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在丧葬习俗，还是城市建设，都不断吸收、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文化相互交融。（4）从晚唐五代起，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是起居方式的改变，特别是桌、椅等家具出现后，结束了自古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起居活动从低矮向高处发展，日用器皿也从低处移至较高的桌几上，日常生活用品的形态和装饰花纹的部位都起了变化，并使得居室内陈设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非常形象地体现在墓葬和各类遗物之上。

第二节　城址及其他

一、宋元明时期城市考古的特点

宋元明时期的城市考古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宋元明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城市，大

部分在原地延续至今，即今天的城市压在宋元明时代的城市上面。这种情况不利于开展考古工作，对这类古代城市应如何进行考古，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宋元明时代编纂地方志的风气盛行，每一部地方志当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产、风俗、学校、人物、仕宦以及名胜、古迹等门类，而且多把当地的城镇和山川形势绘制成图，列在地方志的最前面。明代地方志的编纂基本上已经普及到府、县。由于地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宋元明旧城的遗迹，特别是有的地方志还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这为复原宋元明时代的城市平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今重叠城市的考古工作，元大都的勘察即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元大都城址约三分之二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钻探和发掘证明，今天北京城内（亦即明清北京城内）的许多街道胡同，仍保持着元大都的布局，说明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个规律对进行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有重要意义。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的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是可以基本上复原宋元明时代旧城的平面布局的。

二、都城规划的发展和变化

1. 中原地区都城

宋元明时代的都城规划与隋唐时代相比，最大变化是封闭式里坊制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北宋东京汴梁城（今河南开封）的详细平面布局虽然还需进一步的考古勘测去复原，但封闭式的里坊制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所知最典型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是元大都，其街道在南北大街（纵街）两侧对称地等距离的排列着东西向的平行胡同，这些规整的街道一直沿用至今。

宋元明都城规划的另一个变化是宫城位置的改变。从汴梁城开始，宫城皆居全城的中央，皇城（或者内城）包围着宫城，其外再设大城，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布局。这与隋唐时期都城的宫城居全城北部、宫城前设皇城的布局相比较，宫城的地位在全城之中更加突出。

宫城地位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中轴线两侧建置的安排上。明代初年的南京城和安徽凤阳修建的明中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宫城前的中轴线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皇城前左侧为中央官署，右侧为五军都督府。明代北京宫城和皇城前中轴大路两侧的建置完全按照南京的规制。礼制建筑和中央的军政官署集中在宫城前中轴大路两侧，这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集中反映。对全城中轴线在通过宫城后的终止点，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安排。元大都的中轴线终止在万宁寺的中

心阁上，到明永乐时北京城的中轴线终止在鼓楼和钟楼上，充分发挥了这两座高层建筑在全城中的稳定作用，这在都市规划上是成功的设计。

2. 辽金都城

辽金都城与宋元都城不同，以辽上京和金上京为例，它们都分南北二城。辽上京的北城为皇城，是宫殿之所在；南城为汉城，是工匠和被俘虏的汉人所居之地。金上京南城西北部为宫殿区，北城为居民和工商业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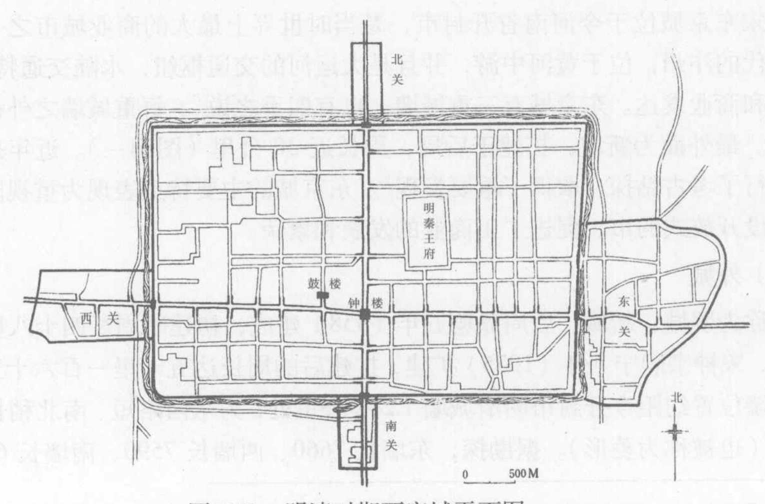
辽金都城的南北城之制，是辽金初期奴隶制残余的产物，随着封建化的加深，又出现了模仿北宋汴梁都城制度的辽中京和金中都。另外，还出现了离宫式的城市元上都，规划布局有其特殊的形式。

三、中原和南方地区的地方城市类型和布局

宋元明时代，中原地区（相对于辽金所占据的地区而言的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的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上与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近年的调查和分析，徐苹芳先生将宋元明时代的地方城市按其布局分为四个类型①：

1. 方形十字街式

这是唐代以来的形式，城平面多为规整的正方形，城内设十字街，城垣每面正中各开一门。这类城市的布局在当时地方城市中最流行，多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如山西的大同、北京的顺义等。它不仅是对前期城市的延续，甚至到明代新建的城市还采用这种布局形式，如江苏的奉贤城、明清时期的西安城（图四〇）等。



图四〇　明清时期西安城平面图

①徐苹芳：《宋元明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 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

城的平面一般多作南北稍长的近似方形，东、西、南城垣正中各开一门，城内设“丁”字街，东西门之间的横街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衙署（或王府）、庙学之所在，衙署居中，向南有大街通南门，大街两侧为居民市肆。如内蒙古昭盟克什克腾旗的元代应昌路故城和江苏南通的元明通州城，都是这种布局。

3. 长方形纵街横巷式

这种形式的城市多见于江南地区。衙署在城的中央或偏于一方，南北主干大街（纵街）之间由平行的东西向小巷（横巷）构成街道网，大街常傍小河，形成了河、路并行的水陆交通线，很有地方特色。典型代表是苏州的宋代平江府城。杭州的临安城也属此种类型，南宋改为“行在”后，只将府衙扩建为宫城，城市的布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4. 不规则形的城市

多处于南方丘陵或滨水的地区，城垣依地形呈曲折状，城内的街道亦多随地势河湖而弯曲转折，没有一定的规律，如宋元时期的泉州城和广州城。还有一些是在水陆交通干线上自由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自由发展的结果往往使城市成为不规则的狭长形，如长江岸边的宋代沙市城。

四、宋元明时期的城址及其他

（一）宋代城址

1. 东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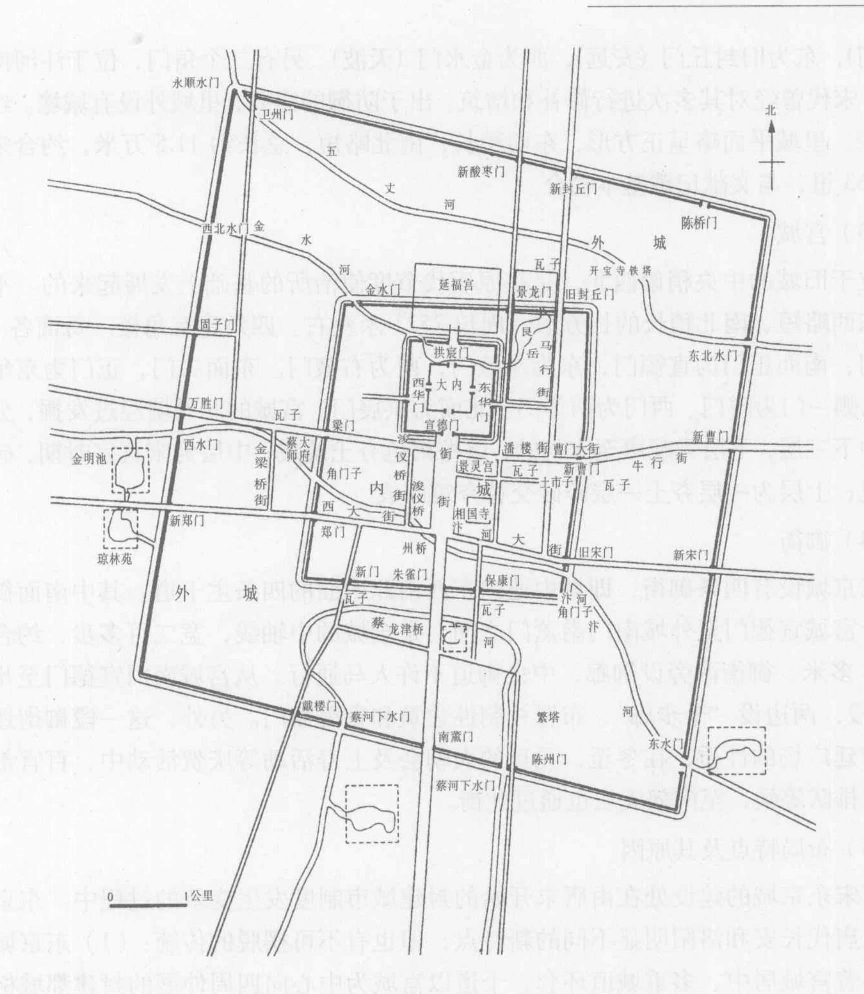
北宋东京城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其前身是唐代的汴州，位于黄河中游，并且是大运河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特别便利，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东京城有三重城墙，也有四重之说①。每重城墙之外都有护城河环绕。最外面为新城，扩建于后周，周长近 30 公里（图四一）。近年来，对东京城进行了考古钻探，取得了重要发现②。东京城的主要特点表现为重视防御，同时沿街设开放式的市，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1）外城

又称为罗城、新城，后周显德五年（958）建成，初建时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扩建，扩建后的周长达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外城的城墙位置约距今开封市明清城墙 1.2~2 公里处，为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平行四边形（也被称为菱形）。据勘探，东墙长 7660、西墙长 7590、南墙长 6990、北

①四重说认为，宫城与里城之间有皇城，皇城与宫城共用北墙，其余三面城墙另筑。

②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和试掘》，《文物》1992 年第 12 期；《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和试掘》，《文物》1996 年第 5 期。



图四一　北宋东京城结构图

墙长 6940 米，周长 29120 米，约折合宋里约五十二里。城墙夯筑而城，夯层厚 8~12 厘米。城外设有有护城河，称“护龙河”，宽约 40 米，内外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人员往来。外城设有 12 座带有瓮城的城门，而且每座瓮城的形制不尽相同，另有 7 座水门。目前，已经勘探出城门 15 座（包括水门），并探出 5 座带大型瓮城的城门遗址。

（2）里城

又称为内城或旧城，宋初也称阙城，也即唐代的汴州城。《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内城共设置 10 座城门：南面中为朱雀门，东为保康门，西为崇明门（即新门）；东面南为旧宋门（丽景），北为旧曹门（望春）；西面南为郑门（宜秋），北为梁门（阊阖）；北面中为景龙门（旧

酸枣门)，东为旧封丘门（安远），西为金水门（天波）。另有二个角门，位于汴河南北岸。宋代曾经对其多次进行修补和增筑。出于防御的需要，里城外设有城壕。经过勘探，里城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稍长，南北略短，总长约 11.5 万米，约合宋代 20.63 里，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3）宫城

位于旧城的中央稍偏西北，是在原唐代节度使治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面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周长 2521 米左右。四角建有角楼。每面各 1 座城门，南面正门为宣德门，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东面二门，正门为东华门，北侧一门为謻门。西门为西华门。北面为拱宸门。宫城的北城墙经过发掘，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晚唐至宋初的，以棕褐色夯土筑成；中层为宋真宗时期，砖砌而成；上层为一层夯土一层碎砖交替夯筑而成。

（4）御街

东京城设有四条御街，即城中通向东西南北四面的四条主干道。其中南面御街位于宫城宣德门至外城南门南薰门之间，是全城的中轴线，宽二百多步，约合今 300 多米。御街两旁设御廊，中央御道不许人马通行。从宫城南门宣德门至州桥[①]一段，两边设“千步廊”、布置礼制性建筑和官署衙门。另外，这一段御街还具有宫廷广场的性质，在冬至、元旦的大朝会及上寿活动等庆贺活动中，百官都在这里排队等候，至南郊天坛也通过此街。

（5）布局特点及其原因

北宋东京城的建设处在由唐末开始的封建城市制度发生变革的过程中。东京既有与唐代长安和洛阳明显不同的新特点，但也有不可摆脱的传统：(1) 东京城仍保存着宫城居中、多重城垣环套、干道以宫城为中心向四周伸展的封建都城格局。(2) 以宫城和御街形成城市中轴线。宫城位居城市中心，城南御街拓宽，形成宫城前广场，御街两边设“千步廊”，布列官署，突出了宫城的中心地位，并强化了御街的中轴线地位。(3) 开放的街市和各类集市代替了唐代的集中市制，形成遍布全城的商业网，在主要交通干道和宫城附近发展成中心商业区。原来仅在城门附近和临河地段开设的商业店铺，发展到各条街巷，形成遍布全城的商业网点。(4) 改革旧坊制，以开放的街巷式代替旧的里坊制。北宋时期虽然曾几次试图恢复旧坊制，但终因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而一再失败，最终形成开放的街巷式居住区。(5) 改变旧的城市分区规划：一是发展为开放的遍布街巷的商业区、手工业区和居住街区，并出现新的仓场区和瓦子一类的娱乐服务性用地。二是各种用地在城内混杂相间，彼此之间没有固定明确的用地界定。在居住区中配有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各类商业、服务业网点。各类用地的分布以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消费

①州桥，又称天汉桥，横跨汴河之上，是东京城内的重要桥梁。

的需求为原则。(6)城市内部街道空间的变化，由坊墙、市墙隔离出来的封闭的街道空间，转变为由各种行业店铺和居民住宅构成的开放式街道空间。街道成为商业、手工业、消费服务业等各种城市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同时也成为居民交往的场所。宫殿被闹市包围，商业街市成为皇帝出行的必经之路。

北宋东京正处于唐宋之际城市制度变革的关键阶段。引起东京城布局产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东京城从旧城基础上发展而来，而不是一次规划建设而成。城市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新城市的建设必然受到旧城市各种现状条件的影响。(2)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推动城市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唐代以前的城市制度是与当时不发达的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到了唐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形成与旧的城市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最终冲破旧制度，以开放的街巷制代替封闭的里坊制。(3)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沿街开店获利甚多，这对于当时的达官贵戚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并不迷恋旧坊制的管理手段，因此尽管皇帝下诏恢复旧制，他们首先起来反对。最后帝王也不得不接受社会现实了。旧的封闭式的城市制度既违反经济规律，同时又与上到官贵、下至百姓的意愿相抵触，自然无法再恢复了[①]。

2. 南宋临安城

临安城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是南宋时期的都城。由于南宋统治者一直想要恢复祖宗基业，因此该城一直以行在来经营，制度上大体如州城。杭州城始建于隋代，五代钱氏定为都城，经过多次改扩建，周长达到70里。北宋时成为东南重镇。南宋绍兴八年（1138）被正式定为都城。由于地势原因，整个城垣呈腰鼓形。南部和西南部是丘陵地带，北部和东南部是水网地带。

临安城的罗城平面近方形，南北两面城墙较短，东西两面城墙长而鼓出曲折。整个临安城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左靠钱江，右近西湖，共开城门13座、水门5座。所有的城墙均高约三丈余，基广三丈，厚丈余。城内的主街是纵贯南北的中心御街，在主街东南有两条运河。城内的河渠很多，有盐运河、茅山河、市河、清湖河、青山河、菜市河、下湖河等。城内有四条大的横街，横街间是东西向小巷，构成了纵街横巷、水陆并行的街网布局。

南宋皇城虽然在规模逊于东京大内，但布局相似。位于凤凰山东麓，围绕着馒头山，利用自然地形布置宫殿、园林和亭阁。外朝的大庆殿和垂拱殿位于南部，东北是东宫所在，次要的宫殿、寝殿、后宫和苑囿都在北部，基本符合“前朝后殿”的惯例。皇城的范围已经得到确认，北城墙自万松岭路南侧的山坡向东到馒头山的东北角。东城墙沿馒头山的东麓往南延伸到今杭州铁路装卸机修厂内，长390、宽10~11米，皆为夯筑而成的土墙。北城墙的和定门和东墙的东华门的位置也已探明。在北城墙的内侧还发现有包砖，为长方形厚砖。皇城的西城墙则主要

①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以凤凰山为天然屏障，只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修筑城墙。南城墙的位置在今梵天寺北至宋城路附近。御街由南向北延伸，以和宁门为起点，向北经过朝天门，略向西折，接着又一直向北，经过众安桥、观桥，到万岁桥，再折而向西，直到新庄桥和中正桥，全长一万三千五百尺，铺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方。御街不仅是临安城的中轴线，从和宁门到朝天门这一段还具有外朝的性质，是元正、冬至大朝会时会集排班之所。中央官署都集中设在大内和宁门以北御街两侧，成为政治统治的核心，官署与居民的坊巷间杂。

大内在凤凰山东麓的案山，现残存的遗址深埋地下。尚存的宫城北墙长100、东墙长500米。设四门，南面是正门丽正门，门阔三间，有三条门道。东面是太子宫门，即东便门。皇城的北门为和宁门，是大内的后门，夹在大城南边的孝仁坊和登平坊之中，面阔三间。和宁门的东面是东华门。

3. 扬州城

扬州宋城位于今江苏扬州，宋代扬州城是由三个互不相属而又关系密切的城圈组成，自南而北分别为大城、夹城和堡城，分布范围大体与唐代扬州城相同。南北全长5600米[①]。

宋大城即州城，约相当于唐代罗城东南部分，为南北向长方形，建于五代，南北长2900、东西宽2200米，今四周城壕犹存。城墙以黄粘土夯筑，外包砌青砖，大量城砖有“武锋军”戳记。四面城门经发掘或钻探已得确定，其中南门门址直接叠压在唐城门址上。城内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袭了唐城的规划。宋大城实测周长10110米，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相近。

堡城由唐代子城改筑而成，西、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墙，实测周长5000米。四面城墙各设一门，其中南门沿用唐代子城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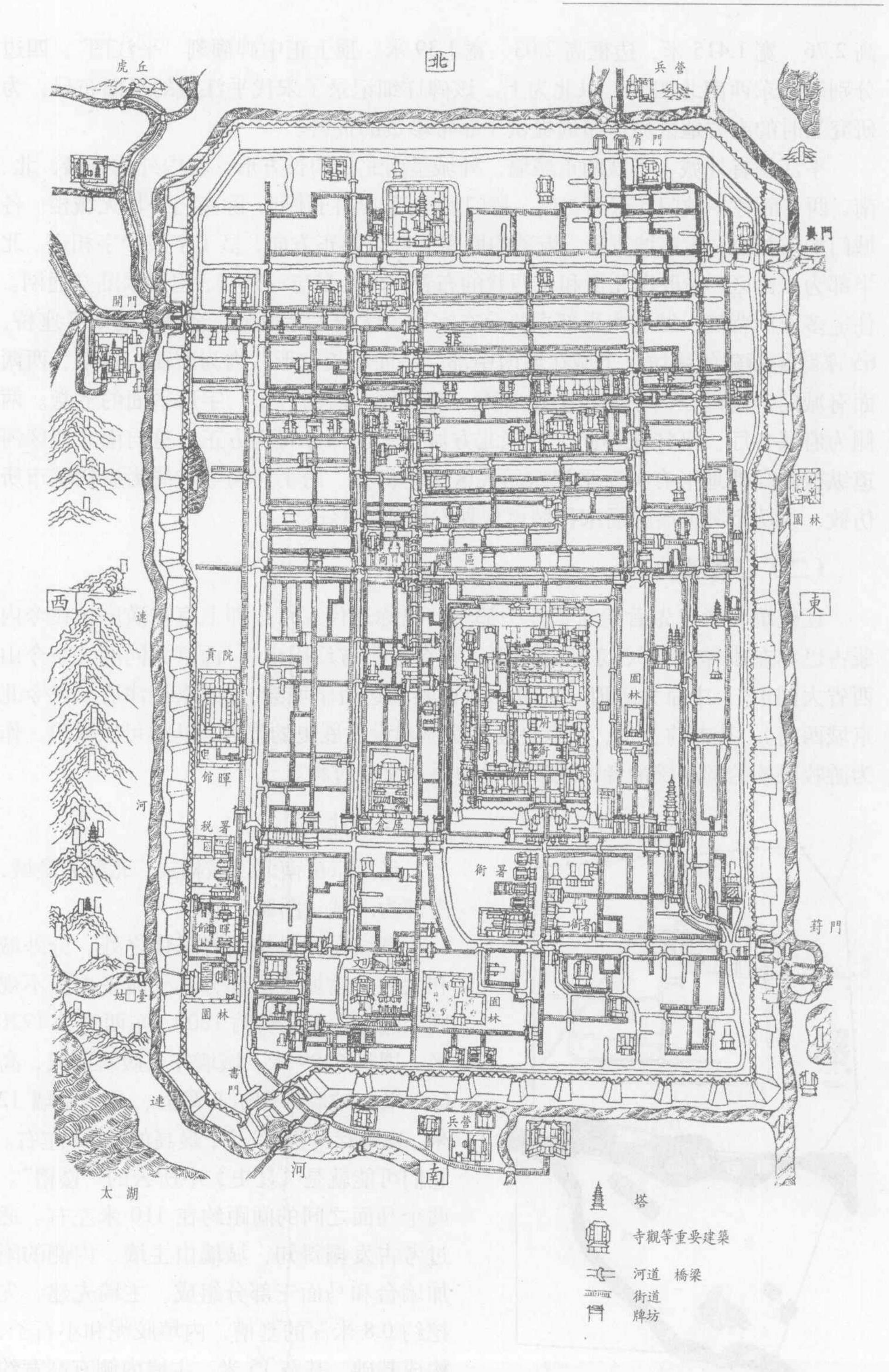
夹城位于堡城和大城之间，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700米。四面城壕尚存，夹城东墙和北墙中部各发现城门遗址一处。

宋扬州三城城内均开十字形大道并与四面城门相连。宋大城南北大街西侧并行一条市河，与南北水门相通。大城内的东西向街皆互相平行，探明东西向主干大道共有三条，间距300~350米，其间又平行分布三条东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南北大街两侧为开放式的街巷，这种纵街横巷式的布局常见于我国南方宋城。大街傍临河道则是扬州宋城的特点。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4. 平江图碑与平江府城

平江府城即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宋代平江城。南宋绍定二年（1229），以该城平面布局为蓝本，刻成现存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图碑——平江图碑（图四二）。碑

①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0年第1期、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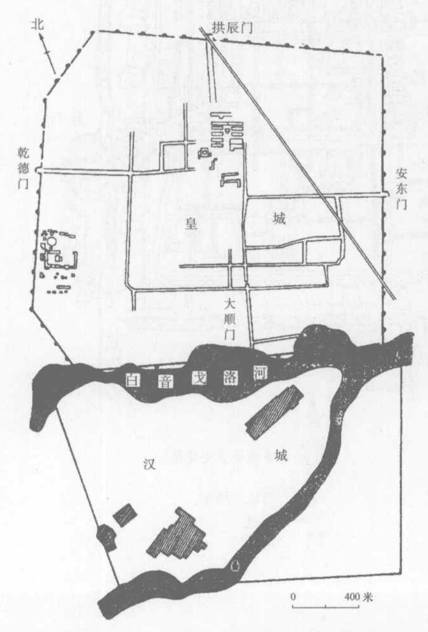
图四二　宋平江府图碑摹本

高 2.76、宽 1.415 米，边框高 2.03、宽 1.39 米，顶上正中碑额刻“平江图”。四边分别题刻东西南北四字，以北为上。该碑详细记录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为研究当时的南方地区城市布局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两重城墙。外城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城内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门，东面二门。每门均水门、旱门并列，除南门外均无城楼。各城门均不相对，无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东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为居民区，采取南北街和东西巷的布置。街巷多与河并行，组成水陆交通网。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主要分布官署、学校、寺观等。全城共有 357 座桥，65 座跨街而建的牌坊。子城在城内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内为府衙，仅南、西两面有城门。南门以内于轴线上建府衙，前设厅，后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两侧为府属各厅。平江城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样规则方正，这与南方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平江城居民区小巷横列、跨街建坊等布局为后代城市所仿效，为坊市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形式。

（二）辽代城址

辽代统治者曾先后建立了五座都城，史称辽代五京，即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县）、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城西南）。其中的上京、中京是辽代都城建设发展史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逐步接受中原文化的过程。



图四三　辽上京城平面布局图

1. 辽上京

辽上京由南北二城构成。北部为皇城，南部为汉城（图四三）。

皇城是契丹统治者居住之处，分外城和大内（宫城）两部分。外城平面呈不规则六边形，南北长约 1600、东西宽约 1720 米，周长 6399 米。城墙夯土版筑而成，高 6~9 米。城墙外侧筑有马面，凸出主墙 12 米，现残存马面 45 个，最高的达 13 左右。它们可能就是《辽史》中所云的“楼橹”。两个马面之间的间距约在 110 米左右。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城墙由主墙、内侧的附加墙台和马面三部分组成。主墙先建，先挖约 0.8 米深的基槽，内填胶泥和小石子，构成基础，基宽 15 米。主墙内侧有高宽约为 5 米的附加城台。《辽史》卷三十七《地

理志一》“上京道”条记载，皇城有四个城门，东为安东门，西为乾德门，南为大顺门，北曰拱辰门。现存东、西、北三面城门遗址都有简单的圆形城门，在北墙外还发现了护城壕的迹象。城内道路宽 14~20 米，路面铺碎石、方砖。皇城南部主要分布官署、住宅、礼制性建筑、寺观和市肆等，且相对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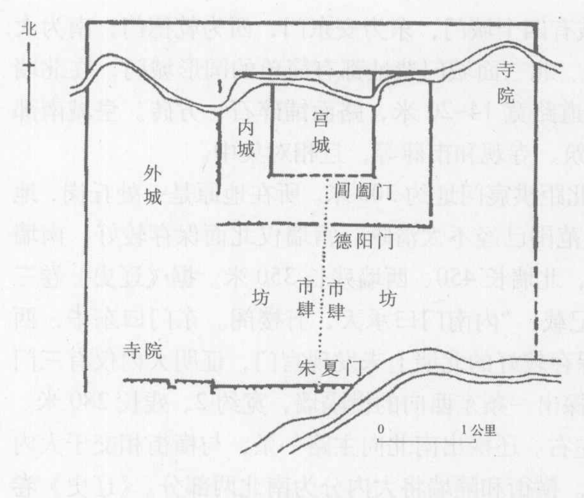
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北距拱宸门址约 300 米。所在地原是一处丘岗，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全城。大内的范围已经不太清晰。宫墙仅北面保存较好，南墙的位置未探出。从残存的遗迹看，北墙长 450、西墙残长 350 米。据《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条记载：“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在保存较好的北墙上未发现宫门，证明大内仅有三门的记载是正确的。在大内的中部探出一条东西向的横隔墙，宽约 2、残长 280 米。隔墙北边有横街一条，宽 10 米左右。还探出南北向主路一条，与横街相交于大内中心，纵街的东面也发现了隔墙。横街和隔墙将大内分为南北两部分。《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北面朝官”条记载：“契丹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枢密院……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大内中的南北两部分，可能正与契丹南、北院相对应。据文献记载：大内“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卢，皆东向。”说明大内之内保留了契丹民族居住毡卢和以东为上的习俗。

汉城位于皇城的南面，平面略呈方形，是汉族、渤海和掠来的工匠居住的地方。《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记载：“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市肆……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可见，汉城还居住有西域商贩和各国信使。城北面的白音戈洛和南边的一条小河在东南部汇合，对城址破坏较大。特别是北墙，也即皇城的南墙已残存无几。据勘测，汉城周长 5800 米，现存城墙残高约 2~4 米，夯土版筑，基宽 12 米，无马面和瓮城等设施。城内还可残见南北纵街和东南横街的痕迹。横街两端有突出地表的方形台基，是文献记载的监督防御市民的“看楼”。横街两侧有狭小的居住址，大约为工奴们的住所。

从上京城的布局来看，虽然突出皇城和宫城的地位，但道路系统并未严格体现出以宫城为中心的思想，而且无中轴线观念。皇城各门也不两两相对，较多的考虑了实际使用，较少礼制束缚。宫城内的建筑采取东向，并设毡卢，反映了契丹镞的游牧习俗。“汉城”、“回鹘营”的设置，反映出民族间的矛盾。尽管这座城市也模仿了中原城市的布局，如皇城中的功能分区，但上京总体上仍是一座带有浓厚的契丹习俗并反映着民族矛盾的城市①。

---

①辽宁省巴林左旗博物馆：《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 年第 5 期；李逸友：《辽上京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



图四四　辽中京城平面图

2. 辽中京

辽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宫城，以外城的南门朱夏门、内城的南门阳德门、宫城的南门阊阖门所在位置为中轴线，对称布局。宫城居北，坊市在南，与隋唐时期的城市布局相似，只是干道两侧的坊市有所不同。整体布局形式，应当是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的结果（图四四）。

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200、南北宽 3500 米。城墙残存高度 4~5 米，基宽 11~15 米，夯层厚 0.1~0.15 米。南面正中开门，并有瓮城。四角有角楼，但未见马面。外城中央的主干道即朱夏门——阳德门之间的道路宽 64 米，用黄土、灰土及砂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两侧有排水沟，其上覆盖木板或石板。主干道两侧有南北向纵街 3 条和东西向横街 5 条，宽度大都在 4~15 米。干道两侧为坊　市区。市为廊舍型，紧邻干道，文献记载有"廊舍约三百间"。据发掘，廊舍为一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层尚存。坊在市的外侧，两侧各有三坊。西南隅分布有寺院，发掘了一座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皆为 5 间、中央有佛坛、殿内以砖铺地的佛殿基址。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2000、南北长 1500 米，东、南、北三面城墙保存较好，残高约 5 米，基宽 13 米左右。内城墙上有马面，两马面间距近 100 米，无角楼。南墙正中有两个相距 20 米高大的夯土层，残高 6 米，为阳德门遗址。往北为一条宽 40 米的大道，直通宫城南门阊阖门，阊阖门内的道路仅宽 8 米。城内多为空旷的地方，未见遗迹。在阊阖门南 85 米处，从正中大道向东西伸出一条宽 15 米的道路，折向宫城，通往东、西掖门。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北端，与内城共享北墙，其余三面城墙另筑。其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1000 米，夯土墙已经被洪水冲毁。四角有角楼。南墙正中为阊阖门，地面无存，在其东西两侧发现宽约 15 米的东、西掖门遗址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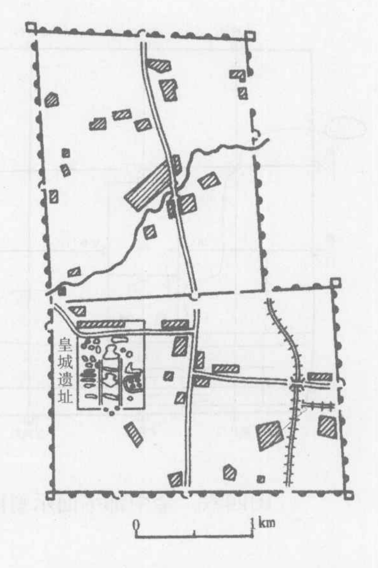
（三）金代城址及其他

1. 金上京

金上京是金朝初期的都城，其遗址在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金太宗时称为

①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 年第 9 期。

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称上京。贞元元年（1153）迁都中都之后，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1157），毁上京宫殿、宗庙、大族府第，夷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称上京。大定二十一年又陆续修复宫殿、城垣，但实际已经不是都城。



图四五　金上京遗址平面图

金上京由南北二城组成，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与辽上京的布局相似。城址平面呈曲尺形（图四五）。南城南北长 1528、东西宽 2148 米。北城南北长 1828、东西宽 1552 米。两城周长 10873 米。城墙为夯土版筑而成，残高 3~5、基宽 7~10 米。城墙外侧筑有马面现存马面 89 个，间距 80~130 米。北城的西北角、东北角以及南城的东北角、东南角、西南角都建有角楼。全城共发现 9 个城门遗址，其中 8 个有半圆形瓮城。城门的分布状况为：北城东面 2 个、西面 1 个、北面 1 个；南城东面 1 个、西面 1 个、南面 3 个；南北城隔墙上 1 个。城墙周围建有护城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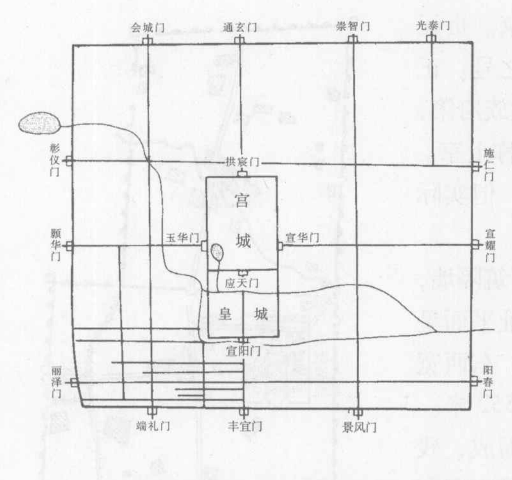
皇城又称为大内，位于南城北部偏西。南北长 645、东西宽 500 米，周长 2290 米。墙基宽约 6.4 米，现皇城南壁保存有午门遗址，前有阙，在午门后的中轴线上残存有五个台基，在后部形成两组殿基，由前后殿和中间的柱廊构成，平面呈工字形。在正殿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残长 380、宽约 11 米。工字形殿基及殿廊结构，都是宋代典型的宫殿制度。在城南还发现了佛寺及附属宫殿建筑，城北则主要为手工业区和民居[①]。

金上京的规划因地制宜，较少受到里坊制的影响，但上京的皇城比较多地模仿了北宋制度。据《大金国志》记载："规模曾仿汴京，然十之二三而已。""城邑富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

2. 金中都

金中都遗址位于明清北京旧城的西南部，即今北京市宣武区境内。1149 年，女真贵族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位，改元天德。天德三年（1151），完颜亮下令"广燕城，建宫室"，将辽的燕京城进行扩建，并以其作为新的都城，并派张浩、卢彦伦等负责营建事宜。贞元元年（1153）三月，正式将都城由上京迁到燕京，并将辽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金王朝将都城由上京迁到中都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1）政治原因：金王朝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北方广大的农业区都归于金朝的统治之下。而金朝的上京远在东北，对中原农业区的

①徐苹芳：《金上京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图四六　金中都平面示意图

统治有诸多不便之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为此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往南迁徙。(2)经济原因：上京处于松花江流域，土地贫瘠，为了供应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费用，每年必须从河北、中原地区征调大批物资，而这些物资转运上京是非常困难的。

基于以上原因，金王朝将政治中心南移，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局势。而选择燕京作为新都的地点，是由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盖京都之首选也。"①

金中都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图四六）。在修建外城之前，完颜亮曾经"先遣画工写京师（汴梁，开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张棣《金房图经》，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皇城宫室是模仿北宋都城汴梁而修建的。

外郭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长 4510、西墙长 4350、南墙长 4750、北墙长 4900 米。新中国建国初期，西墙和南墙尚有一些遗迹，在西墙南部还保存有高 6、基底宽 18.5、宽近 30 米的城门遗迹，应为丽泽门遗迹。经过钻探，外郭城有城门 13 个。东面自北而南依次为施仁门、宣耀门、阳春门；西面自北而南依次为彰仪门、颢（一作灏）华门、丽泽门；南面自东而西依次为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北面自东而西依次为光泰门、崇智门、通玄门、会城门。明代曾经对金中都进行过测量，测量的结果为"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洪武实录》）。现今测量的结果约合明代的五千六百丈，与明代的数字差不多。

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偏西，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东西南北四面各有 1 座城门，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应天门、拱宸门。皇城在宫城之南，南门为宣阳门。

从考古发掘来看，金中都外郭城的城门除光泰门之外，均遥相对应，均有笔直的大道相通。特别是外郭城南面的丰宜门、北面的通玄门，宫城的南门应天门、北门拱宸门，皇城的南门宣阳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应当就是金中都的中轴线。金中都的太庙、尚书省、会同馆（接待各国使臣的场所）位于宫城南门应天门和皇城宣阳门之间，这是金中都模仿中原都城的明显例证。

金中都城内的街道布局整齐，原来燕京城所修建的街道，基本未变，仍为里

①《金史》卷九十六《梁襄传》。

坊制形式，共计 62 坊：城东南、东北为 20 坊，城西南、西北为 42 坊。而扩建的丰泽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制形式。两种不同的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由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的典型材料。

3. 金代地方城址

东北地区的金代地方城址数量众多，但经过发掘者少，仅有数座，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女真部落的城，一类为地方州城。位于黑龙江克东县的蒲峪路古城，是金代北边重镇。通过对门址和衙署遗址的两次重点发掘，搞清了官署区和工业、居民区分设的规划布局。这座城址是首次发掘的金代城址，对于了解金代城址布局有重要意义。平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有南北两门，门外设半圆形瓮城，只有一个门洞，两壁立有 15 根排叉柱，两门之间的大道将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衙署遗址位于城内东北角，为一前有月台、面阔 5 间、进深 8 间的高台建筑，室内采用减柱法，殿内东侧设有火炕，西北部设厨房。这种布局符合女真人生活习惯的要求。城内发现不少金代中晚期的遗物[①]。

金代城址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1）沿江河有秩序地排列，形成交通干线，城与城间距 5~7.5 公里，说明当时的交通主要依靠江河，包括水运和沿河陆运。（2）以金上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上京周围最密集，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网。（3）在重要的山川隘口之地，筑城堡和山城，并且有较多的子母城。大城修筑于平地，小城则为山地城，从而共同构筑更为有效的防御体系[②]。

金代城址的共同特点表现为：（1）形制上并不统一，大多数是方形，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形状的不规则形城。（2）城的大小有等级上的差别。如上京周长 15 里以上，州府城周长 8 至 12 里，观察州或府城周长 5 至 7 里，县级或猛安（千夫长。按规定，三百户为谋克—百夫长，十谋克为猛安）城周长 3.5 至 5 里，谋克城周长 2 至 3.5 里。（3）有很强的防御色彩，作为防御设施的马面、瓮城、角楼、护城壕、烽火台等齐备，还有许多互相拱卫的子母城。（4）较大的城附近常有大墓或墓群发现。说明这些城有可能是一些大族的采邑。（5）主要作为堡垒使用。从城外常有大面积遗址来看，居民平时居住于城外，战时进入城内[③]。

4. 金代界壕

金代界壕是金代在北方边境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称为“界壕”或“堑壕”，俗称“成吉思汗边墙”。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少部分在蒙古国及俄罗斯境内。大部分为东北—西南走向，横跨约 2500 公里，实际总长度约 7000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所：《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古城发掘》，《考古》1987 年第 2 期。
②王永祥、王宏北：《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辽海文物学刊》1988 年第 1 期。
③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公里。根据《金史》记载，天眷元年（1138）以前，就曾在东北路泰州境内兴建界壕。大定十七年（1177）和二十一年曾经大规模修建了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辖境内的界壕，并把它们连接成为一条长壕。明昌三年（1192）至承安三年（1198），又在西南路、西北路、临潢路，并在泰州边境挖掘新的界壕，这便是史籍上记载的"明昌新城"。这项军事防御设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不仅挖掘长壕，而且还在壕内侧堆土为长堤，并在长堤上加筑马面。沿着界壕的内侧每隔一定距离构筑边堡，并在交通要道之处构筑关隘，所以也称为"界壕边堡"。对于金代界壕的调查研究在20世纪已经开始，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界壕的修建、沿革和分布情况。40年代，李文信调查了金代临潢路的界壕边堡。1968~1981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曾经分别调查了各路界壕边堡。

（1）分布与走向

北线即天眷元年以前构筑的界壕，东起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南岸，向西伸延至额尔古纳河南岸，经满洲里市北面穿越俄罗斯，再向西伸入蒙古国境内，行经乌勒吉河和克鲁伦河之间，直到肯特山南麓止，全长约700余公里。

南线，应是明昌、承安年间构筑的，即史籍所称"明昌新城"。东端起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北8公里的前后七家子村附近，西端止于内蒙古武川县上庙沟南面的大青山主峰北侧，连同分支线在内总长约6500公里。东端起点有两条线并行，约向西伸延10公里合为一条，沿大兴安岭东南麓向西南方伸延，到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乡满族屯分为内外侧两条主线。外侧主线在四王子旗补力太庙东约20公里和内侧主线会合，然后延伸到上庙沟南面的西端起点。内侧主线在正蓝旗汉克拉苏木境内又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并在商都境内会合。

南线上还有三条支线：A. 位于外侧主线北侧，西北伸入蒙古国境内，在中国境内长约200余公里；B. 位于内侧主线南侧，在突泉县境内与内侧主线相合，全长100余公里；C. 位于内侧主线南侧，分布在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境内，全长约200公里。

（2）界壕的构筑

主要是挖一条堑壕，以防战马冲越。堑壕口一般宽5~6、底宽3、深2米。掘壕所取得的土石方，堆积在壕的内侧，连接成一道长墙（或称长堤）。墙身有土石混合垒筑、土垒筑或夯筑，现存一般高度在4米以下。在南线内侧主线和支线的外侧，都开挖有副壕，垒筑了副墙（副堤），形成主墙、内壕、副墙和外壕4个部分。外壕上口宽3~5、底宽2~2.5米。副墙现存高度在2米以下。在主墙上加筑有马面和烽台。马面伸出墙外4~5、底宽6~8米，高出墙身1米多。各马面间距为60~120米，多设在险要地段或墙身转折处。烽台有的筑在主墙上，有的筑在堑壕附近，残高5~6米，各烽台间距为500~2500米，多建在山顶和谷口，以便于瞭望

和传递信息。凡是加筑副壕、副墙和马面的界壕，都是明昌、承安年间开掘修筑而成。

（3）边堡与关隘

按其形制和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戍堡、边堡和关隘三种。

戍堡，也称壕堡。大部分位于界壕内侧，并且多为利用界壕主墙作为北墙，只另行筑东、南、西三墙，也有在界壕内侧另筑一小堡的情况。戍堡平面呈长方形或正方形，每边长 30~40 米。堡内仅有建筑遗址 1 处，曾经发现火炕遗迹，出土残碎的陶盆、陶罐、粗白瓷碗碟等生活用具，应是居住戍卒的地方。

边堡。在河谷交会处的冲积平原上修建，位于界壕内侧，有的距界壕仅数米，有的则在界壕南面 5 公里，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呈长方形，边长 120~190 米。残墙高度在 5 米以下，墙上加筑有马面，南面正中开门，个别的加筑瓮城。堡内一般在正中夯筑一座方形建筑台基。有的台基上还保存有不规则的石柱础，地表散有砖瓦碎块及白瓷片，应当是官吏居住的地方。在中央台基的附近，发现有小型的建筑遗迹，出土陶罐、陶盆、粗白瓷碗碟等生活用具，并有铁镞、铁甲片、铁马镫、铁刀、铜钱等等，应是屯兵的地方。

1981 年 6~8 月，内蒙古哲里木盟博物馆对霍林河煤田矿区内的金代界壕边堡进行了清理，发掘了 2 座形制基本一致的边堡遗址[①]。其中一号边堡遗址保存较好，平面呈方形。南墙长 192、东墙长 190、北墙长 191、西墙长 187 米，周长 760 米。城墙断面呈梯形，外壁较陡，内壁稍缓，筑有副墙。底宽 6.5、上宽 3、残高 2.8 米。系用黑黄土版筑于原生土上，夯层厚约 15 厘米，坚硬结实。筑墙之土大部取于墙外，小部取于墙内，故在墙外 2.4 米处形成环城大沟——护城壕，壕宽 4、深 2.5 米。南北护城壕外 40 米处，有两条小河沿浅山脚下由西向东流去，在城东草原上汇合，形成两条天然护城河。仅有一座城门，辟于东墙中部，宽 3.4~4 米之间。城门门道路土厚约 30 厘米，土质坚硬，呈鱼鳞状，是为长期人行马踏所致。两墙根底部有大量残砖，可知原城垛之上应有砖筑防护设施；城门遗址发现大量的朽残木块，可知城门为木制；门道中内侧有两块巨石横卧，似为顶门之用，大概是当年战事炽烈时守御者采取的应急措施。马面三个，建在南、西、北墙中段。马面为长方形，凸出城墙外 4、宽 8、残高 3.2 米。其下部系夯土筑成，坚硬结实；顶部有砖筑防御设施，因损毁严重，结构已不可知。马面内侧倚墙处建有戍兵住房。四角各有一座似乎近圆形的角楼，凸出城墙外 6、残高 3.5 米。底部夯土筑成，上部原有砖石防御设施，仅余碎石残砖。内城呈正方形，附设于城西南角。其西、南两墙，借用了外城墙；东、北两墙，于城中另外夯筑，夯层厚约 20 厘米。东、北墙各长 66 米，断面呈梯形，底宽 3、上宽 2、残高 1. 5 米，较外城墙略粗松。筑墙之土取于墙外，形成了一条宽 3、深 2 米的护卫内城的壕堑。内城之门辟于东墙

①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2 期。

中段，宽 3.2 米，墙垛附砖，已塌落于门道中。门道中路土较薄，约 10 厘米。

关隘。设在界壕经过的南北交通要道上，往往处于比较开阔的河谷地带。在界壕上留有豁口，再在界壕内侧加筑三面墙，一侧开门，有如瓮城性质。关隘与界壕主墙的高度相等，平面呈方形，每边长 30~40 米不等，关隘内未发现有建筑遗迹。

（四）西夏城址

西夏城址中比较重要的有黑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赖湖波镇东南 25 公里的荒漠上。由于该城遗址处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气候比较干燥，使得遗址内埋藏的大量有机质文物特别是一些文书得以完好保存。1908~1909 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首次在这里挖掘，获得大量西夏文文书，引起了国际上一些探险队及学术界的重视。英国人斯坦因等外国探险队也相继而来，并进行了多次发掘，致使大量文书及珍贵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1927~1931 年，由中国学者徐旭生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曾经进行过调查和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多次对黑城遗址进行过调查，并于 1983 年 9~10 月和 1984 年 8~11 月进行过两次发掘，发掘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基本揭露了城内主要部分的建筑遗址，也大致对黑城的建置、沿革和城市布局情况有所了解[①]。同时也从地层上纠正了《元史·地理志》当中将其作为汉代居延城的说法，证明黑城遗址就是西夏的黑水城和元代的亦集乃路遗址。由于黑城遗址南临额济纳河下游的干涸河床，而额济纳河古称弱水或黑水。西夏语谓之为亦集乃（额济纳为亦集乃的转音），为黑水之意；蒙古语则谓之为哈拉浩特，为黑城之意。

通过发掘得知，黑城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叠压在一起。外围大城是元代扩建后的亦集乃路城，也就是现在所见的黑城的规模。小城位于大城内的东北隅，东、北两面城墙被压在大城城墙下之下，西、南两面城墙被元代居民利用，分解为不相连的几段。从小城的城墙夯土来看，土质单纯，只含有汉代的灰陶片，但在发掘过程中又不见汉代地层，由此可见，小城的创建年代早于元代而晚于汉代。又从城内出土物和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小城即西夏所建的黑水城。

小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 238 米，正南设有城门，并筑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同时，利用额济纳河作为天然屏障，未设置护城河。城墙系平地起夯，筑墙所用的土由别处运来。这座城与辽、金乃至于元代的边关城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

大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21、南北宽 374 米。四周城墙保存较好，城墙基宽 12.5、顶宽 4 米左右，平均高度达到 10 米以上。东西两面各设置 1 座城门，城门之外有正方形瓮城。城四角设置向外突出的圆形角台，城垣外侧设马面 19 个，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 7 期。

北面6个、南面5个、东西两面各4个。

黑城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文书，已经编号的将近3000份，内容包括诰书、公文、帐册、诉状、契约、书信、票据、药方、经咒等。文书所用文字以汉文居多，也有一部分为西夏文、畏吾体蒙古文以及少量藏文、八思巴文，还包括一些其他文字如波斯文。

西夏城址除黑城遗址之外，还有一些沿边境修建的城堡。这些城堡分为山地和平地修建两种。平地城堡多呈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而山地城堡则多据险而筑，形状城不规则形。这些城堡的规模较小，周长在1000~2000米左右，而且马面、瓮城、角台等军事防御设施齐全，属于军镇性质。这也与当时西夏、金和宋的对峙形势有密切关系。

（五）元代城址

蒙古族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本无城郭宇栋，他们修建城市是受了中原地区的影响。通过对内蒙古境内境内的24座元代城址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在平面布局和建筑物的组合上，都受了中原城市的影响①。还有学者将蒙古、元代城址分为完全沿用辽金旧城、改造辽金旧城和新建城市三种情况，并按等级将其分为都城、投下城和路、府、州、县城，并对城市布局及等级制度进行了探讨②。元代城址中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都、上都和应昌路城。

1. 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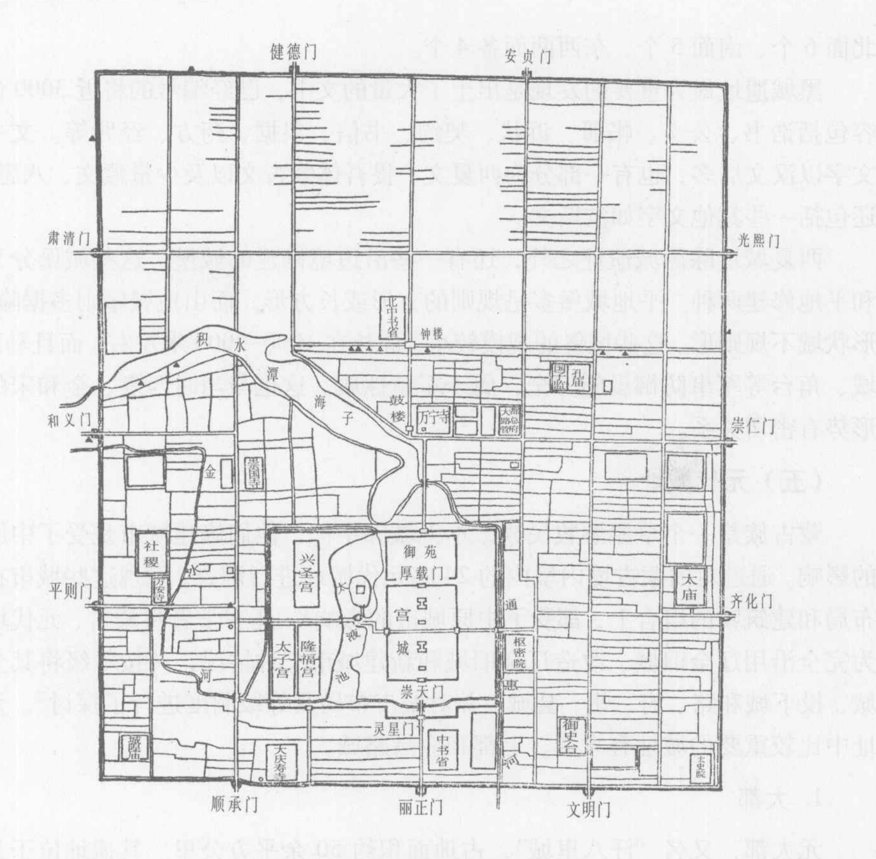
元大都，又名“汗八里城”，占地面积约50余平方公里。其遗址位于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元大都继承了宋代以来的都城布局传统，有布局规整的三重城。主要宫殿都建在中轴线上。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稍短，南北略长。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已经勘探清楚，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宫城偏于皇城东部。纵贯宫城中央宽达28米的南北大路，也就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图四七）。

经实测，外郭城南城墙长6680、北城墙长6730、东城墙长7590、西城墙长7600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底宽24、上宽8、高12米。城外有护城河。元大都外郭城共有11座城门，除北面仅有两门外，其余三面每面三门。东面由北而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由东而西依次为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由北而南依次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北面由西而东依次为健德门、安贞门。各门修建时均无瓮城，至正十八年（1358）始修瓮城、吊桥。

元大都的居民区规划整齐，基本建制也称为坊，全城共设五十坊。每个坊内分了10个左右间距相等的胡同，每个胡同又通向大街。主干大街都是南北向，宽

①马耀圻、吉习发：《内蒙古境内元代城址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

②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所见城市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图四七　元大都城平面示意图

35 米左右，大街本身宽 25 米，路旁各有一条宽约 2.5 米的排水沟，沟外各有一条 2.5 米宽的小路。横向胡同一般宽 7~9 米。街巷的宽度与文献记载的大街宽度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基本相符。根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划线整齐，有如棋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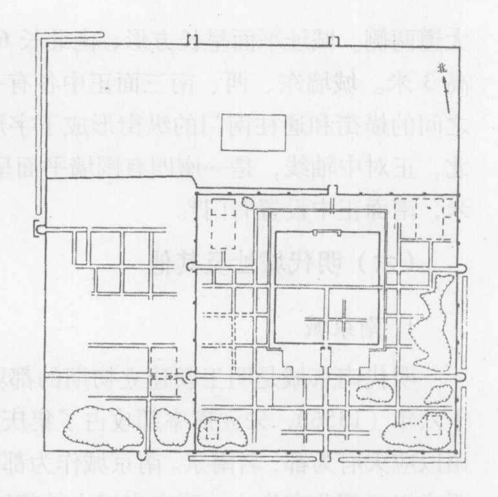
元大都的用水系统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用水系统；二为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2. 上都

元上都蒙古语为"兆奈曼苏默"，意思是"一百零八座庙的地方"。其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五一牧场"范围内，坐落在滦河上游（闪电河）的北岸，背靠南屏山，南面是金莲川平原。元上都曾一度是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建成后为夏都，直至元亡。在元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上都遗址保存比较完好，由宫城、皇城、外城和关厢等部分组成（图四八）。

宫城在皇城中部偏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570、南北长 620 米。城墙夯

筑，外表包砖。墙高约5、基宽10、顶宽2.5米，收分较大。四角建角楼，开三门，正南门为阳德门，另有东、西华门，北面无门。在宫城外距城墙24米处有一圈石砌的夹城，底宽1.5米。宫城内的街道呈丁字形，分别通向东、西、南三门。



图四八　元上都遗址平面图

皇城在外城东南角，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400米。其东、南墙分别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南北面各开一门，有方形瓮城。东西墙上各有二门，并建有马蹄形瓮城。城墙夯筑，外面用石块包砌，基宽12、上宽2.5、残高约6米。墙外侧每隔150米筑一个马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皇城内的街道分布整齐对称，宽窄不等，主次分明。宫城外的正南街宽25米，其两边各有一条贯通全城的南北大街，宽15米，将宫城之南分四等分。在街巷两旁隐约可以看出一些较大的庭院遗址，推测为官署建筑。据文献记载，在皇城内有很多官署和寺庙，但现在只有四角的寺庙遗址尚可与文献印证。东南角是孔庙，为前后两殿的遗址。西南角为华严寺，由于这一带地基条件不好，在其槽内打了一排排木桩加固。西北角是乾元寺，为前后两进的院落，前院有带回廊的主殿。东北角为大龙光华严寺，规模很大，为并列三重院落，中院为主体，在内城四角安排宗教或礼制性建筑，是很有特色的设计。

外城在皇城西、北面，平面呈正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版筑。保存最好的城墙尚高5、下宽10、上宽2米。南、西墙各开一门，西墙上的城门有马蹄形瓮城，北面开二门，南、北墙上的城门有方形瓮城。外城的北部地区是一个东西向的山岗，没有街道。在北墙附近有一些小建筑基址。中部偏南有一个长方形石砌大院，内无房基，推测原来是栽培奇花异草和豢养珍禽异兽之处，应是文献记载的御园。南部从皇城两西门有两条东西向通向外城城门和城墙，还有一条南北向的街道。这几条街道构成了外城的主要街网，建筑基址都在街道两边附近，大都是一个个院落。外城南部应是官署、作坊区。

3. 应昌路城

城址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经鹏镇西，为弘吉剌部路王世居之城，也称鲁王城。元亡后，顺帝曾北奔此城，并终老于此。明洪武三年（1370）攻占应昌城。后来，鞑靼曾一度占据此城，此后逐渐废弃。

城内发现王府、官署、作坊等遗址，一般居民的居址和坊市遗址在南门外的

大道两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650、东西宽约 600 米，城墙夯筑而成，残高 3 米。城墙东、西、南三面正中各有一座带瓮城的城门。城内主要街道由东西之间的横街和通往南门的纵街形成丁字形街道布局。主体建筑鲁王府位于丁字街北，正对中轴线，是一座四有围墙平面呈长方形的小城，南北长 300、东西宽 300 米，南面正中设置有门①。

（六）明代城址及其他

1. 南京城

明代南京城是明王朝建立初期的都城，其遗址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部攻占了集庆路，即改称应天府。明洪武元年（1368），诏以应天府为都，名南京。南京城作为都城使用了五十余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迁都北京为止。明南京城由外郭城、应天府城和皇城三重城墙构成。

外郭城是为了防御的需要，在应天府城的外围利用天然的黄土丘建成，周长 60 公里，共有 16 个门，其中的正阳门与宫城的南门午门、皇城的南门洪武门所在位置的南北向道路及其延伸线，构成全城的中轴线。城墙外有城壕。外郭城和应天府城之间为村落和耕地。正阳门外还设有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先农坛等礼制性建筑。

内城，也称京城。即应天府城，也即今南京城，周长 33.7 公里，位于外城的东部偏南，有 13 座城门，均设有瓮城。其中以聚宝门（今中华门）、三山门（今水西门）和通济门最为坚固，有三重瓮城。城墙平均高 14~21、基宽 21、顶宽 4~10 米。建筑方法为：以条石为基础，内外壁包砌大块城砖，以石灰、糯米汁加桐油粘接，中间用砖块、砾石和黄土填充。

皇城位于应天府城的东南隅，平面呈正方形，有六门：南面三，中为洪武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西各一，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北面一，为玄武门。皇城南面御街两旁是文武官署，一直延伸到洪武门。

宫城，也称紫禁城，在钟山南麓，向南展开，居皇城之中，南北长 2.5、东西宽 2 公里。有六门：南面三，中为午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左掖门和右掖门；东、西各一，分别为东安门和西安门；北面一，为北安门。午门前的中轴线两旁布置太庙和社稷坛，是标准的左祖右社的格局。

2. 明中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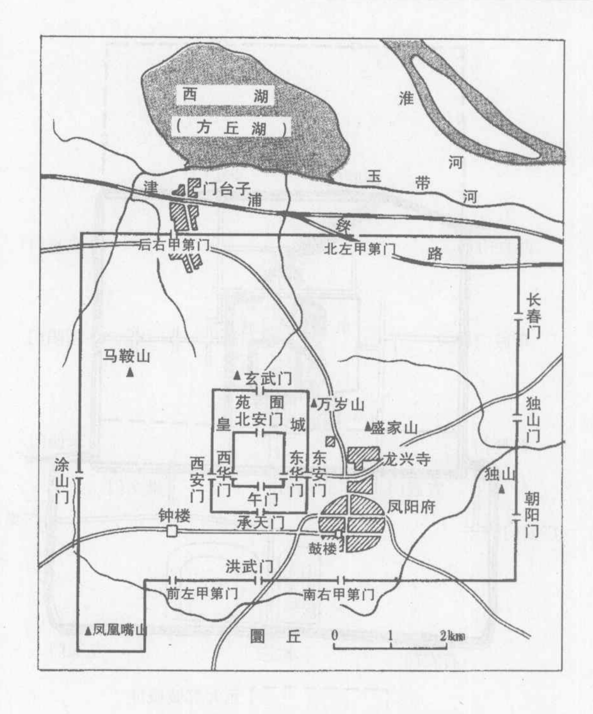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其故乡临濠所建的都城，其遗址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以南京为都，而以临濠为中都。洪武二年（1369）开始兴建，至洪武八年停建。由于兴建和使用的时间短暂，未形成政治中心，但它在

①李逸友：《元应昌路故城调查记》，《考古》1961 年第 10 期；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等：《内蒙古东部航空摄影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2 年。

城市规划上的某些布局，包括宫城内部的宫殿布局，都影响了明北京城。

中都城平面近似方形，东西长7760、南北宽7170米。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图四九）。西南角向外突出，因凤凰嘴山位于此处，所以称突出部分为凤凰嘴。

外城有9座城门：东面自北而南为长春门、独山门、朝阳门；西面仅有一门，即涂山门；北面有2座城门，自西而东为后右甲第门，北左甲第门；南面有3座城门，自东而西为南右甲第门、洪武门、前左甲第门。



图四九　明中都遗址平面图

皇城（明代称为禁垣），位于全城的南部稍偏西，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160、东西宽1860米。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座城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南为承天门、北为玄武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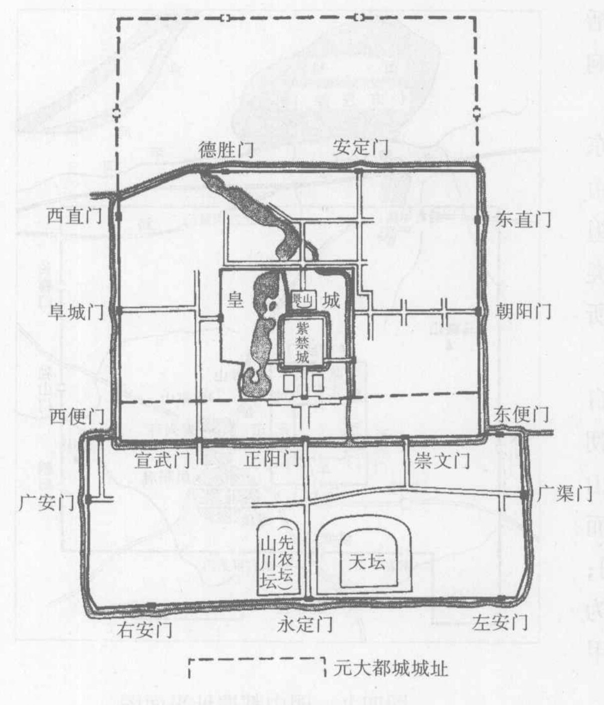
宫城（明代称皇城），在皇城中央稍偏南处，平面近似方形，南北长960、东西宽890米。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座城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南为午门，北为北安门。宫城之内尚存奉天殿、文华殿和武英殿的基址，而以午门墩台保存最好，门洞内石座上的雕刻尤为精美。

明中都的官署及其他分布为：午门外左为太庙和中书省，右为社稷、大都督府、御史台。皇城承天门外左为城隍庙和国子监，右为功臣庙和帝王庙，这些建筑的遗迹尚历历可见。

洪武八年停建中都以后，到洪武十六年，首先拆中都宫殿的建筑材料修建龙兴寺，天顺三年（1459）又拆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500余间建筑重修龙兴寺。此时，中都的宫殿已经仅存遗址，中央官署也仅存中都留守司了。但在皇城的东侧，自天顺以后，却陆续修建了五所“高墙”，专门囚禁皇族宗室罪犯，它是明中都城中很特殊的建筑，崇垣深壕，望楼敌台，犹如郡县城郭，其遗迹至今犹存。

3. 明北京城

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面积约24.5平方公里。由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



图五〇 明北京城平面图

四部分组成（图五〇）。

内城基本沿袭元大都的基本格局，对元大都的最大改变就是东西位置发生了变化。元大都是以金中都的离宫大宁宫为中心建设的，皇城包括了这一片离宫区，大内和隆福宫等都沿湖设置，而明北京城是以中央的宫城为中心对称安排的。为避开金中都旧城，元大都尽量往北扩展，但直至元末，作为发展预留地的北部仍相当空旷。明代初期，将元大都的北部放弃，在原北墙以南五里另筑新墙，仍开二门，即德胜门（西）、安定门（东）。

外城，明嘉靖时为加强京师防卫，加建一圈外郭城。先从人口聚居较多的南面开始，但由于财力不足，其他三面未能修成，仅将南面的天坛、山川坛（清代改为先农坛）和居民稠密的工商业区围筑于外城之内。外城东西长 7950、南北宽 3100 米，砖包城墙，有护城河。外城修好后，北京成为凸字形。外城南面三门，中间为永定门，东边为左安门，西边为右安门。东西两面也各有一门，东为广渠门，西为广宁（广安）门。东北、西北各开一便门。外城街道多为修建前自发形成，在布局上不甚规整。

皇城，位于内城中部偏西南。皇城在元大都基础上向东西两面均有展拓，南面拓展约一里，原太液池也向南拓展扩出部分即今之南海。东西长 2500、南北宽 2750 米。皇城南门为承天门（清代改为天安门）。承天门前有红色的宫墙围成的丁字形凸出部分。丁字形凸出部分的正中为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后称中华门，已经被拆除）。门内有御道直通承天门，御道两侧为千步廊，两边安排中央衙署，大致按照左文右武排列。除了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中央主要官署都集中在皇城前方两侧，改变了元大都官衙分散安插于城中的布局。城门另有东安门、西安门和地安门。皇城没有护城河。

宫城，又名紫禁城，即今故宫。位于内城中央，其东西墙与元大都相同，南二墙各向南移了 400 米和 500 米。宫城有四门，南面为午门，北面为神武门，两

侧分别是东华门和西华门。宫城东西长 760、南北宽 960 米，较元代宫城略小，仅及唐长安太极宫的六分之一强。前朝为皇极殿（清代改为太和殿），后宫为乾清宫，在紫禁城的正北，用拆除元宫的废土和开挖紫禁城护城河的土堆成一山，高约 50 米，称“万岁山”、“镇山”或“景山”。其下正好压着元代的延春阁，取镇山之名含有镇压元朝王气之意。山顶建大亭，名万春亭，正在全城中轴线上，是全城的平面几何中心和最高点。万岁山之北，沿中轴线建筑了鼓楼和钟楼，与万岁山遥相对望。宫城前左方为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右方为社稷坛（今中山公园）。

4. 明长城

明长城也称为边墙，是明代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横贯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全长 6300 多公里。对于明长城的勘察与研究，1949 年以前仅停留在文献资料记载的水平上，实际工作也只是对长城的个别关口、城堡遗址进行过考察。1952 年，郭沫若提出要准备维修长城主要遗址的意见，文化部文物局派专家对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处长城遗址以及关隘进行了勘查设计维修。1956 年，又对长城全线进行了初步普查。1981 年，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又组成了 4 个小组，对明长城全线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发现了河北省滦平沙岭口（又称金山岭）、北京怀柔慕田峪等处保存较好的长城地段。

（1）明长城的修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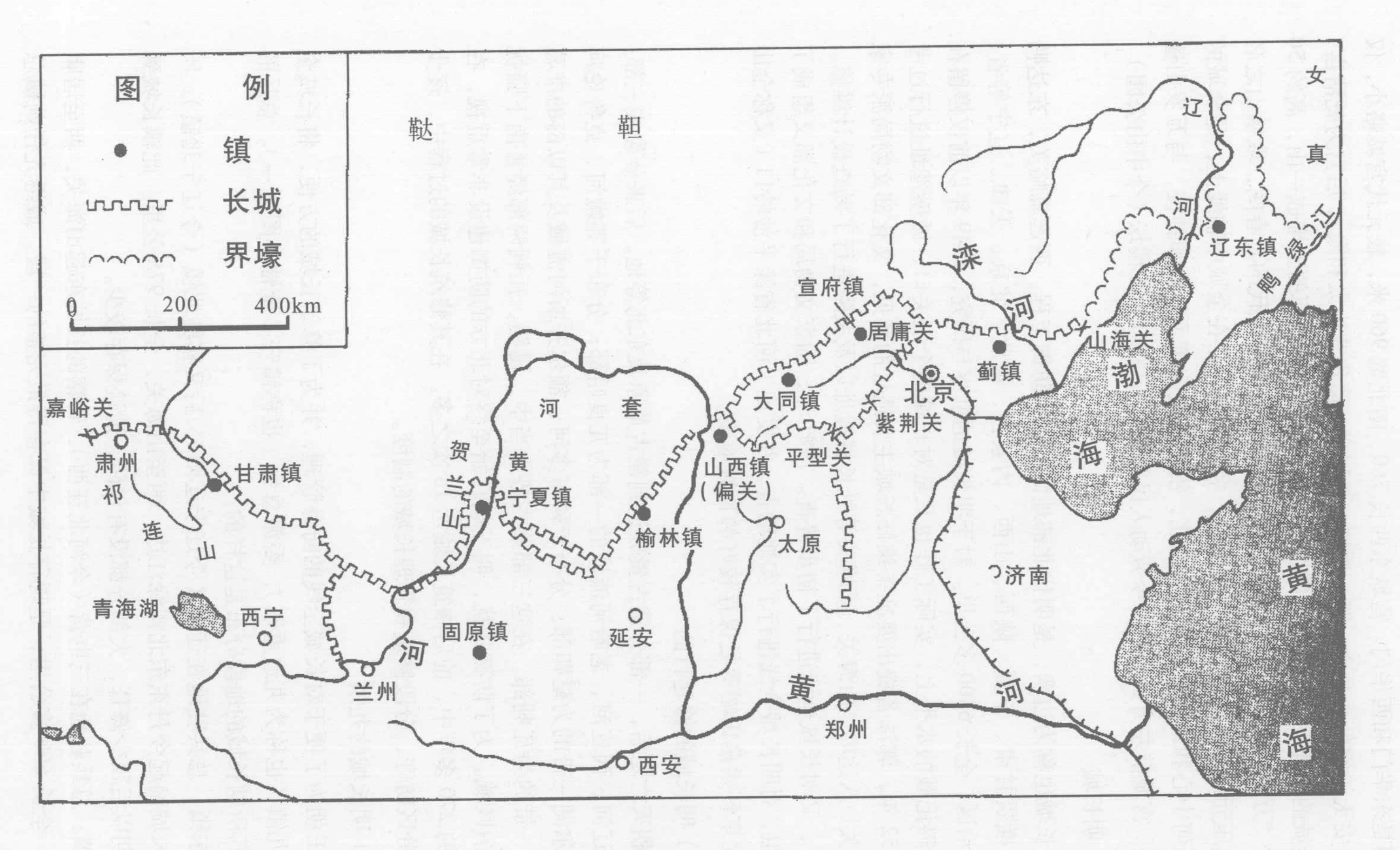
元朝灭亡之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后来分裂成三部：分布于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一部为兀良哈部；分布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的为鞑靼部；分布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葛尔盆地一带的为瓦剌部。在这三部蒙古势力当中，鞑靼、瓦剌两部经常南下骚扰明朝统治区域。为了防御骚扰，明王朝自始至终对北方的防御建设非常重视，在其存在的 270 多年中，前后修筑长城达 18 次之多。在其修筑长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分区防守、分段修筑和管理长城的制度。

（2）明长城的九镇

明王朝为了便于对长城全线的防务管理，并为了修筑长城的方便，将长城全线分为九镇（也称为九边重镇），委派总兵（也称镇守）统辖（图五一）。总兵的驻地及其所辖长城的地段分布是这样的。

辽东镇：总兵驻地在辽阳（今辽宁辽阳），后又移驻北镇（今辽宁北镇）。所管辖的长城南起今丹东东北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全长 975 公里。此镇长城到明朝中期以后很少修葺，大部分都没有包砖，遗迹保存较少。

蓟镇：总兵驻地在三屯营（今河北迁西），管辖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灰岭口，全长 600 多公里，是现存长城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段。戚继光任蓟镇总



图五一 明长城九镇位置示意图

兵之时创建的骑墙敌台，改进了长城的防御工事，不仅增强了防御能力，而且也使得长城更加壮观。

所谓敌台也称为敌楼，跨建在长城之上。有两层或三层，守长城的士兵可以居住在里面。在敌台内还可以储存枪炮、弹药、弓矢之类的武器。敌台的主要工程就分布在山海关至居庸关这一带。

宣府镇：总兵驻地在河北宣化。管辖的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西洋河（今山西大同东北），全长 511.5 公里。宣府镇长城的位置正好位于明朝都城的西北，形势十分重要，所以城墙十分坚固，并且有的地方还筑有内长城，称为内外九重北城墙。兵力的配备也很雄厚。

大同镇：总兵驻地在山西大同。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台口（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鸭角山（也称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 335 公里。

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总兵驻地在偏关。管辖的长城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老营堡、宁武、雁门关、平型关、龙泉关、古关而达到黄榆岭（今山西和顺县），全长 800 余公里。其作用是为了加强都城的防御，因其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所以又称之为内长城。这一镇的长城非常坚固，并有石墙，有些地方的石墙多达 20 多重。

延绥镇：也称为榆林镇，总兵驻地在榆林堡（今陕西榆林）。管辖的长城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全长 885 公里。

宁夏镇：总兵驻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管辖的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西至兰靖（今甘肃皋兰、靖远），全长 1000 公里。

固原镇：总兵驻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管辖的长城东起陕西靖边与榆林镇长城相接，西达皋兰与甘肃镇长城相接全长 500 多公里。此镇的长城也有数重。

甘肃镇：总兵驻地在甘肃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金城（今甘肃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 800 多公里。

以上九镇所管辖的长城的总长度合计 6300 多公里。这只是文献上记载的数据，实际的长度远不止于此。

（3）明长城的建筑结构与工程设施

明长城是由各种城、关、隘口、敌台、烟墩（即烽火台）、堡子、城墙等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城墙是明长城的主要建筑工程，6300 多公里的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上万个烟墩、敌台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古代建筑工程上的奇观。城墙的结构有的为砖筑，有的为石筑，有的为砖石混合构筑，有的为泥土夯筑。城墙的高度与宽窄随地形情况而有所不同，凡山高地险处城墙略低且较窄，平地或要冲处城墙则高达宽阔。北京八达岭长城城墙平均高约 7~8 米，墙基宽约 6~7 米，墙顶宽约 5~6 米。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垛口，宇墙高约 1.2 米，垛口

高约 1.8 米。垛口上有瞭望口和射孔。在城墙内侧相距不是甚远就有一个券洞供守城士卒上下。八达岭长城和整个蓟镇长城的墙身均用整齐的条石砌筑而成，内填碎石和灰土。墙顶、垛口和宇墙则用条砖和方砖铺砌，比以往各个时代的长城在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上都有很大改进。

墙台筑在城墙上，隔 200~300 米就有一个突出墙外的台子，叫墙台，与城墙的高度相当。墙台之上有房屋，叫做铺房，是守城士卒巡逻时遮风避雨之所。

烟墩即秦汉以来所称的亭、燧、烽燧、烽火台等。是一种利用烽火、烟气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烟墩的形式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建筑，设于地面的转折之处和山丘之上，以便互相瞭望、传递信号。高台之上有守望用的房屋和燃放烟火用的设备，台子下面还有守卫的房屋、羊马圈、仓房等建筑。烟墩的设置有四种：一种设置在长城的两侧；一种向长城以外延伸；一种是向内地和都城联系的；一种是与邻近州县、关口、路、镇联系的，大约每隔 2.5~5 公里左右设一台。烟墩的使用一般为白天燃烟，夜间放火。

根据 1952 年在居庸关、八达岭城墙上发现的明万历十年（1582）的石碑记载，明长城的修筑是按照分区、分片、分段包修。明长城的修建对于明朝政权的巩固，北方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安定，国家的安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古格王国遗址

古格王国是 10~17 世纪西藏西部的一个方国，首都在札布兰（今译札布让）。其大体位置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噶尔、日土等县。据藏文史料记载：9 世纪吐蕃王朝灭亡时，吐蕃赞普的后裔吉德尼玛衮因内部之争逃往阿里，与当地土王的女儿结婚。10 世纪中叶，吉德尼玛衮三子中的幼子德尊衮封为古格王。

据西方早期传教士文献记载，17 世纪也就是古格王国末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人安东里奥德・安得拉德来到古格首都札布兰，通过努力取得国王和王室支持，开始传教、建教堂、发展教徒，引起佛教僧侣和民众强烈不满。1630 年，国王生病，安德拉德又奉命离开札布兰。此时，古格佛教集团发起暴动，一些地方官和民众也参与其中，并请求邻国拉达克支持。拉达克王立即派兵，在山下包围了古格王宫。国王率军固守月余，最后暴动的僧侣和拉达克军队将国王诱骗出来并将其俘虏，后被押解到拉达克首府列城，至此古格王国灭亡。

对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古工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调查了古格王国都城遗址。1985 年，对古格都城，以及托林寺、多乡城堡等进行了调查，并出版了《古格故城》一书。1992~1998 年，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和复查时，发现并清理了一大批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存，有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托林寺及托林遗址、多乡城堡遗址、玛那寺及玛那寺遗址、卡尔普遗址、达巴遗址、麦龙沟庙遗址、东嘎遗址、皮央遗址、香孜遗址、江当遗址及桑丹达吉林寺等，全部分布在札达县境内。其中最重要的东嘎、皮央遗址，由石窟、寺院、城堡与塔林组成的大型遗址群。

1. 古格王国都城遗址

遗址位于西藏札达县城西18公里德朗钦藏布南岸，东西约600、南北约1200米。地势南高北低，遗址区内地形复杂，有土山、梁峁、沟壑、缓坡。建筑遗迹主要分布在朗钦藏布南岸的一座土山上，土山东、西、北三面的坡地、山包和开阔地等处也有遗迹分布[①]。

（1）王宫

王宫位于土山顶部的台地，台地平面略呈“S”形，不很规整，四周边沿为悬崖峭壁，南北长约200、东西最宽处78米多，最窄处仅17米。并用土坯于悬崖边沿砌筑防卫墙，现存墙体长430米。除南端为人工挖断之外，其余三面均为自然断崖。只有通过两条陡峭的暗道才能到达山顶宫城。王宫区内的建筑可以分为南、中、北三组。房屋大都以土坯砌成，壁面用草泥层、粗砂层、细砂层3次处理，表面光洁。南组建筑共17间，以平面呈方形的房址为中心进行布局，可能是古格王国国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宫室建筑。中组建筑共16间，以平面呈“回”字形的供佛殿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可能是官邸机构或贵族、高僧及普通僧侣的住处。北组建筑共22间，可能是军事防卫机关设施及其人员的住处。

在北组建筑群的中部东侧地下10多米处，发现了由7座窑洞式建筑组成的地下宫殿，为古格国王冬天居住之处，被称为冬宫。但没有发现涂抹壁面、处理地面和居住设施以及使用痕迹，推测冬宫挖掘于古格末期，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工。

（2）佛教建筑

城址内的佛教建筑有白殿、红殿、坛成殿、大威德殿、度母殿、供佛洞、佛塔和玛尼墙、塔墙等。佛殿建筑的平面多呈方形，室内满绘壁画，并有雕刻等，主要为与藏传佛教相关的题材，也有装饰性题材。供佛洞为窑洞式建筑，洞外有房屋建筑，室内也绘壁画，题材为各类佛像和供养人等。佛塔现存28座，较完整者5座，多用土坯砌筑而成，外抹较厚的砂泥。塔由基座、塔身、覆钵和相轮等部分组成，与早期的印度佛塔相似。玛尼墙是指镶嵌由大量玛尼石[②]的夯土或土坯墙体，遗址内现存三道玛尼墙。塔墙只有一道，一般是指在夯好的墙体上双面挖修沟槽，使之分别独立形成一个个塔身，各塔塔身联为一体成为塔墙。每一个塔身若单独分开则呈方柱体，塔顶呈方尖形。

---

①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②玛尼石：原本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一种崇拜物，通常指堆积在山口、重要通道、渡口、桥梁、山顶等处的石堆，行人路过时均在石堆上添放一石，若无石头还可以放一块骨头或破布、羊毛、头发等，同时呼叫“天神必胜，恶魔必败，叽叽嗦嗦！”这是为守卫此处的战神助威，祈愿战胜恶魔，人民安宁。佛教传入西藏后，利用并改造了这一习俗，在石上凿刻佛教造像或“六字大明咒”，供奉于山顶、山坡、要道、寺院附近，意义大致同于本教。

（3）军事设施

碉堡发现 58 座，分布于各处，其中王宫区有 20 座。碉堡平面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多为石砌基础，土坯砌筑或夯土墙体，高度一层至三层不等，四壁有窄条状或三角形的箭孔。

防卫墙共有三重，墙体为土坯砌筑或夯筑，与房屋或碉堡相连接。墙体之上有窄长条形、三角形的箭孔。第一重没有形成全封闭线，只依地形据守东、北、西南三个重要方向，第二重是防卫体系中的重点，较为复杂，有的地段多达五重之多。第三重即王宫周围的防卫墙，基本环绕一周，仅在西南部有 40 米的缺环。

（4）道路与民居

城址内的道路有主干道 1 条，原有石台阶，在外侧临悬崖处筑有土坯砌筑或夯土筑成的护墙。支道 10 多条，也在临悬崖一侧有护墙，有的无石阶。暗道 4 条。这些道路主要承担与外界联系以及城堡各区之间的联系，大致形成内外沟通的交通网络。

民居建筑有土坯砌筑和窑洞式两种，土坯建筑有单室、双室、三室、四室之分。窑洞式建筑有单室、双室、四室、五室之分。在民居的建筑的中心位置有佛殿、僧舍和佛塔等宗教建筑。

（5）墓葬

墓葬仅发现 3 座，分别为洞葬、壁葬和棺葬。虽然数量少，但基本代表了古格王国不同的丧葬习俗。洞葬是在崖壁上开凿洞室，洞内分为主室和南、西两个侧室，洞内葬有 30 多具尸骨。壁葬是在窑洞内的墙壁上开凿小壁龛，其内安葬婴儿尸骨。木棺葬为竖穴土坑式，采用木棺。

（6）遗物

在古格都城遗址发现了一批遗物，有石器、陶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石器有锅、罐；陶瓷器有罐、灯、瓶等，陶罐有带流罐、双耳罐、单耳球腹罐等，纹饰有绳纹、弦纹、直线纹、圆圈纹、锥刺纹等；铁器有斧、锯、刀、犁、锄、镰、釜、钵、镯、带扣、镞、头盔、铠甲、马掌等；铜器有盘、铃；竹藤木器有锨、碟、箭杆、藤盾等。

2. 东嘎、皮央遗址

东嘎遗址分布在东嘎村北面断崖上，现存洞窟约 200 座，其中几座洞窟绘有精美壁画。在遗址南面的台地上，还坐落着一大片佛寺与塔林废墟。皮央遗址位于东嘎遗址以北约 2 公里处。石窟分布在山前与山后，经调查统计约近 1000 座。

东嘎石窟和皮央石窟，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两处最大的佛教石窟群，石窟类型有礼拜窟、僧房窟、仓库窟以及安置高僧遗骨的灵塔窟等。其中，礼拜窟中残存着大量精美壁画。以画在窟内门道两侧或窟壁下方不太显著位置的供养人形

象最有特色，通常以聆听高僧说法的姿态出现，一般面向高僧侧坐，表情庄重虔诚。供养人的服装无论男女，都身穿一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袖长过手，衣领及衣边、袖边镶宽边或者饰图案的长袍。男子头上常戴一顶宽沿帽或扎头巾，而女子则多梳发辫，分为数股盘绕在头顶，上面再佩以头饰。

东嘎、皮央遗址的壁画题材以各佛教题材为主，除了各类佛像，以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各种供养菩萨数量最多。还有两类女神像：一类为供养天女，包括供香天女、供花天女、散花天女、善舞天女等；另一类为各种度母、佛母。女神像的服饰基本相似，都头戴花冠或宝冠，耳饰大环，佩带有项饰、臂钏、手镯、足镯等，肩披帛，上身或全身赤裸，手结各式手印或持法器。在绘画技法上，采用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其轮廓，用晕染法突出各种女性体态。壁画题材中还有大量动物与植物，动物有龙、凤、狮、羊、牛、马、鸭、鹿、象、孔雀等，以及佛教中的神话动物，如摩竭鱼、龙鱼等。动物图案流行"对兽"构图形式，如双龙、四龙缠绕、双鹿对鸣、双凤对立等。此外，还有复合式的五鹿相环绕、八凤相环绕、一虎逐三羊、一狮逐二羊等。植物图案以树木为主，也有花草、果物等。花草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莲花之外，还有忍冬纹、卷草纹、缠枝莲等装饰性图案。

在汉藏典籍中，没有关于东嘎、皮央的任何记载，而流传在印度的藏文手抄本《古格普兰王国史》中，有关于这两处遗址的记载。皮央寺始建于10世纪，数十年后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是古格仁钦桑布时期所建的早期八大寺之一。而东嘎在古格国王意希沃时代也开始有了建寺历史。据说意希沃的妹妹最早在这里建过一座僧尼院。大约在12世纪，由于古格王国内部的一次分裂斗争，东嘎曾经一度成为与札布兰相对峙的另一个王宫所在地，直到古格王国复归统一，但仍然是古格王国所辖的一个政治、宗教、文化中心。15世纪以后，格鲁派宗喀巴的弟子阿旺札巴曾在东嘎寺作过住持，古格王室的婚礼也曾在此举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嘎、皮央具有与札布兰同等重要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记载和传说可信程度尚需要进一步证实①。

参考文献：

徐苹芳：《辽金城址的调查与发掘》、《元代城址和窖藏》，《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李逸友《金代界壕遗迹》、罗哲文《明长城》、徐苹芳《明中都城遗址》，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

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①更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第三节　帝陵

一、北宋帝陵

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义市，其陵园建制基本相同，皆由兆域、上宫、下宫、皇后陵、陪葬墓组成。兆域，也称为茔域，四周植荆棘等为标记。兆域之内除皇陵外，还祔葬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台四面所筑陵垣以内的部分，是举行大型祭奠仪式之所。帝陵地宫上建方形陵台，陵台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北宋帝陵也有"下宫"为日常奉飨之所，也就是供奉墓主魂灵、衣冠和神像的处所。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门前置面南的蹲狮1对。总而言之，北宋帝陵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北宋皇陵陵园的选地一反过去历代帝陵居高临下、背山面河的建制。陵园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背依伊洛河，面山背水。从鹊台、乳台至上宫宫城逐渐斜降，陵台（中心建筑）位于全陵的低凹处。所谓鹊台、乳台，就是在神道最南端设两重土阙，分别称鹊台与乳台。各陵从南到北都有数米至10余米的落差。这种特别的状况是受了北宋盛行的阴阳勘舆术的影响。司马光《葬论》云："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畎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这种坐北面南而又南高北低的陵园布局，一反中国古代建筑逐渐增高的做法，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的孤例。

从帝陵所在的地势看，位于平缓的黄土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势。仁宗时王洙等人奉敕撰《地理新书》，为官修的阴阳术书籍，按"五音姓利说"对丧葬作出规定。"五音姓利说"将人按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土、金、木、火、水五行相对应。赵姓属角音，角音对应木行，木主东方，阳气在东。因此，赵姓在阴阳地理上是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也可居之"。宋陵的地势与此相符，而与汉唐以来帝陵都要建在高爽之地的传统相违。

2. 兆域之内，帝后同茔合葬，但各自单独起陵。后陵在帝陵之西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实行的这种制度，显然是受西汉帝陵的影响。皇后陵的陵园建制与皇帝陵完全相同，只是规模缩小，神道石雕像有所减少。同时，还常以数个皇后合祔一陵，而且不按辈分，早死的皇后也可祔葬先辈帝陵旁。如太祖王后、贺后祔于永安陵，真宗郭后祔于永熙陵等。只是埋葬方位上，同辈后陵自东南向西北排列，晚辈后陵则在上辈之北。

按“五音姓利说”选择吉地，安排陵位，祔葬后陵和下宫。与唐陵下宫遗址多在陵墓西南、鹊台西北不同，北宋皇陵下宫均建于帝陵上宫的西北部。这是按葬经选择的壬、丙吉地。《地理新书》卷七谓五音各有五向：角音大利向（最吉）为壬向，安坟坐丙穴；小利向（次吉）为丙向，安坟在壬穴；自如向（再次吉）为庚向，安坟坐甲穴；粗通向（不佳）为乙向；凶败向（最凶）为卯向，不宜安坟穴。由此可知，角姓埋葬方位利于壬向、丙向，以丙地、壬地为佳，丙地又尊于壬地。因此，北宋皇陵在陵园布局上将帝陵下宫建于上宫的西北部，而且皇后陵、陪葬墓和寺院均位于帝陵的西北部。在同一陵区内，晚建的帝后陵都位于早建帝后陵的西北，由东南（丙地）向西北（壬地）依次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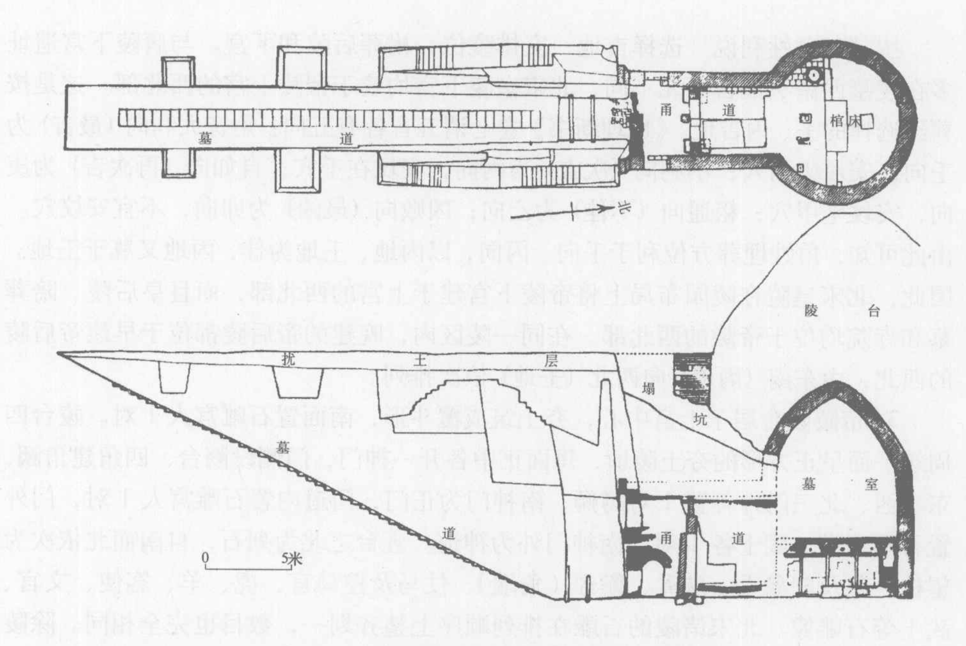
3. 帝陵陵台居于上宫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南面置石雕宫人 1 对。陵台四周筑平面呈正方形的夯土陵垣，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门侧设阙台，四角建角阙，东、西、北三门外各置 1 对蹲狮，南神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 1 对，门外置石雕奔狮、武士各 1 对。南神门外为神道。乳台之北为列石，自南而北依次为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獬豸（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北宋诸陵的石雕在排列顺序上整齐划一，数目也完全相同。除陵园上宫的四神门之外各置 1 对石狮之外，其余石雕像均置于陵前，并集中排列于神道的东西两侧。同时，与以前相比较，石雕像的间距较近，大大缩短了陵园前后距离，使陵园布局显得更加紧凑。

4. 设县以奉陵邑。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特建永安镇为永安县，以其税役“充奉山园”。由于北宋皇陵埋葬比较集中，因此北宋王朝只建有一个陵邑——永安县，来统管全部陵区事宜。又因为宋代奉陵邑的设置要晚于辽代，因此，有人认为宋代奉陵邑的设置受了辽代影响。

5. 设禅院（寺院）追奉祖先。在宋陵四个陵区旁均设有皇家禅院，均位于陵区西北部，计有永昌禅院、永定禅院、昭孝禅院和宁神禅院，用来豢养僧尼为陵主魂灵诵经。在皇陵设置寺院，相传始于东汉明帝。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从（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屠焉。”现在最早的实例，是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前建造的“思远浮屠”。这些禅院一般位于陵区的西北部。其目的可以从《敕住宁神法照大师碑》碑文看出：“本朝建寺，追奉陵寝，以昭圣孝，讲诵有常，负荐无已。盖两汉以孝记号，本朝以孝为德。”

6.陪葬制度。北宋帝陵的每座皇陵兆域之内都有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

7. 地宫。北宋皇陵地宫，又称玄室或皇堂。皇陵地宫未经过发掘，其情况不甚清楚，但被盗掘的元德李皇后陵可以为宋代地宫提供一个重要参考（图五二）。李皇后陵地宫是一座仿木建筑结构的单室砖墓，大致坐北向南，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长斜坡墓道全长 34、宽 2.5~3.8 米，居中部位有宽 1 米的台阶式踏道。甬道长 9、宽 4.3、高 6 米，券顶，壁厚 0.9 米，表面敷草泥，抹青灰。甬道中部偏南设墓室之门，门外两侧墙壁上各有一壁龛。墓门为双扇石门，门扇高 3.96、



图五二　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平、剖面图

宽1.65米，厚29~34厘米。仅一端有门轴，长出门扇，东扇门轴长50厘米，西扇门轴长33厘米，轴径分别为34、32厘米。墓门上部有门额，下部有门砧石和门限，两侧有立颊。当中有撞锁柱，立在门额下。门扇上线刻武士像，门额部线刻飞天。墓室平面近圆形，直径7.95米，用砖砌筑，以泥勾缝，壁厚0.95米，穹隆顶，顶中心至地面高12.26米。墓室内部壁面上有用砖雕出的木装修轮廓。墓壁周围砌有突出壁面5~7厘米的10根转角倚柱，柱间有阑额，柱头上有用砖砌出的柱头铺作。柱间距为1.65米，将壁面划分为9开间，每个开间的墙壁有用砖雕出的窗、栏杆、桌、椅、盆架、梳妆台、衣架、灯檠等。顶部表面粉刷后彩绘，据调查，“最下接近屋檐处用红、黑、青灰色绘宫室楼阁，线条粗率，但可辨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及鸱尾等……宫殿楼阁间绘有粉白云朵，云气以上则为青灰色之苍穹，混然一片直至于顶。其间以白粉涂成径约5~8厘米的圆点，满布天空以象星辰。自东南隅向上斜贯穹顶复下至西北隅，有白粉画银河一道，边缘明显而向中心淡薄，约宽20~30厘米”①。墓室北部置东西长7.9、南北宽4.7米的棺床，高62厘米，棺床南立面为须弥座形式，其上雕刻花卉纹样。

有人将宋陵地宫形制和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为砖砌单室墓，约包括永安、永昌、永熙三陵及祔葬于三陵的后陵；第二阶段仍为单室墓，但改为石构，包括永定、永昭二陵及祔葬后陵；第三阶段的墓室分为上下两层，即在石

①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砌墓室内又建造有石椁，包括永厚、永裕、永泰三陵及祔葬诸后陵[1]。

从总体上看，宋陵规模远不如唐陵宏伟。这是由于北宋的皇帝在世时不营“寿陵”，都是在死后才营陵。由于限定“七月葬期”，皇后的葬期一般只有三五个月，工期很短，而且都是平地起陵，不似唐昭陵、乾陵依山为陵，所以规模都小于唐陵，显得不够气派、壮观。

二、南宋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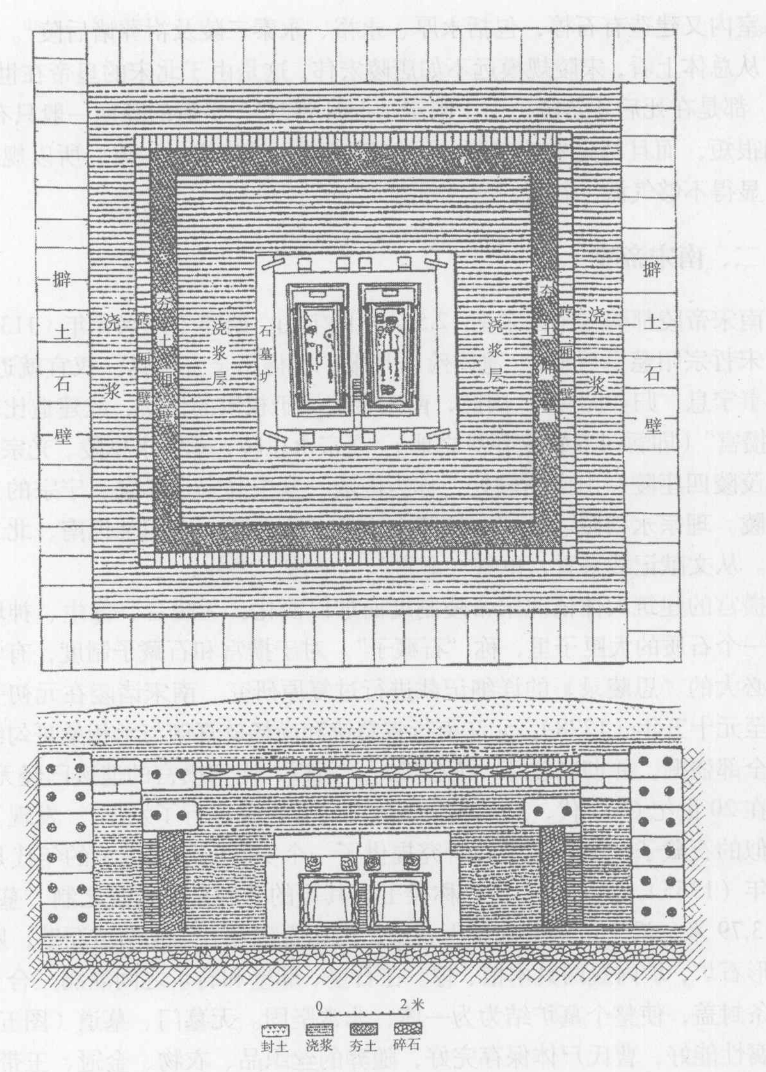
南宋帝陵都葬在绍兴东南 12.5 公里的宝山，始建于绍兴元年（1131）。就在当年，宋哲宗昭慈皇后崩，“遗诏殓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宝具，权宜就近吉地攒殡，候军事宁息，归葬园陵”。因此，南宋帝陵属于权殡的性质，故建造比较简单，称为“攒宫”（即暂时安置的葬身之地）。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四座陵在山南高峻处，称为南陵，其中高宗、孝宗、宁宗的三陵各祔葬一后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在山北，称北陵。人们常把南、北二陵合称宋六陵。从文献记载来看，也有“上宫”、“下宫”之分。

攒宫的建筑大体依北宋帝陵制度而加以简化，无陵台、像生、神墙，并将棺筑在一个石质的大匣子里，称“石藏子”。对于攒宫和石藏子制度，有学者已经根据周必大的《思陵录》的详细记载进行过复原研究。南宋诸陵在元初受到严重破坏，至元十五年（1278），元江南行省总统和尚杨琏真珈与丞相桑哥勾结，将南宋六陵全部盗掘，并彻底破坏，废陵毁尸，所以，南宋攒宫的遗迹已经无存。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元代张士诚之母曹氏墓进行了发掘[2]，发现了与南宋帝陵相似的石藏子，为石藏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际例子。该墓的年代是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其时张士诚已称吴王，其母的葬制是依宋陵之制。墓为正方形，边长 3.79 米，沿土坑四壁砌擗土石壁，内用青砖和夯土砌两道厢壁，厢壁中央置正方形石圹，圹内置两具木棺、椁。在石壁、厢壁和石圹之间灌满三合土灰浆，上用石条封盖，使整个墓圹结为为一体，非常坚固。无墓门、墓道（图五三）。由于其防腐性能好，曹氏尸体保存完好，随葬的丝织品、衣物、金冠、玉带及其他金、银、玉装饰品都保存很好，还出土了阴刻填金的象牙哀册一套。

据文献记载，南宋陵在厢壁之上还铺有一层柏木板，其上才是盖顶石，石上再铺砖，直铺到与地面平行。不起陵台，在上边直接盖献殿。献殿的平面呈凸字形，称为龟头献殿，石藏子就压在下面。另外，还有下宫，文献记载其有前后殿、东西廊。所以，南宋陵从外观上看不出陵的样子，而与殿一样，完全是临时性的，准备将来归葬巩县祖陵。明清以后的方城明楼之制，就来源于此。石藏子的制度也对平民墓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②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



图五三　元张士诚母曹氏墓平、剖面图

三、辽代帝陵

辽代立国二百余年，历经十帝。其陵墓按分布区域可分五区：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祖陵，葬有辽太祖；内蒙古巴林左旗的怀陵，是太宗的陵地，穆宗袝葬于此；辽宁省醫巫閭山东丹人皇王[①]显陵，世宗亦葬于西山；辽宁北镇西南的乾陵，葬有

①东丹国（926 ~ 952）是辽灭渤海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附属国家，亦称东辽。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击灭渤海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于其地，称“人皇王”，因渤海在辽东方，故名为东丹国（东契丹之意）。建都于渤海故都忽汗城，改名为天福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定）。耶律倍后来因受辽太宗耶律德光猜忌，逃奔后唐，未即皇位，后被其子辽世宗追尊为帝。

景宗，天祚帝祔葬于此；内蒙古巴林左旗白塔子北大兴安岭的庆陵，包括了最兴盛时期的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目前了解比较充分的是庆陵。

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总称庆陵。陵墓分布在一座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即辽代的永安山，后改称庆云山，俗称王坟沟。三座陵东西排列，间距约2公里，通称东、中、西陵。

庆陵在辽世宗时即开始修建。太平十一年（1032）圣宗崩于上京东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帐，葬于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同年建庆州城于庆陵之南充奉陵邑，十一月葬于庆陵。此后，兴宗于清宁元年（1055）、钦哀皇后于清宁四年、道宗和宣懿皇后于乾统元年（1101）相继葬于庆陵。庆陵在金初遭到金兵破坏，20世纪30年代又遭日伪军阀盗掘。

庆陵的三座陵墓都有墓门、享殿和神道，均为东南向。在庆陵三陵中，以永庆陵保存最为完好。前有神道，神道后有一门三洞式的陵门，两侧有角楼，边上为回廊，门后1300米处为享殿。享殿自成院落，进深和面阔均为五间，前设月台，殿两边各有一座三开间的朵殿，享殿后边即陵墓。三座陵的墓室都有前、中、后室3室，前、中两室的左右各建一圆形小耳室，共计有7室。墓室用砖石灰浆砌筑，用砖三层，墓顶用砖两层，墓内及墓门皆抹石灰并彩绘壁画。前、中两室的仿木建筑部分和室顶绘彩画。自墓道至中室的壁上绘有彩色壁画，中室四壁画春夏秋冬四幅山水图，表示四时捺钵[①]的所在，这是辽陵中所特有的壁画。

辽代帝陵的特点：（1）多以山为陵。（2）陵前建有享殿。（3）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辽代有5个帝陵区，相应的有5个奉陵邑。分别为祖州城、怀州城、显州城、乾州城和庆州城。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而以庆州城的考古工作展开的最为充分。庆州城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创建于穆宗时期。辽圣宗葬于庆陵后，即以此城为奉陵邑。城有内外两重。外城遗迹已经不很清楚，经实测，南北长1700、东西宽1550米，是辽代州城中最大的一座。内城长1150、宽950米，城墙夯筑，残高4米左右，城墙上有马面。每面设城门一座，门有瓮城，城内的街道呈丁字形，在横街以北正中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是圣宗萧皇后守陵时所居住的行宫。行宫以东为苑，西部为民居，现存一座七层八角楼阁式砖塔，高64米，名为释迦如来舍利塔，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是著名的

①捺钵：契丹语，意为辽代皇帝行营。辽代皇帝保持着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此，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辽代不同时期四时捺钵的地区也有所变化和不同。大体而言，春捺钵设在便于放鹰捕杀天鹅、野鸭、大雁和凿冰钩鱼的场所，最远到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和延芳淀（今北京东南）。夏捺钵设在避暑胜地，通常离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境）不过三百里。秋捺钵设在便于猎鹿、熊和虎的场所，离上京或中京也不很远。冬捺钵设在风寒不甚严酷而又便于射猎的场所，通常在上京以南至中京周围。辽帝在四时捺钵驻留的时间长短不等，每处长则两月左右，短则不满一月。凡捺钵，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

辽塔。奉陵邑与州城在布局上相似，但功能不同。(4) 墓室砖筑，绘制壁画。

四、金代帝陵

金皇统九年（1149），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完颜亶自立为帝。为了缓解政治压力，海陵王决定迁都燕京。这一决定遭到女真贵族的强烈反对，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上京是祖宗山陵所在和王气所钟。海陵王在得到多数朝臣的支持后，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次年，便派人于都城附近寻找“万年吉壤”，最终选定了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大房山（今北京市房山区）下大洪谷云峰寺的风水宝地，决定迁祖宗陵寝于此。据《金史》记载：“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同年五月完工，并分三次派人前往金源迎太祖、太宗、其父德宗宗干及始祖以下十帝陵到大房山。据张棣《金虏图经》“山陵”条记载：“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冈峦秀拔，林木森密。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处凿穴，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父德宗宗干，其余各处随昭穆序焉。惟直被杀，葬于山之阴，谓其刑余之人不入。”《大金国志》卷三十三“陵庙制度”条也有相似的记载。《金虏图经》漏记海陵王所毁之寺名称，此条记其名为“龙城寺”。《金史》卷五《海陵本纪》记为“云峰寺”。据考证，“大洪山”、“大洪谷”就是大房山、大房谷。“龙喊峰”即金陵主陵区九龙山的主峰。大房山金陵勘定以后，经海陵、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五朝六十年间的营建，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文献记载其兆域最大时达156里。陵区实测面积约有60平方公里。

金亡后，蒙元时期金陵一直得到较好保护。元世祖忽必烈一直十分推崇金世宗，因此，金陵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陵区成为燕南的一大景观，其中“道陵苍茫”与“卢沟晓月”、“太液秋风”等同为“燕南八景”。但在陵区并未发现元代致祭遗迹。

在历史上，金陵曾经遭到明人破坏。其实，在元代和明代前期，金陵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即使在明代中叶以前，金代帝陵仍然受到保护并定期祭祀。明嘉靖时期，道陵仍是大房山的一处著名景观。明代后期，满洲在关东崛起，与明王朝交战中，明军屡战不胜。明廷惑于形家之言，认为满人的祖陵在大房山，“王气太盛”是明军战败的原因。因此，明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之祀。天启二年，派军队拆毁金陵，割断地脉。天启四年，又在陵区建关帝庙多处，以为厌胜。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砍龙头”、“刺喉咙”的说法，并保存有明人毁坏山体的遗迹。所谓“砍龙头”即在金太祖睿陵所依九龙山主龙脉的龙头部挖沟断脉，而“刺喉咙”即在“龙喉”部深凿洞穴，并填上鹅卵石。有清一代，对金陵进行了重修。

1. 帝陵的位置及分区

金陵位于北京西南约 45 公里的房山区大房山脚下，属燕山山脉，地接太行山。连山顶是金陵主陵区的所在地，以其为中心，形成了西北、东南向的半环形地势。其中矗立着林木掩映的“九龙山”；九条山脊分九脉而下，形成开阔的缓坡台地。两旁高山如屏，正中一道石门，只有一口可以出入，俗称“龙门口”。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又称朝山。金太祖陵就坐落在九龙山主脉与“影壁山”中间一处凹陷地上。金陵陵区按照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区。

（1）帝陵区。据文献记载，金陵葬有从上京迁来的太祖、太宗陵和太祖以上、始祖以下十帝陵以及在中都埋葬的五代（不包括海陵王）帝陵。具体陵号为太祖阿骨打的睿陵、太宗吴乞买的恭陵、熙宗直的思陵、德宗宗干（海陵王父）的顺陵、睿宗宗辅（世宗父）的景陵、世宗雍的兴陵、卫绍王允恭的裕陵、章宗璟的道陵。从上京迁来的始祖以下、太祖以上的十帝陵亦各有陵号。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帝陵区实际上还可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主陵区，即九龙山陵区。它葬有太祖、太宗、德宗、梁王宗弼（兀术，是皇陵区唯一的亲王陪葬墓）、睿宗、世宗等帝王。第二，石门峪十帝陵。石门峪在周口店地区车场村南，从沟口到沟里有三道山石屏障，似三道石门，明显的有大、小石门两道峪口，大石门尚存有用巨石垒砌的高大护墙。大石门内派生出西、北两峪。十帝陵坐落在北峪内，均穴山为陵。早年调查时还存有望柱底座、柱础、栏板等石件。第三，峨眉峪熙宗思陵。峨眉峪位于周口店地区西庄村西，石门峪之南。《金史》记载熙宗最终迁葬此峪，号思陵。此处黄土很厚，适合建陵，但调查未见遗迹。

（2）坤厚陵区。它始建于世宗大定年间，是埋葬妃嫔的陵园和后世园寝。例如，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元妃张氏、李氏都曾暂厝于坤厚陵区，世宗死后迁往兴陵合祔。世宗德妃徒单氏、贤妃石抹氏、柔妃大氏等都直接葬入坤厚陵。坤厚陵的位置有两说：其一，在睿陵、兴陵西侧，依山有一片陵园，其方位似应为坤厚陵。但此地仅发现一些砖石，未见其他遗物；其二，以帝陵位于山阳，据男阳女阴的说法，坤厚陵区应在山阴，即大柚沟一带。这里发现了不少金代遗物。也有文献记载坤厚陵区在蓼香甸附近的。究竟哪里是坤厚陵区，还有待考古工作。

（3）诸王兆域。完颜宗室中有爵位者的墓地，海陵王后来也被改葬于此地。诸王兆域又称十王坟。前述的石门峪大石门内，北峪为十帝陵，其西峪内应是诸王兆域。文献记载诸王兆域在鹿门谷，今天的石门峪可能就是古代的鹿门谷。文献记载金陵还有享殿、碑亭、明楼、祝版房等建筑，而且还有砌筑的祭祀坑，但这些情况现在还不能与考古发现相对应。

2. 考古调查

最重要的发现是 2002 年发掘的太祖完颜阿骨打睿陵地宫。睿陵位于九龙山主

峰下大宝顶前约 15 米处，是一座竖穴石坑墓，平面长方形，东西长 13 米，南北宽 9~9.5 米。石坑内瘗石椁四具，其中两具为汉白玉质，均东西向，一具浅浮雕龙纹，一具浅浮雕凤纹，另外两具青石质素椁均南北向。龙纹椁已残，凤纹椁保存完好。石椁长 2.48、宽 1.2 米，是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椁盖顶和椁身浅浮雕双凤纹，内填金粉。椁身四壁包裹厚 10~12 厘米的松香。椁内置木棺，长 2.1、宽 0.78 米。木棺外壁髹红漆，棺四角及正中部位饰錾刻凤纹的菱形鎏金银饰。棺内出土了金丝凤冠和白玉饰件。

3. 基本葬制

尽管金陵的考古工作还未结束，不了解的情况还很多，但仍然可以看出金陵的一些葬制。首先，陵区的选址和风水与宋代不同，也与唐陵、辽陵的依山为陵有一定区别。金陵建于深山之中，且选择一个相对封闭的山谷。选址的标准是峰峦秀拔，林木森密。因此，还带有女真人早期的原始性。其次，陵区的安排没有总体规划，帝陵区、坤厚陵区和诸王兆域分开安排，各自在深山中选址。陵位的安排不讲勘舆术，也不讲昭穆，甚至不分辈份①。第三，地宫的修建采用竖穴石坑，葬具采用石椁和木棺，其外包裹松香。多具石椁合葬于同一地宫中。第四，从出土的遗物可见，既有表示皇权的龙纹，又有人物、虎兽、忍冬、寿桃等，与当时北方地区民间流行的瓷器、铜镜、纺织品等的装饰相同，丰富多彩而富有生活气息。这似乎体现了女真族统治者的喜好和品味。第五，金代在房山帝陵区设置奉先县以奉祖先，封山神以护陵。据《金史·地理上》记载："奉先县：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金代奉先县城故址在今房山城西西沙河右岸的洪寺村一带，城墙系夯土筑成，城周 1440 步，城门 4 座：东为朝曦门，西为仰止门，南为迎恩门，北为拱极门。又据《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大房山》记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香、币，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

五、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陵区共 11 座西夏王陵，包括李继迁裕陵、李德明嘉陵、李元昊泰陵、李谅祚安陵、李秉常献陵、李乾顺显陵、李仁孝寿陵、李纯祐庄陵、李安全康陵，另外还有李遵顼和李德旺两个无号的陵。

西夏王陵陵园遗迹在地面上保存较好，基本上坐北朝南。基本由外城、内城、月城、鹊台、碑亭、献殿、陵台、角台等部分组成。每座陵园的占地面积约为 10 余万平方米。1972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 8 号陵（现

①一说严格按照汉人的风水勘舆术，并严格按照昭穆制度。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编为 6 号），还发掘了 70 余座陪葬墓[1]。

1. 外城、角台

在 9 座王陵中，设外城者 7 座，另有 2 座未设置。外城的构筑有两种方式：一是四面包围式，但与内城墙距离不等，东、西、北三面距内城墙较近，南面则较远；一种是三面包围式，仅在东、西、北三面筑外城，南面不筑外城墙，东、西墙延伸至内城南墙即止。以上两种构筑方式在东、西、北三面均不设门，四面包围式仅设南门，三面包围式的南面呈开放式。外城最大者，南北长 340、东西宽 224 米，最小者南北长 220、东西宽 165 米。

王陵在外城之外均设角台，大多数王陵的角台均远离外城，仅个别王陵的角台距离外城较近。

2. 内城、献殿

内城为陵园的主体建筑，占地面积相当于陵园的一半，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75~183、东西宽 104~183 米。四面有黄土夯筑而成的城墙，基宽 2.5~3 米。每面正中各开一门，一般为双阙式。四角建有曲尺形角阙。

在内城南墙以北 30~45 米的位置为献殿，均偏离内城中轴线，偏离最多者 24 米，最少者 4.25 米。献殿大都仅存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夯土台基。

3. 月城

月城凸出于内城之南，碑亭之北，夯土筑成，墙基减薄，宽 2 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00~130、南北宽 40~52 米。南墙正中辟门，为双阙式。东西两墙与内城南墙相接，北墙即内城南墙。月城之内的神道两侧立石像生，各置两列或三列文臣武士像。

4. 鹊台、碑亭

各王陵均在外城南部设两个鹊台，鹊台北距月城南墙多在 100 米左右，个别者在 70 米左右。外城呈四面包围式者，鹊台在外城南墙之内，两鹊台间距月约 70 米左右，多为覆斗式，内部夯土筑成，外抹白灰，顶部有土坯砌体。顶部有瓦砾堆积，四周有砖瓦残块。

碑亭位于鹊台和月城南墙之间，一般为左右对称的两座，个别为三座。仅存夯土台基，在其遗址发现砖、瓦、鸱吻等建筑材料。

5. 陵台、地宫

地宫在内城西北隅[2]，地面上有夯土筑成的塔式陵台，已经发掘的 6 号陵陵台

---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

②有人认为这是受北宋时期风水堪舆术影响的结果。参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平面呈八角形，每边长 12~14 米，共有 7 层，逐级内收，每层收分处都为出檐木结构，并挂有瓦当、滴水、屋脊兽面等建筑材料，夯土台外部则砌砖包裹。在未遭破坏之前，其陵台应当是一座密檐式七层实心高塔建筑。陵台建成塔形，在中国古代陵园建筑中是极其特殊的。陵台之东南向为墓道，墓道填土隆起高一两米，形状如鱼脊背，被称为“鱼脊梁”。墓室不用砖筑，在墓室四壁立护墙板。经过发掘的 6 号陵地宫主室平面呈梯形，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绘有武士等题材的壁画，主室两侧各有一平面略呈方形的侧室，与主室有甬道相连。由于早年遭到破坏，墓室结构已经不甚清楚。随葬品仅残存残缺的金银饰件、铜甲片、铁器和陶瓷碎片等。根据已经发现的汉文残碑推测，该陵可能是西夏第 8 个皇帝李遵顼的陵墓，葬于西夏乾定四年，即宝义元年（1226）。

6. 陪葬墓

陪葬墓主要是西夏皇亲贵族的墓葬，分布于各陵的周围。每座帝陵的陪葬墓多寡不同，多者十余座，少者两三座，陪葬墓无论在规模和性质上都与帝陵有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西夏埋葬制度具有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

7. 北部建筑

在陵区的北部有一处平面呈长方形庭院式殿宇建筑，坐北朝南，东西宽约 200、南北长约 300 米，总面积约 6 万平方米。遗址外围有一周夯土筑成的墙垣，残高约 1、宽 9 米。南墙正中辟门，西墙北部似乎也开有一门，门外筑有“瓮城”。关于该遗址的性质，有认为是陵邑遗址①，也有人为是西夏祖庙遗址②。

西夏王陵与宋陵的平面布局颇不相同，特别是内城呈长方形，前加月城，以及地宫偏处内城西北角并建塔式陵台，应是西夏王陵的特点。

六、元代帝陵

元代皇帝及蒙古宗室、大贵族死后，都北葬蒙古高原，且实行秘葬，因此，关于元代帝陵至今在国内外均无发现。但关于元朝皇帝祭祀先祖的有关遗址有所发现。在元代，皇帝为祭祀先祖在元上都城外设置祭坛。此类遗址在内蒙古正蓝旗发掘一处，出土了汉白玉蒙古帝王像三尊，雕刻精美，头部无存，帝王像身着龙袍，端坐椅上。这一发现，对于了解蒙古人的丧葬习俗和祖先崇拜有重要价值。

七、明代帝陵

明王朝立国 277 年，先后在南北方建立的帝陵皇陵、祖陵、孝陵、太子朱标的东陵、十三陵。

---

①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9 期。

1. 明祖陵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追尊其高祖为玄皇帝，曾祖为恒皇帝，祖父为裕皇帝，父亲为淳皇帝。同年，命太子朱标到泗州修建祖陵。以后陆续增修，到永乐十一年（1413）才把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墓全部修建成功。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明祖陵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十分壮观。陵墓长方形，南北向。有皇城两道，外面土城周长九里三十步；里面砖城周长四里十步。城门4座各3间，正殿3间，具服殿3间，红门3座，燎炉3座，棂星门3座，神厨3间，东屋3间，西屋3间，直房18间，斋房3间，库房3间，宰牲亭3所，水金桥1座。从陵西门进去，北到积水亭还有石桥3座。后有神厨、宰牲亭、享殿、配殿。明亭神道两旁，从南往北相对排列21对大型石刻，有麒麟2对、狮子6对、华表2对、马倌2对、牵马侍者1对、马1对、文臣3对、武将2对，太监2对。周围植树7万余株。明朝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再次夺淮，明祖陵屡遭洪水泛滥的困扰，尽管朝廷几度筑堤卫陵，但明祖陵还是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被洪水所淹没，沉入洪泽湖底。

1961~1962年，洪泽湖水位下降，明祖陵遗址逐渐露出水面，南京博物院对其进行了调查。2000年出版了正式报告。1997年以来，明祖陵几经修复，现周围已筑起2706米的防洪大堤，使得淹没湖底的明祖陵重见天日。从其布局来看，与明皇陵基本一致。

2. 明皇陵

明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至十二年（1369~1379）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南。该陵平面呈长方形，分内外城。外城夯土筑成，周长14.4公里。内城砖筑，南北长1100、东西宽750米，每面中央各辟一门，上建明楼。内城南门内神道两侧立华表和石像生28对，神道后接金水桥，桥前西侧立皇陵碑，东侧立无字碑。陵丘在内城后部中央，呈方形覆斗式，其前建有享殿。与宋代帝陵相比，明皇陵继承宋陵的兆域之制，但废止了上下宫之制，扩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献殿，陵园的内城改为平面长方形的砖墙，陵丘在内城后部，将石像生移入内城，实行帝后合葬。

3. 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钟山南麓独龙阜。孝陵的建设始于洪武九年（1376），洪武十五年皇后马氏入葬，始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入葬孝陵，全部工程到永乐三年（1405）才完工。孝陵在陵墓建制和布局上有了一些创新和发展，到营建明孝陵时，将秦汉以来平面呈方形的陵丘，改为平面呈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式陵丘（也称方城圜丘），陵丘前建祾恩殿以及平面长方形的砖砌神墙。所谓方城，就是一座方形城台，台正面相当于一

般城门的位置开辟券门隧道，有石阶可供上下，再左右转折可达台顶。台顶上再建平面呈长方形的城门楼，即为明楼。楼内立石碑，刻着皇帝的庙号、谥号。所谓宝城式陵丘，就是在方城明楼之后修建平面呈圆形的封土堆，明代将封土堆称为宝顶，宝顶之下为地下宫殿。其周围有砖砌筑的围墙。明孝陵的这种形制和布局，是中国古代帝陵布局的一次大变革。后来为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所遵循，并成为明代帝陵的定制。明孝陵的神道依山势作回转曲折布置，是孝陵的特有设计。在神道两侧对称安置文臣武将 4 尊、华表 2 座、石兽 24 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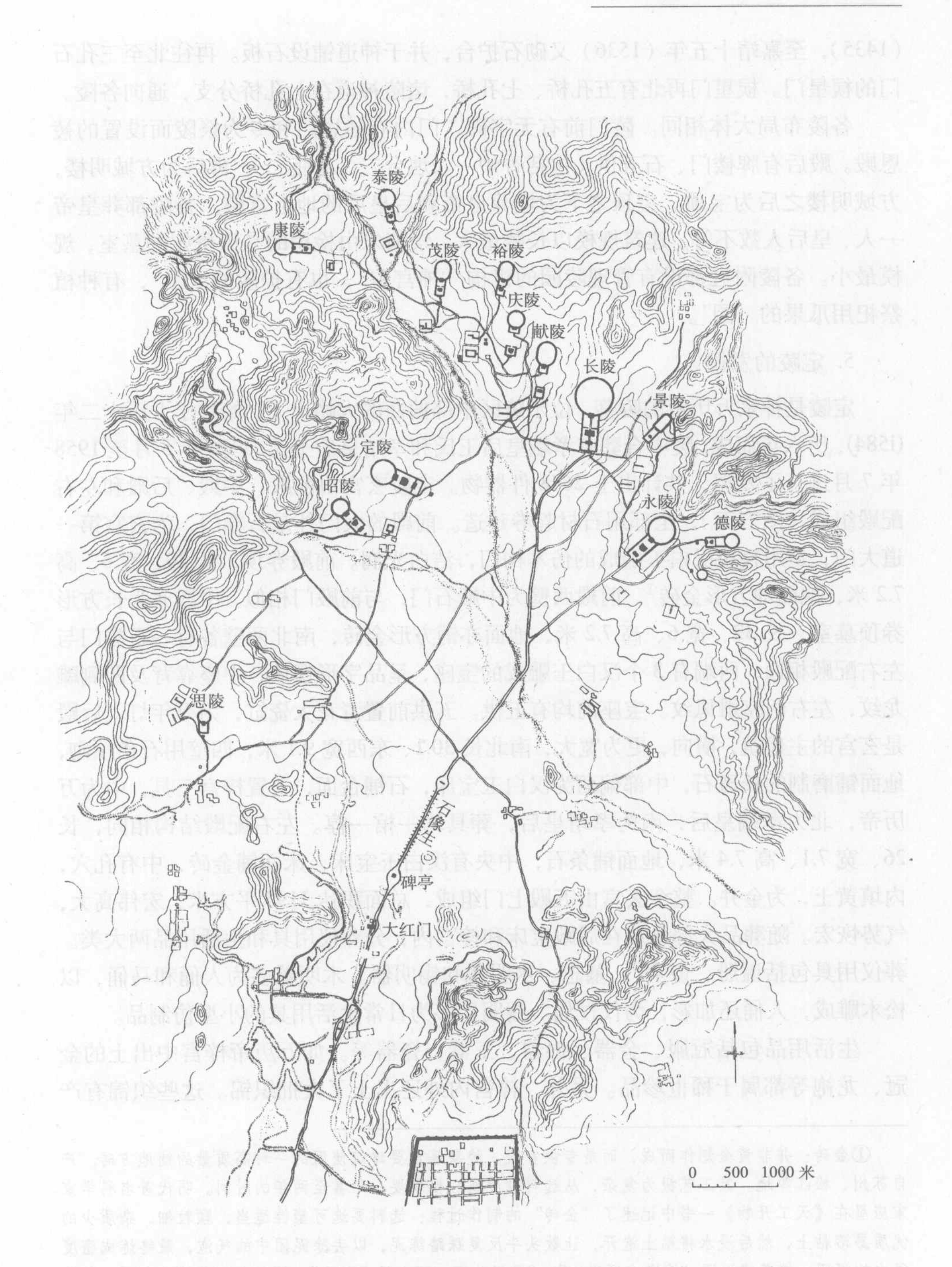
4.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以北 10 公里的天寿山。从明成祖朱棣到思宗朱由检的十四代皇帝，除过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金山之外，其余十三位皇帝都葬在此处，合称十三陵。其中有成祖（永乐）朱棣长陵、仁宗（洪熙）朱高炽献陵、宣宗（宣德）朱瞻基景陵、英宗（正统、天顺）朱祁镇裕陵、宪宗（成化）朱见深茂陵、孝宗（弘治）朱佑樘泰陵、武宗（正德）朱厚熙康陵、世宗（嘉靖）朱厚熜永陵、穆宗（隆庆）朱载垕昭陵、神宗（万历）朱翊钧定陵、光宗（泰昌）朱常洛庆陵、熹宗（天启）朱由校德陵、思宗（崇祯）朱由检思陵。

这些陵寝环列在天寿山南麓，组成以长陵为中心的宏大陵墓群。天寿山原名黄土山，是燕山余脉。山环绕在陵区西、北、东三面，其南面是一片盆地，温榆河穿过盆地东流。龙山、虎山对峙于陵区入口，形似天然门阙。这种选择陵地风水的思想在明代很流行，在明代各地的藩王陵区中也一再重复这一风水思想。各陵以长陵为中心，向左右排列（图五四）。

十三陵陵区周围40公里，依山建陵边墙，在边墙上设置有十口、四水门。墙体大多以山石、河卵石垒砌，用生石灰灌缝。有的地段结构坚固，墙体内外还用青石条包砌，有的地方仅以山石和灰泥筑成。

十三陵在宋元明时期的帝陵中具有独特的一面，即整个陵区一体规划，共享一条神道。从昌平县西门外至大红门有御路，道中设有石牌坊和下马碑。石牌坊全为白石结构，距昌平县 3 公里，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往北为大红门，门前两侧有下马碑。大红门是十三陵的总门户，为三洞券门，两侧接陵区围墙。门基用石，墙身用砖，皆涂红色，故称大红门。券门内侧各有门墩石，可知当年装有门扇。再北是碑亭，俗称大碑楼，方形，四面券门，重檐歇山顶。亭内立一通“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高 7.91 米。正面碑文为洪熙元年（1425）仁宗朱高炽撰，宣德十年（1455）立碑。碑阴刻有清乾隆帝所撰“哀明陵三十韵”。碑亭四周建 4 座华表（擎天柱）。碑亭之北是十三陵总神道，两侧各有石华表 1 座，为神道起点，至长陵达 1060 米。望柱以北为石像生，计有石兽二十四、石人十二，依次为四狮子、四獬豸、四骆驼、四象、四麒麟，皆二跪二立。其北为石人，有四武臣、四文臣、四勋臣。武臣披甲胄、执锤、佩剑。文臣、勋臣执笏肃立。石像生初建于宣德十年



图五四　明十三陵分布图

（1435），至嘉靖十五年（1536）又砌石护台，并于神道铺设石板。再往北至三孔石门的棂星门。棂星门再北有五孔桥、七孔桥，诸陵神道在七孔桥分支，通向各陵。

各陵布局大体相同。陵门前有无字碑，门内有祾恩门和专为祭陵而设置的祾恩殿。殿后有牌楼门、石五供（包括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再后为方城明楼，方城明楼之后为宝顶。宝顶之下为埋葬皇帝和后皇后的地下宫殿。各陵都葬皇帝一人、皇后人数不等。建筑规模以长陵最大，崇祯朱由检用的是田贵妃的墓室，规模最小。各陵附近都设有管理陵园的机构“神宫监”，也有护陵的“卫”，有种植祭祀用瓜果的“园”。

5. 定陵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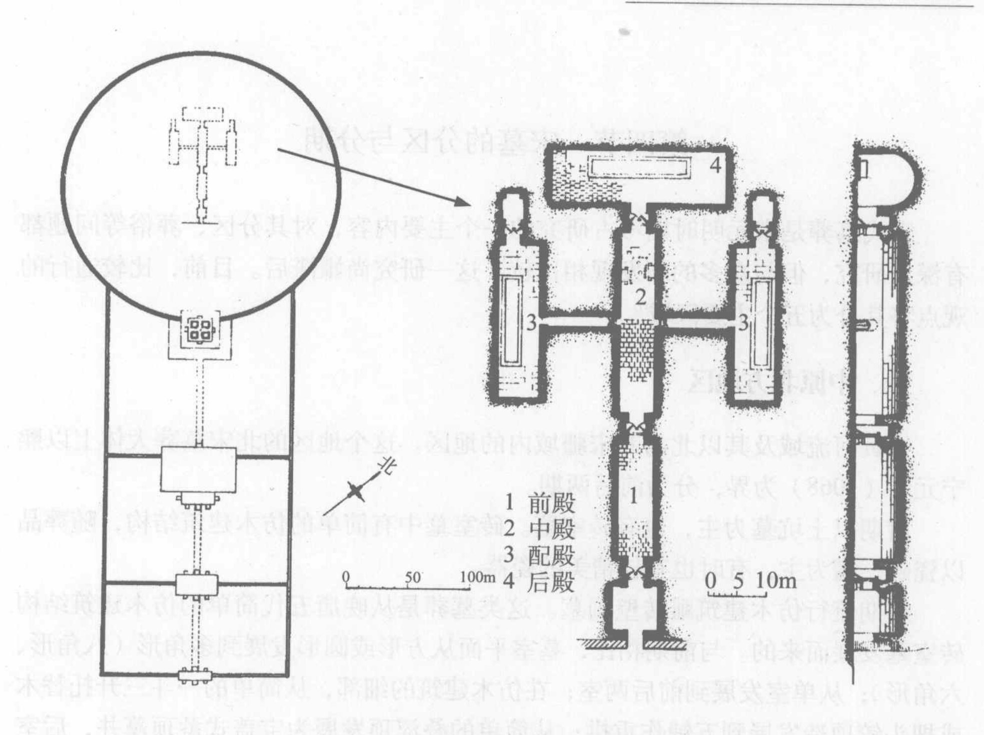
定陵是神宗万历帝的陵墓，位于陵区中部偏西的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历六年而成。陵中合葬有孝端皇后王氏和孝靖皇后王氏。1956 年 5 月至 1958 年 7 月进行了发掘，共计出土 2648 件器物。定陵玄宫由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组成（图五五），全部用石材起券建造。前殿的大门外是石券门，为玄宫第一道大门，是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仿木构门，洁白光润。前殿券顶，长 20、宽 6、高 7.2 米，地面铺方形金砖[①]。前殿西壁为中殿石门，与前殿门相似。中殿亦为长方形券顶墓室，长 32、宽 6、高 7.2 米，地面亦铺方形金砖，南北两壁各有一石券门与左右配殿相通，西端有 3 个汉白玉雕成的宝座，呈品字形摆放，中座靠背及两侧雕龙纹，左右两座雕凤纹。宝座前均有五供。五供前置青花大瓷缸，为万年灯。后殿是玄宫的主建筑，横向，更为宽大，南北长 30.1、东西宽 9.1 米，四壁用石条顺砌，地面铺磨制的长斑石，中部偏西为汉白玉宝床，石铺台面，上置梓宫三具，中为万历帝，北为孝端皇后，南为孝靖皇后，葬具均一棺一椁。左右配殿结构相同，长 26、宽 7.1、高 7.4 米，地面铺条石，中央有汉白玉宝床，床面铺金砖，中有孔穴，内填黄土，为金井。整个玄宫由五殿七门组成，总面积达 1195 平方米，宏伟高大，气势恢宏。随葬品大部分放在后殿宝床和梓宫内，分葬仪用具和生活用品两大类。葬仪用具包括谥册、谥宝[②]、墓志、木明器和锡明器。木明器多为人俑和马俑，以松木雕成，人俑还加彩，为仪仗俑。锡明器多为日常生活用具的小型仿制品。

生活用品包括冠服、金器、银器、玉器、瓷器等。如万历帝梓宫中出土的金冠、龙袍等都属于稀世珍品。另外，梓宫内外还出土了大批织锦。这些织锦有产

---

①金砖：并非黄金制作而成，而是专供宫殿、陵墓等重要建筑使用的一种高质量的铺地方砖。产自苏州、松江等地。其工艺极为复杂，从选料到烧成合格需要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述了“金砖”的制作过程：选料要选可塑性适当，颗粒细、杂质少的优质易溶粘土，然后浸水将粘土泡开，让数头牛反复踩踏练泥，以去除泥团中的气泡，最终炼成密度很大的泥团。接着将泥团“填满木匡之中”，“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加压使泥土成形，并使砖坯密实而均匀。砖坯阴干后，再装入窑中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经科学测定当时的烧成温度应该在 950℃左右。

②谥宝：古代帝王陵墓中随葬的刻有帝后谥号的玺印。



图五五 明定陵平、剖面图

地、产时、花纹及长、宽尺寸、织造的分工及织匠姓名等，是研究明织锦业的重要资料。金器都是日常用品的脸盆、漱盂、壶、香盒、粉盒等，有些器物上刻饰龙纹，有的镶嵌珠宝。不少器物上刻有制作年月、器名、重量及工匠姓名。玉器有碗、盆、壶、耳杯、盂、爵、带钩、圭等，加工琢磨极其精细，有的还镶嵌宝石、珠玉，配金附件，极具皇家气派。瓷器分青花瓷和"明三彩"两类，造型有梅瓶、碗、炉、觚等。青花带盖梅瓶，放置在帝后椁旁，大者绘龙，小者绘梅花，有万历或嘉靖铭款。青花碗胎釉细腻，碗壁极薄，并配有金盖、金碗托。三彩炉的造型、釉色精美，炉身酱黄色，三足是花纹凸起的紫色蟠螭，并与耳部相连接。另外，地宫中还出土了漆盒、铜镜、甲胄、铜剑和箭镞等。

参考文献：

徐苹芳：《金元墓葬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徐苹芳《辽代帝陵》、徐苹芳《明皇陵和祖陵》、罗宗真《明孝陵》、赵其昌《明十三陵》，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第四节　宋墓的分区与分期

宋代墓葬是宋元明时期考古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对其分区、葬俗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但与众多的新发现相比较，这一研究尚嫌滞后。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将其分为五个主要区域[①]。

一、中原北方地区

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葬大体上以熙宁元年（1068）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以土坑墓为主，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结构，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较精美的瓷器。

后期流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这类墓葬是从晚唐五代简单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发展而来的。与前期相比，墓室平面从方形或圆形发展到多角形（八角形、六角形）；从单室发展到前后两室；在仿木建筑的细部，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铰项造发展到五铺作重拱；从简单的叠涩顶发展为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从板门直棂窗发展为雕花格子门。雕砖或壁画的内容，主要表现墓主人的家居生活和墓主人夫妇"开芳宴"的场面，与之相对应，出现了大量的砖雕杂剧和散乐图，以表示墓主人夫妇欣赏杂剧的场景（图五六）。墓中随葬品稀少。个别墓葬有石俑或砖雕俑。如河南方城盐店宋墓出土2件石俑[②]；禹州电厂宋墓出土6多件包括武士、力士、飞仙、侍女、伎乐在内的砖雕俑[③]。修建墓葬的目的更多地注意了表现墓室的建筑和墓主人生前生活。

后期的砖室墓中还有墓室平面呈方形、长方形券顶的，以及墓室平面呈多角形的墓葬。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日用器皿随葬。个别墓葬的地面还有石人、石虎、石羊等石雕。这与埋葬者的品级有关，据《宋史·礼二十八·士庶人丧礼》记载："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贫民墓，以河南三门峡漏泽园[④]墓为代表。这些墓葬均为小型土坑墓，墓室狭小，仅能容尸，或仅容陶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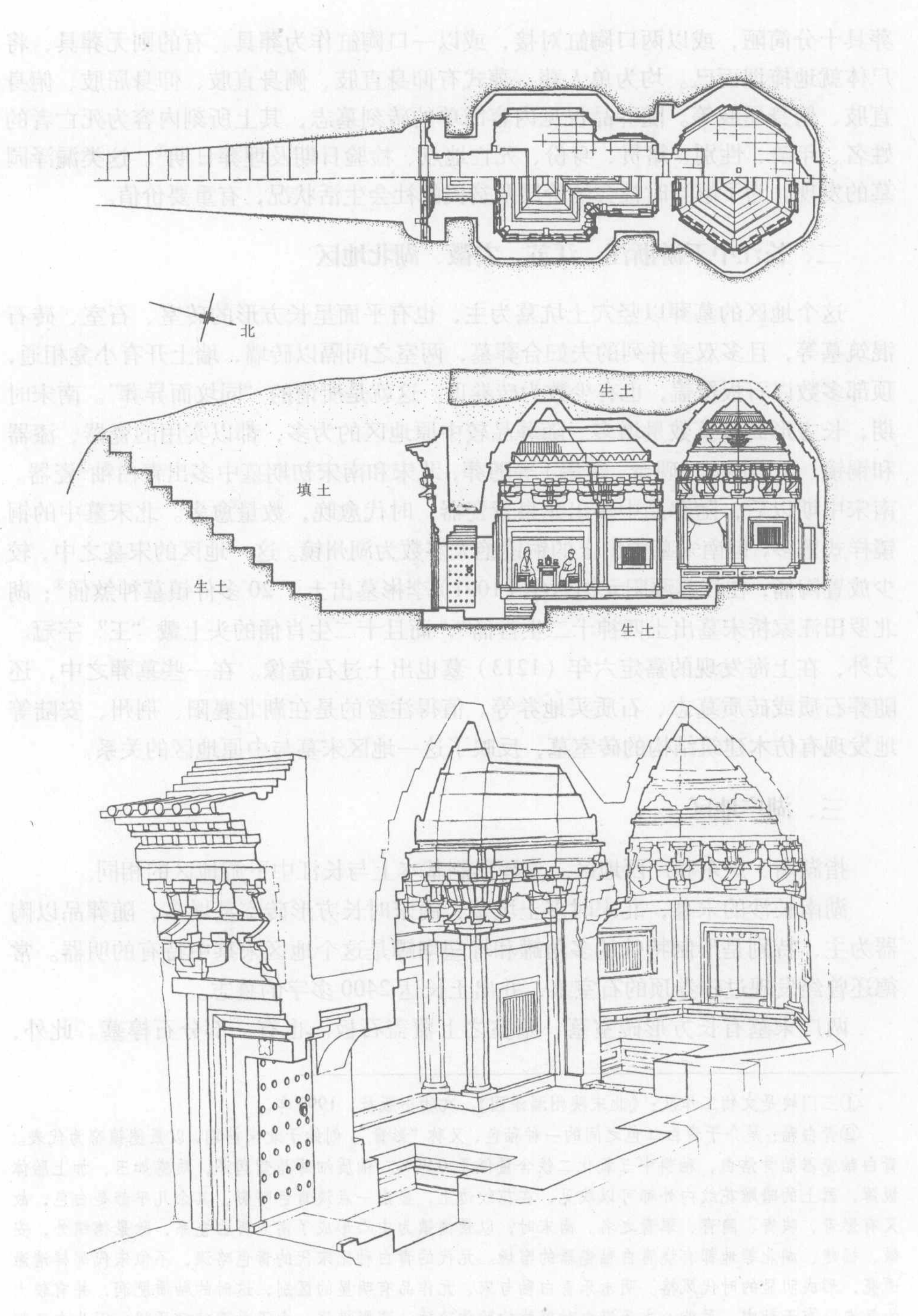
---

①徐苹芳：《宋代墓葬和窖藏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宋元明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②刘玉生：《河南省方城县出土宋代石俑》，《文物》1983年第8期。

③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漏泽园：是北宋的慈善机构之一，由国家设立的公共墓地，主要选择高旷不毛之地，集中埋葬贫不能葬者。据《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记载，创始于宋元丰间，正式名称出现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漏泽，取泽及枯骨，不使有遗漏之意。



图五六　河南禹县白沙一号宋墓平、剖、透视图（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

葬具十分简陋，或以两口陶缸对接，或以一口陶缸作为葬具。有的则无葬具，将尸体就地掩埋而已。均为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直肢、仰身屈肢、俯身直肢、俯身屈肢等。随葬品仅见内容简单的砖刻墓志，其上所刻内容为死亡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身份、死亡地点、检验日期及埋葬日期[①]。这类漏泽园墓的发现，为了解当时社会的阶层及贫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有重要价值。

二、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

这个地区的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平面呈长方形的砖室、石室、砖石混筑墓等，且多双室并列的夫妇合葬墓，两室之间隔以砖墙，墙上开有小龛相通，顶部多数以石板覆盖，也有少数为砖券顶。这就是所谓的“同坟而异葬”。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随葬品较中原地区的为多，都以实用的瓷器、漆器和铜镜、文房用具（砚台、笔墨）等随葬，北宋和南宋初期墓中多出青白釉[②]瓷器。南宋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多出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北宋墓中的铜镜样式繁多，但南宋墓中出土的铜镜绝大多数为湖州镜。这一地区的宋墓之中，较少放置陶俑，在江苏溧阳元祐六年（1091）李彬墓出土了20多件镇墓神煞俑[③]；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出土四神十二生肖俑[④]，而且十二生肖俑的头上戴“王”字冠。另外，在上海发现的嘉定六年（1213）墓也出土过石造像。在一些墓葬之中，还随葬石质或砖质墓志、石质买地券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北襄阳、荆州、安陆等地发现有仿木建筑结构的砖室墓，反映了这一地区宋墓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三、湖广地区

指湖南、广东和广西地区。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

湖南长沙的宋墓，北宋时多土坑墓，南宋时长方形砖室墓增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罈是这个地区宋墓中特有的明器。常德还曾经发现过砖券顶的石室墓，并出土长达2400多字的墓志。

两广宋墓有长方形砖室墓，墓室之上覆盖石板。也有一部分石椁墓。此外，

---

①三门峡是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青白釉：是介于青白二色之间的一种釉色，又称“影青”。创始于北宋前期，以景德镇窑为代表。青白釉瓷器胎骨洁白，釉料中三氧化二铁含量低于0.99%。釉质细薄晶莹润泽，质感如玉，加上胎体极薄，器上的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在花纹边上，显出一点淡青色暗影，其余几乎都是白色，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名。南宋时，以景德镇为中心形成了南方青白瓷系，除景德镇外，安徽、福建、湖北等地都有烧青白釉瓷器的窑场。元代的青白釉比宋代的青色略深，不似宋代那样清澈透亮，形成明显的时代风格。明永乐青白釉与宋、元作品有明显的区别，这时的釉质肥润，并有较大的气泡分布于釉中。另外，永乐青白釉器物的胎体玲珑，透影性强，由于釉面玻璃质强，因此在已刻划的纹饰轮廓线内外形成积釉现象，把纹饰衬托得格外秀美。

③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年5期。

④罗田县文物管理所：《罗田县汪家桥宋墓发掘记》，《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两广宋墓还发现较多的火葬墓，葬具以堆塑陶罈、釉下彩绘的瓷棺和瓷罐为其主要特征。堆塑陶罈的图像内容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褐色釉下彩绘的瓷棺和瓷罐，置于圆形或长方形的砖砌墓坑之内，并随葬铜钱。瓷棺一般呈长方形，后面有插板可以开启，插板之上书写死者姓氏。左右两壁绘十二生肖或青龙、白虎，前壁绘朱雀，后壁绘玄武，棺盖之上书写"天门"、"地户"。有的瓷棺座上雕刻莲花纹，棺身透雕如意纹图案，棺盖四角翘起，其上正中部位雕刻葫芦，葫芦下刻覆莲。瓷罐外壁有数重纹饰，肩部和腹下部绘钱文、卷草纹、莲瓣纹、弦纹、水波纹，腹部开窗或分格，彩绘缠枝菊花、折枝菊花、团菊仕女，或写"仙会蓝桥"、"长寿富贵"、"金玉满堂"、"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兴"等吉祥文字。在广州和佛山还发现了一种形制特殊的火葬墓，地面上筑有棺状的灰沙坟丘，坟前嵌墓碑，设祭台，坟丘之下开挖小土坑埋葬骨灰罈。

四、闽赣地区

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有石椁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有的墓葬随葬的陶俑多达30多件，其中包括四神十二生肖俑和神煞俑。景德镇附近北宋至南宋初期墓中多随葬瓷俑，多为素胎，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对现实人物的模拟，有文吏、武士、侍仆、胡人牵马、僧尼等；另一类为四神十二生肖和镇墓神煞俑，有四神十二生肖、仰观、俯听、蒿里老人、东王公西王母、金鸡、玉犬等。特别是有些瓷俑的底座之上墨书"张坚固"、"李定度"、"张仙人"、"王公"、"指路"、"引路"等题名，为了解镇墓神煞俑的名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十二生肖俑的额部刻有一"王"字，与湖北罗田宋墓所出者相似。有些瓷俑的表情各不相同，被认为是戏剧俑。在临川朱济南墓出土的张仙人素胎瓷俑的左手抱一大型罗盘，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罗盘资料[①]。南宋中期以后，俑类随葬品逐渐减少，其中的四神十二生肖等多塑在常见的堆塑瓶上。江西宋墓中还流行随葬龙虎瓶[②]，特别是南宋墓中，几乎每墓必出一对龙虎瓶，已是必备的明器。有的墓葬还绘制有壁画，墓室两侧壁绘武将、文吏和侍从等，墓室后壁则绘墓主人的仪坐图，但不出现墓主人形象，而仅绘出屏风、交椅和两侧的侍女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壁画见于乐平宋墓[③]。在江西有些宋墓中，由于墓室或者棺椁封闭严密，保存了一些宋代书籍和大量的丝织品等。

江西樟树阁皂山发现1座宋代道教画像石墓[④]，墓内雕刻青龙、白虎、道教祭

①陈定荣等：《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②龙虎瓶：也称为蟠龙瓶、皈依瓶。主要流行于江西、福建一带宋墓中。一般在瓶颈、肩处堆塑一条龙，称为"蟠龙瓶"。以龙泉窑制品为多，大部分带盖，盖顶上饰虎、狗、凤、鹤、鸡、鸟等形纽，以虎纽居多，与器肩颈处的龙合称为"龙虎瓶"。也有一件堆塑龙，另一件堆塑虎，一起被称为"龙虎瓶"。

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乐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3期。

④彭适凡：《江西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奠仪式等，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据《宋史·礼二十八士·庶人丧礼》记载："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可能由于死者是一位道士，先后任"副道正"、"道教首职"等，并被赐"灵宝大师"称号，所以采用了有违常制的画像石墓。

福建宋墓与江西大体一致，也随葬数量众多的陶俑，有的陶俑额部印有"王"字，福州附近的宋墓中还有石俑。福建西北地区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在尤溪等第发现的宋墓中还常见壁画，壁画内容以墓主人生前的家居生活、出游、仪仗以及青龙、白虎、家禽等为主[①]。南平也发现了宋墓壁画，墓室后壁绘亭子和人物图，代表墓主人的家居生活，侧壁绘制鞍马和牵马的童仆，代表墓主人的出游[②]。

五、川渝贵地区

指主要包括四川、重庆和贵州地区，墓葬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为身份低下或贫穷者使用，随葬品较少。在西昌一带还发现在土坑中放置贴塑十二时和文吏的骨灰罐。贵州发现的竖穴土坑墓地面有圆形封土，直径6~11、高1米左右，墓室长2~3、宽0.6~1.3、深0.5米左右。随葬品一般1~2件，最多者也只10余件，而且主要是铜手镯、项饰、发钗及玻璃珠等。另有少量铁器，极个别的墓葬出土铜鼓。可能是苗族或仡佬族墓葬。

第二种是长方形砖室墓，集中发现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主要有四耳罐、多足炉等。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以后俑上施釉，北宋元丰三年张确夫妇墓中三彩陶俑的发现[③]，修正了以前关于四川宋墓南宋嘉定以后才流行三彩俑的说法。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钱币则在淳熙以后常见铁钱，同时还流行在墓葬中放置"镇墓真文"和各类镇墓神煞俑。

第三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主要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具有前后两室，室内雕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进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雕刻妇人启门状题材以及其他题材。但其主题仍为墓主人的"开芳宴"。有些大型家族墓地地面有墓园建筑，墓前有祭台、石望柱、石人、石虎、石羊、石碑、水沟和石沟建筑。有些大型石室墓还有腰坑，坑内放置铜鼓或者以各类钱币摆成吉

①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尤溪县宋代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6期；《福建尤溪城关宋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②张文崟：《福建南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

③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翁善良罗伟先：《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第3期。

祥文字图案和八卦图案等。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石室墓中，重要的有四川华蓥南宋时期的安丙家族墓[①]和彭山虞公著夫妇墓[②]。安丙家族墓共发现5座，其中4座分别为双室并列或基本双室并列，地面有墓园建筑遗迹。其中的安丙夫妇墓前发现祭台、望柱等8件石刻、碑座、水沟和柱础等建筑遗迹及其构件，其他3座墓前也发现有石构建筑遗迹及其构件。安丙夫妇墓后壁龛分别安置墓主人像，两侧浮雕持笏文吏、武士及训狮图案。5座墓室均有仿木建筑如斗拱、屋檐等石雕，其他内容为：青龙、白虎、力士、侍女、童子、伎乐、花卉、狮子戏绣球等。其中M4的腰坑之内以金、银、铜钱分别组成震、离、兑、坎和巽、坤、乾、艮的八卦图形。虞公著夫妇墓用红砂岩巨型石条和石板砌筑而成，墓室呈长方形，双室并列，由墓门、享堂、棺室、腰坑组成。室内雕刻武士、四神、侍女以及"出行图"、"备宴图"、"蓬莱仙山图"、"狮子戏绣球图"等，而且腰坑之内还用铜钱摆成"千秋万岁"的字样。在重庆发现的宋代石室墓则以孝子故事为主要内容。这类带雕刻的石室墓，从四川南部一直分布到贵州的乌江北岸，遵义宋墓的后壁上还刻有墓主人坐像，这与安丙夫妇墓相似，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乌江北岸的贵州遵义一带发现20余座大型石室墓，这些墓当地人称"皇坟"或"官坟"。主要是自唐末至明万历年间统治播州达700余年的杨氏家族墓。这些墓葬的封土呈圆形，直径10米以上，高2米左右。一般有2~4个墓室，墓室由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有甬道、墓门、墓室，有的还有前后室。一般墓门与墓壁上雕刻图案。其中南宋末年的杨粲墓封土直径14.2、高1.25米。为男女同坟异室而葬。两室均有前后室，后室之间有过道相通。除前室外，均有雕刻，共计190幅，内容和题材包括人物、动物、花卉、几何图案、器物用具与仿木建筑结构等，雕刻技法有高浮雕、浅浮雕、圆雕、线刻减地雕等。在棺床之下的腰坑之内各放一面铜鼓。由于被盗，仅出土少量陶瓶、影青瓷、铜镜、钱币等[③]。

在乌江南岸贵州中部一带发现的宋墓则与乌江北岸完全不同，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石室墓，构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条石竖砌而成，加工平整；一种以条石叠置，然后以天然条石盖顶，底部为生土或以石块石板铺地。地面上有小封土堆，墓葬的方向皆以山为准。当地人称这种墓为"苗罐坟"或"仡佬坟"。随葬品稀少，以装饰品为主，其中特有的铜制发钗、项圈、臂钏和手镯等装饰品最具特色，可能是当地少数民族（苗族或仡佬族）的墓葬。

第四种是悬棺葬，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分为悬棺葬、岩棺和洞棺葬，它们分别将棺木置于悬崖峭壁之上，或者搁放在岩坎之上，或堆放在洞穴之中。主要分布

①张肖马、李昭和：《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③宋世坤：《贵州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在四川南部、重庆的长江峡谷地带，贵州的东部、南部和铜仁、安顺等地。延续时间较长，一直到明代。这类墓葬有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苗族和仡佬族的墓葬。

第五节　辽墓的分类和分期

辽墓的发掘与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辽墓不仅发掘数量大，而且由于民族不同，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异，在葬俗、随葬品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使得这一问题复杂而且有趣，这可能也是研究者对其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通过对辽王朝疆域内的汉人墓葬和契丹人墓葬进行对比，还可以探讨草原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是如何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融合其中的这一历史进程。

一、辽墓的分类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在辽代疆域内发现的墓葬，按其民族成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契丹人墓葬，一类为汉人墓葬。契丹人墓葬，目前已经发掘者大都为贵族墓葬，仅有一小部分中下层人员的墓葬。目前，在对契丹人墓葬的研究中，主要以一些大型的贵族墓进行分区、分期等，将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汉人墓葬与契丹人墓葬相比较，有自身的特点，更多地继承了中原地区的传统因素。这两类墓葬不论在分布区域，还是丧葬习俗上都有很大区别。

从发现区域来看，契丹人墓葬主要分布在辽上京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即在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及辽宁西北部地区。而汉人墓葬多集中在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即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大同和辽宁西部。

在丧葬习俗上，由于民族和葬俗不同，在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式上都有区别。契丹人墓墓葬或为砖室，或用石板堆砌，内壁围柏木板（椁室），有的还建有石房（房屋形石椁）。多以木棺装殓，或将尸体直接陈于棺床上，流行在尸体上戴金、铜面具和穿银丝、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以随葬各类马具和本民族特有的鸡冠壶为其主要特征。在墓葬填土或者墓室的小龛内，还经常发现羊头骨，反映了契丹人以羊祭祀的习俗。而汉人墓葬则多沿袭中原地区传统即宋墓旧制，盛行火葬，用小型石棺装骨灰，随葬品以各种小型的日用品模型等陶明器为主。

二、辽墓的分区与分期

一般所说的辽墓主要包括自辽太祖阿保机称帝(907)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时期的墓葬。对于它们的分期，20世纪80年代，徐苹芳先生根据当时的发掘材料

提出了三期说[①]，并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秦大树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辽墓的分区和分期概念，首先将辽墓分为两大区，然后对各区内的辽墓进行分期[②]。这一分区与分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众多的新发现。根据族属、风俗、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沿革的不同，可以将辽统治区内为南、北两区。

1. 北区辽墓

北区的范围是指长城周围及其以北地区，包括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等区域。此区的墓葬以契丹族的大、中型墓葬的发展变化最为显著，可以分为三期：

（1）早期自太祖至圣宗以前（907~983），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以分为前后两段。

前段，即太祖、太宗时期 (907~930)。以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墓地清理的两座贵族墓葬为代表，其中 M1 有“天赞二年”(923) 的墨书题记[③]。两墓为砖筑或石筑的单室墓，均有长斜坡墓道，其中 1 号墓的墓室平面呈抹角方形，2 号墓的墓室平面呈规整的方形，甬道两侧、墓门和墓室有雕砖仿木结构，墓门前有庭院式天井，墓内筑石房，石房之内砌筑棺床，可能还置有床帐。墓室之内满绘壁画，主要装饰在墓室和石房的壁面，内容和题材包括备马图、侍奉图、妇人启门图、厅堂图、花鸟屏风和人物故事等，有着浓厚的唐代风貌，也有契丹民族的色彩。有封闭式茔墙等地面建筑。尽管仅发现了两座大墓，但却有从以东向为尊向以南向为尊转化的迹象。与唐代墓葬制度相似处较多。从这两座墓葬可见，契丹建国前后初创的贵族葬制，整体上有着浓厚的唐代风貌，局部表现的内容则与河北北部地区晚唐墓葬有密切的关联，但就整体设计思想而论又尊重了契丹民族特点，总的来说创新重于借鉴。这是辽代贵族墓葬的初创时期。此期的中小型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代表。

后段，从太宗后期到圣宗以前 (约 930~983)。大型墓以耶律羽之墓[④]和驸马萧沙姑墓[⑤]为代表。中小型墓有竖穴土坑墓，还发现砖室或石室单室无装饰的墓葬。在今内蒙古赤峰西南部地区发现的一些单室中型壁画墓。大型墓由单室变为多室，以方形为主，有少量圆形，流行斜坡墓道，葬具以木制小帐与木制尸床配合使用，墓内放置成套的生活用具，有马具及部分铁制工具、兵器，数量多成双，说明男女墓主各有一套。典型器中的鸡冠壶有强烈原始皮囊风格，带有高鸡冠耳或双穿，经瓶（鸡腿瓶）、有明显凤首的凤首壶和长颈注壶流行。墓内装饰一般位于墓门外

①徐苹芳：《辽墓的发掘和契丹文墓志的新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1 期。

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第 1 期。

⑤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辽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第 3 期。

侧、耳室及甬道和前室，内容为人物肖像及男女侍者，棺壁装饰为在棺外雕刻或绘画四神为主的图像，也有的画出契丹游牧图和游牧生活小景。在贵族墓葬中开始使用墓志。本期墓葬仅在墓葬形制方面可看到河北地区五代墓葬的影响，使用墓志也是仿自汉族传统。而其他方面，如壁画限定在前室，以人物侍奉为主，兼有契丹民族特色的游牧场景；敛葬方式则以木制小帐与尸床组合，以金银饰品、玛瑙璎珞和串饰配合葬服使用等，已经形成规制的表现内容，减少了对汉族文化内容的直接模仿，更多地体现出了创新性。这是契丹贵族葬制的形成时期。

（2）中期为圣宗至兴宗时期（983~1055）。大型墓以陈国公主墓①等为代表，中小型墓葬大量出现。墓葬形制流行圆形，还有少量方形，开始出现多角形。墓道大部分变成阶梯状，木护墙较流行，天井的设置也较普遍，甬道部位开始出现对称的小龛。多数墓葬以木制小帐和石棺作为葬具，并在中小型墓中普及。贵族墓乃至中型墓中开始在尸体上着金、银、铜的丝网络和面具，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带具、錾花银靴等，形成一套完整的丧葬专用服装。随葬器物的类别和摆放方式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太多变化，随葬品有陶瓷生活用具、马具和少量铁制工具，后室配备金、银、漆、玉、玻璃制作的饮食盥洗用具和少量弓箭武器。马具开始明器化，有的用银制，有的则用辔、衔、镫等示意。兵器减少，只有随身的刀、剑等。鸡冠壶形体上与一期后段的相同，形体变得较高而不似早期丰满。高体的提梁壶、双穿耳的鸡冠壶较多见。另外，还出土经瓶、长颈壶等。壁画布局较有规律，墓道基本不绘壁画，天井部分一般绘制仪仗侍卫备马备车内容，前室和甬道是壁画绘制的重点位置，大约以主室的方向为中心，两侧对称布置男侍侍卫和女侍侍盥或侍者奉物的内容，墓顶一般有流云、飞鹤、莲花等内容，主室和耳室内一般不绘壁画。整个壁面的设计以墓主所居主室为中心，在前室及甬道部分安排室内生活内容，侍者均面向主室方向呈立姿站立，墓门内外置有门吏或门神守卫，天井部分安排室外活动所需车马仪仗，侍者一致面向墓室或墓道方向，并列站立作等候主人状。有较多的中型墓葬饰花鸟画、契丹装的侍者、鞍马构成的备行场面、四神、墓主人对坐图、家具和用具等。比较典型的是陈国公主墓壁画，墓道绘侍从牵马图及仿木建筑的斗拱、屋檐等；墓门绘缠枝牡丹和花卉图案；前室壁画绘于两侧壁及券顶之上，主要为捧物的男女侍从及侍卫，均面容悲戚。人物的上方均绘彩色祥云，在耳室门外的侧上方绘飞翔仙鹤。券顶涂深蓝色表示天空，其上满绘大小不等的白圆点表示星辰。东壁之上的券顶一侧绘一轮橙红色太阳图案，其内用墨线绘一只三足乌。与之相对的西壁券顶绘白色月亮图案，其内用墨线绘玉兔和桂树。不少墓中开始使用仿木构建筑雕砖，如雕出门楼、直棂窗、灯檠、桌、椅等家具。棺壁绘游牧景色。从这些特点可见，契丹贵族的葬制与前一阶段相比较，继承与发展并存。这一时期的贵族墓葬的制度化稳步发

---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第11期。

展，契丹贵族葬制在此时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3）后期为道宗到天祚帝时期（1055~1125）。大型墓以库伦 M1[①]等为代表，与之等级相当的墓葬还有 20 余座。中小型墓葬的数量亦很多，包括许多望族家族墓地中的中小型墓。显著特点是多角形墓开始大量流行，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长方形小墓并存，也有少量圆形墓。多室墓的主室规模与前阶段相比普遍较大，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前室普遍退化为券顶长方形，但与甬道仍有所区别。多数墓葬不设天井或从属于墓道，墓道则常有以砖铺底甚至垒砌两壁。墓室内壁流行镶嵌木护墙，许多墓葬连同前室和耳室均使用，并且以木材结顶，构成藻井形式。葬具以在砖砌尸床上铺设木板或以木棺敛葬比较普遍，木制小帐和石棺不再流行。敛葬服饰与前阶段大体相同，网络和面具在中型墓葬中较多地使用。本期还流行火葬，用小石棺盛放骨灰，其上常刻梵文经咒，与佛教流行密切相关。中小型墓葬中较少装饰壁画。随葬品有鎏金铜马具、铜制生活用具、铁制生活用具和瓷器等。此期可以看到契丹人游猎风习的消失和强烈的汉化。马具和兵器消失，经瓶也已极少见。鸡冠壶类的器物只剩下了高体提梁壶一种，体形变得高而瘦。有些契丹人墓葬之中，鸡冠壶消失。大安以后，三彩器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墓葬壁画以墓道部分表现最为突出，部分墓葬主室和耳室木护墙上绘有壁画，前室壁画不够普遍，局限于墓门内的甬道部分。通行在墓道两壁对称布置备马、驼车及仪仗侍卫内容，墓道两侧壁画的人物、车马都呈现相同的方向，两壁所画内容多采用互相补充的方式加以表现。墓室内壁画常见墓主人夫妇对坐、伎乐等场面，并有花鸟、蜂、蝶、湖泊、云朵点缀其间。同时出现孝行图。壁面装饰以主室为中心，甬道、天井简单布置预备外出前的服侍情景，墓道部分重点表现等候主人外出的车马仪仗等。有些墓中的壁画分上下栏，如库伦 1 号墓的天井壁画，即分为上、中、下三栏。下栏绘男女仆侍，中栏绘牡丹湖石，中栏与上栏之间加一道云纹装饰，上栏绘竹林仙鹤和荷花。契丹贵族墓的壁画中，有能够反映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常见的宴饮、伎乐等场面。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仿木构建筑流行，是对前期的继承和发展。

晚期的小型墓葬以吉林双辽发现的一批小型墓为代表[②]。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一些小型的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砖室墓。采用夫妻合葬及母子合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少或无，主要有陶罐、铁刀、铁马镫、铁镞、铜钱等。

辽代末年，还在辽阳、鞍山和锦西一带出现了画像石墓。墓室平面多作八角形或长方形。在石板墓壁上不但刻有墓主人夫妇“开芳宴”的场面，还刻出多幅

①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 8 期。
②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考古》1986 年第 2 期。

孝悌义妇等故事画。在契丹人墓室的壁画上出现这些题材，说明不仅葬俗上接受了汉人习俗，而且在思想意识方面也逐渐封建化了。

从本期墓葬的特点可见，辽墓的特点已基本定型，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契丹贵族的葬制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已经完全成熟。

2. 南区辽墓

南区是指长城两侧以及长城以南地区，与北宋疆域相邻，其范围包括北京周围地区、河北东北部地区、以宣化为中心的河北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区、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这一地区，是辽王朝境内的汉人聚居区，发现的墓葬以汉人墓葬为主。这一区域墓葬，根据其形制、构筑等特征和随葬品的差异可以分为若干小区[①]。

（1）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这一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的檀、蓟、涿、顺、妫、儒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墓葬以圆形和方形的单室砖墓为主。有些墓葬绘制壁画。如北京斋堂的辽代末年壁画墓，西壁画孝孙原谷等三幅大型孝悌故事画，表明这种新题材在当时已很流行。随葬品中陶器种类较多，大体上形成一套较有规律的陶质明器，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器和影青瓷器。

（2）河北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的武、幽、莫、瀛、檀、蓟、涿、顺、妫、儒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以及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以多室和单室砖墓为主，还有一些多室和单室的石室墓。随葬品基本不适用陶器，常见瓷器和铜铁器。墓葬装饰不普遍，而且题材也比较贫乏。有些墓葬使用砖雕装饰，内容和布局与河北地区的宋墓较相似。

（3）宣化地区。这一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的新、武等州。以河北宣化地区的墓葬资料最为丰富，以圆形、方形和多角形为主的双室砖墓最有特点。大多数墓葬都有壁画，而且与砖雕相配合。宣化天庆六年张世卿墓的壁画最为精美，由12人组成的散乐图，完整无缺，极其珍贵；墓顶绘天象图，内区绘九曜二十八宿，外区画黄道十二宫图像，是难得的古代天文学资料[②]。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并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器物组合，如罐、盆、三足锅、灶、鏊子、燕具、勺、注子、三耳器、香炉等。还常以木器随葬。

（4）大同地区。这一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的云、应、朔、蔚等州。墓葬以圆形砖室墓为主。随葬品不丰富，且无规律可循，主要为陶瓷器。最有特点的是墓内的壁画装饰，不仅布局严谨，而且有一定规律可循。一般北壁为三扇花卉围屏和侍立两旁的侍女，墓主人并不出场，这一特点在江西乐平宋墓壁画中也有发现；南壁为门吏或侍立的仕女图；西壁为车马出行或骆驼出行图，个别加绘伎乐；东壁绘挂衣服的衣架，旁立侍女或老翁；墓室顶部绘星象图，东侧绘太阳或金乌，西

①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侧绘月亮或桂树、玉兔。

总的来看，南区墓葬总体上不如北区墓葬变化明显，可综合分为三期[①]：

第一期，太祖至圣宗统和元年以前 (916~983)。本期壁面带装饰的较少，壁画题材以侍女为主，还有马和骆驼；砖雕则多表现为门、窗和桌。但二者并不同时出现。一般装饰于墓室的东西壁面。较大型墓葬的随葬品主要有两类：一为各种实用器物，尤其以瓷器为多；另一类是一套成组的陶明器。这类陶器很有特点，应当是继承了晚唐时北方唐墓中的陶明器，但器类从成套的明器神煞改为一套近似日用器物的礼器。在宣化地区的辽墓中此时大量随葬三足器、注壶、勺、罐、盆等陶炊具组合，这是其地域特色。与辽畿内地区，尤其是昭盟的一套铁明器相同，许多又与中原北方宋墓的壁面装饰相似。由于其保存十分完整，对研究宋代礼器的发展变化很有意义。

第二期，圣宗到道宗清宁元年以前 (983~1055)。北京地区以圆形单室墓为主；河北东北部地区仍使用土坑墓，新出现砖室墓和石室墓；宣化地区和大同地区砖室墓和石室墓并行。壁面装饰除了河北东北部地区，早期的装饰题材和布局被淘汰。装饰题材以侍女为多，但侍女多与花卉、衣箱、桌以及画屏等同时出现，马和骆驼等共同构成有情节的画面，并趋向程式化。墓顶有天象图和莲花图。出现门吏等新内容。砖雕仍表现门窗桌等，出现椅、灯檠。砖雕和壁画开始共同出现于同一墓中。布局开始固定，如画屏绘于墓室北壁，灯檠则一般出现于南壁接近墓门处。随葬品除了形制的变化，种类上与早期相似。北京地区以日用瓷器类随葬品成为大宗，但前述的马具或工具等小件器物仍在小墓中继续使用。宣化地区则趋向随葬成组的陶明器为主，有三足器、釜、罐、盆、注子、熨斗、勺、剪刀和水斗等一套固定的组合，而且器物的尺寸都约在10厘米左右，在组合和大小上都已制度化。这套明器不仅影响了北京地区，而且在辽北区从道宗至辽亡的阶段也成为习用的明器。由此可以看出这种陶器组合是以宣化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式传播。由于砖雕的发展，一些器物被雕刻在壁面，退出了随葬品的组合。大同地区随葬品数量不多，但各类随葬品皆有，并出现木质桌椅等，壁面装饰从本期开始形成固定模式。在埋葬时使用纸明器，并在当时焚烧。

第三期，道宗至辽末 (l055~1125)。河北东北部继续使用圆形单室砖墓，北京地区墓葬形制新出现长方形和方形。宣化地区出现多角形墓和双室墓。大同地区则圆形、多角形和方形单室砖墓并行，且棺床位于墓室整个北部，另外还有多角形积石墓和土洞墓。但总体仍以圆形墓葬占多数，多角形次之，方形最少。与中原宋墓和辽其他地区流行多角形墓相比，燕云地区的传统因素保留得更多。各地普遍出现了新的装饰题材和布局形式。壁画题材增多，内容趋于复杂，并出现孝行图。画面更加复杂，有“宴饮”、“备宴”、“出行”、“伎乐”等。壁画位置也相

①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对固定，形成一定的布局模式。砖雕仍局限于门窗桌椅、灯檠。画屏和灯檠位置与前期相同，但西壁固定地用来绘车马图，东壁绘宴饮图。这种布局在前期的大同地区已出现，本期成为定式。随葬品以成组的陶明器为主，尤在宣化、大同地区流行。也有一些日用瓷器类。大同周边地区墓葬中从本期开始，木质随葬品大量出现，有桌、衣架、盒、杵、刀鞘等。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 年。

徐苹芳：《辽墓的发掘和契丹文墓志的新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第六节　金元明时期墓葬

一、金代墓葬

金代墓葬，按照其构筑方式，可以分为三大类：继承北宋和辽代墓葬旧制类，这类墓葬多见于华北和中原地区；女真人的石室墓或砖室墓、竖穴土坑墓。

1. 继承北宋和辽代墓葬旧制的金墓

这类墓葬的所受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受辽墓影响，另一方面则更多的继承了北宋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代表性的墓葬有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①]和兴隆的萧仲恭墓。由于墓主人爵位高，均系多室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

后期墓葬多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尤以晋南地区的发现较为集中，而且雕刻复杂繁缛。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室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二十四孝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墓葬则以雕砖表现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妇女”。这显然是北宋后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随葬品以各类瓷器为主数量较少。

---

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北杨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2. 女真人的石室或砖室墓

这类墓葬分布地域较广，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均有发现，也被称为石椁墓。墓主人的身份主要为金代贵族和辽代旧贵族。形制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竖穴土坑石室，也有一部分砖室。葬具采用木棺、石函等。木棺多用来盛放尸体或者骨灰，石函则主要用来盛放骨灰，反映了女真人土葬和火葬并存的习俗。实行聚族而葬，如吉林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北京乌古伦氏家族墓地、内蒙古班氏家族墓地等的发现，都是很好的例证。采用夫妇合葬，或将木棺、石函并列墓室，或将尸骨同置于一棺之内。未火葬者，采用仰身直肢葬。受汉人葬俗的影响，有些墓前列望柱、文臣、武将、石羊、石虎等石雕像以及神道碑，随葬品中也使用墓志。

吉林舒兰小城子发现了金代贵族完颜希尹家族的世袭墓地[①]。墓地分为5区，每区有数座墓葬。每区墓前多有望柱、文臣、武将、石羊、石虎等石雕像以及神道碑。墓葬形制为在竖穴土坑之内用石、砖等砌筑而成。葬具采用木棺或石函，木棺盛尸或骨灰，石函盛放骨灰。

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北京地区也较常见，已发表资料的10余座[②]，为竖穴土圹石室或砖室墓。如北京发现的乌古伦氏家族墓，其中石室墓3座，砖室墓1座，葬具采用木棺或石函，多为夫妇合葬。有人将这类墓葬以金正隆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正隆以前，这类石椁墓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内筑长方形石室，葬具用木棺；正隆以后，墓葬构筑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普遍采用火葬，一般不用木棺，而是在石室内放置石函或木匣以盛放骨灰，有的还使用氈毯袱套[③]。

3. 女真人的竖穴土坑墓

这类墓葬多为平民墓，与贵族墓形成鲜明的对比，地面上无任何标志，墓室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具采用木棺，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个别的屈肢葬。随葬品主要有铜钱、铜镜、桦树皮箭囊以及铁制的镰、刀、镞、马镫、马衔等，并随葬羊距骨、羊肢骨。

二、西夏墓葬

1975年，发掘了西夏王陵的第108号陪葬墓[④]，为了解党项人的埋葬习俗提供

①徐翰煊、庞治国《金代左丞相完颜希尹家族墓调查试掘简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

②张先得、黄秀纯：《北京市房山县发现石椁墓》，《文物》1977年第6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北京文物》1977年第11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③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了重要证据。该墓地面上尚存封土和平面呈方形的墓园夯土围墙，墓室是一座前有阶梯墓道的土洞墓，平面呈方形，边长 4 米。在墓室的西南角发现有羊羔骨架，同时在墓道的填土中也夹杂有大量家畜家禽等的骨骼，这可能代表了西夏党项人的一种葬俗。在墓旁碑亭的残基上采集到了汉文和西夏文碑石残块 300 余块，复原出了"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等字，从而得知 108 号墓的墓主人是西夏时被封为"梁国正献王"的嵬名安惠，大约葬于 12 世纪 30 代初。随葬品有石狗、石马、绿釉陶罐和北宋钱币等，还发现有丝织品残片。这一墓葬的发掘为了解西夏贵族的葬制和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夏时期的汉人墓葬也有发现。1977 年，在甘肃武威发掘了两座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①]。其中一座是天庆七年（1200）下葬的刘德仁墓，墓室约 1 米见方。骨灰葬在以一高 76 厘米的八角形"木缘塔"中，塔身上写满了梵文咒语，塔顶部有题记。随葬品有木制家具模型和 29 块板画。板画大小不一，大者长 28、宽 10.5 厘米，小者长 9.5、宽 4.5 厘米。多画男女侍者和武士。也有带题名的板画，如"蒿里老人"，是一位头戴高冠的持仗老人。这些板画都排列在墓壁之下，可能有替代墓葬壁画的意思。通过对武威西夏墓葬的发掘，可以认识到西夏汉人墓葬有以下几个特点：采用火葬，将骨灰葬于八角形塔中，塔身写满梵文咒语；由于采用火葬，葬具较小，所以墓室狭小，以板画代替壁画[②]。

三、蒙古时期与元代墓葬

从发现的元墓来看，从地域上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从时代上可分为蒙古时期和元代两个时期[③]。有学者则进一步将北方地区元代墓分为长城以北、长城以南至长江以北、南方三个区域[④]。

1. 蒙古时期墓葬

蒙古时期是指金贞祐南迁，即成吉思汗八年（1213）以后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国之间。这期间蒙古从北方草原南进，逐渐控制了中原，于 1234 年灭金后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地区。墓葬形制大体上可以分为方形或长方形、六角形或八角形两大类:

（1）方形或长方形墓，墓室砖筑或石筑。主要的发现有山西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宋德方墓[⑤]，长方形砖室券顶墓，葬具采用画像石棺，题材有厅

---

①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麟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

③徐苹芳:《金元墓葬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④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⑤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8 期。

堂楼阁、墓主人夫妇对坐、杂剧表演和孝行故事等，与山西地区金代后期的墓葬装饰一脉相承。但画像石棺在山西则是新因素。山西大同至元二年（1265）冯道真墓①，平面呈方形，壁画有奉茶、焚香、观鱼、论道等题材，北壁正中还有大型山水画，以木制家具、器物模型和钧窑瓷器等随葬。此墓从装饰到随葬品都符合道士身份，葬制是将着道冠和道袍的尸体放在棺床上，外罩木制棺罩。北方地区与道教有关的墓葬不断发现，反映了这个时期道教势力的增长。西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墓②，平面方形，随葬成组的黑陶家具、家畜和俑等，这是新出现的因素。北京密云太子务村墓与田各庄墓③、山西大同东郊中统二年（1261）墓④，均为方形砖室墓，以壁画为主要装饰，四壁均饰有蒙古风格的垂幕以及花卉，还饰有梅石图、屏风和人物壁画等。类似的壁画墓还有内蒙古赤峰三眼井⑤和赤峰元宝山⑥、沙子山⑦发现的几座砖室壁画墓，均为方形墓室，有竖井台阶式墓道，拱券形墓门，墓室边长在 2.5 米左右，墓顶为穹隆顶。壁画内容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出行图、行旅图、山居图或闲居图、备宴图。墓门两侧绘有武士（门神）或仪仗队伍，墓顶绘有表示吉祥的花卉、瑞禽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⑧，墓地延续时间横跨蒙古、元、明，从 1243~1616 年。此墓地较早的墓葬延袭了金墓风格，在方形墓框上做出八角形叠涩顶，以砖雕为主要装饰，题材有孝行图等。随后出现了方形叠涩顶和长方形券顶墓，砖雕装饰逐渐减少，而用彩画表现各种生活场景，随葬品流行陶明器，有的墓出土较多的铜器，还有完整的木制床帐。

另外，辽宁凌源富家屯发现 2 座方形叠涩攒尖顶石室墓⑨，墓内无装饰，墓室后部有石板尸床，随葬品不多，应是较特殊的葬制。

（2）六角或八角形墓，墓室砖筑。主要的发现有山西芮城永乐宫蒙古中统元年（1260）潘德冲墓⑩，平面呈六角形，使用石椁，两侧线刻二十四孝图，门两侧刻男女侍者，门上刻舞厅，厅内有四人表演杂剧，继承了宋金雕砖壁画墓的题材。河南焦作老万庄宪宗八年（1258）冯三翁墓⑪，平面呈八角形，壁面饰真人大小的屏风画，这一点延续了金代葬制。陕西蒲城至元六年（1269）墓⑫，为八角形单室

---

①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 年第 10 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58 年第 6 期。
③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 年第 6 期。
④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 年第 6 期。
⑤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 年第 1 期。
⑥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 年第 4 期。
⑦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 年第 6 期。
⑧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 年第 2 期。
⑨辽宁省博物馆等：《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⑩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8 期。
⑪刘建洲、皇甫其堂：《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1 期。

砖墓，穹隆顶，仿蒙古包的样式在墓顶开天窗，壁面彩画表现蒙古装的墓主人夫妇对座及乐舞、出行等场面，但几幅壁画中都有墓主人形象出现。另外，还有放牧图、停舆图等。

蒙古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表现出继承、变化相交错的局面，这与其战乱的背景密切相关。墓葬形制从金代后期以多角形为主，转变为较多地采用方形和长方形墓室，石室墓数量增加，而且石室的使用与墓主人身份无必然关系；流行以壁画装饰墓内，壁画一般有完整的情节，以墓主人夫妇正面坐像代替以前的墓主人夫妇对坐象，题材则依然流行墓主人夫妇对坐、备茶、备宴、侍奉、出行、伎乐、杂剧、升仙、孝行等，但出现身着蒙古装的人物，同时也有狩猎、放牧、停舆等新题材，并出现了附属装饰的垂幕、蒙古包式墓顶彩画和花卉等新因素；砖雕衰落，仿木构斗拱普遍简化；随葬品常见陶模型明器和俑类、瓷器等，大中型墓中的瓷器以南方所产为主，小型墓中的则以当地或附近所产者为多①。

2. 北方地区元墓

（1）长城以北地区

此区的特点是大型墓葬不多，与蒙古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体现了葬制的延续性。墓葬有砖室、石室和竖穴土坑，平面形制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类。方形墓如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元墓②，平面近方形，穹隆顶，有的墓室有仿木建筑结构的斗拱，四壁饰彩画，北壁为墓主人家居图；东、西壁北端、中部、南端分别绘有牡丹图、孝行图和神怪图；南壁墓门两边壁画均残，判断应为人物画；有建筑彩画；墓顶绘有祥云，其北面还绘有一招魂女。长方形墓如大连寺沟墓③、抚顺土子口墓④，用石板盖顶或在过梁木上铺以木棍后再用白灰抹顶。另外，如辽宁喀左大城子石椁墓，椁室四壁用砂岩石条平砌三层，白灰抹缝，墓顶用四大块厚重的石板搭成。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发现了许多小型墓葬，有砖室、石室和竖穴土坑。这些墓葬无装饰。大小不一，随葬品的多寡也相差甚远。

（2）长城以南至长江以北地区

北京及河北地区发现的主要有三种墓葬：①土坑石椁墓、长方形砖室墓和砖室石顶墓。这些墓类都可以追溯到金代的土坑石椁墓，其变化是大多以石块或砖砌成墓室，内置棺椁。另外，墓主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广泛了。②仿木构砖室墓，有方形、圆形和多角形，以圆形多见。壁面装饰以壁画为主，但已经走向衰落。与宋金时期相比，这类墓有较多的随葬品。③壁面没有装饰的砖室墓，仅见方形和圆形墓室。使用者多为元朝的品官和王族成员，墓的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是区分

①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的第10期。
③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
④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子口村元墓》，《考古》1994年第5期。

墓主人身份的主要依据。此类墓葬在蒙古时期后期出现，元代后期相当流行。

河南、山东地区的元墓发现不多，山东地区与江南和河北的某些元墓比较相似，而河南与晋中地区比较相似。河南发现的元墓有砖室和土圹两种，其中土洞墓很有特点，有抹角方形、长方形和梯形，有的还有土洞附室。这类墓的墓主人有些是品官，常随葬一套陶模型明器和陶俑。砖室墓有两种：一种是元代新出现的方形、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内没有装饰，但出土一套灰陶或黑陶的明器和俑。另一种砖室墓是从传统的仿木构砖室墓变化而来，仿木斗拱简化甚至不用。河南地区的元代墓葬与陕西的关中和甘肃地区相似，实际上可以当作一个小区来看待。

关中地区的元墓有长方形与方形土洞墓、长方形砖室墓，也有八角形的石室墓。有的墓葬具有前后室。墓主人以平民为主，也有一些下层品官。墓室壁面基本上没有装饰，流行小龛和附室。最大的特点是都随葬灰陶明器，包括碗、盘、瓶、罐等饮食器，盒、炉、灯、灶、仓等模型器，俑类有男女侍俑、马、车马、牵马俑，家畜模型有鸡、羊等。

山西地区的元墓最为丰富，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带壁画的砖室和石室墓，平面呈八角形、方形等。这些墓多数依然保留着仿木构斗拱；另一种是有精美雕砖的砖室墓，与北方其他地区相比，山西保留的传统更多一些。壁画墓主要发现在晋中以北和晋东南地区。晋南元墓主要以雕砖来装饰，装饰内容与壁画墓大致与金墓相同。晋南元墓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墓葬的仿木构斗拱仍比较复杂。山西地区元墓的壁面装饰题材十分丰富，与金墓的装饰有所不同，基本可以代表北方地区元墓的题材内容。壁画和砖雕的题材可分为六类：①墓主人夫妇的形象和活动图。多在相对的壁或两侧壁表现伎乐、杂剧题材。墓主人夫妇为正面并排而坐的形式。还有出行、狩猎和狩猎归来等的生活场景。其中狩猎等场面为元代所特有，并在长城沿线及其以北较多见。②侍者图像，有捧物侍女、备茶、备宴、梳妆和其他侍奉图等，包括“妇人启门状”图像。③孝行图在墓中有时是主要装饰，有时仅穿插于第一类装饰中。④杂剧题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表现五人或更多的人在表演杂剧，包括伴奏乐队，有些还有舞台或舞厅；另一种是表现杂剧的故事情节。⑤道教题材的装饰，包括灵兽、仙人（也被称为隐逸或高士）以及升仙场面等。⑥其他花鸟及山水图画，包括一些吉祥图案。

3. 南方地区元墓

主要沿用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夫妇同坟异葬。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有利于尸体的保存。由于密封条件较好，所以，不仅有些墓葬的尸体保存较好，而且一些麻织品、丝织品、各类纸钞等也得以完好地保存。盛行厚葬，以实用瓷器、漆器等随葬比较常见，有些墓葬则主要以金银器随葬。

四、明代墓葬

明代墓葬一般流行夫妇同穴合葬的砖室墓，厚葬之风盛行，使用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葬不仅尸体保存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的有机质物品也非常完好。如江苏淮安明王镇夫妇墓出土 25 幅书画[①]包括山水、人物、走兽、花鸟等，其中 22 幅有名款，为明前期享有盛誉的夏昶、马拭、李在、谢环、何澄、夏芷等人所作。太仓南转村明墓则出土了 4 部古籍[②]，包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古今考》、《尺牍清鉴》、《□（不能释读）字文汇体》，共 42 册。另有手抄文牍 14 页、《战国策索引》13 页。4 部古籍均为明版善本，14 页手抄文牍则提供了有关明代卫所、吏治制度以及江南风土民情的第一手资料。有些等级较高的墓葬地面有石人、石虎、石马、石羊等石刻。

参考文献：

徐苹芳：《金元墓葬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年。

第七节　手工业遗址与遗物

宋元明时期，由于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增加，矿冶、制瓷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遗址主要有矿冶、制瓷等。

一、宋代冶铁遗址

宋代的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河南的荥阳、林县和安阳，福建同安[③]，山东莱芜等地均有发现。在宋代，已经用煤冶铁，其特点是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了铁的质量，对于改善农具、兵器起到了很大作用。如苏轼曾在徐州西南山中发现了煤炭，用以冶铁制作兵器，“犀利胜常”[④]。宋代铁的开采和冶炼，有的由地主豪绅经营，有的则由政府设监经营。前者役使的大都是所谓“流亡”和“逋逃”，后者则是把各地被判决服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劳作。

邢台朱庄至綦村一带，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铁，皇祐五年（1053）开始置官，所铸造的铁斧上印有“丰明”二字[⑤]。繁昌冶铁作坊就设立在矿山附近，范围甚广，

①江苏省淮安县博物馆：《淮安县明代王镇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3 期。根据墓志记载，王镇，字伯安，祖籍扬州仪真（今仪征），先祖迁至淮安。他一生不仕，经商为业，喜好书画。墓葬中的书画，是他生前购买所得。

②吴聿明：《太仓南转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1987 年第 3 期。

③陈仲光：《同安发现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 年第 2 期。

④苏轼：《东坡全集》卷十《石炭诗·小引》。

⑤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 年第 7 期。

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岩块作溶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①。林县铁牛沟冶铁遗址有炼铁炉 11 座②，均依山坡建炉以使炉体坚固。火膛内径 0.9~2.6 米，在坡上平台装料便于运输，下面平台鼓风、出铁、出渣、操作。这种利用地形建炉的方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节省人力。

二、宋代煤矿遗址

宋代之时，煤炭已经大量开采。根据文献记载，河东境内的居民多用煤炭作燃料，当地贫民，在北宋前期即多以采煤出卖维持生计。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用煤炭作为燃料。江西的丰城、萍乡两县山间的煤炭也已经被开采出来。宋代煤矿遗迹有的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

1960 年，在河南鹤壁矿区发现的宋代煤矿遗迹③，是一处重要的采矿遗迹。根据遗迹内出土的鹤壁集窑瓷器，推测矿井的年代属于北宋晚期。竖井矿口直径 2.5、深 46 米。依煤层伸延开掘巷道，其中较长的 4 条巷道总长达 500 余米，并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地下积水的设备。从煤矿区的分布看，当时已动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煤方法。巷道通向采煤区，采煤区与矿口的距离自10~100 米不等。在遗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弃置的木制辘轳。巷道西壁和采掘区壁面，有密布的灯龛和灯盏，还有矿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县神垕镇梨园煤矿发现的北宋煤矿遗址④，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面积约 6 万平方米。已查明井口 11 个，其中 2 个竖井的深度分别为 54 米和 66 米。在现今的煤矿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遗迹。

三、元代铸造作坊遗址

在河南荥阳楚村发现一处元代铸造作坊遗址，出土炼渣、煤块、炉壁、坩埚和一批铜模。这批铜模包括犁铧、耧铧、犁底、耙齿等。铜模均铸造而成，都可以直接用来制范，表面光滑，化学性能稳定，不易生锈，远比铁模优越。这种永久性模型，在铸造工艺史上使产品规格化，简化制范工艺，在我国铸造工艺史上是一大改进和创造⑤。

四、瓷窑遗址与瓷器

宋元明时期的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窑址遍布全国大部

---

①胡悦谦：《繁昌县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 年第 7 期。

②北京钢铁学院等：《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 年。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 年第 3 期。

④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 年第 8 期。

⑤于晓兴等：《郑州荥阳楚村元代铜模》，《文物》1982 年第 11 期；郑州市博物馆等：《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的试掘与研究》，《中原文物》1984 年第 1 期。

分地区，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经发掘的瓷窑，北方地区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灵武窑等遗址。南方地区有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德化窑等。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瓷器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仅出现了制瓷手工业作坊和城镇，各地窑业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许多名窑在烧造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并为其他民窑所效仿，从而形成不同的瓷窑体系，称为窑系[①]。一般可分为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等六大窑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就窑场的布局而言，多以大规模的窑群形式出现，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专业化程度较高。宋代的定窑，仅涧磁村窑址范围即达117万平方米；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浙江的龙泉窑址在龙泉大窑地区就发现宋代窑址24处，每个窑址包括许多瓷窑。在瓷器生产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匀合理。

其次，瓷窑设置不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运输。特别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陆路交通干线附近，窑场向交通干道、商业集镇靠近。一个瓷窑的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逐渐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窑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范围。

再次，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瓷业发展特别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仅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州窑、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以泉州为中心的德化窑、同安窑、建阳窑等。沿海地区瓷业发展已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表明瓷器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显增强。

从海外考古发现看，当时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欧洲。

从纪年资料看，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明显垄断了当时的国内市场，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定窑白瓷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影青瓷的势力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地区。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及越窑精品在长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当时密切的宋辽关系。其他窑系产品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大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在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较少。

---

①窑系：瓷窑体系的简称。民间众多瓷窑中，以一个窑口为代表，产品的胎釉成分、工艺、造型、釉色、装饰诸方面相同或相近的一批瓷窑，往往被划分为一个窑系。窑系形成于民间制瓷业空前繁荣的宋代，元代继续发展。重要的窑系有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龙泉窑系。各窑系产品多以一个品种为主，如定窑系的白瓷、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瓷、耀州窑系的刻花青瓷、龙泉窑系的青瓷等，有的也有其他种类的产品。

（一）定窑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曲阳在宋代隶属定州，故称定窑。它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窑口。北宋是定窑的最盛期，不仅产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点。但靖康之变使定窑遭到严重破坏。宋王朝南迁之后，定窑曾经一度停烧。金世宗时期，因社会趋于稳定，定窑又恢复生产。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是装烧工艺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的是大量采用印花装饰，器型趋于单一。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流行器内壁印花、刻花和划花，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并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遗址中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20件刻有“官”字款。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37件定瓷中，“官”款器多达16件。这些瓷器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定窑系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瓷窑体系，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酱、绿釉瓷及白釉剔花瓷。主要窑口有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山西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霍窑，四川彭县窑等。

（二）汝窑

汝窑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宝丰县在宋代隶属汝州，故称汝窑。又因为汝窑是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故也称汝官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烧造的时间不长，仅从宋哲宗到宋徽宗烧造了20年左右。北宋王朝的建立，社会稳定，手工业进步，陶瓷业繁荣昌盛，制瓷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到宋徽宗大观年间，以定白瓷有芒（边沿无釉）不堪用，则改用汝青瓷，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造御用品，即把汝官窑称汝窑，把汝窑称临汝窑。

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汝窑在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使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

汝窑不仅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煇《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釉莹厚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磬，釉面沙眼显露出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

由于为宫廷烧制时限很短，产量有限，流传很少，南宋时已很难得。传世汝官窑器物不足百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香港等私人收藏家手中。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窑地点一直困扰着古陶瓷研究人员。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 1987 年才在河南省宝丰县西大营镇清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的汝官窑址[①]。该窑址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厚 2~3 米，最厚者在 6 米以上。窑址附近盛产白色、黑色、红色、绿色和棕色的玛瑙石，是汝窑特殊色泽的釉料。所烧青瓷，色泽莹润，并有漂亮的开片。试掘中出土 20 多件宫廷御用汝瓷，有鹅颈瓶、折肩壶、细颈小口瓶、碗、盘、洗、盂、茶盘托、器盖等。这一新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找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遗址。

从 1987 年开始，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传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不见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的鉴定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

根据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说明，由于汝窑为宫中禁烧，产量有限，到南宋时就已难得。为了不断满足宋皇室的需求，继汝窑之后，又在北宋京都汴梁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然，大观、政和间在京都置窑烧造的官窑器，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技巧，所以北京故宫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洗与北宋官窑的冲耳足炉，两者釉色相似，风格类同。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迁至临安，仍在郊坛下设官窑烧造瓷器，史称"南宋官窑"。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发现龙窑两座以及作坊遗址和大量遗物。南宋官窑更直接受到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其中有部分来自北方的制瓷匠师。随着宋王朝南迁到达临安，制瓷匠师也将原有的汝瓷与北宋官窑的烧造技术带到了南方，加上当地制瓷原料和条件，使南宋官窑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其产品素面无纹，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开片为特征，有支烧和垫烧两类产品，后者具"紫口铁足"特征，胎薄釉厚，是南宋官窑产品的代

①赵青云等：《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钻探与发掘》，《文物》1989 年第 11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表作，曾为龙泉窑所仿效。

北宋汝窑、汴京官窑与南宋官窑，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各有千秋，并有发展与创新。由于汝窑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为其他窑所不及，受到北宋皇宫的偏爱与赞赏，因而汝瓷成为“名瓷之首，汝窑为魁”，得以流芳百世。

（三）磁州窑

磁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的民间瓷窑，主要烧造白地釉下黑（褐）花瓷器。窑址分布在河北邯郸市的观台镇、东艾口村和磁县冶子村一带的漳河两岸，以观台镇窑址为代表，故又称之为观台窑。始于北宋中期，元代以后衰落。故宫博物院曾先后两次调查过观台窑址，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过发掘。

1. 窑炉与窑具

在观台窑址中发现金元时期窑炉 2 座，一座是用耐火砖砌成的平面呈长方形的窑炉，另一座是比较简单的就地挖成的土窑，平面也呈长方形，后壁有 3 个烟囱。出土的窑具有匣钵、垫饼、陶拍和陶印模等。

2. 主要产品

观台窑烧制品种极为丰富，其中以白地釉下黑花、白地釉下酱花瓷器为其主要特征。装饰花纹的技法，既有刻花、划花，又有剔花、印花，还有精致的珍珠地划花和釉上加红、绿彩绘的多种装饰技法。北宋时期，烧制民间日常生活用的盘、碗、壶、瓶、罐、洗与盆等器物，花纹多用花卉、鸟兽、婴戏和民间传说故事等，细部刻划细腻逼真，富有乡土气息与生活情趣。瓷枕也是北宋时磁州窑的著名产品，枕面或画小儿垂钓，或画花鸟，或画老虎，或题诗句，着墨不多，却极传神。在东艾口村窑址中发现了专烧瓷枕的窑址，出土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在传世的磁州窑瓷枕中，还有“张家枕”、“刘家造”、“李家造”等戳记，而以“张家造”瓷枕数量最多。

观台金代遗址中出土器物仍以白釉黑花瓷器居多，胎质轻薄，白釉多泛青色，器形有碗、盘、盆、罐、碟、托盏、酒盅、枕等多种。还大量烧制黄、绿釉器皿，器形有方形双耳花瓶、兽面衔环圆花瓶、三足香炉等。

元代磁州窑主要产品仍以白地黑花与褐花瓷器为主，烧制的大罐较为精致，罐身绘龙凤纹饰，还大量烧制天蓝色釉的钧窑瓷器。

3. 磁州窑的影响

磁州窑的瓷器是当时最为畅销的民用瓷器，因而北方各地民间窑场多行仿制，形成了磁州窑系。它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为最多，如河南的鹤壁集窑址、修武的当阳峪窑址、禹县的扒村窑，河北邯郸的彭城镇窑，山西的介休窑等，都以烧造磁州窑式瓷器而著称。江西吉州窑也受磁州窑的影响而

烧制白地釉下黑花、白地釉下褐花瓷。

（四）耀州窑

耀州窑遗址分布于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上店村、立地坡、陈炉镇一带。唐宋时期窑址集中于黄堡镇附近。该镇当时属耀州同官县治，窑以地名，故名耀州窑。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民间青瓷窑址。始烧于唐而盛于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至明代衰落。黄堡镇窑址的范围长达 5 公里，1954 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5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黄堡镇、立地坡、上店村等地又进行了调查和发掘。耀州窑主要生产青釉刻花瓷器，以在器内外满布刻、印或划的花卉为其特征。耀州窑址的发掘，是中国对古瓷窑址首次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其成果对北方青瓷的断代有重要意义，也为在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发现的一批同类窑址提供了断代的依据，并使人们认识了独具风格的耀州窑系。耀州窑产品还影响及沿海地区，在广州西村、广西永福等地都发现了供外销的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址。

1. 窑炉结构

在窑址中发现 12 座窑炉，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拱形，俗称馒头窑，高一般为 3.36 米。除单座窑炉外，还有 2 或 3 座并列的，反映出个体经营的特点。宋代的窑炉皆残。保存较好的金元时期的窑炉，由火膛、窑门、窑室、烟囱四部分组成，皆以耐火砖砌筑，外抹厚 1 厘米的泥。火膛略低于窑室，呈长方形。其下有长方形炉灰坑，坑口用砖砌炉桥，以煤为燃料。火膛后为长方斜坡状窑室，前高后低，长 3.36、宽 2.16 米，底部有铺底匣钵。窑室后面为隔墙，下有 8 个长方形烟孔通向南北两个烟囱，中有烟道隔墙，墙上亦有小烟孔。据推算每窑可装 2590 个匣钵。这种窑炉结构能充分控制火焰，使氧化焰转还原焰，烧造出青绿光泽的瓷器。

2. 作坊遗迹

发现 4 间作坊及堆料场、晾坯场等遗迹。作坊皆位于窑炉火膛前，长方形，面积 30~80 余平方米不等，周围以废匣钵或砖砌筑墙基。在黄堡镇窑场的 1 座金代作坊遗址内，出有金“大安二年”（1210）款的青瓷片。作坊内有贮存瓷泥或釉料的大陶缸，粉碎瓷土用的石碓，包括石杵、石臼、石轴槽等物，还有砖砌的水沟。作坊周围有堆瓷土的料场。晾坯场的场地呈坡状，便于排泄雨水。这些说明，耀州窑的制瓷设备齐全，规模较大，分工精细，生产工序合理，生产工艺也较先进。

3. 产品与烧造工艺

耀州窑的产品主要是碗、盘、盒、罐、壶等生活用具，也生产玩具、文具。此外有生产瓷器的工具、窑具等。

唐代多黑釉、青釉、白釉瓷，以碗、盘最多，皆为敞口、平底，宽边圈足，挖

足较浅，用三角支垫叠烧。壶为短流、单把。胎釉皆较厚，胎外不施化妆土，釉不透明，只施于口及腹上部，纹饰少，仅在一种白釉粉盒盖上施黑色花卉纹。宋代主要产青釉瓷器，有少量酱、黑釉产品。器物种类多样，以喇叭口、深腹、圜底小圈足的碗最多。瓷器胎薄质坚，不吸水，色灰白，烧成温度达1300℃以上。胎釉间施化妆土，釉面匀净光滑，釉色淡雅，呈半透明状。采用匣钵内单件仰烧或二次烧成法，即先素烧，上釉后再装烧，成品率达70%。在发现的瓷器中，未见有烟熏、烧生、开裂、变形等情况，说明宋代耀州窑的烧制技术已相当进步。根据出土层位、器物形制及纹饰变化，并参照瓷器上的纪年铭，宋代耀州窑青瓷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宋初至真宗年间（960~1022），器物种类较少，胎厚釉粗，纹饰多刻划于器外壁，以简单的莲花瓣、牡丹为主。

中期为仁宗至神宗年间（1023~1085），器物种类大增，胎薄釉匀，釉面开裂者多，纹饰满布器内外，以范印为主，刻划较前精致。纹饰题材生动多样，植物类的有折枝、缠枝、交枝的牡丹，菊花，莲花等，动物类的有水波双鸭、鸳鸯戏莲、水波三鱼、龙、飞凤等，还有回纹和纸扇纹。

晚期为哲宗至北宋末年（1086~1127），器类同中期，多矮圈足小碗，胎较前薄，纹饰刻印更为纤细，构图繁缛，主要施于器物内底，出现连环状牡丹、竹叶、卷叶、凤凰戏牡丹、群蛾、群鹤博古、水波五鱼、莲花六鱼、双鹤等。在折枝牡丹花蕊中刻有“大观”、“政和”等纪年铭，此外还有体态生动的精美戏婴图，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在窑址附近发现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德应侯碑》，记载了耀州黄堡镇的烧瓷盛况及制瓷烧窑工艺过程。《宋史·地理志》陕西条中有“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贡瓷器”，说明宋代耀州窑不仅生产一般民用瓷器，还烧制供宫廷用的精致瓷器。

金元时期的主要产品为姜黄色青釉瓷，同时烧造黑釉、月白色青釉及白釉黑彩等瓷器。器形中以大件的碗、盘最多，碗为直壁深腹。器物内底皆有叠烧遗留的沙圈，挖足深，胎釉粗厚，不施化妆土，造型纹饰简单，图案形象刻板，以圆圈或六格式构成。纹饰题材新出现的有八卦、鹿鹅、吴牛喘月等。产品质量明显不如宋代。

4. 耀州耀系

耀州窑系是我国北方著名的青瓷窑系。主要窑口有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河南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特别是广东、广西许多窑场仿制的耀州窑青瓷，有许多作为外销瓷输往亚、非各国。

（五）钧窑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窑齐名。因所在地禹县古称“钧

州”而得名。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实地调查探明，禹县境内的八卦洞、钧台、神重镇等地分布着100余处窑址。烧瓷时间从唐至元，约有600年的历史。唐代窑址发现于小北峪，出土遗物有黑釉彩斑装饰的壶、罐、腰鼓等。1974~1975年，在八卦洞及钧台窑进行了局部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窑具及瓷器标本。器形有花盆、盆托、洗、炉、尊、钵等；釉色是以铜为着色剂的乳浊釉，通称钧釉，颜色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多种。盆、托、尊等宫廷用器的底部均刻一个十以内的汉字数目字，标明器物从大到小的型号。这批器物的另一个特点是釉面上的蚯蚓走泥纹，它是在施釉晾坯时干燥不当，因此釉层产生裂痕，烧制过程中融化的釉又使之弥合，从而形成弯曲的痕迹。从窑址调查与传世器物来看，钧窑影响了南北方一大批瓷窑，形成了钧窑系。地域包括河南禹县、临汝以及河南、山西的一些窑场。

钧窑系是指烧造钧窑风格瓷器的瓷窑体系。以河南禹县为中一心的宋代钧窑属北方青瓷体系，其含铜的蓝色乳浊釉被后代许多窑口仿烧，到金、元时期形成窑系。目前发现的宋、元仿钧瓷窑这要分布在河南、河北、浙江、广西、山西等地。河南的临汝、内乡、林县、浚县、淇县、鹤壁、新安、鲁山、安阳，河北的隆化、磁县，浙江的武义、鄞县、金华、宁波、东阳，广西的柳城、永福、兴安，山西的浑源等的均有发现。明、清时期仿钧窑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广东石湾。烧制器物多为花盆、洗、炉、钵等。

（六）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址位于江西景德镇，目前发现的早期窑址属五代时期，生产青瓷与白瓷，有杨梅亭、石虎湾、黄泥头窑。青瓷釉偏灰，白瓷白度已达70度，烧造方法采用支钉支烧，在碗里及足上留有一周长形支痕。器物以碗、盘为主。宋代窑址发现有湖田、湘湖、南市街与柳家湾等处，烧造青白釉瓷器。杨梅亭等3处五代窑宋代也改烧青白瓷。器形有盘、碗、瓶、壶、罐、盒、枕。装饰有刻、划、篦划、篦点、印花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定窑的覆烧法，产量大大提高，有“南定”之称。其中湖田窑制品质量较好，釉色纯正，纹饰精美。元代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开始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绘品种，并继续烧造青自瓷，有梅瓶、玉壶春瓶、罐、碗、盘、高足杯、鬲、炉等器形。明代青花瓷得到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制瓷技术又有提高，彩瓷品种更加丰富，五彩、粉彩、珐琅彩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仿宋代名窑瓷器，釉色极为接近，而且出现仿玉石、漆、铜釉色及仿干鲜果品的像生器，烧瓷技术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宋以后景德镇瓷器销往海外，制瓷技术也随贸易、文化交往传播国外，对亚非及欧洲瓷器的出现，起了关键性作用。

景德镇窑系，是指以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青白瓷的瓷窑体系。形成于宋代，主要窑口除景德镇窑之外，还有江西南丰白舍窑、吉安永和镇窑、安徽繁

昌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乡窑等。青白瓷釉色青中显白，白中泛青，又称“影青”，是由景德镇首创烧出的一种风格独特的瓷器。器形有盒、碗、盘、壶、炉、瓶、枕等。装饰以刻花、印花为主。纹饰题材有花卉、飞凤、水波纹等。

（七）龙泉窑

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而以龙泉县为中心。经过多年对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对窑床结构、作坊规模、烧制原料、燃料、水源、制作工艺等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均在龙窑附近的开阔平地上。龙泉窑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并成功地仿烧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产品。

已发现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大白岸、小白岸、道泰、山头窑、松溪、安福、安仁口、笔架山、碗圈山、马坳、大方、岭脚、围墙、大棋、下村、黄金坑、武溪等300余处窑址。其中大窑、金村两地窑址最多，瓷器质量最佳。从采集的标本与传世器物来看，龙泉窑烧瓷时间从宋至清，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北宋瓷器生产初具规模，产品主要为碗、盘、钵、盆、罐、瓶及执壶。元丰三年（1080）铭的莲瓣纹五管瓶和双耳盖瓶为这一时期有确切纪年的器物。这一时期产品胎为灰或浅灰色，圈足高而规整，釉层薄，有流釉及开片现象，釉色不够稳定，多青中带黄，说明对还原气氛还没有完全控制。常见纹饰有团花、菊花、莲瓣及缠枝牡丹。南宋为龙泉窑发展时期，产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器形丰富，有各式瓶、炉、碗、碟、盒、灯盏、渣斗、香熏、文具及塑像。装饰盛行单面刻划花，以刻花为主，常见纹饰有云纹、水波纹、蕉叶纹、凤纹、雁纹、鱼纹、莲花纹、叶纹等。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成功地烧制出粉青与梅子青釉器，达到青釉史上的高峰。在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黑、白两种胎。白胎占绝大多数，比黑胎厚，釉层也较厚，故装饰采用浮雕、贴花等；黑胎量小，胎薄在1毫米左右，釉面普遍开片，紫口铁足，是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的产品。两种胎的器物是在同一窑中烧造的。这一时期器物中有印“河滨遗范”、“金玉满堂”铭文的。“河滨遗范”铭文器物中有带“庚戌元美宅立”款的，应为南宋绍熙元年（1190）制品。

元代龙泉瓷业继续发展，此期大件器物比较多，器大而不变形，反映出烧制技术的纯熟。碗、盘、杯、盏、洗、瓶、炉又出现新样式，时代特征明显。如高足杯、双鱼洗、月梅纹碗、龟心荷叶碗、荷叶盖罐、双耳连座瓶等。纹饰有云龙、荔枝、牡丹、荷叶，有模印贴花、露胎装饰与褐斑装饰。大量印“福”、“禄”等吉语铭文、商标性质铭文及八思巴文。

明代早期龙泉窑产量仍很大，有相当一些器物，如大盘、盖罐等，造型、纹

饰与江西景德镇青花极为相似。菊瓣纹碗与历史故事图案印花碗较具特色。明晚期瓷业渐衰，青釉色泽灰暗，器底不施釉，足部处理粗糙。

龙泉窑产品不仅内销，自元代开始，还大量销往海外，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国都出土有龙泉窑瓷器。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一批瓷窑先后仿烧龙泉窑产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泰国、韩国、日本都曾仿烧龙泉窑产品。

龙泉窑系是指宋、元时期以龙泉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窑系。有众多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龙泉瓯江两岸，旁及邻近各县。南宋晚期至元代，范围扩大到江西、福建的许多窑场。

（八）建窑

建窑址分布在福建建阳，亦称“建阳窑”，以烧造黑瓷著称，产品以碗、盏为主。考古发掘表明，宋代建窑窑炉结构先进，有的龙窑长达百余米，为其他窑系所罕见。

窑址在建阳水吉、芦花坪、牛皮仑、南山、大路后门等10余处。经发掘得知，烧瓷时间上自晚唐、五代，下至宋、元，烧瓷品种有青釉、黑釉、青白釉等。宋代为其发展时期，以烧黑釉器最为著名。兔毫斑、鹧鸪斑、曜变等釉色的茶盏名品就出产在这里。在窑址还发现有刻“供御”、“进盏”字铭的碗，是北宋后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茶盏。建阳窑黑釉碗的特点是胎土富含铁质，呈黑紫色。碗盏造型多样，有大、小、敛口、敞口等不同形式。圈足小而浅。器物内外施釉，外壁釉至近足部，有明显垂流现象。

兔毫盏为建窑的名贵品种之一。兔毫斑是一种铁结晶在黑釉中形成的细条状斑纹，多数盏口为酱色。鹧鸪斑为此窑的又一名品，形象似鹧鸪鸟胸前羽毛的圆点斑纹，数量比兔毫少。曜变，是建窑中稀少而珍贵的品种，是指在黑釉里面浮现大小不同的结晶，结晶周围带有日晕状的光彩。传世品仅在日本收藏几件。经考古工作者多年查寻，在窑址中发现了酱色釉面上光彩变异，随光转动呈现金、深蓝、鲜红、洋红、海蓝、碧绿等色彩的标本。

建窑黑釉瓷器影响福建北部一大批瓷窑，附近几乎县县都烧黑釉瓷器。目前发现的黑瓷窑有南平、建瓯、松溪、浦城、崇安、光泽、邵武、宁德、闽清、闽侯、连江、福清、福州、泰宁、建安、罗源等。建阳窑出土的青釉标本以碗为主，其中有珠光青瓷碗，多在碗心一周刮釉作涩圈支烧。

（九）吉州窑

吉州窑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民间窑场，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安在隋、唐、宋均称吉州，故名。该窑的最大特点是多仿其他名窑，但又有创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又将民间剪纸的

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

已发现窑址 20 余处，创烧于唐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瓷器种类比较丰富，器物有罐、炉、盒、瓶、枕、盆等；釉色种类较多，既烧南方流行的青釉、黑釉、青白釉，又烧北方常见的酱釉、绿釉、白釉及白地褐花。借鉴北方定窑的覆烧法与印花装饰、磁州窑的白地褐花彩绘，胎釉及绘画风格则具有江西特点。江西地区宋墓中出土的莲花纹炉与奔鹿纹盖罐为吉州窑精品。韩国新安江沉船中打捞的卷枝纹地开光花卉长颈瓶亦为难得的佳作。吉州窑经常生产的低温绿釉器也是北方流行的品种之一，器形有碗、枕、盆等，釉色较浅，玻璃质感较强。最能代表吉州窑特色的品种是黑釉器，其上多伴有木叶纹、玳瑁斑、剪纸贴花、窑变花釉、黑釉彩绘及剔花装饰。木叶纹是把天然树叶直接烧在黑釉碗上，以黑釉衬托出黄色的叶子剪影。玳瑁釉是在黑、褐釉上饰以浅黄色斑点，色泽质感有如海洋动物玳瑁的甲壳，常装饰于碗、炉、瓶等器。剪纸贴花主要饰于碗内，装饰效果极似民间的剪纸，题材有飞凤、折枝梅花、散点式梅花、鹿纹、凤梅纹、鸳鸯、蝴蝶、竹、兰以及菱形边框内有“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四字吉语图案。黑釉彩绘有月梅、月竹、凤蝶纹，是在铁质釉上用草木灰釉绘画纹饰，烧成后形成黑地白色花纹。剔花装饰见于瓶、罐、碗等器物上，梅花纹最常见。此外，白釉、青白釉亦有剔梅花纹的。黑釉器除上述装饰，还烧制大量光素碗、盘、瓶、罐等。青白釉有碗、高足碗、罐、洗、盒、枕、罐、灯、壶、三联盒、褐彩骑狗俑，有的以褐彩书“吉”、“记”字样。其中有印花、划花装饰，图案有凤纹、花卉纹、柳斗纹、菊瓣纹等。

（十）德化窑

广东广州、福建德化及晋江、厦门等地，在宋代兴起了大批窑群，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德化窑是其中的重要产地之一。

德化窑遗址位于福建省中部德化，已发现窑址 180 余处，是目前该省发现古窑址最多的一个县。重点发掘了碗坪仑窑与屈斗宫窑。窑炉采用分室龙窑，更易控制窑内温度和气氛，烧制的产品质量更高。

碗坪仑宋代烧青釉、青白釉及近似白釉的器物，黑釉亦有少量发现。青釉器有瓶、壶、碗等。青白釉器有瓶、壶、罐、缸、盘、碗、军持、盒子等。德化窑还有专门制作盒子的作坊。盒子遗物丰富。盒盖上阳纹印花装饰题材丰富，近百种，有动物、花卉，如鱼、鸟、荷花、芦苇、葵花、宝相花、团花、叶纹等，每种构图又有多样变化，辅以卷云、联珠与连弧纹。其次，划花间篦划纹亦较多，饰于碗、盘、瓶等器物上。屈斗宫宋、元时期以烧造青白瓷为主，器物有碗、高足碗、盘、折腰盘、瓶、罐、壶、盒、军持。装饰有印花与划花。印花在盘、盒、军持上比较多见，划花常在瓶、碗等器物上见到。

明、清时期在元代白瓷的基础上，进一步烧制出质地坚硬、釉呈牙白色的器

物。产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雕塑品，有如来、达摩、弥陀、观音等塑像；一类为日常用品，有白釉瓶、炉、贴花杯、碗、盘，青花盘、碗、杯、炉，彩绘碗、盘等器物。

自元代起，德化窑器销往海外，菲律宾曾出土元代德化窑青白瓷，东非坦桑尼亚等国也出土过清代德化窑青花瓷器。

（十一）西村窑

西村窑是北宋时期广州规模较大的民间瓷窑。以烧外销的青白瓷为主，产品输往南亚各地。遗址分布于广州市西村增涉河东岸岗地上，南北长1公里多，残存的3处堆积以“皇帝岗”的规模最大，是西村窑的主要遗存。1956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发掘。

皇帝岗窑址堆积高约7米，略近圆形，在堆积的东南角发现一座龙窑残址，残长36.8米，拱形窑顶已塌，窑身中宽4米，首尾稍收窄，窑床铺细砂，坡斜13度。窑前有圆形坎穴，窑首火门、炉膛都伸入地表之下。

窑具有大量垫饼、垫环及泥团，匣钵有漏斗形和平底直筒形两种，前者用于装烧碗、盆、碟、盏等食具，后者用于执壶、罐等高身的器物。

西村窑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而以前者为主，后者属青白瓷。其中以青釉最多，黑酱釉次之，还有少量低温绿釉器。器类有碗、盏、碟、盆、执壶、凤头壶、军持、罐、盒、唾壶、注子、灯、炉、烛台、枕等日常生活用器29种，还有雀食盅、碾轮、漏斗、埙、狗、马等杂器玩具。一个窑场生产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的型款与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装饰手法有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孔等。有一类橄榄青釉印团菊或缠枝菊纹的碗、盏、碟、盒，是耀州窑产品的仿制品；刻划花青白釉精瓷碟、碗、盏，明显是受景德镇窑影响；还有一类青白釉大盆，盆心绘酱褐色釉的菊纹或牡丹，有的周边再刻花，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

西村窑的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近年来在中国的西沙群岛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出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还有不少西村窑的传世品。

（十二）辽代官窑

辽代官府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目前发现的窑址有内蒙古的缸瓦窑、林东窑，以及北京的龙泉务窑。

缸瓦窑窑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以西60公里的缸瓦窑村附近。1964年内蒙古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进行调查，1975~1979年辽宁省博物馆再次调查。窑址范围东西长约1、南北宽约0.5公里，堆积层厚2~3米。以粗白瓷为主，细质白瓷不多，缸胎粗瓷不少，还有辽官窑白瓷鸡冠壶黄绿色低温铅釉陶等。器物多属盘、碗、杯、碟等生活用品，也有盂、盒、壶及牛、马、羊、骑兽人俑。器物装饰有

刻花、划花、印花、剔花 4 种，以印花为主，也有剔刻加填彩的。窑具有匣钵、支柱及垫饼，“官”字铭文匣钵为平底直筒形，外径 0.12 米，只能烧小件瓷器。缸瓦窑产品的装饰以及划刻“官”、“新官”字铭的做法，是受北宋北方瓷窑的影响。如白瓷印花装饰明显受河北曲阳定窑的影响；剔刻花纹受河南、河北磁州窑系同类装饰的影响；刻划“官”、“新官”铭文是仿定窑的做法。其产品在辽中京遗址中出土很多。

林东窑窑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街之南辽上京临潢府城遗址的皇城内西侧。遗址规模较小，东西长约 80、南北宽约 50 米。产品以白瓷数量较多，胎釉及制作也较精致。器物有杯、碗、盘、碟、盂、盒、瓶、壶、坛和罐。黑釉有瓶、罐、盂及瓦。绿釉仅有瓶、罐两种。白瓷、黑瓷的底部刻有 8 种特殊符号，是该窑的特点。窑具有匣钵、支具和垫环。匣钵有平底直筒形的，供叠烧碗使用；有常见的仰烧式钵，视碗的高度，可放 1~3 件。支具有圆形、三角形和叉形 3 种，每种均有 3 个支钉。垫环创始于曲阳定窑，是覆烧工艺的主要窑具，也为林东窑所吸收。

龙泉务窑址位于北京房山区，1991~1994 年进行发掘，揭露作坊 2 处、窑炉 13 座。窑炉为马蹄形倒焰窑，以匣钵叠烧方式装烧。产品主要是白瓷碗碟类，三彩器有佛像、瓦当、鸱吻等，釉色以白釉为主，酱釉、黑釉、三彩次之。龙泉务窑瓷器质地细腻，釉色光亮，制作精良，应为辽代官窑，出土的“寿昌五年”（1099）款识的黄琉璃釉瓷片为窑址烧造年代提供了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琉璃样品经化验，含氧化硼 10%~12%、氧化铅 0.4%~1%，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我国陶瓷工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据证实，比国外类似釉质的出现早 500 多年①。

（十三）西夏瓷窑

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据考古调查，西夏瓷窑遗址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发掘的主要窑址有宁夏银川缸瓷井窑、灵武瓷窑堡窑和回民巷窑②。在甘肃省武威塔尔湾也发现 1 处③，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的有些工艺和釉色，与磁州窑和耀州窑有密切关系，反映了中原地区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瓷窑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火膛、窑室和烟囱组成。使用的窑具有匣钵、垫圈等。敞口器物一般采用叠烧法，小口类器物一般采用垫烧法。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的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

①黄秀纯等：《略论龙泉务窑址归属问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 4 辑，1994 年。

②宁夏博物馆：《银川市缸瓷西夏窑址》，《文物》1978 年第 9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物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回民巷窑址调查》，《考古》1991 年第 3 期。

③王辉：《武威塔尔湾西夏至元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5 年。

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他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

瓷器种类丰富，有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者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此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已能翻模成批生产。西夏瓷窑还存在地域上的差异，如灵武窑产品中的经瓶、棱足钵不见于武威塔尔湾窑，而塔尔湾窑常见的瓮、大型罐、四系高领壶、大碗等不见或少见于灵武窑。

西夏瓷器的造型、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

1. 造型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牛头埙等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

扁壶延续时间长，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是西夏瓷器中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下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多用于盛液体。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西夏境内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不仅解决了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也开创了瓷业的新思路。

牛头埙以形似牛首而得名。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分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是白釉板瓦，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大量瓷质建筑用材的出土，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 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

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所以使用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灵武窑在承袭了磁州窑的这一工艺，主要用于壶、瓶、罐、钵，而且在表现手法上表现出三个特点：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并露胎；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地露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壶、瓶、罐、碗、盆、钵等均开光，有菱花形、连弧形等，所占比例较大。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3. 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有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表达了人们的祈求吉祥富贵的美好愿望。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题材虽然发现不多，但颇具民族韵味。如灵武窑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马驮一朵盛开的莲花，其上立幡旗，马前有一奔跑的猎犬，犬前有一只挣扎的肥鹅，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鹰，鹰前方有一只逃命的野兔。马后方似刻划一只靴子和靴垫，靴子和靴垫反映人死后要走向祖灵的思想。整幅画面纯真稚拙，真实地反映了党项人出游狩猎场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与欢乐，同时也有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王家广：《耀州瓷、窑分析研究》，《考古》1962年第6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年。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文物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5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八节 重要遗物

宋元明时期，除过瓷器以外，还有一些重要遗物，如铜镜、金银器、货币、漆器以及纺织品、釉陶器，其中的釉陶器以宋三彩和辽三彩最具有代表性。

一、铜镜

1. 宋代铜镜

宋代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称铜镜为“铜鉴”或“照子”。北宋的铜镜，工艺不如唐代，但在形制和纹饰方面仍有唐镜遗风。宋代铜镜在各类遗址、墓葬中多有发现，同时还包括大量的传世品。与汉唐时期相比较，铜镜纹饰简单，处于古代铜镜铸造的衰落期。

宋代铜镜的形制主要有方形、圆形、长方形、葵花形、菱花形、钟形、鼎形等。装饰纹样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缠枝花草文纹；一类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仙故事；一类则铸造各类铭文，包括诗句、吉祥用语、官私作坊名称等。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宋代出现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铸镜中心，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浙江地区有湖州、临安；江西有饶州、吉州、抚州；江苏有建康；福建的建州；湖南的潭州；四川的成都等地。在诸多的铸镜地区中，以湖州、饶州最为著名。

南宋铜镜主要为湖州和饶州的“铸鉴局”所造，可称“湖州镜”和“饶州镜”。在形制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有柄镜大增，镜上没有花纹，只是铸出长方形的印章，标明铸镜者的名号，如“湖州石家二叔”、“饶州许家”等。

2. 辽代铜镜

辽代境内发现的铜镜主要以唐代铜镜或具有唐代风格的铜镜为主，如折枝花镜等。也有一些宋镜或宋代风格的铜镜，如连钱锦文铜镜、蝴蝶纹铜镜等。辽代本土境内铸造的铜镜数量不多，曾经出土过一些契丹文铜镜，它们是比较明确的辽代铸造的铜镜。

辽代铜镜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为八棱形，一为圆形，而以圆形较为常见。有些铜镜之上刻有铭文。纹饰主要有契丹文、牡丹鸾鸟、飞鸟葡萄、连钱锦文等。也有一些素面铜镜。

3. 金代铜镜

金代由于战争频仍，金属缺乏，铜禁极其严格，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规定，凡铜镜、铜钱等一律官铸，不得私营，而且铜镜

上必须加刻官府验记，方可出售，违者处以徒刑。从发现的铜镜上的刻铭来看，证明文献记载的确实。

金代铜镜发现的数量较多，形制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有柄型等，其中以圆形为主。除过一些铜镜为素面之外，有装饰的铜镜，纹饰内容较为丰富，有神仙人物故事，内容有许由巢父、柳毅传书、达摩渡海、仙鹤人物、神人龟鹤、吴牛喘月、煌丕昌天海舶、童子采莲、童子攀花等；动物纹有龙纹（有单龙和双龙之分）、双鱼纹、摩竭纹、凤凰等；钱文主要有大定通宝钱文；花卉类主要有“卐”字海菊、海浪海菊、菊花等。

4. 元明铜镜

元代和明代的铜镜，铸造都较粗糙。形状多为圆形，花纹少见，主要是一些云龙纹、双龙纹和双鱼纹等。许多铜镜铸出纪年铭文、吉祥用语。纪年铭文如“至正四年”、“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日造”、“万历己丑年任小轩铸造”、“曾氏天启六年”、“大明隆庆庚午端阳益藩世孙潢南雅制”等；吉祥用语有“五子登科”、“长命富贵”、“状元及第”、“厚德荣贵”、“鸾凤呈祥”、“为善最乐”、“彦和”、“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唐宋以后，特别是明代，制造仿古镜的风气很盛，主要是仿造各种汉式、唐式镜。如江西南城县明代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一面仿汉连弧纹镜、一面仿唐鸾凤花蝶纹镜。明代还多用汉镜实物翻模复制。

二、金银器

1. 宋代金银器

宋代金银器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作坊大发展，更多的出现了日常生活用品。器物制作一方面更加华丽、精细，另一方面则趋于素朴、简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北宋以后，出现了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产品，有些器物的产地和店铺不同，但形制、纹样等却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如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心形银饰、银丝盒等十分相像。不少器物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小巧玲珑，是当时社会商品生产发达的必然结果。器形和纹样多为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民间格调浓厚，还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地宫中，特别是窖藏中常有大批发现，多是遇战乱时埋藏起来的。已发现的地点多在南方地区，除江苏等传统的金银器生产地区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银器出土的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主要地点有：江西的遂川、彭泽、波阳、乐安，江苏的南京、江浦、吴县、溧阳、镇江，四川的德阳、崇庆、彭州，福建的邵武故县，湖北的黄石、蕲春，浙江的宁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县，安徽的无为、六安等。其中，福建邵武故

县窖藏出土140余件①、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35件②、浙江永嘉窖藏出土50余件、江西乐安窖藏出土100件③、四川彭州窖藏出土350件④等。有学者对宋代金银器的特征进行了总结⑤，其特点如下：

（1）造型精巧别致，花式多样。与唐代金银器相比较，宋代器皿胎体轻薄，流行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八角碟等；溧阳平桥窖藏中的银盏就有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及蟠桃形等。唐代的银盘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规则形，但宋代出现并流行多角形制，主要有六角形和八角形盘。

（2）构图别致、题材广泛。以寓意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纹样最为盛行，如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纹样不再是图案化的装饰，更具写实性，包括飞鸟、菊花、缠枝牡丹、荷莲、团花等等，有的装饰花纹生活情趣浓厚。当时流行的鱼藻图，主要饰于盆、盘上，因多采用浮雕、高浮雕的做法，器物盛水后，水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双狮跳跃戏球图案等也与唐代同类题材有较大的区别。有的还带有具体的内容，有特定的故事情节。

（3）器类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多成套用具，而且同类器物大量重复。乐安南宋窖藏100多件银器中，有双鱼盘38件、匙22件、箸23双、杯20件。这些发现，反映出当时金银器已批量生产，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妇女的梳妆用具、首饰类出土很多。如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银钗28件、鎏金银簪16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花形鎏金银饰1件、银钗8件。其形制和装饰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情趣和社会风俗。

（4）工艺制作有新成就。器物采用双层（即带夹层）、重瓣、高浮雕等新工艺。器皿做成双层是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工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溧阳平桥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等，都是夹层器物。重瓣的做法别具一格，溧阳窖藏中的各种银盏，整体如花形，盏心有一层或多层花瓣。高浮雕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溧阳窖藏中的瑞果图鎏金银盘、狮子戏球图鎏金银盘和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盘都是这种高浮雕装饰技法的代表作。镂空技术更加精致，并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永嘉发现的叶形龙纹银簪，在镂空的缠枝细花上压印一条高凸的蛟龙，龙的颈、腹、尾部又分别錾刻一朵菊花，边缘线刻细珠纹，精美绝伦。

①王振庸、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②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

③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

④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⑤肖梦龙：《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文物》1986年第5期；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

（5）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的器物增多，这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 1 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与青铜器纹样类似。乐安窖藏银器中的乳钉纹凸花杯，外观具有青铜礼器的浑厚凝重感，是当时社会上下崇古仿古风习的反映。

（6）佛教用品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门寺塔地宫中土有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金银器，但纯属寺院用具的不多。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棺银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如宁波南宋天封塔基地宫中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①]，是非常罕见的佛教用品。

（7）流行文字刻铭。宋代金银器上流行文字刻铭，纪年款识很少，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增多，与宋代铜镜上的铭文有相似之处，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有的银锭上刻铸有解银者的官职姓名、银锭重量和铸银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记银锭来源和用途的。有的银锭上的“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则带有宣传产品的意味。此外，还有精心刻出的文学作品，邵武故县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银碗，内底刻《踏莎行》词一首，10 行共 61 字，外壁饰人物、建筑和卷草等，融词、书、画为一体，极富观赏性。乐安窖藏中的两块银牌，分别刻有当时名作《黄州竹楼记》和《醉翁亭记》，非常罕见。

2. 辽代金银器

目前发现的辽代金银器数量不少，出土金银器的遗迹主要为墓葬和塔基地宫，也有一部分出土于窖藏。器形主要有杯、盘、碗、碟等，还有一些宗教用器，主要为盛舍利的容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辽代特有的器物，如金银冠饰、银面具、银丝网络、金银靴、带具等，这些与契丹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密切相关。有人对辽代金银器进行过综合研究，总结了辽代金银器的发展规律：早期自耶律阿保机至辽景宗（907~982）中期自辽圣宗至辽兴宗（983~1054），晚期自辽道宗至天祚帝（1005~1125）[②]。

早期器物有五曲葵口碗、盘、盒、匜、折肩罐、把杯、壶、盏托、渣斗等，在造型和纹饰上表现出较强的唐代金银器的风格，以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为代表，如带把八棱杯、菱花形银盒、委角方形银盒、金花银渣斗、五瓣花形金杯等，器物装饰采用唐代金银器中流行的鱼子纹地，多用鸿雁、狮子等纹饰。

中期器物在早期的基础上，器物种类更加丰富，新出现了各类葬具如金银冠饰、银面具、银丝网络、金银靴、带具等，这些都是带有契丹民族色彩的器物。同时，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与佛教舍利瘗埋有关的器物占了大宗。器物特征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唐文化因素，同时开始融合宋代器物的风格。

---

①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②朱天舒：《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98 年。

晚期器物发现者较少，各类与饮食相关的器物锐减，种类主要为碗、盘、杯等，契丹民族色彩的葬具仅限于面具、网络。进一步融合宋代金银器风格。有些金银器的造型风格与宋代相差无几，如八棱银执壶、莲花瓣形银碗。

除上述特征之外，辽代金银器还包含有突厥、中亚等地区的文化因素。

三、货币

1. 铜币

宋统一后，随经济的日益繁荣，货币需求量也不断增长。神宗时每年铸钱达500多万贯，创历代铸钱的最高纪录。南宋铸钱也很多，因而两宋铜钱传世者甚多。宋钱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年号钱极多，从太宗铸淳化元宝之后，各帝几乎每改元一次便要铸造有新年号的钱币，对元、明铸钱有很大影响；二是铸大小不同的钱。小钱为小平钱，与开元钱相当。较大者为折二、折三，即合小平钱2枚或3枚，还有折五或当十者；三是钱文书体的多样化，从篆到隶、楷、行、草，崇宁、大观钱上的瘦金体，就出自徽宗手笔。铸造货币和书法艺术相结合，也是宋代文明发达的例证之一。

辽金受宋代币制影响，也铸造年号钱。辽代铸有统和元宝、重熙通宝等十多种钱，但数量较少。金代仅铸正隆通宝、大定通宝等几种，但铸造量较大。西夏钱币深受北宋影响，流行年号钱，质地分为铜钱和铁钱两种，钱文分西夏文和汉文，西夏文称为宝钱，汉文称为通宝、重宝、元宝。在宁夏发现的西夏文钱币有“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福圣宝钱”等。汉文钱币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汉文钱币多为楷书，字体端庄，轮廓规整，铸造精良。其中的汉文钱币“乾祐元宝”还采用行书、楷书对钱，汉文“光定元宝”还采用篆、楷书对钱，这也应当是受北宋钱币影响的结果。

元代纸币较多，故铸钱较少，民间多用旧钱交易。传世元带铜钱有至大通宝、至正通宝等。纸钞有“中统元宝钞”“至元通行宝钞”等，面值有“贰拾文”、“伍拾文”、“壹佰文”、“叁佰文”、“伍佰文”等，背面都有文字印记。明代通行铜钱和纸币。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所以，每更换一次皇帝就新铸一次货币。明朱元璋洪武时铸洪武通宝，明成祖时期铸造过永乐通宝。明和元一样发行纸币，故明中期铸钱甚少。从嘉靖、万历到天启、崇祯，铸钱数量较以前增多。

中国历史上除各王朝外，有些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政权，以及古代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或地方政权，也发行过铜钱。如元末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张士诚的天佑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朱元璋的“大中通宝”、陈友谅的“大义通宝”等。明末李自成的永昌通宝、张献忠的大顺通宝，后两种钱铸造较多，传世品中常见。用少数民族文字发行的钱币，除西夏有西夏文钱外，元

有八思巴蒙文钱。

2. 铜币铸造工艺

从先秦到清，铜钱制作基本为手工铸造。从先秦到隋唐，采用范铸法。在春秋末和战国时，范为陶质、石质或铜质，战国时又用铜质范母来复制铸范，以提高制作效率。西汉从昭、宣到王莽时，用陶范母代替铜范母。王莽时多用叠铸法，将若干片陶范叠在一起，只须灌铜一次便可铸出上百枚铜钱。从唐代开始，渐用翻砂法以取代过去的范铸法。其做法是以木为框，框中放沙土；用木或陶等物刻成的母钱在沙土上扣出型范即可灌铜铸钱。宋、元、明都用此法，故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是母钱而不是钱范。河南渑池、广西梧州都曾经发现过宋代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坩埚和废钱。

现根据文献记载或对实物化验结果得知，从先秦到唐、宋币材为铅锡青铜，铅含量为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左右。明代则开始掺入锌而成为黄铜。

3. 纸币

中国使用纸币始于北宋。当时因铜钱携带不便而实行信用券制度，初行于商人之间，后为官府所采用，称为交子或钱引。南宋时称为关子或会子，发行量较北宋为多，金效法宋而发行钞币，1154 年曾发行贞元交钞，嗣后又出贞祐宝券、兴定宝泉等。近年在陕西、山西相继发现贞祐宝券的铜版。元代继金而发行钞币，并禁民间用铜钱交易。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造中统宝钞，面额分成10 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宝钞，面额分为11 等。元代初行钞法时，以银为本，钞价较稳定，元末滥发钞币，钞币几乎等于废纸。近几十年来，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江苏曾发现有元的中统钞、至元钞。另外，在河北、广东还发现了印刷至元钞的铜版。明代也用纸币，明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也有大小不同的面额。明代钞币仅此一种，约流通百年之久，以后为铜钱所替代，明钞实物有传世品。

4. 其他钱币

除铜币外，中国古代还流行过铁钱、铅钱、金银、金银钱等，南北朝以后且有外国钱。除实用的钱币外，还有专供随葬之用的冥钱和为辟邪及祈求吉祥而作的压胜钱。

中国铸造铁钱约始于西汉，汉墓中曾发现铁半两钱。此后铁钱不断出现，王莽时有铁制的大布黄千，东汉晚期有的墓中还曾出土过铁五铢。南朝萧梁曾大量使用铁钱。五代十国时南方各地用铁钱尤为普遍。如闽王审知铸铁质开元通宝，楚马殷铸铁天策府宝、乾封泉宝。到两宋时期，使用铁钱则成为一种制度。北宋时铜铁钱并行，而规定四川专用铁钱，陕西、晋南一带铜铁兼用。南宋时铁钱铸造量超过北宋。

1980年，在新疆阿图什东南10公里的牙尔干地区发现一袋喀喇汗王朝[①]时期（即汉文文献记载的黑汗朝）的铜钱，总重138公斤，约17000余枚[②]。钱圆形无孔，用打压法制造。据初步研究，钱文绝大部分是古代科斐体阿拉伯文，只在1枚钱币上发现回鹘文。这批钱币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穆罕默德阿斯兰汗所造，约占总数的90%以上；第二类在钱文中有“真主的崇拜者和依托者纳斯尔之子”的字样；第三类钱文中有“桃花石可汗”的字样。喀喇汗朝钱币在中亚地区曾多次发现，而在我国新疆境内这样集中的大量发现是第一次，在钱文中有“苏来曼卡德尔·桃花石可汗”属于首见。

四、漆器

1. 宋代漆器

宋代的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漆器制造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制作地点、工匠姓氏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主要由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宋代漆器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但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宋代漆器中有许多纹饰精美，这不但改正了过去的认识，还可以看到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漆器的工艺主要有戗金剔犀工艺，它是雕漆工艺的一个分支，一般用两种或数种色漆，逐层相间，积累至所需要的厚度，然后用刀剔刻出云纹、香草、回文等回转流动的图案，再加以打磨，使刀口圆润隐顿，不露刻痕，于是在刻口断面处呈现厚薄相间、富有规律的色层，取得比纯色雕漆更富于变化的装饰艺术效果[③]。

宋代的漆器在江苏、浙江、湖北、福建等地的墓葬多有发现，而且许多漆器上都带有铭记，标明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1976年和1978年，在无锡武进村前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素面黑漆奁、戗金细钩人物花卉奁、戗金朱漆长方盒、戗金细钩填漆斑纹地长方盒、填漆斑纹长方盒，以及剔犀牛镜盒、粉盒、唾盂等[④]。其中的戗金细钩人物花卉奁，朱漆，为十二莲瓣式，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戗金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

①喀喇汗王朝，由西迁到伊犁河中下游七河地区的回鹘人与当地游牧民族葛逻禄等部落建立（约9世纪中叶或以后～1212）。其最初的领地仅在七河地区，后向东扩展占据伊犁河谷，向南发展领有费尔干纳河喀什噶尔。喀喇汗王朝的王室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王室的头衔中往往带有“桃花石汗”的称号。“桃花石”一直到13世纪，在西域一带是用于称呼“汉人”或“中国人”的专有名词，“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另有一些首领则以“东方和中国王”自称。（马大正等：《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陈增弼，大同市博物馆、张利华：《介绍大同金代剔奁兼谈宋金剔犀工艺》，《文物》1985年第12期。

④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第3期。

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为研究宋代温州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铭文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丁酉温州五马钟念二郎上牢”、“庚申丁字桥巷解七叔上牢”。温州漆器是当时享有盛誉的商品。戗金工艺“以针刻为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2）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发现了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122.6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纻胎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狮子、宝相花、供养人则用稠漆堆塑而成[①]。（3）淮安北宋杨氏墓群发现的75件漆器[②]，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即上得牢固之意）”、“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4）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③]。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5）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④]。（6）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10余件[⑤]，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也是温州产品。（7）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19件[⑥]，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部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这批遗物上的干支纪年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8）福州南宋端平二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⑦]，非常珍贵。

2. 元代漆器

元代漆器品种甚繁，最重要的是螺钿、戗金和雕漆中的剔红和剔犀。尤其是薄螺钿，过去一般认为明代才有，1970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中发现的广寒宫图黑漆盘残片[⑧]，证明元代薄螺钿的技法已相当成熟。元代有名工匠彭君宝、陶宗仪著《辍耕录》，对戗金的做法有详细记载，唯传世实物多流往日本。在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腴圆润的花纹。大貌

①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

②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③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北郊宋墓》，《考古》1982年第4期。

④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8期。

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⑦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以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出土的雕漆山水人物圆盒为代表，木胎，盒面雕陶渊明东篱采药图，雕漆呈红色[①]。

3. 明代漆器

明清漆器分为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等。一色漆器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一层透明漆。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代表。填漆是用填陷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的名称，指用彩色花纹装饰漆面，花纹之上还加戗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明清的螺钿器厚、薄并存，薄螺钿至17世纪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了金、银片。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逐层刷不同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继承元代肥腴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渐疏，至嘉靖时磨工少而有棱角，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是在胎骨上用两三种色彩有规律地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装饰大而平的漆面，常见的实物有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戗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戗金的标准实例。百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玳瑁、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高起的花纹图案，明代开始流行，清初达到高峰[②]。

五、纺织品

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则南移江、浙一带。宋代纺织品的发现主要有：福建福州黄升墓出土纺织品和衣物480件[③]、福州北郊茶园村南宋墓出土400余件纺织品[④]、江苏金坛周瑀墓出土衣物50余件[⑤]、江苏武进宋墓出土衣物残片[⑥]、湖南衡阳宋墓[⑦]和宁夏西夏陵区108

---

①上海博物馆、沈令听、许勇翔：《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

②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④王振镛等：《五十年来福建省文物考古的主要收获》，《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⑤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衡阳何家皂北宋墓》，《文物》1984年的12期。

⑥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第3期。

⑦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

号墓出土的丝麻织品①、浙江兰溪墓出土的棉毯②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丝织衣裙③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这些发现，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1. 丝麻织品

衡阳县北宋墓出土的丝麻织物，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 200 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菊花、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

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纺织品数量众多，有长袍短衣 64 件，裤 23 件，裙子 20 件，鞋 6 双，袜 16 双，被衾 5 条等，还有大量丝织衣物，另有成幅织物 134 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 7 个品种，以罗居多，近 200 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 110.4 厘米，幅宽 56 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 6 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福州北郊茶园村南宋墓出土的纺织品有罗、绢、纱、绸、花绫等品种，装饰技法有绣、提花、印花和贴金银箔等，图案装饰有牡丹、缠枝花、菊花、团花等。织物种类主要有各式衣裤、裙及鞋帽等。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如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丝织品，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 6 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德安南宋周氏墓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

西陵陵区 108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代表了西夏的纺织工艺和内地的交流状况，品种有罗、绫、锦，其中的异向绫和茂花闪色锦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2. 印染品

宋代的印染品，已出现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工艺。黄

①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 108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 年第 8 期。

②浙江省博物馆、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 年第 6 期。

③杨明、周旸、周迪人：《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纺织品残片种类与工艺》，《南方文物》1998 年第 4 期。

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子戏绣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等四种工艺。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两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两者则是在镂空花版上涂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3. 棉织品

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 2.51、宽 1.15 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六、玻璃器

1. 宋代玻璃器

宋代玻璃器不论在数量还是种类上均较以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

发现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出土宋代玻璃器的塔基地宫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37 件，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玻璃碗、葫芦瓶、四联瓶、细颈瓶等 34 件[①]。其中净众院出土的全为国产的高铅玻璃，而静志寺出土的一部分属于伊斯兰钠钙玻璃[②]；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塔基地宫出土北宋葫芦瓶 3 件[③]；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葫芦瓶 3 件[④]；浙江宁波

①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第 8 期。

②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③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海青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 年第 7 期。

④秦明智、刘得桢：《灵台舍利石棺》，《文物》1983 年第 2 期。

南宋天封塔基地宫出土瓶 2 件[①]；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瓶 2 件[②]；河南邓州福胜寺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瓶、葫芦瓶 4 件[③]；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瓶等 50 余件等[④]。

经部分测试，中国自产的玻璃为高铅玻璃。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其中的葫芦瓶，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类，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的 50 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标本的测试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瓶的个体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主要出土于塔基地宫之中。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充分利用了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

2. 元明时期的玻璃作坊遗址

在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

山东淄博市的博山是我国古代玻璃生产中心之一。1982 年，在博山区大街北头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⑤]。遗址内玻璃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在 403 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大炉 1 座，小炉 21 座。大炉炉底呈方形，用以熔化矿石，生产玻璃料条；小炉炉底呈凸字形和亚腰葫芦形，用以生产玻璃制品。遗址中出土大量玻璃炉工具、玻璃原料、玻璃料、丝头和玻璃制品等。这是一处工匠集中，有较细分工，主要生产珠、簪、环饰等产品的大型手工工场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发

①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②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塔基地宫出土》，《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③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福圣寺塔地宫》，《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④无戈：《密县北宋塔基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0 期。

⑤淄博市博物馆：《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考古》1985 年第 6 期。

现的元明时期的玻璃作坊遗址。

七、三彩器

1. 宋三彩

所谓宋三彩主要指宋、金时期生产的低温釉陶，即把与南宋并存的金代生产的三彩器也划入宋三彩的范畴。宋三彩可以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四川、陕西南部和湖北等宋墓中，以各类三彩俑为主，可以看作是唐墓随葬三彩俑类的孑遗。北方地区的三彩主要发现于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宋金墓葬、瓷窑和塔基地宫中，以枕、炉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少量的建筑模型、建筑构件和小型工艺品。

宋三彩以瓶、枕、灯、炉为主，盘、碟、罐类器物较少。其中枕类数量和数量最多，也最能代表宋三彩的艺术成就。从枕面形制上可以划分为长方形、三角形、八角形、元宝形、扇面形、如意形、荷叶形、椭圆形等。其中的人物造型枕往往是一幼童或成年人屈腿静卧，在身体上支起枕面，构思巧妙，富有生活气息。宋三彩的釉色以绿、黄、褐三色为主，白色较少，色彩较为暗淡，呈现出一种凝重深沉、淡静素雅的艺术风格。装饰技法以划花见长，刻划严谨，施釉工整，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常见花卉、人物、动物和铭文等图案。

2. 辽三彩

辽三彩即辽代生产的低温釉陶器，在辽代陶瓷中与白瓷平分秋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辽三彩不仅有黄、绿、白三色釉，其绿、黄单彩器也很有特色。在烧造工艺上，辽三彩受到了唐三彩的直接影响，也是制坯后先入窑素烧，再施彩釉二次烧成。釉陶器的生产，既有专门烧制釉陶的窑场，也有陶瓷窑场中专门烧制釉陶的窑炉。辽代烧制釉陶器的窑场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缸瓦窑、林东南山窑、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和北京龙泉务窑[①]等。其中位于辽上京临潢府城遗址西南1公里的林东南山窑，就是一处专门烧制辽三彩的窑场。这里生产的三彩和单色白釉、黄釉器，胎质较细，均作淡红色。胎体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再施黄、绿、白三色或单色釉，色调不甚鲜艳，且易脱落。而低温白釉器，釉色乳白而不润则，有的在白釉或黄釉器上加施绿彩，达到非常美观的装饰效果。北京龙泉务窑址出土的三彩菩萨、三彩佛像等，胎质坚硬细致，釉色光润，制作规整，是典型的辽代三彩制品。

与唐三彩相比较，辽三彩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辽三彩多为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器，尽管在辽代贵族墓葬中无一例外地随葬釉陶器，但不见唐墓中常见的房屋、车、柜、灶、井和俑类等模型明器。辽三彩的器类较少，仅见罐、瓶、碗、

①赵光林：《近年北京地区发现的几处古代琉璃窑址》，《考古》1986年第7期。

杯、盘、碟、砚、壶、水注等十余类。其中的鸡冠壶、皮囊壶、穿带瓶、海棠形长盘、方碟等，显然是仿制契丹人使用的皮质、木质等器物制成，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特色。（2）在胎质、釉色方面，辽三彩胎土粗糙，坯体中夹杂有红色斑点，因此所有器物在素烧后都要涂抹一层质细色白的化妆土，然后再施釉入窑烧成，胎体均呈淡红色。素烧时温度达1120℃左右，胎质瓷化程度高，吸水率低。辽三彩的釉色单一，主要为黄、绿、白三种彩釉，不见蓝釉和黑釉。大都采用填彩法，釉色界限分明，釉面很少流淌，缺乏唐三彩的釉色浑厚、浓淡不一的层次变化。（3）在装饰方面，辽三彩由于器类简单，主要以印花为主，少见划花和绘花等装饰。装饰内容单一，仅有花卉、游鱼、水波、飞蝶、流云等几种题材，而且在构图上讲究对称，纹饰繁缛，满布整个空间。

参考文献：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陈柏泉：《宋代铜镜简论》，《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吴荣曾《中国古代钱币》、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均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朱天舒：《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98年。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
孙新民：《略论辽三彩与唐、宋三彩的异同》，《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第九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遗迹与遗物

一、泉州宋元港与海船遗迹

泉州宋元港与海船遗迹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是宋元时期的名港。唐代的泉州城是一座规整的长方形城池，五代及南宋经数次扩建，成为依地形而建的不规则形城市。因五代时泉州罗城绕植刺桐，称刺桐城；城东南的泉州港，亦得名为刺桐港。该港包括3湾11港。自北而南为泉州湾、深垳湾、围头湾。泉州湾中洛阳、后渚、石湖3港。

泉州港从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始设市舶司开始正式开港，南宋发展成为中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北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西到波斯、阿拉伯半岛及东非地区，均有商船往来，促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从海外引进了旱稻、棉花，运来香料药物，输出瓷器、丝绸和铜铁器等。通往各国的航路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港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元末战乱，对外贸易被迫停止，明初实行海禁政策，泉州港逐渐衰落。

宋元为泉州港兴盛时期，留下了不少遗迹和遗物。如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古船上的各种构件；泉州的清净寺礼拜堂、开元寺东西塔及元代夜航灯塔——六胜塔等，都是反映中外交往及海上航行的著名遗迹。

1973 年，在后渚西南海滩上发现一艘保存较完整的南宋海船，1974 年进行了发掘[①]。海船上部结构损毁无存，残长 24.2、残宽 9.15 米。海船平面近似椭圆形，尖头方尾，船身扁阔，尖底，底有两段由松木接合而成的龙骨，全长 17.65 米。估计排水量为 370 吨左右，很适合于海上航行，是宋代四大船形之一的“福船”的实物例证。

二、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著名的港口，外国商人、旅行家、僧侣及各行各业的人会集于此，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互相辉映。同时，还有大量外国人侨居，尤以阿拉伯人为多。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建有自己的寺庙，有公共墓地，还有番学等。20 世纪以来，发现有关宗教石刻数百方，所属宗教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等，雕刻的文字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拉丁文、蒙古八思巴文及汉文。还有印度教浮雕石刻和佛教造像。泉州宗教石刻是外国人在泉州所建寺庙、墓葬等建筑的遗物，对研究外国宗教在中国传播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石刻、墓碑、墓盖石等 200 多方。石刻文字表明，他们来自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妞、布哈拉、花剌子模、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哈马丹、德黑兰，叙利亚的亚那不鲁斯，土耳其的玛利卡、亚达那，亚美尼亚的哈拉提，也门的哈妞门等。他们的身份有贵族、长老、哈只（对朝觐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人的尊称）、和加（宗教领袖）、毛拉（伊斯兰学者的尊称）、将领、番王、达鲁花赤等。

印度教石刻 300 多方，有各种故事石刻、龛状石、神像、神殿台基石、蛇形图案纹石、螺旋状石以及各种形式的柱头、柱础、梁楣、门楣、门框石、须弥座等。其中有圣班达·贝鲁玛在元初获元廷恩准在泉州建印度教寺院（番佛寺）的泰米尔文石刻。1934 年，在泉州南门曾经出土 1 件高达 1.15 米的毗湿奴神石像。印度教石刻的发现，反映了中印两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泉州的宗教文化、社会生活提供珍贵资料。

古基督教石刻 30 多方，其中属于景教的 20 多方。景教石刻质地优良，形式多样，有圆拱、尖拱、弧形、长方形。雕刻图案富于变化，十字架下雕刻莲花柱脚；有的雕刻云气纹；雕刻的带翼天使，或伸手，或双手捧圣物、圣像，在十字

①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架的臂端和中间常饰有宝珠；雕刻的文字有叙利亚文、八思巴文、拉丁文、汉文等。泉州景教石刻中有叙利亚文的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和中文合璧的元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摩尼教）、大秦教（景教）的教长失里门的墓碑。他是崇福司掌领下的高级官员。还有泉州路也里可温（也称也立乔，意思为奉基督教的人）的掌教官兼景教寺兴明寺住持吴安·多尼恩，他可能是来自波斯或西域的高级景教僧侣。有圣方济会泉州主教安德烈的墓碑，系拉丁文碑，安德烈为意大利人，据英国学者福斯特推测，安德烈死于1332年。石刻中的“大德黄公”是泉州景教教区的主教，“柯长诚，侍者长”是基督教的修士长[①]。

三、扬州拉丁文墓碑

1952年，在扬州南门水关附近发现两块拉丁文墓碑[②]，一块属死于至正二年（1342）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女儿喀德邻，墓碑上部刻着“圣喀德邻殉教”的图像；另一块属死于至正四年（1344）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儿子安东尼，墓碑上部刻着“末日审判图”。伊利翁尼（Yilionis）家族是热那亚城的商人，多米尼来到中国经商后，全家定居扬州。当时扬州有圣方济格会的教堂，多米尼是这个教会的信徒，死后便葬在教堂的墓地里中。

四、海南岛穆斯林墓群

海南岛三亚、陵水一带发现的唐宋以来的穆斯林墓葬群，主要分布在三亚市梅山，陵水县干教坡、番岭坡、土福湾等地，共有4个墓群[③]。在干教坡发掘了其中的4座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长约1.8~2、宽约0.8~1、深约1~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西北，脚东南，面朝西。每座墓葬的前后两端各竖碑石一块，每块碑石向外的一面均雕刻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和花纹图案。墓碑皆用珊瑚石雕刻而成，形状不一，碑文字体和花纹图案也略有不同。碑额中央有一圆月图案，月中浮雕阿拉伯文，碑文内容为死者名字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文。按形制可分为四类：（1）碑额中间作圭形，两边对称各突起两峰，两侧直平，底部不平整。一般高45~67、宽35~56、厚10~12厘米。（2）碑额呈半圆形，分五峰，两侧成弧形，底部不平整。一般高60~40、宽58~35、厚10~11厘米。（3）碑额中间高，两边低，各突起两峰。一般高61、宽58、厚13厘米；（4）碑额呈“山”字形，两侧平直，底部平整。墓上立（1）（2）类墓碑的墓葬约属于唐宋时期，立（3）（4）类墓碑的墓葬约属于宋元时期。

---

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考古》1963年第8期；夏鼐：《扬州城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货币》，《考古》1979年第6期。

③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这些墓葬在葬俗、墓葬形制和墓碑变化上都有明显的特点。首先是葬俗特殊，墓葬集中，排列有序。死者头在北（或西北），脚在南（或东南），侧身，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是典型的伊斯兰葬俗。碑文全部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死者的名字如阿特魏、萨曼·赫尼、艾斯马尔、伊本·赛义德·宛尔圣等，无疑是来自外国的穆斯林。其次是墓葬形制独特，全部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只在前后各竖一珊瑚石碑作墓穴标志，没有封土，这在我国其他伊斯兰教流传地区是很少见的。在伊斯兰教的发祥地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海岸佐德尔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这种形制的穆斯林墓葬。在东非一带沿海港口遗址中也发现有用珊瑚石作墓碑和建筑材料的。海南岛陵水、三亚一带的穆斯林墓葬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习俗，可能直接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与我国其他伊斯兰教流传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相比，具有早期特色。

陵水、三亚一带的穆斯林墓葬与唐至宋元时期穆斯林在海南岛活动的历史有关。海南岛是东亚、中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是我国海外交通的门户。在唐代，西域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每年都来往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进行贸易，海南岛是商船来往必经之地，所以当时就有波斯和阿拉伯人在海南岛活动。据《大唐和上东征记》载：唐天宝七年（748）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漂流到海南岛的振江口，得到当时振州别驾冯崇绩的迎接，后又被护送到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家安置。这个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已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如焉”。振州为唐武德五年（622）所置，领宁远、延德、临振、陵水四县，州治宁远（今三亚市崖城镇）。振江口即为番坊港。唐代广州等地外国（阿拉伯）人居留之地称番坊，番坊港附近也有番坊，是番商番船来往云集之所。其西侧即为梅山穆斯林墓葬群所在的酸梅铺。冯若芳所在的万安州为唐龙朔二年（662）置，治万安县（今万宁县），并以富云、博辽、陵水隶属。陵水县的干教坡、番岭坡、土福湾穆斯林墓群都正好在冯若芳的“村村相次”的波斯奴婢居住范围之内。在宋代，西域波斯、阿拉伯商船来往我国广州和东南沿海的更为频繁，在海南岛市舶的很多，外国穆斯林在海南岛寄泊，一时假寓或定居的也不少。定居下来的穆斯林，成了海南岛的回族居民。陵水、三亚一带发现的穆斯林墓葬，为我们研究中外交通、海南岛伊斯兰教流传和回族居民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五、伊斯兰玻璃器

宋元明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外来玻璃器，以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为主。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从发现地点来看，出要见于宋辽时期的塔基地宫和墓葬之中，它们大多数被用作佛教的供养品或墓葬的随葬品。从器形来看，有鸟形带把玻璃瓶、大口带把玻璃杯、直筒杯、细颈瓶、盘、细柄高足杯等，有的瓶上有刻花。这些伊斯兰玻璃器，有些呈蓝色、浅绿色，有的则无色透明。制造中采用了无模吹制、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描金、打磨、抛光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①]，腹壁所饰一周 28 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

主要的发现有陈国公主墓（1018）、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②]、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③]、辽宁朝阳北塔[④]等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筒玻璃杯、细颈瓶[⑤]，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出土玻璃瓶[⑥]，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⑦]等，内蒙古通辽土尔基辽墓出土的蓝色细柄高足杯。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保存完好，十分精美，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 7 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 2 件带把杯、1 件刻花瓶、1 件乳钉纹瓶、1 件乳钉纹盘和 2 件细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 10 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而且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草原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 8~11 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1 期。

②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3 期。

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④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 年第 7 期。

⑤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第 8 期。

⑥《安徽无为宋塔》，《文物》1972 年第 1 期。

⑦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 年第 1 期。

六、外来货币

1971~1973年，先后在福建泉州地区发现了5批西班牙银币[①]，这些银币多放在陶罐或瓷罐内埋藏起来的，推测可能是明末清初西班牙人从美洲运到亚洲的，其中大多数是由菲律宾运进我国境内的。这些发现，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密切的情况。

1964年，在广州明太监韦眷墓中出土了15世纪中叶的外国银币3枚，其中1枚是威尼斯银币，2枚是孟加拉银币。这些银币的出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意大利、孟加拉等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情况[②]。

参考文献：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吴幼雄等：《福建泉州清静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考古》1986年第6期。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2期。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①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泉州地区出土的五批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第6期。

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东山明太监韦眷墓清理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附 录

附录一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以出版年代为序）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文物出版社，1983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孔翔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纲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在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中国书店，1992年。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

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朱天舒:《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98年。

本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

夏鼐:《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韩伟:《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

孟凡人:《交河故城形制布局特点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齐东方:《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

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

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重要报告（以出版年代为序）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科学出版社，1996年。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骆希哲：《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金乡县主墓》，科学出版社，2002年。

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庄太子李㧑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城版社，2004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附录二　插图出处

著作、报告类注出书名，书名相同者加注著者，杂志注明名称、年份和期数。杂志以外，著作、报告均可参阅所附参考文献。

图一　《秦都咸阳考古报告》。
图二　《秦汉考古》。
图三　《秦汉考古》。
图四　《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2000》。
图五　《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图六　《秦汉考古》。
图七　《满城汉墓》。
图八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
图九　《考古学报》1983第2期。
图一〇　《西安龙首原汉墓》。
图一一　《中国古代瓦当图典》。
图一二　《文物》1987年第6期、《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长安汉墓》。
图一三　《中国古代铜镜图典》。
图一四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1999年第6期。
图一五　《考古学报》1983第2期。
图一六　《满城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图一七　《满城汉墓》。
图一八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图一九　《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
图二〇　《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
图二一　《考古》1989年第4期。
图二二　《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图二三　《文物》2000年第10期。
图二四　《文物》2000年第10期。
图二五　《文物》1974年第12期。
图二六　《魏晋南北朝考古》。
图二七　《魏晋南北朝考古》。
图二八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图二九　《考古》1964年第2期。
图三〇　《文物》1999年第1期。
图三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三二　《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图三三　《江苏考古五十年》。
图三四　《陇县原子头》、《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西安郊区隋唐墓》。
图三五　《西安郊区隋唐墓》。
图三六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
图三七　《金乡县主墓》、《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
图三八　《中国古代铜镜图典》。
图三九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
图四〇　《中国建筑艺术史》。
图四一　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
图四二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
图四三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四四　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
图四五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四六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四七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图四八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四九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五〇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五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图五二　《北宋皇陵》。
图五三　《考古》1965年第6期。
图五四　《中国建筑艺术史》。
图五五　《定陵》。
图五六　《白沙宋墓》。

后 记

教材的编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常因恐误人子弟而惴惴不安。故在编写体例及内容结构上，多与张宏彦教授、王建新教授、赵丛苍教授、钱耀鹏教授、陈洪海教授等交流和探讨，并屡屡得到启发和教诲。面对校样，不仅想起了还在讲坛上辛勤耕耘的他们，更想起了曾经对我进行过教育和有过帮助但已退休的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刘士莪教授、段浩然教授、段连勤教授以及研究生阶段的导师韩伟教授（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特别是已经去世的王世和教授、戴彤心教授格外让人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眼前。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戴老师检查我的课程准备情况，他不仅阅读了我编写的讲义，还进行了认真批改，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一一订正。当时的讲义都是手写，我曾经将一个不认识的字顺手写在了讲义的末页，准备查查字典，但时间一长，也就忘记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戴老师在翻阅讲义时在其一旁用工整的字迹注上了音，标上了声调，附上了字义解释。这件小事，使杜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表现的意境在我的脑海里生成一幅小景。随着岁月的推移，其色愈新，其意味也愈加悠长。

书籍的出版离不开出版社。三秦出版社的编辑韩宏伟先生，无意中在办公室看到了我自己打印并简单装订的这本讲稿的初稿，虽然已被改得花花绿绿、乱七八糟，但他还是认真地将其翻阅了一遍，建议并鼓励我将其出版。之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三秦出版社的社长费润民先生、总编辑赵建黎先生，他们听后慷慨允诺赞助出版，才有了本书稿面世的机会。对他们为人嫁衣之举，深表感谢。

讲稿的编写过程中，西北大学副校长任宗哲教授、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原西北大学副校长）方光华教授、教务处处长王正斌教授、文博学院院长陈峰教授、书记王雁玲及徐卫民、史翔副院长等，从教材编写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或意见。对他们的支持和关心，也深表谢意。

最后，还得感谢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教学不断提出挑战的学生们，他们让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冉万里

2008年10月